



摘

要

杉木 60片 1220

通小 第 1 次

杉木 60片 1250

第 2 次

電

A21
7484

日 頁	借 方	
	發	貨
	百十億千百十萬千百十元	
銷	19000	
現		200000
購		
現		

000139

A21/7484

目 錄

第一篇 1908—1911年的反動時期

1 走上軌道.....	3
2 關於目前時局和黨底任務決議的草案.....	12
3 “無產者”擴大編輯部會議底決議案.....	16
1 論召回主義和哀的美教主義.....	16
2 布爾塞維克在黨內的任務.....	20
4 關於鞏固黨及其統一的決議草案.....	23
5 政論家的時評.....	24
I 論召回主義底贊成者和擁護者之“綱領”.....	24
II 我們黨內“統一的危機”.....	34
1 對於統一的兩個見解.....	36
2 “兩條戰線上的鬥爭”和對於各種傾向的克服.....	42
6 論獨立合法派集團.....	46
7 論護黨的孟塞維主義和對牠的估計.....	59
8 結論：論布爾塞維克底綱領.....	67
6 論政權底社會結構，論前途和取消主義.....	69
7 論調和派或好心人底新政派.....	92

8 黨內危機告一段落.....	114
9 幾個爭論問題.....	126
1 1908年的決議.....	126
2 1910年的決議.....	131
3 取消派對1908年和1910年決議的態度.....	134
4 取消主義底階級意義.....	138
5 爭取公開黨的口號.....	142
6	145

第二篇 1912—1914年的高漲時期

1 節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全俄布拉加代表會議底 決議案.....	151
1 論取消主義和取消派集團.....	153
2 論黨的工作底性質和組織形式.....	154
2 革命的高漲.....	156
3 論“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底現狀.....	164
1 給“德國社會民主黨管理委員會”底一封信.....	164
2 1912年正月以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部情形.....	164
3 至今守中立的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對於所謂“組織委員會”抱何 種態度.....	165
4 取消派底騙局.....	166
5 第三國會中的社會民主黨黨團.....	167
6 關於黨底影響與取消派底影響之比較的可以正式審查的材料.....	170
7 關於取消派和黨兩者與俄國工人羣衆之聯繫的公開的可以審查 的材料.....	172

8 結論	176
9 “俄國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會啓	177
4 改良派底綱領和革命社會民主黨人底綱領	181
5 論高喊統一而實則破壞統一的行爲	191
1 論‘政派主義’	191
2 論分裂	196
3 論八月聯盟底瓦解	201
4 一個調和派對‘七人團’的忠告	204
5 託洛茨基底取消主義觀點	208
6 好決議和壞演說	214
7 再論國際社會主義局和取消派	218

第三篇 1908至1914年反動時期和新高 漲時期中的土地農民問題

1 給斯切津納夫的信	225
2 關於現政府底(一般的)土地政策問題	231
3 土地問題與俄國現狀	246

第四篇 1908至1914年時期內的民族問題

1 論民族自決權	253
1 何謂民族自決	253
2 問題之歷史的具體的提法	258
3 俄國民族問題底具體特點及俄國資產階級民主的改革	262
民族問題上的‘實際主義’	266

7 1896年倫敦國際大會底決議	272
8 空想的馬克思與求實的盧森堡	276
9 1903年的綱領及其取消者	285
10 結論	295

第五篇 1908至1914年時期內的國際革命運動問題

1 世界政治上的引火物	301
2 中國的民主主義與民粹主義	308
3 維新的中國	315
4 國際社會黨人底斯都加爾大會	317
5 好戰的軍國主義與社會民主黨反軍國主義的策略	327
6 德國工人運動中所不應仿效的地方	338
註釋	343—481

編譯部底話

編入本卷的，都是列甯在1908至1914年時期內的著作。本卷共分五編：第一編包括1908至1911年反動時期內的著作；第二編包括1912至1914年新高漲時期內的著作；第三編包括1908至1914年反動時期和新高漲時期內關於土地農民問題的著作；第四編包括1908至1914年時期的關於民族問題的著作；第五編包括1908至1914年時期內關於國際革命運動問題的著作。

本卷也如其他各卷一樣，著作基本上是按照牠們出世年代的先後來排列的，但也有些稍微不遵照這個原則的地方。比方，爲要使讀者易於領會1908至1911年反動時期內的各基本問題起見，列甯選集俄文版編輯部就將列甯在1913年所作的幾個爭論問題一文編入本卷第一編內。

在翻譯與校正過程中，本編譯部總是使俄文絕對符合原文的意思，字句通俗而易解，使技術上的缺點達於最低限度。我們歡迎讀者們對譯文的正確指示和批評。

其次，也如其他各卷一樣，書上腳註共分三種：第一是著者本人

註的，註尾沒有寫明是誰註的；第二是俄文版編輯部註的，註尾附有“編者”字樣；第三是譯者或校者註的，註尾附有“譯者”或“校者”字樣。

末了，還有一個聲明，就是俄文的“Fraction”一字，在本卷內曾譯為“政派”兩字，我們認為這種譯法還不是最完滿的，還不能完全表達“Fraction”一字的意思。有些人把“Fraction”譯作“小組織”，這是片面的，不切當的，因為這只是表明了這個名詞底組織內容，而沒有表明這個名詞底政治內容。反之，“政派”兩字專注意到這個名詞底政治內容而忽略了牠的組織內容。列甯給“Fraction”這字下了這樣的定義：Fraction 是黨內的這樣一種組織，這種組織不是由於工作地點，不是由於言語或其他的客觀條件而結合起來的，而是由於對黨的問題有特殊的主張而結合起來的。根據這個定義，我們認為把“Fraction 譯為”派別組織”是比較妥當些。因為技術上的困難，我們不便把“政派”改成“派別組織”，所以只得在這裏作了一個聲明，請讀者注意。

當然，Fraction 一字除上述的含義以外，還有其他的用法，如“黨團”、“黨派”等等。可是這字底含義是以具體的情形來決定的。

列甯選集中文版編譯部

1934年4月。

第一篇

1908—1911年的

反動時期



1 走上軌道(1)

過去的一年，是組織瓦解的一年，是思想上政治上紛亂的一年，是吾黨走頭無路的一年。黨底組織在黨員數量方面都縮小了；有些組織，即無產者人數最少的組織，已經瓦解了。革命所造成的那種半公開的黨機關，一個一個地被破獲了。黨內有些受瓦解底影響的份子竟發出這樣的問題：要不要保留原有的社會民主黨，要不要繼續地的事業，要不要再去做秘密工作和怎樣去做這種工作，——極右派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就是：無論如何要使黨公開化，爲此之故，甚至可以公開放棄黨底綱領、策略和組織（所謂取消主義的思潮）。無疑的，當時的危機，不僅是組織上的，而且也是思想上和政治上的。

不久以前舉行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底全俄代表會議，把我們的黨引上軌道，這次代表會議，顯然是反革命勝利以後俄國工人運動發展中的一個轉變關頭。代表會議底決定，由吾黨中央印成爲特殊的通告，經由中央批准，所以這些決定，直到下次代表大會止，是全黨底決定。在這些決定中，對於危機底原因和意義問題，以及擺脫這個危機的方法問題，都給了完全明確的回答。我們的各級黨部是要本代

表會議議案底堅決精神而工作，使黨的一切工作人員對於吾黨目前的任務，都有明白的和充分的認識，這樣，牠就能鞏固和團結自己的力量，來進行親密的和生動的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工作。

在組織問題議決案底理由上，已經指出黨內危機底基本原因。這個基本原因就是：工人政黨清去動搖的智識份子和小資產階級份子，這些份子過去所以附和工人運動，主要的是因為希望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即刻成功。他們在反動時期曾未能支持下去。這種不堅定性的，無論在理論方面（“離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論時局的決議案），無論在策略方面（“縮小口號”），無論在黨底組織政策方面，都表現出來了。覺悟的工人打擊了這種不堅定性的，堅決地反對了取消派，開始把黨部底事務及黨部底領導拿到自己手裏來了。如果黨內這個根本核心未曾能夠即刻克服紛亂和危機底成份，那末這不僅是因為在反革命勝利之下任務底重大和困難，而且是因為有一部份工人對黨抱一些冷靜的態度，這些工人具有革命的情緒，但還沒有充分具備社會主義的覺悟性。所以，代表會議底決定，即社會民主黨關於與紛亂和動搖作鬥爭的手段問題所持有的意見，首先就向俄國覺悟的工人宣告。

對現時各階級相互關係和沙皇制度底新政策加以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指出吾黨仍向自己提出的最近鬥爭目的；在革命社會民主黨策略底正確性問題上估計革命教訓；弄清黨內危機底原因和指出黨內無產階級份子在反對這種危機時的作用；解決關於秘密組織和公開組織之對比問題；承認有利用國會講壇之必要，替我們的國會黨團規定適當的領導指示，同時使這些指示與對國會黨團的直接批評聯繫起來，——所有這些就是代表會議決議底主要內容，此等決議，對於工人階級政黨在目前困苦時期中應如何選擇堅定的道路問題，給予完滿的回答。現在，我們要更仔細地來研究這個回答。

現時各階級在其政治分合上的相互關係，仍舊和以前羣衆直接革命鬥爭時期所具有的一樣。大多數的農民不能不努力於這樣一種土地革命，這種革命消滅半農奴制的土地佔有制，這種革命非推倒沙皇政權便不能實現。反動勢力底勝利，特別厲害地打擊了那些不能強固地組織起來的農民底民主份子，但是雖有一切的壓迫，雖有黑幫派的“國會”，雖有勞動派極端的不堅定性的，然而農民羣衆底革命性，甚至於在“第三國會”內的討論中，都顯然可以看出。無產階級對於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任務所站的基本立場仍舊沒有變更：領導民主的農民，把農民從自由資產者，立憲民主黨底影響下奪取過來；立憲民主黨繼續和十月黨人接近（雖然他們中間有小小的個別的爭吵），並在最近以來企圖造成民族自由主義，和用國家主義的鼓動方法去擁護沙皇制度和反動勢力。決議案說，現在的鬥爭目的仍舊是：完全消滅君主制度，由無產階級和革命農民奪取政權。

專制制度仍舊是無產階級和全體民主派底主要敵人。但是假使認為專制制度還是如以前一樣，那是很錯誤的。斯託雷平的“憲法”和斯託雷平的土地政策，是舊的半宗法的、半農奴制的沙皇制度解體過程中的一個新階段，是由這個沙皇制度轉變為資產階級的君主制度的道路上的一個新步驟。高加索底代表會想或者把這個對於時局的估計完全取消，或者是用“富豪統治的”形容詞來代替“資產階級的”形容詞，他們這種立場會是不正確的（2）。其實，專制制度老早已經是以富豪統治的了，但專制制度之成為資產階級的專制制度，——按其土地政策及其在全國範圍內與某些資產階級階層作直接的和有組織的聯合講來——却只在革命底第一階段之後，受了革命種種打擊的影響。專制制度老早已經扶養了資產階級，而資產階級也老早已經用金錢的勢力為自己打通了一條路徑，以接近“上層份子”，影響立法

機關和行政機關，和顯貴的貴族列於同等地位；但是，目前時局底特徵是在於：專制制度會不得不替某些資產階級階層建立一種代表機關，會不得不在這些階層與農奴主之間兩相周旋，在國會中組織這些階層底聯盟，會不得不拋棄牠對農夫底宗法思想的一切希望而在破壞村社的富人中去找尋反對鄉村羣衆的支柱。

專制制度用似是而非的立憲機關來掩飾自己的真面目，但同時在事實上，因為沙皇與普里什克維赤之流和古契可夫之流聯合而且只與他們聯合，所以專制制度底階級實質便空前地暴露出來了。專制制度企圖自己起來解決資產階級革命客觀上必需的任務：造成真正辦理資產階級社會事務的國民代表機關，清洗鄉村裏中世紀的、紛亂的、陳腐的土地關係；但是，正是專制制度新步驟底實際結果，至今只等於零，這正是更顯著地指出，必須用別的力量和別的手段來解決歷史任務。政治上沒有經驗的千百萬羣衆向來以為專制制度與一般的國民代表機關相對立的；而現在的鬥爭，却把自己的目標弄得更集中了，更具體地確定出己的任務：為爭取那個足以決定代表機關本身底性質和意義的國家政權而奮鬥。所以，在舊的沙皇制度底解體過程中，在牠的冒險行為底加強中，在舊的革命任務底加深中，在為此等任務而作的鬥爭範圍（以及參加鬥爭的人數）底擴大中，第三國會是一個特殊的階段。

這個階段應當被消滅；在目前新的條件下要有新的鬥爭方式；利用國會的講壇，是絕對必要的；訓練和組織無產階級羣衆的長期工作，被推到首位；祕密組織與公開組織之配合，在黨的前面提出種種特殊的任務；被自由派和取消派智識份子所污辱的革命之經驗，無論在理論的或實際行動的目的上，都必須加以通俗化和解釋。但是，黨底策略路線，應當善於估計鬥爭手段與鬥爭方法之新條件的策略路

綫，現在仍舊沒有變更。代表會議底一個決議案上說道，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策略底正確性，已由1905年至1907年羣衆鬥爭底經驗所證實了。在這第一次運動底結果中，革命失敗所暴露出的，不是任務之失當，不是最近目的之“空想性”，不是手段和方法之錯誤，而是力量沒有充分的準備，革命危機沒有充分的深入和擴大，——而斯託雷平及其同伴却正在最拚命地加深和擴大革命的危機哩！讓自由派和茫無所措的智識份子去爭取自由的真正羣衆的第一次戰鬥之後，精神頹喪罷，讓他們怯懦地向人宣傳：不要再到受了一次失敗的地方去，不要再走這條必遭失敗的道路。覺悟的無產階級將回答他們道：歷史上偉大的戰爭，革命底偉大的任務，所以解決了的緣故，只是因為學得失敗經驗的先進階級能夠再接再厲，屢次進行自己的襲擊而力謀達到勝利。戰敗之軍，善於學習。在第一次運動中，俄國革命的階級遭了失敗，但是革命的形勢仍然存在。革命的危機正在新的形式之下與經過別種道路而再行到來，而重新成熟——有時候要比我們所希望的遲緩得多。我們應當進行長期的工作，以準備更廣大的羣衆去應付革命的危機，這種準備應當是更認真的，估計到更高的和更具體的任務的；這種工作進行得愈順利，則在新的鬥爭中，我們的勝利愈是可靠。俄國無產階級可以自誇的地方，就是在1905年，奴隸民族在牠領導之下，第一次變成了進攻沙皇制度的成千百萬的兵馬，變成了革命的軍隊。這個無產階級現在又能堅定地、持久地、忍耐地進行一種工作，來訓練和準備更強固的革命力量底新的幹部人材。

我們已經指出過 利用國會講壇，就是這個訓練和準備工作底必要的組成部份。代表會議關於國會黨團的決議案給我們黨指示一條道路，這條道路——如果在歷史上去找例子，——最接近於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在非常法之下的經驗(3)。祕密的黨應當善於利用，應當

學習利用公開的國會黨團，應當把這個黨團訓練成爲一個能充分執行自己任務的黨組織。如果提出召回黨團的問題（在代表會議上曾經有兩個“召回派”*，他們沒有直接提出這個問題），或者不肯直接公開地批評國會黨團底錯誤，不肯把這些錯誤列舉在決議案上（在代表會議上有一些代表曾經這樣要求過）**，這都是最錯誤的策略，最傷心的事情——離開在目前環境中應有的堅定的無產階級的工作。決議案完全承認，國會黨團也犯了這樣一些錯誤，對於這些錯誤要負責任的不僅是一個黨團；這些錯誤與吾黨一切組織所未能避免的錯誤完全相同。但是又有其他的一些錯誤——這就是離開黨底政治路綫。既然有了這樣的錯誤，既然代表全黨來公開說話的組織犯了這樣的錯誤，那末，黨就會應該明白確切地指出，這是離開黨的路綫。在西歐各社會黨底歷史中，國會黨團對黨表示不經常的態度的實例，已經不止有過一次了；在拉丁族諸國內*，直到現在，黨團對黨的態度，往往還是不經常的，黨團底黨性還不充分。在俄國，我們對於培養社會民主黨國會政策的問題，應當立即有別的提法，在這方面應當立即進行和衷共濟的工作，使一切社會民主黨的議員，事實上都感覺到：黨站在他們的背後，黨關心於他們的錯誤，黨關心於他們道路之糾正，使每個黨的工作人員都來參加黨底一般國會工作，都學習用馬克思主義的切實精神來批評這種工作底步驟，都感覺到幫助這種工作是自己的義務，都設法使黨團底特殊工作，隸屬在黨底一切宣傳和鼓動工作之下。

* 伏爾斯基（即梭可洛夫）和略多夫（即曼德斯坦）——（編者）

** 孟塞維克。——（編者）

* 意大利、法蘭西、西班牙、葡萄牙和羅馬尼亞。——（編者）

此次代表會議，是黨內各最大組織底代表第一次富有威信的會議。牠討論了社會民主黨國會黨團在國會整個集會期間的活動。代表會議底決定，明白地指出：吾黨要如何進行國會的工作，牠向自己本身和對黨團在這方面提出怎樣嚴格的要求，牠如何不斷地和如何堅定地打算培養真正社會民主黨的國會政策。

關於對國會黨團的態度問題，有其策略的方面和組織的方面。在組織方面，關於國會黨團的決議案，又只是代表會議在組織問題指令決議中所規定的一般組織政策原則之對於單個情形的應用。代表會議指出，關於這個問題，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有兩個基本的思潮：一個思潮把重心移到祕密的黨的組織上去，另一個思潮——牠與取消主義多少是親近的，——却把重心移到公開的和半公開的組織上去。我們已經指出了，目前局面底特點，就是有些黨的工作人員——特別是智識界出身的，可是也有一部份是工人出身的——脫離了黨。取消主義的思潮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現在，最好的最積極的份子離開黨而選擇公開組織為活動場所，抑或是“動搖的智識界的和小資產階級的份子”離開黨呢？不消說，代表會議會堅決地駁倒了和申斥了黨取消主義並答覆道：“動搖的智識界的和小資產階級的份子”離開黨。黨內最富有無產階級性的份子，原則上最堅定的最富有社會民主黨精神的智識份子，仍然忠於“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離開黨即是清洗黨，即是把最不堅定的不可靠的朋友，把“半途伴侶”（Mitläufer）從黨內排除出去，這些人都是從小資產階級或從“失了階級性的”人們（即越出某一階級底軌道的人們）中出身的，他們始終會是暫時地附和無產階級的。

從這個對黨的組織原則的估計中自然而然地產生代表會議所通過的組織政策的路線。目前的任務就是：鞏固黨的祕密組織，在一切

工作部門建立黨的支部，首先就要“在每個工廠中建立純粹黨的、雖然人數不多的、工人的委員會”，把領導職能集中在工人出身的社會民主運動指導者手裏。當然，這些支部與這些委員會應利用一切半公開的組織和（在可能範圍內）公開的組織，保持“與羣衆的密切聯繫”，使工作按着能使社會民主黨去應付羣衆一切需要的方向走。每個支部和每個黨的工人的委員會，應成爲“羣衆中鼓勵的、宣傳的和實際組織的工作底支點”，就是說，必定要到羣衆所去的地方去，並且要步步努力推動羣衆的意識，使其向着社會主義發展，把每個局部的問題與無產階級的一般任務聯繫起來，把每次組織上的發端變爲階級團結的事業，用自己的精力，用自己的思想影響（當然不是用自己的頭銜和爵位）在一切無產階級的公開組織中去爭取領導作用。縱使這些支部和委員會有時候數量很少，可是在牠們中間却將有黨的傳統底聯繫和黨的組織底聯繫，却將有一定的階級綱領，——這樣一來，兩三個社會民主黨員，就不至於融解在散漫的公開組織中，而在一切條件之下，在任何環境之內，在一切可能的情況之下，都能實行自己黨的路綫，都能以全黨精神去影響環境，而不至於被環境所吞噬。

在反革命統治之下，反革命可以解散某種形式的羣衆組織，可以摧殘公開的工會，可以用警察故意爲難的手段來損害工人底一切公開的發端；但是世界上無論什麼力量都不能排除資本主義國家——俄國已成爲這樣的國家了——內工人底大批的集合。工人階級這樣或那樣、公開地或半公開地、或明或暗地，總可以找到相當的團結地點，——無論何時何地覺悟的社會民主黨人，將走在羣衆的前列，無論何時何地他們將彼此團結起來，拿黨的精神去影響羣衆。而且社會民主黨已經在公開的革命中證明自己是階級底政黨，曾經能够領導成千百萬羣衆，去進行罷工，舉行1905年的暴動，參加1906年至1907

年的選舉；牠現在也能夠仍舊做階級底政黨，羣衆底政黨，能夠仍舊做一個先鋒隊，這個先鋒隊在最困難的關頭將不與全部軍隊脫離；能夠幫助這支軍隊去打破這些困難關頭，能夠再團結全軍底隊伍，能夠準備一批一批的新戰士。

讓黑幫派的健將們在國會內和國會外，在首都內和窮鄉中去高興和狂吠吧，讓反動勢力去耀武揚威吧，——可是聰明絕頂的斯託雷平底每一步驟，不能不使兩相周旋的專制制度更接近於崩潰，不能不使政治上無辦法的和荒謬的行動更加紛亂，不能不使生力軍補充到無產階級隊伍及農民羣衆革命份子隊伍中去。善於鞏固自己去作與羣衆聯繫着的堅定工作的黨，先進階級底黨，——善於組織先進階級先鋒隊，努力以社會民主黨精神去影響無產階級每次生活表現的黨，無論如何都是要得到勝利的。

1909年2月（1月）



2 關於目前時局和黨底 任務決議的草案(8)

目前的政局有下列各個特點：

(A) 舊的農奴制的專制制度正在發展成爲資產階級的君主制度，這種君主制度以假的立憲形式來掩蔽專制制度。沙皇制度與黑幫地主及上層工商業資產階級間的聯合，已由6月16號(3日)的國家政變和第三國會底成立所公然批准和承認了。專制制度已迫不得已而最終走上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並竭力擁護正是這樣一條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這條道路能夠保留農奴主地主底政權和收入，所以，牠總是周旋於農奴主地主階級與資產階級代表之間。專制制度利用這兩個階級間的細小爭執來維持自己的地位，協同他們進行狂烈的反革命的鬥爭，以反對在不久以前的羣衆鬥爭中表現出自己力量的社會民主主義的無產階級與民主主義的農民。

(B) 現時沙皇制度底土地政策(4)，也具有這種資產階級的拿破崙主義的性質。沙皇制度已經完全不相信農民羣衆對君主制度有幼稚的忠順思想了。牠正在謀與富農聯合，讓富農去打劫農村。專制制度拚命破壞一切村社份地的土地佔有制，而專門鞏固私人土地所有制。這樣的政策使鄉村中一切資本主義底矛盾緊張百倍，並且加速鄉村之分化爲絕對少數的反動派和革命的無產階級的及半無產階級的羣衆。

§ (C) 以立憲民主黨爲首的自由資產階級，在革命中發生第一批大的羣衆發動時，就已經走上反革命的道路，牠現在繼續向這條道路前進，更加接近十月黨人，而且牠所進行的沙皇主義的民族主義的鼓動——這是資產階級階級自覺增長之表現，——其實就是替專制制度和農奴主地主們服務。

(D) 農民羣衆不管政府對鄉村民生份子的一切壓迫，還是繼續站在（雖然有動搖）革命民主的土地改革方面；關於這一點，甚至於就是加入第三國會的那些被人壓迫和損傷的農民代表（5），也指出來了：這種土地改革，完全消滅地主式的土地佔有制，這就保證資本主義俄國底生產力有最迅速的、最普遍的、最自由的發展。11月22號（9日）所頒布的法律（6）只是加速農民羣衆之劃分成爲兩種勢不兩立的和政治上覺悟的力量。

(E) 無論從專制制度方面來的打擊，無論從迅速聯合着和進攻着的資本方面來的打擊，過去和現在，落在無產階級身上的要算最多。雖然如此，但無產階級與其他各階級比較起來，牠却保留着最大的團結性並對本階級的政黨保留着最大的信仰心，因爲革命使無產階級與牠的政黨溶合起來了。無產階級繼續爲自己的階級利益而奮鬥和加深自己的社會主義的階級意識，牠仍然是唯一的能够徹底領導新的革命鬥爭的階級。

(F) 一般地和整個地說來，毫無疑義的，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客觀任務仍舊沒有解決。繼續着的經濟危機、失業和饑荒現象，證明專制制度最近施行的政策不能保證俄國資本主義發展底條件。這種政策必然使民主羣衆與統治階級間的衝突加深起來，使新的人民階層底不滿意增長起來，使各階級底政治鬥爭更加緊張和加深。在這種經濟和政治局面之下，新的革命危機必然成熟起來。

(G) 世界市場上一般的緊張化，其主要原因，是在於西歐工業狀況發生變化而陷入危機（這種危機在 1908 年已進入停滯形式了），東方掀起了革命運動（這些運動將使民族的資本主義國家建立起來）（7），這種緊張化加強競爭，使國際上的衝突日益增多，如此便使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的階級矛盾劇烈化，使一般的國際環境日益成爲革命的環境。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全俄代表會議，根據上述各種實情，認爲目前黨底基本任務有下列各點：

(1) 對廣大的民衆解釋專制制度最近政策底內容和意義以及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底作用，無產階級應當實行獨立的階級的政策，同時應在現代政治中和行將到來的革命鬥爭中去領導民主派的農民。

(2) 對1905年到1907年的羣衆鬥爭底經驗，加以各方面的研究和普遍的宣傳，因爲這種經驗給了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策略底一些無可代替的教訓。

(3) 鞏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革命時代的原有面目；保持也與專制制度和反動階級以及資產階級自由主義作不調和的鬥爭這種傳統；反對離開革命馬克思主義的行動，反對縮小「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口號的行動（8），反對取消「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這個秘密組織的企圖（黨內有些受瓦解影響的份子就有這些企圖）。

這裏必須注意到，只有促進這一個把黨的職能過渡到社會民主黨人自己手裏的過程（這個過程現在已經顯然表現出來了），只有建立和鞏固秘密的黨組織，才可以把黨引上正確發展的道路。

(4) 依照倫敦國際大會和斯都加爾國際大會底決議案（9），各方面去促進工人階級底經濟鬥爭。

(5) 利用國會和國會講壇以進行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宣傳和鼓動。

(6) 目前第一個緊急任務，就是進行長期的工作來訓練、組織和團結無產階級底覺悟羣衆。其次——這一點隸屬於前一任務——必需把組織工作（特別是用文字上的宣傳和鼓動形式）推廣到農民中和軍隊中去，而主要的注意應當集中在向農民中和軍隊中的無產階級的和半無產階級的份子施行社會主義的訓練上面。

1909年1月(1908年12月)

3 “無產者”擴大編輯部

會議底決議案(10)

1、論召回主義和哀的美敦主義

我們黨內革命派所提出的抵制布里根國會和第一國會的口號，在當時起了很大的革命作用，並且吸引了工人階級中一切最積極的和最革命的階層。

自後廣大羣衆直接的革命鬥爭，就由反革命的困苦的階段所代替了；此時，社會民主黨人必須適應着這個新的政治環境而應用自己的革命的策略，因此，利用公開的國會講壇以幫助社會民主黨的鼓動和組織，也就成爲我們最重要的任務之一了。

可是一部份在過去參加過直接革命鬥爭的工人，曾不能在事變迅速的轉變當中立即應用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策略，以適應新的反革命的條件，而只是簡單地重復口號——這些口號在以前公開的國內戰爭時代曾是革命的，而現在把牠們簡單地重復起來，就能够阻止在新的鬥爭條件下團結無產階級的過程。

另一方面，在這個困難轉變底基礎上，在革命鬥爭低落底空氣中，甚至在一部份工人也表示冷淡和迷惑的情形之下，在工人的組織被摧殘和牠們沒有充分力量去抵抗腐化影響的這個時期中，——在工人階級當中，便有一部份人對於一般政治鬥爭，抱一種旁觀態度，特別是對於社會民主黨底國會工作起一種更其淡漠的心理。

在這些條件之下，所謂召回主義和哀的美敦主義，便能够在無產階級這些階層中得到暫時的勝利。

公開嘲笑工人底苦境的第三國會所作的工作，又加強了此等工人階層中召回主義的情緒，此等階層因為沒有充分的社會民主黨的訓練，還不能明瞭下面這一個情形：正是第三國會底這種活動使社會民主黨人能够以革命手段利用剝削階級底這個代表機關，去向廣大的民衆說明專制制度及一切反革命力量底實質，向他們說明革命鬥爭之必要。

在這一部份工人當中所以養成召回主義的情緒，除上述情形以外，還因為社會民主黨的國會黨團在過去（特別在牠第一年的活動中）犯了非常嚴重的錯誤。

布爾塞維克政派承認，召回主義的情緒對於工人階級底社會主義和革命的訓練有壞的影響，所以認為：

（1）對於工人中的此等階層，必須進行長期的社會民主黨的訓練工作和組織工作，有系統地和堅忍地解釋召回主義和哀的美敦主義在政治上的全無效果，解釋社會民主黨的國會政策底真正意義，以及反革命時期中的國會講壇對於社會民主黨人的作用；

（2）對於社會民主黨的國會黨團以及一般的國會工作，必須建立國會黨團和先進工人間的密切聯繫，全黨要各方面幫助黨團，並且有組織地監督牠和強制牠，其方法之一，就是公開解釋牠的錯誤；要切實地實現黨對於黨團（牠是一個黨的機關）活動的領導，由布爾塞維克來把最後一次的全黨代表會議關於這個問題的決定，一般地實行起來，因為只有工人加強自己對社會民主黨國會黨團活動的注意和有組織地參加國會中的社會民主黨黨團底活動，才能把我們的國會黨團底策略在事實上糾正過來。

(3) 對於黨內的右派（牠引誘國會黨團走上反黨的道路，因而使黨團脫離工人先鋒隊），要進行有系統的和不可調和的鬥爭和揭露他們這種危害黨的策略。

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有些份子會附和我們的黨，吸引此等份子的，不是我們黨的純粹無產階級的綱領，而主要的是牠爭取民主制的顯明的和奮勇的鬥爭，牠們在接受無產階級政黨底革命民主的口號時，沒有把這些口號和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底整個鬥爭聯繫起來。

這些沒有充分貫徹無產階級觀點的份子，在我們布爾塞維克政黨的隊伍中却也有了。在此黑暗時代，此等份子日益表現其沒有充分的社會民主黨的堅定性，並既與革命社會民主黨策略底基礎日益發生激烈的矛盾，在最近一年來牠們就造成一種思潮，這種思潮企圖形成召回主義和哀的美教主義底理論，但是實際上牠只是把自己關於社會民主黨的國會政策和社會民主黨的國會工作所持的錯誤觀念奉為原則而加深起來。

這些將召回主義情緒造成召回主義政治整個系統的企圖，結果得出一種理論，這種理論實質上表現政治上的旁觀主義底和無政府主義迷誤情緒底思想系統。無論召回主義和哀的美教主義有其各種的革命口頭禪，然而牠們底理論實際上大多是立憲迷夢（即希望國會本身能滿足民衆這些或那些迫切的要求）底另一方面，所以這個理論其實是以小資產階級的傾向來代替無產階級的思想。

所謂哀的美教主義也是有害於社會民主黨的工作的，牠的害處，並不比公開的召回主義小些（哀的美教主義便是這樣一種思潮：在原則上不肯利用第三國會的講壇，或企圖用實際的理由來為自己

不執行這個義務的行為作辯護，並竭力想召回社會民主黨的國會黨團，用立刻向國會黨團提出哀的美敦書的方法，來代替長期訓練和糾正國會黨團的工作）。現時哀的美敦主義在政治上與召回主義絲毫沒有分別，而且因為他是暗藏的召回主義，只引起更大的模糊和混亂思想。哀的美敦主義企圖說，牠與我們這一派在革命某個時機中應用過的抵制主義有直接的聯繫，牠這個企圖只是曲解吾黨絕大多數人在對付布里根國會和第一國會時用得十分正當的抵制手段底真實意思和性質。哀的美敦主義和召回主義企圖根據革命某個時機中對於代議機關的抵制手段之個別應用而提出抵制的路線作為布爾塞維主義策略——連反革命時期中的布爾塞維主義策略也在內——底特色，這就表示，此等思潮其實就是孟塞維主義底另一方面，——孟塞維主義鼓吹無條件地參加一切代議機關，不管革命發展底階段如何，不管有無革命的高漲。

召回主義和哀的美敦主義至今所做的在原則上給自己理論以根據的一切企圖，必然使牠們否認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底原則。牠們所擬定的策略必然弄到與國際社會民主黨左派應用於俄國現條件下的策略完全分裂而走入無政府主義的歧途。

召回主義和哀的美敦主義的鼓動，已經開始給工人運動和社會民主黨的工作以確實的害處了。如果這種鼓動再繼續下去，牠能够危害黨底統一，因為這種鼓動已經引起了這樣的惡劣現象：如召回派和社會革命黨人（在聖彼得堡）聯合起來拒絕幫助吾黨在國會中的代表（11），以及在工人前面與某些工團主義者共同發表一些公開的言論。

因為這一切情形，所以“無產者”擴大編輯部聲明：布爾塞維主義是俄國社會民主黨內一定的思潮，牠與召回主義和哀的美敦主

義，沒有絲毫相同之點：布爾塞維克政派應當與離開革命馬克思主義道路的這些傾向，作最堅決的鬥爭。

2、 布爾塞維克在黨內的任務

自第二國會解散以後，接着便是反革命大勝利的時代，這時代的客觀環境，向全部的黨的活動提出這樣一個任務：不管反動勢力如何努力，不管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極其消沉，而要保持在不無產階級鬥爭最高漲時期所造成的黨的組織，——就是說要保持這樣一個組織。這個組織自覺地站在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基礎上，和統一各“民族的”社會民主黨的組織，以實行一致的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策略。

在這個兩年來為黨及黨性而鬥爭的過程中，已經十二分明白地表現出：一方面，黨和被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特殊條件所吸收入黨的份子，分清了界線；他方面，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繼續團結起來。一方面，已經完全表現出，社會民主黨底已往的半途伴侶，脫離黨，把自己的活動完全轉移到各種公開的組織（合作社、工會、教育團體、國會黨團下的特別委員會）中去；在那裏，他們不僅不會實行黨的政策，而且相反，與黨作了鬥爭，竭力與黨脫離關係，竭力把此等組織與黨對立起來。此等份子，公開取消黨的份子，把合法性當作崇拜的偶像，把這種因工人運動一時低落和散漫而勉強採用的狹隘的活動形式，當作一種原則；大家看得非常清楚，這些份子已經站到理論的和策略的修正主義立場上去了。國會黨團內智識份子的“顧問”（12） 逼迫我們黨團執行機會主義路線之全部歷史，以及在公開的工人組織中和四種代表大會（人民大學代表大會、合作社代表大會、婦女代表大會、工廠醫生代表大會）（13） 底工人團中取消派和護黨派間的全部鬥爭，現在已經十二分明白地指出和證明：組織上的取消主義（與

黨的機關作鬥爭)與反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反對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黨綱基礎的原則鬥爭,有極密切的聯繫。

另一方面,黨內的左派(當此反革命大獲勝利的時期,這個左派已經擔負了領導黨的使命)在理論上承認了並且在實際上實行了一種策略,即將秘密的和公開的黨的工作適當地聯結起來。屬於這一類工作的,就是黨對於國會黨團的一切工作與在公開的和半公開的無產階級組織內的一切工作。目前歷史時幾底特殊條件正是提出這些工作形式,作為秘密黨用以影響多少廣大的羣衆的形式,作為對黨的基本工作形式的補充。正是在此等工作形式中,黨在實際工作上、在事實上就碰到取消主義並給取消主義以嚴重的打擊。而在這個基礎上,各政派內護黨的社會民主黨人就切實地接近了,並且還在接近起來*。最後,同是在這裏,同是在第三國會時期條件下的那些黨的策略問題和組織問題上,布爾塞維克派公開地與那些假革命的、不堅定的、非馬克思主義的份子,——拿所謂“召回主義”旗幟來反對黨的新的活動形式的份子分清界線。

在目前,“無產者”擴大編輯部會議規定布爾塞維克底基本任務時,特指出以下幾點:

(1) 在繼續為黨和為黨性而鬥爭的時候(布爾塞維克派應照舊是為黨性和為黨內革命社會民主黨路線而鬥爭的先鋒戰士),布爾塞維克派底任務就是從各方面去積極幫助黨底中央委員會及中央機關

* 中央曾經一致通過下列各個決議:關於工會的決議,關於合作社的決議,關於國會黨團工作的幾個決議。在最近這次全俄代表會議上,絕對大多數是贊成黨的路線的。中央機關報底工作經驗,上述各種代表大會內的工人團等等(14)。

報。在現時黨內力量重新分合的時期中，只有全黨的各中心機關，才能充當黨的路線底有感信的和有力的代表者，而一切真正黨的和真正社會民主黨的份子就會在黨的路線底周圍團結起來；

(2) 在黨內孟塞維克的營壘中，在該政派底正式機關報“社會民主黨人呼聲”被孟塞維克取消派完全俘虜之下，政派少數嘗試了取消主義道路到底以後，已在抗議反對這條道路，並在替自己的活動重新找尋黨的立場（聖彼得堡“維包格區的”孟塞維克底信，莫斯科孟塞維克底分裂，社會民主黨人呼聲編輯部內的分裂，“猶太工人同盟”內部類似的分化等等）（15）；

(3) 在此等情形之下，仍舊為黨底團結的先鋒隊於布爾塞維克，其任務不僅是繼續和取消主義及各式各樣的修正主義作鬥爭，並且要和其他各派中馬克思主義的和擁護黨的份子接近起來，因為在為保持和鞏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而作的鬥爭中，我們的目的是相同的。

1909年7月（舊曆6月）

4 關於鞏固黨及其統一 的決議草案(16)

中央機關報編輯部認為，在現時鞏固本黨及本黨統一的唯一方法，祇能是把實際的工人運動中某些有力量的和有威信的政派接近起來（這種接近已經表現出來了），而不是道德式地哀求這些政派之消滅。而且這種接近應當在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策略和組織政策基礎上建立起來和發展起來，這個組織政策是用來與“左的”和“右的”取消主義作堅決的鬥爭，特別是與右的取消主義作堅決的鬥爭的，因為已被打倒的“左的”取消主義，其危險性是比較少些。

1909年11月（舊歷10月）

5 政論家底時評(17)

I. 論召回主義底贊成者和擁護者之“綱領”

不久以前“前進社”在巴黎出版了一本小冊子：“現時形勢和黨底任務，布爾塞維克集團所擬定的綱領”。這個布爾塞維克集團，就是去年春天“無產者”擴大編輯部談到牠(新政派)形成的那個集團，現在這個集團“有十五個黨員：七個工人和八個智識份子”(該集團這樣告訴我們)，牠發表演論是要對於自己特殊的“綱領”加以完整的有系統的肯定的敘述。這個綱領底原文，顯然具有慎重的、周到的和集體的研究工夫，其中刪除了一切不圓滑的字句，取消了激烈的措辭，其所着重說明的地方，主要的不是該集團與黨分歧之點，而是牠與黨同意之處。這個新的綱領是著名政派見解之正式的敘述，這對於我們是更有價值的。

布爾塞維克集團首先敘述牠怎樣“了解我國現時歷史形勢”，(第一節，第3頁至13頁)，然後敘述牠怎樣“了解布爾塞維主義”(第二節，第13頁至17頁)。而牠對於前者和後者都了解得不好。

我們拿第一個問題來看吧。布爾塞維克底見解(和黨底見解)，已經在1908年12月代表會議關於時局的決議案上敘述過了*。新綱領

* 請參看本卷內，關於目前時局和黨底任務的決議草案，這個草案經代表會議通過，通過時，雖有一些更改，但並沒有變更其實質。——(編者)

底起草人是否同意這個決議案上所表示出的見解呢？如果同意，那麼他們何以不爽直地說出來呢？如果同意，那末何以要起草特殊的綱領，何以要敘述自己對於時局的特殊的“了解”呢？如果不同意，那末爲什麼也不明白地說出來，新的集團到底在什麼地方反對黨底見解？

原來問題就在於：新的集團自己也不明白這個決議案底意義。新的集團不自覺地（或一半不自覺地）傾向於召回主義者底那種與該決議案不可調和的見解。新的集團在其小冊子中所作的通俗的解釋，並未涉及該決議案底一切論點，而僅僅涉及該決議案底一部份，同時却沒有了解另一部份（也許甚至看不出牠的意義）。該決議案說，引起1905年革命的基本因素正在繼續發生作用。新的革命危機正在成熟（第1項）。鬥爭底目的仍舊是推翻沙皇制度和爭取共和國；無產階級應在鬥爭中起“領導的”作用和應努力於“奪取政權”（第e項和第1項）。世界市場和世界政治底條件使“國際環境日益成爲革命的環境”（第g項）。以上這些論點，便是新綱領所加以通俗解釋的，在這個範圍內牠是與布爾塞維克和黨完全携手共進的，在這個範圍內牠是敘述正確的見解和作出有益的工作的。

可是不幸之處也就在於：我們必須把在這個範圍內這幾個字加上着重點。不幸之處也就在於：新的集團不了解該決議案，他的論點，不了解這些論點與其餘各論點的聯繫，尤其是不了解這些論點與那個對召回主義所取的不調和的態度間的聯繫，這個不調和的態度是爲布爾塞維克所具有而不是爲這個集團所具有的。

革命又是不可避免的。革命又應當推翻而且完全推翻專制制度——新綱領底起草人這樣說道。這是對的。可是，現代的社會民主派革命家應當知道而記着的，不限於此。他應當善於懂得：這個革命之到來是按新的方式的，我們也應當用新的方式去應付牠（與以前不

同：不僅像以前一樣，不僅要用以前所用的鬥爭工具和鬥爭手段）；現在的專制制度不是以前的專制制度。這也就是召回主義擁護者所不願意看到的！他們偏要只顧一面，這樣一來，他們（不管他們的意志如何，不管他們的意識如何）便效忠於機會主義者和取消派，他們就以站在一面的偏向來幫助站在另一面的偏向。

專制制度已進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牠按着那條轉變為資產階級君主制度的道路而進一步。第三國會就是與某些階級的聯盟。第三國會不是偶然的機關，而是這個新君主制度中必要的機關。專制制度底新土地政策也不是偶然的，而是必要的、資產階級方面必要的、按其資產階級的性質是必要的一個新的沙皇制度政策中的組成環節。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特殊的歷史階段及其所帶有的產生新革命的特殊條件。如果只按舊的方式去幹，如果不會利用國會講壇的本身等等，那末就不能領會這個特殊性，就不能準備自己去應付這個新的革命。

最後這個論點，也就是召回派所不能了解的。而召回主義底擁護者稱召回主義為“正當的色彩”（見上述的小冊子，28頁），他們不了解，與這個論點聯繫着的，乃是整個觀念的系統，乃是承認時局底特殊性！乃是力求在自己的策略中估計到這個特殊性！他們再三重複說：我們現在處於“兩個革命中間的時期”（29頁），“現在的形勢”是“民主革命兩個浪潮中間的過渡形勢”（32頁），但是他們不能了解，這個“過渡”底特點，究竟在什麼地方。而不先懂得這個過渡，就不能為革命底利益而渡過牠，不能準備自己去應付新的革命，不能過渡到第二個浪潮！因為準備應付新的革命這個工作，不能僅以重複革命必不可免這些字眼為限；這個準備應當在於根據這個過渡形勢底特點，去進行宣傳、鼓動和組織的工作。

請看人們怎樣說到過渡形勢而不懂這個過渡在什麼地方的實例吧。“在俄國沒有任何真正的憲法，而國會只是憲法底幻影，沒有權力，也沒有意義，這不僅民衆從經驗中知道得很清楚，就是全世界現在也都明白了”（11頁）。試拿這段話和十二月代表會議對於第三國會的估計作一比較吧：“沙皇制度與黑幫地主及上層工商業資產階級間的聯合，已由6月16號（3日）的國家政變和第三國會底成立，所公然批准和承認了”。

綱領起草人雖然把這個決議案，在黨報上重複咀嚼了一年之久，但畢竟還是沒有懂得這個決議案，這難道不是“全世界都明白的”嗎？他們所以不懂的緣故，當然不是因為他們不懂事理，而是因為他們被召回主義和召回主義觀點系統所牽制了。

俄國的第三國會是黑幫十月黨人的國會。至於說十月黨人和黑幫在俄國沒有“權力和意義”（綱領起草人就是這樣說的），這是胡說。“真正憲法”之缺如，專制制度之保留全部權力，並不是排斥下面這個特殊的歷史局面：這個權力不能不在全國範圍內，在全國意義的公開行動的機關中，組織某些階級之反革命的聯合；某些階級自己也由下而上地組織起來，而成為歡迎沙皇制度的反革命的聯盟。如果沙皇制度與此等階級之“聯合”（為保留農奴主地主們底權力和收入而作的聯合），是目前過渡時期中這些階級底統治和沙皇及其黨徒底統治之一種特殊形式，是在“革命第一次浪潮”失敗底條件之下由國內資本主義底進化所產生出來的形式，——那末，要是不利用國會講壇，就談不到什麼利用過渡時期。那末，利用反革命者用來說話的講壇以準備革命的這一個特殊策略，便是一個必要的由整個歷史環境底特性中所產生出來的策略。如果國會只是憲法底“幻影”，而“沒有權力和意義”，那末在資產階級的俄國、資產階級的君主國底發展

中，在各上層階級統治形式等底發展中，就沒有任何的新階段，那末召同派在原則上當然也是對的了！

讀者不要把我們在上面從綱領中引來的話，看作是偶然的出言不慎。在專論國會的一章內（第25到28頁），起首就這樣說道：“至今所有的國會都是沒有切實力量和權力的機關，都是沒有表現國內社會力量真正對比的機關。政府在民衆運動打擊之下召集了這些國會，目的是：一方面要把羣衆的憤激從直接鬥爭的道路中引誘到和平的選舉道路上去；他方面要在國會中與那些能够援助政府去反對革命的社會集團商酌妥當”……這就是一場糊塗的思想，或是不成體統的思想。如果政府之召集國會，目的是要與反革命的各階級商酌妥當，那末從這裏所得出的結論，恰巧就是：第一國會和第二國會，沒有“力量和權力”（來幫助革命），而第三國會則曾經有過並且現在也有“力量和權力”（來幫助反革命）。革命者能够（而在某種條件之下會應當）不參加無力幫助革命的那個機關。這是無容爭辯的。綱領起草人把革命時期底這些機關與那個有力量幫助反革命的、“兩個革命中間的時期”內的國會混爲一談，這是非常錯誤的。他們把正當的布爾塞維克的議論，恰巧拿到實際上不能應用這些議論的情形之下來應用！這恰巧就是把布爾塞維克主義變成爲被曲解的東西。

綱領起草人在總括其對於布爾塞維克主義的“了解”時，甚至於提出特殊的D條（16頁），在這一條裏面，這種“被曲解的”革命性，可以說已經有了標本式的表現。試引該條全文如下：

“D. 在革命完成以前，工人階級之一切半公開的和公開的鬥爭方法和鬥爭道路——參加國會也在內——都不能有獨立的和決斷的意義，而僅僅是集合和準備力量去作直接革命的、公開的、羣衆鬥爭的一種手段”。

在他們看來，在“革命完成”以後，各種公開的鬥爭方法，國會工作也“在內”，就能够有獨立的和決斷的意義了

不對的。在那個時候，也是不能夠的。“前進派”底綱領，竟寫出這種毫無意思的話頭來。

其次。在他們看來，“在革命完成以前”，除掉公開的和半公開的鬥爭方法以外，一切鬥爭方法，即一切秘密的鬥爭方法，都能够有獨立的和決斷的意義！

不對的。有些秘密的鬥爭方法，無論在“革命完成”之後（例如秘密的宣傳小組），無論“在革命完成以前”（例如奪取敵人的資財、或用暴力去釋放被捕者、或殺死偵探等等），都“不能夠有獨立的和決斷的意義，而僅僅是……”，如“綱領”原文上所說的一樣。

其次。此地所謂“革命完成”是指什麼革命底完成？這顯然不是指社會主義革命底完成，因為那時候一般地不會有階級存在，也就不會有工人階級底鬥爭了。這樣看來，此地是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完成。現在我們來看，綱領起草人所“了解”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完成究竟是什麼？

一般地說，這個術語可以了解為兩種東西。如果把牠用在廣義上，則牠可以了解為：資產階級革命客觀歷史任務底解決，資產階級革命底“完成”，就是說，能夠產生資產階級革命的這個基礎本身底消滅，資產階級革命整個週期底完成。在這個意義上說，譬如法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只在1871年才算完成（牠在1789年就已經開始了）（18）。假如把這個術語用在狹義上，則這是指單個的革命，指幾個資產階級革命中的一個，指“幾個浪潮”中的一個，牠打擊舊制度，但沒有打破牠，沒有消滅此後各個資產階級革命底基礎。在這個意義上，德國1848年的革命，是在1850年或1850年代“完成了”，但這並沒有消

滅1830年代革命高漲底基礎。法國1789年的革命，可以說在1794年“完成了”，但這並沒有消滅1830年、1848年的革命底基礎

綱領內“在革命完成以前”一語，不管牠是用在廣義上，或是用在狹義上——無論如何這句話總是沒有意思的。不消說，如果現在企圖確定革命社會民主黨底策略直至俄國一切可能的資產階級革命整個時期底完成為止，那末這是完全荒謬的。而關於1905年到1907年的革命“浪潮”，就是說，關於俄國第一次資產階級革命，該綱領自己也不能不承認：“牠（專制制度）戰勝了革命底第一次浪潮”（12頁），我們所處的時期，是“在兩個革命之間”，是“在民主革命兩個浪潮之間”。

“綱領”中這個無止境的和無出路的糊塗觀念，其根源究竟在什麼地方呢？其根源正在於：綱領外表上與召回主義脫離關係，而絕不擺脫召回主義思想底圈套，絕不更正牠的基本錯誤，甚至沒有看出這些錯誤。其根源正在於：“前進派”認為召回主義是“正當的色彩”，就是說，他們認為被曲解的布爾塞維主義底召回主義色彩，是正當的模範，是無上的模範。誰站在這個傾斜面上，他就無可支持地滾到而且一定會滾到無出路的糊塗觀念底深淵裏去；他就重複空話和口號，而不會思索牠們適用底條件及其意義底限度。

舉例來說，1906到1907年，布爾塞維克何以屢次用“革命沒有完結”這個口號去與機會主義者對立起來呢？因為當時客觀的條件是如此：在狹義上說，談不到什麼革命底完成。就拿第二國會時期來說吧。此時有世界上最革命的國會和幾乎最反動的專制政府。所以除了自上而來的政變或由下而起的暴動之外，當時就沒有直接的出路；現在無論高明的學究們如何搖頭歎息，但在政變以前，誰也未能擔保，說政府得以完成政變，政變將順流地過去，尼古拉第二在這政變中不至受到失敗。“革命沒有完結”這個口號會有最生動的、直接重要的、實

際上可以感覺到的意義，因為祇有這個口號正確地表示：形勢如何，由於事變客觀的行程，事情要向那裏發展。現在呢，召回派自己也承認，現在的局是“在兩個革命之間的”局面，此時，他們又企圖把這個召回主義當作是“革命派之正當的色彩”——“在革命完成以前”——難道這不是無辦法的糊塗觀念嗎？

要從這個無出路的矛盾圈套中跳出來，那就不應當與召回主義玩弄外交手腕，而應當割斷他的思想基礎；應當站在十二月代表會議決議案底觀點上，應當澈底思索這個決議案。現在所處的兩個革命之間的時期，不是由偶然性來說明的。現在已經毫無疑義了：我們目前所處的階段在專制制度底發展中，資產階級君主制底發展中，資產階級黑幫代議制底發展中，鄉村中沙皇制度資產階級政策底發展中，反革命資產階級擁護以上一切的行動中，是一個特殊的階段。這個時期的確是“革命底兩個浪潮之間”的過渡時期，但是要準備應付第二次革命，正是必須領會這個過渡底特點，要善於把自己的策略和組織去適應這個艱難的、困苦的、黑暗的、而由“運動”進程強迫我們經過的過渡。利用國會講壇，如利用其他一切公開的可能性一樣，是極不高超的鬥爭手段，不帶有什麼“光彩的”。但是過渡時期之所以為過渡，正因為這個時期底特殊任務，就是準備和積聚力量，而不是力量之直接的發動，不是力量之堅決的發動。善於進行這個無慘關外觀的活動，善於利用一切黑幫派和十月派的國會時代所具有的那些半公開的機關來進行這種活動，就是在這個基礎上，也善於堅持社會民主黨底一切傳統，他的不久以前的英勇時期中的一切口號，他的全部工作精神，他對於機會主義和改良主義所抱的一切不調和的態度，——這就是黨底任務，這就是目前的任務。

我們已經把新綱領離開1908年12月代表會議決議案所敘述的策

略的第一個觀點加以分析了。我們已經知道，這就是跑到召回主義思想方面去的觀點，這些思想無論與馬克思主義對於現時局面之分析，無論與一般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的策略底基本前提，都絲毫沒有相同的地方。現在我們要考察新綱領底第二個底高特點。

這就是新集團所宣佈的任務，要“造就”和“在羣衆中推廣新的無產階級的”文化：“發展無產階級的科學，鞏固無產階級隊伍中真正的同志關係，造成無產階級的哲學，使藝術向無產階級的趨勢和經驗方面去發展。”(17頁)

這就是新綱領中用以掩飾事情真相的幼稚的外交手腕底模範！請看吧！在“科學”和“哲學”中間插入“鞏固真正的同志關係”，這難道不是很幼稚麼？新集團把牠自己預料的恥辱，牠自己對其他各集團（首先就是正統的布爾塞維克）的歸咎，說牠們破壞“真正的同志關係”，放到綱領中去。這個可笑條文底實在內容，就是如此。

“無產階級的科學”這句話，這裏也說得“難聽和文不對題”。第一，我們現在只知道一種無產階級的科學——馬克思主義。綱領底作者何以有系統地避免這個唯一確切的術語，而到處用“科學社會主義”這類的話來替代牠（13, 15, 16, 20, 21各頁）。大家都知道在俄國，直接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人，也企圖用“科學社會主義”這個術語。第二，如果要在綱領中提出發展“無產階級的科學”這個任務，那末必須說明白，綱領底作者此地是指現時那種思想上理論上的鬥爭，是站在那一方面。關於這一點默不作聲，這就是幼稚的狡猾手段，因為所有知道1908年1909年的社會民主黨底刊物的人，對於事情底實質是很明白的。在我們這個時代，在科學、哲學和藝術方面，馬克思主義者與馬哈主義者之間的鬥爭，已進到首要地位(19)。如果閉着眼睛不看見這個有目共見的事實，這至少也是可笑的。“綱領”不應為掩蓋意

見分歧而作，而應為解釋意見分歧而作。

在綱領底上面所引的一段話中，這些作者不乖巧地自己揭破自己。大家都知道，所謂“無產階級的哲學”其實就是指馬哈主義——所有明白事理的社會民主黨人立即可以揭破“新的”匿名。想出這個匿名是無謂的。隱藏在這個匿名之後也是無謂的。其實新集團中最有勢力的作家的核心就是馬哈主義的核心，他認為非馬哈主義的哲學，就是非“無產階級的”哲學。

如果想在綱領中說及這個問題，那就應該這樣說：新集團所聯合着的人們，是要反對哲學上和藝術上非“無產階級的”，就是說非馬哈主義的理論。這才算是大家知道的一派思潮直爽的光明正大的言論，這才算是與其他各派思潮鬥爭的言論。當人們認為思想鬥爭對於黨有重要的意義時，那末恰恰就要公開宣戰，而不是藏身匿跡。

而我們將號召大家對於綱領暗中與馬克思主義所進行的哲學上的鬥爭，給以肯定的明確的回答。在事實上，所有關於“無產階級的文化”的語句，正是用來掩飾反馬克思主義的鬥爭的。新集團底“獨創之處”就在於他把哲學放在黨綱內，而不直爽地說，在哲學中，他所擁護的究竟是那一派。

然而，我們不能說，在綱領底上面所引的一段話中所含有的真實內容，都完全是壞的內容。在這段話當中，也可以發現一些好的內容。這個好的內容，可以用高爾基這三個字表現出來。

其實用不着隱蔽那一個已被資產階級的報紙所囂張了（曲解了和顛倒了）的事實，這就是：高爾基也是新集團方面的人（20）。而高爾基却無條件地是無產階級藝術底最偉大的代表，他對於這種藝術已經有了許多貢獻，並且還能有更多的貢獻，社會民主黨底任何政派可以因高爾基之屬於自己的政派而正當地自誇，但是根據這一點就

把“無產階級的藝術”放在綱領內，這無異於證明該綱領是貧乏的，無異於把自己的集團當作是作家小組，而自己恰恰就是揭露自己是“崇拜權威”……。綱領底作者說了許多反對承認威信者的話，但是他們不直爽地說明，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事情是這樣：在他們看來，布爾塞維克在哲學中堅持唯物主義而和召回主義鬥爭，這就是馬哈主義底敵人“所盲目信託”的個別“威信者”的事情（何等明顯呵！）；這類的攻擊當然是萬分幼稚的。然而，“前進派”恰巧對待威信者對待得不正當。高爾基在無產階級的藝術方面是一個威信者，這是無庸爭辯的。企圖“利用”（當然是指思想上而言）這個威信者來鞏固馬哈主義和召回主義，這無異於標榜：如何不應該這樣對待威信者。

在無產階級的藝術方面，高爾基有很大的長處，雖然他是同情着馬哈主義和召回主義的。在社會民主黨的無產階級的運動底發展中，這一個綱領（他提出發展似乎是“無產階級的”藝術作為特殊的集團的任務，這樣便在黨內特別造成馬哈主義者和召回主義者集團），是一種短處，因為這個綱領，立意在大威信家底活動中去鞏固和利用恰恰構成這個大威信家底弱點的地方，去鞏固和利用他對無產階級所給的偉大貢獻中的短處。

1901年3月

II. 我們黨內“統一的危機” (21)

有的讀者看了這個標題，也許不能即刻相信自己的眼睛。“這還了得麼！在我們黨內已經有過百般危機了，——何以忽然又有新的統一的危機呢？”

這一句聽起來這樣奇怪的話，是我從李卜克內西*那裏引來的。1875年（4月21日）李卜克內西致恩格斯的信上，敘述拉沙爾派和

愛森拿赫派的統一時用過這句話(22)。當時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這個統一不會有甚麼好的結果。李卜克內西則認為他們的擔心是無根據的，並擔保說：順利地渡過了一切危機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也將渡過“統一的危機”（參看Gustav Mayer: “Johann Baptist von Schweitzer und die Sozialdemokratie” Jena. 1909 S. 424）**

毫無疑義地，我們的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也會順利地渡過自己的統一的危機。誰要是讀過中央全會底決議，誰要是看到全會以後的事變(21)，他就可以看見，我們的黨現在正遇着統一的危機。如果按全會決議來判斷，那末，這種統一似乎是最完滿的和完全終結了的。假如按現在的情形，1910年5月初所有的情形，按中央與由取消派出版的“社會民主黨人呼聲”所作的堅決的鬥爭，按普列漢諾夫和其他護黨的孟塞維克向“呼聲派”所作的劇烈的論戰，按“前進派”反對中央機關報的這種極端謾罵的言論（見剛才出版的該派的傳單：告布爾塞維克同志書(23)）來判斷，那末，旁觀者就容易覺得任何統一都是一種幻想。

黨底公開的敵人，非常高興。召回主義底贊助者和掩護者“前進派”正在大事謾罵。取消派底領袖們——阿雪洛德、馬丁諾夫、馬爾託夫、波特列索夫等等，“在其對普列漢諾夫日記應有的補充”（24）中，罵得更兇。“調和派”則束手無策，作不平之鳴，說些可憐的話（參看1910年4月30日（17日）“維也納社會民主黨俱樂部”所通過的決議案，這個俱樂部是站在託洛茨基派觀點上的）（25）。

* 這是威廉·李卜克內西，生於1826年，死於1900年。德國社會民主黨底創始人。卡爾·李卜克內西底父親。（校者）

** 麻衣爾著 施維澤和社會民主黨。（編者）

但是，對於最重要的基本問題：我們黨的統一何以這樣而不是那樣進行，何以在全體會議上（看來似乎）完滿的統一，現在已變為（看來似乎）完全的分離，在這中間，有些什麼原因；又如對於這個問題：因為黨內和黨外“力量底對比”，黨今後的發展趨勢應當是怎樣，——對於這些基本問題，無論取消派（呼聲派），無論召回派（前進派），無論調和派（託洛茨基和維也納派），都沒有任何的回答。

謾罵和空談並不是回答。

1、對於統一的兩個見解

取消派和召回派同心協力地大罵布爾塞維克（取消派還罵普列漢諾夫）。他們說，罪在布爾塞維克，罪在布爾塞維克的中央（10），罪在列甯和普列漢諾夫底“個人主義的”癖性（參看必要的補充第15頁），罪在“布爾塞維克中央底舊委員”“不負責任的集團”（參看“前進社”底傳單）。在這方面，取消派和召回派是完全團結一致的；他們締結聯盟來反對正統的布爾塞維主義（這個聯盟屢次表現在全體會議上的鬥爭中，關於這點以後另說），是無可爭辯的事實；兩個同樣表示服從資產階級觀念、同樣反黨的極端思潮底代表，在其黨內政策中，在其和布爾塞維克鬥爭中，在其宣稱中央機關報為“布爾塞維克的”機關報的時候，是完全一致的。但是，阿雪洛德和亞力新斯基之最有力的謾罵，只是掩蔽他們之完全不懂黨的統一底意思和意義。託洛茨基（——維也納派）底決議案與阿雪洛德和亞力新斯基底“吐實”，只有表面上的不同。該決議案寫得非常“謹慎”，企圖主持“超政派的”公理。但是他的意思在什麼地方呢？他認為“布爾塞維克的領袖”處處應負其咎，——這是阿雪洛德和亞力新斯基底“歷史哲學”。

在維也納派決議案第一段上說道：……“一切政派和思潮底代表

……用自己的決議”(在全體會議上通過的)“自覺地和嚴重地擔負起在某種條件下與某些個人、團體和機關合作中來實行通過了的決議案的責任”。這是指“中央機關內部的衝突”而言(26)。在中央機關報內誰是全體會議“決議案實行底負責者”呢？顯然是中央機關報底大多數，就是說，布爾塞維克和波蘭人，他們便是“在與某些個人(即呼聲派和前進派)合作中”實行全體會議決議案的負責者。

全體會議底主要決議案，有一部份是說到我們黨內最“麻煩的”問題，這些問題在全體會議以前會是爭論最多的問題；而在全體會議以後會應當成爲爭論最少的問題；這個主要決議案底這一部份說些什麼話？

牠說：資產階級影響無產階級的表現，一方面在於否認祕密的社會民主黨，降低牠的作用和意義等等；他方面在於否認社會民主黨底國會工作和否認利用公開可能性，不識前者和後者底重要性等等。

現在試問這個決議案究竟有甚麼意思：——

是不是呼聲派會應當誠懇地和決絕地不再否認祕密的黨，不再降低牠的作用等等呢？是不是他們會應當承認這是一種傾向呢？是不是他們會應當離開這個傾向和以仇視這個傾向的精神來進行積極的工作呢？——是不是前進報派會應當誠懇地和決絕地不再否認國會工作和公開工作可能性等等呢？——是不是中央機關報大多數應當以呼聲派和前進派誠懇的澈底的和決絕的拋棄他們那底被全體會議決議案所詳細指出的“傾向”爲條件而極力設法吸收他們來“合作”呢？——是不是這樣的呢？

抑或決議案底意思就是——中央機關報大多數應當擔負那種“在與某些”呼聲派(仍舊繼續和甚至更魯莽地擁護取消主義的呼聲派)以及“某些”前進派(仍舊繼續和甚至更魯莽地堅持召回主義、

哀的美敦主義等等底正當性的那種前進派)“合作中”來實行決議案(關於克服取消主義的和召回主義的傾向的)的責任?

一提出這個問題,就能夠看到,託洛茨基決議案中的響亮詞句,如何無內容,——這些話在事實上如何幫助阿雪洛德及其同伴和亞力新斯基及其同伴所站的立場。

託洛茨基在其決議案開始一段中就表示出最惡劣的調和主義底全部精神,這種“調和主義”是抵弧內的,小組式的,庸人的,只顧“某些個人,而不顧某條路綫,不顧某種精神,不顧黨工作底某種思想的和政治的內容。

須知這裏就是託洛茨基及其同伴底“調和主義”與主張清除黨內取消主義和召回主義的真正黨性之間的天淵之別;託洛茨基底“調和主義”在事實上最忠順地替取消主義者和召回主義者服務,因此他越狡猾,越精巧,越好聽,越是用彷彿黨的、彷彿反政派的漂亮話做幌子,則他對於黨便更有危害。

事實上黨底任務是什麼呢?

是否就是要把“某些個人、團體和機關”——不顧他們的路綫,不顧他們的工作內容,不顧他們對取消主義和召回主義的態度——“調和起來”呢?

抑或者是黨的路綫,是我們一切工作之思想的和政治的方向與內容,是清洗這種工作中的取消主義和召回主義的這一個任務,——不管那些不同意這條路綫或不實行這條路綫的“個人、團體和機關”底反抗而應當實現的那個任務呢?

對於任何的黨的統一底意義和條件,可有兩種見解。認識這兩種見解底區別,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在我們的“統一的危機”發展過程中,這兩種見解彼此混合着和錯綜着,如不把一種見解與別種見解分

清界線，則不能瞭解這個危機。

對於統一的一種見解，可以把“某些個人、團體和機關”間的“調和”放在第一位。依照這種見解說來，他們對黨的工作、對這個工作路線的意見底一致，是次要的事情，應當極力把各種意見分歧隱瞞起來，而不應當弄清牠們的根源，牠們的主義，牠們的客觀條件。把個人和團體“調和起來”，這是主要的事情。假如他們在總路線底實行中不能有一致的意見時，那就要把這條路線解釋得使牠能夠為大家所採納。請你過活和使他人也能過活罷。這就是庸夫俗子的“調和主義”，牠必然引起小組式的外交手腕。這個“調和主義”之主要視線集中於，塞住意見分歧底來源，隱瞞這些來源，無論如何要把“衝突”“調停下去”，使對敵的方向中和化。很明顯的，在秘密黨底活動根據地是在國外的條件之下，這種小組式的外交手腕，就是大開門戶讓那些在實行“調和”和“中和”的各種企圖時充當“誠實中間人”的“個人、團體和機關”都一齊進來。

請看馬爾託夫在“呼聲”第19至40期上怎樣敘述全體會議上的這種企圖：

“孟塞維克，‘真理派’*和猶太工人同盟派，曾經提議要這樣一些人來扭負中央機關的工作，就是要他們能夠保證黨內兩個對抗的思潮底“中和化”，不讓這兩個思潮中任何一派人占多數，這樣來逼迫黨的機關對於每個重要的問題採取居中的路線，以便能夠聯合大多數黨內的工作人員。”

* 所謂“真理派”，就是集合在托洛茨基於維也納出版的真理報周圍的那一夥人。至於布爾塞維克底真理報，在當時還沒有出版。——(校者)

大家都知道，孟塞維克底提議沒有通過。託洛茨基曾提出自己到中央機關報編輯部中去作爲一個中和者，他也遭受了失敗。提出來担任同種職務的一個猶太工人同盟派的候選人（孟塞維克在其發言中提出了這個候選人），甚至沒有拿來付表決。

這就是惡劣的“調和派”底實際作用，他們曾經寫過維也納的決議案，他們的見解就在我剛才所得到的“猶太工人同盟底回聲”第四期上楊諾夫論文中發表出來了(27)。孟塞維克會不敢提出以他們的派別占多數的中央機關報編輯員名單來——但同時他們却承認（從我上面所引的馬爾託夫底議論中可以明白看出）黨內有兩個互相對抗的思潮。孟塞維克甚至並沒有想到要提出以他們的派別佔多數的中央機關報編輯部底名單來。孟塞維克甚至沒有打算要求中央機關報有一定的方針（非常明顯地，在全體會議上孟塞維克沒有方針，人們才剛剛要求孟塞維克，才剛剛希望孟塞維克能夠誠懇地和澈底地放棄取消主義）。孟塞維克曾經企圖使中央機關報“中和化”，並提出了猶太工人同盟派或託洛茨基作爲中和者。猶太工人同盟派和託洛茨基會應當盡媒介人底作用，使“某些個人、團體和機關”（不顧某一方面是否已經放棄取消主義）“結成佳偶良緣。”

媒介人底這種觀點就構成楊諾夫和託洛茨基底調和主義之一切“思想基礎”。當他們看見統一沒有成功便歎息流淚時，那末了解這一點的時候應當 *Cum grano salis**。這應當解作爲結婚沒有成功。託洛茨基和楊諾夫對於統一的希望，對於與“某些個人、團體和機關”（不願他們對取消主義所抱的態度如何）統一的希望之“遭受挫折”，

* 拉丁語，原意爲——用鹽屑，借喻爲——有一些附帶條件，有相當的限制。——（編者）

只是媒介人之遭受挫折，只是媒介人之觀點不對，不可靠，可憐，而並不是黨的統一之遭受挫折。

對於這個統一還有另外一種見解，這種見解就是：許多深刻的客觀的原因（這些原因不是以“某些（給全體會議的和全體會議上所有的）個人、團體和機關”之某種成份為轉移的），在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兩個舊有主要政派中老早已開始引起了而且還在引起這樣的變遷：這些變遷造成（有時違背着“某些個人、團體和機關”中一部份人底意志和甚至意識）統一底思想的和組織的基礎。此等客觀條件基於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底特性中，這是俄國資產階級式的發展時代，資產階級反革命的時代，專制制度企圖按資產階級君主制度方式而改造自己的時代。這些客觀條件在同一時期和彼此不可分離地造成工人運動性質底改變，造成工人社會民主黨先鋒隊之成份、方式、外貌底改變，以及造成社會民主運動之思想的和政治的任務底改變。因此，造成取消主義（等於半自由主義，他希望把自己歸入社會民主黨）和召回主義（等於半無政府主義，他希望把自己歸入社會民主黨）的那種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影響，並不是一種偶然現象，不是某種個人的惡意，蠢笨或錯誤，而是此等客觀原因發生作用的必然結果，而是現時建築在俄國全部工人運動上的、與“基礎”不可分離的上層建築。因為認識這兩種傾向對於工人運動的危險、害處和非社會民主黨的性質，所以各政派內的份子日益接近起來和“經過一切障礙”而奪黨的統一，開闢一條道路。

從這個觀點看來，統一可以進行得很慢、很困難，有動搖、擺動、反覆，但他不能不進行。從這個觀點看來，統一底進行並不是必需要在“某些個人、團體和機關”之間，而是不以某些個人為轉移，使某些個人屈服於統一，把那些不認識和不願認識客觀發展要求的人拋

棄於“某些人”以外，而提拔和吸引新的不屬於“某些人”的個人去補充“某些人”，使舊的政派、思潮、集團底內部發生變化，再行更改和重新分合。從這個觀點看來，統一是與他的思想基礎不可分離的，統一只有根據思想之接近才生長起來，統一又與取消主義和召同主義這些傾向之出現、發展、增長有聯繫，這種聯繫不是某些論戰的言論、某種文字上的鬥爭之偶然的聯繫，而是內部的不可分離的聯繫，如因果的聯繫一樣。

2. “兩條戰線上的鬥爭”

和對於各種傾向的克服

對於我們黨內統一底實質和意義的兩個原則上不同的根本分歧的見解，就是如此。

現在試問在這兩種見解中，那一種見解是全會決議案底基礎呢？誰願對這個決議案稍加思索一下，他就可以看出，他的基礎，就是第二種見解，但是決議案在有些地方，帶有着第一種見解的精神而實行局部“更正”之痕跡。不過這些“更正”雖然弄壞了決議案，可是絕對沒有取消他的基礎，沒有取消他那個貫徹着第二種見解的主要內容。

爲要指明這一點，指明是有小組式的外交精神的“更正”確實祇帶有局部更正底性質，指明這些更正沒有變更問題底實質和決議案底原則基礎，現在我就要說一談黨內所已經說到的關於黨內實況的決議案中的某幾條和某幾段。先從結尾談起吧。

楊諾夫歸咎“舊政派底領導者”說：他們正竭盡全力來妨礙統一底實現，他們在全體會議上的舉動也是這樣，“從他們那裏取得每一步時都會要進行鬥爭”，同時楊諾夫又寫道：

“列甯同志會不願意用“擴大和加深社會民主黨工作”底方法去“克服各種危險的傾向”。他曾十分努力地想把“兩條戰綫上的鬥爭”理論當作黨的一切發端底中心。他甚至沒有想到要消滅黨內“關於嚴密防範的條例。”（第22頁第一條）

這是指關於黨內實況的決議案第四條第二項而言的(28)。這個決議案底草案曾經由我提到中央去，而這一條是在委員會工作之後由全體會議自己更改的，這個更改是根據託洛茨基底提議的，我雖然反對了這個提議，却沒有成效。在這一條上面我雖不是寫了“兩條戰綫上的鬥爭”這幾個字，那末至少是寫了表示這樣意思的話。“用擴大和加深底方法去克服”這些字樣是根據託洛茨基底提議而加進去的。楊諾夫同志提起我反對這個提議的鬥爭，給我適當的機會來解釋這些“更正”底意義，這是使我高興的一回事。

在全體會議上再沒有別的東西能如“兩條戰綫上的鬥爭”這個觀念使人發生這樣利害的（往往是滑稽的）怨恨。只要提起這一件事，就使前進派和孟塞維克非常難堪。這種怨恨是完全可以以歷史觀點來說明的，因為布爾塞維克從1908年8月至1910年正月事實上進行了兩條戰綫上的鬥爭——與取消派和召回派的鬥爭。這種怨恨之所以滑稽，是因為曾經怨恨布爾塞維克的人們，這樣一來只是證明了他們自己的過失，只是證明了：對取消主義和召回主義的一切指斥仍在連累他們。真是所謂做賊心虛。

託洛茨基提議以“用擴大和加深底方法去克服”這些字樣來代替兩條戰綫上的鬥爭，他的提議會得了孟塞維克和前進派熱烈的擁護。

因為有這種“勝利”，所以現在無論楊諾夫，無論真理報，無論維也納的決議案。無論社會民主黨人底呼聲，都高興起來。但是試問，從這一條上刪去了關於兩條戰綫上的鬥爭的字樣以後，是否就從

這個決議案刪去了承認這個鬥爭之必要呢？絕對不是的，因為，既經承認“這些傾向”，既經承認牠們的“危險”，既經承認有“解釋”這種危險之必要，既經承認此等傾向就是“資產階級影響無產階級表現”，那末按實質請求，這正是承認兩條戰綫上的鬥爭！在一個地方更改了“難聽的”（對於某個朋友）名詞，但是保留了基本意思！結果，只是把這一條底這一部份弄得糊塗混雜一些，用一種空話來使牠變壞些罷了。

事實上，如果在這一條內說到“用擴大和加深工作的方法來克服”等等的話，那末這恰恰就是空話和無辦法的遁辭。此地毫無明白的意思。擴大和加深工作，無論何時都是絕對必要的；這一點在決議案整個第三節內說得很詳細了（29），在未講到特殊的（這不是任何時候都絕對必需的，而是由特別時期底條件所產生的）“思想的和政治的任務”以前就說到了。第四條所發揮的就只是特殊的任務，而在該條所包括的三項底引言中直捷了當地說道：這些思想的和政治的任務“已提到日程上來了”。

結果怎樣呢？結果得出無意思的議論：似乎擴大和加深工作底任務也提到日程上來了！似乎可以有這樣的歷史“日程”，此時這個任務沒有了，而其實這任務是永遠存在的！

試問怎樣可以用擴大和加深社會民主黨的工作底方法去克服各種傾向呢？在任何的擴大中，在任何的加深中，必不可免地要發生如何去擴大和如何去加深的這一個問題；如果取消主義和召回主義不是一種偶然現象，而是由社會條件所產生出來的思潮，那末牠們可以鑽進工作底任何的擴大和任何的加深中去。可以本着取消主義底精神去擴大和加深工作，例如“我們的曙光”和“復興”所做的那樣；這也可以本着召回主義底精神來做。另一方面，對於各種傾向的克

服，真正的“克服”，不可免地要把用在正確的社會民主黨工作之直接擴大和加深中的相當的力量、時間和精神剝奪去。例如楊諾夫在自已論文同一頁內寫道：

“全體會議已經開完了。參加會議的人們也走盡了。現在中央要在整理工作的時候去克服非常的困難，在這些困難中，所謂的（楊諾夫同志！祇是所謂的，而不是真正的，不是實在的嗎？）取消派底行動不是佔着最後的一個位置，而取消派底存在又是爲馬爾托夫同志所這樣堅決否認的。”

你們看吧，這種材料（小小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材料）就足以說明託洛茨基和楊諾夫底說話是如何的空洞！克服米哈爾、玉里及其同伴底取消派步驟，這會使中央不得不把用以直接擴大和加深真正社會民主黨的工作的力量和時間剝奪去。假如沒有米哈爾、玉里及其同伴底行爲，假如在我們繼續誤認爲自己同志的那些人們中間沒有取消主義的話，那末擴大和加深社會民主黨的工作也就進行得更加順利了，因爲內部的鬥爭就不致於把黨底力量剝奪去了。這就是說，如果把擴大和加深社會民主黨的工作解作爲本着真正社會民主黨的精神去直接發展鼓動、宣傳、經濟鬥爭等等，那末，克服社會民主黨人脫離社會民主主義的傾向，對於這個工作是一種短處，可以說是“積極活動中”一個折扣，因此，關於用擴大等等的方法去克服各種傾向的話，就沒有意思了。

這種話其實就是表現模糊的希望，善良的、幼稚的希望，希望社會民主黨人中間少作些內部的鬥爭！在這種話中間，除了幼稚的希望之外，便沒有表現出任何的意思；這就是所謂調和派底歎息：噯嚨，如果和取消主義及召回主義少作些鬥爭的話！

此種“歎息”底政治意義即等於零，劣於零。如果黨內有人認爲

“堅決否認”取消派（和召回派）底存在於他有利，那末這些人就是利用“調和派”底“歇息”去掩蔽害處。社會民主黨人底呼聲就是這樣做的。因此祇有所謂的“調和派”才擁護決議案中好意的空洞的辭句。而實際上他們是幫助取消派和召回派的，實際上他們不是加深社會民主黨的工作，而正是加深離開社會民主黨工作的傾向，正是鞏固害處，因為他們暫時把害處隱藏起來，使人難以消弭這個害處。

爲要把這種害處底意義指示給楊諾夫同志看，我就拿楊諾夫同志在討論特刊第一期上的文章中一段話使他回憶一下(30)。楊諾夫曾經很妥當地拿取消主義和召回主義與良質腫瘤相比較，這個腫瘤“在膿腫過程中把全身一切毒素都吸引到這個腫瘤上，這樣一來就可以助長牠的健康”。

對啊。膿腫過程把全身底“毒素”都吸引在一塊，就會使人健康。而凡阻難身體去清洗這些毒素的東西，都是有害於身體的。讓楊諾夫同志想一想楊諾夫同志這個有益的觀念吧！

6、論獨立合法派集團（31）

現在我們來解釋在全體會議後所發生的事情。對於這個問題，託洛茨基和楊諾夫給了一個相同的和簡單的回答。維也納的決議案說道：“無論在外部政治生活條件中，無論在我黨內部關係上，在全體會議之後都沒有發生過任何切實的變化，致難以進行黨底建設工作”……這都是政派主義的復發，政派主義關係底尚未消滅的遺毒，再沒有別的了。

楊諾夫關於“個人”的解釋也是一樣。

“全體會議已經開完了。參加會議的人也走盡了……舊有各政派底指導者已得自由，已脫離一切外來的影響和抑制。此外剛

巧又來了有力的援兵：一部份人得到普列漢諾夫同志底援助，普列漢諾夫在最近極力鼓吹宣佈黨內軍事戒嚴；另一部份人得到十六個“黨的老工作人員底援助，這十六個人是為社會民主黨人呼聲編輯部所明白知道的”（參看公報的信，第十九至二十期）（32）。在這些條件之下，那有不開戰的道理？於是就掀起互相殘殺的舊‘事業’來了。”（猶太工人同盟底回聲第四期，22頁）

剛巧來了幫助各政派主義者的“援兵”，——所以又打起仗來了，此外並無別事。不錯，護黨的孟塞維克——普列漢諾夫恰好跑來做布爾塞維克的“援兵”，他“恰好跑來”與取消派實行開戰，但這一點在楊諾夫看來是一個樣子的。大概楊諾夫不喜歡普列漢諾夫與波特列索夫、伊同志（他曾提議“要解散一切”）（33）等等的論戰。他非難這個論戰，這當然是他的權利。但是怎樣能稱這個論戰為“宣佈黨內軍事戒嚴”呢？與取消派開戰，是宣佈黨內軍事戒嚴——我們記住楊諾夫同志底“哲學”。

俄國內部的孟塞維克，曾是國外孟塞維克底援兵。但是這個事實絲毫也不能引起楊諾夫同志去思索一下。

從託洛茨基和楊諾夫底這種“時局估計”中會得出怎樣的實際結論，這是很明顯的。一點特別事情也沒有發生。僅僅是政派主義的爭鬧。提出新的中和派來——則一切將有把握了。一切都從小組主義的外交手段底觀點去解釋。實際一切的補救方法都不過是小組主義的外交手段。“開戰的人”說到了，願意“調和”的人也說到了：此地刪去“

* 本文第3, 4, 5各章（參看列寧全集的14卷378至322頁），因為篇幅不夠，此地沒有編入。這3章的內容就是用各種具體的證據和例子去說明本文前兩章底要旨。——編者）

基礎”的字樣，這裏在“機關上”加上某某，那裏關於召集代表會議的方法問題對合法派“讓步”……這就是國外小組主義派萬古常新的歷史。

我們對全會以後所起事變的見解，却與上述的不同。

全體會議既通過了一致贊成的決議案，刪去了一切“意氣鬥爭”的歸咎之辭，於是就完全使取消派陷於絕路。現在再不能藉口於意氣鬥爭而自行掩護了。再不能拿讓步和“機械式的壓制”（或是：嚴密防範，軍事戒嚴，包圍形勢等等）這些話頭來作藉口之辭了。離開黨的，只是因為帶有取消主義的觀點（如前進派之所以離開，只是因為帶有召回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哲學）。

陷於絕路的取消派已經露出已的“面目”。取消派在俄國內部的中央——無論他是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半公開的（米哈爾輩）或完全公開的（波特列索夫輩）——對於回到黨裏來的號召會以拒絕作答。俄國內部的合法派的取消派完全離開了黨，他們已團結成爲獨立的社會主義者集團（當然他們是離開社會主義而獨立和依賴自由主義的）。米哈爾及其同伴底回答（這是一方面）和我們的曙光以及復興底言論（這是另一方面），都是表明“社會民主黨人”（正確些說：似是而非的社會民主黨人）反黨小組之團結成爲獨立的社會主義者集團，因此託洛茨基和楊諾夫兩人“調和的”企圖在目前是可笑而又可憐的。只有完全不懂目前所發生的事情的人，才會去作這樣的企圖，這些企圖現在已經不能爲害了，因爲除了國外小組主義的外交家，除了窮鄉僻壤的土包子以外，誰也不來贊成這些企圖了。

託洛茨基和楊諾夫這類調和派的錯誤，就是他們會把全會上那些助長過調和的外交手段的特別條件，作爲目前黨內生活底一般條件。他們的錯誤，就是他們會把那些在全會上起過作用（因爲存在了

一些條件的緣故，這些條件在兩個主要政派中產生了一種深刻的趨向調和（——黨的統一）的趨勢）的外交手段，本身當作一種目的，當作長久的在“某些個人、團體和機關”之間周旋的工具。

在全體會議上外交手段確有了使用的餘地，因為當時護黨的布爾塞維克和護黨的孟塞維克中間實行黨的統一，是必要的，但是這種統一，非有讓步，非有妥協，是辦不到的，在決定讓步程度時，“誠實的中間人”會必然佔在第一位，因為在護黨的布爾塞維克和護黨的孟塞維克看來，當整個統一底原則基礎還發生效力的時候，關於讓步底程度問題，是次要的問題。託洛茨基和楊諾夫這類調和派，在全體會議上佔了第一位，會有可能以“中和者”資格，以“裁判官”資格，來消弭意氣鬥爭，來滿足某某反“布爾塞維克中央”的“野心”，這樣一來，他們就以爲，在“某些個人、團體和機關”還存在着的時候，則他們永遠能起這種作用。這是很可笑的迷誤。如果要決定讓步底程度，以達到一致的意見，那末中間人是必要的。如果已有統一底顯然共同的原則上的基礎，那末讓步程度是要決定的。至於在一切的讓步之後誰會加入這個統一，那末這個問題當時是沒有解決的，因為，在原則上會必然要有這個有條件的假定：一切社會民主黨人都願意跑到黨裏來，一切孟塞維克都願意誠懇地執行反取消主義的決議案，一切前進派都願意誠懇地執行反召回主義的決議案。

現在呢，中間人不需要了，他們沒有立足的餘地了，因為關於讓步底程度問題已經沒有了。而關於讓步底程度問題之所以沒有，是因為關於任何讓步的問題都沒有了。一切的讓步（甚至過分的讓步）已經在全體會議上做過了。現在的問題，純粹是關於和取消主義鬥爭的原則上的立場，而且並不是一般地和取消主義鬥爭，而是和一定的取消主義獨立派集團作鬥爭——和米哈爾及其同伴底集團，和波特

列索夫及其同伴底集團作鬥爭。如果託洛茨基和楊諾夫現在企圖把黨與某些個人、團體和機關“調和起來”，那末在我們看來，在一切護黨的布爾塞維克和護黨的孟塞維克看來，託洛茨基和楊諾夫簡直是黨的叛徒，再沒有別的了。

調和的外交家在全體會議上之所以“有力量，只是因為，只是在於，護黨的布爾塞維克和護黨的孟塞維克都曾願意和平，而且認為和平底條件問題，對黨底反取消主義和反召回主義的策略問題講來是一個次要的問題。例如，我認為當時的讓步是過分的，並因為讓步程度問題而作過鬥爭（對於這一點，呼聲第十九至二十期加以暗示，而楊諾夫也公然說過了）。但是我當時已經決意並且現在也會決意贊成那些甚至過分的讓步，既然這些讓步沒有破壞黨的路線，既然這些讓步沒有弄到否認這個路線，既然這些讓步成了一種橋樑使人們離開取消主義和召回主義而跑到黨裏來。但是在米哈爾及其同伴和波特列索夫及其同伴團結起來以及實行反對黨、反對全體會議之後，我就不肯做關於任何讓步的任何談判了，因為現在黨應該與此等獨立派分離，應該堅決地與他們這些完全地澈底地形成的取消派作鬥爭。而且我不但能夠代表我個人，並且能夠代表一切護黨的布爾塞維克而自信地講這種話。護黨的孟塞維克底意見，已由普列漢諾夫及其他人口中十分明白地表示出來，他們也有這樣的意思；在黨內這種實際情形之下，“調和的”外交家，如託洛茨基和楊諾夫之流，或者應當拋棄自己的外交手段，或者應當脫離黨而跑到獨立派方面去。

要使人們相信合法派已經完全團結成為獨立的社會主義者集團起見，只要看一看全體會議以後的事變就夠了，只要按實質去估計（而不僅根據小的和無關重要的“糾紛”史去估計，像楊諾夫徒然以此滿足一樣）這些事變就夠了。

(1) 米哈爾·羅曼、玉里都稱中央(全體會議)的決議案以及中央本身的存在是有害的。從這個事實宣佈以來，已經約有兩個月之久，而事實却沒有被人推翻。這個事實顯然是確實的了*。

(2) 國內十六個孟塞維克，這中間至少有上述三個人中的兩個和其他幾個最著名的孟塞維克作家(切爾凡甯，科爾起夫等等)，得呼聲編輯部之贊許，在呼聲上發表言論，為孟塞維克之退出黨作辯護，發表純粹取消主義的宣言(32)。

(3) 孟塞維克的公開雜誌我們的曙光登載了波特列索夫底一篇綱領式的論文。在這篇論文上公然說道：“像一個完整的和有組織的機關系統那樣的黨，是沒有的”(第二期，61頁)，又說：不能減，在事實上已經沒有的東西，就是說有組織的完整的東西”(同上)。在該雜誌的同事中有切爾凡夫、科爾起夫、馬丁諾夫、阿爾古思多夫斯基、馬斯諾夫、馬爾托夫，——而這個馬爾托夫竟能够在秘密黨“有組織的機關系統”中佔一個位置，這個黨如“有組織的整體”一樣有自已的中央，同時馬爾托夫又能隸屬於公開的集團，該集團得斯托雷平賜恩批准而宣佈這個秘密黨之不存在。

(4) 在通俗的孟塞維克的復興雜誌中(1910年4月12日(3月31日)第五期)，——該雜誌的同事還是上述那些人——登載了一篇沒有署名的，即編輯部的社論，該社論極力褒獎我們的曙光上所登的波特列索夫的那篇論文，他曾經引錄我在上面所引過的那一段話，

* 社會民主黨人底呼聲雜誌 21 期剛才出版。在該雜誌 16 頁上面馬爾托夫和唐恩證實確有這個事實，因為他們說道：“三個同志”(??)“拒絕”“加入中央”。按通例，他們在這裏又是痛罵提科，列寧，藉以掩飾米哈爾及其同伴之集團已經完全變為獨立派集團的這一個事實。

接着就補充說道：

“我們”（即復興編輯部）“可以補充一句，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取消，幻想恢復這個系統之舊有的秘密的狀態，這簡直是有害的反動的烏托邦，這個烏托邦就表示：有個時候曾經最富於實利主義精神的政黨底代表人物失去政治的知覺。”（第51頁）

誰要是把所有這些事實認為是偶然現象，他就是不願看見真理。誰想用“政派主義底復發”來解釋這些事實，他就是用空言來安慰自己，試問這和政派主義及政派鬥爭（無論米哈爾及其同伴，無論波特列索夫及其同伴，都早已離開這些東西了）有甚麼關係呢？是沒有關係的，誰不願意故意閉着眼睛，他就沒有什麼懷疑的可能。全體會議排除了一切阻止護黨的合法派回到黨裏來的障礙（真正的或彷彿的）；排除了一切建立秘密黨時的障礙，同時估計到一切利用公開可能性的新條件和新方式。四個孟塞維克中央委員和呼聲兩個編輯都曾經承認一切足以障礙共同的黨的工作的障礙物，都已經消除了。國內的合法派集團會給全體會議以自己的回答。這回答是否定性的：我們不願意從事於恢復和鞏固秘密黨的工作，因為這是反動的烏托邦。

這個回答是社會民主運動史中最大的一個政治事實。獨立的（離社會主義而獨立的）社會主義者集團已經完全團結起來和完全離開社會民主黨。至於這個集團形成到了什麼程度，牠是由一個組織構成的，還是由幾個彼此間聯繫很不強固的單個小組構成的，這一點我們此刻還不知道，而且這點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離開黨而獨立的這些集團之形成趨勢（這些趨向在孟塞維克中間老早已經有了），現在已經進到新的政治上的形成了。從今以後，俄國一切社會民主黨人，如果不願意自己欺騙自己，那末就應當顧慮到這個事實，——這個獨

立派集團之存在。

爲要說明這個事實底意義，首先就要提到法蘭西“獨立的社會主義者”，他們在最先進的、將一切舊制度掃除得最乾淨的資產階級國家內，曾把這個政治派別底趨勢澈底表現出來。米萊蘭、維維安尼、白利安曾經屬於社會黨，但他們的行動往往離開黨的決定，違背黨的決定，而且米萊蘭以挽救共和國和保護社會主義利益爲藉口，加入資產階級的內閣，以至於同黨斷絕關係。資產階級曾用總長位置去報酬社會主義底叛徒。法國三大叛徒繼續稱自己和自己的集團爲獨立的社會主義者，繼續以工人運動和社會改良之利益來辯護自己的行動。

當然，資產階級的社會不能這樣迅速地來報酬俄國的獨立派：他們開始活動的條件不知落後多少，他們應以自由資產階級（牠老早就幫助過孟塞維克的“獨立主義”趨勢）之稱贊和幫助爲滿足。但是基本的趨勢彼此都是一樣：離開黨而獨立，說是爲着工人階級底利益；把“爭取合法性的鬥爭”（這是唐恩提出的口號，叛徒的復興第五期第七頁上曾拚命抓住這個口號），當作工人階級的口號；在事實上，團結起來的都是些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在法蘭西爲國會派，在俄國爲作家），他們的行動與自由派有密切的關係；不服從黨；米萊蘭及其同伴，復興雜誌和呼聲，都宣佈黨爲不充分“實利主義的”黨；他們指黨說：黨是“閉塞的祕密小組底專政”（呼聲），黨閉關自守而成爲一個隘狹的革命的會社，妨害廣大的進步（米萊蘭及其同伴）。

其次，爲明白俄國獨立派的立場起見，試拿俄國“人民社會黨”形成底歷史來看吧。這個歷史將幫助這樣一些人們去了解問題的實質，這些人們，因我們的獨立派和米萊蘭及其同伴“工作”外部的條

件有很大的區別，便看不見他們的血統關係。我們的“人民社會黨”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中一個合法的和溫和的派別，這是大家知道的，在馬克思主義者中間，大概誰也沒有懷疑這一點。在1905年末社會革命黨代表大會上，人民社會黨人曾經發表取消派的言論，要求取消小資產階級民主派革命政黨的綱領、策略和組織；在1905年秋天和1905年春天這個自由時期中，他們和社會革命黨人密切聯合起來共同在報章上發表意見。在1906年秋天，他們就公開起來和分化出來而成爲獨立的政黨了，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在選舉第二國會的時候和在第二國會中有時差不多和社會革命黨混合在一起。

1906年秋天，在無產者報上我寫了一篇論人民社會黨人的文章，那時候我稱他們爲“社會革命黨的孟塞維克”^{*}。自此以後，已經有三年半了，而波特列索夫及其同伴已經證明給護黨的孟塞維克看，我當時的說話是正確的。不過應當承認一點，甚至聖塞浩諾夫先生這一班人的行動，政治上比波特列索夫先生和他的集團倒要誠實些，因爲他們經過許多事實上脫離社會革命黨而獨立的政治行動之後，他們已公開地宣佈自己已經脫離社會革命黨而成爲單獨的政黨。當然，這“誠實性”亦是由力量的對比來決定的：聖塞浩諾夫認爲社會革命黨是沒有力量的黨，又認爲和他實行非正式的聯合，是要失利的；而波特列索夫則認爲，他實行政治的亞色夫主義³⁴，繼續自稱爲社會民主黨人，而在實際上則脫離社會民主黨而獨立，這樣一來就可以得利。

波特列索夫先生及其同伴暫時認爲對於自己最有利益的，就是用他人的名義掩飾自己，偷用社會民主黨人的威信，在他的內部做破

^{*} 參看列寧全集第十卷六七至七四頁。——(編者)

壞工作，實際上反對牠，而不僅脫離牠而獨立。我們的獨立派集團將設法儘量長久地偷穿他人的衣服，這是可能的；在黨受了什麼打擊之後，在祕密組織受了大的破獲之後，或在特別誘人的局面中（如在可以不顧黨而跑進國會的局面中），獨立派自己就會揭破自己的假面具，這也是可能的；——我們不能預先看到他們的政治欺騙手段底一切情節。

但是，我們現在確然知道一點，這就是：對於工人階級的政黨——“俄國社會民主黨”，獨立派的這種祕密行動，是有害的，致命的；因此，我們無論如何應當把牠揭破，使獨立派原形畢露，宣佈他們與黨的任何聯繫底破裂。全體會議在這條道路上走了一大步；無論初看起來覺得這是何等奇怪，但恰恰是馬爾托夫和馬丁諾夫的同意（不誠實的或不自覺的），恰恰是給他們的最大程度的甚至過分的讓步，會幫助我們去割穿取消主義的腫瘡，和我們黨內獨立派的腫瘡。無論那一個誠實的社會民主黨人，無論那一個護黨派，不管其同情那一政派，他現在總不能否認，米哈爾及其同伴底集團，波特列索夫及其同伴底集團，就是獨立派，他們在事實上不承認有黨，不願意有黨，進行反黨的工作。

獨立派的脫離黨和他們成立為特別政黨，其成熟的過程怎樣迅速或怎樣遲緩，當然以許多難以計算的原因和情形為轉移。人民社會黨人，在革命以前就已經有了特別的集團，所以該集團既然會暫時地和部份地歸附於社會革命黨，那末就特別容易分立出來。我們的獨立派還有私人的傳統，與黨的聯繫，這些傳統阻止着脫離黨的過程但是這些傳統日益減弱，而且除此以外，革命和反革命又提出一些新人物來，這些新人物沒有任何革命的政黨的傳統。“道標主義”情緒的環境，異常迅速地推動無氣節的智識界走向獨立主義。革命者的“老”前

輩正在離開舞台；斯托雷平用盡全力摧殘這輩人的代表，這些代表在自由年代，在革命的年代，一大部份已經暴露自己一切的假名和自己一切的祕密。監獄、充軍、苦役，逃亡國外，日益增加退伍的人數，而新的後輩又生長得很慢。在智識界中，尤其是在“習慣於”某種公開活動的智識界中，完全不相信祕密的黨，完全不願意費力去做現時特別困難的和更一時不見效的工作。“患難之中識朋友”，而目前正處在新舊反革命勢力實行進攻的困難時期的工人階級，不可避免地會看到牠的許多智識界中的“臨時朋友”，快樂時期中的朋友，祇是革命時期中的朋友離開革命，這些朋友在革命時期會是革命家，但在低落時代就做隨波逐流的人，並決意在反革命開始勝利時，就宣佈爭取“公開性的鬥爭”。

在歐洲有幾個國家內，如在 1848 年以後，反革命勢力曾經能夠徹底消滅無產階級底革命的和社會主義的組織之殘餘。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在少年時代會歸附於社會民主黨，但因為他的市儈心理，他傾向於失望而說道：過去如此——將來也會如此；要堅持舊的祕密的組織是無希望的事情，建立新的祕密的組織又是更無希望的事情；我們會一般地“過於看重”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革命中的力量，我們會錯誤地強說無產階級的作用有“萬能的”意義，——所有這些叛徒式的社會運動 35 底“見解”，直接和間接地推動他拋棄祕密的黨。獨立派一經站在傾斜面上便看不見他怎樣不墮下降，看不見他是與斯托雷平合作的：斯托雷平用肉刑，用警察手段，用絞架和苦役刑罰，去破壞祕密的黨；自由派用公開宣傳道標主義思想的方法來破壞祕密的黨；而社會民主黨人中的獨立派則間接幫助破壞祕密的黨，因為他們叫喊着，說祕密黨已經“死亡”不肯幫助牠，為脫黨的行為辯護（參看呼聲第十九至二十期上十六人的信）。真是所謂每况愈下。

反革命的時期越延長下去，則爲黨而鬥爭對於我們便越加困苦，這一點我們是不會忽略的。護黨派不看輕危險，他們看清這種危險，關於這一點，例如可拿中央機關報第十三期上 K 同志的論文來做證明(36)。但是，堅決的和直爽的承認黨的薄弱，組織的瓦解，情形的艱難，却不能使 K. 同志（同樣的不能使任何一個護黨派）對於要不要黨，要不要進行恢復黨的工作這個問題，發生一時的動搖。我們的情形越艱難，我們的敵人越增加（在我們的敵人中，前天增加了這標派，昨天又增加了人民社會黨人，今天又增加了獨立派社會民主黨人），則一切社會民主黨人，無分色彩，就會更加密切地團結起來擁護黨。許多社會民主黨人對於如何引導具有革命情緒的和相信社會民主黨的羣衆去衝鋒這個問題，彼此曾可以發生分裂，但是對於應否爲保有和鞏固1895至1910年建立起來的祕密的社會民主工黨而鬥爭這個問題，却不能不使他們團結起來。

至於呼聲報和呼聲派，那他們特別鮮明地證實了去年六月無產者擴大編輯部關於他們的決議案所說的話(37)。該決議案說（參看無產者第四十六期附錄，第六頁）：“在黨內孟塞維克底營壘中，在該政派底正式機關報社會民主黨人呼聲被孟塞維克取消派完全把持之下，政派少數嘗試了取消主義道路“到底”以後，已在抗議反對這條道路，並在替自己的活動重新找尋黨的立場……”。到取消主義道路的“底”：這個距離比我們當時所想的要遠些，但是，上述一段話的基本意思之正確，已被自後的事實所證明了。對於社會民主黨人呼聲講來，“被取消派俘虜”這幾個字眼，尤其得了證實，這個機關報恰恰是取消派的俘虜，牠既不敢直接擁護取消主義，又不敢直接反對取消主義。甚至在全體會議上他們一致通過決議案的時候，也不是一種自由人，而是一種俘虜，他們從自己“主人”方面得到了短期的休假，但是在全

體會議後第一天又回復到了奴隸的狀態。他們既不敢擁護取消主義，便竭力藉口於一切可能的（和一切幻想的！）障礙。這些障礙雖與原則問題無關，但是足以妨害他們去放棄取消主義。當這一切“障礙”已經消除的時候，當他們一切局外的、私人的、組織上的金錢上的以及其他的野心已經得到滿足的時候，——他們便違反自己的意志“大叫”放棄取消主義，真是可憐虫！他們不知道：在這個時候十六個人的宣言已經在送往巴黎的道路上了，米哈爾及其同伴的集團，波特列索夫及其同伴的集團已在擁護取消主義當中鞏固起來了！他們又很馴服地跟着十六個人，跟着米哈爾，跟着波特列索夫，而重新回到取消主義方面去了！

無氣節的“調和派”，如楊諾夫和託洛茨基之流，擁護這些人或替這些人辯護，他們最大的罪惡，就在於他們使這些人更受取消主義的束縛，這樣來殘害他們。要是一切無政黨的社會民主黨人都有那種反對米哈爾及其同伴和波特列索夫及其同伴（須知，無論託洛茨基、無論楊諾夫，都不敢擁護這些集團！）的堅決行動，那這可以使取消主義的俘虜呼聲派中某些人，回到黨裏來：——而“調和派”的假仁假義的手腕却絲毫沒有使黨與取消派調和起來，而只是拿“無意思的希望”來鼓勵呼聲派。

同時，這種矯飾手段，在不小的程度內的確是由於不懂情形所致。只是因為不懂情形，所以楊諾夫同志僅僅提出是否登載馬爾託夫一篇文章的問題，而維也納的託洛茨基派才能把問題歸結於中央機關報編輯部內部的“衝突”。無論是馬爾託夫底文章（走上正路……到取消主義方面去）或是中央機關報編輯部的“衝突”，都祇是局部的事情，這些局部的事情，如果不把牠們和全部的事情聯繫起來就不能了解。例如，馬爾託夫底文章明顯地告訴我們——已在一年內研

究了取消主義及呼聲主義底一切色彩的我們，馬爾託夫已經轉頭了（還是人家把他的頭轉過來了）。同是這位馬爾託夫，不能在給中央的關於代表會議的信上署名，而同時又寫“上正路這篇文章 38”。託洛茨基及楊諾夫既把馬爾託夫底文章與一切事件，與未寫這篇文章以前所寫的信，與該文發表以前所出版的第19——20期呼聲報，與16人底宣言，與唐恩、波特列索夫和復興上的許多文章之間的聯繫打斷，既把馬爾託夫底文章與中央機關編輯部內部“衝突”的一切事件之間的聯繫打斷，於是就不能了解所發生的事情*。反之，如果把成爲全部事件底基礎的東西放在中心地位，那一切都完全明白了，所謂成爲全部事件底基礎的東西就是：俄國的獨立派完全團結起來了，他們與恢復及鞏固秘密黨的這種“反動空想”完全決裂了。

7、論護黨的孟塞維主義和對牠的估計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關於所謂黨的孟塞維主義和關於對牠的意義的估計問題，這個問題我們應當加以研究，以便說明我們黨內“統一的危機”。

在這一點上，非政派的——卽是自願稱爲非政派的——楊諾夫和託洛茨基之見解（真理報第12期**和維也納的決議案），是極值

*再來舉一個例子罷，拿秘密黨內公開獨夫底“平衡論”爲例罷(39)，在米哈爾，玉里及其同伴們，波特列索夫及其同伴們發表言論之後，這個理論底內容和意義，就是承認獨立合法派集團和使黨服從他們，這難道還不明白麼？

**這個真理報不是布爾塞維克的（他們的真理報當時還沒有出版），而是托洛茨基在維也納出版的。——（編者）

得注意的。託洛茨基堅決地和固執地忽略護黨的孟塞維主義（在中央機關報第13期上指出過這點）（40）——而楊諾夫則把自己同道者底“秘密的”意思洩露出來，他宣稱：“普列漢諾夫同志”（楊諾夫不願看見其他護黨的孟塞維克）所發表的言論，其意義就在於“幫助”布爾塞維克進行政派的鬥爭，就在於鼓吹“宣佈黨內軍事戒嚴”。

託洛茨基和楊諾夫所站的立場被事實所推翻，只因這一點，他們也會應當看見自己的立場之錯誤。從中央機關報第13期上顯然可以看出；在國外七個幫助黨的集團中——在巴黎、日內瓦、伯恩、蘇黎支、利愛其、尼蒂、三利門，普列漢諾夫派，或更正確些說，護黨的孟塞維克，已經起來反對呼聲了，他們要求執行全體會議底決定，要求停辦呼聲報，他們又指出：呼聲第19——20期所站的思想上的立場，帶有取消主義的性質。在俄國內部的工作人員中間現在也發生着這樣的過程，雖然這個過程也許比較不明顯些。隱瞞這些事實，是可笑的。如果不顧事實，企圖把普列漢諾夫與呼聲派所作的鬥爭，當作是著作家的“政派主義”鬥爭，這無異於——客觀上——站在獨立合法派集團方面反對黨。

上述的“調和派”所站的立場，顯然是虛偽的，顯然是支持不住的，這一個立場應當使他們看出他們的見解底出發點是錯誤的：他們認為全體會議上統一底政治意義，曾在於“與某些個人、團體和機關”實行妥協。不要被黨內事變底外形及其個人的特性所欺騙，而應估計目前所發生的事情在思想和政治上和政治上的意義。就其表面上來看，妥協會是與呼聲派某某妥協。但是，須知妥協底基礎，妥協底條件會是：呼聲派過渡到普列漢諾夫底立場上來，這一點從上述的關於黨內實際情形的決議底分析中*，顯然可以看出（41）。就其表面上來看，例如，從中央機關報底人員成份來看，呼聲派恰恰就是黨內孟

塞維主義底代表。事實上，中央機關報在全體會議之後便開始變為護黨的布爾塞維克和普列漢諾夫派“合作”底機關報，而完全受到呼聲派方面的反抗。這樣一來，在黨的統一底發展中，就有了一種曲折的狀態：開始似乎是什麼調和一切的一盤散沙，沒有鮮明確定的統一底基礎，但是後來各種政治趨向底發展規律就得了勝利，獨立派脫離黨的過程，却會因為會議上盡量向呼聲派讓步而加速起來了。

我在全會上聽到和在呼聲上（第19至20期，第18頁）看到：人們拚命攻擊“各有力政派妥協起來反對右的和左的取消主義”這個口號（42）（呼聲把這個口號放在括弧裏面，但是為什麼不直接說：在全會前和在全會上我擁護了這個口號），當我聽到和看到這種攻擊的時候，我就暗中想道：“abwarten！”，“wait and see”（等下就會知道的！）。呼聲派先生們！等一下吧！因為你們想“沒有主人”就實行算賬：問題不在於全體會議會給一切政派——而不僅只給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有力的政派，以參加妥協的可能性。問題就在於你們的“主人”——即獨立合法派集團，能否允許這種可能之變為實際。

幾個月已經過去了，——現在只有瞎子才會看不見，在事實上恰恰“各有力政派底妥協”構成黨的統一，“經過一切的障礙”使統一前進。這應該如此，這只能如此，因為在黨內實力對比是這樣。無疑地，在最近的將來，或者黨底一切領導機關正式改造過來以表現這個妥

* 在參加全會的四個孟塞維克中央委員裏面，有兩個人曾用盡力量，以便對呼聲派作盡量的讓步以後，使呼聲派事實上轉到普列漢諾夫底立場上面來。這並不是說，這兩個人是堅定的護黨派，說他們決不會跑到呼聲派方面去。這只是說，孟塞維主義當時處於這樣一個時期，就是說它還不能放棄黨性。

協，或者黨底生活和黨底統一之發展，一時不經過黨底領導機關而前進。

當然，稱護黨的孟塞維克爲“有力的政派”，初看起來，似乎是很奇怪的，因爲目前——至少是在國外，呼聲派大概是有力些。但是，我們社會民主黨人在判斷力量的時候，不是以國外集團之意見如何爲標準，不是以孟塞維克作家如何結合爲標準，而是要看誰的立場客觀上是正確的和誰的立場被政治情形的發展規律所裁判爲獨立派底俘虜。工人事務派，在1898到1900年，無論在國外，無論在俄國都比火星派有力些；但是，他們畢竟不是“有力的政派”。

現在，呼聲派已經動員一切力量來反對普列漢諾夫了，已經拿出自己一切的法寶，——直至波特列索夫先生和直至關於1901年至1903年（Siel*）人們如何“欺侮了”馬爾託夫等等的回憶——來反對普列漢諾夫了，——現在呼聲派之沒有力量表現得特別明顯了。阿雪洛德及其同伴於四月間在國外出版一種反普列漢諾夫的個人謾罵的彙刊，這在政治上已經是遲到不可救藥了；因爲在俄國，我們的曙光二月號和復興三月號，已把問題移到完全另一方面去了，而普列漢諾夫在中央機關報第13期（43）上，已經由敘述他與呼聲派衝突的歷史而過渡到反對呼聲派現時的政策了。呼聲派現在一回憶到舊的（直至1901年爲止！）“恥辱”，就弄得手忙腳亂不知所措，正和前進派一樣，前進派還請求好心人來保護他們不受布爾塞維克中央的侵犯。

請看我們的“受辱者”如何日益自己揭破自己的面目吧。他們在1901年，只要一想到“列甯、普列漢諾夫”（他們的術語！）底妥協就發狂起來，正如一年以前馬克西莫夫也爲着此事而發狂起來一樣

* 原來這樣！

（編者）

(44)。呼聲派像馬克西莫夫一樣竭力把事情這樣描寫：似乎問題差不多只在“列甯與普列漢諾夫”個人的妥協，而且他們認為普列漢諾夫底行動是由“一時的脾氣”（參看必要的補充第19頁），“換湯不換藥”，“飛來飛去”以及其他等等來解釋的。馬爾託夫拚命回憶普列漢諾夫以孟塞維克資格所作的“五年來的活動”（同上），破壞他的信用（太遲了），說他飛來飛去，但馬爾託夫沒有看出：這樣一來，最受辱的恰恰就是他自己。

在上述的必要的補充中，呼聲底集體編輯部鄭重地告訴我們（第32頁）說：普列漢諾夫只在上述的五年（1904年至1908年）過程中，才是“偉大的”。請看呵，從這裏會得出什麼結論。孟塞維克稱普列漢諾夫之所以“偉大”，不是由於他在二十年（1883年至1903年）過程中的活動（在這時期中，他曾經是一個確信自己主張的人，既不是孟塞維克，也不是布爾塞維克，而是社會民主黨底創始者），而恰恰是由於他在這五年中的活動：在這個時期中，據孟塞維克自己的承認，他是“飛來飛去”的，就是說，沒有堅其澈底的孟塞維克的路線。結論是：“偉大處”就在於沒有完全陷到孟塞維主義底泥坑中去。

但是阿雪洛德和馬爾託夫所記起的孟塞維主義五年來的歷史，正是給我們許多事實，幫助我們不用馬爾託夫所極力引舉的那種微小的、個人的原因來解釋孟塞維克的分裂。

1903年普列漢諾夫在選任阿雪洛德和馬爾託夫時，在火星第五十二期上不要做的是什麼這篇論文中宣佈：他願和機會主義者周旋一下，願用周旋手段把他們糾正過來。他在這裏竟極端攻擊布爾塞維克。1904年末他極力想把顯然已陷於自由主義的阿雪洛德（見地方自治運動計劃）捧出來，但是，他的捧法是這樣：對最新奇的事實，如宣佈在地方自治局員前面的示威為“最高形式的示威”等，一字

也不提（參看給中央的信這本小冊子，該小冊子僅僅是為黨員備用的）。在1905年春天，普列漢諾夫已經相信“周旋手段”沒有希望，乃離開孟塞維克，創辦日記和鼓吹與布爾塞維克聯合。日記第三期（1905年11月）完全不是孟塞維克的刊物了。

普列漢諾夫約費年半工夫（從1903年末至1905年春）去和黨內的機會主義者相周旋以後，從1906年初起和在1907年過程中與立憲民主黨相周旋。在這裏，他走到機會主義的極端，比其他的孟塞維克更甚。但在第一國會時宣佈“周旋手腕”的普列漢諾夫，在第一國會解散以後提議（日記第六期上）要各個革命的政黨妥協起來為“立憲會議”而鬥爭的時候，那時無產者（第二期，1906年9月11日（8月29日），在策略上的動搖那篇論文上）即刻指出：這個立場完全不是孟塞維克的（45）。

1907年春天，在倫敦代表大會上，普列漢諾夫曾與（根據切爾凡甯底話，這些話我在十二年間文集上所做的序言中*已經引用過了）孟塞維克底組織上的無政府主義作鬥爭。當時他需要“工人代表大會”，當作一種周旋手腕，以便發展黨而不是反對黨。在1907年下半年，據馬爾託夫在必要的補充上所說的話，普列漢諾夫“曾經又不得不花費不少的雄辯”，以堅持孟塞維克須有祕密的（即是黨的）機關報，而反對阿雪洛德（阿雪洛德顯然會甯願有公開的、事實上不是黨的機關報）（46）。在1908年因波特列索夫論文而起的衝突，就是普列漢諾夫與取消派分裂的導火線（35）。

這些事實是說明什麼呢？這是說明：孟塞維克現時的分裂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不可免的事情。“周旋手段”不能辯護周旋者因周旋所

* 這篇序言編在列寧全集第12卷55至70頁。——（編者）

犯的錯誤，所以我絲毫不把我所寫過的反對普列漢諾夫這些錯誤的說話收回來。但是“周旋手段”說明：何以一部份孟塞維克容易走到獨立派方面去，而別一部份孟塞維克很難甚至不能走到那裏去。因玩弄周旋手段而使工人階級去跟着立憲民主黨人走的那種社會民主黨人，他所給予工人的害處，並不比那種因內心引力而陷入機會主義的人作此行動時所給的害處為少。但是，前者則善於、能夠、來得及在後者要落入陷穽的地方停住腳步。俄國有句俗語說：叫他去拜上帝——他却把額角都撞破了。普列漢諾夫可以說：叫波特列索夫和唐恩向右邊去，認為這是一種周旋手段——而他們向右邊走的時候却認為這是一種原則。

某些孟塞維克所停住腳步的地方，完全證實他們不愧為“護黨的孟塞維克”。他們停住腳步，站在擁護黨而反對獨立合法派的地方。波特列索夫先生和社會民主黨人呼聲編輯部在必要的補充中企圖避免這個簡單明瞭的問題，這是徒勞無益的。

恩格斯也曾經與S.D.F.（英國社會民主黨人）作過鬥爭，——波特列索夫這樣說，想藉此逃身（24頁）。最親愛的先生，這是詭辯。恩格斯糾正了黨（47），而你們却不說如何去糾正黨，你們甚至不肯直接說：現在要不要祕密的社會民主黨，要不要“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斯託雷平面前你們就說：不要（我們的曙光），而在黨員面前，在祕密刊物上，你們就不敢這樣說，你們就說東說西，想藉此逃身。

編輯部使人相信。“列甯、普列漢諾夫主張與工人運動新形式宣戰”（31頁）。“我們却以真實的工人運動之狀態、條件和要求……做出發點”（32頁）。最親愛的先生們，這是詭辯。你們自己也承認了：全體會議曾經用盡一切方法來承認這些新形式，並且在全體會議以前布爾塞維克用自己的鬥爭也證明了這一點。我們的分歧，不在

要不要“新形式”，要不要進行公開的工作，要不要建立公開的團體——我們的分歧完全不在這一點上。我們的分歧是在於：進行這類工作的合法派如米哈爾及其同伴們，波特列索夫及其同伴們，既離開了社會民主黨，是否還可以允許他們自稱為社會民主黨員，抑或社會民主黨的黨員必須承認黨，宣傳黨底必要，在黨內工作，為黨底組織而工作，在各地方和在一切工會中建立秘密支部以便和黨發生正確的關係等等。而且你們也知道得很清楚，現在（在全體會議之後），我們的分歧僅僅在這一點上。

我們希望與護黨的孟塞維克接近，希望與他們妥協，以便為黨而奮鬥，反對獨立派，而呼聲派却極力把我們這種希望當作“列甯與普列漢諾夫”底私人結合。呼聲派謾罵無產者第47到48期上反對波特列索夫的論文底作者，說他有“詔臣”底論調，這種詔臣利用和普列漢諾夫的“妥協來作投機”(48)。

現在我就拿出這篇論文來，並把該論文第7頁上所說的話讀出來：

“當然，普列漢諾夫在革命時所犯的一切錯誤之來源，恰恰就是由於他沒有澈底實行他自己在舊火星上所實行過的路線”。

讓讀者去判斷，究竟那一種話更似“詔訣”和“投機”：是布爾塞維克把普列漢諾夫底錯誤指點出來的這個直接指示呢，還是稱普列漢諾夫為“偉人”（恰巧就在普列漢諾夫做孟塞維克和“飛來飛去”——孟塞維克底說法——的時期稱普列漢諾夫為“偉人”）的這種稱獎呢？

社會民主黨人呼聲編輯部寫道：

“當責任重大的”（着重點是呼聲加上的）“政治行動時期重新到來的時候，普列漢諾夫是要和我們在一塊的（必要的

補充第32頁)。

這些話是沒有政治常識的，但是，在“投機”方面是很明白的。何以沒有政治常識呢？因為對於舊的領袖們，現在恰恰就是責任重大的政治行動時期，此種責任重大性，要比在公開鬥爭時勝過百倍，因為在公開鬥爭時，羣衆自己找到道路要容易得多。何以在“投機”方面是明白的呢？因為當普列漢諾夫重新開始“周旋”的時候，他們又決意重新承認普列漢諾夫爲孟塞維克。

我們覺得很奇怪，爲什麼呼聲派不了解：他們這些攻擊和——舉例來說——阿雪洛底底話：“我們不願把自己降爲”（在普列漢諾夫面前）“阿諛逢迎的奴僕”（19頁）放在一塊，究竟有什麼意思。你們的行動恰恰是像阿諛逢迎的奴僕。你們對普列漢諾夫所持的態度，恰恰適合於這些人底“公式”：“或是動武，或是獻媚”。

你們“獻媚”已有五年了，現在你們又寫出三十二大頁文章“去動武”，而在第三十二頁中却又“表示決意”：無論重新承認他爲孟塞維克，無論“獻媚”，都可以同意。

至於講到我們，那我們有權可以說：在普列漢諾夫“飛來飛去”的時期中，他從來沒有做過布爾塞維克。我們現在不認他爲布爾塞維克，並且將來也永遠不會認他爲布爾塞維克。但是，我們却把他以及把凡能起來反對獨立合法派集團和能與他們作澈底鬥爭的孟塞維克，當作護黨的孟塞維克。在目前困難的時期中，擺在鬥爭日程上的，就是在理論上爲馬克思主義而奮鬥和在工人運動底實際上爲黨而奮鬥，此時我們認爲竭力和這樣一些社會民主黨人接近，這是一切布爾塞維克無條件的義務。

8、 結論：論布爾塞維克底綱領

全體會議所規定的黨的代表會議，不可限於並且也不應限於全

會預定在一切孟塞維克過渡到黨的立場上來的這個條件之下討論的那個議事日程(49)。這個過渡並沒有實現——所以我們當時也就無須自己隱瞞自己。

在與獨立合法派鬥爭中把護黨派團結起來，應作為選舉這次代表會議代表的口號，召集和準備這次代表會議的口號。為適應這個任務並且估計到呼聲派反黨的立場起見，我們應當十分堅決地去改造黨底一切領導機關，以便使這些機關不去作意氣的鬥爭（一切呼聲派給領導機關正在準備而且今後還要準備這種鬥爭），而去從事真正的建設黨的工作。呼聲派不願建設黨，他們想暗中幫助獨立合法派集團。

布爾塞維克對於這次代表會議的政治主張應當如此。根據十二月的（1908年）決議案（1）和本着這些決議案底精神去建設黨。繼續全體會議底事業，其方法就是把全體會議底決議案中上述的各點加以糾正，這些糾正，都是全體會議之後黨底一切過程所要求的。要集中全力來有系統地、不斷地、各方面地和堅持到底地利用一切和所有的合法的可能性，以便集合無產階級底力量，以便幫助無產階級去結合起來，團結起來，學習怎樣去鬥爭，幫助牠去展開自己的各個關節——同時要不屈不撓地恢復祕密的支部，祕密的亂葬黨的組織，首先是和主要的是純粹無產階級的組織，使其適應新的條件，因為只有後一種的組織纔能指揮公開組織中的一切工作，纔能夠以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精神去培養這些工作，纔能夠與叛徒們和獨立合法派作不調和的鬥爭，纔能準備這樣的時機，此時我們的黨，我們的“俄國社會民主黨”正保持了1905年革命底和1905年無產階級偉大勝利底一切傳統，鞏固和擴大了黨的無產階級的軍隊以後，就引導這支軍隊去作新的戰鬥得到新的勝利。（1910年6月（5月）

6 論政權底社會結構、論前途 和取消主義(50)

在標題上所指出的問題，按其重要性來說，是馬克思主義者（願意研究其周圍的實際情形的馬克思主義者）底觀點系統中最重要問題之一，如果不是最重要的問題的話。1908年到1910年這個時期，無疑地是一個特別的時期。社會底和政權底社會結構都起了變化，如果不了解這些變化，就絲毫不能進行任何方面的社會活動，而關於前途的問題，又以了解這些變化為轉移；我們對於前途的了解當然不是空洞猜度誰也不知道的東西，而是指出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底基本趨勢，這些趨勢底總和就決定國家最近將來的前途，就決定一切自覺的社會活動家之任務、工作方向及其性質。但是這一個問題——即關於任務、工作方向及其性質的問題，又與關於取消主義的問題有最密切的聯繫。

因此毫不奇怪的，還在1908年，當馬克思主義者一經看出或開始看出當時的時期，是俄國歷史上的一個多少新穎的特殊的時期以後，恰恰就迫切提出了關於政權底社會結構、關於前途和取消主義的問題，曾提出這些問題彼此有不可分離的聯繫，曾有系統地討論到這些問題。其次，他們又不僅限於討論，——如果只限於討論，那末這恰恰就是壞的文學主義，這只有在不了解自己責任和不留意政治的智識份子底辯論小組中纔有可能，——不，他們却不限於討論，他們還

將討論底結果規定爲確切的措辭，而這措辭，可以作爲一個指南，不僅某個文藝小組底組員，不僅與某種智識界有連帶關係的人，可以拿牠作爲指南，而且階級中任何的和一切的自覺的代表，認馬克思主義爲自己的思想系統的代表，都可以拿牠作爲指南。至1983年末，這種必要的工作已經做完了*。

這種工作主要的結果如何，我已經在我們的雜誌第二期上說過了**。我現在從這篇文章裏引用幾行，使下列的敘述能够明白。

“俄國的國家制度在最近三世紀以來的發展指示給我們看：牠按着某個一定的方向而變更了自己的階級性。十七世紀的君主制度及其王公顯貴的國會不似十八世紀的官僚貴族的君主制度。十九世紀前五十年時代的君主制度又不似1891年到1904年的君主制度。而在1908年到1910年顯然展開了一個新的階段，即在同一方向中再進了一步，這個方向可稱爲走向資產階級君主制度的方向。第三國會和俄國現時的土地政策，都與這種步驟有密切關係。這樣看來，新的階段並不是偶然的現象而是在國家底資本主義進化中一個特殊的階段。新的階段並不解決舊的問題，無法解決這些問題，因此也沒有取消這些問題，新的階段要求用新的手續準備用舊的方法去解決舊的問題”（第二期，43頁）。再過幾行又說：“誰要是否認（或不了解）……在我們面

* 列寧此地是指1908年12月代表會議底各種決定，尤其是代表會議通過的決議案：論目前時局和黨底任務；參看本卷25頁至30頁。

（編者）

** 參看列寧底論文：我們的廢除者，列寧全集15卷，78，92頁。

（編者）

前擺着舊的問題，我們歡迎用舊的方法來解決這些問題，那末他在事實上就離開馬克思主義底立場，他在事實上就成爲自由派的俘虜（波特列索夫，列維茨基等等）（44頁）。

無論誰如何去觀察上述議論中所表現出的許多觀念，但恐怕誰也不能否認，在對於這個時期的此種估計中，各單個部份有最密切的聯繫和相互依賴性。試拿 1906 年 11 月 22 日（9 日）的法令（1910 年 6 月 27 日（14 日）的法律）¹³⁶ 來做例子吧：毫無疑義的，這個法令具有顯然資產階級的性質，他表示在“上層份子”對村莊和份地土地佔有制所早已採取的那種土地政策中，發生了原則上的轉變。但是至今誰也未敢斷定：這個原則上的轉變已經解決了問題，已經造成了資本主義農民經濟底新基礎，已經取消了舊的問題，——甚至於最無原則的和隨波逐流的人，如立憲民主黨人之流，至今也不敢這樣斷定。1910 年 6 月 27 日（14 日）的法律與第三國會選舉制及其社會成份之聯繫是非常明顯的：當時除了中央政權與封建的（我們現在採用這一個不完全確切的歐洲通用的名詞）地主及上層工商業資產階級結成一種聯盟之外，就不能實現這個法律，就不能用種種辦法以施行這種法律。這就是說，擺在我們面前的，是國家整個資本主義進化中一個特殊的階段。這個階段是不是取消着封建的土地佔有者之“政權和收入”（在社會學的意義上說）呢？不，並不取消。已經發生的那些變化，就是在這一方面（也如在其他各方面一樣），也沒有取消舊制度底基本特點，社會力量舊有相互關係底基本特點。因此，自覺的社會活動家之根本任務，也就很明白了：估計到這些新的變化，“利用”牠們，完全領會牠們，——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同時不要隨波逐流，不要拋棄舊有的東西，要保存基本的東西，這不僅在理論方面，在綱領方面，在政治底原則方面是如此，即在活動形式方面也無不如

此。

現在要問那些團結於復興、生活、人生事業、我們的曙光這類刊物周圍的“思想領導者”，波特列索夫和馬爾託夫先生，唐思和阿雪洛德先生，列維茨基和馬丁諾夫先生，對於這個肯定的給“麻煩問題”的回答，對於這個直爽的和明白的關於一定的見解的敘述，抱何種態度呢？他們對於這些問題的態度，恰恰不像政治家，不像“思想領導者”，不像重要的政論家，不像著作界，而像知識份子的小組，像自由作家底自由團體。他們善於估計在自由派招待室中所陳設的一切時髦東西和時代精神；而對於這個陳舊的已往的大可異的引導人們去給麻煩問題以肯定回答的吸引力，却加以輕蔑的譏笑。試問可以任意說什麼、寫什麼、談什麼的時候，要這個肯定性幹什麼？試問當米留科夫先生輩和司徒威先生輩已經以身作則，向大家指出，避開直接回答問題，避開確切敘述觀點，避開肯定 Professions de foi 等等*，就可以獲得百般便宜和優勢的時候，試問當健忘的伊凡（尤其是不愛回憶過去的肯定性的伊凡）在“社會”底最廣大的階層中，受人推尊和敬重的時候，要這個肯定性幹麼？

在整個三年當中，我們也沒有看見這班作家有絲毫企圖來提出自己的肯定的對於“麻煩問題”的回答。寓言和空洞的假設，真是不可勝數，而直爽的回答却一個都沒有。這班作家底特點就是愛好無定性，就是愛好這樣一種特徵，這種特徵，還在直接回答麻煩問題的時候，就被入最明白地、最確切地最不模糊地認為是取消主義概念中的組成部份了。取消主義底基本特點之一就是：動搖無定地隨波逐流，誇揚自己的無定性，否認一切與無定現象相反的東西。機會主義者無

* 宣示自己的信仰（此地指政治的信仰）。——（編者）

論何時，無論何地都是消極地隨波逐流，以“敷衍了事”，以從一個代表大會（戒酒的）跑到另一個代表大會（工廠的）（13）為滿足，他們以從這一個“會社”（雖然是最光榮的和最有益的：工會，消費團體，文化機關，戒酒會等等）聯合到另一個會社為滿足等等。取消主義是這樣一些傾向底總和，這些傾向是一般機會主義所具有的，牠們是在俄國歷史某個時期中、在某個社會政治派別中、在一定的具體形式中表現出來的。

在歷史上，取消派只給上述的“直爽的回答”（對麻煩的問題）以兩個肯切的評判。第一個評判就是：用“富豪統治的”這個形容詞（2）來代替“資產階級的”這個形容詞。可是這個代替是完全不對的。1861年到1904年這個時代表現給我們看，在生活底各方面，富豪統治底影響是增加着，並且牠的影響往往佔着優勢。在1908年到1910年這個時代中，我們看見另外一種情形：資產階級（這與“富豪統治”不同）已經認識自己是一個階級，已經估計到前三年對牠的階級自覺所給與的教訓。而造成一個思想系統，此種系統，在原則上既仇視社會主義（而且不是全歐洲的社會主義，不是一般的社會主義，而是俄國的社會主義），又仇視民主主義。不僅如此，資產階級在全國範圍內組織起來了，就是說，牠組織成爲一個階級了，其中某一部份在第三國會中有其經常的代表（並且很有勢力的代表）。最後，在1908年到1910年的土地政策中，又有實行資產階級的土地制度一定計劃的系統。這個計劃至今“沒有成效”，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這個挫折是一個資產階級系統底挫折，同時鄉村中的富豪統治却是很“順利”的：就是說，鄉村中的富豪統治從1908年到1910年的土地政策中，一定是占到便宜的，但引起許多犧牲的那個資產階級的制度，總還不能“奠定”。總而言之，應用“富豪統治”這個術語，無論在那一方面，都是

不妥當的，而且這樣不妥當，甚至取消派自己大概也甯願忘掉這個建議。

另一個評判就是：上述的回答之所以不正確（在他們看來是不正確的），是因為這個回答是叫人“再蹈覆轍”的……（51）。這個簡括有力的評判所以有價值的緣故，是因為牠非常明顯地表現出取消派一切著作言論之總結，始於波特列索夫底社會運動 35，終於列維茨基先生在我們的曙光上的言論 52）。這個評判底內容是完全否定式的；牠只限於申斥“再蹈覆轍”的趨向，而沒有任何肯定的指示——要“蹈”到那裏去。他們是說，你們飄流吧，“大家”怎樣飄流你們就怎樣飄流；但是這個飄流的結果如何，飄流的結果應當怎樣，對於這些總結，是不值得去研究的。

但是無論機會主義者如何希望不作任何的歸納，如何希望避免“不高興的”關於給“麻煩問題”以直接回答的議論，而他們的希望畢竟是不能實現的。你把牠驅出門外罷，牠又鑽進窗裏來了。有些取消派喜歡自命為“先進者”，自命為厭棄“保守主義”的人，在1908年曾經鄙視關於必須直接回答問題之指示，就是這些取消派竟也迫不得已——差不多過了一年半之後，在1910年夏天，——而顧及這些指示了；歷史底作弄原來就是這樣。而且他們自己營壘中的事變，也逼得他們這樣做。他們過去認為：直接的回答，乃是那種卑賤的已往的僵死的無謂的有害的“死地”所提出的要求，因此，他們曾經完全拒絕這種回答；可是，經過一年半之後，忽然在取消派中間產生一種“思潮”，牠已要求一種直接的回答，而且也就大胆地拿出直接的回答來！

拉林就起來做“大胆者”的角色了，這是意料中的事。但是這一次已經不止拉林一人了。大家知道，拉林是機會主義底一個 enfant terrible*。從機會主義者底眼光來看，拉林有莫大的缺點，因為他認

實地，誠實地和深思地接受他們中間發現着的趨勢，努力把此等趨勢聯結成一個整體，一直思索到底，得出直接的回答，做出實際的結論。誰要是讀過拉村著的關於廣泛的工人政黨一書（該書在三四年以前出版了），他大概就記得拉林如何熱烈地接受了阿雪洛德關於工人代表大會的著名觀念。

從1910年3月起，拉林在復興上開始發表了許多文章，這些文章所討論的問題恰恰就是關於政權底社會結構，關於前途和取消主義的問題。附和拉林的，有皮列茨基先生。這兩位著名作家以新信徒底熱烈態度去討論這些問題，他們在自己的，取消主義的營壘中徒勞無益地找尋了對於這些問題的直爽的回答，不問是非。他們認為在現在的俄羅斯，談不到什麼農奴制度，政權已經變為資產階級的政權了。

拉林說道：

“無論‘第一等’或‘第二等’人（拉林把著名的‘第三等人’（53），特別除外），都可以高枕無慮：1905年10月現在不站在日程上面”（復興第九第十合期，第二十頁）。“誰要把國會解散，他就要馬上把國會恢復起來，這種恢復速度將比革命後的奧國還要快些；奧國曾於1851年廢除憲法，而在1860年，即過了九年以後，不經過任何的革命而又重新承認憲法（54）。其所以如此者，只是因為統治階級裏那部份最有勢力的已經把自己經濟改造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的人底利益，是這樣要求着。後來統治階級各階層之間的鬥爭，在資本階級式的關係底社會制度根深蒂固以後，就迫使這些階層（在俄國也如其他各地一樣）去擴大選

* 可怕的蠢孩子。——（編者）

舉權底範圍……”(同上,26頁)。“俄羅斯捲入資本主義世界漩渦的過程……在政治方面也正在完成。這種完成,其意思就是:在目前這個階段上,沒有1905年那樣的全國革命運動之可能”(27頁)。

“這樣看來,既然政權”(依照拉林底結論)“並沒有“幾乎完全”操在土地的封建主手裏,那末,為“農業和工業資本家”底政權而反對封建主的鬥爭,也就不能變成爲反對現存政權而作的全國的鬥爭”(第十一期,第9頁)……。指望於行將到來的“全國高漲”而建立自己的策略路線,這必然要使自己陷於無結果的期待中”(同期第十一頁)。“持騎牆態度是不行的。如果在政權底社會結構中不會有過絲毫變化,那末,任務和活動形式就應該照舊不變,那末,就只有“和取消主義作鬥爭”。如果誰想再走上前去,誰想建設新的來代替、繼續和推尊那個舊的頹廢的和已不中用的東西,那末就請他澈底想想建設底條件吧”(同上,第14頁)。

這個拉林難道不是很幼稚麼?他居然要求機會主義者“澈底”行事,居然要求他們“不持騎牆態度”!

復興底編輯部會茫無所措。他在第九第十合期上聲明不同意拉林,他寫道:“意思”(拉林底意思)“新穎”,但是“拉林底論文沒有說服我們”。在第十一期上米洛夫大概是代表編輯部起來反對拉林,米洛夫曾承認拉林和皮列茨基“代表一定的思潮,這種思潮在理論上還少有研究,可是說話底口氣,倒很清楚”(在機會主義者看來,這是最大的缺點了!)。米洛夫寫道:“拉林又順便地和完全出人意外地”(原來如此!這個燥急的拉林總是用“很清楚的口氣”攪擾他的朋友!)“提到另一個關於取消主義的問題。我們覺得,黨的建設底形式

和俄國政府底本性之間，是沒有密切關係的，所以我們保留着單獨來談這個問題的權利”（1910年7月20日（7日）出版的一期，第22頁）。

在生活第一期上（1910年9月12日（8月30日））馬爾託夫已經代表這個“我們”而“單獨地談過了”，他申明道：“只能同意”（第1頁）米洛夫和編輯部而反對拉林。這樣看來，取消派這一切辯論中的結論，已由馬爾託夫說出了。

現在我們就來看看取消派底這個結論罷。

馬爾託夫着手工作，如向來一樣，非常活潑和非常……“巧妙”。他開始便說：“在6月16日（3日）政變之後，在我們這裏，立刻就有人開始細心去找尋握有政權的資產階級或當政的資產階級。“六三制度是俄國工商業資產階級統治底制度。這個公式，無論上述的孟塞羅克作家（拉林，皮列茨基），無論他們的敵手——正統派的布爾塞維克（他們在1908年曾寫到“俄羅斯資產階級君主制度之產生”），都同樣接受了”。

請看，這豈不是巧妙之至嗎？拉林責備馬爾託夫，說他持着騎牆態度，並爽直地、不動搖和不狡猾地承認，如果不重新改造“正統派”對於麻煩問題所作的回答，那就應當和取消主義作鬥爭。

而馬爾託夫却“巧妙地”製造空氣，企圖使讀者相信（這些讀者在1910年8月完全沒有可能聽到另一方面的說話）：“這個公式”，無論拉林，無論“正統派”都“同樣接受了”！！

這個巧妙手段就是布里甯式的或孟興科夫式的巧妙手段（55），因為我們再想不出更無恥的……離開真理的行爲了。

馬爾託夫在該論文上又寫道：“在作品上的辯論中，人們往往忘記：究竟是誰先“開啓”。不錯，在著作家的辯論中，真有這種情形，因為那時沒有談到給麻煩問題規定明確肯定的回答。但是，我們現在

所看到的問題恰恰不是著作家的和不僅是作品上的“辯論”，這一點是這位使生活讓讀者陷於迷途的馬爾託夫所明白知道、澈底知道和真正知道的。馬爾託夫知道得很清楚，“正統派”所給的和擁護的肯定回答是什麼。馬爾託夫知道得很清楚，拉林恰恰就是反對這個回答，他稱這個回答為“呆板的舊調”，“空中樓閣”等等。馬爾託夫知道得很清楚，他自己和他的一切同道和同事們都曾經駁斥“正統派”所給的肯定的回答。馬爾託夫知道得很清楚，“究竟是誰先開始”；誰開始擬定（和澈底擬就）確切的回答；誰只限於嘻笑一場和表示不同意就算完事，而不會拿出並且現在還不拿出任何的回答來。

再想不出比馬爾託夫這個詭計更可惡和更狡猾的了！拉林用自己的爽直氣概和公開態度大大地觸犯了取消主義底外交家，因為他承認了（雖然是經過了一年半），沒有確切的回答是不行的。真理昭彰，馬爾託夫企圖欺騙讀者，他把事情這樣描寫，似乎拉林與正統派採取“同樣的公式”；其實前者和後者底公式是相反的：從拉林的公式中得出袒護取消主義的結論，而從“正統派的”公式中却得出痛斥取消主義的結論。

爲要掩蔽自己的詭計，馬爾託夫便從這個所謂“公式”中抓住一個字眼，而曲解它和其他字眼的聯繫（這是布里甯和孟興科夫所研究得盡善盡美的方法）。馬爾託夫斷定說：正統派曾經寫到“俄羅斯資產階級君主制度之產生”，——拉林則寫着，在俄羅斯根本就談不到什麼農奴制度，政權已經是資產階級的政權了，——“這就是說”，拉林底公式和正統派底公式是“同樣的”！！戲法變完了。相信馬爾託夫的讀者就被愚弄了。

而在實際上，正統派底“公式”，或正確些說，正統派底回答却是這樣：俄羅斯的舊政權“按照轉變爲資產階級君主制度的道路更進

一步”，而且恰恰是這樣一條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這條道路“保持正是封建式的土地佔有者之政權和收入”，——這個實際情形底結果，使“引起”二十世紀初葉第一次危機的*“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基本原素，繼續發生作用”。

拉林說，政權已經是資產階級的政權了，因此只有贊成“呆板的舊調”的人，才說封建主的“政權還保存着”，因此過去高漲底“基本原素”並不繼續發生作用，因此要建設什麼新的“來代替已成爲不中用的舊的東西”。

“正統派”說：政權按着轉變爲資產階級君主制度（不是一般的資產階級的政權，而祇是資產階級君主制度）的道路更進一步，而且實在的政權，仍舊保存在封建主手裏，所以從前的趨勢、從前的進化形式之“基本原素繼續發生効力”，因此誰說什麼“已成爲不中用的舊的東西”，他就是取消派，事實上就是自由派的俘虜。

這兩個公式，這兩種回答，顯然是相反的。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這兩個不同的完整的回答，從這兩個回答中得出不同的結論。

馬爾託夫仿倣布里甯來玩把戲，因爲他藉口說，兩種回答都似乎“說到”什麼“資產階級君主制度之產生”。同樣有權可以藉口說：兩種回答都承認俄羅斯正在繼續資本主義的發展！在共同承認（在一切馬克思主義者和一切願爲馬克思主義者的人中間）資本主義的發展這個立足點上，發生着關於資本主義發展底程度、形式、條件之爭論。而馬爾託夫却混亂爭論的問題，以便把無可爭論的問題變爲爭論底對象！在共和承認（在一切馬克思主義者和一切願爲馬克思主義者的人中間）舊政權正按着轉變爲資產階級君主制度的道路向前

* 即是1905年到1907年的革命。——（編者）

發展這個立足點上，發生着關於這個轉變底程度，形式、條件、過程之爭論，而馬爾託夫混亂爭論的問題（過去的原素是否繼續發生作用？是否容許放棄舊的形式？等等），以便把無可爭論的問題作為爭論底對象！

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俄羅斯政權，一般地是“按着轉變為資產階級君主制度的道路”發展的，這一點拉林沒有否認，就是無論那一個負責的願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人，至今也沒有否認過。主張用“富豪統治的”這個形容詞來代替“資產階級的”這個形容詞這一個提議，沒有正確地估計到轉變底程度，但是在原則上却不敢否認：實在的“道路”，真正進化底道路，恰恰就是這一個轉變。讓他嘗試一下去作這樣的斷定吧：1831年至1904年的君主制度（毫無疑義的，他與現時的君主制度相比帶有較少的資本主義性質），與上古拉時代，農奴制時代比較，不是“按着轉變為資產階級君主制度的道路”前進一步麼，——讓他嘗試一下去作這樣的斷定吧！

馬爾託夫不但不敢嘗試一下去作這樣的斷定，而且相反，他“附和”米洛夫的意見，而米洛夫反駁拉林時所援引的，恰恰是認為維特的改良（56）以及六十年代的改良，帶有資產階級的性質！

現在讓讀者去判斷米洛夫和馬爾託夫兩人底“巧妙手腕”吧。起初，他們重複一些理由來反對拉林，這些理由是“正統派”一年半以前引來反對馬爾託夫和米洛夫底最親近的朋友，同道者和同事的；——然後，他們又要讀者相信，拉林和“正統派”底“公式”是同樣的。

這不僅是反政治的文學主義底模範（因為，政治要求肯定的直爽的回答，而文學家往往只限於說些題外的話），這是把文學降低到布里寧主義的一個模範。

馬爾託夫引證我在上面所引過的拉林底話：“如果不會發生絲毫

的變更……，那就只有和取消主義作鬥爭”，同時回答他說：

“我們至今都認為：我們的任務是由我們從中活動的那個社會底社會結構來決定的，而我們的活動底形式，却是由（1）這些任務和（2）政治條件來決定的。因此，“政權底社會本性”對於我們的任務和活動形式之決定，並沒有直接的（馬爾託夫加上着重點）關係”。

這不是回答，而是空洞的遁辭。馬爾託夫又企圖混亂問題，企圖把爭論不是轉移到發生爭論的地方去。問題不在於：政權底社會本性與任務以及活動形式有直接的或間接的關係。就算這個關係是間接的吧；既然承認有密切的和不可分離的關係，那末問題就不因此而有絲毫的變更。但是馬爾託夫却不敢說一句話來反對承認有密切的和不可分離的關係。他援引“政治條件”就是蒙蔽讀者底耳目。把“政權底社會本性”與“政治條件”對立起來，這恰恰像把人造的套鞋與避雨鞋*對立起來一個樣，這是如何的不通啊！避雨鞋，這就是套鞋。而除了人造的套鞋以外，就不會有其他的套鞋。政權底本性，這就是政治條件。而政權除了社會的本性以外，就不會有其他的本性。

結果我們可以看出：馬爾託夫“講過”些題外的話，而不肯直接回答拉林。他所以不肯直接回答的緣故，是因為他根本就沒有什麼話可以回答拉林。拉林認為：對於“政權底社會本性”（說得更確切些，對於政權底經濟本性）的見解與對於“任務以及活動形式”的見解，有密切的和不可分離的聯繫——這一點上拉林完全是正確的。這一種聯繫，無論拉林或“正統派”都是了解而指明了的。而在馬爾託夫（及其一家人）方面，卻沒有這些見解間的聯繫。因此馬爾託夫不

* 避雨鞋，就是俄國人對套鞋的俗話。——（譯者）

能不拿“避雨鞋”來敷衍一下。

請聽下去吧：

“這幾個孟塞維克（馬爾託夫援引可干在1907年教育雜誌上的文章做例）多少明白地露出了這樣的觀念：工人階級逐漸地，可說是有機地“生入”已有立憲制度萌芽的“法治國”，就是說，6月3日法令所規定的資產階級（而不是“富豪統治”嗎？什麼緣故呢？）特權，逐漸推廣到廣泛的民主派中來。如果現時的括弧內的“取消主義”或現時的“合法主義”底實在的原則基礎果然是這樣，那麼，這就是真正取消我們的傳統，就是正真的、奉為原則的合法主義，就是在原則上與我們過去的一切斷絕關係。那麼，我們也就應當與這種取消主義作認真的鬥爭了……難道真正會有爬入新式的託爾馬却夫統治時代（57）中去的改良主義者麼？”。在這個地方馬爾託夫又加上註釋如下：“我當然（！！）不懷疑拉林會有改良主義的傾向”。

我們所以要有這段冗長的摘錄，為的是要把馬爾託夫底“手腕”，極明白地表示給讀者看。他承認，可干（即孟塞維克，他是經常和馬

*這句法國方言，也許不是一切讀者都知道的，在我看來這句話用得極不妥當。“法治國——這是法文 pays légal 底直譯，他是指人民中某些階級或集團及階層而言；他們在國會中有其代表並和民衆不同，享有憲法上的特權。同時，在估計馬爾託夫底動搖時還應注意，就是，他不願承認1908年到1909年俄羅斯已經按着轉變為資產階級的君主制度的道路更進一步。但是，他承認，1907年6月16日（舊曆6月3日）“資產階級”（而不是“富豪統治”）“已取得立憲制度底萌芽”。誰能懂得呵！

爾託夫共同寫重要“著作”的)“多少明白地露出了”改良主義。他承認，如果改良主義真是取消主義底原則上的基礎，那麼，這就是“與過去斷絕關係”。他喊出響亮的、喧嘩的、動人的話來反對“爬入……的改良主義者”。末了他說道，……(你們猜他會說些什麼呢?)他當然“不懷疑”拉林會有改良主義的“傾向”!!

須知這恰恰就是培恩斯坦底言論，壽勒斯底言論，或麥克唐納爾底言論。他們都“承認”，有些“極端派”“暴露出”……一種不好的東西，改良主義，自由主義。他們都承認，如果自由主義真是他們的政治底“原則基礎”，那麼，這就是“與過去斷絕關係”。他們都喊出響亮的、喧嘩的、動人的話來反對“爬入……的自由派”。末了他們都說道，……他們並不懷疑拉林輩……(對不起，說錯了)，並不懷疑他們的那些更公開的更“右的”同志，同道者、同伴、同事，會有自由資產階級的傾向。

問題底中心就在這裏：拉林在上述的論文中，敘述了最確鑿的最真實的改良主義觀點底“系統”! 否認這一點——那就無異於反對真理，無異於把改良主義這一個概念底意思完全刪去。但是，如果你們要“駁斥”拉林，“斥責”“原則上的”改良主義，喊出響亮的話來反對“爬入者”，而同時忽然又使人相信，說你們“不懷疑”拉林會有改良主義，那麼，這樣一來你們就把自己完全揭破了。這樣一來，你們就完全證明出，對於你們，藉口說在“原則上”仇視“原則上的改良主義”，正如小商人賣貨時所作的宣誓一樣：“請你相信吧，本着良心說，我真是虧本賣貨”。

請你們相信吧，我本着良心說：我申斥原則上的改良主義，但是，我不“懷疑”拉林會有改良主義(這些形跡可疑的正統派，真可惡極了!)，並且在取消主義的實際工作中我完全同意拉林。

現時俄國機會主義底“擴大的公式”就是如此。

請看馬爾託夫自己（幼稚的人或者不懂新的重新結合底奧妙的人，至今還認他是一個“無疑的”非取消派）怎樣應用這個公式罷。馬爾託夫在第九和第十頁上寫道：

“在所謂“取消派”活動中所表現出來的策略，就是這樣的“策略”，他以公開的工人運動作為中心，他立意在一切可能的方向中擴大這個運動，他在這個運動內部（馬爾託夫加上着重點、並且祇有在這裏）（請注意：祇在這裏啊！）“去找尋一些成份來恢復黨的生活。”

這是馬爾託夫所說的話。而這正是爬入新式的託爾馬却夫統治時代的改良主義。“爬入”字樣，是我從馬爾託夫那裏引來的，因為重要的是：馬爾託夫在這裏所引證的幾句話中事實上恰恰就是鼓吹爬行。無論你如何把宣誓反對“原則上的改良主義”的議論和這種鼓吹一同提出，但是，問題並不因此而有所變更。事實上，馬爾託夫既然說過：“祇有在這裏”，既然說過：“作為中心”，那麼，他恰恰就在進行改良主義的路線（在1908年至1910年俄羅斯特別的環境之下）；至於宣誓，允諾，担保呢，那就讓政治上的幼兒去相信吧。

“1850年代初葉馬克思和維里赫沙別爾之間的爭論恰恰（II）就是關於這一個問題：秘密團體有何意義和是否可以由這些團體來領導政治鬥爭……布朗基主義者（在六十年代的法蘭西）“會準備”對付這些事變（對付拿破崙主義底破產），其方法就是建立了秘密團體，把單個工人團結在這些團體裏面；而法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却跑到工人組織中間去，建立工人組織，用一切方法“爭取合法性”……”*

無論前一個例子或後一個例子，都恰恰文不對題。五十年代馬

克思和維里赫的爭論，六十年代馬克思主義者和布朗基主義者的爭論(53)完全不在於：要不要“僅僅”在“和平的可以容忍的”(馬爾託夫，生活第一期，第十頁)組織中去尋找“一些成份來恢復黨的生活”。這一點馬爾託夫知道得很清楚，他現在企圖使讀者陷於迷途，這未免徒勞無益。這兩種爭論却不是涉及“恢復”工黨的問題，因為當時不能爭論關於恢復那時候還完全沒有的東西。這兩種爭論恰恰是關於：一般地要不要以工人運動做靠山的工人政黨，階級的政黨。維里赫和六十年代的布朗基主義者恰恰否認了這一點，這是馬爾託夫知道得很清楚的，他現在企圖談論這些現在無可爭辯的問題，藉以掩蔽現在成爲爭論的問題，這真是徒勞無功了。馬克思不僅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始終沒有站在這樣的觀點上：“僅僅”在和平的和可以容忍的組織中去找尋恢復或產生黨的生活；而且甚至於在七十年代末，在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君主制度發展到更高階段的時候，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作過無情的鬥爭去反對德國的機會主義者(59)，這些機會主義者曾經取消德國的“黨的生活”底最近過去，曾經袒護“過激行動”，曾經談論“更文明的”運動形式(即俄國現時取消派所說的“歐化”)，曾經擁護這種思想：“僅僅”在“和平的和可以容忍的”組織中去“找尋一些成份來恢復黨的生活”。

馬爾託夫寫道：

“我作一總結吧。爲要給那些仍舊忠實於馬克思主義的“孟塞維克”現在所做的事情以理論上的根據和政治上的辯護，只要拿出下面的事實就完全足够了：現時的制度就是專制主義和立憲主義之間的內部矛盾的配合；俄國的工人階級已經成熟到這

* 這一長語是列寧從馬爾託夫論文中引來的。——(校者)

種程度，以便能如“西歐”先進各國的工人一樣，抓住這個制度裏面這些矛盾中的最弱之點”。

馬爾託夫這些話（“完全足夠”）——完全足夠使我們做出自己的總結。馬爾託夫認為立憲民主黨人和一部份十月黨人所承認的東西已“完全足夠”。1911年1月，言論正是把問題提得如1910年8月馬爾託夫所請求抽提的那樣：立憲主義和反立憲主義之矛盾的（在他們看來是矛盾的）配合；兩個營壘——一個贊成立憲，一個反對立憲（60）。對言論完全足夠的東西，對於馬爾託夫也完全足夠了。這裏馬克思主義底影子都沒有。這裏馬克思主義完全化為烏有而由自由主義來代替了。俄國有“矛盾的配合”，這對於馬克思主義者無論如何是不“足夠的”。要認識了解：這個定理是不夠的，這個定理含有一小部份的真理和一大部份的荒誕，這個定理蒙蔽了矛盾底深刻性，粉飾了實際情形，否認了唯一可能的補救方法，——只有把這幾點認識和了解之後，方可說開始懂得馬克思主義。

舊制度與立憲主義之“矛盾的配合”，這不僅在現時的俄羅斯是存在着，同時在現時的德意志，甚至在現時的英吉利（元老院；在對外政策方面國王脫離國民代表而獨立等等）也存在着。如果政治家說，承認對於德意志和英吉利說來都是正確的東西，則對於俄國人就“完全足夠了”，那麼，試問這個政治家實際上（就是說不以善意和好話為轉移）是站在何種立場上呢？這個政治家實際上就是站在自由派底立場上，立憲民主黨人底立場上。在俄國，甚至多少是徹底的資產階級的民主派也不能站在而且也沒有站在這樣一種立場上。馬爾託夫最後一句話，他用以總括取消派全部辯論的總結公式，最確切、最明白、最充分地表示出自由派的見解，而這種見解是拿冒牌馬克思主義的旗幟做護符的。

如果自由派（不僅是立憲民主黨人，而且是一部份十月黨人）說：要給我們的活動以理論上的根據和政治上的辯護，則一經承認舊制度與立憲主義之內部矛盾的配合，就完全足够了；那麼，自由派仍舊完全忠實於自己的觀點。他們在這些說話中表示出真正確切的自由派的公式1908年到1910年（如果不是1906年到1910年的話）自由派政治底公式。至於馬克思主義者呢，那麼他就應解釋這個公式是不夠的和虛偽的，因為這個公式是把那個表示出俄國“矛盾”與英國及德國矛盾間原則上和根本上的區別的特點抹煞了，——只有當馬克思主義者進行這種解釋的時候並進行這種解釋的範圍內，他才表現出自己的馬克思主義。自由派說：“一經承認：在俄國有許多東西是與立憲主義相矛盾的，這就完全足够了”。馬克思主義者回答說：“這種承認是完全不夠的。必須認識，現在對於“立憲主義”一般地沒有初步的、基本的、重要的，必須的基礎。自由主義根本的錯誤恰恰在於承認這種基礎已經存在（其實他是不存在的），這錯誤說明自由主義之軟弱無力，而產生這種錯誤的原因，便是資產階級樂觀主義之軟弱無力”。

把政治上互相矛盾的兩個觀念譯成經濟上的詞句，則可以概括如下。自由派以為：經濟的（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已經有了，確定了，完成了；現在的問題就是把這條道路上的障礙和矛盾加以掃除。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這條現有的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至今還沒有走出絕境，不管經濟的進化有這種無可懷疑的資產階級的進步，如1906年11月22日（9日）（或1910年6月27日（14日））的法令，如第三國會等等；並認為：還有另外一條也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牠能夠走上康莊大道，不管自由主義底一切動搖，一切猶疑和一切畏縮，我們要指出、要說明、要準備、要堅持、要實現這條道路。

馬爾託夫和拉林爭論得這樣，似乎他比拉林“左”得多。因此許多幼稚的人就受其欺騙，他們說：當然，波特列索夫、列維茨基、拉林都是取消派，當然，他們都是極端的右派，像我們的魯安這班人一樣，可是馬爾託夫這種人就不是取消派了！然而在事實上，馬爾託夫反對爬入的改良主義者的那些動人的話，只是轉移視線的一種方法，因為馬爾託夫在自己的結論中，在自己的最後的幾句話中，在自己的總結中，恰恰是幫助拉林的。馬爾託夫絕對不比拉林“左些”，他祇是比拉林外交些，無原則些，狡猾些用冒充“馬克思主義的”五花八門的腐敗不堪的庸陞濫調來作掩飾。馬爾託夫的結論是：承認矛盾的配合就“完全足够了”——這個結論正是拉林所需要的那種對取消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批准。但是，拉林想把這個結論加以證實，證明，思索到底，使他成為原則上的結論。馬爾託夫對拉林所說的話，正如禱爾馬、亞威爾及其他機會主義的“老將”對年輕的機會主義者培恩斯坦所說過的話一樣：“親愛的拉林！……（對不起，說錯了），親愛的培兒（培恩斯坦的簡稱）！你真是傻子！應該做這點，但不應該說這點”（61）。“親愛的拉林！我們兩個人有取消主義的實際行動就“完全足够了”，我們只要拿自由主義的態度來承認舊制度與立憲主義之間的矛盾性就“完全足够了”，但是，請你千萬不要再進一步，不要“加深一層”，不要去找原則上的明確性和完整性，不要做關於“現在時局”的估計，因為這些都是揭破你我的。我們祇要做，可是，絕對不要說呀”。

馬爾託夫教導拉林做機會主義者。

拉林要求給他和馬爾託夫兩個人所重視的取消主義作一個原則上的說明和辯護，於是他就對馬爾託夫說：持騎牆態度是不行的。

馬爾託夫回答說：

東西，而波特列索夫則用深奧的話把這些所說的東西混亂、掩飾和穩藏起來，其方法就是在普列漢諾夫底哀的美教書影響之下來把自己那篇反對領導權的文章，加以洗刷和改造³⁵。

馬爾託夫的公式和列維茨基的公式——是一物底兩面。給馬爾託夫（馬爾託夫假裝不懂領導權觀念與取消主義問題之聯繫）解釋這一點，就是下篇文章的對象。

附註：當我們收到人生事業第二期上拉林向右——向後轉這篇論文的末節時，我這篇論文已經送去排印了。馬爾託夫“當然不懷疑”拉林會有改良主義，可是拉林却在新的取消派的雜誌上，也像以前那樣正確地敘述改良主義，現在，我們暫時祇把改良主義綱領底實質引錄如下：

“當人們簡直不知道明天究竟如何、不知道自己的任務是什麼的時候，那麼就有手足無措和胸無定計的狀態，——這種狀態也就是無定的等待主義的情緒，就是模糊的希望：又像希望革命重演一遍，又像希望“到那時就會知道是什麼一回事”，目前的任務，不是在海邊等氣候，而是向廣大羣衆灌輸這種基本的觀念：俄國實際生活已經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在這時期中，工人階級應當組織起來，並不是“爲着革命”，不是“爲着等待革命”，而不過是爲着在一切實際生活方面堅決地和有計劃地擁護自己特殊的利益；爲着集合和訓練自己這種多方的複雜的活動力量；爲着用這個方法去培養和積集一般的社會主義意識；特別是爲着在行將到來的那個隨着封建反動勢力之經濟上的必然消滅而產生的俄國立憲維新中俄國社會階級複雜的互相關係上，善於決定方針（辯別事理）和保衛自己！……”（18頁）。

這一段話，確切表示出拉林“綱領”底全副精神和整個意思，同

時確切表示出一切取消主義的著作（我們的曙光、復興、人生事業等等）以至於那位已經由我們分析得“完全足夠”的馬爾託夫等人底著作）底全副精神和整個意思。這一段話，就是最純粹的和最十足的改良主義。我們現在不能來分析這一段話；我們在此地不能把這一段話詳細分析到應有的程度。因此，我們祇限於一個簡單的說明。左派立憲民主黨人，非黨的社會主義者，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人民社會黨人之流）和那些願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人們裏面的改良主義者，都向工人們鼓吹這樣的綱領：集合自己的力量吧，訓練自己吧，教育自己吧，擁護自己的利益吧，這不過是為着在將來的立憲維新中來保衛自己。這樣的綱領完全減少、縮小、過去1908年至1911年工人階級底政治任務，這恰如“經濟派”在1896年至1901年去這些任務一樣。自欺欺人的舊經濟派曾喜歡援引比利時（不久以前曼恩和布魯克爾底絕妙的作品，已經說明比利時人中間改良主義佔優勢；關於這些作品我們以後再談）；新經濟派，即取消派，現在喜歡援引1867年奧地利利用和平方法得到憲法的實例（54）。舊經濟派也好，現在的取消派也好，總是要在歐洲工人運動和民主運動歷史中找出這樣一些例子、情形、事件來：因為有某些原因，工人是軟弱的、不覺悟的、依賴於資產階級的，——並且拿出這些例子作為俄羅斯底模型。經濟派也好，取消派也好，他們都是把資產階級的影響傳達到無產階級中去。

1911年3月

7 論調和派或好心人底新政派(63)

國外‘技術委員會’底新聞紀要(64) (第1期, 1911年8月24日(11 1)) 和幾乎同時在巴黎出版的署名爲“一部份護黨的布爾塞維克”的(63) 告社會民主工黨全體黨員的宣言, 按其內容都是同樣的反對正式的布爾塞維主義”或反對(按他種說法)“列甯派布爾塞維克”的言論。這些言論是非常憤激的,——其中憤激的歎息和堂皇的詞句比內容多些,——雖然如此,對於這些言論還是應當加以研究,因爲牠們涉及我們黨底最重要的問題。我自然更要來討論這個新政派,因爲,第一,在足足一年半以前我恰恰代表一切的布爾塞維克恰恰寫到這些問題(參看討論特刊第二期)*,第二,我完全了解我自己對於“正式的布爾塞維主義”所負的責任。至於說到“列甯派”這個術語,那末牠不過是一種不中肯的造謠中傷的企圖:似乎此地祇指一個人底朋黨而言!在事實上,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問題完全不在有些人贊成我個人對於布爾塞維主義某些方面的見解。

宣言底作者署名爲“護黨的布爾塞維克”,還自稱爲“非政派的布爾塞維克”,附帶聲明道:“此地”(即在巴黎)“很不中肯地”稱他們

*參看列寧底論文:政論家底時評,第二章,我們黨內“統一的危機”。

本卷第32頁至66頁。——編者)

爲調和派。在事實上，這個名稱（這個名稱在一年三個多月以前，不但在巴黎，在國外，而且在俄國也已確定了），恰恰唯一正確地把新政派底政治實質完全形容出來，這一點讀者從我以後的敘述中可以相信。

調和主義就是與1908年至1911年反革命時代中“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歷史任務之本質有密切關係的各種情緒、志願、見解之總和。因此，在這個時期中，有許多社會民主黨員從各種不同的前提出發，都“陷入了”調和主義。託洛茨基之表現調和主義比任何人都澈底些，差不多祇有他一個人會企圖給這個思潮建立理論基礎。這個基礎即爲：政派和政派行動會是智識界“爲影響未成熟的無產階級”而作的鬥爭。無產階級成熟起來，政派行動就將自行消滅。政派合併過程底基礎，不是各階級關係底變更，也不是兩個主要政派根本觀念之進化，而是以是否遵守一切“智識份子”政派間的協定爲轉移。託洛茨基堅決地鼓吹一切政派間的這種協定——他老早就鼓吹這種協定，同時，他又是不斷地動搖着，有時動搖到布爾塞維克方面來，有時又動搖到孟塞維克方面去。

與此相反的見解（參看討論特刊第二期和第三期）*就是：各個政派都是由俄國革命中各階級的關係所產生的。布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只是確定了1905至1907年客觀實況向無產階級所提出問題的回答。因此，只有這兩個政派，“有力的”政派（因其根深蒂固而有力的，因其思想之適應某方面客觀實況而有力的政派）之內部的進化，——純粹內部的進化，才能保障政派間的實在的合併，就是說，在俄國

* 參看 政論家底時評，第二章，我們黨內統一的危機，本卷32頁至66頁。——（編者）

建立無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之真正完全統一的政黨。從此就得出實際的結論：只有這兩個有力政派在工作中的接近，只有牠們把非社會民主黨的思潮——取消主義和召回主義，加以肅清，才是真正的黨的政策，真正實現統一的政策；所走的道路是不輕便的，不順暢的，遠不是轉瞬間的，然而這是實在的，這與許多騙人的允諾，說什麼“一切”政派能够容易的、順暢的轉瞬間的實行合併，是不同的。

這兩種見解還在全體會議以前就表現出來了，在全體會議以前，我曾在談話中提出一個口號：“兩個有力政派接近起來，而不是哀求政派之解散”（社會民主黨人呼聲在全體會議之後即刻向大家這樣哀求）。這兩個見解，在1910年5月，即在一年半以前，我已經直爽地，肯定地，有系統地在“全黨的”舞臺上，在討論特刊（第二期）上敘述過了。從1909年起，在這些問題上，我們與調和派爭論過：如果調和派至今一次都沒有預備來回答這篇論文，一次都沒有企圖一般地稍微有系統地來分析這個問題，稍微公開地和完整地敘述自己的見解，那末，這完全是他們的過咎。他們在宣言上用特別集團名義，稱自己的政派言論為“公開的回答”：一年多不公開的人們作這個公開的回答，並不是回答問題，不是回答這一個早已提出的，早已討論的，早已有兩個原則不同的方向中解決了的問題：而是發表最沒有希望的糊塗觀點，最無理由地把兩種不可調和的回答混淆起來。無論那一個論點，宣言底作者一經提出，就打自己的嘴巴。無論那一個論點，冒充的布爾塞維克（事實上是不澈底的託洛茨基主義者）都是重複了託洛茨基底錯誤。

試拿宣言底基本意思來看罷。

宣言底作者是些什麼人呢？他們說，“是些不同意正式布爾塞維主義對組織問題見解的布爾塞維克”。似乎僅僅是組織問題上的“反

對派”，你想對不對呢？請讀一讀下面這一句話罷：……“現在如一年半以前一樣，正是把組織問題，黨底建設和恢復問題，提在第一位”。這簡直是不對的，這正是一年半以前被我揭破了的託洛茨基原則上的錯誤。在全體會議上，組織問題，所以能夠成爲彷彿是首要的問題，只是因爲而且僅僅在於：無論呼聲派，無論前進派，爲“安慰”黨起見都“贊成了”反取消主義和反召回主義的決議案，這樣一來，各派之放棄取消主義會被看作是實在的事情。在我們的曙光從1910年起完全舉起取消主義的旗幟，而前進派在自己的出色的某學校（70）中完全舉起擁護召回主義的旗幟之後，託洛茨基仍舊把這種彷彿是的东西，看作是實在的事情，這就是託洛茨基底錯誤。在全體會議上，有些人把彷彿是的东西，看作是實在的事情，這在當時也許是自欺底結果。在全體會議之後，從1910年春天起託洛茨基最無原則地和最無廉恥地欺騙了工人，因爲他要人家相信，統一上的障礙，主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話）是組織上的困難。1911年，巴黎的調和派繼續這種欺騙，因爲現在如果說組織問題居於第一位，這就等於譏笑真理。其實現在居於第一位的，並不是組織問題，而是關於黨底全部綱領、全部策略、全部性質的問題，正確些說，是關於兩個黨——社會民主工黨和波特列索夫、斯米爾諾夫、拉林、列維茨基諸先生底斯託雷平工黨（65）的問題。在全體會議之後，巴黎的調和派足足的睡了一年半，在這一年半當中，反對取消派的全部鬥爭，無論在我們方面，無論在護黨的孟塞維克方面，都從組織問題轉到關於社會民主工黨（而不是自由主義的工黨）底生存問題上去了。如果現在與我們的曙光中的先生們去爭論組織問題，爭論秘密組織與公開組織間的關係問題，這就等於演齣滑稽劇，因爲，這些先生們完全能夠承認這樣的“秘密”組織：替取消派効勞的呼聲社！我們老早就說過了，這樣一種

替保皇派的自由主義劬勞的祕密組織，是爲俄國的立憲民主黨人所承認和應用的。調和派自稱爲布爾塞維克，爲的要在一年半以後來重複（而且特別申明，這是用整個布爾塞維主義底名義去做的！）託洛茨基底那種被布爾塞維克所揭破了的錯誤。難道這不是濫用大家所公認的黨綽號嗎？既然如此，難道我們還不應該向大家和每個人申明，調和派並不是布爾塞維克，他們與布爾塞維主義沒有絲毫相同之點，他們祇是不澈底的託洛茨基主義者嗎？

再讀下去罷：“可以不同意正式布爾塞維主義和中央機關報編輯部底大多數關於與取消主義鬥爭的任務的了解”……難道可以真的斷定說，“與取消主義鬥爭的任務”，就是組織任務嗎？調和派自己說道，他們與布爾塞維克的分歧，不僅在組織問題上！究竟在什麼地方呢？他們總是緘口不言。他們的“公開的回答”，仍舊是不公開的……還是無顧慮的？……人們底回答。在一年半當中，他們一次都沒有預備來修正“正式的布爾塞維主義”，或敘述自己關於與取消主義鬥爭的任務的了解！而正式的布爾塞維主義進行這種鬥爭，從1908年起足足有三年了。一拿這些時日來比較，我們無意中就去找尋調和派離奇的“不公開態度”底原因，而這種找尋，無意中就使人回想到託洛茨基和楊諾夫；他們倆會要人相信，他們也反對取消派，可是他們對於與取消派鬥爭的任務却有另外的了解。同志們，這是可笑的：鬥爭開始了以來已有三年，而此時才起來申明說，你們對於這種鬥爭有另外的了解。這樣的另外的了解，正像完全不了解！

再講下去吧。現在黨的危機底關鍵，無疑地是歸結到這個問題：我們的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是完全與取消派（呼聲派也在內）分離，還是繼續與他們實行妥協政策。凡稍知事理的社會民主黨員，恐怕沒有一個人會否認，現在黨內整個情況底實質，就在這個問題

上。但是調和派怎樣回答這個問題呢？

他們在宣言上寫道：

“人們對我們說，這樣一來（擁護會議），我們便破壞黨的形式和實行分裂。我們却不以為然(sic!*)。但是如果真是這樣，那末，我們也不會怕這一點”。（以後就指出‘中央國外局’(66)破壞全體會議，指出“人們拿中央來做賭博”，指出“黨的形式已開始被政派行動的內容所充實”等等）。

這個回答，實在可以稱為思想上和政治上無黨法底“古典式的”模範！多麼可怕呵：人們竟給了他們以分裂的罪名。新政派企圖給黨指出道路，於是在宣言上公然說：“我們却不以為然”（就是說，你們不以為現在有分裂而且將來還會有分裂嗎？），“但是”，……但是“我們也不會怕這一點”

我們可以擔保，在一切政黨底歷史中，都找不出這樣糊塗的例子來。如果你們“不以為”現在有分裂而且將來還會有分裂，那你們就要說明這一點！就要說明，為什麼可以和取消派一塊兒工作！請你們直爽也說一說，和他們可以——也就是說應當——一塊兒工作。

我們的調和派不僅不肯說這一點，而且說出相反的話頭來。在新聞紀要第一期上(63)編輯部論文中（在註釋上公然說到，反對這篇論文的，曾有一個布爾塞維克，即擁護布爾塞維主義綱領——第二巴黎區決議案(67)的人），寫道：

“在俄國，與取消派一塊兒工作，是不可能的，這是事實”。

而在稍前一段中又這樣承認：在呼聲派和取消派中間，“要分出甚至最小的界限，都是日益困難了”。

* 原來如此！——（編者）

誰個懂得呵！一方面，用‘技術委員會’（在該委員會中，調和派與現在擁護他們的波蘭人，多過我們布爾塞維克）底名義，作正式的聲明。說一塊兒工作是不可能的。照俄文來講，這就是宣告分裂。分裂兩字，並無其他任何的意思。他方面，同是這個新聞紀要第一期又說道，‘技術委員會’之設立，“不是爲着分裂，而是爲着預防分裂的”；而且同是那些調和派又寫着，他們“却不以爲然”（不以爲現在有分裂而且將來還會有分裂）。

可否想出比這更糊塗的觀念呢？

如果一塊兒工作是不可能的，那末，這對於社會民主黨人，在社會民主黨人看來，只能由於這樣的原因和理由：或者是因爲某集團，公然破壞了黨的決定和義務（那末，與這個集團分裂，是不可免的），或者是因爲原則上根本的分歧，使某個派別底全部工作，都脫離了社會民主主義（那末，與整個派別分裂，是不可免的）。大家都知道，在我們中間，這兩種情形都存在着：1910年全體會議宣佈過，與取消主義的派別一塊兒工作，是不可能的！現在則與呼聲派的集團——與破壞了一切義務和完全轉到取消派方面去的集團——實行分裂。

誰自覺地說：“一塊兒工作是不可能的”，誰稍爲想過這個申明和懂得牠的原則上的基礎，那麼他一定就要把一切注意力和一切力量用來在最廣大的羣衆面前去解釋這些基礎，並使羣衆盡量迅速地完全地離開空洞的和有害的企圖：無論如何要和不能一塊兒工作的人及派別繼續發生關係。如果誰發表這個申明，而同時又補充說：“我們却不以爲”會有分裂，“但是我們也不會怕這一點”，那麼他們這一種糊塗懦弱的口氣就暴露出，他害怕他自己，害怕他所作過的步驟，害怕現有的局面！調和派底宣言正是使人不能不發生這樣的印象。調和派想拿什麼作辯護，想在某人面前表示自己是“好心人”，對某人

丟眼色……。往後我們可以看見，他們與前進報真理報丟眼色，有怎樣的意義。現在我們首先應當結束這個問題：調和派如何了解“全體會議之後這個時期末總結”，即中央委員會會議所做了的總結。

其實必須了解這個總結，要了解，爲什麼牠已經成爲不可避免的，——不然，我們之參加事變，將是自發的，無辦法的，偶然的。試看調和派底了解吧。他們如何回答這個問題：爲什麼從全體會議底工作中，從全體會議底決定中（主要地爲着統一），發生了‘中央國外局’（66）（即取消派）和反取消派間的分裂呢？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不澈底的託洛茨基主義者，簡直是抄襲了託洛茨基和楊諾夫兩人底回答，所以現在我要重復去年五月我反對這些澈底的調和派時所說過的話*。

調和派回答就是：罪在政派主義，罪在孟塞維克，前進派，真理報（我們按着宣言上排列的次序而列舉政派主義的集團）底政派主義，以及“布爾塞維主義之正式代表”底政派主義，此等代表底“政派主義的希圖，大概是勝過了上述一切的集團”。宣言底作者直爽地和肯定地僅僅稱他們自己——巴黎的調和派——是非政派主義的。大家都是壞心人，而我們却是好心人。調和派沒有舉出引起上述現象之任何思想上的原因。他們沒有指出引起這種現象的各集團之任何組織上的特性，或任何其他特性。絲毫沒有、真的絲毫沒有解釋，僅僅說，政派主義是壞的，非政派主義是好的。巴黎的調和派與託洛茨基之間的差別，僅僅在於前者認爲託洛茨基是政派主義的，自己不是政派主義的，而後者底說法，却剛剛相反。

*參看政論底時評一文，第二章，我們黨內統一的危機，本卷第32頁至66頁。——（編者）

我不能不承認，只拿一種人底壞心和另一種人底好心，去解釋政治現象，這種問題底提法，總使我回想到那些外觀上盡善盡美的相貌，一見這種相貌，使人無意中就生出一種念頭來：“這莫非是騙子吧”。

試想想下面的比較吧：我們的調和派，就是非政派主義的，好心的。我們布爾塞維克底政派主義的希圖，勝過了其他一切的集團，就是說，我們的心是最壞的。因此，好心的政派會幫助心最壞的布爾塞維克的政派，去和‘中央國外局’作鬥爭！同志們，你們不能自圓其說！你們每作一次申明，你們就越糊塗。

你們自己嘲弄自己，你們和託洛茨基各以政派主義的罪名拋來拋去，正像拍球一樣；你們不去思索一下，什麼叫做政派？請你們試下一個定義吧，我們預先告訴你們，你們更要糊塗，因為你們自己就是一個政派，一個動搖的、無原則的、不懂全體會議上和全體會議後發生什麼事情的政派。

政派就是黨內的組織，牠不是由工作地點，語言或其他各種客觀的條件團結起來的，而是由特殊的綱領，對於黨內問題的見解之特殊的綱領團結起來的。宣言底作者就是一個政派，因為宣言就是他們的綱領（很壞的綱領，但是也有帶有不正確的綱領的政派）。他們就是政派，因為他們，也和一切的組織一樣，因內部的紀律而彼此團結着：他們派到‘技術委員會’和‘組織委員會’（64）去的代表，是由他們的團體根據多數人的投票而指定的，而他們的團體又起草和印發宣言——綱領等等。客觀的事實就是如此，這些事實排斥了空喊反對政派主義的虛假行動。無論託洛茨基，無論“不澈底的託洛茨基主義者”，都想使人相信他們沒有政派，因為……團結（到政派中去）的“唯一”目的，就是消滅政派，鼓吹政派底合併等等，但是所有這類的

話，僅僅是自己稱贊自己，僅僅是怯懦地掩飾自己，其原因很簡單，就是政派存在底事實，不以政派具有任何那種的（雖然是極好的心）目的為轉移。一切政派都相信，牠的綱領和政策，就是消滅政派的最好的道路，因為誰也不認為政派底存在是一種理想。所不同的祇在於，有些政派發表鮮明的，澈底的，完整的綱領，公然擁護自己的綱領；而有些政派却是無原則的，牠們空喊自己的好心善意，自己的非政派主義，用以掩飾自己。

‘俄國社會民主黨’內政派存在底原因，在什麼地方呢？就在於，這些政派是1903年至1905年分裂(68)底繼續。這些政派是各地方黨部軟弱底結果，這些黨部無力防止那代表新思潮的作家團體之變為新“政派”，就是說變為把內部紀律提在第一位的組織。消滅政派的保障，在什麼地方呢？僅僅在於完全消滅革命時期中的分裂（而兩個主要政派之肅清取消主義和召回主義、完全是要做到這點），在於建立强有力的能够强迫少數服從多數的無產階級組織。在這樣的組織還沒有建立起來的時候，只有一切政派底協定，能够加速政派消滅的過程。從這裏，顯然看出全體會議底思想上的功勞和牠的調和主義的錯誤：其功勞就是掃除取消主義和召回主義底思想；其錯誤就是與那些個人和團體協定時不加選擇，不將他們的約言（“贊成了決議案”）和他們的行動拿來比較。以反對取消主義和反對召回主義作基礎的思想上的接近，不管一切的障礙和困難而向前進展。全體會議底調和主義的錯誤*，會使牠的調和主義的決議完全不可避免地歸於破產，就是說，會使與呼聲派所作的聯合歸於破產。布爾塞維克（以及

* 參看討論特刊第二期（列寧底論文：政論家底時評，第二章，我們黨內“統一的”危機，本卷第32頁至66頁——（編者））

後來的中央委員底會議(64)之和‘中央國外局’決裂，就是對於全體會議底調和主義錯誤之糾正：反對取消主義和召回主義的各政派之接近，現在將不經過全體會議底形式而進行，因為這些形式已與內容不相符合了。所有一般的調和主義以及全體會議底調和主義，都已經破產了，因為工作底內容，使取消派和社會民主黨人分裂了，而無論任何的形式，無論調和派任何的外交手段和把戲，都不會能夠克服這種分裂的過程。

從這個觀點看來，而且只有從這個我在1910年五月所發揮過的觀點看來，便可知道全體會議之後所發生的一切事件，都是很明顯的，不可避免的，不是由一種人底“壞心”，另一種人底“好心”中產生出來，而是由事變底客觀行程中產生出來的，這種行程使取消派底思潮獨樹一幟，並掃除居間的大小集團。

調和派爲要抹煞調和主義完全破產底這個無疑義的政治事實，便不能不走到公然曲解一切事實的地步。請聽一聽吧：

“列甯派布爾塞維克底政派主義的政策，所以發生了更大的害處，是因為在最主要的黨的機關中他們有了大多數；因此，他們的政派主義的政策就替其他各派本身的組織上的獨樹一幟作了辯護，而且武裝了牠們來反對正式的黨的機關”。

這段話無非就是畏縮地和過時地替……取消主義“辯護”，因為正是這一派底代表始終會是以布爾塞維克有“政派主義”爲藉口。這種辯護是太遲了，因為每個真正的護黨派（不是利用護黨口號做招牌的人）底責任，就是要在這個“政派主義”開始表現的時候，即起來發表意見，而不是在一年半以後才來講話！調和派——取消主義底擁護者，會不能夠早些起來講話，而且他們的確沒有早些起來講話，因為他們沒有事實。他們利用現在的“混亂時期”，來提出取消派底無

根據的空論。可是事實却明白確切地告訴我們：剛在全體會議之後，在1910年2月，波特列索夫先生即刻就舉起了取消主義底旗幟。在二月或三月，米哈爾、羅曼、玉里諸先生立刻就叛變了黨(69)。呼聲派立刻就進行了擁護呼聲的宣傳(參看全體會議後第一天普列漢諾夫日記)，而恢復了呼聲。前進派立刻開始建設自己的“學校”(70)。反之，布爾塞維克底政派主義的第一步——即創辦工人報(71)，是在1910年九月，在託洛茨基和中央底代表破裂之後(72)。

試問調和派何必要曲解路人皆知的事實呢？爲的要向取消派丟眼色，爲的要向取消派獻慫慂。一方面說，“與取消派一塊兒工作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說，布爾塞維克底政派主義替布爾塞維克“辯護”！我們請問任何那個沒有受國外的外交手段所傳染的社會民主黨人：爲這些矛盾所弄得昏頭昏腦的人們，值得享受何種政治上的信仰？他們會值得享受呼聲當衆賜給他們的接吻，再沒有別的了。

調和派把我們的論戰底這種無情態度(爲了這種無情態度，他們曾在巴黎全體大會上千百遍地空口叱責我們)，把我們在揭破取消派時所持的這種無情態度(他們反對揭破米哈爾、玉里和羅曼)，稱爲我們的“政派主義”。調和派從來都是擁護和掩飾取消派的，但是，無論在討論特刊上，無論在那一個印行的、公開的宣言上，他們都不敢公開表示自己的擁護。現在呢，他們把自己的無力，自己的懦弱，來阻礙黨(已經開始與取消派堅決地分清界線的演說)底前進。取消派說：並沒有取消主義，這是布爾塞維克把牠“擴大起來的”(參看高加索取消派底決議案和託洛斯基底演說)。調和派說：和取消派一塊兒工作是不可能的，但是……但是布爾塞維克底政派主義替取消派“辯護”。主觀判斷底這種極端矛盾底實在意思，有一個而且只有一個：畏縮地擁護取消主義，立意暗中謀害布爾塞維克和實行幫助取

消派——難道這還不清楚嗎？

但是這還遠不能包括一切。對於事實最惡劣最可惡的曲解，就是這個斷定，說“在最主要的黨的機關中”，我們會佔“大多數”。這種可惡的說謊，只有一個目的：掩飾調和主義政治上的破產。因為，事實上，無論在那一個“最主要的黨的機關”中，布爾塞維克在全體會議之後不會佔有大多數，佔有大多數的恰恰是調和派。試看誰能否認下列的事實。在全體會議之後，只有三個“最主要的黨的機關”：（1）‘中央俄國局’——多半是調和派*；（2）‘中央國外局’——從1910年正月到1910年11月，其中一個調和派代表了布爾塞維克；既然猶太工人同盟派和萊多維亞人正式地都會站在調和主義的觀點上，那末，在全體會議後十一個月當中，多數會是調和主義的；（3）中央機關報編輯部——在這裏有兩個“布爾塞維克政派主義者”和兩個呼聲派相對立；除了一個波蘭人(73)就沒有大多數。

調和派何必要公然說謊呢？正是爲要遮蓋面目，爲要掩飾調和主義政治上的破產。調和主義在全體會議上會佔了優勢，在全體會議之後，在黨內一切最主要的負責實際工作的中心機關中，牠佔有大多數，而在一年半當中，牠完全破產了：牠沒有“調和了”任何人，無論何地牠絲毫沒有建立什麼，牠無辦法地從一方面動搖到另一方面，因此牠完全值得領受呼聲派底接吻。

尤其是在俄國，調和派完全破產了，——巴黎調和派越是努力用盡感手段引證俄國，則特別指出這一點，便更加重要。調和派底基本

*當然，調和派中間是參差不齊的。而且不是‘中央俄國局’所有已往的委員，都能夠（和願意）起來替巴黎調和派（他們簡直是託洛茨基底留聲機）底一切笨拙行爲負責的。

理由就是：俄國是調和主義的，牠與國外不同。把這些話和事實作一比較，——那末就可以明瞭，這是最空洞的和最不值錢的蠱惑。事實證明，在全體會議之後，一年以上在‘中央俄國局’內，僅僅是調和派，僅僅是他們做了關於全體會議的正式報告，與合法派正式開過會，僅僅是他們指定代理人和派送他們到各機關中去，僅僅是他們支配了從‘中央國外局’毫無阻礙地匯去的一切經費，僅僅是他們才和“俄國的”那些希望利用糊塗思想（即那些希望利用調和主義）的著作家，作過談判等等。

結果如何？

結果竟等於零。沒有出過一種刊物，沒有作過一次政治行動，沒有辦過一個機關報，沒有得到一個“調和”底成績。而布爾塞維克“政派主義者”（此地不談那些只有幫助偵探機關的馬爾託夫先生才公開說出的東西），則有國外的工人報（TI），該報出版兩期之後，就站穩腳跟了。調和主義等於零，等於空談，等於虛無的願望（並且根據這些“調和作用”的願望而謀害布爾塞維主義）；“正式的”布爾塞維主義拿實際行動證明了，牠恰恰在俄國得有充分的優勢。

這是怎麼一回事——是偶然的事情嗎？是逮捕底結果嗎？但是，逮捕曾能“寬恕”在黨內不做工的取消派，而對於布爾塞維克和調和派曾是一樣加以殺戮的。

不，這不是偶然的事情，而且也不是個人順利或成功之結果。這是有虛偽的出發點的政治思潮破產之結果。調和主義底基礎是虛偽的——牠企圖在聯合一切政派（反社會民主黨的政派，非無產階級的政派也在內）的基礎上，建立無產階級政黨之統一；調和主義之空虛的“統一的”計劃底無原則性是虛偽的；反對“政派”（同時在事實上則成立新政派）的話也是虛偽的，——這些話，無力解散反黨的政

派，却却滅弱布爾塞維克政派，布爾塞維克政派在反取消主義及反召回主義的全部鬥爭中所作的鬥爭佔百分之九十。

託洛茨基給我們許多無原則的“統一的”計劃底例子。你們只要記起（我只舉一個最新的例子）：他曾經如何稱贊過巴黎的調和派和呼聲派領導的巴黎的工人生活報（74）。託洛茨基說：“既非布爾塞維克，亦非孟塞維克，而是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這種說話是何等爽快呵！可憐的空談英雄，却沒有看見一件小小的事情：只有那些明瞭某國某時非革命的假社會民主主義底害處的社會民主黨人，就是說，明瞭俄國1908年至1911年的取消主義和召回主義底害處的社會民主黨人；只有那些善於和此等非社會民主黨人的思潮作鬥爭的社會民主黨人，才算是革命者。託洛茨基和那種與俄國非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不作任何鬥爭的工人生活報接吻，他僅僅揭破了他所忠心效勞的取消派底計劃：在中央機關報內的平等，即等於停止和取消派的鬥爭；取消派實際上有和黨鬥爭的充分的自由，而讓中央機關報內（和中央委員會內）的呼聲派和護黨派間的“平等”去束縛黨底手足吧。那時候取消派的勝利就完全有了保證，所以只有取消派底走狗纔能實行或擁護這樣的計劃。

無原則的“統一的”計劃底例子，在全體會議上，在楊諾夫、伊諾健齊夫及其他調和派方面，我們已經見過了，這種計劃，答應可以不和取消派作長期的、不屈不撓的、拚命的鬥爭而得到和平與幸福。這樣的例子，我們在調和派底宣言中也見過了，這班調和派拿布爾塞維克底“政派主義”，替取消主義作辯護。還有一個例子：他們說布爾塞維克“離開其他各個站在祕密社會民主黨立場上的思潮（前進，真理*）”而“孤立”。

這句名言中的着重點，是我加上的。在這段話中，取消主義之一

切無原則性，牠的政治上軟弱無力底基礎，都顯然表現出來了。

第一，真理和前進是否代表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潮？不，牠們不是代表這種思潮，因為前進代表非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潮（召回主義和馬哈主義），而真理則代表一個小集團，這個小集團對於革命與反革命底任何一個重要的原則問題，都未給獨立的和完整的回答。可以稱為思潮的，只是這樣一些政治觀念底總和，這些觀念是在一切最重要的問題上，無論在革命（因為我們離開革命的時期極短，而且在一切關係上我們都是依賴牠的）底問題上，無論在反革命底問題上，都已經表現了的，除此之外，這些觀念又因散佈到工人階級廣大羣衆中而會證明自己已有權成爲一種思潮。布爾塞維主義和孟塞維主義，都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潮，這已經由革命經驗，由八年來的工人運動史所證明了。在這個時期中，不代表任何思潮的小集團，非常之多，也如以前一樣的多。把思潮與小集團混爲一談，這等於在黨的政策上使自己陷於陰險行爲。因爲無原則的小集團之出現，牠們之朝生暮死，牠們之拚命發表“自己的言論”，牠們之相互“聯絡”（正如列強的聯絡一樣），這就是國外的陰險行爲底基礎，要脫救這種行爲，除了嚴格的、穩固的、由工人運動長期歷史經驗所審查過的原則性之外，便沒有而且也不能有其他辦法。

第二，——就在此地我們也立即可以看到，調和派底無原則性質實際上變成了陰險手段，——巴黎派底宣言公然說謊，牠說：“在我們黨內，召回主義已經找不到自己的公開的贊助者和擁護者了”。大家都知道，這是說謊。前進第三期（1911年5月）證據確鑿地駁倒這種謊

*本文所說到的真理，是託洛茨基在維也納所辦的報紙名稱。不是布爾塞維克以後在俄國所出版的真理報。——（譯者）

言，他公開申明道，召回主義是“我們黨內完全正當的思潮”。(78頁)或許聰明絕頂的調和派要起來斷定說，這樣的申明，不是擁護召回主義嗎？

你看，當人們不能在原則上替自己與某個小集團的接近作辯護時，他們只能採用一種政策：散佈小小的謠言，實行小小的獻媚、送秋波、丟眼色，就是說，正是幹這種陰險勾當。前進稱贊調和派，——調和派稱贊前進，並假仁假義地勸黨不必謹防召回主義。結果，與召回主義底擁護者，與全體會議一切決議底破壞者，商議去分配位置和地位。暗中幫助取消派，暗中幫助召回派，——這就是調和主義底命運，這就是無力的可憐的陰險手段。

第三，“在俄國，與取消派一塊兒工作是不可能的”。調和派也曾經不能不承認這個真理。試問“前進派”和“真理派”這些小集團，是否承認這個真理呢？不僅不承認，而且公然說出相反的話，公然要求與取消派“一塊兒工作”，公然進行這種工作（請看前進派第二學校底報告就够了）。全體會議一致通過的和直爽的決議案，承認取消主義問題，是基本問題之一；既是這樣，試問主張與那些對於基本問題作直接相反的回答的小集團接近的政策，有沒有絲毫的原則性和純正性呢？顯然是沒有的，這裏我們看到思想上的鴻溝，而企圖在牠上面建築一架口頭上的橋樑，外交式的橋樑，這不管爭論雙方有怎樣的好意，——必然使這些好意成爲陰險手段。

當人們還沒有根據可靠的材料和根據對最重要問題的考察來告訴我們和證明給我們看，“前進派”和“真理派”是代表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潮的時候（但是，在全體會議後一年半當中，誰也沒有企圖來證明這點，而且也不能證明這點），我們總是要向工人解釋：調和派宣傳和“前進派”及“真理派”接近，這種無原則的陰險的詭計是完全有

害的。與這些非社會民主主義的、無原則的、幫助取消派的小集團隔絕，就是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之第一個義務。不經過“前進派”及“真理派”，反對“前進派”及“真理派”，而接近那些和“前進派”及“真理派”有關係的俄國工人，——這就是布爾塞維主義所已經進行的，正在進行的和經過一切障礙而進行到底的政策。

3 我已經說過，調和主義在其統治黨底中心機關的半年過程中，政治上已經完全破產。對於這一點，普通的回答就是：對的，但這是因為你們政派主義者妨礙了我們的緣故（請看真理第二十期上調和派（而不是布爾塞維克）黑爾曼和阿爾卡第底信）（75）。

某思潮和某小集團底政治破產就在於大家都“妨礙”他，大家都反對他，——因為他把這個“大家”打算錯了，因為他把空話、感慨、嘆息、哀鳴，作為自己的基礎。

可是，先生們，大家却一齊幫助了我們，這也就是我們勝利底擔保。波特列索夫、拉林、列維茨基諸先生，幫助了我們，因為他們如不證實我們關於取消主義的判斷，他們就不能夠開口。馬爾託夫和唐恩之流的先生們，幫助了我們，因為他們會強迫大家同意我們的判斷：呼聲派和取消派是一個東西。普列漢諾夫幫助了我們，正因為他揭破了取消派，指出了：在全體會議底議決案上留下了（由調和派留下了）“取消派底後路”，譏笑了（調和派用以反對我們的）這些決議案中的“累贅的”和“多餘的”章句。俄國的調和派幫助了我們，——他們會“邀請”米哈爾、玉里和羅曼，對列甯作諷罵的攻擊（請看呼聲），這樣一來，他們就證實了，取消派之拒絕，是與“政派主義者”底劣性無關的。親愛的調和派！不管你們的好心，大家都妨礙了你們，不管我們的政派主義的惡意，大家都幫助了我們，這是什麼緣故呢？

這因為你們的小集團底政策，僅僅建築在空談上，雖然往往是十分好心的，十分好意的，但畢竟是空談。而真正促進統一，只有由各個有力的政派接近起來才行，政派之所以有力，是因為牠們有自己的完整的思想，牠們在羣衆中具有影響，牠們有已經審查過的革命經驗。

你們反對政派主義的叫喊，到現在還是一句空話，因為你們自己就是政派，而且是一個最壞的、最不可靠的、最無原則的政派。你們高大的響亮的申明（在新聞紀要上），是一句空話，“對於各政派，是一錢不值的”。如果你們認真地說了這一點，那末你們還能花費“一文錢”去出版宣言——新小集團底綱領嗎？如果你們認真地說了這一點，那末你們看見政派主義的機關報——工人報和社會民主黨人日記，還能緘口無言嗎？——那末你們還能不公開要求封閉這些機關報嗎*？如果你們要求了這一點，認真地提出了這樣的條件，那末，別人就只能把你們置之—笑了。如果你們顯然感覺到這一點，而只限於長噓短嘆，那末，難道這不是再三證明你們的調和主義是空中樓閣嗎？

解除各政派底武裝，只在相互實行的基礎上才有可能，——不然，牠就是反動的口號，是對無產階級事業有莫大害處的煽惑的口號，因為這個口號只是使取消派便於進行不可調和的反黨鬥爭。自從全體會議不當地應用這個口號之後，自從‘呼聲派’和‘前進派’底政派破壞了各政派底融合之後，現在如果誰又提出這個口號，誰又提出這個口號而甚至不想和不敢重複提出相互實行的條件，不想和不

* 按公理應當說，巴黎的調和派，現在發表自己的宣言的調和派，曾反對工人報底成立，而且他們退出了第一次的會議，即該報編輯部邀請他們參加的會議。可惜他們沒有用公開反對工人報的方法來幫助我們（幫助過我們揭破調和主義之空洞性）

敢明顯地提出這個條件，不想和不敢規定監督切實執行這個條件的方法，那末簡直是以甜蜜的話來麻醉自己。

布爾塞維克，團結起來吧！你們就是與取消主義和召回主義作澈底的和堅決的鬥爭之唯一的柱石。

你們把事實上試驗過的和由經驗所證實的政策，與反取消派的、孟塞維主義接近的政策，進行起來吧，——這就是我們的口號。這就是這樣一個政策，這個政策並不約許那個在崩潰瓦解時代不可實現的“天下和平”底黃金世界，可是，這個政策却使代表無產階級運動中一切有力量的、健全的、生氣勃勃的東西的各個思潮，能夠切實地在工作接近起來。

在反革命時代，調和派底作用可用這樣的圖畫形容出來。布爾塞維克用莫大的氣力把我們黨的車子推到艱難險阻的山頂上去。呼聲派的取消派却拚命把車子往山下拖。一個調和派坐在車子上。他顯出和藹的態度和愉快的面貌，完全如耶穌一樣。全身好似一個現身顯世的大慈大悲的觀世音。同時他又很謙遜地低着眉頭，合着手掌，哀聲禱告道：“上帝呵！蒙你恩佑，我不像這些——指着布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妨礙任何進展的惡意搗亂的政派主義者一樣”。可是車子還是漸漸前進，調和派還是坐在車子上。當政派主義者布爾塞維克打破了取消派的‘中央國外局’，因而打掃出一塊地基來建築新屋，來達到黨內各政派聯盟（或者至少是暫時的聯合）時，調和派就走進這個屋子裏去（一面則痛罵政派主義者布爾塞維克），拿非政派主義的甘言巧語的聖水……來洗濯這座新屋！

*

*

*

如果舊火星不會去作澈底的、不調和的原則上的運動，以反對經濟主義和“司徒威主義”，而會去和一切大小集團（當時這些大小集

團在國外不比現在少些)作什麼聯盟、聯合或“融合”，那末舊火星底歷史上可以紀念的事業，就變成了什麼呢？

而現時代和舊火星時代間的差異，把無原則的和空談的調和主義底害處加強了好多倍。

第一個差異就是：在俄國，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底發展比過去要厲害得多，階級鬥爭也比過去更加明顯得多。對於波特列索夫、列維茨基、拉林這班先生們底自由主義的工人政策，現在已經有了(這在俄國是第一次)相當的客觀的基礎。立憲民主黨人底斯託雷平的自由主義和斯託雷平的工黨，已在形成起來。所以，對國外那些幫助取消派的小集團作調和主義的空談和陰謀，事實上便更加有害。

第二個差異就是：無產階級及其覺悟性和階級團結性之發展階段，比過去不知要高多少。所以調和派之故意擁護朝生暮死的國外小集團(前進派，真理派等等)，——在社會民主黨內沒有創造和不能創造任何思潮的各小集團——便更加有害。

第三個差異就是：在火星時代，在俄國曾有經濟派底秘密組織，當時會必須分散、分裂這些組織，以便把革命社會民主派統一起來反對經濟派。現在沒有平行的秘密組織，現在的問題僅在和幾個已經獨樹一幟的公開集團作鬥爭。牠們妨礙這種獨樹一幟的過程(甚至調和派也不能不承認這個過程)，其方法就是與國外的政派，不願意和不能够接這種分清界限的路線去工作的政派，玩政治上的把戲。

布爾塞維主義“挨過了”召回主義的病，革命的空談，“左的”把戲，離開社會民主主義的左的動搖。召回主義者之形成爲一個政派，是在已經不能“召回”國會中的社會民主黨人的時候。

布爾塞維主義也將挨過“調和主義的”病，向取消主義方面的動搖(因為在實際上調和派始終是取消派手中的玩具)。調和派也是

遲緩得不可救藥了，他們之形成爲一個政派，是在全體會議後調和主義底半年統治當中，調和派已經無法可想而不能調和任何人的時候。

附註：這篇論文是在一個多月以前寫好的。牠批評調和派底“理論”。至於調和派底“實際”，在調和派和波蘭人底新聞紀要第二期上(76)充滿着的那種無辦法的、荒謬的、無聊的、可恥的意氣鬥爭所表現出來的“實際”，則沒有絲毫談論的價值。

1911年10月

8 黨內危機告一段落 (77)

兩年以前，在社會民主黨的刊物上，可以看到論黨底“統一的危機”的言論*。反革命時代底崩潰與瓦解，引起了新的分合和分裂，國外鬥爭底新的劇烈，於是不少意志薄弱的人或神經軟弱的人，一看到社會民主工黨內部的困苦情形，就垂頭喪氣了。現在因‘俄國組織委員會’底成立，顯然進到（如果不是危機底終結，那麼，至少也是）新的和堅決的轉變，使黨底發展走向較好的方面。因此，企圖把黨內進化底過去階級和最近將來前途作一個總的觀察，是很適合時宜的。

革命所遺留下來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包括有三個單獨的自主的民族底社會民主派組織和兩個俄國本部的政派。在無產階級發展趨勢中，在目前資產階級革命時代內的無產階級生活環境中，這些政派具有深刻的根源，這一點已由1905年、1906年和1907年最豐富的偉大事變底經驗所證明了。反革命又把我們從山上（我們已經攀登得很高）拋到豁谷中去了。在斯託雷平建築絞架和道標派**高唱哀

*參看列寧底論文：政論家底時評第二章，我們黨內“統一的危機”，本卷第32頁至66頁。——（編者）

**道標是一個論文集底標題，其中作者為司徒威，布爾加可夫，白加也夫等，反映着反動時期中自由派資產階級知識界底反動的神祕主義的情緒。——（校者）

歌的環境中，無產階級會應當重新整頓隊伍和收集力量。

新的環境引起了社會民主黨內各種趨勢之新的分合。最不堅定的社會民主派份子，無產階級底各種各樣的資產階級的半途侶伴，在黑暗時代的嚴重壓迫之下，開始離開兩個新的政派。有兩個思潮最鮮明地表示出牠們離開社會民主主義，這就是：取消主義和召回主義。牠們又必然引起了兩政派內仍舊忠於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核心接近起來的趨勢。實際情形就是如此，1910年正月的全體會議就是從這個情形中產生出來的，——而社會民主黨往前發展中之長處和短處，前進和後退，即曾以此為起點。

全體會議所完成的事業之不可磨滅的思想上的功勞，以及牠所犯了的莫大的“調和主義的”錯誤，至今有許多人還沒有好好的了解。而不先了解這一點，就絲毫不能了解吾黨底現狀。因此，我們應當再三再四地來查明現時危機底起點。

有一個“調和主義者”在全體會議開幕底前夜，寫了一篇文章，在全體會議後即刻就發表出來了，我們從這篇文章內引出下面一段話來，這段話比更加直接的和更加繁多的“文件”中的長篇大段的議論或摘錄，更能幫助我們去查明這個起點。在全體會議上佔優勢的“調和主義”底首領之一，猶太工人同盟派楊諾夫同志，寫了一篇標題為黨的統一是否可能的文章，登在討論特刊第一期上（1910年4月1號（3月19日）；在第六頁上，編輯部加上註釋：“本文是在全體會議以前寫好的”），其中有下面一段話：

“無論召回主義與取消主義本身對於黨有怎樣的害處，但是牠們對於各政派，毫無疑義的有好的影響。病理學知道兩種瘡：一為好瘡，一為壞瘡。好瘡就是有益於身體的疾病。在腫脹過程中，牠把全身中一切有害之物，都吸引到腫脹的地方，這樣一來，

就能促進身體之健康。我認爲取消主義之對於孟塞維主義，召回主義和哀的美敦主義之對於布爾塞維主義，恰恰起了這樣的作用”。

這就是全體會議*時“調和派”對於事情的估計，這個估計，確切地描寫出這一個在全體會議上獲得勝利的調和主義底心理和觀念。這一段話底基本意思是對的，是千真萬確的，而正是因爲牠是對的，所以布爾塞維克（他們還在全體會議以前，就已經完全發展了與取消主義和召回主義的鬥爭）在全體會議上未能和調和派背道而馳。所以未能背道而馳，是因爲在基本思想上彼此曾是一致的；意見分歧當時只是關於實現這個思想的形式：形式是會服從內容的，——布爾塞維克曾經這樣設想，而這樣設想却是正確的，雖然因調和派底錯誤“形式之適應內容”，使黨差不多“虛度了”兩年的光陰。

這種錯誤在那裏呢？就在於，調和派不把那些而且只有那些清洗（僅僅在牠們的清洗程度內）“腫脹”的思潮，作爲正當的東西；反之，他們却以空口答應清洗爲根據而把什麼都當作正當的東西。無論前進派，無論呼聲派，無論託洛茨基都“贊成了”反對召回主義和取消主義的決議案，這就是說，他們答應了“清洗”，就算完事了！調和派“相信了”口頭上的答應，會把黨和各個非黨的、“腫瘡式的”（據他們自己所說的話）小團體糾纏攏來。從實際政策上看來，這是幼稚行動，從更深刻的觀點看來，這是無一貫思想的舉動，無原則的表現，陰險手段。實際上，誰要是認真地相信取消主義和召回主義及哀的美敦

* 這是指 1910 年的中央全體會議，關於這次會議，列寧在政論家底時評第二章，我們黨內“統一的危機”一章中已經說過了，參看本卷第 32 頁至 66 頁。——（編者）

主義是腫瘡，誰就不能不了解，腫瘡一成熟，就要把全身一切有害之物吸引出來，就要把牠們從身體中排除出去；誰就不能企圖把“腫瘡的”毒素逼入身內來貽害身體。

全體會議後的第一年，事實上揭破了調和派之無一貫思想的舉動。在這一年當中，布爾塞維克和普列漢諾夫派事實上進行了黨的工作（就是清洗，除腫瘡而健身體的工作）。無論社會民主黨人，無論工人報（自從託洛茨基驅逐中央委員會代表之後）（72），都證明這個事實。1910年有些大家知道的公開出版物，也證明這個事實。這裏不是空話，而正是事實：在黨底領導機關中一塊兒工作。

在這一年（1910年）當中，無論“前進派”，無論呼聲派，無論託洛茨基，事實上都離開了黨，而恰恰走到取消主義和召回主義、哀的美敦主義方面去了。“好瘡”仍然還是瘡，而且牠的表現是不好的，因為牠沒有把“毒素”從黨底機體中排除出去，却使之繼續貽害這個機體，使這機體繼續處在病態中，使牠不能進行黨的工作。布爾塞維克和普列漢諾夫派，違背“調和主義的”決議案和全體會議所成立的各機關進行了這種黨的工作（在公開的著作中），反對呼聲派和前進派，而不是和他們一塊（因為與取消派和召回派、哀的美敦派一塊兒工作會是不可能的）。

但是國內的工作怎樣呢？一年來中央委員會沒有開過一次會議！爲什麼呢？因爲國內的中央委員（即調和派，他們當然值得被“取消派底呼聲”接吻）總是“邀請了”取消派；可是，過了一年，過了一年三個月，還是沒有一次能夠把他們“邀來”！可惜在全體會議上，我們的忠厚的調和派沒有規定“強迫傳到”中央的制度。結果恰恰發生了一種荒謬的對黨可恥的情形，而這種情形，正是布爾塞維克在全體會議上反對調和派底輕信和幼稚態度時所曾預見的：國內工作停頓着，黨

被束縛着，而我們的曙光和前進，則鼓起一種可惡的自由主義的和無政府主義的反黨的風潮！一方面，米哈爾、羅曼和玉里；他方面，召回派和造神派，他們都竭力破壞社會民主黨的工作，而調和主義的中央委員們則“邀請”和“等候”取消派！

布爾塞維克在1910年12月18號（5日）的“聲明書”（28）中，公開地和正式地聲明過，他們廢除與其餘一切政派所訂的條約。呼聲、前進、託洛茨基之廢除“條約”，破壞全體會議上所締結的條約，已完全成爲公認的事實了。

約在半年間（1911年6月以前），曾經再三企圖召集國外的全體會議（按條約底規定，至少在三個月以內必須召集一次全體會議）。取消派（呼聲派——猶太工人同盟派——石瓦爾切）把國外的全體會議也破壞了。那時候，三個集團（布爾塞維克、波蘭人、“調和派”）底聯盟最後企圖設法補救：召集代表會議，成立“俄國組織委員會”。布爾塞維克仍舊佔少數：從1910年正月至1911年6月，取消派佔優勢（在“中央國外局”有呼聲派——猶太工人同盟派——石瓦爾切；在俄國有“邀請”取消派的“調和派”）；從1911年6月至1911年11月14日（1號）（保管人仲裁處所規定的期限），調和派（波蘭人轉到他們方面去了）佔優勢。

當時的問題是這樣：經費和派送代表之權，都操在提什科和馬爾克*（巴黎調和派底首領）手裏；布爾塞維克所得到的保障，只是：調和派也同意派布爾塞維克去作工。全體會議所產生的許多意見分歧，歸結到最後的、當時不能迴避的一點：不“等待”任何人，不“邀請”任何人（誰願意和能够本社會民主派的精神去作工，他就不要邀請！）

* 馬爾克，即桑美爾·留皮莫夫。——（編者）

而到處工作；抑是繼續和託洛茨基、前進派等等再三談判。布爾塞維克選擇了第一條道路，關於這一點，他們已經在巴黎舉行的中央委員會會議上，就公開明白地聲明過了。提什科及其同伴則選擇了第二條道路（並會強制‘技術委員會’和‘國外組織委員會’走這條路），這條路客觀上會歸結到空洞的和窮極無聊的陰險手段，這一點在社會民主黨人第二十四期上的專論*中已經詳細地指出了。

結果如何，現在大家可以看見。到11月14號（1日），‘俄國組織委員會’已經成立起來了。事實上，是布爾塞維克和俄國的護黨孟塞維克把他組織起來的。“兩個有力（因牠們有堅定的思想，作清洗“膿瘡”的工作，所以有力）政派底聯合”，已成了事實，而在全體會議上和在全體會議之後，頭腦軟弱的人們非常憤激地反對了這個聯合（請看呼聲、前進、猶太工人同盟回聲、真理等等）。1910年和1911年，俄國模範的和先進的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就是巴庫的組織和基輔的組織，在這些組織中，這種聯合差不多變成了完全的融合，變成了護黨的社會民主黨員底統一的不可分離的機體，這是布爾塞維克所最高興的事情。

兩年來的經驗證明出：關於解散“一切”政派的哀求，原來會是頭腦空虛的人們——波特列索夫和召回派這般先生所愚弄了的人們——之可憐的空談。“兩個有力政派底聯合”，做了自己的事情和完全走近了（在上述的先進組織中）完全融合為統一政黨的地步。國外護黨的孟塞維克底動搖，已經沒有力量來改變這個已有的事實。

社會民主黨內許多半信半疑的人或不求甚解的人，不願意了解

* 此地列寧是指他自己的文章：論調和派或好心人底新政派；參看本卷90頁至111頁。——（編者）

任務之難以設想的困難，在他們看來，全體會議後的兩年，就是無聊的無前途的無意思的意氣鬥爭、崩潰瓦解底時期；其實這兩年，就是社會民主黨從取消主義的和召回主義的動搖底泥坑中跳上軌道的時期。1910年，在黨底一切領導機關中（無論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無論公開的或不公開的），布爾塞維克和護黨的孟塞維克一塊兒工作了：這是“兩個有力政派底聯合”之第一步，是在反取消主義的和反召回主義的統一旗幟下，作思想準備和收集力量的步驟。1911年做了第二步：成立了‘俄國組織委員會’。在該委員會底第一次會議上，護黨的孟塞維克做了主席，這是一件顯著的事實：第二步，建立國內實際行動的中心機關，現在已經做到了。車頭駕上了並且放入軌道了。

不管警察底非常的壓迫，不管呼聲派、前進派、調和派、波蘭人及 tutti quanti * 之“暗中謀害”，而在四年的瓦解和離散之後第一次成立了俄國社會民主黨的中心機關。在俄國第一次由這個中心機關發出告全黨的宣言，恢復各地秘密組織的工作，第一次有系統地和完備地普及於（僅歷三個月之久，從1911年7月至10月）兩個首都 **、窩瓦河沿岸、高加索、基輔、葉加吉林諾斯拉夫、羅斯託夫、尼古拉也夫，——因為‘俄國組織委員會’之召集會議，是在視察了這些地方之後；因為該委員會底第一次會議，是與‘彼得堡委員會’底恢復及其舉行許多工人的羣衆大會，與莫斯科各區之通過護黨的決議案等等，同時舉行的。

當然，如果醉心於輕信的樂觀主義，那就是不可寬恕的幼稚；今後的困難還非常之大；自社會民主黨中央在俄國第一次發表宣言之

* 這是意大利文，意即：所有一切。——（編者）

** 所謂兩個首都，是指彼得堡和莫斯科而言。——（校者）

後，警察的壓迫加緊了十倍；可以預先看到長久的困難的時月，新的破獲，工作中新的停頓。但是，主要的已經做到了。旗幟已經樹立起來了：俄國各地的工人小組，都已經趨向這面旗幟，現在，無論怎樣的反革命的進攻也不能棒倒這面旗幟了。

* * *

對於國內工作這樣長足的進步，國外“調和派”和提什科以及列德爾，會用什麼去回答呢？用最後一次的窮極無聊的陰險手段：全體會議前夜楊諾夫所預言的“膿腫過程”，說起來也不愉快。但是，誰個不了解這個醜惡的過程會健全社會民主黨，他就用不着去做革命工作！‘技術委員會’和‘國外組織委員會’不肯服從‘俄國組織委員會’；布爾塞維克當然持鄙視態度而脫離國外的陰險家；那時候動搖就開始了：十一月初，‘國外組織委員會’餘孽（兩個波蘭人和一個調和派），收到一個關於召集‘俄國組織委員會’的報告。這個報告非常詳細地述敘一切工作，所以布爾塞維克底反對者，呼聲所稱贊的調和派，會不能不承認‘俄國組織委員會’；1911年11月26號（13日）‘國外組織委員會’便通過一個決議案：“以‘俄國組織委員會’底決議為指南”。‘國外組織委員會’將牠所有的錢交出五分之四給‘俄國組織委員會’底會計處，這就是說，波蘭人自己，調和派自己也不能懷疑，一切事務辦的很認真。

但是，再過幾天之後，無論‘技術委員會’，無論‘國外組織委員會’，又不肯服從‘俄國組織委員會’了！！這個把戲底密訣，究竟在那裏呢？

在中央機關報編輯部手裏有一個文件，將送交代表會議，從這個文件中可以看出，提什科鼓動別人不要參加‘俄國組織委員會’，不要參加代表會議。

可否想出比這更卑鄙醜惡的陰險手段來呢？在‘技術委員會’和‘國外組織委員會’內他們會決定幫助召集代表會議和成立‘俄國組織委員會’；他們會自誇道，他們要邀請“大家”，但是一個人也沒有邀請（雖然他們佔大多數，有權邀請和提出任何的條件）；他們除了布爾塞維克和護黨的孟塞維克之外沒有找到任何的工作人員；他們在自己所選擇的舞台上完全遭了失敗；牠們居然“暗中謀害”俄國組織委員會，而這個‘俄國組織委員會’，又是會被他們當作全權的中心機關而自願把召集代表會議的五分之四的用費交給牠的！！

不錯，腫瘡是一種討厭的東西，尤其是在“腫脹過程中”。爲什麼國外各小集團聯盟底理論家，除了陰險手段之外，已無所能爲，這已由中央機關報第二十四期*所指明了。現在俄國的工人社會民主黨員，可以很容易地選擇：他們要堅持自己的‘俄國組織委員會’和自己的代表會議，抑是讓提什科和列德爾這一班人用陰險手段去阻礙代表會議。陰險家已經把自己害了，這是事實；提什科和列德爾已經戴着鍊銬而走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歷史中去了；可是他們並不能阻礙代表會議，他們並不能破壞‘俄國組織委員會’。

取消派又怎樣呢？在整整一年半當中，從1910年正月到1911年6月，他們在‘中央國外局’佔了大多數，而且有了可靠的“朋友”，即‘中央俄國局’底調和派，那時候他們對於俄國的工作，完全沒有做過什麼，絲毫沒有做過什麼。當取消派佔大多數的時候，工作會停頓着。而當布爾塞維克破壞了取消派的‘中央國外局’而着手進行召集代表會議的時候，取消派就活動起來了。這個“活動”表現在那裏，這是非常

* 參看列寧著的論調和派或好心人底新政派，本卷第90頁至111頁。——（編者）

值得注意的。猶太工人同盟派，始終都是取消派最可靠的助手，他們在不久以前忽然想到了要利用現在的“混亂的時期”（例如在萊多維亞中間，兩個思潮——取消主義的和護黨的——鬥爭底結果，還沒有決定），不知從那裏拉攏了一個高加索人，於是大家都赴Z城去替託洛茨基和唐恩在 Cafe Bubenberg *（伯恩城，1911年8月）起草的決議案搶些署名（79）。但是，他們沒有找到萊多維亞的領導機關，沒有搶到署名，而任何帶有‘三個最有力的黨部底組織委員會’這塊響亮招牌的文件，都沒有製造出來。事實就是如此**。

讓俄國工人去認識一下，猶太工人同盟派如何在俄國企圖進行破壞‘俄國組織委員會’的工作！你們想一想吧：當準備代表會議的工作人員出發到烏拉爾、窩瓦河沿岸、彼得堡、莫斯科、基輔、葉加吉林、諾斯拉夫、羅斯託夫、梯夫里斯、巴庫的時候，猶太工人同盟派却“拉攏”“一個高加索人”（這個人大概就是那些委員們之一，這些委員把持着‘高加索州委員會’底“圖章”，並且曾在1908年12月派遣唐恩和阿雪洛德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代表會議底代表！）和出發到萊多維亞人那裏去“運動署名”。但是這些替取消派劬勞的和在俄國絕對不做工作的陰險黨徒，險些兒要真正形成為“三個黨部”

* ——布平堡咖啡館。——（編者）

**除了樂觀的猶太工人同盟派之外，前進派也曾奔來奔去破壞決議案。從這個小集團中（他那裏是召回主義的小集團，）有一個著名的召回主義者也奔了起來。他“奔到”基輔、莫斯科、下新城，他與調和派“調和了”，雖然走遍各地，畢竟毫無結果。有人說，‘前進派’歸咎於盧拿查爾斯基，說他所造的孽上帝，毫不中用，所以該派一致決定要想出較好的上策來。

(兩個“最有力的”把持圖章的黨部也在內)底“組織委員會”! 或者也許猶太工人同盟派和一個高加索人,這些先生們要告訴黨,他們巡視了國內的那些組織,而且是在什麼時候巡視的,何地恢復了工作,何地做了報告?親愛的先生們,嘗試一下罷,說一說罷!

但是國外的外交能手却儼然以專家態度判斷道:“不能孤立起來”,“應當與‘猶太工人同盟’和‘高加索省委員會’實行談判”。

呵,滑稽大家!——

讓現在動搖着而憐惜布爾塞維克底“孤立”的人們去學習,去思索這兩年來的黨史底意義吧。呵!我們自己覺得有了這樣的孤立,比任何時候都好些,因為我們已經把國外陰險家的空架子打倒,而且又幫助了彼得堡、莫斯科、烏拉爾、窩瓦河沿岸、高加索和南俄等地的俄國工人社會民主黨人團結起來!

誰要是因孤立而痛哭,他就絲毫沒有懂得全體會議思想上的偉大事業,絲毫沒有懂得全體會議調和主義的錯誤。在全體會議後一年半當中,國外有彷彿似的統一,而俄國內部的社會民主黨工作則完全停頓。在1911年底半年或四個月當中,布爾塞維克之表面上的極端孤立,第一次地把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工作推往前去了,第一次地把俄國社會民主黨的中心恢復起來了。

誰要是還沒有看清楚取消主義和召回主義這些“膿瘡”之思想上的腐敗和無生氣,那末,現在無力的意氣鬥爭和窮極無聊的陰險手段底歷史,可以徹底教訓他一下:‘呼聲派’和‘前進派’底小集團已經陷於這種窮極無聊的陰險手段底境地,並將一切企圖擁護過牠們的人們,拉來同歸於盡。

讓黨的社會民主黨員同志們,從事工作吧!把你們與非社會民主派的思潮和不顧黨底決定而培養這些思潮的小集團之間的最後一點

聯繫，完全打斷罷。在‘俄國組織委員會’底周圍團結起來，幫助牠召集代表會議和鞏固各地方的工作。‘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已經挨過了重病：危機正在結束。

統一的、祕密的、革命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萬歲！

1911年12月

9 幾個爭論問題 (80)

(公開黨和馬克思主義者)

一、1908年的決議

在許多工人看來，真理*和光線**間的鬥爭，是不需要的和爲人所不甚明瞭的。自然，在某幾期報紙上關於個別的、有時很局部的問題的辯論文章，不能給一個完滿的關於鬥爭底對象和內容的概念。因此工人之不滿意是合乎情理的。

然而引起鬥爭的取消主義問題，是目前工人運動問題中最重要和最迫切的問題之一。如果不切實地去認識這個問題，對於這個問題自己沒有一定的意見，那麼就不能成爲覺悟的工人。凡願意獨立地去解決自己黨底命運的工人，就不會拒絕論戰（甚至在這個論戰初看起來是不甚明瞭的時候），而會認真地完全找出和發現真理。

如何去找出真理呢？如何去辯別彼此互相矛盾的意見和論斷呢？

* 此處所指的真理，是布爾塞維克從1912年9月起在彼得堡創辦的公開日報。自從該報曾經更換報名數次。1914年(大戰前夜)，就完全被封閉了。他是現在‘聯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底前身。——(譯者)

** 光線是孟塞維克取消派底公開報。從1912年至1914年在彼得堡出版。——(譯者)

一切明理的人都知道，如果爲着某個對象而發生熱烈的鬥爭，那麼要找出真理，就必須不限於爭論者雙方底申明，而是自己要去審查事實和證據，自己要去研究，有無證明人底供辭，這些供辭是否確實。

不消說，這不是時常容易做到的事。把湊巧碰到的、偶然聽到的、人們“公開”叫喊的東西信以爲真，這自然要“容易”得多。但是，以此爲滿足的人，就叫作“輕率的”，輕佻的人，誰也不會認真地去顧及他。誰要是不花費相當的獨立的功夫，他就在任何嚴重問題中都找不出真理來；誰要是怕費力，他就使自己失掉找到真理的可能性。

因此，我們所要告訴的工人，只是那些不怕費力的工人，有決心去獨立研究和努力找到事實、證據、證人口供的工人。

首先發生的問題就是：什麼叫做取消主義？這個名詞從那裏得來的，牠的意思是什麼？

光綏說道，要把黨取消的取消主義，就是說，要把黨解散和破壞的思想，要把黨拋棄的思想，這不過是惡意的捏造。這是布爾塞維克政派主義者¹捏造出來反對孟塞維克的！

真理說道，全黨斥責取消主義，與牠鬥爭，已經四年有餘了。

誰是對的呢？如何去找到真理呢？

很明顯的，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在最近四年間，從1908年到1912年（到取消派完全脫離黨爲止**）的黨史中去找到事實和證據。

正是這四年（在這四年中，現在的取消派還在黨內），就是最重要的一個時期，足以審查取消主義這個概念，是從何而來和如何得來的。

* 參看論俄國社會民主黨底現狀一文；見本卷164頁至179頁及其註釋——（譯者）

從這裏得出第一個的和基本的結論：誰要是談到取消主義而避開1908年至1911年時期中的事實和黨底憑據，他就是瞞着真理而不告訴工人。

有些什麼事實，有些什麼黨底憑據呢？

首先就是1908年12月黨底決議*。如果工人不願別人把他當作小孩子看待，當作被故事和神話所麻醉的小孩子看待，他就應當去問自己的忠告人、指導者或代表：在1908年12月，關於取消主義問題，曾有過黨底決議，這個決議底內容究竟怎樣？

這個決議斥責了取消主義和說明了取消主義底實質。

取消主義就是“黨內一部份知識份子底這樣一種企圖：取消”（就是說，解散、破壞、廢除、停止）“黨底現有組織；無論如何要在合法性”（就是說“公開”存在）“範圍內用渙散的聯合來代替黨底現有組織，爲着合法性，甚至不惜公然放棄黨底綱領、策略和傳統”（就是說過去的經驗）。

四年多以前，黨關於取消主義的決議就是如此。

從這個決議中顯然可以看出，取消主義底實質何在，牠爲何被人斥責。取消主義底實質就在於拋棄“秘密組織”，取消牠，無論如何要在合法範圍內用渙散的聯合來代替牠。所以，黨所斥責的，並不是合法的工作，並不是那種認爲有提出這種工作的必要的意見。黨所斥責的（而且絕對斥責的），就是用什麼渙散的、“公開的”、不能稱爲黨的東西，去代替舊有的黨。

如果黨不堅持自己的生存，不與那些要取消牠、消滅牠否認牠和

* 此地是指當時所舉行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底全俄代表會議；參看走上軌道一文，見本卷1頁至9頁及其註釋(1)。——(編者)

離開牠的人作無條件的鬥爭，那牠就不能生存。這是不言而喻的。

誰要是爲着什麼新黨而放棄現有的黨，那就應當告訴他：試建設新黨吧，可是你決不能做舊有的、目前的、現存的黨底黨員。黨在1908年12月的決議底意思，就是如此。而關於黨底生存問題，當時不能有別的決議，這是很明顯的。

當然，取消主義與叛變行爲，與放棄綱領和策略的行動，與機會主義，都有思想上的聯繫。上述決議底結尾也正指出這一點。但是取消主義不僅僅是機會主義。機會主義者把黨引上不正確的、資產階級的道路上去，引上自由主義的工人政策的道路上去，但是他們不拋棄黨的本身，不取消黨。取消主義就是這樣一種機會主義，這種機會主義竟走到拋棄黨的境地。如果黨把那些不承認黨底存在的人們都包括在黨內，那黨就不能存在，這是不言而喻的。在現在的條件之下拋棄祕密組織，就是拋棄舊有的黨，這也是不言而喻的。

試問取消主義對於黨在1908年所通過的這個決議，採取何種態度呢？

這裏就是問題底關鍵，這裏就是取消派底誠懇性和政治坦白性之考驗。

他們中間無論何人，如果沒有發瘋，就不會否認這個事實：黨有過這樣的決議的而且沒有取消牠。

在這裏，取消派便大顯脫身之術了：或者避開問題，在工人前面抹煞黨在1908年的決議；或者是叫喊說（往往帶着許多惡言），這個決議是布爾塞維克所提出通過的。

但是，惡言僅僅暴露出取消派底弱點。曾經有過由孟塞維克提出所通過的黨的決議，例如1906年在斯託阿立姆所通過的關於市有化的決議就是(21)。這是大家都知道的。許多布爾塞維克都不同意這個

決議。但是，在他們中間，誰也沒有否認這是黨底決議。同樣的，1908年關於取消主義的決議，也是黨底決議。在這個問題上作一切遁辭，無非是希望工人們走入迷途。

誰要是想不僅僅在口頭上承認黨，他在此地就不容許任何的遁辭，而是要找出黨關於取消主義問題的決議底真理。從1909年起，普列漢諾夫領導下的一切護黨的孟塞維克，都附和了這個決議；普列漢諾夫在自己出版的日記和其他許多的馬克思主義刊物上，曾經多次和十分肯定地解釋過：取消黨的人，不能在黨內。

普列漢諾夫過去是而且現在還是孟塞維克。所以，取消派通常借口說1908年黨底決議，帶有“布爾塞維克的”性質，這是非常不對的。

在光線或在我們的曙光上，取消派愈用惡言去反對普列漢諾夫，那麼這便更加明顯地證明：取消派無理取鬧，他們企圖用喧譁、叫喊、鬧架來蒙蔽真理。這些手段，有時立刻可以弄昏幼稚的人底耳目，但是工人們自己畢竟能夠辯別是非，而且很快就會鄙棄這些惡言。

工人底統一是否必要呢？是必要的。

沒有工人組織底統一，能否有工人底統一呢？顯然是不可能的。

阻礙工黨統一的是什麼呢？是關於取消主義的爭論。

由此可見，工人們應當辯別這些爭論，以便由自己來解決自己黨底命運和擁護自己的黨。

要做到這一點，第一步就是認識黨底第一次關於取消主義的決議。工人們應當切實地知道和細心地思索這個決議，而拋棄一切躲避問題或移開問題的企圖。無論那一個工人，把這個決議加以思索之後，就會開始明瞭：取消主義問題底實質何在；為什麼這個問題如此重要，如此“麻煩”；為什麼在四年有餘的反動時代內，這個問題總是擺在黨的前面。

在下一篇文章內，我們將考察黨關於取消主義的另一個重要決議，即約在三年半以前所通過的決議，然後就要考察到決定問題底現狀的事實和證據。

二、1910年的決議

在第一篇文章內（真理第289期）*，我們引出第一個的和基本的證據，凡願意在目前爭論中去找到真理的工人必須認識這個證據，這就是：1908年12月間黨關於取消主義問題的決議。

現在我們要引出和考察黨關於這個問題的另一個同樣重要的決議，即三年半以前1910年正月所通過的決議**，這個決議所以有特殊的意義，因為牠是一致通過的：一切布爾塞維克（沒有一個例外），其次是一切的所謂前進派，最後（這是最重要的），一切孟塞維克和現在的取消派（沒有一個例外），以及一切“民族的”（就是說，猶太的、波蘭的、萊多維亞的）馬克思主義者，共同通過了這個決議。

我們把該決議最重要的一段完全引出來：

“在資產階級反革命時代，社會民主運動之歷史環境必然產生那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影響之表現：一方面，否認祕密的社會民主黨，降低牠的作用和意義，企圖縮小澈底的社會民主黨之綱領的和策略的任務與口號等等；他方面，否認社會民主黨底國會工作和否認對於公開可能性的利用，不懂前者和後者底重要

* 參看本卷第124頁129頁。——（編者）

** 此地是指1910年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底決議，關於這次會議，列寧作了政論家底時評第二章2，我們黨內“統一的危機”，參看本卷32頁至66頁及其註釋(21)。——（編者）

性，不善於把徹底的社會民主黨的策路去適應當前特殊的歷史條件等等。

在此等條件之下，在無產階級底一切階級鬥爭方面來擴大和加深社會民主黨的工作以克服這兩種傾向，說明這些傾向底危險性，這便是社會民主黨策路之不可分離的成份”。

從這個決議中顯然看出，在三年半以前，一切馬克思主義者，以各派的（無例外的）代表底名義，曾一致地承認有離開馬克思主義策路之兩種傾向。兩種傾向都被承認是危險的。兩種傾向都不能拿偶然性去解釋，不能拿個人底惡意去解釋，而要拿現代工人運動底“歷史環境”去解釋。

這還不够。在黨底一致通過的決議中，曾指出這些傾向底階級起源和意義。因為馬克思主義者不限於空洞地無內容地指出流離失所的情緒：大家都看見，在許多贊成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人們底腦海中，統治着流離失所、猶疑、消沉、迷惑的情緒。承認這一點還不够。必須了解：流離失所的情緒底階級起源是什麼，從非無產階級隊伍中，那些階級的利益培養無產階級朋友們之“混亂”。

黨在三年半以前的決議對於這個重要問題給了回答：“資產階級的反革命”產生出離開馬克思主義的傾向，“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影響”產生出這些傾向。

使無產階級去受資產階級影響的這些傾向，究竟是什麼呢？這些傾向之一，是與“前進主義”聯繫着的，他否認社會民主黨人底國會工作，否認對於公開可能性的利用，這個傾向幾乎完全消滅了。在俄國，現在沒有一個社會民主黨人再去鼓吹這些錯誤的非馬克思主義的見解了。“前進派”（亞力新斯基等等也在內）已經在真理報內與護黨的孟塞維克並列地工作了。

黨底決議所指出的另一種傾向，恰恰就是取消主義。這一點從關於“否認”秘密組織和降低牠的作用及意義的指示中，顯然可以看出。最後，我們有最確切的文件，即三年以前發表過的而且誰也沒有談到牠的一個文件，這個文件是由一切的“民族的”馬克思主義者以及託洛茨基（取消派不能想出比他們更好的證人了）發出來的；這個文件公然說：“按實質講來，在決議案中所指出的、必須與之鬥爭的思潮，最好稱牠是取消主義”（41）。

總之，凡願意了解現時爭論的人所應當認識的基本的最重要的事實就是：三年半以前，黨一致地承認了取消主義是離開馬克思主義與“危險的”傾向，必須和這種傾向作鬥爭，這種傾向表示“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影響”。

具有反民主情緒的、具有一般的反革命情緒的資產階級底利益，要求取消無產階級底舊有政黨，要求解散牠。資產階級極力散佈和擁護一切趨向於取消工人階級政黨的觀念。資產階級竭盡其力，以便播散那些拋棄舊有任務的種子，“切短”、截短、割去這些任務並抽出這些任務底精髓，以便和普里什克維赤輩實行調和或妥協而不去堅決剷除他們的政權底基礎。

取消主義也就是在無產階級隊伍中實現這些資產階級的拋棄的變節的觀念。

黨在三年半以前一致通過的決議所指出的取消主義底階級意義，就是如此。全黨所看見的取消主義之最深刻的害處和危險性，牠對工人運動、對工人階級獨立的（在實際上，而不是在口頭上）政黨的團結之致命作用，也就在這裏。

取消主義不僅是取消（就是說，解散、破壞）工人階級底舊有政黨，牠又是破壞無產階級底階級的獨立性，以資產階級的觀念來壓

化無產階級的意識。

在下一篇文章內，我們將用一目瞭然的例子來說明這種對取消主義的估計，把取消派的光綫上最重要的議論，完全引出來。現在我們把上述各點作一簡括的總結。一般‘光綫派’，尤其是唐恩先生和波特列索夫先生，企圖把問題看作這樣，似乎一切的“取消主義”，都是捏造出來的；此種企圖是一種非常虛假的，指望光綫底讀者全不知道實情的遁辭。其實除掉黨在1908年的決議之外，還有黨在1910年一致通過的決議，這個決議，對於取消主義給了完滿的估計，指出牠對於工人階級是一種危險的和致命的離開無產階級道路的資產階級傾向。只有工人階級底敵人，纔能隱瞞或避開這一種黨的估計。

三、取消派對1908年和 1910年決議的態度

在上文裏（真理報第95（299）期）*，我們已經把黨關於取消主義（這是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影響底表現）問題所一致通過的決議中的一段話逐字逐句地援引過了。

我們已經指出了，這個決議是在1910年正月通過的。現在有些取消派居然想使人相信，似乎過去和現在都沒有任何的取消主義；我們來看看這些取消派底行動吧。

1910年2月，在當時剛剛出版的我們的曙光雜誌第二期上，波特列索夫先生公然寫道：“像完整的和有組織的機關等級”（就是說，層級或系統）“那樣的政黨是沒有的”，又說，不能取消“在事實上已經沒有的有組織的整體”（見我們的曙光第二期、61頁、1910年）。

* 參看本卷129頁至132頁。——（編者）

這是在黨一致通過決議以後一個月，而且還不到一個月的時候的！

而在1910年3月，取消派底另一種雜誌（同是由波特列索夫、唐馬丁諾夫、也壽夫、馬爾託夫、列維茨基及其同伴主持的），即復興雜誌，又着重指出並通俗說明了波特列索夫先生底話：

“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取消，而且——我們（就是復興底編輯部）還要補充說——幻想恢復這個機關等級之舊有的、秘密的形式，簡直是有害的、反動的烏托邦，這是表示，曾經最富於實利主義精神的政黨底代表失掉政治的感覺”（復興第5期51頁，1910年）。

黨沒有了，要恢復牠，就是有害的烏托邦，——這就是明白的肯定的言論。這就是明白的和公然的拋棄黨。這些拋棄了黨（並會邀請主人來拋棄黨）的人，也就是拋棄秘密組織和“夢想”公開政黨的人。

後來在1912年，阿雪洛德在尼瓦呼聲（1912年第6期）和我們的曙光（1912年第六期）（82）上，也完全肯定地和公開地擁護過這個離開秘密組織的行動。

阿雪洛德寫道：

“在這種情形之下來談非政派主義，這無異於仿做駝鳥……無異於自欺欺人”。“政派主義的形成和團結，就是主張黨內改良者，或正確些說，主張黨內革命者底直接責任和迫切事業”。

總之，阿雪洛德公然贊成黨內革命，就是說，主張消滅舊黨而建立新黨。

在1913年光綫第101期底未署名的編輯部的社論上，公然說過，‘在工人中間，有些地方對於秘密組織的同情心，甚至復活着和鞏固着’，這是“令人痛心的事實”。該文作者色多夫自己曾經承認，這篇

文章甚至在光綫派策略底贊成者中間（我們的曙光第三期，49頁，1913年）也“引起了不滿意”。而且色多夫自己的解釋又引起了光綫派贊成人，即安恩*底新的不滿意，安恩在光綫第181期上發表文章反對色多夫。安恩反對色多夫之一種觀點：似乎“秘密組織障礙我們運動底政治形成，障礙工人社會民主黨底建立”。安恩譏笑色多夫，說他對於是否最好是有秘密組織的問題，“態度無定”。

光綫編輯部在安恩底論文後面加上長篇的書後，表示贊成色多夫，而認為安恩“給色多夫的批評是不對的”。

在活潑生活第8期上（1913年8月1號（7月9日），查蘇利赤會寫道：“組織（就是說，社會民主黨）……幫助了抑或妨礙了……工作，這很難說”。很明顯的，這些話即等於離開黨。查蘇利赤會替脫黨行為辯護，她說：組織空虛了，“因為當時在那裏沒有什麼事情可做”。查蘇利赤創造純粹無政府主義的“廣大階層”底理論來代替政黨（參看1912年教育第九期關於這個理論的詳細分析）**。

從我們所引的各種文件中得出的基本的主要的結論是什麼呢？

無論在1908年或在1910年，全黨都斥責和駁斥取消主義，牠詳細地和明確地說明，這種思潮底階級來源何在和牠的危險性何在。一切取消派的報章和雜誌：復興（1909至1910年）也好，我們的曙光（1910至1913年）也好，尼瓦呼聲（1912年）也好，光綫（1912至1913

* 安恩就是壽丹尼亞。——（編者）

** 列寧是指他自己的文章：查蘇利赤如何打擊取消主義，見列寧全集

第16卷624至640頁。——（編者）

年)也好, 新工人報 (1913至1914年) * 也好, 在黨底最確定的和甚至一致通過的決議之後, 大家都還在重複這樣一些包含着顯明的取消主義的觀點和議論。

甚至光綏派底贊成人也不得不申明其不同意這些議論, 不同意這種宣傳。這是事實。因此, 像託洛茨基、謝可夫斯基及其他許多取消主義底袒護者一樣, 喊什麼有人“摧殘”取消派, 這簡直是不誠實的, 因為這完全是公然曲解真理。

我所引的五年多以來 (1908年至1913年) 的文件所證實的真理就在於, 取消派侮蔑黨一切決議, 繼續對黨, 就是說, 對“秘密組織”, 加以謾罵和攻擊。

每個願意自己極認真地去了解黨底爭論問題和麻煩問題、願意自己去解決這些問題的工人, 應當首先明瞭這個真理; 爲此之故, 每個工人應採用獨立的方法去研究和審查上述的黨底決議與取消派底議論。祇有細心地研究、思索以及獨立地解決自己黨底問題和命運的人, 才配做黨員和工黨底建設者。黨之“摧殘”(就是說, 太激烈的和不正確的攻擊) 取消派是“罪過”呢, 還是取消派之公然破壞黨底決議, 公然鼓吹取消黨, 就是說破壞黨, 是罪過呢。對於這個問題不能抱淡漠態度。

* 參看例如1914年新工人報第一期中的一年社論罷: “走上公開的行動政黨的道路, 同時就是走上黨的統一的道路”(走上公開黨建設者之統一的道路嗎?), 或者參看1914年該報第五期: “克服(擺在組織工人代表大會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礙) 不是別的, 無非就是作最確實的鬥爭, 來爭取結社自由, 就是說爭取那種和爭取社會民主工黨之公開存在有密切聯繫的工人運動底合法性”。

很明顯的，如果黨不竭力去和破壞黨的人作鬥爭，黨就不能存在。

我們既援引了關於這個基本問題的文件，在下一篇文章內就將來估計那種“公開黨”宣傳底思想內容。

四、取消主義底階級意義

在以上幾篇文章內（真理報第289、299、314期上）*，我們指出了：無論在1908年或1910年，一切馬克思主義者都毅然決然地斥責了取消主義，認為牠是一種拋棄已往的思想。馬克思主義者對工人階級解釋過，取消主義是資產階級影響無產階級的表现。而從1909年到1913年，一切取消主義的刊物，都是拚命破壞了和破壞着馬克思主義者底決議。

現在我們來考察取消派在光線和我們的曙光上至今所擁護的口號：“公開的工黨”或“爭取公開的黨”。

這個口號是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的口號呢，還是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的口號呢？

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不應在取消派或其他集團底情緒和計劃中去找，——而應在對於現代俄國社會力量對比之分析中去找。口號底意義不是由提出口號的人之用意來決定，而正由國內各階級底力量對比來決定的。

農奴地主和他們的“官僚制”，對於本着政治自由精神的一切變更，都抱仇視態度。這是不言而喻的。資產階級，按其在落後的和半農奴的國家內所佔的經濟地位講來不能不趨向於自由。但是資產階

*參看本卷第132頁至136頁。——(編者)

級之害怕民衆的積極性比害怕反動勢力還要厲害些。1905年特別明顯地證明了這個真理；工人階級非常清楚地明瞭了這個真理；祇有機會主義的和半自由主義的智識份子，才沒有了解這個真理。

資產階級是自由主義的和反革命的。由此就有他那種軟弱到可笑的可憐的改良主義。幻想改良；同時又害怕認真和農奴主算賬；農奴主不但不給改良，而且甚至奪回已經給了的東西。鼓吹改良；同時又害怕民衆運動。企圖排擠農奴主；同時又害怕失掉他們的幫助，害怕失掉自己的特權。6月16號（3日）的制度，給農奴主以全部政權和給資產階級以特權的制度，就是建築在這種階級對比之上的。

無產階級底階級地位，使他完全沒有與任何人“分享”特權或害怕任何人失掉這些特權的可能性。因此，自利的、狹隘的、可憐的和愚昧的改良主義，是為無產階級所完全不容的。至於講到農民羣衆呢，那麼，一方面，他們受過份的壓迫，而且只見飢餓而不見特權，他方面，他們絕對是小資產階級性的，——必然動搖於自由派和工人之間。

客觀情形就是如此。

從這種情形中顯然可以看出，公開工黨這個口號，按其階級來源說來，是反革命自由派底口號。其中沒有別的，祇有改良主義；其中甚至沒有暗示，無產階級，即唯一的完全民主的階級，了解自己的任務：奪取對整個民主派的影響而與自由派作鬥爭；其中甚至沒有關於消滅農奴主、“官僚制”等等任何特權基礎的念頭；其中甚至沒有關於政治自由和民主立憲之一般基礎的念頭；可是，在這中間，他們却把舊有的東西不作聲地拋棄了，這也就是叛變工黨和解散（取消）工黨。

簡單些說：在反革命時代，這個口號恰恰把自由派資產階級在自己隊伍中所作的宣傳，拿到工人隊伍中來。因此，如果沒有取消派的

話，那麼，聰明的進步派的資產者就一定會找尋或僱用智識份子，以便把這種宣傳拿到工人階級中去！

祇有無頭腦的人們才能拿取消派底言論和取消派底動機作比較。應當把他們的言論和自由派資產階級底行動以及牠的客觀地位作比較。

試看這些行動吧。在1902年，資產階級曾贊成秘密工作。牠曾經派司徒威去出版秘密的解放 (83)。當工人運動引起 10月 30號 (17日) 事變的時候，自由派和立憲民主黨人便拋棄秘密工作，然後就離開牠，宣佈牠是不需要的、不合理的、罪惡的、無法無天的*。自由派資產階級拿爭取公開黨的鬥爭，來代替秘密工作。這是歷史上的事實，這個事實為立憲民主黨人 (1905年到1907年) 和進步黨人 (1913年) (85) 底不斷進行的合法化企圖所證實了。

在立憲民主黨人方面，我們看見“公開的工作和牠的秘密的組織”；幼稚的、就是說不覺悟的取消派胡拉梭夫，僅僅“用自己的話”來轉述了立憲民主黨人的行動。

爲什麼自由派拋棄了秘密工作而採用了“爭取公開黨的鬥爭”這個口號呢？是否因爲司徒威做了叛徒呢？不是的，恰恰相反。司徒威之所以轉到另一方面，是因爲整個資產階級都改變方向了。而資產階級之所以改變方向，(一) 因爲得到了特權，在1905年12月24號 (11日)，甚至在1907年6月16號 (3日)，得到了可以容忍的在野黨底地位；(二) 因爲牠自己已被民衆運動嚇得要命了。“爭取公開黨的鬥爭”這個口號，從“高深的政治”譯成簡明的話，這就等於說：

*“有一部‘很出色的書’，標題爲道標 (94)，再版了許多次，牠給反革命的自由主義底這些觀念作了一個很好的總結”。

——地主先生們！你們不要以為我們想消滅你們。不是的。請你們移動一下，使我們資產者也可以坐下來（公開黨），——那時候我們之擁護你們，將比齊莫石金輩和沙布列爾式的神父（66）還要“聰明”、狡猾、“科學”五倍。

小資產者、民粹派，做做着立憲民主黨人，採取了“爭取公開黨的鬥爭”這個口號。在1906年8月，俄國富源上的壁塞浩諾夫先生及其同伴，離開秘密工作，宣佈“爭取公開黨的鬥爭”，割短自己綱領中徹底民主的、“秘密的”口號（87）。

這些庸人們以改良主義的精神空談什麼“廣泛的和公開的黨”，結果，大家都知道，他們弄得沒有任何政黨，與羣衆沒有任何聯繫，而立憲民主黨人甚至於不肯再來幻想這種聯繫了。

這樣而且只有這樣，——經過對各階級地位之分析，經過對反革命底一般歷史的了解，——才可以去明瞭取消主義。取消派，這是小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被資產階級派到工人中去散佈自由主義的毒素的。取消派是馬克思主義底叛徒和民主主義底叛徒。他們（如自由派和民粹派一樣）所提出的“爭取公開黨”這一個口號，是用以掩飾他們之拋棄過去和他們之與工人階級的破裂的。這是工界之選舉第四國會和工人報真理底產生史所證明了的事實。大家都知道，與羣衆有聯繫的原來只有這樣一些人，這些人不會拋棄過去，而且完全本着過去底精神，曾善於利用“公開工作”和一切“可能性”以加強過去，鞏固過去和發展過去。

在六三制度時代，是非如此不可的。

在下文中，我們要談到取消派（就是說，自由派）怎樣“割短”綱領和策略的問題。

五、爭取公開黨的口號

在上文裏（真理報123期）*，我們已經考察了“公開黨”或“爭取公開黨”這個口號之客觀的、就是說由階級關係所決定的意義。這個口號就是資產階級策略之奴隸式的重複；對於資產階級，這個口號是離離開革命或走向反革命之正確表現。

現在，我們來考察取消派中間一些特別流行的企圖，即擁護“爭取公開黨”這個口號的企圖。無論馬耶夫斯基、無論色多夫、無論唐恩、無論一切“光線派”都努力把公開黨和公開工作或活動混為一談。這樣的混淆簡直是詭辯、兒戲、欺騙讀者。

第一，在1904年到1913年這個時期，社會民主黨人之公開活動是事實。公開的黨是智識份子底一種掩蔽脫黨行動的話頭。第二，黨多次申斥了取消主義，即申斥了公開黨的口號。但是，黨不僅沒有申斥公開的活動，反而申斥了那些拋棄這種活動或離開這種活動的人們。第三，在1904年到1907年，一切社會民主黨人特別發展了公開的活動。但是，當時社會民主黨人中，無論那個思潮，無論那個政派，都沒有提出“爭取公開黨”的口號！

這是歷史上的事實。凡願意了解取消主義的人應當思索這個事實。

在1904年到1907年，沒有提出“爭取公開黨”的口號，這是否妨礙了公開的活動呢？絕對沒有。

爲什麼當時在社會民主黨人那裏沒有發生這樣的口號呢？正因為，當時還沒有那種引誘一部份社會民主黨人到極端機會主義中去

* 參看第四章，本卷136頁至139頁。——（編者）

的反革命底猖獗。當時極其明顯的就是，“爭取公開黨”這一個口號，是機會主義的說法，是脫離“祕密組織”的行動。

先生們，請領會這個歷史轉變底意思：在1905年時代，在公開活動蓬勃發展時，沒有“爭取公開黨”的口號；在反革命時代，在公開活動發展得比較薄弱的時代，一部份社會民主黨人（跟着資產階級）提出離開“祕密組織”和“爭取公開黨”的口號。

難道這個轉變底意思和階級意義還會不明白嗎？

最後，還有第四件事情，而且是最主要的事情。公開活動可有（而且正表現着）兩種方式，兩個絕對相反的方向：一為擁護過去和完全本着牠的精神，爲着牠的口號和策略而進行的，一為反對過去，爲着離開牠，減少牠的作用及其口號等等而進行的。

從1906年（立憲民主黨人和壘塞浩諾夫先生及其同伴）至1913年（光線、我們的曙光）這個時代中，存在有這兩個原則上仇視的和不可調和的公開活動形式，這是一個極無疑義的歷史事實。因此，當蠢漢（或一時假裝蠢漢的人）說既然彼此都進行公開活動，就無爭論之可言等等時。能否聞之而不笑呢？我們要向這種蠢漢說：最親愛的人呵，這裏的爭論，恰恰就是：應如何去進行這個活動，爲着擁護“祕密工作”和本着牠的精神而進行呢，抑或爲着減少祕密工作底作用、反對牠、不是本着牠的精神而進行呢！爭論之點僅僅（無非“僅僅”！）在於：是本着自由主義的精神還是本着徹底民主主義的精神去進行這個公開的工作。爭論之點“僅僅”在於，能否祇限於公開的工作：請記起自由派的司徒威先生吧，他在1902年不限於這種工作，而在1906年到1913年便完全“限於”這種工作了！

光線報上的取消派總不能了解，“爭取公開黨的口號，就是自由主義的（司徒威主義的）觀念在工人中間的實行，這些觀念用“幾乎

是馬克思主義的”詞句底破衣服來裝飾自己。

或者拿光線編輯部在其回答安恩（第181期上）時所發揮的議論來看吧：

“……社會民主黨不限於那些少數被實際生活所迫得不能不做秘密工作的同志。其實，如果黨祇限於秘密工作，那麼，牠還有多少黨員呢？兩三百個嗎？然而，那些擔任全部社會民主黨工作的成千工人（如果不是成萬工人的話），究竟跑到那裏去了呢？”

在思索的人看來，祇根據這一段議論就足以斷定牠的作者是自由派。第一，他們關於“秘密組織”說出顯然不對的話：其中絕對不止“數百”人。第二，世界上無論何地，黨員數目總比進行社會民主黨工作的工人數目要“狹小”。舉例來說，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祇有一百萬黨員，而贊成社會民主黨的票數約有五百萬，無產階級則約有一千五百萬。黨員數目和社會民主派數目的比例，是由各國歷史條件之差異來決定的。第三，我們並沒有其他代替“秘密組織”的東西。這就是說，光線是藉口於非黨的或黨外的工人，來反對黨。這也就是自由派底慣技，自由派極力使羣衆離開其覺悟的先鋒隊。光線之不懂得黨對階級的關係，猶之乎1893年到1901年的“經濟派”之不懂這個關係一樣。第四，社會民主黨的工作，只有本着過去底精神，爲着過去底口號而進行的時候，才是真正社會民主黨的工作。

光線底議論是自由派智識份子底議論，這些智識份子不願意加入真正存在着黨的組織，唆使非黨的、散漫的、少覺悟的烏合之衆去反對牠，這樣來企圖破壞這個組織。德國自由派底行動也是如此；這些自由派說，社會民主黨人不是無產階級底代表，因爲在他們“黨內”，“只有”十五分之一的無產階級！

再拿光線底更通常的議論來看吧：“我們”之贊成公開黨，“如在歐洲一樣”。自由派和取消派之願意憲法和公開黨，“如在歐洲”今日一樣；可是他們却不願意歐洲所達到這個今日的那條道路。

取消派兼猶太工人同盟派可索夫斯基，在光線內拿奧國人底實例來教訓我們。他只是忘記了，奧國人從1867年起就有了憲法，並且如果（一）沒有1848年的運動，（二）沒有1859到1866年深刻的國家危機（當時因工人階級薄弱，俾斯麥及其同伴得能用著名的自上而來的革命”（54）而脫救出來），那麼當時就不能有憲法了。但是從可索夫斯基、唐恩、拉林和一切“光線派”底教訓中會得出什麼結論呢？

僅僅得出這個結論：他們幫助人們本着一一定的“自上而來的革命”底精神，去解決俄國的危機！但是，他們的這類工作也就是斯託雷平式的工黨底“工作”。

無論向什麼地方看——到處我們都可以看見取消派之拋棄馬克思主義和拋棄民主主義。

在下文裏，我們將詳細地考察他們關於必須截短我們社會民主黨之口號的議論。

六、

現在我們要考察取消派怎樣截短馬克思主義的口號。這裏最好是拿他們的八月代表會議底決議來看，但是，由於各種明白的原因，要分析這些決議只有在國外出版物上才有可能。所以，此地只得拿光線來看。光線在И.С.底論文中（第108——194期），對於取消主義全部的實質、全部的精神，都有極確切的敘述。

И.С.先生寫道：

“……國會議員謨蘭諾夫暫時只承認三個局部的要求，即大家知道的，列甯主義者底選舉綱領所根據的三大要求：國家制度完全民主化、八小時工作日、土地轉給農民。真理報也繼續站在這個觀點上。然而，我們如歐洲整個的社會民主黨一樣”（應讀爲：“我們如米留可夫一樣，米留可夫担保說，阿彌陀佛，我們有憲法”），“認爲提出局部的要求，是一種鼓動的手段，這種手段，只有在牠顧到工人羣衆日常鬥爭的時候，才可以成功。只有那些對於工人運動向前發展有原則意義的（這是一方面）以及對於羣衆可以成爲迫切要求的（這是另一方面）東西，我們才認爲可以提出來作爲一個局部的要求，而社會民主黨目前的注意就應集中在這一個要求上。從真理報所提出的三個要求中，只有一個要求（八小時工作日），在工人日常鬥爭中發生而且可以發生作用。其餘兩個要求在目前能夠作爲宣傳底對象，而不能作爲鼓動底對象。關於宣傳和鼓動的差別，可以參看普列漢諾夫著的與飢荒作鬥爭內出色的篇幅”（Л.С.跑錯了路：回憶起1899年到1902年普列漢諾夫與“經濟派”的論戰，這對於他是多麼“痛心”呵，因爲，他自己所說的話，都是從經濟派那裏抄來的！）。

“除了八小時工作日之外，結社自由、一切組織自由、以及與此有關的集會和言論（口頭的和出版的）自由這個要求，也是爲工人運動底需要以及俄國生活底整個行程所提出的局部要求”。

你們看，這就是取消派底策略。看呵！Л.С.所寫的“完全民主化等等”，他所寫的“土地轉給農民”（88），都不是“對羣衆迫切的”都不是“爲工人運動底需要”和“俄國生活底整個行程”所提出的！！這是多

麼陳舊的議論呵，而且凡記得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實際行動底歷史的人，記得馬克思主義者多年與離開民主任務的“經濟派”進行鬥爭的人，是多麼熟悉這種議論呵！普羅科波維赤和古斯科娃當時曾企圖引誘工人走上自由主義道路，現在光線如何聰明地抄襲着他們的見解！

但是，我們還要更仔細地來分析光線底議論。在頭腦健全的人看來，這個議論簡直是一種瘋狂的議論。其實，難道不是只有神經錯亂的人，才敢斷定，說上述的“農民的”（就是說，於農民有利的）要求不是“對羣衆迫切的”，不是“工人運動底需要和俄國生活底整個行程所提出的”嗎？這不但是說謊；這簡直是荒謬絕倫。俄國十九世紀底全部歷史，整個“俄國生活底行程”，提出了這個問題，使牠成了迫切的和最迫切的問題，這一點就在俄國全部立法上也反映出來了。光線何以能作出這樣離奇的說謊呢。

光線會一定要作這樣的說謊，因為牠被自由派的政策所束縛着，而自由派之拒絕（或擱置——如光線所作一樣）農民的要求，乃是自由派原有的主張。自由派資產階級所以這樣幹，是因為牠的階級地位使牠不能不迎合地主而反對民衆運動。

光線將自由派的地主底觀念貢獻給工人並且背叛民主的農民。

其次，難道只有結社自由，才是“迫切的”嗎？個人不可侵犯呢？廢除獨斷獨行的制度呢？普遍的……選舉權呢？一院制呢？以及其他等等呢？凡有常識的工人，凡記得最近過去的事實的人，顯然知道，所有這些都是迫切的。一切自由派在許許多多的文章中和講演中，承認所有這些都是迫切的。但是為什麼光線只承認一種（就算是最重要的）自由是迫切的，而把政治自由、民主制度和立憲制度之根本條件（88），勾消了，擱置一旁了，交到“宣傳”底案卷中去了；拋出鼓動範圍以外了呢？

因爲而且僅僅因爲，光線不接受自由派所不能接受的東西。

從工人運動底需要對於羣衆的迫切性和俄國生活底行程這種觀點看來，謨蘭諾夫和真理報底三個要求（簡言之就是澈底的馬克思主義者底要求），彼此之間沒有差別。無論工人的、農民的以及一般政治的要求，對於羣衆同樣是迫切的，同樣是由工人運動底需要和“俄國生活底整個行程”所提出的。從“局部性”（這是我們的崇拜溫和精神及實用精神的人所歡喜的）的觀點看來，所有這三個要求也是同樣的：牠們對於最終的要求講來是“局部的”，但是，牠們對於——譬如說來——一般的“歐洲”講來，便是很高的了。

爲什麼光線接受八小時工作制的要求，而駁斥其餘的要求呢？爲什麼牠代替工人來決定，說八小時工作制在他們的日常鬥爭中“發生作用”，而一般政治的和農民的要求不發生這樣的作用呢？事實告訴我們，一方面，工人在日常鬥爭中，提出一般政治的要求，也提出農民的要求；而另一方面，他們時常爭取較小的關於縮短工作時間的要求。

問題究竟在那裏呢？

問題就在於光線底改良主義，光線把自己這個自由主義的狹隘性，照例卸在“羣衆”、“歷史行程”等等的身上。

改良主義底實質一般地就在於，人們只限於鼓動那種不要求消滅舊統治階級主要基礎的改變，即要求那種與這些基礎之保持可以並存的改變。八小時工作制是與資本政權之保持可以並存的。爲吸引工人起見，俄國的自由派自己也決意贊成（“在可能範圍內”）這個要求。至於那些爲光線所不願意“鼓動”的要求，則與資本主義以前的農奴制時代底基礎之保持不能並存。

光線所排斥於鼓動範圍之外的，正是自由派所不能接受的東西；自由派不願消滅地主的政權，而只願瓜分政權和特權。光線所排斥

的，正是與改良主義底觀點不能並存的東西。

這就是問題實質之所在。

無論謨蘭諾夫、無論真理報、無論一切馬克思主義者，都不反對局部的要求。如果說我們反對局部的要求，那是無稽之談。保險運動就是一個例子（89）。我們反對人們用關於局部要求的空談，用改良主義去欺騙羣衆。我們反對現代俄國自由派的改良主義，認爲這是烏托邦的、虛偽營私的、基於立憲幻想的、充滿着恭維地主的精神的。這就是實質之所在，光線用一般的關於“局部要求”的話頭，來混淆和掩蔽這種實質，雖然他自己也承認，無論謨蘭諾夫、無論真理報，都沒有反對某些“局部要求”。

光線截短馬克思主義的口號，使這些口號去適應狹隘的、改良主義的、自由主義的尺寸，這樣，他把資產階級的觀念實施到工人隊伍中來了。

馬克思主義者與取消派的鬥爭，無非就是先進工人爲要影響民衆、爲要在政治上教育和訓練民衆而和自由派資產者鬥爭底表現。

1913年4月至6月。

第二篇

1912—1914年的

高漲時期

1 節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全俄布

拉加代表會議底決議案(90)

論目前時局和黨底任務 (91)

代表會議首先批准了黨的1908年12月代表會議所通過的論六三制度和黨底任務的決議案*。代表會議指出這個決議案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決議案關於整個六三制度底歷史意義和階級實質（這是一方面）以及關於革命危機之增長（這是另一方面）的論點，都被過去3年來的事變完全證實了。

從這些事變中，代表會議局部地指出下列各點：

（甲） 沙皇制度底土地政策（地主和大資產階級底政府黨也好，實際上反革命的自由主義也好，都把自己的反革命的利益與這種政策聯繫起來了），不但沒有在農村中造成多少穩固的資產階級的關係，而且沒有把農民從大批飢餓狀態中拯救出來，這些飢餓現象表示民衆地位極端的惡化，以及國內生產力莫大的浪費；

（乙） 沙皇制度既在現代資本主義國家間的國際競爭場上仍舊沒有力量，而且日益被排擠到歐洲中不重要的地位，於是便聯合‘黑幫派’的貴族和正在強固起來的工業資產階級，企圖滿足自己的強盜的利益，其所用的方法就是：採用魯莽的“民族主義的”政策來反對

* 參看本卷10頁至13頁。——(編者)

邊疆各地、反對一切被壓迫民族、反對文化程度較高的特別區（芬蘭、波蘭、西北邊疆），採取掠奪殖民地的政策來反對為自由而進行革命鬥爭的亞洲民族（波斯、中國）；

（丙）農民經濟狀況之完全混亂，專制政府強搶式的預算政策以及官僚機關底腐化，使經濟發展大受阻礙；另一方面，物價之日益昂貴，使工人階級和廣大民衆底貧困，更加劇烈起來；

（丁）因此，在第三國會存在底五年中，廣大民衆日益相信，這個國會不願意、無本事和無力量做出什麼改善廣大民衆生活的事情來；日益相信，在國會中佔統治地位的各政黨帶有反民衆的性質。

（戊）在廣大民主階層中，首先是在無產階級中，表現出政治活躍底開始。1910年至1911年的工人罷工，示威運動和無產階級羣衆大會之開始，城市資產階級民主派運動之開始（學生罷課）等等，——所有這些都是反對6月16日（3日）制度的那種日益增長的羣衆革命情緒底表現。

根據以上一切事實，代表會議批准1908年12月代表會議決議案所詳細指出的黨底各種任務；同時，代表會議又特別指出，領導農民的無產階級之奪取政權的任務，仍舊是俄國民主革命底任務。代表會議特別使同志們注意：

（1）目前首要的任務，還是和以前一樣，就是進行長期的工作，本着社會主義的精神來訓練、組織和團結先進的無產階級羣衆；

（2）必須加緊工作以恢復‘俄國社會民主黨’底秘密組織。這個組織比過去更廣泛地利用所有一切的公開可能性，牠能領導無產階級底經濟鬥爭，並且唯一能夠指導無產階級日益增多的政治發動；

（3）必須進行和擴大有系統的政治鼓動和各方面幫助正在開

始的民衆運動，並在完全實現黨底各種口號的旗幟之下去擴大這種運動。宣傳共和制度以反對沙皇君主制度底政策——這一點應當特別提出來，並與那種普遍進行着的宣傳：主張縮小口號和主張用現有“合法性”範圍來限制工作的宣傳，對立起來。

論取消主義和取消派集團 (92)

代表會議因爲注意到以下各點：

(1) ‘俄國社會民主黨’之進行堅決的反取消主義思潮的鬥爭，已經約有4年了，黨底1908年12月的代表會議，曾經確定這個思潮是

“黨內一部份智識份子底這一種企圖：取消‘俄國社會民主黨’底現有組織；無論如何要在合法範圍內用無定形的聯合來代替黨底現有組織，爲着合法性，甚至不惜公然放棄黨底綱領、策略和傳統”：

(2) 1910年正月中央全體會議在繼續和這種思潮作鬥爭時，曾一致承認他是資產階級影響無產階級之表現，並曾提出與取消主義完全破裂以及澈底克服這種離開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傾向，作爲黨的真正統一條件，作爲從前的布爾塞維克政派及孟塞維克政派合併底條件；

(3) 一部份社會民主黨人，團結在我們的曙光和人生事業這兩種雜誌之周圍的，違背黨底一切決議，違背1910年正月全體會議上一切政派代表所提出的義務，曾公開起來擁護被全黨承認爲資產階級影響無產階級之產物的那種思潮；

(4) 過去的中央委員米哈爾、玉里和羅曼 (21)，不但在1910年春天不肯加入中央，而且連選任新委員的一次會議都不肯參加，他

們公開申明過，黨底中央本身之存在是“有害的”：

(5) 上述的取消派底主要刊物我們的曙光和人生事業，恰恰在1910年全體會議之後，堅決地和各方面地轉到取消主義方面去了，牠們不但“降低”(違背全體會議底決定)“秘密黨底意義”，而且公然否認牠，說黨是“死屍”，說黨已被取消，說恢復秘密黨是“反動的烏托邦”，並在公開雜誌上以詆毀和謾罵來攻擊秘密黨，號召工人來承認黨底支部及各級黨部是“僵死的”等等；

(6) 全國護黨派已不分政派而統一起來進行關於召集黨的代表會議的迫切工作，而取消派却形成了完全獨立的小集團，在各地地方，而且也在護黨派的孟塞維克佔優勢的地方(葉加吉林諾斯拉夫，基輔)，與黨分裂了，並且完全拒絕了與‘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各地方的組織發生任何黨的聯繫；——

所以，代表會議申明道，‘我們的曙光派’和‘人生事業派’底行動，已經將自己完全置於黨外了。

代表會議號召一切護黨派，不分思潮和色彩，實行反取消主義的鬥爭，解釋牠對於工人階級解放事業的一切害處，用全力去恢復和鞏固秘密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

論黨的工作底性質和組織形式 (93)

代表會議承認，最近三年底經驗，無條件地證實了12月(1908年)代表會議所通過的組織問題決議案之基本論點，並且認為，在工人運動正在開始活躍的基礎上，按着同樣的道路，就是說，按着建立秘密社會民主黨支部(周圍有儘多的各種各樣的公開工人團體的)的道路更加發展黨工作底組織形式，已成為可能了；因此，代表會議認為：

(1) 必須使秘密的黨的組織，最積極地參加對經濟鬥爭（罷工、罷工委員會等等）的領導，必須使秘密的黨的支部與工會在這一方面彼此合作，特別是與工會中社會民主黨支部合作，同樣也要和職工運動底個別活動份子合作；

(2) 工會中按職業的標準所組織的社會民主黨人支部，最好是——依照各地方的條件——和按地域的標準所建立的黨支部，配合起來；

(3) 必須拿出儘量多的首創精神來在公開團體，如工會、閱書室、圖書館、各色各樣的工人娛樂團體中，進行社會民主黨的工作；推廣職工機關和以馬克思主義的精神來指導工作出版物，利用社會民主黨人在國會中的演說，從工人中培養公開的講演員；按街區和街道等等來建立工人的及其他的選舉委員會（在選舉第4國會的時候）；在城市自治機關選舉時，進行社會民主黨的鼓動等等；

(4) 必須努力鞏固和增加秘密的黨的支部，給這些支部找尋新的儘量靈活的組織形式，在每個城市中建立和鞏固秘密的黨的領導組織，並宣傳這樣一些羣衆的秘密的組織形式，如“介紹所”，工廠黨員大會等等；

(5) 最好是吸收宣傳組來參加日常的實際工作：散發秘密的社會民主黨的及公開的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品等。

(6) 必須注意到：從事有系統的、文字上的、社會民主黨的鼓動，特別是經常散佈那種定期而時常出版的秘密黨報，對於各秘密支部間組織聯繫之建立，以及公開的工人團體中各社會民主黨支部間組織聯繫之建立，也能够有很大的意義。

1912年1月

2 革命的高漲 (94)

全俄無產階級之轟轟烈烈的五月罷工，⁵以及和牠有連帶關係的遊行示威，革命宣言和在工人大眾面前的革命演說，都顯然表示出，俄國已進入革命高漲的時期。

這個高漲並不是如晴天霹靂突然而來的。不，牠老早就由俄國生活底一切條件所準備了，而與列拿槍殺案有關的以及與五一節有關的羣衆罷工，祇是完全確定了這個高漲底到來。反革命之暫時勝利，曾與工人底羣衆鬥爭之低落，有不可分離的聯繫。罷工者底數目，給我們一個關於這種鬥爭範圍的概念，這個概念雖然是大概的，但是絕對客觀的和確切的。

革命前的10年當中，1895年到1904年，罷工者底平均數，每年曾有4萬3千人（取其整數）。在1905年，有275萬人；在1906年，有100萬人，在1907年，有75萬人。三年革命底特點，就是無產階級底罷工鬥爭達到世界上任何地方沒有見過的高漲。這種鬥爭底低落，始於1906年和1907年，至1908年就完全確定了：罷工者只有17萬5千人。1907年6月16日（3日）的政變，是羣衆革命毅力低落底必然結果，這次政變，使沙皇專制制度在與黑幫地主的和工商資本巨頭的國會聯合中恢復過來。

1908年到1910年這三年，就是黑幫派反革命的猖獗、自由派資產階級的背叛以及無產階級的消沉和衰落底時代。罷工者底數目日益

低落，1909年竟減到6萬人，1910年減到5萬人。

但是，從1910年末，顯明的轉變便開始了。因自由派諷刺家切夫和托爾斯泰兩人逝世而起的示威運動，以及學生運動（94），顯然指出，風勢轉變了，民主羣衆底情緒發生相當轉變了。在1911年，工人羣衆漸漸轉爲進攻：罷工者底數目達到10萬之多。從各方面得到消息說，由反革命勝利所產生的疲勞性、麻木性，日益過去，重新又吸引到革命中去了。1912年正月‘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全俄代表會議，將自己對於時局的估計做了一個總結，同時又指出了：“在廣大民主階層中，首先是在無產階級中，表示出政治活躍開始，1910年至1911年的工人罷工，示威運動和無產階級羣衆大會之開始，城市資產階級民主派運動之開始（學生罷課）等等，——所有這些都是反對6月16日（3日）制度的那種日益增長的羣衆革命情緒底表現”*（參看關於代表會議的通告第18頁）。

一到本年夏季的時候，這種情緒已經大大增長，牠已經表現爲羣衆的行動並造成革命的高漲。最近一年半來的事變過程顯然表示出，這個高漲並不是什麼偶然的事情，高漲底到來完全是合乎規律的，並且由俄國過去的一切發展所必然促成的。

列拿慘案，是由羣衆底革命情緒過渡到羣衆底革命高漲的導火線（94）。最虛偽的莫過於自由主義的虛構（託洛茨基在維也納真理報上跟着取消派重複這種虛構），說：“爭取結社自由的鬥爭，就是列拿慘案及其在國內所引起的宏大回聲底基礎”。在列拿罷工中，並沒有提出什麼結社自由這個特殊的或主要的要求。在列拿慘案中

* 此地列拿引用1912年布拉加代表會議底決議案：論目前時局和黨底任務——見本卷149頁至151頁。（編者）

暴露出的，並不僅是結社自由之缺乏，而是避免誣害行動、避免一般的無權狀況、避免專橫行爲……的自由之缺乏。

在社會民主黨人第26期上(96)，我們已經說明了，列拿慘案，是整個六三帝制之最確切的反映。列拿事變之特點，並不是爭取權利中之一種，雖然這種權利對無產階級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這次事變底特點，就是在各方面完全缺乏最初步的法律性。它的特點，就是挑釁者、奸細、暗探、沙皇臣僕沒有任何政治理由，而不施屠殺。正是俄國生活中之這一個一般的無權狀況，正是爭取個別權利之這一個無希望性和不可能性，正是沙皇君主制度及其整個統治之無可矯正，在列拿事變中表現得這樣鮮明，結果使羣衆發生了革命熱情。

如果自由派過去和現在都拚命認爲列拿事變和5月罷工帶有職工運動和爭取“權利”的鬥爭底性質，那麼，在一切不被自由派的（和取消派的）爭論所蒙蔽的人看來，顯然是不同的。羣衆罷工底革命性質是很明顯的，五一節前夜社會民主黨人各個集團（而且甚至有一個工人的社會革命黨人集團！）在彼得堡發表的宣言特別指出了這個性質：現在我們把這個宣言完全轉載在紀事欄裏，這宣言重複着1912年正月‘俄國社會民主黨’全俄代表會議所提出的口號(97)。

而且，列拿罷工和五月罷工之革命性質，主要證據甚至不在於口號上。口號把事實所說明的歸納了起來，羣衆的由一區蔓延至別區的罷工事實，這些罷工之偉大的發展，普及底迅速，工人底勇敢，羣衆大會和革命演說之增多，關於取消因紀念五一節而施行的罰款制的要求，我們在俄國第一次革命中所熟識的政治罷工和經濟罷工之配合，——所有這些，都明確地指出運動真正的性質在於羣衆底革命高漲。

我們現在來回顧1905年底經驗吧。事變告訴我們，在工人當中，

革命的羣衆罷工底傳統是活着，工人們立即就提起了這種傳統並使之活躍起來。1905年底罷工高漲是世界上所沒有看見過的，是年春季有81萬的罷工者。冬季有127萬7千的罷工者，同時經濟罷工和政治罷工都互相配合。按約略的計算，列拿罷工包括了30萬工人，五月罷工包括了40萬工人，而罷工還不斷地發展着。每份報紙（甚至自由派的報紙）都載有關於罷工火焰如何加劇的消息。1912年夏季還沒有完全過去，可是現在已經明確地表現出這個事實，就是以罷工運動底範圍而論，1912年革命高漲底開始，不是小於而是大於1905年的革命高漲底開始！

俄國革命，第一次大規模地發展了這一個無產階級的鼓動、發動、團結、吸引羣衆參加鬥爭的方法。現在無產階級重新應用並且用更堅決的手段來應用這個方法。世界上無論那種力量，都不能實現無產階級革命先鋒隊用這種方法所實現的事情。俄國是幅員廣大的國家，有1萬萬5千萬的人民，他們散居於廣闊的疆域內，是一種散漫的、被壓迫的、無權的、愚昧的人民，是被當局、警察和奸細烏調瘴氣所隔開而不得接近“惡影響”的人民，——這個國家整個兒已經醞釀起來了。工農中最落後的階層，都與罷工者直接和間接地接近起來了。成千成萬的革命的鼓動者，已經驟然出現於舞台；他們的影響正在無限地加強着；因為他們與下層份子、與羣衆有密切的聯繫，他們仍舊留在羣衆的隊伍內，爲一切工人最迫切的要求而鬥爭，並把政治的抗議及反君主制度的鬥爭，與這種爲着迫切的經濟要求而作的直接鬥爭，聯結起來。因爲，反革命已引起幾百萬幾千萬羣衆對君主制度的劇烈的仇恨，使他們開始明白君主制度底作用，而現在呢，首都先進工人底口號（民主共和制度萬歲！），却跟着每次罷工，不斷地經過幾千條運河而源源流入落後階層，流入窮鄉僻壤，流入“民間”，流入

“俄國深處”了。

自由派雪維梁甯關於罷工的議論，極足以表明一切，他這種議論，曾被俄國新聞所高興接受並獲得言論之同情的轉載。雪維梁甯先生自問自答道：

“工人們是否有什麼根據來把經濟要求或其他什麼(?)要求添在五一罷工上呢?我敢斷言，他們是沒有根據的。任何的經濟罷工，只有在嚴格較量機會之後，才能够，才應當開始……。所以，把這樣的罷工恰恰和五一節聯繫起來，往往是無根據的……而且真奇怪極了：當我們在慶祝世界工人紀念節的時候，便乘機要求把製造某種花布的工資提高10%”。

自由派底議論，便是如此！而“優等的”自由主義的報紙，自命爲民主主義的報紙，却用同情態度來接受這種十分卑鄙的下賤的醜惡的議論！

資產者底最粗魯的貪心，反革命者底最下賤的畏怯，這就是自由派底漂亮言論中所蘊藏的東西。這個自由派願意保全主人的荷包。他願意那種要求“結社自由”的“守秩序的”和“無害處的”示威運動！而無產階級却不是這樣，牠吸引羣衆去參加革命的罷工，這種罷工，把政治和經濟不可分離地聯繫起來，用那種主張即刻改善工人生活的鬥爭之勝利去吸引最落後的階層，同時激發民衆去反對沙皇的君主制。

而且，1905年底經驗，造成了羣衆罷工之深刻的和偉大的傳統。不應當忘記，在俄國，這些罷工引起如何的結果。在俄國，羣衆的持久的罷工是和武裝暴動密切聯繫着的。

大家不要誤解這段話。此地所說的，完全不是號召暴動。在目前號召暴動，是極不合理的。這裏所說的，就是確定俄國罷工和暴動間

的聯繫之問題。

在1905年，暴動曾經是如何生長起來的呢？第一，羣衆罷工、示威運動和羣衆大會，會使羣衆和軍警的衝突日益加多。第二，羣衆罷工會掀起農民去實行一些局部的、零星的、半自發的暴動。第三，羣衆罷工非常迅速地蔓延到軍隊中和軍艦中，在那裏引起一種基於經濟要求的衝突（“糧食的”以及其他的“騷動”），以至於暴動。第四，反革命自己用摧殘和屠殺民主派等等方法來開始了國內戰爭。

1905年的革命終於失敗了，這並不是因為牠走得“太遠”，並不是因為12月暴動是“人工造作的”，如自由派的叛徒們所想的一樣。正是相反，失敗底原因就是：暴動走得不十分遠：在革命階級中，對於暴動之必要的認識，還沒有充分普遍地傳佈和堅固地領會起來；暴動當時還不是和衷共濟的、堅決的、有組織的、同時並發的、進攻的。

現在我們來看，在目前是否有暴動生長底徵兆。爲的要不陷於革命的引誘，試拿十月黨人做證人。在彼得堡的俄國十月黨人聯合會，大半是屬於所謂“左的”和“立憲的”十月黨人，立憲民主黨人特別喜歡他們，並且他們最能（比之其他的十月黨人和立憲民主黨人）“客觀地”觀察事變，不拿以革命去恐嚇上司爲目的。

這些十月黨人底機關報，“St.-Petersburger Zeitung”*，在5月19號（6日）的一週政治要覽上寫着：

“五月到了。不管天氣如何，牠對於首都的居民，通常總是不甚高興的，因爲，頭一天就是無產階級的“紀念節”。在今年，工人還保存着列拿示威運動底感想，所以，五一節那天特別危險。在充滿着各種關於罷工和示威的謠言的首都空氣中，聞出烟火

* 即聖彼得堡報。——（編者）

的氣味。我們的可靠的察警機關很是着急，連忙實行搜查和逮捕某些人，準備大批武裝隊伍去防止遊行示威。警察機關並沒有找到更妙的方法，只得去搜查工人報紙底編輯部，以及逮捕牠們的編輯，這種情形不是證明牠特別深刻知道推動工人傀儡們的那些線索。而這些線索是有的。罷工底紀律性以及其它許多事實，都證實這一點。因此，這次五月罷工是很可怕的，這次罷工，是空前未有的大罷工，參加罷工的，有大小企業內十萬甚至於十五萬的工人。這僅僅是和平的閱兵，但是這種軍隊底團結性，很足令人注意；尤其是因為，與工人不久以前的憤激同時發生的，還有其他各種驚惶現象。在我們海軍底許多軍艦上，有些水手因作革命的宣傳而被捕了。根據報上所載的一切消息，在我們本來就很少的軍艦上，情形並不好……。鐵路工人也使我們發生驚惶情緒。不錯，無論何地甚至還沒有舉行罷工的企圖，但是種種逮捕，尤其是像這樣觸目的事情，如尼古拉也夫鐵路副站長烏夏可夫之被捕，便是表示：就在鐵路上也有相當的危險。

幼稚的工人羣衆底革命企圖，對於選舉國會的結局，當然只能發生有害的影響。這些企圖之所以更加無理，就是因為……“沙皇已經委任馬奴興 (98)，而國務院呢，又已經通過工人保險法了！”

俄國十月黨人底議論，便是如此。但是，我們要指出，關於水手的問題，我們已從各地得到許多確實的消息，這些消息證明新時代把事情誇大了，暗探機關顯然是以挑釁“爲業”的。時機未到的暴動企圖，是極不合理的。工人的先鋒隊應當明瞭，在俄國，及時的、即勝利的武裝暴動底基本條件，就是民主農民之援助工人階級，以及軍隊積極的參加。

在革命時代，羣衆罷工有其客觀的邏輯。牠們把幾千幾百萬火星散佈於各方，——而在周圍，却堆着引火的燃料，由下列各現象所形成的燃料：極端的怨恨，空前的饑荒，暗無天日的橫行不法，無恥的凌辱“窮人”，凌辱“農夫”，凌辱下級官吏。此外又加上點幫派萬分放肆的反猶太人的蹂躪行動，即由暴虐無道的尼古拉、羅曼諾夫底宮廷黨徒所暗中促成和指揮的行動……。“過去如此——將來亦如此”：這便是總長馬卡洛夫對自己和自己的階級以及對自己的地主沙皇所說過的定要實行的預言！

羣衆底革命高漲，把偉大而責任重大的義務，加在一切工人社會民主黨人身上，加在一切忠實的民主派身上。‘俄國社會民主黨’全俄代表會議這樣規定了這些義務：“各方面幫助正在開始的羣衆運動（現在已經要說：已開始的革命的羣衆運動），並且在完全實行黨底各種口號的旗幟之下去擴大這種運動”。黨底口號——民主共和國、八小時工作制、沒收地主一切土地、——應成爲整個民主運動底口號，人民革命底口號。

爲要援助和擴大羣衆運動，就一定要有組織。沒有祕密的黨，就不能進行這種工作，空談這種工作是絲毫沒有意義的。當援助和擴大羣衆進攻的時候，應當仔細估計到1905年底經驗，解釋暴動之必要和必然，同時預防和阻止時機未到的暴動企圖。羣衆罷工之增長，吸收其他階級來參加鬥爭的情形，組織底狀況，羣衆底情緒，——所有這些自己會指出，何時一切力量應當聯合起來，向沙皇君主制度進行和衷共濟的、堅決的、進攻的、勇往直前的革命襲擊，

沒有勝利的革命，俄國就不會有自由。

不用工農暴動去推翻沙皇君主制，俄國就不會有勝利的革命。

1912年6月

3 論‘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底現狀

給‘德國社會民主黨管理委員會’

的一封信（100）

親愛的同志們！

不久以前，我們收到了7月7號（6月24日）‘萊多維亞社會民主黨國外委員會’給你們的一封信底謄稿。當時我們認為無須對你們解釋這些萊多維亞人底離奇的計劃，因為我們會覺得，無論那一個有見識的人都不會認真地看待這個計劃。可是，根據7月29日（9日）你們給我們的信，我們已知道你們打算接受這個計劃，這是很奇怪的。這使得我們不能不也向你們提出堅決的抗議。‘管理委員會’底用意，客觀上無非就是企圖促成吾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底分裂和組成一個仇視我們的新黨。這在整個‘國際’以內是空前未有的事情。現在，我們要向德國同志們詳細說明這一點。

1912年正月以來‘俄國社會

民主工黨’內部的情形

1912年正月，舉行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全俄代表會議，派遣代表到會的有下列的組織：彼得堡黨部、莫斯科黨部、莫斯科府

黨部、加山黨部、沙拉托夫黨部、梯夫里斯黨部、巴庫黨部、尼古拉也夫黨部、基輔黨部、葉加吉林諾斯拉夫黨部、維倫黨部、特文黨部。這個代表會議恢復了黨，選舉了新的中央，來代替取消派所消滅了的中央，同時代表會議不能不宣佈這些取消派是站在黨外的（見“Vor-wärts”中的匿名者和‘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底實況這一本小冊子，(101)，該小冊子曾經送給‘管理委員會’了；在該小冊子中，曾提到取消派底抗議，即各民族組織：波蘭人、萊多維亞人，‘猶太工人同盟’和國外各集團底抗議，）

在同年正月，又有人舉行了一次會議，其目的在於建立‘組織委員會’(102)以召集新的代表會議，即取消派及其朋友們所稱的“全黨代表會議”。

萊多維亞人在其7月7號（6月24日）給‘管理委員會’的信中斷定說，構成這個‘組織委員會’的，有下列的組織和派別：猶太工人同盟、萊多維亞社會民主黨人、高加索省委員會、孟塞維克的社會民主黨人呼聲、維也納的‘真理派’和‘前進派’。

總之，在一方面，有‘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牠是由國內的組織，即在俄國工作的組織在代表會議上選舉的（對手稱這個中央是列甯派）；在另一方面，有所謂‘組織委員會’，牠答應召集“全”黨的代表會議。

至今守中立的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對於所謂

‘組織委員會’抱何種態度？

最有名的孟塞維克普列漢諾夫，是堅決反對過取消派底滅黨行為的；這一次，他不願邀請，還是沒有參加正月的黨底代表會議。1912

年4月，他公佈了他和‘組織委員會’代表的通信（參看他的社會民主黨人日記第16期）。

普列漢諾夫不肯參加所謂‘組織委員會’，解釋他之所以不去參加，就是因為‘猶太工人同盟’所召集的，不是現有的黨的組織底代表會議，而是一個“成立大會”，即以成立新黨為目標的代表會議。普列漢諾夫斷定說，所謂主動的集團，即真正擁護‘組織委員會’的集團，就是取消派的集團，牠們並不屬於黨，而想組織新黨。1912年4月，普列漢諾夫寫道：“新的代表會議是由取消派召集的。”

到7月，這個‘組織委員會’底新聞紀要第三期出版了，其中沒有寫一句話來回答普列漢諾夫。根據這點可以斷定，萊多維亞人，即埋怨“列甯的”中央不回答‘組織委員會’底信的那些萊多維亞人，是如何傳信給‘管理委員會’的。

難道黨底中央，舊黨底中央不回答那些——根據至今守中立的普列漢諾夫底說法——組織新黨的人，這就算奇怪嗎？

‘組織委員會’首先應當向中立的普列漢諾夫證明說，牠不組織新黨和不取消舊黨。

參加‘組織委員會’的萊多維亞人，當其在7月7號（6月24日），在這個取消派的‘組織委員會’進行反黨鬥爭至半年之久以後，寫信給‘管理委員會’的時候，他們本應當拿事實和憑據來表示這種鬥爭底結果；可是他們却不這樣做，而向‘管理委員會’拿出各種騙局來。

取消派底騙局

萊多維亞人會向‘管理委員會’提議，把俄國社會民主黨底11個“組織上的”中心機關、組織和政派召集起來，舉行一個會議。原文上竟是這樣寫着（參看7月7號【6月24日】萊多維亞人給‘管理委員

會’的信第四頁)。

全世界上，從來各政黨是由各地方的組織集合而成的，這些地方的組織由一個中心機關統一起來。但是，俄國的取消派和萊多維亞的取消派在1912年却作了一個大發明。——從此以後可以由“各中心機關、組織利政派”來建立政黨了。

根據萊多維亞取消派最新的選舉幾何學，屬於這十一個組織上的中心機關、組織和政派的：第一是‘組織委員會’第二是那些組成這個‘組織委員會’的六個政派或組織或中心機關。在萊多維亞人底信中這樣說道：“從第二項到第七項都是組成‘組織委員會’的”。

這樣一來，幾個取消着黨的智識份子集團，就可以得到三重的選舉權，正如享受腐敗俸祿的貴族一樣：

(1) ‘高加索省委員會’——空虛的組織：

(2) ‘高加索省委員會’——以巴黎的呼聲為其代表，雖然呼聲沒有從高加索得到固定的委任狀：

(3) ‘高加索省委員會’——以“組織委員會”為其代表。

我們斷定說，俄國工人將以憤激和蔑視的態度，去推翻關於討論雙重選舉名單這個問題的思想，就是說，關於取消派和國外幾個小集團共同引起分裂的企圖，尤其是因為這些集團只是一些破壞組織的智識份子。

我們絕對斷言：在最近半年中，無論那一個反黨的國外集團，都絕對沒有從國內某個組織方面得到委任狀，去辦理自己的機關報或公佈自己的宣言。萊多維亞人想對‘管理委員會’證明相反的事情；既是如此，那麼讓他們在俄國刊物上至少指出一個在8月4號(7月22日)以前的這樣的委任狀來。

社會民主黨人呼聲，不是什麼俄國某個組織底機關報。託洛茨

基在維也納出版的真理，也不是什麼俄國某個組織底機關報。3年以前，真理會為烏克蘭的‘斯皮爾卡’（南俄）（103）底機關報，可是，‘斯皮爾卡’老早就已經把自己的委任狀取消了。

無論‘前進派’，無論普列漢諾夫，無論“護黨的布爾塞維克”（104），都沒有出版任何一種充當俄國某個組織機關報的報紙。

援引實際上不存在的集團，是十分容易的；登載“同情的”通訊，也是不難的。——但是，要至少在半年內辦理在俄國工作的組織底機關報，就必須有經常的聯繫，必須得到當地工人羣衆充分的信任，必須有策略見解底一致，——所有這些，只有在長期的共同工作之後，才能做到。而幾個國外小集團，即被萊多維亞的和‘猶太工人同盟’的破壞組織的人所發動起來反黨的小集團，就沒有具備這些東西。

關於 P. P. S.* 我們簡單說幾句話。牠不是社會民主主義的組織。牠從來不屬於‘社會民主黨’。吸收牠的根據只有一個，這就是：牠“答應”成爲社會民主主義的組織和答應附和取消派！——這一點在破壞組織和愛好分裂的人看來，當然就夠了！如果要吸收 P. P. S. 來共同討論問題，那末，何以同時不吸收參加國會選舉的社會革命黨人、西翁派社會黨人、‘萊多維亞社會革命黨人聯盟’及諸如此類的“派別”呢？

第三國會中的社會民主黨黨團

‘管理委員會’把國外各小集團列爲組織上的中心機關，而不邀請國會中的社會民主黨黨團。這是料想不到的，但這是事實。俄國工人甚願知道，託洛茨基及其同伴，如何使我們國外的同志們陷於迷

* 即‘波蘭社會黨’。（編者）

途。萊多維亞人在其7月7號給‘管理委員會’的信中寫道：

“至於國會中的社會民主黨黨團，那末，牠是不能做關於選舉運動之物質幫助問題上的中間人的，因為國會的常會快要完結，而國會黨團自然同時就失掉牠自己的代表資格了”（該信第2頁）

這段話不是有意欺騙，便是政治上無限的愚昧。這種愚昧充分明白地表明不律塞爾的萊多維亞人關於俄國選舉的情形知道到什麼程度。

上述這封信是在7月7號（6月24日）發的。6月22號（9日），第三國會已被正式宣佈無定期的閉會，——而一切議員，社會民主黨人也在內，還是保留着自己的代表資格。這些社會民主黨人至今還是國會議員，——俄國每個有常識的工人都知道這一點。但是，在國外誣蔑黨的份子，却不知道這一點。

第三國會中的社會民主黨黨團團員，恰恰就是俄國唯一公開的社會民主黨員，他們在國內到處都是構成唯一正式的組織。

一切取消派都仇恨這個黨團。取消派底報章（我們的曙光）謾罵牠和中傷牠，一切國外的破壞組織的人都誹謗牠。爲什麼？因爲素來以孟塞維克護黨派（105）佔優勢的黨團底大多數，從來就堅決地反對取消派，而且會幫助黨把彼得堡的取消派弄得完全不能發生害處。

在“Vorwär's”中的匿名者和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底實況這本小冊子中，我們公佈了一個重要的事實。誰也沒有能夠說出半句話來反對這個事實。經常在取消派報紙中做事的只有兩個黨團團員。而八個黨團團員都是經常在反取消派的報紙中做事的（105）。

萊多維亞人也好，託洛茨基也好，都向‘管理委員會’提議，把這個保存了一致的全俄唯一的團體，從這次會議中排除出去！——就算萊多維亞人陷入了迷途，在7月7號（6月24日）不知道俄國一切工人

所明白知道的事情，那麼，爲什麼他們直到8月4號（7月22日），就是說，經過整個月之後，還不費力去改正自己的錯誤呢？有些錯誤對於犯錯誤的人是十分有益的。

欺騙了‘管理委員會’的萊多維亞人和取消派，其用意就在於：違背國內大多數黨員底意志，違背國會中大多數社會民主黨黨團團員底意志，借助於幾個空虛的國外小集團底聯盟，來提出取消派的候選人，並且用欺騙方法來取得德國工人底金錢。——長篇言論（萊多維亞人、猶太工人同盟派、託洛茨基及其同伴底長篇言論）底要旨，就是這樣。

但這個欺騙是一定會受處分的。

關於黨底影響與取消派底影響之比

較的可以正式審查的材料

一切懂道理的人都懂得，關於那些彷彿似的同情於取消派的“秘密”組織的空談，不值得絲毫的相信。

我們斷言，取消派在俄國的一切組織，都是空虛的。

凡自己沒有得到關於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內部實況的正確消息的人，難以辨別是非。但是，如果他能根據文件去找真理，審查這些文件底內容而不相信口頭上的話，那末他也可以辨別是非。第一個可以拿來審查而爲大家所知道的事實，我們已經引出了，——這就是取消派和反取消派在社會民主黨底國會黨團中所佔的力量之對比。

但是，在取消派和黨作了半年鬥爭以後，現在又有下列各種完全客觀的和更可以使人相信的事實。

萊多維亞人在其7月7號（6月24日）的信中（第五頁和第6頁）

談到彼得堡各種公開的馬克思主義的報紙。他們指出活事和尼瓦呼聲，這些報紙實行孟塞維主義（社會民主黨人呼聲）底路線並將自己和明星及彼得堡的真理（不要把他和託洛茨基在維也納辦的取消派的真理混爲一談）對立起來；據萊多維亞人說，後兩種報都“在列甯派掌握之下和領導之下”。

就算這種說法是不安當的吧，但在這裏，萊多維亞人畢竟是無意地舉出了一件反對取消派的嚴重事實。

如果“公開的黨”，僅僅是取消派底自由主義的空談，那麼，在國會中和刊物上的公開活動，便是馬克思主義宣傳底主要活動了。在此地，而且只在此地，才可以找出一些在客觀上證明取消派力量和反取消派力量的事實來。

除掉萊多維亞人所指出的以外，就沒有其他任何全俄的政治的機關報了。取消派有活事和尼瓦呼聲，反取消派有明星，後來還有尼瓦明星和（彼得堡的）真理。在俄國，無論在刊物上，無論在社會的羣衆舞台上，都沒有任何其他的思潮和政派；萊多維亞人所指出的一切國外的集團，——完全等於零。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兩個思潮半年來活動底結果。

在這半年當中（1912年1月到6月），俄國一切政黨開始了而且已經結束了準備選舉底工作。現在距選舉的期限，只有6個或8個星期了。選舉名單多半已經定好了。恰恰根據這半年來的準備，選舉底結局，事實上已經預先決定了。

贊成取消派的，是萊多維亞人所列舉的第一至第七“各項”（‘組織委員會’，‘猶太工人同盟’，‘萊多維亞社會民主黨’，呼聲派，維也納的真理派，‘高加索省委員會’，前進派），贊成反取消派的，是中央委員會，牠統一了俄國的各個組織，就是說，在俄國活動的各個組織

（據取消派說，是清一色的“列甯派”）

現在我們來看，這兩派各做了什麼事情。

取消派從1912年1月14號（1日）至7月13號（6月30日）在彼得堡出版了16期活事報和五期尼瓦呼聲報，總共出了21期。

反取消派在半年內出版了33期明星報，14期尼瓦明星報和53期真理報，總共出了100期。

21與100之比。

在俄國，取消派和黨的力量底對比，便是如此。關於報紙的材料是公開的材料；大家都可以拿來審查和加以證實。

報紙底份數是怎樣呢？萊多維亞人說，取消派出版了三萬份報紙。就假定這不是誇大的吧。有人對‘管理委員會’說過（哈薩同志及管理委員會其他委員所見過的人所說的）：反取消派的報紙有6萬份。這個對比數得出取消派底影響和黨底影響的比較：1與10之比。

如果關於報紙份數的消息沒有公佈過，因此看去也許是誇大的，那麼，其他更重要的更可以使人相信的材料，是公佈了的。

這就是關於取消派和黨兩者與俄國工人羣衆之聯繫的材料。

關於取消派和黨兩者與俄國工人羣衆之

聯繫的公開的可以審查的材料

關於報紙出版的期數和份數的材料，還沒有充分證明黨之勝於取消派。自由主義的智識份子底小集團也可以出版報紙。一切“親近工人的”報紙，或者甚至帶急進派色彩的自由主義的報紙，總可以在俄國找到許多讀者。除掉工人以外，自由派以及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也會閱讀這些報紙。

可是，却有一些更簡單明瞭的事實證明取消派和黨兩者與俄國工人羣衆的聯繫。

這就是關於出版工人刊物的經費底統計。

關於募集工人刊物出版費的鼓動，早已在俄國工人中間進行了。大家懂得，沒有這樣的報紙，則參加選舉差不多是虛空的。報紙是選舉運動底主要武器，是在羣衆中作馬克思主義鼓動的主要工具。

但是，從什麼地方可以得到報紙底經費呢？

應當在工人中去募捐。這些捐款即組成基本金，而且證明各個集團底聯繫之力量。這些捐款表示出：各個集團底威信，工人方面對牠們的信仰，牠們對無產階級羣衆之真正的影響。

1912年初，這種工人報紙捐，便在彼得堡開始了。從1月14號（1日）至7月13號（6月30日）這半年的期限已經足夠了。關於捐款的統計，公佈於上述一切的（取消派的和反取消派的）報紙上。

根據半年來的這些材料而得出的結論，是一個最好的材料，是對取消派和黨兩者在俄國力量對比問題之公開的、完滿的、客觀的、最後的回答。因此，我們曾在信的附件內引舉了半年來上述各工人日報捐款報告書底全部譯文。

這裏，我們只是把總結表引舉出來。

在半年當中，在反取消派的報紙上公佈的，有關於在工人團體中所進行的504次捐款的報告，就是說，關於這樣一些捐款的報告，在報告這些捐款的時候是把進行了募捐的工人團體底名稱直接引舉出來的。這些捐款在50個俄國城市和工業集鎮裏面募集的。

在同一半年中，從1912年1月14號（1日）至7月13號（6月30日），在取消派的報紙上公佈的，有關於在工人團體中間進行15次捐款的報告。這些捐款是在五個俄國城市裏面募集的。

下面便是這種確切的總結：

從1912年1月14號（1日）至7月13號（6月30日）工人團體給工人日報的捐款次數：

在取消派的報紙上	在反取消派的報紙上
1月.....0	14
2月.....0	18
3月.....7	76
4月.....8	227
5月.....0	135
6月.....0	34
15	504

同上：俄國主要區域

<u>彼得堡</u>10	415
<u>南 俄</u> 1	51
<u>莫斯科</u> 2	13
<u>俄國北部和西部</u> 1	12
<u>烏拉爾和窩瓦河流域</u> 0	6
<u>高加索、西伯利亞、芬蘭</u> 1	7
15	504

* 無論取消派怎樣散佈謠言，可是，恰恰就是這些捐款（共1萬2千馬克以上）和德國同志們以前的捐助，組成了我們俄國社會民主黨報底基金。在正文上所提到的半年來各種社會民主黨報底一切捐款數目一覽表，已經送交‘管理委員會’，‘監察委員會’和培培爾了。

在半年的反黨鬥爭之後，取消派完全被擊潰了。

在俄國社會民主主義的工人運動中，取消派完全等於零。上述的這種人人皆可拿來審查的統計，就可以證明這一點。無論託洛茨基和取消派怎樣自誇，而整整半年來在俄國所公佈的事實，却是如此。

應當指出，託洛茨基是活事報底同事。其次，在7月7號（6月24日）的信中，萊多維亞人自己也承認，所有六個集團（託洛茨基，孟塞維克的呼聲，活事報和尼瓦呼聲報底指導者等，都在其內）組成所謂‘組織委員會’。因此，我們的統計證明：在俄國社會民主主義的工人運動中，不但取消派完全等於零，而且他們的一切神氣活現的國外朋友們也完全等於零。

站在他們方面的，平均說起來，在俄國每13個工人團體中只有一個

在這裏，我們同時還要註明彼得堡一切社會民主黨報底地址和出版日期。

取消派：

（1）活事。彼得堡——大莫斯科路16號門牌。第1期出版於1912年2月2號（1月20日），第16期，即最後一期出版於1912年5月11號（4月28日）。（停辦了）。

（2）尼瓦呼聲。彼得堡——可洛哥爾路第3號門牌。第1期出版於1912年6月2號（5月20日）；第5期出版於1912年7月11號（6月28日）（至今，至1912年8月11號（7月29日）還在出版）。

反取消派：

（3）明星。彼得堡——拉司那什路第10號門牌，第14號房間。第1期（第37期）出版於1912年1月19號（6日）；第33期（第69期）出版於1912年5月5號（4月22日）。（停辦了）。

(4) 尼瓦明星。彼得堡——尼古拉也夫路，第33號門牌，第57號房間。第1期出版於1912年3月1號（2月26日）；第2期出版於1912年5月16號（3日）；第14期出版於1912年7月7號（6月24日）。（至今還在出版）。

(5) 真理。彼得堡——尼古拉也夫路，第37號門牌，第18號房間，第1期出版於1912年5月5號（4月22日）；第48期出版於7月13號（6月30日）。（至今還在出版）。

結 論

在最近的國會選舉中，‘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底候選人，將由各地方黨部（不分見解與派別）提出。無論何地，社會民主黨的工人底多數，應將服從多數。

所謂雙重候選名單——簡直是一種謬論，其目的只是恐嚇國外同志和騙取金錢。

要是這十個所謂的“派別”能夠提出十個候選名單來嚇人，並爲了每個名單都到國外去騙錢，那不是更妙了麼。

雙重候選名單是不會有的。取消派如此薄弱，他們完全不能提出第二個候選名單來。我們不和寥寥無幾的叛黨的取消派作任何的談判。無論在俄國的中央委員會，無論各個地方的組織，都沒有認真地把取消派放在眼裏。請看彼得堡最近的事件吧。取消派在尼瓦呼聲（第6期）上傳出消息，說在彼得堡，有人和他們（取消派）開過會，討論如何進行選舉運動。而在8月2號和4號（7月20日和23日），尼瓦明星（第16期）和真理（第61期）都通知過，牠們並沒有派自己的代表去參加會議；此外，有一個參加會議的人在尼瓦明星上聲明過，俄國全國的工人將實行‘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正月代表會議底決議。

他聲明道：

“各種派別底聯合”（指取消派而言）“在社會民主黨選舉運動中是完全不可能的”（尼瓦明星第16期，1912年7月21號（8日）。）

無論世界上任何的金錢上的幫助，都不能替取消派爭得俄國工人底同情。但是，可以用‘管理委員會’底金錢在各地方提出虛構的第二個候選名單，這是不言而喻的。在這種情形之下，當然‘管理委員會’要負提出這種候選名單的責任，因為這種名單實際上將是德國‘管理委員會’底名單。取消派沒有日報，會撥給取消派的金錢，將被他們用來創辦競爭的機關報。這些金錢將被那些已在長期鬥爭中證明自己窮極無聊的人們拿去幹分裂的工作，這些金錢將拿去做路費等等，去組織新黨。如果‘管理委員會’現在想用這個或那個方法去幫助取消派，那末，我們雖然尊重兄弟的德國黨，也不得不向‘國際’去控告。那時候，我們將有證有據地向‘國際’底維也納世界代表大會（106）證明：‘管理委員會’曾決意以金錢的幫助來促進吾黨底分裂，來提出雙重的候選名單，要復活已被擊潰的這一個取消派死屍。如果德國同志們願意幫助‘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他們就應當把金錢交給舊黨底中央委員會，而不應交給組織新黨的人。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啓

‘管理委員會’自從把預定要開的會議取消以後，曾通知我們說：“在大家沒有共同向我們（‘管理委員會’）指出一個為大眾信仰而有全權接受和分配金錢的機關以前，我們不能把金錢交給俄國黨內任何一個集團去進行選舉鬥爭”。

‘管理委員會’這種似是而非的中立態度，實際上就是：因為聽到

幾個國外小集團和取消派底“代表會議”對俄國工黨的壓迫，牠便不肯幫助這個工黨。

爲要補充上面各種意見，我們認爲必須指出以下各點。

現在公開出版的並以馬克思主義爲指南的俄國報紙，是黨底鼓動工作深入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工人羣衆之一種最重要的公開傳聲筒。

在國外出版而在俄國認爲祕密的報紙，按事情底實質講，不能夠獲得上述的那種意義，雖然牠們對於運動之理論上的發揮却有非常重要的原則的意義。大家知道，散居於國外的俄僑小集團如何容易地而且有時候是輕意地創辦這些報紙；這些報紙在這些集團中間過着可憐的生活，幾乎不落到國內的黨員手裏來。因此，按事情底實質講來，不能承認牠們對於俄國黨的生活有比較顯著的意義。

在反取消派的報紙作了半年鬥爭（從1912年1月至6月）之後，取消派唯一的機關報，就是尼瓦呼聲了。這個報紙幾乎不復成爲政治的機關報了；在一個半月當中（從6月至8月中旬），僅僅出版兩期（第6期和第7期）。很明顯的，諸如此類的報紙，如果不從和工人羣衆的密切聯繫去吸取生動的力量，一種也不能對抗警察的追究，而在俄國，這種追究是十分猖獗的，牠反對一切工人的報紙，甚至於還反對許多完全溫和的自由派的報紙。

這樣一些具有大的政治作用和直接迫切意義的工人報紙在現在就是：尼瓦明星週刊和真理日報。這兩種報紙都在彼得堡出版，萊多維亞社會民主黨中我們的政敵却輕視牠們，綽號之爲“列甯派”底機關報。從上面引出的客觀的始終可以公開審查的統計材料中，我們的德國同志們定會明白，這個“列甯派”實際上是包含俄國工人社會民主黨人底絕大多數的。

由此完全明白，何以從取消派及同情他們的大小集團中所傳出的一切消息，沒有絲毫令人相信的價值。這些小集團及和牠們一起的猶太社會民主黨人（猶太工人同盟）與萊多維亞社會民主黨人（他們和俄國的運動完全沒有直接的聯繫）所散佈的一切傳言，說已經召集或者似乎正在召集一切“派別”底全體代表會議等，完全是捏造的。任何這類的代表會議，即使牠真正召集過，在俄國無產階級底鬥爭中也不發生多少重大的作用。所以，用激烈的話來講，我們在這裏所看到的是騙子的行爲。

爲的要吧關於本問題的更好的事實，顯然有重要的政治意義的事實，告訴我們德國黨的同志，在結尾中，我們要從最近一期我們的曙光月刊上阿雪洛德（取消派底領袖之一）底論文中引幾段話出來。

阿雪洛德寫道：

“關於“非政派主義的”社會民主黨的……機關報的念頭，在目前是一種烏託邦，而且是……與黨的政治發展底利益背道而馳的烏託邦……。在我們這裏，組織上已經形成的政派，可以說沒有；代替她們的有各種小組和小團體，其中一部份抱着多少明確的政治上的、策略上的和組織上的見解，而另一部份却動搖到各方面，妨礙第一部份……。黨內爭執底中心點和主要根源就是：一方面，各個黨的集團，對於新的，公開的，社會民主黨的和工人的運動，抱不同的態度；別一方面，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目前政治任務和政治策略方面，有重大的意見分歧。這兩種問題……恰恰在現在變成……特別緊急的、迫切的問題……。俄國社會民主黨之分裂爲兩個主要的營壘，也就是爲着這些問題……。試問（被彼得堡一些工人以及國外許多智識份子）* 所擬定的工人機關報，能否在這兩個對立的營壘間站着中立的地位，而且這樣

的地位在原則上是否容許呢？顯然是不能的……。在黨內這種情形之下，把“非政派主義”，解作爲唯一補救的方法。這無異於……自欺欺人，蒙蔽社會民主黨內的實際情形……。政派的形成和團結，便是贊成黨內改良的人，或者更確切地說，贊成（黨內）* 革命的人之直接義務和迫切事業”。

阿雪洛德在最後幾句話中所說的，顯然是指取消派……。我們只能勸我們的德國黨員同志們，如果從各方面有人將向他們敘述“非政派主義”或非政派主義的代表會議（有取消派參加），那末，辨別是非的好方法，就是要求把上述的阿雪洛德底論文完全翻譯出來，登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報上。那時候就可以得到關於有些傳聞的正確的概念。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機關報：

社會民主黨人編輯部。

1912年8月（7月）

* 括弧內的字句，是列寧加在阿雪洛德底論文上的，在德文上這些字句沒爲括弧，此地的括弧是我們加上去的。（編者）

4 改良派底綱領和革命社會

民主黨人底綱領 (107)

1912年底上半年，俄國的革命高漲，已經顯然表現出來了。據廠主底計算，在5個月內，政治罷工者底數目，已達51萬5千人。中央機關報第27期上所完全登載出來的一個特別重要的文件，即彼得堡工人底5月宣言 (97)，足以證明：這些罷工者底口號怎樣，他們的要求怎樣，他們的示威運動，羣衆大會等等底政治內容怎樣。

彼得堡工人在這些值得紀念的日子所提出的口號，不是改良主義的口號，而是革命社會民主黨底口號：立憲會議、8小時工作制、沒收地主土地、推翻沙皇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國。

在土耳其斯坦、波羅的海艦隊、黑海等處兵士和水手底暴動及暴動的企圖(108)，給了我們以一個新的客觀的證據：證明在俄國，自從反革命多年猖獗以及工人運動多年沉寂以後，又開始新的革命高漲了。

與這個高漲同時發生的，就是第四國會底選舉，此時一切政黨，一切政派，會必須這樣或那樣給政治局面以總的估計。所以，如果我們想認真分析我們的任務，認為這是工人階級底任務而不是各小集團善長的願望，如果我們想以馬克思主義的精神來審查綱領和政治主張，把牠們和羣衆鬥爭底事實及該社會一切階級底發動作一比較，那末，我們就應當恰恰在羣衆這個革命高漲底試金石上，也來試驗、

考察各種不同的選舉綱領。因為，在社會民主黨看來，選舉不是特別的政治行動，不是以各種信口的答應或聲明為代價來攫取議席的行動，而僅僅是一種為着基本要求和覺悟無產階級政治宇宙觀基礎而作鼓動的特別的藉口。

一切政府黨（由黑幫派至古契可夫）底綱領和政治主張，不引起任何的懷疑。牠們的反革命性是顯而易見的。這些政黨不但在工人階級和農民中，而且甚至在資產階級底廣大階層中，都沒有任何的多少嚴重的援助，這是大家所知道的。資產階級底廣大階層幾乎完全離開十月黨人了。

各個自由派資產階級政黨底綱領和政治主張，一部份幾乎正式公佈了（回教團底綱領），一部份則已從“大的”政治報紙中完全確切地知道（“進步黨人”、立憲民主黨人底綱領）。胡說八道的立憲民主黨人格列德斯枯爾，在其聲明中（他的聲明轉載於言論上，由此而落到馬克思主義的刊物上），獨一無二地說出這一切綱領和政治主張底實質。

“公開否認俄國新的革命之必要”，這就是格列德斯枯爾先生對本人觀點的說明（參攷社會民主黨人第27期第3頁），而且他又拿自由主義（以立憲民主黨人為首的）底實在的綱領和革命者對立起來，這個綱領就是：“所需要的，僅僅是鐵靜的、堅毅的和自信的立憲主義的工作”。

我們所以着重指出實在的綱領這幾個字，是因為在俄國，也和其他一切資產階級國家一樣，大多數的綱領是裝樣的綱領。

問題底實質，恰恰就是格列德斯枯爾先生所承認的（在罕見的真情洩露的時候所承認的）這一點。自由主義君主派的資產階級，反對新的革命而僅僅主張立憲改良。

社會民主黨澈底地主張新的革命之“必要”，宣傳這個革命。資產階級民主派（民粹派）動搖地主張新的革命之“必要”，宣傳這個革命。羣衆鬥爭底高漲開始了。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正在努力擴大地、鞏固地、幫助牠發展到更高的階段——革命底階段。而改良派呢，却把高漲僅僅看作是“活躍”，他們的政策，是求得立憲主義讓步、求得立憲主義改良的一種政策。因此，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就是在俄國歷史底這一個“階段”上，也已進到影響“人民”，影響羣衆的鬥爭了。誰也不能預見鬥爭底結局；但誰也不能懷疑，在這個鬥爭中，‘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應佔怎樣的地位。

這樣，而且只有這樣，才可以進而估計黨底選舉綱領和取消派的代表會議（109）所選出的‘組織委員會’最近發表的那個選舉綱領。

正月代表會議之後中央委員會所公佈的黨底選舉綱領，是在4月和5月的事變以前擬定的。這些事變證實了該綱領底正確性。全部綱領，都貫徹着這一個思想：批評現代俄國實行立憲主義改良之無希望和空想；宣傳革命。綱領底口號恰恰是這樣提出的，就是最鮮明地表示出革命的任務，並使人們不能把革命任務和關於立憲主義改良的約言混爲一談。黨底綱領是這樣的，即牠是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對數十萬政治罷工者和數百萬農民軍隊先進份子的直接宣言，向他們說明暴動底任務。除了5月罷工和6、7月的軍事暴動企圖對黨的解釋工作所給的直接響應而外，革命的政黨甚至於不能夢想到更好的對自己綱領的審查了，不能夢想到更好的對自己綱領之生活上的證實了。

試看取消派底綱領吧。該綱領之取消主義的實質，被託洛茨基底革命辭句精巧地掩蔽着。這種掩蔽有時可以弄昏幼稚而全無經驗的人們底眼光，而且甚至可以把牠當作取消派和黨的“調和”。但是，只

要稍微注意一下，這種自欺馬上就被消滅。

取消派底綱領，寫於5月罷工和夏季暴動企圖以後。爲要獲得對這個綱領實質問題的切實的實在的回答，我們首先就要問：該綱領對於這些罷工和暴動企圖的估計會是怎樣。

“經濟的高漲”……“無產階級用其罷工運動之增長而指出了新的社會的高漲之行將到來”……“無產階級舉行雄壯的4月運動要求結社自由”，——取消派綱領關於4,5月罷工所說的一切話，就是如此。

然而這是假話！這是荒謬絕倫地曲解事實！此地把主要的東西忽略了，即是把政治罷工底革命性質忽略了，這種罷工，恰恰不是趨於奪取立憲主義改良底一種，而是趨於推翻政府，就是說，趨於革命。

在秘密的、革命的、充滿着“赤色”辭句的宣言中，如何能夠說出了這樣的假話呢？這是本來應當如此的，因爲自由派和取消派是如此觀察問題的。在罷工中，他們看見他們所願意看見的東西，就是爭取立憲主義的改良。他們看不見他們所不願意看見的東西，就是革命的高漲。我們自由派願意爲改良而鬥爭，不願爲革命而鬥爭——這就是在取消派底假話中所表現出來的階級立場底真情。

關於暴動底企圖，他們說道：“軍營中的兵士……被暴力、侮辱和飢餓弄到絕望的抗議底爆發了，而然後又被槍彈和絞索鎮壓下去了……”

這是自由派的估計。我們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認爲暴動企圖就是羣衆暴動底開始，這個開始雖然是不中肯的、不及時的、不正確的，但是我們知道，僅僅在失利的暴動經驗中，羣衆才學習順利的暴動，——猶之乎俄國工人由1901年到1904年種種失利的而且有時特別不中肯的政治罷工中，學會了1905年10月的中肯的罷工一樣。我們說：最受軍營壓迫的工農開始暴動了。由此得出直接的結論：應當對

他們解釋，爲什麼和應當怎樣去準備順利的暴動。

自由派底判斷是不同的。他們說：把兵士“弄到”“絕望的抗議底爆發”了。在自由派看來，暴動兵士不是革命底主體，不是暴動羣衆底先聲，而是政府作惡底對象（“弄到絕望”），作爲表明這個作惡的對象。

自由派說：你們看，我們的政府竟把兵士“弄到絕望”，然後又用槍彈去鎮壓他們，我們的政府是如何的惡劣（結論就是：如果我們自由派得了政權，就不會有兵士暴動了）。

社會民主黨人說：你們看，甚至被軍營訓練所束縛的兵士和水手，都開始暴動起來，而且從不好的暴動中學習順利的暴動，那末，在深刻而廣大的羣衆中，革命精力是如何地成熟着。

你們看：取消派已經“解釋了”（元老院式的解釋）（110）俄國春天和夏天的革命高漲。

接着他們又來“解釋”吾黨底綱領。

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底綱領上說：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底最近的政治任務，就是推倒沙皇的專制制度而以民主共和制度代替之；民主共和制度底憲法要保障：（1）國民底專制……等等”——往後就列舉各種“自由”和“權利”。

看來這段話是不能不了解的。“最近的”任務，就是推倒專制制度而以共和制度代替之，共和制度要保障各種自由。

取消派把這段話完全修改了。在他們的綱領上說道：

“……社會民主黨號召人民爲民主共和制度而鬥爭……”。

……只有在革命底結果，人民才能實現這個目標，社會民主黨向着這個目標前進，而在現在的選舉運動中（聽呵！），却號

召勞動羣衆團結於下列各個迫切要求底周圍：(1) 在選舉第四國會時實行普遍的……選舉權……”等等。

社會革命黨的取消派璧塞浩諾夫先生，在1906年秋天着手創立“公開黨”(而且幾乎要創立成功了……不過被警察所妨礙而被捉到牢獄裏去了)時寫道：共和制度是一個“遙遠的前途”，“關於共和制度的問題，要持極端慎重的態度”，現時迫切的要求，就是改良。

但是，這位社會革命黨的取消派是幼稚的、簡單的、粗魯的，並不說甚麼曖昧的話。難道“西歐的”機會主義者底行為是這樣嗎？不，他們要狡猾些、巧妙些、外交些……。

他們不放棄共和制度的口號，——這是怎樣的一種毀謗呀！他們僅僅是相當地“解釋”牠，根據着一切庸人所明白的理由來解釋牠。革命會不會發生，這還是一個問題，——庸人只是簡單地說着，而託洛茨基則在我們的曙光上(第5期, 21頁)以學者口吻來重複這句話。共和制度“只有在革命之後”，而“在現在的選舉運動中”，立憲主義的改良却是“迫切的”要求！

一切事情都弄妥了：共和制度既被承認，又被推到遙遙無期的將來。革命、革命、革命的話，說了一大套，——而事實上，“在現在的選舉運動中”(全部綱領僅僅為這一個現在的運動而寫的！)，却把改良要求提出來作為“迫切的”要求。

對了，對了，在取消派的代表會議上，是有過一些大的“外交專家”的……這些專家未免太無聊了！如果小組的外交家受他們麻醉，如果“一個調和主義的土包子”被他們迷惑，那末，馬克思主義者却要向他們來作另外的談話了。

庸人所認為滿足的，就是那種無疑的、神聖的和空洞的真理：革命會不會發生，不能預先知道。馬克思主義者却不！此為滿足；他說：

我們和一切社會民主黨的工人底宣傳，就是決定革命會不會發生的標準之一。數十萬政治罷工者和各部軍隊先進份子都在問我們，問我們的黨：他們的目標是什麼，爲什麼要暴動，要達到什麼，是把已經開始的高漲擴大到革命，還是使牠去爲改良而鬥爭？

革命的社會民主黨回答了這些問題；這些問題比庸人的託洛茨基派的“袖手推測”——說革命會不會發生，誰知道牠？——要稍爲有興趣些，重要些。

我們的回答就是：批評立憲改良之空想性，說明對這些改良的希望之虛偽性，用一切方法各方面幫助革命的高漲，爲此而利用選舉運動。革命會不會發生，——不僅依靠我們。但是，我們將幹完自己的事業，而這個事業是永遠不會落空的。這個事業將民主主義和無產階級獨立性底種子，深深地種在羣衆裏面，而這些種子一定會發芽，或者在明天的民主革命中，或者在後天的社會主義革命中。

誰個向羣衆鼓吹自己的卑鄙的、智識份子的、猶太工人同盟式託洛茨基式的懷疑主義：“革命會不會發生，不得而知，而放在“日程”上的却是改良”，——那末，誰就在現在已經誘惑羣衆，向羣衆鼓吹自由主義的烏託邦。

現成的、實在的、“現在的”政治環境是這樣：五十萬工人實行革命的罷工，農民軍隊底先進份子槍殺貴族軍官。他們不根據這個環境去進行選舉運動，而以自己那種彷彿是“歐洲人的”（在俄國，他們就是這樣的歐洲人，這樣的歐洲人就是取消派！）“國會主義的”理由，來抹煞這個實在的環境（其中“歐洲的”東西很少，而有很多“中國的”，即民主革命的東西）；並且用幾句毫不負責的話來抹煞這個環境的時候，把改良主義的運動，作爲真正的選舉運動*！

社會民主黨之所以需要第四國會的選舉綱領，爲的是要無論在

選舉底機會中，無論在選舉底事件中，無論在關於選舉的爭論中，再來向羣衆解釋革命之必要性、迫切性、必然性。

他們取消派之所以需要綱領，却是“爲的”選舉，就是說，爲的要很客氣地抹煞關於革命的理由，把牠當作是不可捉摸的可能性之一，而把選舉運動，作爲“真正的”理由，以便列舉立憲主義的改良。

社會民主黨想利用選舉，以便再三推動羣衆去想到革命底必要，想到正是已經開始的革命高漲。因此，社會民主黨底綱領，簡單明瞭地對第四國會底選舉人說不是立憲主義的改良，而是共和制度；不是改良主義，而是革命。

取消派利用第四國會底選舉，以便鼓吹立憲的改良，減弱關於革命的念頭。爲着這一點，他們把兵士暴動形容爲“絕望的抗議底爆發”（說人們把兵士“弄到”這個地步），而不把牠當作是羣衆暴動底開始，這個開始將要生長起來還是凋零下去，也要看俄國一切社會民主派的工人，是否現在就用一切力量，用一切精力，用一切熱忱去援助牠爲轉移。

爲了這一點，他們把五月的罷工“解釋”爲不是革命的，而是改良主義的。

爲了這一點，他們把黨的綱領加以“解釋”，不把建立保障自由的共和制度作爲“最近的”任務，認爲“在現在的選舉運動中，關於各種自由的要求就是迫切的要求（不要開玩笑，這是爲着第四國會的！）在俄國生活中，舊有的中區遺風，竟如此之多！在沙皇制度

*俄文的“Настоящее”這個字眼有兩個意思，可解作“現在的”，亦可解作“真正的”；列寧這裏是說俏皮話，把取消派所謂“現在的選舉運動”這句話譯成“真正的選舉運動”。——（校者）

中，古老的中國氣味如此之多！在俄國取消派中，古老的中國氣味如此之多！取消派竟企圖把國會鬥爭和改良主義底“禮儀”，陳設到上有普利什克維赤輩和特列興可夫之流、下有羣衆底革命企圖的環境中去。智識份子企圖拿出麥克唐納爾和壽勒斯、比梭拉梯和培恩斯坦、可爾伯和佛蘭克……諸人底介紹信，來防禦赫伏斯多夫輩及馬卡洛夫輩底攻擊；在他們這種企圖中，古老的中國習氣，如此之多！

在取消派的代表會議上，託洛茨基曾假裝替取消派的見解與黨的見解作外交式的“調和”，而這種調和，實際上是什麼也不能“調和”的（111）。這種調和，並不消滅那個決定現時俄國全部社會政治環境的最大的政治事實。這就是改良主義綱領與革命社會民主黨綱領間的鬥爭；這就是，一方面，以黨的自由派的領袖爲代表的資產階級，起來反對俄國新革命底必要和擁護純粹立憲主義“工作”底道路；而另一方面，與之對立的，却是幾十萬無產階級起來舉行革命的罷工，號召羣衆去作真正的爭取自由的鬥爭。

一面向改良主義者點頭，一面向革命的社會民主黨點頭，這並不就是消滅這個客觀的政治事實，這並不就是減弱、甚至絲毫地減弱牠的力量和重量。想來排解由這個事實所產生的意見分歧的各種善良的用意（即使這種用意真正是完全“善良的”和誠懇的），也無力來改變各個由反革命底全部環境所產生的和勢不兩立的政治趨勢。

無產階級已經舉着自己的革命社會民主黨的旗幟而興起了，而且她在第四屆反動國會底前夜，決不會在自由派面前拋棄這面旗幟，決不會爲着改良主義者底便利而捲起這面旗幟，決不同意爲着小組外交家底理由而削弱或模糊自己的綱領。

革命社會民主黨底綱領反對改良主義底綱領——5月罷工曾經就是在這個標誌之下進行的；‘俄國社會民主黨’現在又在這個標

誌之下參加地主牧師國會的選舉；而將來黨在這個國會中以及在廣大民衆中的全部工作，也將在這個標誌之下去進行。

1912年11月

5 論高喊統一而實則破壞

統一的行爲(112)

現代工人運動底問題，在許多關係上，都是一些麻煩問題，——尤其是對於這個動運底昨天（就是說，歷史上剛過去的階段）的代表。屬於這類問題的，首先就是關於所謂政派主義、分裂等等的問題。參加工人運動的智識份子，往往發出憤激的、燥急的、幾乎瘋狂的請求，說不要提起這些麻煩問題。對於那些經歷過馬克思主義者中間各派長期鬥爭（例如，從1900年至1901年起）的人，關於這些麻煩問題的許多議論，自然無庸贅述了。

但是，參加過馬克思主義者中間14年的鬥爭（何況是189年的鬥爭，如果從“經濟主義”最初的徵兆表現時算起）的人，現在已經不很多了。現在極大多數補充馬克思主義隊伍的工人，對於過去的鬥爭，不是記不得，便是完全不知道。對於這些極大多數的工人，麻煩問題却有特別大的興趣（我們的雜誌底調查表，也足以證明這一點（113））。所以，我們打算把託洛茨基底“非政派主義的工人雜誌”（鬥爭）似乎是第一次（對於新進的工人，的確是第一次）提出來的這些問題講一下。

1. 論“政派主義”

託洛茨基稱自己的新雜誌為“非政派主義的”。他把這幾個字放

在廣告中的第一位，無論在鬥爭本身以及取消派的北方工人報（在鬥爭未出版以前，該報登載了託洛茨基關於鬥爭的論文）底社論中，他都把這幾個字着重指出。

什麼叫做“非政派主義”呢？

託洛茨基底“工人雜誌”是託洛茨基爲着工人而出版的雜誌，因爲在該雜誌中，絲毫沒有工人的啓發性，也沒有和工人組織發生任何聯繫。託洛茨基爲求通俗起見，就在其爲工人出版的雜誌上，對讀者解釋“疆土”、“因素”等等名詞。

這是很好的。但是，爲甚麼不替工人解釋“非政派主義”這個名詞呢？難道牠比疆土和因素這些名詞更明瞭些嗎？

不是的。問題不在於此。問題就在於，政派主義最壞的餘孽底最壞的代表，用“非政派主義”這個假商標，實行欺騙新進的工人。這一點是值得說明的。

政派主義是一個一定的歷史時代中社會民主黨底主要特點。究竟是什麼時代呢？即1903年到1911年。

爲的要最明白地說明政派主義底實質何在，至少應當記起1906年到1907年底具體條件。當時黨是一致的，沒有分裂，但是有了政派主義，就是說，事實上在一致的黨內有了兩個政派，兩個事實上分離的組織。下層的工人組織是一致的，但是，對於每個嚴重的問題，兩個政派規定了兩個策略；在一致的工人組織中，擁護這些策略的人們彼此互相爭論（例如，在1906年討論國會的——或立憲民主黨的——內閣這個口號的時候；或是在1907年選舉倫敦代表大會代表的時候），問題會根據大多數的意見而解決了：一個政派在一致的斯託阿立姆代表大會上（1906年）失敗了，另一個政派在一致的倫敦代表大會上（1907年）失敗了。

這是俄國有組織的馬克思主義底歷史中大家知道的事實。

一回憶到這些大家知道的事實，就可以看出託洛茨基所散佈的荒謬的假話。

從1912年起，已經2年多了，在俄國有組織的馬克思主義者當中，沒有政派主義，在一致的組織中、在一致的代表會議和代表大會中，沒有關於策略的爭論。所有的就是黨與取消派之間的完全破裂，黨在1913年1月正式申明過，取消派不屬於黨。託洛茨基往往稱這種情形爲“分裂”，關於這個名稱我們在下面將特別講到。但是，“政派主義”這個名詞是與真情不相符合的，這是毫無疑義的事實。

我們已經說過了，這個名詞是一種重複，無批評態度的、不合理的、無意思的重複，將昨天，就是說，將已往時代中曾經是正確的話，重複一遍而已。當託洛茨基對我們說到“政派鬥爭底紛亂狀態”時（參看第1期第6、7頁及其他許多地方），即刻可以明白，他所說的到底是那一種的已往的東西。

試以俄國青年工人（在俄國有組織的馬克思主義者當中，十分之九是青年工人）底觀點去觀察現在的實情吧。他看到在工人運動中有各種見解或思潮底三個普遍的表現：“真理派”（該派所辦的真理報每期出版四萬份），“取消派”（一萬五千份）和左的民粹派*（一萬份）。關於報紙份數的材料，可以使讀者明白某種鼓吹底普遍性。

試問這裏與“紛亂狀態”有什麼關係呢？託洛茨基好講響亮而空洞的話，——這是大家知道的，但是，“紛亂”這兩個字，不僅是空話，此外又是把過去時代底國外關係，搬運（正確些說，徒勞無益地企圖搬運）到現時代底俄國環境中來。問題底實質就在這裏。

* 即社會革命黨人。——（編者）

在馬克思主義者和民粹派的鬥爭中，並沒有任何的“紛亂狀態”。我想甚至託洛茨基也不敢做出相反的斷語。馬克思主義者和民粹派的鬥爭，已經進行了30多年之久，一有馬克思主義，就有這個鬥爭。這個鬥爭底原因，就是兩個不同的階級——無產階級和農民——之利益和觀點底根本分歧。如果什麼地方真有“紛亂狀態”，那末，僅僅是在不憐這個鬥爭原因的怪人底頭腦中。

還剩下了什麼呢？馬克思主義者和取消派的鬥爭是“紛亂狀態”嗎？但是，這也是不對的，因為與思潮作鬥爭，與全黨所承認為思潮並從1903年起就被全黨所痛斥的思潮作鬥爭，不能稱為紛亂狀態。凡關心俄國馬克思主義史的人就知道，取消主義，甚至按其領袖和參加人底成份來說，都與“孟塞維主義”（1903年到1908年）和“經濟主義”（1894年到1903年）有不可分離的最密切的聯繫。這就是說，在這裏幾乎有二十年的歷史，把自己黨底歷史，當作“紛亂狀態”來看待，這是無可原諒的愚蠢見解。

但是，試以巴黎派或維也納派底觀點去考察現在的情形吧，那末什麼事情馬上都改變了。除了“真理派”和“取消派”之外，至少還有五個俄國的“政派”，就是說，願把自己列入同一個社會民主黨的個別的集團：託洛茨基底集團，前進底兩個集團，“布爾塞維克護黨派”和“孟塞維克護黨派”（114）。在巴黎和維也納（我拿兩個特別大的中心做例子），一切馬克思主義者都明白地知道這一點。

在這裏，在某種意思上，託洛茨基底話是對的：這的確是政派主義，這真正是紛亂狀態！

“政派主義”，就是說，名義上的一致（在口頭上，大家都是在一個黨內）和事實上的分散（在事實上，一切集團都是獨立的，彼此進行談判和協商，如獨立的列強一樣）。

“紛亂狀態”，就是說，（1）關於這些政派和俄國工人運動的聯繫，沒有客觀的可以審查的材料，（2）沒有材料足以判斷這些政派之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本來面目。試拿足足兩年的時期（1912年和1913年）來說吧。大家知道，這個時期是工人運動活躍和高漲底年代，此時任何多少類似羣衆的（而在政治上，僅僅是羣衆的，才被人顧到）思潮或派別，會不能不表現於第四國會底選舉上，表現於罷工運動中，表現於公開的報紙上，表現於工會中，表現於保險運動上等等。在這整整兩年的時期內，這五個國外政派中，無論那一個，都絕對沒有在俄國羣衆的工人運動底上述任何一個表現中，顯出什麼顯著的東西來！

這是每個人都容易審查的事實。

這個事實證明，我們說託洛茨基是個政派主義最壞的餘孽底代表，這話是對的。

凡是知道一些俄國工人運動狀況的人，顯然知道，口頭上爲非政派主義的託洛茨基，就是“託洛茨基政派”底代表，此地有政派主義，因爲政派主義底兩個重要特徵都具備着：（1）名義上承認一致，（2）事實上存在獨立派別。此地有政派主義底餘孽，因爲在和俄國羣衆的工人運動發生聯繫的意思上，這裏不能發現什麼嚴重的東西。

最後，此地有式樣最壞的政派主義，因爲沒有任何思想上政治上的明確性。無論對於真理派（甚至我們的勁敵馬爾託夫也承認，我們有“團結性和紀律”，我們都服從大家知道的關於一切問題的正式決定），無論對於取消派（他們——至少是他們當中最著名的人們有十分明確的，恰恰是自由主義的，而不是馬克思主義的面目），都不能說他們沒有這種明確性。

不能說，有些政派，即類似託洛茨基底政派而只從維也納和巴黎

方面（絕不從俄國方面）看來是真正存在的政派，其中一部份沒有一些明確性。舉例來說，馬哈主義的前進派，有馬哈主義的理論，這是明確的；“孟塞維克護黨派”堅決地否認這些理論，而擁護馬克思主義，同時在理論上申斥取消派，這也是明確的。

至於託洛茨基，那麼他就沒有任何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明確性；因為，“非政派主義”底特許證只是特許他在這一個政派與另一個政派之間完全自由地飛去飛來（下面我們將更詳細的看到這一點）。

結論就是：

（1）託洛茨基不說明和了解馬克思主義各思潮和各政派間思想分歧底歷史意義，雖然這些分歧充滿着社會民主黨二十年的歷史，而且涉及現時各個基本問題（這一點我們還要加以證明）；

（2）託洛茨基不懂政派主義底基本特性，這種特性就是：名義上承認一致和事實上實行分散；

（3）託洛茨基拿着“非政派主義”底旗幟擁護國外的一個政派——特別沒有思想基礎的和在俄國工人運動中沒有基礎的政派。

光耀奪目的不一定是金子。託洛茨基底說話雖然很多光彩和聲浪，可是沒有絲毫內容。

2、論 分 裂

有人反駁我們道：“假使你們真理派沒有政派主義，就是說，沒有那種名義上承認一致而事實上實行分散的行爲，那末，你們却有更壞的行爲——分裂主義”。託洛茨基恰恰就是這樣說的；他不會把自己的意思加以思索，不會把自己的說話首尾銜接起來，有時大喊反對政派主義，有時高呼：“分裂接連獲得自尋死路的勝利”。（第1期第6頁）

這段話只能有一個意思：“真理派接連勝利”（這是客觀的，可以

審查的事實，即從1912年和1913年俄國羣衆工人運動底研究中也亦可以確定的事實），但是我託洛茨基呢，却要申斥眞理派，說他們第一是分裂派，第二是自尋死路的政治家。

我們來研究這個問題。

首先我們感謝託洛茨基；不久以前（從1912年8月至1914年2月）他跟了唐恩跑，大家知道，唐恩曾經威嚇和號召“打死”反取消主義。現在託洛茨基不來威嚇“打死”我們的思潮（和我們的黨，——託洛茨基君，不要生氣吧，這是實話呵！），而僅僅作預言，說這個思潮自己會打死自己！

這是軟和得多的語調，對不對呢？這幾乎是“非政派主義的”態度，對不對？

但是，我們不多談笑話了（雖然笑話是給託洛茨基底不堪忍受的空談以軟和回答的唯一方法）。

“自尋死路”——不過是一句空話，祇是一句空話，祇是“託洛茨基主義”

分裂主義是一個嚴重的政治罪名。無論取消派，無論一切上述的、從巴黎和維也納方面看來是真正存在的集團，都用各種腔調重複這個罪名來反對我們。

但是他們重複這個嚴重的政治罪名時的態度，都是非常不嚴重的。請看託洛茨基吧。他承認了，“分裂（應讀作：眞理派）接連獲得自尋死路的勝利”。同時他補充說：

“許許多多的先進工人，處在政治上完全迷惑的狀態中，他們自己往往變成分裂底積極代理人”。（第1期第6頁）

能否找出比這句話對問題所持態度更不嚴重的例子呢？

在俄國工人運動舞台上，擺在我們面前的不過是取消主義，而你

們却責備我們爲分裂主義者。這就是說，你們認爲我們對取消主義的態度是不正確的嗎？果然不錯，一切上述的國外集團，無論牠們彼此有多大的差別，可是牠們却一致認爲：我們對取消主義的態度，是不正確的，是“分裂主義的”。這一切集團與取消派相同之點（和重要的政治上的接近），也就在這裏。

如果我們對取消主義的態度，理論上原則上是不正確的，那末，託洛茨基就應該爽直地把他說出來，肯定地申明和直接地指出，他所認爲不正確的地方，究竟在那裏。可是，託洛茨基在多年以來却避免這個重要問題。

如果事實上，運動底經驗，把我們對取消主義的態度推翻，那末，就當分析這個經驗；這一點託洛茨基又沒有去做。他承認：“許許多的先進工人都變成分裂底積極代理人”（當讀爲：真理派路線、策略、系統、組織底積極代理人）。

爲什麼會產生這樣傷心的現象（託洛茨基認爲這種現象正在被經驗所證實），即先進的而且許許多的工人，都擁護真理派呢？

因爲這些先進的工人處在“政治上完全迷惑的”狀態中，——託洛茨基這樣回答。

不消說，對於託洛茨基，對於所有五個國外政派、對於取消派，這個解釋是非常悅耳的。託洛茨基非常歡喜“以學者模樣”，用誇張響亮的語調，給歷史現象以一些對於託洛茨基是悅耳的解釋。假使“許許多的先進工人”，都變爲與託洛茨基路線不相符合的那條政治的和黨的路線底“積極代理人”，那末，託洛茨基就不客氣地、立刻直接了當地解決問題：這些先進的工人處在“政治上完全迷惑的狀態中”至於他託洛茨基呢，則顯然是處在政治路線明確和正確的“狀態中”！……而同是這位託洛茨基却又拍拍胸膛，說要打倒政派主義、小

組主義、智識份子強制工人意志的行爲……！

真的，讀到這樣的東西，無意中會自問：這類的呼聲，不是從瘋人院裏喊出來的麼？

關於取消主義和申斥袖的問題，從1908年起* 黨就向“先進工人”提出了，而與某個一定的集團（我們的曙光這個集團）分裂的問題，就是說，關於不要這個集團並且反對這個集團才可以把黨建立起來的問題，則是在1912年1月（2年多以前）提出的。絕大多數的先進工人恰恰是擁護“1月的（1912年）路線”的**。託洛茨基本人也承認這個事實，他所說的“勝利”和“許許多多的先進工人”等語，可以證明這點。而託洛茨基却只以誣蔑這些先進工人爲“分裂者”和“政治迷惑者”的方法來敷衍塞責！

神經尚未錯亂的人，却從這些事實中作出另外的結論。凡大多數覺悟工人在明確決議周圍團結起來的地方，就有意見和行動之一致，就有黨性和黨。

在那些被工人“撤職的”國外集團（兩年來無以證明自己與俄國羣衆的工人運動有聯繫的集團）中，那裏就充滿着迷惑情況和分裂主義。現在託洛茨基企圖使工人不執行馬克思主義者真理派所承認的那個“整體”底決定，他就是企圖擾亂運動和引起分裂。

這些企圖是無能爲力的，但終究應當揭破智識份子小集團底自誇自大的領袖，這些領袖，在實行分裂的時候高喊人家的分裂；他們

* 指1908年12月全俄代表會議，參看本卷第151頁至152頁。（編者）

** 指1912年1月的（布拉加的）全俄代表會議。參看本卷第149頁

至151頁。——（編者）

在這兩年以上的過程中在“先進工人”面前完全失敗以後，現在却非常傲慢地侮蔑這些先進工人底決定和意志，稱他們為“政治上的迷惑者”。這完全是諾士特萊夫或果洛孚列夫 (115)底態度。

但是，我們這些政論家始終應重復確切的統計，現在沒有推翻而且將來也不能推翻的統計，來回答他們所重復的關於分裂的喊聲。在第二國會選舉時，工界選出的議員中布爾塞維克佔47%，在第三國會選舉時，——50%，在第四國會選舉時——37%。

看呵，“先進工人”底多數就在這裏，黨就在這裏，大多數工人意見和行動底一致也就在這裏。

取消派反駁道（參看我們的曙光第3期上布爾金底論文），說我們拿斯託雷平選舉分界制中的消息作根據，這是不合理的和不誠實的反駁。德國人拿根據俾斯麥排斥婦女的選舉法的選舉，來測量他們自己的勝利。只有喪心病狂的人，才能够借此叱責德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德國馬克思主義者雖在該選舉法之下來測量自己的勝利，但絕不替他的反動的限制作辯護。

我們也是一樣，我們並不擁護選舉分界制，但我們曾在該選舉法之下來測量我們的勝利。在三屆國會（第二、第三、第四屆）內，都有過選舉界，在同一工人選舉界內部，在社會民主黨內部，發生了趨向於反對取消派的整個轉變。誰個不想自欺欺人，他就應當承認這個客觀的事實，反取消派的工人的一致之勝利的事實。

另一個反駁也是一樣“聰明的”：“孟塞維克和取消派曾經投票贊成（或者參加選舉）某個布爾塞維克”。好極了！在第二國會內，工界選出的非布爾塞維克議員占工界選出的議員全數53%，在第三國會內占50%，在第四國會內占33%，難道孟塞維克和取消派沒有投票贊成這些議員中的某些議員麼？

如果可以舉些關於選舉人或工人初選代表等等的統計，來代替關於議員的統計，那末，我們很願意舉這些統計。但是這些更詳細的統計是沒有，因此，“反駁者”簡直只是掩蔽衆人底耳目。

關於那些會幫助各派報紙的工人集團的統計，又是怎樣的呢？在兩年中間（1912年和1913年），2801個集團贊成真理，740個集團贊成光線*。任何人都可以審查這些數字，而且誰也未會企圖否認牠們。

試問多數“先進工人”之行動和意志的一致在那裏，而破壞多數意志的行爲又在那裏？

託洛茨基底“非政派主義”，恰恰就是分裂主義，就是說，他最不要臉地破壞了多數工人底意志。

3、論八月聯盟底瓦解

但是，可以審查託洛茨基所提出的分裂主義的罪名之正確與否的，還有一個方法，而且是十分重要的方法。

你們以爲恰恰“列甯派”就是分裂派嗎？好的。假定你們的話是對的吧。

但是，如果你的話是對的，那末爲什麼其餘一切的政派和集團都未曾證明，沒有“列甯派”和反對“分裂派”而可以和取消派造成一致呢？……如果我們是分裂派，那末爲什麼你們統一派不把自己內部統一起來並和取消派統一起來呢？如果這樣做，你們就會在事實上把

* 在1914年4月14號(1日)，按預先的計算，已有四千個集團贊成真理（從1912年1月14號(1日)起），一千個集團贊成取消派及其一切的同盟者。

一致底可能及其益處等等表示給工人看了！

且將大事紀回憶一下罷。

1912年1月，“分裂派”“列甯派”申明道，他們是沒有取消派而且反對取消派的一個政黨。

1912年3月，一切的集團和“政派”都在他們的俄文宣言上以及在‘德國社會民主黨’黨報“Vorwärts”*篇幅上統一起來，反對這些“分裂派”。這些團體是：取消派、託洛茨基派、前進派、“布爾塞維克護黨派”、“孟塞維克護黨派”。他們共同起來和衷共濟地、一心一意地、異口同聲地痛罵我們，給我們以“僭奪派”、“神祕家”和其他諸如此類的溫柔慫恿的綽號。

先生們。好極了！試問你們還有過什麼比統一起來反對“僭奪派”並拿一致底例子去告訴“先進工人”更容易的事情呢？先進的工人，如果他們看見一方面有反對僭奪者的人們底一致，取消派和非取消派底一致，他方面只有“僭奪派”“分裂派”等等，那末，難道他們不會贊助前者嗎？

如果意見的分歧，僅僅是由“列甯派”虛構或吹噓……起來的，而在事實上則有取消派、普列漢諾夫派、前進派、託洛茨基派等等一致之可能，那末，為什麼在兩年以來你們不拿自己的實例來證明這一點呢？

1912年8月，“統一派”底代表會議召集了。分裂就即刻開始了：普列漢諾夫派完全不肯參加，前進派參加了，可是隨即退出，並提出抗議及揭穿全部企圖底虛空。

取消派、萊多維亞人、託洛茨基派（託洛茨基和謝可夫斯基）、

* 即前進。——（編者）

高加索人、七人團*“統一起來了”，真正統一了嗎？我們在當時就說過，沒有，這不過是掩飾取消主義而已。事變是否把我們的話推翻了呢？

恰恰經過一年半的功夫，在1914年2月的時候，事實證明：

(1) 七人團正在瓦解——布揚諾夫退出七人團。

(2) 留在新的“六人團”內的齊赫芝和土烈亞科夫或其他某某，彼此不能商量妥當去回答普列漢諾夫。他們在報紙上聲明要回答他，但是他們不能回答。

(3) 託洛茨基事實上已經離開光線多月了，現在出版“自己的”鬥爭雜誌，拒絕統一了。託洛茨基稱這個雜誌爲“非政派主義的”，這也就是明白說明（在一切稍爲明白事理的人看來，是很明白的），我們的曙光和光線，據託洛茨基底意見，就是“政派主義的”，即壞的統一派。

親愛的託洛茨基！如果你是個統一派，如果你申稱和取消派的一致是可能的，如果你和取消派共同站在“1912年8月所擬定的基本觀念”（鬥爭第1期、第6頁、編輯部底話）立場上，那末，爲什麼你自己不在我們的曙光和光線上與取消派統一起來呢？

還在託洛茨基底雜誌未出版以前，在北方工人報上發表了一個兇惡的時評，說該雜誌之面目“尚未清楚”，說關於這個雜誌“在馬克思主義者中間談過很多”。當時真理之路（第37期）自然就揭破了假話，說“在馬克思主義者中間談過”託洛茨基反對光線派的一種秘密

*第四國會內孟塞維克的黨團。關於這屆國會內社會民主黨黨團之分裂爲兩個的獨立黨——孟塞維克的“七人團”和布爾塞維克的“六人團”，可參看本卷註釋(116)。——(編者)

札記；託洛茨基底面目及其脫離八月聯盟的行動，已經完全“清楚了”。

(4) 高加索取消派的著名領袖安氏*，曾經反對過色多夫（並因此而被唐恩一流人所當衆譴責），現在又在鬥爭上出頭現面了。現在所“不清楚的”，就是：高加索人現在願意和託洛茨基一塊兒走，抑是和唐恩一塊兒走呢？

(5) 只有萊多維亞的馬克思主義者，在“八月聯盟”裏是一個無庸爭論的組織，他們現在已經正式退出這個聯盟了，他們在其最後一次代表大會（1914年）底決議案上說道：

“調和者底無論如何要和取消派統一起來的企圖（1912年8月的代表會議），已經是沒有用處了，而且統一派自己也落到思想政治上依賴取消派的地步了”。

這段話是這樣一個組織在一年半經驗以後寫的，這個組織自己採取着中立的立場：不願和兩個中心的任何一個中心發生聯繫。中立派這個決議，對於託洛茨基應當是更加確信無疑的！

大概已經够了吧？

人們會責備我們爲分裂主義者，責備我們不願意或不善於和取消派相安無事，但這般人自己也沒有和取消派相安無事。八月聯盟終竟是個空中樓閣而瓦解了。

託洛茨基既然不把這個瓦解情形告訴讀者，也就是欺騙讀者了。

我們的敵手底經驗，證明了我們的主張是對的，證明了和取消派一塊兒工作是不可能的。

4. 一個調和派對“七人團”的忠告

* 即壽爾但尼。（編者）

鬥爭第一期社論國會黨團底分裂之內容，就是調和派對取消主義化的（或動搖於取消主義方面的）國會議員七人團所給的忠告。這些忠告底要旨，就是下面一句話：

“當和其他各個黨團有妥協之必要時，……首先就要去和六人團*接洽……”。（第29頁）

這就是一個正當的忠告，而託洛茨基之與取消主義的光線派分歧，大概是爲了這個忠告。從國會中兩個黨團鬥爭一開始起，從通過夏季（1913年）會議底決議案起，真理派恰恰就站在這個觀點上。就在分裂以後，俄國社會民主工人黨團也在報章上屢次聲明過，雖然“七人團”再次拒絕，該黨團還是繼續站在這個立場上。

從最初起，從通過夏季會議底決議案起，我們就已認爲，而且現在還認爲，關於國會工作問題的妥協，是我們所希望的而且是可能的：如果和小資產階級的農民的民主派（勞動派）已經屢次實行過這樣的妥協，那末，和小資產階級的自由派的工人政治家作這種妥協，當然是更加可能的和必要的。

不要誇大意見分歧，而要正確地去觀察實際情形：“七人團”是動搖於取消主義方面的人們，昨天他們完全跟着唐恩跑，今天却又很不好過地把自己的視線從唐恩轉移到託洛茨基，然後又從後者轉移到前者。取消派——這是離開了黨的、實行自由派的工人政策的合法派。因爲他們否認“祕密工作”，所以在黨的建設和工人運動底事業中，談不到和他們作任何的統一。誰有另外的設想，他就是大錯而特錯，就是不顧及1908年以後所已發生的變動底深刻性。

但是，在單個問題上，和這個黨外的或這個接近於黨的集團妥

* 第四國會內的布爾塞維克的黨團。

協，當然是可以容許的：我們總是應當強迫這個集團（如強迫勞動派一樣）在工人的（真理派的）政策和自由派的政策之間去作選擇。舉例來說，在關於爭取出版自由的問題上，取消派曾經顯然是動搖於自由派的立場（否認或忘記無檢查的出版）和相反的工人的政策之間。

在國會政策範圍內，沒有直接涉及最重要的、國會外的問題，在這些範圍內，和自由派的工人議員七人團妥協，是可能的和愜意的。關於這一點，託洛茨基由取消派的立場過渡到黨的夏季（1913年）會議立場上來了

不過這裏不要忘記，黨外的集團對於妥協的了解，與黨內的人通常所了解的，完全不同。在非黨員看來，國會中的“妥協”，就是“製定策略決議案或路線”。在黨員看來，妥協就是吸引他人去實行黨的路線的一種企圖。

舉例來說，勞動派是沒有黨的。他們所了解的妥協，可說是“自由的”“製定”路線，今天和立憲民主黨人一起，明天和社會民主黨人一起。我們對於我們與勞動派的妥協完全不是這樣去了解：我們對於一切重要的策略問題都有黨的決定，無論何時我們都不會放棄這些決定；至於和勞動派妥協，則在我們看來，無非就是吸引他們到自己方面來，就是使他們相信我們的主張是正確的，就是不放棄反對黑幫派和反對自由派的共同行動。

這個粗淺的差別，黨的觀點和非黨的觀點對妥協的了解間的差別，被託洛茨基忘記到什麼程度（他到過取消派那裏，終究不是徒然的呵！），這可從他的下面一段議論中表明出來：

“‘國際’裏面衆望所歸的人物，必須把我們這一個已經分裂的國會代表團底兩部份召集起來，和他們一齊去考察：使他們統

一的是什麼，使他們分裂的又是什麼……，可以製定一個詳細的策略決議，以規定國會策略底基礎……”(第1期、27—30頁)。這就是取消派的問題提法底特別的和最標本式的榜樣！託洛茨基底雜誌把黨忘掉了：其實是否值得去記憶這類的瑣事呢？

在歐洲（託洛茨基喜歡亂談歐洲主義）當各個政黨妥協或統一的時候，事情是這樣的：各黨底代表便集合在一塊，而且首先就弄清分歧的地方（‘國際’向俄國迫切提出的正是這一點，而絕不是把考茨基所說的似乎“舊黨已沒有了”這個輕率的論斷，放在決議案中）(120)。把分歧之點弄清楚以後，這些代表就規定出：關於策略、組織等等底問題，那些決定（決議案、條件等等）應當向雙方政黨底代表大會提出。如果能夠擬定一致決定底草案，那麼代表大會就來決定是否採納這些決定；如果擬定不同的提議，那麼，雙方政黨底代表大會，也同樣給以最後的討論。

在取消派和託洛茨基看來，“可愛的”僅僅是機會主義底歐洲的榜樣，而並不是歐洲黨性底榜樣。

國會議員將製定“詳細的策略決議案”！！在這個例子中，俄國的“先進工人”（託洛茨基這樣不滿意他們不是徒然的）能夠顯然看出，在維也納和巴黎，國外各小集團之滑稽的騙局，達到何種地步，這些小集團甚至使得考茨基也相信俄國“沒有黨”，但是，在這個問題上，如果有時候得以欺騙外國人，那末，俄國的“先進工人”（不怕引起威嚴的託洛茨基底新的不滿）就要當面譏笑這些騙徒了。

工人們會對他們說：

“在我們這裏，詳細的策略決議案，是由黨的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製定的（不知道在你們非黨的人那裏是怎樣），例如1907、1908、1910、1912和1913各年所舉行的會議。我們很願意使不知底蘊的外

國人以及健忘的俄國人，來認識我們的黨的決定，而且更加願意請求“七人團”或“八月聯盟派”、或“左派”（117）底代表，或其他任何的人，把他們的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底決議案，介紹給我們看，並把對我們的決議案或對1914年中立的萊多維亞人的代表大會決議案*等態度如何的具體問題，提到他們將來的代表大會上去”

俄國“先進工人”將要向騙徒們去說的話，就是如此，——在馬克思主義的刊物上，彼得堡有組織的馬克思主義者所已經說過的話，就是如此。託洛茨基為自己的方便而把這些向取消派提出而已經公佈的條件，忽略過去嗎？這對於他更是糟糕。我們的責任就在於預先告訴讀者：“統一的”（按8月“聯合”底方式嗎？）騙局，不願顧及俄國多數覺悟工人底意志的騙局，是多麼可笑。

5、託洛茨基底取消主義觀點

託洛茨基在自己的新雜誌上曾經努力儘量少談及本人見解底實質。真理之路（第37期）已經指出了，無論關於秘密工作的問題，無論關於爭取公開黨的口號等等，託洛茨基都沒有說過一句話。因此，我們在這裏又說到最壞的政派主義，因為他想沒有任何思想的和政治的面目而成立獨樹一幟的組織。

但是，如果託洛茨基會不願公然敘述自己的見解，那麼他的雜誌有許多地方表示出，他在暗中實行和掩蔽的，是那些思想。

就在第一期中第一篇社論上，有下面一段話：

“在俄國，革命前的社會民主黨，只是就其思想和目的來說，是一個工人的政黨。其實，牠不過是那些領導了已經覺醒的

* 參看本文第三段，本卷第204頁。——（編者）

工人階級的馬克思主義智識份子底組織……”(第5頁)。

這一段話就是早已著名的自由主義的和取消主義的論調，實際上是用以否認黨的一個引言。這個論調底基礎就是曲解歷史事實。1895至1896年底罷工，就已經造成一種思想上組織上都與社會民主黨聯繫着的羣衆工人運動。“智識份子領導了工人階級”去進行這些罷工，去進行經濟的和非經濟的鼓動嗎!!?

或者請看關於1901至1903年的國事犯和前一時代比較的正確統計吧。

參加解放運動的(被判決爲國事犯的)

每百人中，其職業成份如下：

時 代	從 事 農 業 者	從 事 工商業者	從事自由職 業者和學生	職業無定者 和無職業者
1884—1890	7.1	15.1	53.3	19.9
1901—1903	9.0	46.1	23.7	8.1

我們看到，在八十年代，在俄國還沒有社會民主黨，當時的運動會爲“民粹主義的”運動，此時智識界佔了優勢：佔解放運動參加者底半數以上。

在1901到1903年，已經有了社會民主黨。當時舊火星報進行了自己的工作，此時這個景象完全改變了。智識界已經成爲運動參加者底少數，在這中間，工人(“從事工商業者”)比智識界多得多了；而工人和農民合併起來，則佔全體參加者一半以上。

恰恰在馬克思主義內部各個思潮底鬥爭中，曾表現出社會民主黨中小資產階級的智識界的派別，始則爲“經濟主義”(1895到1903

年)，繼則為“孟塞維主義”（1903到1908年）和“取消主義”（1908到1914年）。託洛茨基害怕提起黨內各個思潮 20 年鬥爭的歷史，這樣也就是重複取消派對黨的誣蔑。

試看另一個例子吧：

“‘俄國社會民主黨’對代議制的態度，也是經過三個階段……（如在其他各國一樣）……首先是“抵制主義”……其次是原則上承認國會的策略，但是……（“但是”兩字再好沒有了，這個“但是”，已由俄國小說家謝德林譯成爲下面一句話：耳朵絕對不能高過額角！）……爲了純粹鼓動的目的……而最後是把當前的要求……搬運到國會講台上……”（第1期，第34頁）。

又是用取消主義的觀點來曲解歷史。他所以虛構出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底差別，爲的要暗中去擁護改良主義和機會主義。如把抵制主義看作社會民主黨對代議制的態度中的一個階段，那末這個抵制主義，無論在歐洲，無論在俄國，都是沒有的；在歐洲，過去和現在有的都是無政府主義，而在俄國呢，譬如對‘布里根國會’* 的抵制，祇是對付一定的機關，從來不是對付“代議制”，這種抵制是由馬克思主義爲繼續襲擊而與自由主義所作的特殊鬥爭產生出來的。至於這個鬥爭如何在馬克思主義內部兩個思潮底鬥爭中反映出來，託洛茨基却一字也不提。

如果要提到歷史，那就要說明各個具體問題和各個思潮底階級根源；誰願意本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去研究階級鬥爭，研究各個思潮爲着參加“布里根國會”問題而起的鬥爭，他在這裏就會看出自由主義

* 參看列寧底論文：對布里根國會的抵制和暴動，見列寧選集中文版第六卷。——（編者）

的工人政策底根源。但是，託洛茨基之“提到”歷史，爲的要避開具體問題，以及替現代的機會主義者想出一個辯護或類似辯護的東西來！託洛茨基寫道：

“……事實上，一切思潮都採用同一的鬥爭方法和建設方法”。“高喊在我們的工人運動中有自由主義的危險，簡直就是粗魯的閉關主義的對實際情形的曲解”（第1期，第5頁和35頁）。

這些話就是十分明顯地擁護取消派，而且是十分憤激地擁護他們。但是，我們畢竟要舉一個比較新的小小的事實，——託洛茨基僅僅說空話，我們却希望工人自己去考察事實。

這個事實，就是3月26號（13日）北方工人報所寫的以下的言論：

“不去特別指出擺在工人階級面前的一定的具體任務——強迫國會否決法案（關於出版的法案），而却提出浮汎的爲“完滿無缺的口號”而鬥爭的公式，同時‘又鼓吹秘密的出版物，這種鼓吹只能減弱工人爭取其公開刊物的鬭爭’。

這就是擁護取消派政策和批評真理派政策的明白切當的證據確鑿的事實。難道有常識的人會說在這個問題上兩派都採取同一的鬥爭方法和建設方法嗎？難道有常識的人會說取消派在這裏不是實行自由派的工人政策嗎？會說工人運動中的自由主義的危險在這裏是空想出來的嗎？

託洛茨基之所以避開事實和具體的指示，正因爲這些事實和指示無情地推翻他的一切發怒的喊叫與漂亮的空話。當然，振起姿勢脫“粗魯的閉關主義的曲解”，這是很容易的。再添上更嚴厲的更漂亮的話頭，說什麼從保守的政派主義中解放出來”，這也是不難的。

不過這不是太不值錢了嗎？這個武器不是從託洛茨基在中學生

面前風頭時代的武庫中拿來的嗎？

但是，託洛茨基所不滿意的“先進工人”，畢竟希望他來直接明白地告訴他們：你是否贊成上述那一個對於具體政治運動的估計所確切表示出來的“鬥爭方法和建設方法”？贊成不贊成？如果贊成，這就是自由派的工人政策，這就是叛變馬克思主義和黨，而說什麼與這樣的政策，與實行這個政策的集團，實行“和平”或“一致”，這無異於自欺欺人。

不贊成嗎？——那就直接了當地說吧。而用空談是不能驚嚇，不能滿足也不能嚇倒現在的工人的。

附帶地說一說：就是取消派在上述一段話中所宣傳的政策，甚至在自由派看來也是愚蠢的，因為在國會中，法律底通過，是以那些已經在法律委員會中暴露其陰謀的扁尼仙之流的“地方自治派十月黨人”為轉移的。

參加俄國馬克思主義運動的老前輩，深知託洛茨基這個人物，在這些老前輩面前，已經用不着說他了。但是新進的工人却不知道這個人物，所以非說不可，因為，他足以代表事實上也是動搖於取消派和黨之間的五個國外小集團底面目。

在舊火星時代（1901到1903年），對於這些動搖的以及由“經濟派”跑到“火星派”又由後者跑到前者的人會給了這樣的綽號：“反覆將軍”（古俄羅斯在混亂時期大家把那些由這個營壘跑到另一個營壘中的武士稱作反覆將軍）。

當我們談到取消主義的時候，我們認定牠是一定的思潮。是在多年內生長起來的，是與馬克思主義20年歷史中的“孟塞維主義”和“經濟主義”根本聯繫着的，是與一定的階級——自由資產階級之政策和

思想有連帶關係的。

“反覆將軍”自命高超於一切政派，其唯一的根據就是：他們今天“借用”這一個政派底觀念，明天“借用”另一個政派底觀念。在1901到1903年，託洛茨基會爲猛烈的“火星派”，所以梁尙諾夫曾把1903年代表大會上的託洛茨基稱爲“列甯的棍棒”(118)。在1903年末，託洛茨基會是個猛烈的孟塞維克，就是說，會是個由火星派跑到“經濟派”的人；他聲明道：“在舊火星與新火星之間，橫着一條鴻溝”。在1904到1905年，他離開孟塞維克，而站在動搖的地位，有時和馬丁諾夫（“經濟派”）合作，有時主張左得不合邏輯的“不斷革命”*。在1906到1907年，他接近布爾塞維克，而在1907年春天，他自稱爲和盧森堡取一致行動的人(119)。

在瓦解時代，他經過長久的“非政派的”動搖之後，又向右跑，而在1912年8月，與取消派締結聯盟。現在，他又離開取消派，然而，按事情底實質講來還是重複着取消派底觀念。

這樣的人物顯然是已往歷史組合和結構底殘餘，那時，俄國羣衆的工人運動還是沉靜的，當時任何的小集團可以“自由地”把自己看作是一個思潮、集團、政派，——總而言之，就是與他人談判聯合的“列強”。

有些人抱着不堪設想的慾望起來講話，無論對於黨的決議——從1908年起就已決定和規定對取消主義態度的黨的決議，無論對於俄國現代工人運動——在完全承認黨的決議這個基礎上真正造成了多數底一致的工人運動——底經驗，都絕不願顧到；我們要使新進的工人好好知道這是一些什麼人。

1914年5月

* 參看米運集第五卷第30頁至32頁 註(59)。——(校者)

6 好決議和壞演說 (120)

無疑的，俄國一切覺悟的工人，曾經很有興趣地留心地注意‘國際社會主義局’關於俄國問題所通過的決議案。大家都知道，該決議案底實質，就是決定要組織或實行使俄國“工人運動中的一切政派”“共同交換意見”：列入這些政派的，有承認社會民主黨綱領的政派，也有其綱領與社會民主黨綱領“相和協的”(或“相適稱的”——im Einklange)政派。

最後這個界說，非常廣泛，不僅包括雅果羅 (117)底贊助人，而且包括着凡願意聲明牠們的綱領和社會民主黨綱領“相適稱的”，或“相和協的”一切集團。可是這個廣泛的界說，沒有什麼害處，因為，要“交換意見”，當然最好是廣泛些規定參加者底成份，其中不妨有甚至社會民主黨人個別集團願意與之聯合的份子。不要忘記，在“國際社會主義局”底會議上，曾提出兩個計劃：(1)考茨基底計劃——共同交換意見，再沒有別的。在至公無私的委員會面前，即在“國際社會主義局執行委員會”面前交換意見，這將查明實際情形究竟如何，意見分歧怎樣深刻。(2)另一個計劃，是盧森堡所提出的，經過考茨基反駁之後，她把這個計劃收回了，——根據這個計劃，要舉行“聯合的代表會議”(Einigungskonferenz)“以便恢復統一的黨”。

當然，後一個計劃要壞些，因為首先收集確切的材料是必要的，

至於盧森堡此地會企圖暗中拉進去的只是“恢復”遺臭萬年的“提什科小組”(IZI),這更是不要說了。

通過了考茨基底計劃,這個計劃比較慎重,比較有系統地提出一個問題:經過預先的“意見交換”和確切材料之研究來實現統一。因此,考茨基底切議案:會得一致通過,這完全是自然而然的。

但是,我們要把考茨基底決議案(他已成了‘國際社會主義局’的決議案)和考茨基底演說分清楚,他在演說中有一個地方竟說出極離奇的東西。這一點我們已經約略地指出過了,可是在現在,“Vorwärts”(德國黨主要的機關報)上關於考茨基演說的紀載,使我們不能不更詳細地來研究這個重要的問題。

考茨基在反駁盧森堡的時候說過:“舊的政黨,已經無形消滅了,——雖然舊的名稱還保留着,但在一個時期內(im Laufe der Jahre——即近年來),這些名稱已獲得新的內容了。不應該簡簡單單地除去老同志,只因他們的黨(ihre Partei)不採用舊的名稱而就除去他們”。

盧森堡反對覆這種說法,她說:“考茨基底說法,似乎‘俄國社會民主黨’已經死亡了(sei tot),這是一句未經思索的說話”,那時候考茨基只限於“一個抗議,反對說他說過”“‘俄國社會民主黨’已經死亡了的話。據他說來,他只講過,舊的形式,已被破壞。必須創造新的形式”。

正式紀載中關於俄國問題的一段話。就是如此。

考茨基沒有說過,而且也不能說社會民主黨已經死亡了,這是顯而易見的。但他却說過:黨已經無形消滅了,而且不管有人反駁他,他沒有收回這一句話]

這很奇怪,但這是事實。

考茨基在這裏暴露出非常大的糊塗觀念。他所謂被除去的，是那些“老同志”呢？波特列索夫先生及其同伴嗎？他是否稱過取消派的散漫狀態為“他們的黨”呢？

抑或考茨基是指那個盧森堡底公式所除去的“‘波蘭社會黨’左派”（117）呢？要是這樣，那麼“老同志”這種說法，是莫明其妙的，因為，無論何時，自社會民主黨成立之日起，就是說，自1898年起，‘波蘭社會黨’底黨員，根本就未曾是社會民主黨底同黨的同志！

在我們看來，兩個界說都是一樣的，因為，在實際上，從關於一致問題而舉行的“意見交換”中，除去取消派（問題底全部實質就在他們），正和除去‘波蘭社會黨’左派是一樣可笑的（抽象地說，取消派——他們是無所不為的——哀的美教式地護擁袖和‘波蘭社會黨’這個非社會民主黨所締結的分裂主義聯盟，這是可能的）。但無論如何應當切實知道，不僅取消派先生們，而且他們的同盟者，對黨抱何種要求。

在‘國際社會主義局’中，考茨基竟說出俄國黨無形消滅了的話，這仍是一個無疑的事實。

他怎樣能夠說出這種極離奇的東西呢？為明瞭這個問題起見，俄國工人應當知道，把俄國事情通知‘德國社會民主黨’刊物的，究竟是誰？德國人寫文章的時候，他們照例不談意見分歧的問題。俄國人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出版物上發表意見時，那我們所看到的，或是國外各小集團和取消派聯合起來實行最醜惡的謾罵反對“列甯派”（1912年春天在“Vorwärts”上就是如此）；或是提什科派，託洛茨基派或故意蒙蔽問題的國外小組中的某人大做文章。數年以來沒有一個文件，沒有一個決議彙刊，沒有一個觀念底分析，一個收集實際材料的企圖！

我們憐惜德國的領袖們，他們（當他們研究理論時，他們是善於收集材料和研究材料的）竟聽信和重復取消派通知者底傳說；而不以為恥。

‘國際社會主義局’底決議案將應用於實際，而考茨基底演說詞將依然是傷心的奇事。

1913年12月

7 再論國際社會主義局

和取消派 (120)

“新取消派報”*政論家底基本特點，就是爲懦弱的怨恨心理所驅策的虛偽行爲；而他們關於‘國際社會主義局’決議的論文，又使這個虛偽行爲達到空前未有的程度。

他們弄到了什麼地步，這在下面的事實中就可以看出：自從他們關於這個問題的第一批論文發表以後，‘國際社會主義局’底書記九思曼，不得不提出自己的抗議以反對新工人報“利用”俄國讀者的“不明真相而達到其政派主義的目的”這一個企圖，提出自己的抗議以反對取消派關於‘國際社會主義局’決議的消息之絕對不真確和不忠實，並不得不委託撲波夫同志把這個抗議轉達給俄國的工人。

自從新工人報政論家接到‘國際社會主義局’書記給他們的如此響亮的……批評之後，我們可以最平心靜氣地不去理會他們責備我們有曲解倫敦決議(120)實質的企圖了。‘國際社會主義局’書記，已經當衆宣佈他們的罪狀，說他們“利用”‘國際’的決議“而達到其政派主義的目的”和對這些決議抱“不忠實的”態度；他們可以亂喊自己尊重‘國際’的話等等，——但是，恐怕誰也不會相信他們吧。唐恩先生用種種伎倆，賣盡死氣力，從‘國際社會主義局’底決議案中，找出黨

* 新工人報。——(編者)

底“建設方法”、對六人團的“申斥”(116)、“駁斥”我們的“要求”和“承認”波蘭社會黨左派(117)帶有社會民主主義的性質等等；可是，現在每個工人都知道這些伎倆底實質了。唐恩先生，要知道借着“國際社會主義局”底決議來演筆墨的魔術，這還不是尊重這些決議的標誌哩！

然而這些魔術家是多麼慌張啊！看罷，動不動就要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哩！

(1) 在 102 期上，唐恩先生冠冕堂皇地說：“‘國際社會主義局’申斥了六個議員退出黨團的行爲”；經過 1 期，在 104 期上，另一個魔術家——色多夫先生，又一樣冠冕堂皇地說“‘國際社會主義局’既沒有通過什麼稱贊的決議，也沒有提出什麼非難來”。但是，——請注意啊！——兩位名人都異常滿意‘國際社會主義局’底決議！一個是因為他“申斥了”，另一個是因為他並沒有提出任何的申斥！還能想出更迷惑的景象嗎？

取消派先生們底迷惑是有原因的！‘國際社會主義局’決議底基本條文肯定說道：無論採取那一種達到統一的實際步驟，事先都應把現有的意見分歧弄清楚。

這個決定是完全正確的。

如果我們不想借“統一”底名義來給工人階級以各種極不一致的份子底渙散混合，如果我們想把工作弄得真正統一起來，那麼，第一個必要步驟就應把“分歧之點”切實弄清楚。請用“共同交換意見”這一個方法，來把“分歧之點”切實弄個清楚吧，那時候便可只明白：是不是可以談到什麼達到統一的實際步驟。‘國際社會主義局’決議對問題的提法，便是如此。我們完全歡迎這種問題底提法。我們對‘國際社會主義局’提議的回答，就是我們曾號召工人：再來平心靜氣地討

論意見分歧和發表自己對於分歧之點的意見罷。我們這方面，已經答應盡量幫助國外的同志，使其來認識現有的意見分歧。在無產階級真理第9期上所登載的決議案(122)，完全正確地列舉出我們和取消派間的各個分歧之點。我們對於‘國際社會主義局’底提議的回答，應當如此，而且對於一切認真看待‘國際社會主義局’關於號召“共同交換意見討論分歧之點”的決議的人，無論過去或現在都沒有旁的道路。

但是，(全部問題也就在這裏！)，在取消派先生們看來，最不高興的，最不愜意的，最不能容納的，莫過於把佔統治地位的理論的、綱領的、策略的和組織的意見分歧弄清楚。他們因‘國際社會主義局’決議而作出的一切造作、曲解和謾罵，純粹是要模糊該決議底這個要求——預先把意見分歧弄清楚的要求。色多夫先生也好，唐恩先生也好，都拚命過於跑上前去：可否不“查明”聯合者底思想“言行錄”而“聯合起來”呢；可否不去“引證”舊的雜誌和報紙上的議論”呢，——色多夫先生這樣掛念着；可否不追念“已往”呢，——唐恩先生這樣顧慮着。我們非常明白他們的用意：色多夫先生所不高興的，就是回憶關於秘密工作的文章（光線第15【101】期），唐恩先生所不高興的，就是回憶關於“爭取合法性”的口號。我們完全同意‘國際社會主義局’決議底提議：不要追求已往的錯誤。寬恕“已往的錯誤”，這是取消派先生們所關心的，我們將不拒絕給他們以這種寬恕。使我們發生興趣的，並不是已往事情的本身，而是現在和將來的工作。關於這種工作，我們就想知道：取消派的機關報是否要繼續攻擊秘密工作；牠們是否要繼續認為“三大要求”不適宜於目前的環境；牠們是否要堅持“八月聯盟派”(109)對於黨綱的曲解等等。

據‘國際社會主義局’決議看來，查明這些問題及關於這些問題

的分歧程度，就是任何那種促進統一的步驟底先決條件，——如果
不以取消主義的精神去了解“統一”，不學取消派來把統一當作是將
一切任意自命爲社會民主黨員的人們無原則地混合爲一的話。

“罪狀底條文已經擬定了”，——色多夫先生這樣喊着。此地我
們本不願提起所謂“做賊心虛”的這句俗話，但色多夫何必把締結和
平的簡單條件當作“罪狀”呢？我們說：如果由統一而建立一個組織，
那末，這個組織就應當站在某些原則上：站在承認舊綱領、一定的組
織形式、完整的口號、堅決的策略等等之上。可是，你們就即刻說明，
綱領，策略和組織任務底這種措詞，無非就是“取消派罪孽底一覽
表”。我們十分可憐你們，但是，無論我們，無論‘國際社會主義局’，都
不知道，要建立新的組織，除掉把牠們的綱領策略等等弄清楚而外，
還有什麼另外的方法。

然而我們還有更大的罪孽。我們不僅提出了建立組織的條件，就
是說，不僅提出了和平底條件，而且還把這些條件提交工人去裁判。

我們堅決主張，要執行‘國際社會主義局’底決議，除我們所選擇
的道路之外，便沒有旁的道路。

‘國際社會主義局’號召一切自命爲社會民主黨員的人們，去把
他們彼此間的意見分歧弄清楚，認爲這是解決統一問題的先決步驟。

我們所公佈的決議案對於‘國際社會主義局’的號召之響應會
是：公佈我們對綱領策略和組織底基本問題的見解“一覽表”；把我們
這個“一覽表”轉交工人同志去討論。如果取消派先生們也做做我們
的先例，那麼，在較近的將來，我們就有各方面明白規定的意見並確
實弄清楚，大多數有組織的工人究竟站在誰的方面。‘國際社會主義
局’向俄國無產階級提出的任務，便可以着手解決了。但是，取消派
當然會堅持到底地離開這條道路，其原因很簡單，就是無論把他們的

政見明白規定出來，無論把這些政見提交廣大的工人去裁判，這對於他們小組底利益，都是同樣不利的。

在這些條件之下，他們一定會設法將‘國際社會主義局’主張“把意見分歧弄清楚”的要求置之腦後，而代以一種只能阻難‘國際社會主義局’工作的細小的、私人意氣鬥爭、曲解和造作；而且，他們將經常使‘國際’書記去教授那些已經不能不投給了取消派先生們的關於“忠實行爲”的功課。

1914年1月（1913年12月）

第 三 篇

1908 — 1914 年的

反動時期和新高漲時期
中的土地農民問題

1 給斯切泮諾夫的信 (123)

親愛的同志！你的回信已經接到了。現在再來繼續和你筆談。

你想把問題多多地移在理論的（而不是策略的）基礎上。我同意。我只要指出，你的出發點會是策略上的：你會否認基本的策略上的原理底“標本提法”（123）。你在否認“美國式的可能性”時，曾經規定這種策略上的決定（不過還沒有從中得出策略上的結論）。因此我不以為你對於我們意見分歧的敘述是正確的，因為你的敘述是：“你（即指我）着重指出農民運動底事實，我則承認正在無產階級化的農民運動底事實”。分歧不在這裏。實際上我並不否認農民正在無產階級化的事實。分歧在於：在俄國，資產階級的土地制度是否已經這樣確定，以便使農業資本主義底“普國式的”發展客觀上不能急遽過渡到“美國式的”發展；如果是，那末，基本策略問題底“標本”提法就不成立。如果不是，那牠就保存着。

我呢，却主張牠應該被保存着。我不否認“普國式的”道路底可能性。我承認，馬克思主義者不應該“担保”這兩條道路中的某一條，也不應當使自己只顧及到這兩條道路中的某一條；我承認，斯託雷平底政策按着“普國式的”道路更前進一步，並承認在這條道路上，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可以來一個辯證式的轉變以取消對於“美國式的”道路的一切希望與指望。可是我敢斷定，現時這一個轉變一定還沒有到來。

因此，拒絕問題底“標本”提法，這對於馬克思主義者是絕對不容許的，而且在理論上是絕對不正確的。這就是我們的意見分歧所在。

在理論上，這些意見分歧歸結為兩個（要是我不說錯的話）主要點：（1）你底“同盟者”依里英（124）應當被我打倒，以便替我的主張辯白。換一句話說，這種主張與馬克思主義者關於俄國革命前的經濟之分析總結相矛盾。（2）“標本”提法可以而且應當與修正派（達敏特及其同伴）在農業問題上的機會主義相提並論，因為，關於工人對“農夫”態度問題的提法，在俄國和德國並沒有什麼重要的原則上及根本上的差別。

我認為，這兩個觀點都是極端錯誤的。關於第一點。為不要涉及“策略”問題起見，我把馬丁諾夫攻擊依里英的話擊開而講你對理論問題的提法。

依里英曾證明過什麼呢？他證明過俄國的土地關係，無論在地主經濟上或在農民經濟上，無論在“農村公社”之外或在農村公社之內，都是照着資本主義的道路發展的。這是第一。第二，這一個發展所已經一去不迴地決定了的，無非就是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無非就是資本主義的階級分合。

為着這一點，曾經與民粹派有過爭論。這一點本應當證明。這一點已經證明過。這一點現在還是被證明了的。現在所提出來的（而且是由1905至1907年的運動所提出的）是另一個問題，是進一步的問題，這個問題包含着依里英（自然不僅他一人）所已解決了的問題底解決，可是包含的不僅是這一點，而是更大的、更複雜而新鮮的問題。除了1883至1887年，1895至1899年（125）已經完全而且正確解決了的問題以外，俄國二十世紀的歷史給我們提出了進一步的問題——如果見着這個問題而後退，藉口於早已解決而敷衍牠、推辭牠，

這在理論上是再錯誤不過的了。這就是把所謂第二級的、離高等的問題化爲第一級的、低等的問題。當新的事變（如1905至1907年那樣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事變）提出了更具體的更詳細的問題的時候，提出了關於資本主義的農業發展底兩條道路或方法間的鬥爭問題的時候，我們便不能停留在一般的關於資本主義問題的解決上了。當我們與民粹派作鬥爭來證明這條道路必不可免地和無可返復地是資本主義的道路時，我們曾是完全對的，我們曾經不能不把一切力量 and 一切注意集中在這樣的問題上：是資本主義抑是“國民生產”。這會是自然的，必然的，而且是合乎情理的。可是，現在這一個問題在理論上和實際上都已解決了（因為大多數勞動派底小資產階級性已經被俄國最近的歷史所證明），而放在日程上的是另一個更高的問題：是a式的資本主義還是b式的資本主義呢？據我的仔細觀察：依里英在該書第二版序言中所說的話是對的，他說，從這本書裏面得出這樣的結論：資本主義的農業發展，可以有兩種形式，這兩種形式間的歷史鬥爭，還沒完結（126）。

馬克思主義中的俄國機會主義（即現時的孟塞維主義）底特點，就在於他把馬克思主義加以學究式的簡單化，庸俗化，曲解其字句，背叛其精神（工人事務派和司徒威主義派是這樣）。孟塞維克把民粹主義當作不正確的社會主義學理而與之鬥爭的時候，沒有看出民粹主義底歷史上實在的歷史上進步的內容，不把他當作小資產階級羣衆所代表的民主的資本主義用以反對自由派的地主的資本主義的理論，“美國式的”資本主義用以反對“普國式的”資本主義的理論。由此就產生了他們那種奇怪的鄙俗的和叛徒的思想（社會運動也充滿了這種思想），說農民運動是反動的，說立憲民主黨人比勞動派要進步些，說“工農專政”（即標本式的問題提法）與“經濟發展底全部

過程”相矛盾（參看社會運動661頁）（127）與“經濟發展底全部過程”相矛盾，那還不是反動嗎？

我認爲，與這一種奇怪的對馬克思主義的曲解作鬥爭，曾經是“標本式的問題提法”底基礎，而且是正確的基礎；雖然，可惜得很，由於當時的自然條件的關係，這種鬥爭在策略方面做得很熱心，而在理論方面却做得不十分熱心。可惜字樣在這裏用得不對，應當刪除！

這一個土地問題，現時在俄國也就是資產階級發展底民族問題。因此，爲要不把那在許多地方都是正確的而在一切地方都是極有價值的德國的標本，錯誤地（機械地）搬到我們這裏來，就須要明瞭，在德國完全確定了的資產階級的發展底民族問題會是統一等等，但不是土地問題；而現時在俄國澈底確定資產階級發展的民族問題却正是土地問題（甚至已經是農民問題）。

在馬克思主義之應用於1848至1868年代的德國及應用於1905至1917年的俄國中間的差別，其純粹的理論的基礎，就在這裏。

在我們俄國，對資產階級的發展帶有民族意義的是土地問題而不是其他什麼問題，這一點我能用什麼來證明呢？我倒不知道是否需要證明？我想，這是無容爭辯的。可是理論的基礎正在這裏，而一切局部的問題正應歸結到這裏來。如果將有爭論，我就簡單地指出（暫時簡單地指出），1905至1907年的事變過程、事實、歷史恰恰證明了我所指出的土地問題（農民問題——所謂農民，當然是指小資產階級性的農民而不是指村社制度性的農民）在俄國所有的意義。現在，1907年6月16號（舊曆3日）的法律，第三次國會底成份及行動，1909年12月3號（舊曆11月20日）的立法草案（128）以及（特別重要）政府底土地政策，也都是證明這一點。

如果我們都同意這一點，就是俄國最近的歷史，1905至1909年

的歷史證明了土地問題對於在俄國確定一定形式的資產階級的進化是有根本的首要的民族的（在這個意思上講）意義；那我們就可以繼續討論。如果不同意，那就不能繼續討論了。

到1905年的時候，俄國資產階級的發展已完全成熟到可以要求立刻破壞已經陳舊的上層建築——已經陳舊的中世紀的土地佔有制（你當然明白，何以在整個上層建築中，我單只拿一個土地佔有制來講）。我們生在這一個破毀時代，資產階級俄國的各階級都極力想依自己的辦法來完成這個破毀工作：農民（加上工人）用土地國有化的辦法（我很高興，關於土地市有化之完全謬誤，我們彼此的意見却是一致的；我曾在我用波蘭文（129）分章出版的一本書內引了剩餘價值論上的話來擁護土地國有化的主張）；而地主（加上資產階級——舊式的、基郎特式的資產階級）則用1906年11月22號（舊曆9日）的法律等等。土地國有化，即由農民來破毀舊式土地佔有制，這是美國式的道路底經濟基礎。1906年11月22號（舊曆9日）的法律，即由地主來破毀舊式土地佔有制，這是普國式的道路底經濟基礎。我們這個時代，1905至19??年這個時代乃是革命道路和反革命道路這兩條道路鬥爭底時代，——正如1848至1871年的德國一樣，當時曾是兩條統一道路（就是德國資產階級式發展底民族問題之兩種解決方法），經過大德意志共和國的道路與經過普魯士君主國的道路之間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鬥爭底時代。只是到1871年，第二條道路才澈底（我之所謂“完全”兩字即指這一點）勝利。這時威廉·李卜克內西就放棄了抵制國會的 policy。拉沙爾派與愛森拿赫派間的爭論也消滅了。德國一般民主革命的問題也消滅了，——而拿烏曼、達微特等人却在90年代（20年後！）又開始其死灰復燃的工作（130）。

在我們這裏，鬥爭還在進行。在兩條農業發展的道路中，還沒有

那一條獲得勝利。在俄國現代（1905年至1909年至19??年）發生任何危機的時候，都會發生而且一定要發生“農夫”底“一般民主的”運動；而忽視這一點，就是犯了根本的錯誤，這種錯誤實際上走向孟塞維主義，雖然在理論上會把爭論放到另一方面去。並不是我把爭論“歸結”為‘孟塞維主義’；而是現代的歷史，把無產階級對俄國資產階級式發展底民族任務的忽視態度，歸結為孟塞維主義，因為，孟塞維主義底實質恰巧就在這裏。

此外，你讀過切爾凡甯時局狀況一書（131）裏面關於布爾塞維克‘標本式的問題提法’犯了機會主義的話麼？請讀一讀吧！

關於第二點。實質上我差不多已經把第二點完全講過了。在德國，工人去贊助“農夫”替自己（即替農夫）取得大地主、克底土地的這個願望，是反動的。是否如此？對不對呢？在俄國1905至1909至19??年，拒絕作這種贊助，這却是反動的。這裏就是一道鴻溝。或者是拒絕整個土地綱領，而差不多轉到立憲民主主義方面去；或者是承認，在德國和俄國，問題底提法有原則上的差別：所謂原則上的，並不是說，俄國不是資本主義的；而是說，這裏有兩個完全兩樣的、原則上不同的資本主義的時代：一個是資本主義的道路在全國完全確定以前的時代，一個是在這種確定以後的時代。

暫且擱筆；我將設法把關於本題的材料給你寄來。希望你隨時抽暇與我通信。與你緊緊握手。

你的老頭子。

2 關於現政府底(一般的)

土地政策問題 (132)

1905年革命以後，政府底土地政策，大大改變了牠以前的性質，以前，專制政府實行了卡特可夫及波別德諾思澤夫*底路線，極力在民衆面前表示牠是站在“各階級之上”的，是保護廣大農民羣衆利益的，是替他們防止失地及破產的。當然，這種假意的“照顧”農民，事實上是掩飾了純粹農奴制的政策，上述兩位舊俄羅斯的（革命以前的）“要人”，在一切社會生活及國家生活上都是愚笨地實行這種政策的。專制政府當時完全依靠於農民羣衆之完全落後、愚昧及不覺悟。在革命以前，專制政府冒充自己爲份地“不可讓渡權”底擁護者及“農村公社制”底贊成者，曾企圖藉俄國在經濟上的停滯及農民羣衆在政治上的沉眠。那時，全部土地政策都完全是農奴主貴族的政策 (133)。

現在，1905年的革命，已引起了專制政府全部土地政策之轉變。斯託雷平在切實執行貴族聯合會 (134) 底意旨的時候會決定(依他自

* 卡特可夫是俄皇亞歷山大第二時代反動貴族底代表和思想家。波別德諾思澤夫是亞歷山大第三和尼古拉第二時代政府底主腦，是反動貴族及‘黑幫’領袖。——(校者)

已的話)“以強者爲靠山”^{*}。這就是說,自從無產階級及廣大的民主農民羣衆在1905年革命中厲害地覺醒以後,俄國政府再不能冒充爲弱者底保護人了。人民既能在舊有農奴制的國家制度上打了第一個(雖然還不足够)破隙,他這樣也就是證明了:他的政治酣夢醒了多少,所謂政府保護“農村公社”,保護“份地不可讓渡權”,所謂超階級的政府保護弱者,這一些傳言在農民中都完全失掉信仰了。

1905年以前,政府還可以希望藉全體農民羣衆之愚昧與閉塞做牠的支柱,這些農民,還不能脫除他們數百年來所死守的奴隸性、忍耐性及順從性的政治成見。當農民還是順從而愚昧的時候,政府會可以裝出“以弱者爲靠山”的,即照顧弱者的樣子,雖然在事實上牠完全是照顧農奴主地主,完全是想保持自己的專制政體。

1905年以後,舊的政治成見已遭受如此深刻而普遍的損傷,致使政府及領導牠的貴族聯合會已知道再不能像從前那樣利用農民底愚昧與綿羊般的馴服來投機了。政府知道了,牠和那些被牠弄到完全貧窮破產及飢餓的農民羣衆間不能相安無事了。因爲覺悟到與農民“相安無事”之不可能,所以“農奴主聯合會”底政策發生了轉變。該會決定無論如何要分裂農民,從中造出“新式地主”,即豐裕的農民私有主,這個階層“不迫於威嚇而迫於良心”來保護地主大地產底安甯與神聖權,使之不受羣衆所侵害(這種大地主在1905年多少終究是被革命民衆所侵犯了的)(135)。

因此,革命以後政府全部土地政策之轉變,決不是偶然的。反之,這種轉變對於政府,對於“農奴主聯合會”底階級利益着想,乃是必

^{*} 列寧這裏是指1908年12月18號(舊歷5日)斯託雷平在第三次國會上的演說。——(編者)

然的。政府再沒有別的辦法了。政府知道了，牠與農民羣衆之間不能“相安無事”了，農民已從數百年來的農奴制的睡夢中覺醒過來了。政府只剩下一個辦法，就是企圖用盡氣力，用任意破壞農村的方法，來分裂農民，把鄉村交給富農和豐裕的農民去“任意搶劫”，以便憑藉農奴主貴族與“新地主”，就是與富人——農民私有主，農民資產階級的聯合。

斯託雷平會誠心誠意地替‘農奴主聯合會’效勞並實行了該會的政策，他自己說：“給我二十年的安甯，我便改良俄國”。他之所謂“安甯”，就是墓地上的安甯，是要農村忍受着空前的破產與貧窮而不要作聲。他之所謂“安甯”是地主們底安甯，地主們希望農民完全停滯不動、愚昧無知、毫不抵抗，具有這樣的決心：安分守己，死亡於飢寒、交出土地、跑出鄉村、完全破產，只要博得地主老爺們底歡心就是了。斯託雷平所謂改良俄國，就是要引起這樣一個變化，使鄉村中只剩下滿意足的地主、富農、高利貸者以及零散的、愚昧的、無辦法的、軟弱無力的僱農。

在地主們看來，斯託雷平之滿心希望這一種二十年墓地上的安甯，完全是自然而然的和可解的。可是，我們現在已知道，我們已經完全看見而感覺到，結果並不是“改良”，也不是“安甯”，而是三千萬農民底饑荒* 貧窮與破產之空前的（就在多災多難的俄國也是空前的）加緊，農民之怨恨與騷動異常的厲害。

有人向‘國會’提議用批准預算的辦法再來加以贊同（國會中的地主黨當然是會贊同的）的那種所謂“斯託雷平式的”土地政策已

* 這裏是指1911年之大饑荒，收成不好到達二十省，包括農民達三千萬。（編者）

經破產了，爲要明瞭這種破產底原因，讓我來把“新”土地政策底兩個所謂主要的骨幹，加以更詳細的分析：

第一，移民問題。

第二，著名的社外農莊問題。

講到移民問題，那麼，1905年革命已經告訴地主們，農民在政治上已覺醒了，革命會迫得地主們“稍開”方便之門，不像從前那樣阻撓移民，而極力想“緩和”俄國緊張的空氣，極力多把不安分的農民輸送到西伯利亞去。

政府是否得了成效呢？是否使農民多少鎮靜了一些。把俄羅斯及西伯利亞底農民狀況多少改良了一些呢？恰恰相反。政府在俄羅斯與西伯利亞，都使農民狀況更加緊張與惡化了。

我現在證明給你們看。

財政總長在他所作的1913年國家預算草案說明書內，我們看到慣常的官場的樂觀態度和對於政府政策的“成績”的頌揚。

他說道，移民們把荒郊變爲“開化之地”，移民們都發財致富與改良自己經濟等等。一套慣常的官場頌詞！“百事大吉”，“天下太平”這一些老生常談。

所可惜的只是這一個說明書把移民回家的事實完全緘默過去了！好一個奇妙而著名的緘默呵！

先生們，不錯，1905年以後，移民的數目每年平均曾經增加50萬。不錯，移民浪潮到1908年曾經達到最高點，一年之內有66萬5千人。可是，後來浪潮便急速地降落了，到1911年就只有18萬9千人了。這不明明表示政府“安置”移民這種自誇的辦法已成泡影嗎？這不明明表示一共只經過6年之久，政府又回到無辦法的情況中去了嗎？

關於移民回家的數目。即財政總長先生在其“說明書”（正確點

說,是一個隱瞞書)內所故意不提的數目:指明回家移民底人數有百分之人的增加,1910年達到30%到40%,1911年達到60%。這一個巨大的移民回家的浪潮,指明農民之災禍、破產和貧困,已達到絕望的地步。從前,農民賣掉房子,移到西伯利亞去:現在呢又迫得從西伯利亞跑回來,變成完全破產的窮光蛋了。

這一個完全破產的移民回家的大浪潮,極明顯地證明政府移民政策之完全的破產。只引證久居西伯利亞的移民經濟之改良(‘移民管理局’預算案序說明書內就是這樣幹的),而把數萬回家的移民之完全破產默而不提,這簡直是曲解事實!這就是明明否認我們所眼見的破產和貧窮而拿關於百事大吉的紙人紙馬和神話去款待國會裏面的議員。

先生們,財政總長在他的說明書內隱瞞關於回家移民的統計,隱瞞他們的完全貧困的狀況,隱瞞他們的完全破產的情形,這就是政府底一種窮極無賴的隱瞞真情的企圖。這正是徒勞無益呵!真情是隱瞞不了的!真情使人們不得不承認牠。跑回俄國的破產農民之貧困,久居西伯利亞的破產農民之貧困,使人們不得不來提到這種真情。

爲要明白說明我這一個關於政府移民政策之破產的結論,我還要引證一位官吏底評判。這位官吏在西伯利亞森林部內辦事已有27年之久——竟至27年之久,先生們!——他熟悉一切移民事業底條件;他看不慣俄國移民辦事處中那些醜態百出的現象。

這位官吏是一個國封的顧問官,姓卡馬洛夫,就職27年之久,他不能不承認,1910年內閣總理斯託雷平與農務總長克力伏善著名的巡視西伯利亞,是一種“滑稽的巡視”——這是就職27年的國封的顧問官自己說的話!這位官吏看不慣這種風行全國的以“滑稽巡視”做幌子的欺騙,因此,拋棄了職務,寫了一本小冊子,把政府移民政策中

的一切勒索、侵吞、荒謬、野蠻掠奪的情形，都逼真地描寫出來。

這書叫做移民事業紀實，1913年在聖彼得堡出版的，該書載有很多揭露黑幕的材料，書價不高，僅值60哥比。而我國的政府在移民事業上，也同在其他“事業”及其他“管理部門中”一樣，極力隱瞞真情，生怕“家醜外揚”。官吏卡馬洛夫在職的時候會不得不隱藏起來，會不得不用假名字在報上發表揭露黑幕的書信，而官廳會極力“拿辦”通信員。並不是所有的官吏都能拋棄官職和出版揭露黑幕的小冊子的！可是只要看了這一本小冊子，就可以想見這個“黑暗鄉”內是充滿了何等腐敗惡濁的現象。

官吏卡馬洛夫完全不是一個什麼革命家。絕對不是的！他自己曾敘述他是如何誠心誠意仇視社會民主黨及社會革命黨底理論。他是俄國一位普通的最誠心誠意的官吏，只想求得很初步的潔白的正經的精神。信是一個仇視1905年革命和決意替反革命政府出力的官吏。

連這樣的人都棄官不做，潔身自好，這是更值得注意的。他看見政府的移民政策等於“完全破壞合理的林業”（見該書138頁），他看不慣這點。他看不慣“老居民底良田遭受剝奪而日趨於貧窮”（見該書137及138頁）。他看不慣國家“這樣的”盜竊，或更正確些說，破壞西伯利亞的土地及森林；這種盜竊或破壞絕不是從前巴什喜爾土地之盜竊或破壞所能比擬於萬一。

這位……的結論是這樣：

“移民總局完全沒有籌劃妥當去作大規模工作”，“工作完全沒有計劃，工作質量又壞”，“把地質不宜於農業的、缺乏水源或水源不宜於飲用的土地分給人家”（見該書137頁）。

當移民浪潮高漲時，官吏們都弄得張惶失措。他們：

“把昨天才由政府建築起來的林場瓜分了”——“一看見什麼就拿什麼——爲的只要安排和避開那許多精疲力竭的人，往來於移民招待處而在移民管理局門口站幾點鐘的人”(見該書11頁)。

請看以下兩個例子。官廳把‘庫林移民區’分給移民。該區土地是由‘阿爾泰製鹽廠’附近的土人手裏奪來的。土人被搶劫了。新居民碰到不能做飲料的鹹水！官廳動款掘井。沒有結果。新居民要到7、8俄里(7、8俄里！！)之外去挑水！(見該書161頁)。

‘菲埃斯德’區是在曼納河上游。居民有三十家。新居民過了七個困苦的年頭以後，確信土地不能耕種。差不多通通都跑到別處去了。剩下來的幾個人，則以打獸捕魚爲業(見該書27頁)

邱羅·安格爾邊區：官廳把該區劃爲數百塊，九百塊至四百六十塊不等。移民沒有。住不得。遍地都是山脊與沼澤，水質不良。

官吏卡馬洛夫又講到回俄的移民，這是財政總長先生所不願意講的，卡馬洛夫說出爲政府所不高興聽的實話。他關於這些破產而回俄的移民說道：

“人數不止十萬。這樣的份子跑回來，在將來的革命中(如果將來有革命)，會起可怕的作用。……回來的並不是一生都是當過僱農的，有的不久以前還是業主，腦子裏從來不會想到他與土地可以分開，這種人看到官廳不會安插他們而只會使他們破產，心裏當然抱恨。這種人對於任何國家制度都是危險的”(見該書14頁)。

這是官吏卡馬洛夫先生所說的話，他是生怕革命的人。他以為只有地主的‘國家制度’才能存在，這樣想是徒然的。最好而且最文明的國家就是沒有地主也過得去。爲了民衆底利益，俄國沒有地主也過得去。

卡馬洛夫揭示出老居民之破產。因為這些老居民被劫掠，所以甚至號稱“西伯利亞意大利”的米魯新縣也開始“年歲不好”，而照實說來，也開始饑荒。卡馬洛夫先生揭露官場的黑幕：官吏們侵吞公款，虛報賬目和虛擬計劃；工作做得全無成績，如鄂畢、葉尼塞運河之耗費無數百萬，化幾萬萬盧布為烏有。

這位畏神而謙遜的官吏說：俄國整個移民運動都是“一段醜史”（見該書134頁）。

這正是財政總長先生所默而不談的！關於回俄移民的實話，俄國移民政策完全破產之真象正是如此；在俄國與在西伯利亞都是貧窮與破產。盜竊土地，破壞林業整理——虛報賬目，官場作弊。

現在我要說到社外農莊問題。

財政總長先生底說明書，在這個問題上也同移民問題一樣，只說些籠統的、毫無意義的、官場虛報的統計（正確些說是冒牌的統計）。

據說，在1912年的時候，已有150萬以上的農戶完全脫離村社；——一百萬以上的農戶住在社外農莊中。

至於社外農民底實在的經濟狀況到底如何，則在政府的報告中沒有一處講了一句實話！

然而，我們根據誠實的考察家（如已故的孔諾瓦洛夫之流）關於新的土地整理的敘述，根據自己對於農村及農民生活的考察，現在已經知道，社外農民是有彼此完全不同的兩種。政府把牠們一併統計，不分皂白，為的只是要欺騙民衆。

有一種社外農民，為數極少，這就是豐裕的農夫，富農；在未重新整理土地以前，這些人底生活，已經過得不差。這些農民退出農村公社和收買貧農底份地的時候當然剝削他人而致富，使民衆日益

破產和更受束縛。可是，我再重複說一遍，這樣的社外農民，爲數極少。

大多數，而且是絕大多數，都是另一種社外農民，即貧窮破產的農民，他們因飢寒而迫居於社外農莊中，因爲，此外再沒有別的出路了。“無處安身了，還是上社外農莊去吧”——這些農民這樣說。他們在貧窮的經濟上挨餓受苦，他們的一線希望，就是領得遷徙津貼，向國家借得安置費。他們在社外農莊中掙扎，好像鯉魚碰冰一樣；他們賣盡所有的糧食，爲的是向銀行繳納債款，他們欠一世債；窮極無聊；生活和乞丐一樣；他們因不能繳付債款而被人逐出社外農莊，變爲完全無家可歸的漂流者。

如果政府的統計，不虛構空洞的快活風景的圖畫而說明實際的情形，把這些住土屋與牲畜同居、忍飢受苦、兒女衣衫襤褸疾病時發的貧苦農民底情形，據實報告，那麼，我們就會看見“社外農莊底真象”了。

可是，問題就在於政府拚命把社外農莊底這種真象隱瞞。有人獨立去考察農民生活，便加以處分，把他逐出農村。農民在報上投了什麼稿子，便要遭受警察和官廳空前的（甚至在俄國也是空前的）任意摧殘、壓迫和追究。

分明只有極少數的富裕的社外農民，却冒充說是大批致富的農民！分明是官廳關於富農的撒謊，却冒充說是關於農村的實話！然而政府是不能隱瞞真情的。政府隱瞞鄉村破產和饑荒的真象之企圖，僅僅引起農民底正當怨恨與憤怒。去年與前年饑民曾有數千萬人之多；這件事實，比許多長篇大論更足以揭露出：關於社外農莊有造福作用的說法，完全是一種虛假的欺人之談。這件事實，最明顯不過地指明；無論在政府變更土地政策以後，無論在有名的斯託雷平的改良

以後，俄國農村之受壓迫、被剝削、貧窮、享不到權利，還是同以前在農奴制度時代一樣。貴族聯合會底“新”土地政策，完全保留着舊農奴主及其幾千幾萬俄畝的大地產底壓迫。“新”土地政策會使舊地主發財，使少數農民資產階級致富，而使大批農民羣衆越更破產。

已故的斯託雷平在說明並擁護自己的土地政策時，高聲叫道：“我們以強者爲靠山”。這句話值得注意並值得記住，因爲，這是不可多得的老實話，這是總長所不常講的老實話。農民明白知道了、並由本身的經驗領會了這句實話，這句實話的意思就是說：新法律，實際上就是爲富人所享用及由富人所擬定的法律；而新政策，實際上就是爲富人所享用及富人所執行的政策。農民懂得了那個“不巧妙的”訣竅：老爺們的國會所擬出的法律，也是老爺們的法律；政府是農奴地主支配全國的代表機關及統治機關。

如果斯託雷平會想拿他的“著名的”（遺臭萬年的）“我們以強者爲靠山”這一句格言，來教會農民了解這一點；那麼，我們却深信，他在破產的憤恨的農民羣衆中已找到而且還會找得這樣一些好學生，這些學生知道了政府靠着誰以後，就更會明白地懂得他們自己應當靠着誰：靠着工人階級及其爭取自由的鬥爭。

爲使我的話不致空無憑證起見，且引舉幾個例子：這些例子，是一位能幹而忠於職務的考察家孔諾瓦洛夫從實際生活中引舉出來的（孔諾瓦洛夫：現代農村概況，1913年在彼得堡出版，定價一個半盧布）。

在阿爾洛夫省李文縣，社外農莊是由以下四家大地產分成的：安德列、佛拉齊米洛維赤大公名下5千俄畝，波列可夫名下9百俄畝，拉波可夫名下4百俄畝，科爾富名下6百俄畝。總共約7千俄畝。每個社外農莊分得9俄畝，分得12畝的只是例外，所以一共有六百個。

以上的社外農莊。

爲要更清楚點說明這些數目字底意義起見，再引1905年關於阿爾洛夫省的官廳統計。該省五個貴族共有 143,446 俄畝土地，平均每人有 2 萬 2 千俄畝。很明顯的，這樣驚人的大地產，並不是完全由地主經營，而只是用來壓迫和束縛農民的。從前地主屬下的，每戶擁有份地6俄畝以下的農民在1905年爲44,500戶，共有土地 137,600俄畝。一個地主擁有2萬8千俄畝，一個“地主的”貧苦農夫只有四俄畝。

阿爾洛夫省擁有 5 百俄畝以上的貴族，在 1905 年共有 3 7 8 人，共有土地 5 9 2 、 0 0 0 俄畝，平均每人有 1 5 0 0 多畝而該省“從前的地主屬下的”農民，每戶擁有份地 7 俄畝以下的共有 12 4,600 戶，共有土地 6 4 7 、 0 0 0 俄畝，平均每戶有 5 俄畝。

由此可見阿爾洛夫省的農民被農奴主大地產壓迫到什麼程度，李文縣分爲社外農莊的四大田莊在貧窮海內是何等微小的一滴。但是社外農民在自己的這塊9俄畝的土地上又是怎樣謀生呢？

每畝估價爲 220 個盧布。農民每年要繳 118 個盧布零 80 哥比（就是說，每畝耕地大約要繳20個盧布）。貧苦的農民是付不起這筆款子的。他把一部份土地很廉價地出租了，只爲的要弄到幾個錢。賣盡糧食來繳款給銀行。再沒有留下做種子和糧食的了。要去借錢，又要受束縛。母牛賣掉了，剩下一匹瘦馬。農具是舊的。更莫想去改良經濟。“小孩們莫說不記得牛奶怎樣喝，連牛奶是什麼顏色都忘記了”（198頁）。到期不繳款，便要趕出農莊之外，於是完全破產了。

財政總長先生在自己的說明書裏，竭力用土地整理（倒不如說是土地破壞）這一套空話，寬懷地掩飾這種農民破產的事實。

關於1911年末出賣土地的農民人數，總長先生在自己的說明書第二部第57頁引了一些官場的統計。這數目是385、407家。

總長先生這樣“安慰”人家道：買主人數（32,840）“與賣主人數（385,407）很相近”。每個賣主平均賣出3,9俄畝，每個買主平均買2,4畝（說明書58頁）

這有什麼可安慰的呢？第一，就是這些官場統計也指明買主比賣主少些。這就是說，鄉村的破產與貧窮是增加了。第二呢，因為法律禁止購買份地超過法定的不大的數量（136），所以買主逃避法網，用老婆、親戚及別人底名義去買土地；這一點誰不知道？農民不得不用一切其他的交易形式如出租等等來出賣土地，這種制度非常發展，這一點又誰不知道呢？你們只要看一看阿波倫斯基公這位半立憲民主黨人、半十月黨人在俄國思想上做的文章，就可以知道：連這位充滿地主思想的地主也承認，富豪們購買大批份地，並用各種逃脫法網的手續來掩飾！！

不，先生們！政府與貴族底“新”土地政策就是貴族先生們為保留自己的私產及收入（而且甚至常藉地價之暴漲及“農民銀行”之多方寬待貴族而增加自己的收入）而能做到的一切。

而這種貴族的“一切”已化作烏有了。農村破產加深了，怨恨情緒也加深了。農村中的怨恨情緒，真是厲害到令人驚惶了。所謂流氓行動大半都是農民怨恨達於極點和他們原始形式的反抗之結果（137）。現在數百萬被“土地整理家”所空前迅速地粗魯地殘忍地陷於破產境地的飢餓農民，他們所表現的這一種怨恨和這一種反抗，決不是任何取締及懲辦所能消滅的。

不。貴族的或斯託雷平的土地政策並不是一條出路，而只是苦痛地走近俄國土地問題新的解決。這個解決底實質當怎樣，這甚

至從愛爾蘭底命運中間接看得出來；愛爾蘭經過地主方面的多方妨害、遲延及阻撓以後，土地終究還是轉到了法麥手裏。

俄國土地問題底實質何在呢？關於大地產的數字再清楚不過地說明了這個問題。這些數字是從1905年正式的官場統計中引來的；凡是認真關心於俄、農民底命運及國內政治狀況的人，一定要注意到這些數字。

請看歐洲俄羅斯方面的地主大地產。佔有五百俄畝以上的地主共27、833人，共有土地6千2百萬俄畝！再加上皇室封地及烏拉爾工廠主底最大地產，總共就有7千萬俄畝了；而地主數目，却還不到3萬人。每個大地主平均有2千俄畝以上。699個大地主，每人佔地1萬俄畝以上，共有20,798,504俄畝。由此可見，俄國的大地產是大到什麼程度。這些土地大王平均每個差不多有3萬俄畝(29,754)！

這樣大得驚人的農奴制的地產，在歐洲甚至於在全世界上都不易找到。

最重要的，就是這些土地上只有一部份是經營資本主義經濟，即是用僱工底勞動和地主底農具耕種土地。大部份經濟都是農奴制的經濟，即是地主束縛農民，像1百年3百年及5百年以前一樣，逼迫牠們用農民的耕馬和農民的工具來耕種地主的土地。

這不是資本主義。這不是歐洲式的經濟方式，請右派先生們和十月黨人先生們注意這一點，你們總是因自己願意使俄國農業“歐化”(即依歐洲式來改造)而自命不凡！不，這完全不是歐洲式的。這是老大大中國式的；這是土耳其式的；這是農奴制式的。

這不是完善的經濟，而是土地的高利貸制，這是陳舊不堪的奴役制。一個貧窮的農民甚至在年歲好的時候還是個窮光蛋，還是半餓

不飽；帶着一匹瘦餓的馬和幾件陳舊不堪的可憐的工具，到地主“老爺”那裏去受束縛；因為，農夫們已經投身無地了。

如果農民不甘受“老爺”去束縛，老爺們就不給租地、不給過路、不給水池、草場、也不給木料。農民如果“非法”砍伐林木，被拿獲了怎麼辦呢？巡警、切爾克斯兵以及類似的人就把他打一頓，然後就是這位在國會中大談俄國農業進步與歐化等等的老爺，叫受打的農民選擇一事：或者是進牢獄，或者替他播種並收割二三俄畝！農民的牲畜踐踏田禾也是一樣；借糧過冬也是一樣。借用草場牧場等等，都是一樣。

這不是地主底大經濟。這是對於農民的束縛。這是藉各有數千俄畝的大地產，地主們底大地產來向千百萬貧苦農民實行農奴制的剝削，從各方面去壓榨與絞緊他們！！

社外農莊所解放的，只是極少數的富農。而大批羣衆依舊挨餓。地主老爺們，請問歐洲何以老早就沒有饑荒了呢？何以在那裏只在農奴制之下才有過像俄國1910至1911年那樣可怕的饑荒呢？

因為，歐洲沒有農奴制的束縛。歐洲有富農、中農、也有僱農，可是沒有千百萬破產到底的、一貧如洗的、無權的、閉塞的、依賴着“老爺”而永久過苦工生活的農民！

怎樣辦呢？出路在那裏呢？

出路只有一條：使農村解脫這些農奴制的大地產的束縛而且無代價地把這7千萬俄畝土地從地主手上轉交到農民。

只存這一條出路才會把俄國弄得真像個歐洲式的國家。只有這一條出路，才會把俄國千百萬農民得以透息一下恢復元氣。只有這一條出路，才會 俄國這一個受地主奴役而終年挨餓的貧苦農民底國家變為“歐洲進步的”國家；由無知識者底國家變為有知識的國

家：由落後的死不長進的國家變為能發展能前進的國家；由人民無權的奴隸制的國家變為自由的國家。

工人階級底政黨覺悟到：除了自由的民主的機關之外，沒有而且不能有其他達到社會主義的道路，因此指出：政府用自己的土地政策又使俄國走入了絕路；脫離這條絕路的出路，便是把一切地主的土地無代價地轉交農民，便是由新的革命來奪取完全的政治的自由。

1913年6月

3 土地問題與俄國現狀(138)

(政論家底時評)

不久以前，雜誌上有過兩篇有趣味的文章談到這個題目。一篇是洛什可夫作的，登在取消派底我們的曙光上（1911年）；另一篇是波爾菲洛夫作的，登在立憲民主黨右派底俄國思想（1913年第8期）上。毫無疑義地，這兩位作者在寫文章時彼此是完全不知道的，他們是從彼此各不相同的前提出發的。

可是這兩篇文章却非常相似。這裏很明顯地看出（這使得這兩篇文章有特別的價值），自由派的工人政治家底思想與反革命的自由派資產階級底思想有原則上的血統關係。

洛什可夫所引用的材料與波爾菲洛夫完全一樣，不過後者比較廣泛一些。1905年以後，俄國農業中的資本主義日益發展。糧食價格與土地價格，都增長起來了；農業機器及肥料底輸入增加了，同時國內農業機器與肥料底生產也增加了。經營小借貸的機關增加了。在社外經營田地的農民人數增加了。工資增加了（從1890至1910年增加44.2%，這是洛什可夫所報告的，可是他把這個時期以內生活費漲價的事實忘掉了！）。商品性的畜牧業、造油業、種草業、農業教育事業，都有長進。

當然，這些都是很有興味的。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不能阻止的，這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甚至是無容懷疑的。如果作者們只拿新的材料來

說明這一點，那就不能不感謝他們了。

可是，問題底全部實質却在於對這些材料的估計，由這些材料所得出的結論。洛什可夫在這裏性急萬分……簡直感動人心。他說：

“地主農奴制的經濟已經蛻化爲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經濟了……農村經濟中農奴制度之過渡爲資產階級制度，乃是已成的毫無疑義的事實……從前那樣的土地問題，在俄國已經沒有了……用不着企圖使這個死屍（舊式的土地問題）復活了”。讀者可以看到，這裏的結論是完全明白和完全……是取消派的。取消派雜誌底編輯部，給這篇文章加上這樣一個附帶的申明（這在營業性的無原則的編輯部內早已通行）：

“有許多地方我們都是不同意的……我們認爲，決不能像洛什可夫那樣堅決地斷言，說俄國，正是依照着11月22號（舊歷初9）與6月27號（舊歷14）的法律所劃定的道路而走的”。

取消派是“不像”洛什可夫“那樣”堅決的！對問題的態度真深刻而有原則呵！

洛什可夫底文章再三證明，他背熟了許多馬克思主義底原理，可是沒有了解牠們。因此牠們容易“滑出了”馬克思主義的軌道。

就是在1861至1904年間，俄國農業中的資本主義也是有過發展的。洛什可夫與波爾菲洛夫現在所舉出的那些徵象，當時已經有過。資本主義底發展，沒有消滅1905年的資產階級民主的危機，而準備了牠，加緊了牠。爲什麼呢？因爲舊有的、自給的、半農奴制的經濟已經受到破壞，而對於新的、資產階級的經濟，條件還沒有建立起來。因此，1905年的危機便非常緊張。

洛什可夫說：諸如此類的危機，其基礎已經消失。當然，如果抽象地講，只是一般地講資本主義，而不是講俄國，不是講1913年，那

末，這是可能的。馬克思主義者當然只是在特殊的條件之下（不是在任何時候，不是在任何地方）才承認有資產階級民主的土地問題之存在。

可是，洛什可夫甚至於還不懂得：如果他想證實自己的具體的結論，他就應當證明怎樣的原理。

農民不滿意於自己的狀況嗎？——“可是任何地方的農民都是不滿意於自己的狀況的。”——洛什可夫這樣寫着。

西歐農民的鄉村和他們在法律上的生活，都完全是資產階級性的，他們組織“秩序黨”（139）；拿西歐農民之不滿意來與俄國的飢荒，來與鄉村之完全處於等級方面的卑賤地位，來與法權等方面之完全的農奴制度相提並論，這未免幼稚得可笑。洛什可夫只見樹木而不見森林。

他寫道，資本主義日益發展，賦役制（工役制）日趨衰落。

自由派波爾菲洛夫也寫道：

“絕大多數的地主，日益發展付定錢的和分成的制度，這種制度完全是農民需要金錢及土地的結果”。

俄國思想方面的自由派，還不如取消派的我們的曙光方面過去的馬克思主義者那樣幼稚地抱樂觀！

洛什可夫關於現代農村中收穫平分制、工役制、賦役制及奴役制度傳播程度的材料，連提都沒有提到。牠們的傳播究竟還是廣泛的；而洛什可夫竟如此輕易地逃過這一事實。但是從這一事實中就應得出結論：資產階級民主的危機已越加緊張起來。取消派說，不要把死屍復活；這完全重複自由派底話，因為，自由派曾用另一套話來宣佈1905年的要求為“死屍”。

我們對於這一點曾經這樣回答：馬爾可夫及普力什克維赤*，並

不是死屍，產生了而且至今還在產生着他們的經濟，並不是死屍。與這個階級作鬥爭，是活工人底活任務，這些工人對於自己的階級目的有活的了解。

離開這種任務。就是表示取消派底屍體腐爛，取消派雖然不是人人都像洛什可夫說得“那樣堅決”，可是，他們人人都是忘記或抹煞那種與土地關係上（特別是土地佔有關係上）及政治上的普力什克維赤統治的鬥爭。

普力什克維赤之流在俄國生活中的統治，正是反映着農村中的所謂工役制、奴役制、賦役制、農奴制及反映着資產階級經濟的最弱的普通條件之缺乏。要是百萬家財的大經濟主（如古契科夫及其同伴）埋怨於上，——這就是千百萬小經濟主（農民）底狀況完全不堪於下了。

工人以反對普力什克維赤統治底根源為自己的任務，這絕對不是離開“自己的”任務來把什麼毫不相干的東西“復活”。不是的。他們這麼一來，就向自己指明自己的鬥爭、自己的階級底民主任務；他們這麼一來，就教訓廣大的羣衆，使他們明瞭民主主義及社會主義進步。因為，只是“國王的普魯士社會主義”（馬克思在反對施維澤（140）時所用的話），才能抹煞一般的普力什克維赤統治，尤其是土地佔有制關係上的普力什克維赤統治之農奴制的無上威權。

洛什可夫已墮落到波爾菲洛夫底地步而不自知。波爾菲洛夫說：如果不採用深耕制而“只是添補土地”，這是“無濟於事”的！正好像在剷除了普力什克維赤統治以後，深耕制之進行，不會加速百倍！

* 馬爾可夫與普力什克維赤，同為俄國農奴地主底代表。古契科夫是俄國大資產階級底代表“十月黨”底組織者。——（按者）

正好像這裏的問題，只是涉及農民（是不是給他們添補土地），而不是涉及全體民衆，不是涉及被普力什克維赤統治所折磨的、所阻礙的全部資本主義發展！

洛什可夫洩露了取消主義底實質，因為他指出“結社自由”這個包羅一切的口號（請將1913年11月5日【舊曆10月25日】杜列可夫在國會中發表自由主義的演說時對這個口號的提法，和巴達也夫在同時同地發表馬克思主義的演說時對這個口號的提法，拿來比較一下）（141），是與滿意土地問題現狀有聯繫的。

這個聯繫，乃是一件客觀的事實；我們的曙光並不能用一些“遁辭”將牠消滅下去。

不要着想到全體民衆，不要着想到全部社會生活中的普力什克維赤統治，不要着想到農民的飢荒、工役制、賦役制與農奴制；而來“爭合法性”、爭改良之一種——“結社自由”罷，——這就是資產階級在工人裏面所宣傳的思想。洛什可夫和取消派不懂得這一點，只是跟着資產階級跑，做牠的尾巴。

我們却認為，無產階級，全體勞動羣衆底先進代表，就是爲要達到本身的解放，也不能不經過和普力什克維赤統治作各方面的鬥爭，以便與資產階級進行鬥爭，——這些思想，就是馬克思主義者與自由派的工人政治家所不同的地方。

1913年11月

第 四 篇

1908—1914年

時期內的民族問題

1 論民族自決權 (142)

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政綱第九條(143)講到民族自決權。近來，這一條已引起(我們在教育上已經指出來了)*機會主義者底整個的攻擊。俄國取消派謝可夫斯基在彼得堡取消派的報紙上，猶太工人同盟派李勃曼以及烏克蘭民族社會黨人尤爾克維赤都在自己的機關報上攻擊這一條，以極其鄙視的態度來侮辱牠。“各種言語的”機會主義向我們馬克思主義者的政綱的“攻擊”，無疑義的是與現時一般的民族主義的動搖有密切的聯繫。因此，我們認為現在正好來詳細分析這個問題。我們只要指明一點，就是以上所舉的這些機會主義者沒有舉出一個獨立的理由來，他們都只是把1908至1909年盧森堡在民族問題與自主那篇用波蘭文寫的長文內所說過的，拿來重複一遍。我們以後要講得最多的正是關於盧森堡底那些“獨創的”理由。

1、何謂民族自決？

要想以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來研究所謂自決，自然首先要提出這個問題。所謂自決是什麼呢？在那些由法權底各種“一般的概念”中

* 列寧在這裏是指自己的一篇論文民族問題短評(參看列寧全集)

第17卷第129至159頁。——(編者)

得出來的法律定義中去找答案呢？還是在民族運動之歷史的經濟的研究中去找答案？

難怪謝可夫斯基、李勃曼、尤爾克維赤之流的先生們猜都沒有猜想到提出這個問題，他們只是嘲笑馬克思主義政綱之“不清楚”，藉此敷衍塞責；他們由於頭腦簡單的緣故，大概竟不知道，關於民族自決的話，不但是1903年俄國政綱說到了，而且1896年倫敦國際大會底決定就講到了（這以後要詳細來講）。更奇怪的就是，常說政綱底這一條太抽象太虛玄的盧森堡，自己却正犯了抽象和虛玄的錯誤。正是盧森堡經常迷戀於民族自決問題之一般的議論（直到完全滑稽的議論：怎樣去認識民族底意志），從來就沒有明確地設問：事情的本質，究竟是在於法律的定義，還是在於全世界民族運動的經驗？

這一個為馬克思主義者所必要提出的問題只要有確切的提法，就立刻可以把盧森堡底理由打倒十分之九。民族運動並不是第一次在俄國發生，也不是為俄國一國所特有。全世界上，資本主義澈底戰勝封建制度的時代曾與民族運動有聯繫。這種運動底經濟基礎就在於：為要使商品生產完全勝利，就需要由資產階級奪取國內市場，就需要使語言一致的人民底領土用國家的形式團結起來，同時剷除妨害這種言語底發展及在文藝上鞏固起來的一切障礙。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語言之統一及順利發展是真正自由的廣泛的、適合於現代資本主義的商品週轉底最主要條件之一，是人民自由廣泛地團集為各個階級的最主要條件之一，最後，又是市場與任何及每個大經濟主或小經濟主、賣主及買主發生密切聯繫的條件。

所以一切民族運動底趨向，就是要組織最能滿足現代資本主義底這些要求的民族國家。最深刻的經濟原素推動實現這一點，所以對於整個西歐——而且是對於整個文明世界，資本主義時代標本式的

經常的國家，就是民族國家。

所以，要是我們想了解民族自決底意義，不去玩弄法律上的定義，不去“捏造”抽象的定義，而去研究民族運動之歷史的經濟的條件，那我們就一定要得出這樣的結論：所謂民族自決，就是民族在國家關係上脫離外族的集體，就是組織獨立的民族國家。

民族自決權之所以只能了解分立的國家存在之權而不能了解為別的，這還有其他的原因，以後再講。我們現在應該講一講，盧森堡怎樣會企圖“逃避”一個必然的結論：造成民族國家的趨向有其深刻的經濟基礎。

考茨基所著的那本民族性與國際性的小冊子（1907至1908年新時代*，第一年底附錄，俄文譯本登在1910年里加的科學思想雜誌上）**，盧森堡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她也知道：考茨基在該書第四節裏詳細分析到民族國家的問題，並得出了一個結論，說鮑威爾“看輕趨向於組織民族國家的力量”（第23頁）。盧森堡自己引考茨基底話：“民族國家是國家底一種形式，這種形式最適合於現代的條件”（即資本主義的、文明的、經濟上進步的條件，與中世紀的、資本主義以前的條件不同），“是這樣一種形式，在這種形式中，牠最容易能夠完成自己的任務”（即最自由、最廣泛、最迅速地發展資本主義的任務）。這裏還要加上考茨基底更確當的結論，他說，民族關係複雜的國家（與民族國家不同的所謂多民族的國家）總是因為某些原因，其內部的結構老是不經常的或發展不足的”（落後的）。考茨基之所謂不經常，當然完全是指與那些最適應資本主義發展要求的東西不相符合而言。

* 新時代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底理論機關報。——（編者）

** 認可以參看考茨基底民族問題論文集。

現在要問：盧森堡對於考茨基這些歷史的經濟上的結論，到底取怎樣的態度呢？結論正確不正確呢？是考茨基歷史的經濟理論對，還是鮑威爾之以心理為基礎的理論對呢？(144)鮑威爾之確實無疑的“民族機會主義”：他之擁護文化民族自治，他之迷戀於民族主義（“有些地方加強民族成分”，這是考茨基底話），他之“極其誇大民族成分而完全忘記國際成分”（考茨基）——所有這些與他之看輕趨向於造成民族國家的力量，有什麼聯繫呢？

盧森堡關於這個問題，提都沒有提出來。她沒有看出這種聯繫。她沒有把鮑威爾底全部理論觀點想一想。她甚至完全沒有把民族問題中的歷史的經濟的理論與心理的理論對立起來。她只用以下的幾句話來反對考茨基。

“……這一個“最好的”民族國家只是一種抽象的東西，牠容易被人拿去作理論上的發揮和理論上的擁護，但不符合於實際的情形”（社會民主黨的評論，1908年第6期499頁）。

盧森堡為要證實這種堅決的申明起見，接着又說，大資本主義列強的發展與帝國主義，將小民族底“自決權”化為幻想。盧森堡高聲叫道：“黑山人、保加利亞人、羅馬尼亞人、塞爾維亞人、希臘人、甚至於部份的瑞士人，在形式上是獨立的；他們的這種獨立性，本身就是“歐洲音樂會”的政治鬥爭及外交把戲底產物；是否可以嚴重地候到他們的“自決”呢？（第500頁）。最能適合條件的“不是考茨基所提出的民族的國家而是強盜式的國家”。然後，他又引用了關於英法等國殖民地面積的數目表。

讀了這些話，不能不佩服作者竟能如此不懂得：什麼東西對什麼東西有關！她還神氣活現地教訓考茨基，說什麼小國在經濟上依賴大國；什麼資產階級國家為着用強盜手段去征服異族而彼此互相鬥爭；

什麼存在有帝國主義和殖民地——這都是些可笑的小孩子的妄作聰明，因為，這些都與問題沒有半點關係。豈但小國，就是像俄羅斯這樣的國家在經濟上也完全依賴於“富強的”資產階級國家之帝國主義財政資本的勢力。豈但是巴爾幹半島上的幾個小國，就是十九世紀的美國，在經濟上也曾經是歐洲底殖民地；關於這一點，馬克思在資本論裏面就已經說過。所有這些，考茨基和每個馬克思主義者當然知道得十分清楚；但是，在民族運動及民族國家的問題上，講這種話簡直是文不對題的。

盧森堡把資產階級社會裏面民族政治自決問題，把民族底國家獨立問題，暗中改爲民族底經濟獨立問題。這猶之乎一個人討論關於在資產階級國家內給國會（即人民代表機關）以最高威權的這個綱領要求時却發表自己關於大資本在資產階級國家任何制度之下都握有最高威權的正確意見是一樣的聰明。

毫無疑義的，亞洲（世界上人口最密的地方）大部份的領土，或者是“列強”底殖民地，或者是民族關係上極不獨立的和極受壓迫的國家。可是這種人人皆知的情形，又豈能絲毫動搖這一件無庸爭辯的事實：在亞洲本身內，只有在日本，就是說，只有在這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裏，才造成了一種使商品生產能夠極充分發展的條件，使資本主義能夠極自由、極廣泛、極迅速發展的條件。這一個國家是資產階級的國家，因此，他自己已開始壓迫其他的民族、束縛殖民地；亞洲是否來得及在資本主義沒有崩潰以前，也像歐洲一樣形成一批獨立的民族的國家，這個我們還不得而知。可是，有一點是毫無疑義的，就是資本主義把亞洲驚醒起來以後，在那裏也各處喚起了民族運動，就是這些運動底趨勢是在亞洲創立一些民族的國家，就是這樣的國家恰巧就保證資本主義的發展以最好的條件。亞洲這一個實例是擁護考

茨基而反對盧森堡的。

巴爾幹半島各國底實例也是反對她的：因為，現在大家都知道，隨着在這半島上建立獨立民族的國家的程度，在巴爾幹半島上正在形成資本主義發展底“最好的”條件。

所以，一切先進文明的人類底例子，巴爾幹半島底例子和亞洲底例子，都違背着盧森堡底意志，證明考茨基立論之絕對正確：民族國家是資本主義底通例與“常規”；而民族關係複雜的國家，却不是落後就是例外。從民族關係上看來，最適宜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當然是民族國家。這當然並不是說，這樣一種基於資產階級關係的國家，能排除剝削與民族壓迫。這祇是說，馬克思主義者不能忽視那種產生力求建立民族國家的趨向之强有力的經濟原素。這是說，從歷史的經濟的觀點看來，馬克思主義者綱領上的“民族自決”，祇是政治的自決，國家的獨立，民族國家的形成，決不能其他的意義。

從馬克思主義的、即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上看來，在什麼條件之下，才能贊助“民族國家”這個資產階級民主的要求？關於這一點，以後還要詳細說到。現在，我們祇是給“自決”這個概念，下一個定義。不過還應當指出一點，就是盧森堡還知道這個概念的內涵（“民族國家”），而她的機會主義的同伴如李勃曼、謝可夫斯基、尤爾克維赤之流，却連這一點都不知道！

2、問題之歷史的具體的提法

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的時候，無條件地要求把問題放在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再則，如果是講到一國（例如，講到該國的民族綱領），則還要估計，在同一歷史時代以內，該國與其他各國不同的具體的特點。

馬克思主義底這一個無條件的要求，應用到我們的問題上又是怎樣的意思呢？

這首先就是說，必需嚴格分清由民族運動觀點看來是根本不同的兩個資本主義時代。一方面是封建制度與專制政體破產的時代，是資產階級民主社會及國家形成的時代，這時候民族運動初次成為羣衆的運動，用出版品及參加代議機關等辦法，而把各階級的人民捲入政治漩渦。另一方面是這樣一個時代，這時候，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完全形成，立憲制度早已建立，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間的對抗局面已經大大發展；這時代可以叫做資本主義破產底前夜。

第一時代底標本現象，就是因為奪取一般的政治自由，尤其是因為爭取民族權利的關係，民族運動掀起，人數最多而“最難發動”的農民被牽引去加入這些運動。第二時代底標本現象，就是沒有羣衆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這時候，發展的資本主義既然使已經完全捲入商品週轉之內的各民族漸漸接近而雜居，於是把那個已在國際上溶合起來的資本與國際工人運動間的對抗局面放到第一位。

當然，這兩個時代之間並沒有城牆隔着，而是由無數的過渡連環聯繫着；而且各個國家，還因民族發展底速度、人口底民族成份、人口底分佈等等而各不相同。如果不估計到所有這些一般的歷史的條件和具體的國家的條件，那就根本談不到着手製定該國馬克思主義者底民族綱領了。

這裏，我們恰巧遇到了盧森堡底議論中最軟弱的地方。她非常熱心地挑選一些“厲害”的字眼，修飾自己的文章，來反對我們的綱領第九條，說她是“籠統的”、“拘守成規的”、“虛玄的空談”，諸如此類等等，以至無窮。這位女作家既然如此高明地斥責玄學（在馬克思主義的意思上，即是反辯證學）及空洞的抽象，她自然就該給我們一個用

具體的歷史的方法來研究問題的模範。問題是講到在一個一定的國家（俄國）與一定的時代（二十世紀之初）以內的馬克思主義者底民族綱領。盧森堡大概也提出這樣的問題：俄國現在處在怎樣的歷史時代、這一個國家在這一個時代中的民族問題與民族運動，具有怎樣的具體特點？

可是盧森堡關於這一點竟絲毫沒有說到。民族問題在該歷史時代中的俄國的怎樣擺着，俄國在這方面具有怎樣的特點，對這個問題的分析，在她那裏是連影子都找不出來的！

人們告訴我們，說民族問題在巴爾幹與在愛爾蘭不同，說馬克思在1848年的具體條件之下就是那麼樣那麼樣估計了波蘭的與捷克的民族運動（整頁引證馬克思的話），說恩格斯就是那麼樣那麼樣估計了瑞士森林區反對奧地利的鬥爭以及1815年的莫加登之役（整頁摘引恩格斯底話與考茨基對於一點的評註），說拉沙爾曾認為十六世紀德國農民戰爭是反動的等等。

這些意見與引證，固然沒有什麼新奇，可是無論如何，讀者如果再三迴想，馬克思、恩格斯與拉沙爾曾經用什麼態度研究過個別國家底具體歷史的問題，這却有些興味。你們熟讀這些從馬克思與恩格斯那裏摘來的教訓人們的引證，就能更明顯地看到盧森堡已使自己陷於何等可笑的地步。她用銳利的詞鋒，用憤激的情緒宣傳必需用具體歷史的方法，來分析各個時代各個國家的民族問題；同時，她又絲毫不打算決定：二十世紀初開的俄羅斯是處在資本主義發展底怎樣的歷史階段，這一國家底民族問題有怎樣的特點。盧森堡舉些例子，來說明別人家怎樣用馬克思主義的精神來研究問題，這好像是故意指明，有些人如何往往用好意去鋪設地獄；用許多忠言去掩飾他們自己之不願或不會在實際上利用這些忠言。

拿一件教訓人們的事實來對比一下。盧森堡在反對波蘭獨立口號時，曾引證她的1893年的著作，這本書證明，“波蘭工業發展”迅速並且牠的工廠製造品推銷於俄國。不消說，從這裏完全不能得出與民族自決權問題有關的結論，這一點祇是證明了舊式貴族的波蘭之消滅等等。但盧森堡却總是暗中作出這樣的結論，說在那些使俄國和波蘭合併的各因素中，現代資本主義關係底純粹經濟因素在現在就已佔到優勢。

我們的盧森堡又談到自治問題——雖然她的文章叫做一般的民族問題與自治——開始來證明波蘭王國有特別權利要求自治（請看1913年教育雜誌12期）*。盧森堡爲要證實波蘭有要求自治之權利起見，說明俄國底國家制度，按其各種標誌，顯然是按其經濟的、政治的、生活的與社會的標誌，乃是那些構成“亞洲式的專制政體”這個概念的特徵底總和。（評論第12期第137頁）**。

大家都知道，這樣一種的國家制度，當該國經濟還完全是以宗法的、資本主義以前的特徵佔優勢，商品經濟及階級分化底發展極其微小的時候，是極其鞏固的。如果在這樣的國家內，國家制度厲害地具有資本主義以前的特質，有一個民族上隔離的區域裏的資本主義迅速發展，那末，這個資本主義的發展越快，則牠與資本主義以前的國家制度之間的矛盾越厲害，先進區域之脫離整體越有可能——這區域不是由於“現代資本主義的”，而是由於“亞洲式的專制政體的”聯繫而與整體聯繫着的。

* 這裏列寧引證自己的民族問題短評這篇文章。（參看列寧全集第17卷129到159頁）——（編者）

* 評論是波蘭社會民主黨人底機關報。——（編者）

如此，盧森堡連關於俄國政權（對資產階級的波蘭而言）底社會結構的問題都不能自圓其說，而關於俄國民族運動底具體歷史的特點的問題，則提都沒有提起。

3、俄國民族問題底具體特點及

俄國資產階級民主的改革

“‘民族自決權’這一個原則，是極單純籠統的一點；牠顯然是同樣適用於各民族，不但適用於俄羅斯境內的各民族，而且適用於德國及奧國、瑞士及瑞典、美洲及澳洲境內的各民族，這種原則雖然富於伸張性，可是在現代社會黨底綱領內沒有一個採用牠的”（評論第6期第438頁）。

盧森堡攻擊馬克思主義的綱領第九條時，一開始就是這樣說的。她把這一條綱領稱為“十足的普通之點”，她自己就正是陷於這種錯誤，因為她竟可笑地大胆地說，這一條“顯然是同樣適用”於俄德等國的。

我們回答道：顯然的，盧森堡打算在自己的文章內寫出一部為中學生當教科書用的邏輯錯誤大全。因為她的議論只是一片胡說和譏笑問題之歷史的具體的提法。

如果不是拿小孩子的脾氣而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談論馬克思主義的綱領，那就很容易看出，這個綱領是關係於資產階級民主的民族運動的。要是這樣，——而且的確是這樣——那末，“顯然的”，這一個綱領是籠統地適用於一切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民族運動的一個“普通之點”等等。這就是我們的綱領只是與存在着這種運動的地方有關係；這樣的結論對於盧森堡也只要稍加思索就會明白的。

盧森堡要是把這些顯然的理由加以思索，就不難知道，她所說的話，是多麼糊塗。她責備我們提出“普通之點”，這就是引用這樣的理由來反對我們：在沒有資產階級民主的民族運動的那些國家底綱領內並沒有說到民族自決的話！好一個聰明的理由！

拿各國政治的及經濟的發展來比較，以及拿各國馬克思主義的綱領來比較，這從馬克思主義底觀點看來是有莫大意義的，因為，現代各國共同的資本主義的天性及其共同的發展定律都是無容疑義的。可是這樣的比較須要得當，這裏的初步條件就是要看清被比較的國家底歷史發展時期，是否可以比較。譬如，拿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底土地綱領與西歐的來“比較”，這就完全是個蠢子（如特魯伯茨基公在俄國思想上一樣（145）），因為，我們的綱領是回答資產階級民主的土地改革問題的，而在西歐各國連談都談不到這樣的改革。

對民族問題也是一樣。民族問題在西歐大多數國家內老早就解決了。在西歐各國綱領內去找對不存在的問題的答覆，這是可笑的。這裏盧森堡恰恰忘掉最重要的一點：資產階級民主的改革早已完成的國家與還未完成的國家之間的差別。

全部關鍵就在這個差別上。盧森堡底洋洋數萬言長文章，其所以變為一種空洞而無內容的籠統的議論，就是因為她完全忽視了這種差別。

在西歐大陸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時代，包括有一個十分確定的時期，例如是從1789起至1891年止。這個時期恰恰是民族運動及建立國家的時期。這時期完結以後，西歐已轉變為資產階級的、而照例是民族統一的國家底成熟系統。因此，誰如果現在還到西歐社會主義者綱領內去找民族自決權，這就是不懂得馬克思主義底初步。

在東歐與亞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時代只是從1905年才開始。

俄羅斯、波斯、土耳其及中國等國的革命，巴爾幹的戰爭（146）——這就是我們的“東方”現時各種世界事變底連環。只有瞎子才不會看見：事變底這一個連環就是許多資產階級民主的民族運動底掀起，力求造成民族獨立民族統一的國家之趨向。正因為而且只是因為俄國及其鄰邦還處在這一時代，所以我們要在我們的綱領內載入民族自決權這一條。

還要把盧森堡底文章摘引下去：

“……特別是，處在民族成份非常複雜的國家而應將民族問題看作首要問題的黨，如奧國社會民主黨，牠的黨綱也不包含民族自決權這一個原則”（同上）。

總之，她想“特別是”拿奧國做例來說服讀者。好，看吧，從具體的歷史眼光來看，這個例子是否有很多的道理。

第一，先把這關於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這個基本問題，拿來講一講。在奧國，這一個革命從1848年即已開始，到1867年即已告終。從那時到現在，為時幾達50年之久，早已形成的、一般地講來是帶有資產階級性的憲法，從那時到現在，在那裏佔着統治地位，公開的工黨因有這種憲法而進行公開的活動。

因此，在奧國發展底內部條件上（即是從一般的奧國資本主義發展，特別是奧國各個民族中的發展看來），並沒有一些產生突變的原素（民族獨立的國家之成立可以成為與這些原素相伴而來的一種東西）。盧森堡拿這件事情作比，就假定俄國在這一點上也處在同樣的境遇內；這樣一來，她就不但作了一個根本不對的反歷史的假定，而且無意中墮落到取消主義方面去了。

第二，奧地利境內各民族間的相互關係與俄羅斯境內各民族間的相互關係完全不同，這對於本問題有特別重大的意義。奧國不但在

長時期內曾是日耳曼人佔着優勢的一個國家，而且奧國的日耳曼人還曾企圖做一般日耳曼民族中的霸王。這一個“企圖”被1866年的戰爭打得粉碎，——這一點我想盧森堡（她似乎這樣不愛普通之點、死模型、抽象東西……）也同意提起。奧國底統治民族——日耳曼人——竟處在日耳曼人獨立國家底範圍之外，這個國家於1871年已澈底成立（147）。另一方面，匈牙利人曾經企圖創造獨立的民族國家，這種企圖，還在1849年就在俄國農奴制的軍隊打擊之下而遭了失敗。

這樣一來，就造成了非常特別的情況：在匈牙利人方面，後來又在捷克斯拉夫人方面，正因為要謀民族獨立，所以不趨重於脫離奧國，而趨重於保持奧國底完整性，因為否則民族獨立就會被更野蠻更強悍的鄰國所完全破壞。奧地利由於這種特別情形，便形成爲兩個中心的（二元的）國家，而現在又轉變爲三個中心的（三元的：日耳曼人、匈牙利人、斯拉夫人）國家。

俄國有什麼相像的情形呢？我們俄國境內的“異族人”因為恐怕更壞的民族壓迫而情願與大俄羅斯人合併麼？

只要把這問題一提出來，就可以看見，在民族自決的問題上拿俄國來同奧地利比較；這是何等荒謬，何等褻械，何等糊塗？

在民族問題關係上，俄國所有的特別情形恰恰與奧國相反。俄國是有單一的民族中心——大俄羅斯人的中心的一個國家。大俄人佔有整塊大的地盤，人口約有七千萬。這個國家底特點：第一是，“異族人”（佔全人口底大多數——57%）恰恰是住在邊境上；第二是，這些異族人所受的壓迫比在各鄰國（而且不僅是歐洲各國）內要厲害得多；第三是，這些住居邊境的被壓迫民族，牠們在邊界之外有許多比較享受民族獨立的同胞（例如，只要記到西南邊界一帶的芬蘭人、瑞典人、波蘭人、烏克蘭人、羅馬尼亞人就夠了）；第四是，資本主義

底發展及一般的文化水平線，在“異族的”邊境上往往比國家底中心區域高些。最後還有一點，就是在亞洲鄰國內，資產階級革命及民族運動底階段已經開始，這種革命和運動又局部地普及到俄國境內的同血統的民族。

如此，正因為俄國民族問題有歷史的具體特點，在我們這裏，在現代承認民族自決權是特別重要的。

而且，從純粹的事實方面講來，盧森堡說奧國社會民主黨綱領上沒有承認民族自決權，這也是不對的。例如，只要把通過了民族綱領的布留恩代表大會（143）底記錄一看，就可以知道：曾有一位露西的社會民主黨人甘克維赤代表全體烏克蘭（露西）代表團（記錄第58頁）和一位波蘭社會民主黨人列格爾代表全體波蘭代表團（記錄第108頁）出來申明，說該兩民族中的奧國社會民主黨人已把關於民族統一與民族自由及獨立的要求，包括在自己的要求之內。所以，奧國社會民主黨雖然沒有在自己的綱領內直接提出自決權的要求，可是同時對於黨底各部份所提出的民族獨立的要求却完全容忍。這在事實上當然也就是承認民族自決權呵！如此，盧森堡之援引奧國，在各方都是引來反對盧森堡自己的。

4. 民族問題上的“實際主義”

盧森堡說，我們的綱領第九條，並沒有包含一點“實際的”東西，這一個論據特別為機會主義者所拚命稱贊。她愛用這個論據，她在自己的文章內竟把這個“口號”重復了八遍。她寫道：

第九條“沒有替無產階級底日常政策拿出半點實際的指示，對於民族問題沒有任何實際的解決。”

現在來看一看這個論據；這個論據又說成這樣：或者是說，

第九條一點沒有意思，或者說，牠責成贊助一切民族要求。

要求民族問題中的“實際性”，這是什麼意思呢？

或者贊助一切的民族要求；或者是用“是或否”去回答每個民族底分立問題；或者是民族要求底一般的直接的“可實現性”。

現在來考究“實際性”要求底這三種可能的意思。

在一切民族運動開始的時候，資產階級自然出來做領導者，牠把贊助一切民族要求稱為實際的事情。可是無產階級在民族問題上（與在其他問題上一樣）的政策，只在一定的方向上贊助資產階級，可是永遠不與資產階級的政策相符合。工人階級只是為謀民族和平（這是資產階級所不能完全給的，這只有在完全民主化的時候才能實現），為謀平等權利，為謀階級鬥爭底最好環境，才贊助資產階級。所以無產階級提出民族問題上的原則政策，恰恰是反對資產階級底實際主義的，牠永遠只是有條件地贊助資產階級。一切資產階級在民族問題上都是打算，或者為自己的民族謀特權，或者為自己的民族謀特殊利益；這也就是叫做“實際的”東西。無產階級反對一切特權，反對一切特權地位。如果向牠要求“實際主義”，即等於上資產階級底圈套，使自己陷入機會主義的地位。

用“是或否”去回答每個民族底分立問題麼？這似乎是一個很“實際的”要求。其實牠在理論上是荒謬的，虛玄的，而在實際上則使無產階級服從資產階級底政策。資產階級總是把自己的民族要求放在第一位；無條件地把牠們提出來。在無產階級看來，民族要求服從於階級鬥爭底利益。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是該民族底分立還是這個民族享受與別個民族平等的地位，這在理論上不能預先斷定；無產階級所重視的是在這兩種情形之下都要保證自己階級底發展；資產階級所重視的是要阻礙這種發展，把無產階級發展的任務推在“自己

的”民族任務之後。因此，無產階級只限於所謂否定式的要求承認自決權，不向任何民族擔保，不責成自己使任何民族去侵害別的民族以自利。

就算這是不“實際的”，可是牠在實際上却最正確地保證各種可能的解決法中之最民主的解決；無產階級所需要的只是這些保障，而每個民族底資產階級則需要不顧其他民族底地位（無論其受何等損害），而保障自己的利益。

資產階級所最感受興趣的，是該項要求底“可實現性”——因此，牠就永遠實行一種政策：與其他民族底資產階級勾結來謀害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則注重鞏固自己本階級來反對資產階級，以澈底的民主主義及社會主義精神來教育羣衆。

就算這對於機會主義者是不“實際的”吧，可是這是唯一切實的保障，違反封建主和民族主義的資產階級底意志而保障最高限度的民族平權及民族和平。

從每個民族底民族主義的資產階級看來，無產階級在民族問題上的全部任務都是“不實際的”。因為，無產階級因仇視一切民族主義而要求“抽象的”平等權利，要求在原則上沒有絲毫特權。盧森堡不懂得這一點，糊塗塗崇拜實際主義，這樣一來，正是替機會主義者，特別是替那種向大俄民族主義的機會主義讓步，大開方便之門。

爲什麼是大俄民族主義呢？因為大俄民族是壓迫民族，而在民族問題方面，機會主義在彼壓迫的民族中的表現與在壓迫的民族中的表現自然是不同的。

被壓迫民族中的資產階級在自己要求底“實際性”底名義之下，將號召無產階級來無條件地擁護牠的要求。最實際的是莫如直接說個“是”字，贊成某一個民族底分立，而不是贊成一切與每個民族底

分立權！

無產階級反對這樣的實際主義：牠承認各民族底平權，承認各民族都有成立民族國家的平等權利時，把各民族無產者間的聯合看得並提得高乎一切，拿工人底階級鬥爭觀點來估計各種民族要求及各種民族分立。實際主義底口號實際上只是純粹襲取資產階級要求的口號。

有人說，你們贊成民族分立權，就是贊成被壓迫民族底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盧森堡就是這麼說的，跟着她說這話的，還有機會主義者謝可夫斯基，——可以說，他是在取消派報紙上對這個問題發表取消派思想的唯一代表了！

我們回答道：不，剛巧是在這裏，資產階級就正需要“實際的”解決，而工人則需要在原則上劃清兩個趨向。我們在被壓迫民族底資產階級與壓迫民族奮鬥的程度以內，總是最堅決地贊成，因為我們是壓迫底最厲害和最堅決的敵人。在被壓迫民族底資產階級擁護自己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程度以內，我們便反對。反對壓迫民族底特權及暴力，同時絲毫不同情被壓迫民族方面謀得特權的企圖。

我們如果不提出和不宜傳民族分立權的口號，那我們就不但是幫助了壓迫民族底資產階級，而且還幫助了壓迫民族底封建主及專制政體。這一個論據考茨基早已用來反對盧森堡，這論據確是無容辯駁的。盧森堡生怕“幫助”波蘭底民族主義的資產階級而反對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綱領上的民族分立權，這在事實上就是幫助黑幫大俄人。她在事實上就是幫助和大俄人底特權（而且比特權更壞的東西）實行機會主義的調和。

盧森堡一心只要與波蘭的民族主義奮鬥，而忘記了大俄人底民族主義，然而這一個民族主義現在正是最可怕的，正是牠少帶資產

階級性而多帶封建性，正是牠成爲民主制度及無產階級鬥爭底主要障礙物。被壓迫民族底每一種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都有反對壓迫的普通民主主義的內容；正是這一個內容我們無條件地贊助，同時嚴格地辨別那種謀自己的民族特權地位的企圖，反對波蘭資本家壓迫猶太人的企圖等等。

這由資產者及市儈們看來是“不實際的”。可是，這是民族問題上唯一實際的、有原則的、真正幫助民主制、促進自由、促進無產階級聯合的政策。

承認一切民族有分立權；估計每一個關於民族分立的具體問題都要從剷除各種不平等、各種特權及各種特權地位的觀點上出發。

就拿壓迫民族底地位來講。壓迫其他人民的人民，是否可以自由？不可以的。大俄居民*要想得到自由，必須要與這種壓迫作鬥爭。被壓迫民族運動在長時期內，在數百年來受人鎮壓，“上流”階級有系統地宣傳這種鎮壓；這些都替大俄民族本身自由事業造成了莫大的障礙，阻礙人民拋棄自己的成見等等。

大俄黑幫派故意幫助和激發這些成見。大俄資產階級容忍牠們或迎合牠們。大俄無產階級如果不與這些成見作有系統的鬥爭，牠就不能實現自己的目的，不能替自己掃清走向自由的道路。

建立獨立自主的民族國家，這在俄國暫時還祇是大俄民族一個民族底特權。我們大俄無產階級不擁護任何特權，也不擁護這一個特權。我們在這一個國家底範圍內奮鬥，統一這個國家內各民族底工

* 巴黎有一位甚麼兀·B兀·認爲這兩個字是非馬克思主義的。這位聰明兀·B兀·(149)大概要寫一本東西，研究怎樣把“居民”“人民”等字樣趕出於我們的最低綱領(從階級鬥爭看來)之外。

人，我們不能擔保民族發展底某一條道路，我們經過一切可能的道路，走向自己的階級目標。

可是，如果不與各種民族主義鬥爭，不堅決主張各民族工人間的平等，就不能走向這一個目標。例如，烏克蘭是否定會造成爲獨立國家，這要以千百個因素爲轉移，而這些因素是不能預先知道的。我們並不打算“猜”謎，我們堅決地主張那毫無疑義的東西：烏克蘭有造成爲這樣的國家的權利。我們尊重這種權利，我們不贊成大俄人對於烏克蘭人的特權，我們教育羣衆去承認這種權利，去否認任何民族底國家特權。

在資產階級革命時代一切國家都經過的這些突變中，爭取民族國家成立之權的衝突和鬥爭，是可能的而且是一定的。我們無產者預先申明，我們反對大俄人的特權並使自己的一切宣傳與鼓動都照着這個方向進行。

盧森堡一心去探求“實際主義”，却忽略了大俄及異族無產階級底主要的實際任務：爲着反對各種國家的民族的特權，擁護各民族成立自己的民族國家的同等權利而進行日常的宣傳與鼓動；這種任務是我們在民族問題上的主要任務（現時），因爲祇有這樣，我們才能保持民主制底利益及各民族一切無產者平等聯合底利益。

大俄民族的壓迫者及被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都認爲這種宣傳是“不實際的”（這兩種人都要求一定的是或否的回答，而責備社會民主黨人底“沒有一定”）。事實上，正是這一個宣傳，也祇有這一個宣傳能保證羣衆底真正民主主義的和真正社會主義的教育。也祇有這樣的宣傳，才能够在俄國仍舊是一個複雜的民族國家的時候，保障俄國的民族和平有最多的機會，而在發生分立問題的時候，保障最和平地（對於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無損害地）分立爲各個民族國家。

爲要更具體地說明民族問題上這一個唯一的無產階級的政策起見，我們來考察大俄自由主義對於“民族自決”的態度及挪威與瑞典分立的實例(150)*。

7、1896年倫敦國際大會底決議

這個決議說道：

“國際大會宣佈贊成各民族有完全的自決權（Selbst bestimmungsrecht），並向現時受軍事的民族的或其他的專制主義壓迫的各民族底工人表示同情；大會號召所有這些國家底工人加入全世界有覺悟的（Klassenbewusste）覺悟到本階級底利益的）工人底隊伍，以便與他們共同爲征服國際資本主義及爲實現國際社會民主黨底目的而奮鬥”**。

我們已經說過，我們的機會主義者，謝可夫斯基、李勃曼、尤爾克維赤等先生，簡直不知道有這個決議。可是盧森堡是知道他的，並且引了他的全文，文中有與我們的綱領內同樣的字樣：“自決”。

現在要問，盧森堡怎樣來剷除這個攔在她那種“獨創的”理論底道路上的障礙呢？

簡單得很：這裏的重心，是在決議案第二部份裏面……他帶有空宣言的性質……祇是出於誤會才能援引他！

* 此地未將第五節與第六節載入，請看列寧全集第17卷442至455頁。——（編者）

**請參看關於倫敦大會的正式德文報告：1896年7月27日到8月1日倫敦社會工黨及工會國際代表大會底記錄與決議。國際大會底決議案印有俄文本，那裏把“自決”字樣譯爲“自治”，這是錯誤的。

我們這位作者之無辦法和張惶失措，簡直令人吃驚。有些機會主義者通常把澈底民主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政綱條文指為帶有宣言性質，因為他們不敢直接反對這些條文。難怪這次盧森堡陷入謝可夫斯基、李勃曼、尤爾克維赤這些先生們的可憐同類中去了。盧森堡不敢直接說，她到底認為她所引來的決議案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她迴避着，躲閉着，好像讀者都是些不注意的，不懂事的，讀到後半節便忘掉了前半節的人，或者是些從來沒有聽過在“倫敦大會”以前，社會主義刊物上的爭論的人。

可是盧森堡如果以為她在俄國有覺悟的工人面前，能够如此容易踐踏“國際”關於重要的原則問題的決議，甚至不打算用批評態度去分析牠；那末，她就大錯而特錯了。

盧森堡底觀點在“倫敦大會”以前的爭論中——主要的是在德國馬克思主義者底雜誌新時代上——就發表過，而這個觀點實質上在“國際”面前遭了失敗！這就是事情底實質，俄國讀者所應當特別注意的。

那次爭論是關於波蘭獨立的問題。發表的一共有三種觀點：

(1) 佛拉克派底觀點，代表說話的是赫克爾。他們曾要“國際”承認將波蘭獨立的要求當作自己的綱領。這提議沒有通過。這一個觀點在國際面前遭了失敗。

(2) 盧森堡底觀點：波蘭社會主義者不應當要求波蘭獨立。依這觀點看來，宣佈民族自決權是談都談不到的。這一個觀點也在國際面前遭了失敗。

(3) 當時為考茨基所發揮得最圓滿的觀點；他反對盧森堡，證明她的唯物論底極端的“單方面性”。由這個觀點看來，現時“國際”不能把波蘭獨立作為自己的綱領，可是波蘭社會主義者考茨基說——

則完全可以提出這樣的要求，從社會主義底眼光看來，在民族壓迫的環境內而忽視民族解放底任務，這是絕對錯誤的。

“國際”底決議也就採納了最後一個觀點底最重要的最基本的原理：一方面，完全直接地和不容絲毫曲解地承認各民族一律都有完全的自決權；另一方面，同樣明確地號召工人去謀他們的階級鬥爭底國際主義的一致。

我們認為，這個決議是完全正確的，正是這個決議，正是牠的兩部份密切聯貫起來，才給二十世紀初期的東歐及亞洲各國，在民族問題上規定出無產階級的階級政策方面唯一正確的指示。

更詳細一點來講一講以上這三種觀點。

大家知道，馬克思與恩格斯會認為積極贊助波蘭獨立的要求，是西歐一切民主派，尤其是社會民主派所絕對應該的。對於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德、奧資產階級革命時代，俄國“農民改良”時代，這種觀點是完全正確的，是唯一的徹底民主主義的和無產階級的觀點。當俄國及大多數斯拉夫民族的國家底民衆還在沉眠不醒的時候，當這些國內還沒有獨立的羣衆的和民主的運動的時候，波蘭的貴族解放運動，不但從全俄的，全斯拉夫的民主派看來，就是從全歐民主派看來，都會有偉大的第一等意義*。

* 如果把1863年波蘭貴族暴動者底主張和全俄民主革命派齊內舍夫斯基底主張以及後起的烏克蘭的小資產者德拉果曼諾夫底觀點，拿來作一個比較，這倒是一件極有趣味的歷史工作。齊內舍夫斯基並能夠（如馬克思一樣）估計到波蘭運動底意義。德拉果曼諾夫代表這樣落後的愚昧的貧苦農民底觀點，以致這種農民因為合理的仇恨波蘭貴族，而不能了解這些貴族底鬥爭對於全俄民主運動的意義（請參看德拉果曼

馬克思底這種觀點，對於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是完全對的，但在快到二十世紀的時候就不再是對的了。在大多數斯拉夫民族的國家，甚至於其中最落後的國家之一——俄國，都掀起了獨立民主運動，甚至於獨立的無產階級運動。貴族的波蘭消滅了，而讓位於資本主義的波蘭。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波蘭會不能不失去其特殊的革命意義。

要是“波蘭社會黨”（現時的佛拉克派）在1896年企圖把另一時期中馬克思底觀點“緊緊釘住”，那麼，這是利用馬克思主義底字面來反對馬克思主義底精神。因此，波蘭社會民主黨人會起來反對波蘭小資產階級底民族主義的熱情，會說明民族問題對於波蘭工人祇有次要的意義，曾在波蘭第一次地創立純粹無產階級的政黨，曾宣佈俄國與波蘭兩國工人在階級鬥爭上密切聯合，是非常重要的原則，這些社會民主黨人是完全對的。

然而，這是否說，“國際”在二十世紀之初，可以認為民族政治自決底原則對於東歐及亞洲是不需要的呢？可以認為牠們的分立權是不必要的呢？如果是這樣，那就是最大的謬誤，等於（在理論上）承認土耳其、俄羅斯及中國底資產階級民主改革已經完結，等於（在實際上）對專制政體採取機會主義的態度。

不。當東歐及亞洲已經開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時代，在民族運動激發及緊張的時代，在獨立的無產階級政黨產生的時代，這些政黨在民族政策上的任務應當是兩方面的：一方面承認一切民族都有自決權，因為資產階級民主改革還沒有完成，因為工人民主派是澈底

諾夫著歷史的波蘭與全俄的民主派一文）。已變為民族自由派的司徒威後來極力稱讚德拉果曼諾夫，這是完全值得的。

地、認真地、誠懇地、不是本着自由派的精神、不是本着科可什金的精神，去堅持各民族享有平等權利；另一方面，主張該國各民族底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極緊密地不可分離地聯合起來，在這個國家底任何一切歷史變動中，在無論資產階級怎樣劃分各單個國家底國界的時候，這個國家裏各民族底無產階級之階級鬥爭，都極緊密地不可分離地聯合起來。

1896年“國際”底決議案就正是規定無產階級底這個兩方面的任務。1913年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夏季會議底決議，其基本原則正是這樣。有些人覺得，決議案第四條與第五條是互相“矛盾”的，他們以為，第四條上承認了自決權與分立權，似乎“給”民族主義以最高限度（事實上，承認一切民族有自決權，這是民主主義底最高限度與民族主義底最低限度），——而在第五條上，却警告工人反對任何資產階級底民族主義的口號，要求各民族底工人統一而溶合為國際統一的無產階級組織，——他們認為這是互相矛盾的(151)。可是，只有頭腦簡單的人，才能認為這裏有“矛盾”，這些人不能懂得，何以——舉例來說——瑞典工人主張挪威有分立出去組織獨立國家的自由，這使瑞典挪威兩國無產階級底統一和階級的團結佔了便宜。

8、空想的馬克思與求實的盧森堡

盧森堡說波蘭獨立是“空想”，並且再三再四地這樣說，她帶着譏諷的態度歎息道：為什麼不提出愛爾蘭獨立的要求來呢？

“求實的”盧森堡顯然不知道，馬克思對於愛爾蘭獨立的問題，曾經採取怎樣的態度。這一點值得講一講，以便說明怎樣用真正馬克思主義的，而不是機會主義的觀點來分析具體的民族獨立的要求。

(152)

馬克思會有一種向自己熟識的社會主義者“摸牙齒”（他自己的說法）的習慣，審查他們的覺悟性與懇切性。馬克思認識羅巴庭以後，於1870年7月27號（舊歷15日）寫信給恩格斯，在信上對於這個俄國少年社會主義者大加稱贊，但却補充道：

“……弱點：波蘭。羅巴庭關於這一點所說的話，完全同英國人——例如英國舊派憲章運動家——關於愛爾蘭所說的話一樣。”

馬克思向屬於壓迫民族的社會主義者，問明其對於被壓迫民族的態度怎樣，就立刻發現統治民族（英、俄）中社會主義者底一個共同缺點：不了解他們對被壓迫民族所担负的社會主義的義務，再三咀嚼“大列強的”資產階級所傳授與他們的成見。

在沒有講到馬克思關於愛爾蘭的積極主張以前，我們就必須附帶聲明，馬克思與恩格斯對於一般的民族問題會採取嚴格的批評態度，因為他們估計到這問題底有條件的歷史的意義。例如1851年5月23號，恩格斯寫信給馬克思說，研究歷史，使他對於波蘭的問題作出悲觀的結論，就是波蘭底意義是一時的，只是到俄國土地革命以前為止。波蘭人在歷史上的作用是“大胆的荒唐行爲”。“即使波蘭所反對的，只限於一個俄國，那我們還是絕對不能假定說，牠代表進步或有什麼歷史的意義”。在俄國，文化、教育、工業、資產階級底成份等，都要比在“貴族式的沉眠的波蘭”多些。“瓦薩與克拉可夫怎能敵得過彼得堡莫斯科與奧德沙呢？”恩格斯不相信波蘭貴族底暴動能有成效。

可是所有這些觀念（其中有極多明哲非凡的地方），絕對沒有妨礙恩格斯和馬克思過12年以後，即當俄國還沉睡着而波蘭已經沸騰的時候，對波蘭的運動表示極深切熱烈的同情。

1864年，馬克思起草“國際”^{*}底宣言時，寫信給恩格斯，說要同馬志尼底民族主義鬥爭。他說：“當宣言內講到國際政策的時候，我講的是國家而不是民族；我所揭露的是俄國而不是比較次要的國家”。馬克思毫無疑義地認為，與“工人問題”比較起來，民族問題只有附屬的意義。可是，他的理論，和忽視民族運動的觀點距離很遠，正如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1866年到了。“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信中說到巴黎‘蒲魯東派’，‘蒲魯東派’說民族性是無意思的而攻擊俾斯麥與加里巴第。把這個策略作為和國家主義的論戰，那是很有益處的，是可以解釋的。可是當信仰蒲魯東的人（我這裏的好朋友如拉法格及龍格也屬於這種人）認為全歐洲可以而且應當安分守己地坐着，等法國老爺們來消滅貧窮與愚昧，那他們就愚笨可笑了。”（1866年6月7號的信）馬克思在1866年6月12日寫道：

“昨天在‘國際總委員會’裏面討論到目前的戰爭的問題……討論中曾牽涉到（這是意料中的事）‘各民族特性’問題與我們對該問題的態度……‘少年法國’底代表（非工人）發表這樣的觀點，說一切民族性及民族本身都是陳舊的成見。蒲魯東主義的史迪勒尼思想……。全世界都應對待法國人成熟起來實行社會革命。我在自己的發言中開始就說，我們的朋友拉法格以及其他否認了民族性的人，向我們大談法國話，而會場上十分之九的人都聽不懂他們的話。英國人聽到我這一段話以後，笑得不得了。後來我又暗示說，拉法格自己不知道，他之否認各民族特

* 即指‘第一國際’，當時“第一國際”總委員會，是在馬克思親身指導之下。——（校者）

性大概就是要求由模範式的法國民族來吞滅各民族特性。”

馬克思所有這些批評底結論是很明顯的：工人階級最不會把民族問題當作偶像，因為資本主義底發展不一定就喚起各民族都來謀獨立的生活。可是羣衆的民族運動既然發生了，那末，擺脫牠們，不肯贊助其中進步的成份，這事實上就是陷入民族主義的成見，即是，認為“自己的”民族是“模範民族”（或者還由我們自己加上一句，是享有國家建設特權的民族）*。

我們現在又回到愛爾蘭問題上面來。

馬克思關於這個問題的主張，在他以下的一段信內發表得最清楚：

“我會設法激起英國工人為援助芬尼亞運動**而舉行示威遊行。……過去我以為愛爾蘭脫離英國是不可能的。現在我認為他是必不可免的，那怕分離以後又會弄成聯邦。”

1867年11月2號馬克思寫給恩格斯的信中所寫的就是這樣。他在同年11月30號的信上又補充道：

“我們應勸英國工人做些什麼呢？我以為他們應當把破裂聯盟”（所謂聯盟是指英國與愛爾蘭間的聯盟，所謂破裂聯盟，即是指愛爾蘭脫離英國）“作為自己綱領內的一條，——簡單點說這就是1783年的要求，不過使其民主主義化並使其適應於現

* 請參看1867年6月3號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信。“……從巴黎時報底通訊中，得知巴黎人有親波反俄的表示，非常滿意……蒲魯東先生及其小的學究派——不能代表法國人民”。

**“芬尼亞”是愛爾蘭人的革命聯合，1863年成立於美國，其目的在於使愛爾蘭脫離大不列顛而獨立，主要參加者是勞苦農民。——譯者）

在的條件罷了。這就是愛爾蘭解放底唯一合法的形式。因此也就是英國黨底綱領唯一可以採納的形式。以後的經驗應該指明：由一個皇帝治理兩國的這種聯合制度，是否可以長久存在……

……愛爾蘭所需要的是：

(1) 自治與脫離英國而獨立。

(2) 土地革命……”

馬克思把愛爾蘭問題看得非常重要，他關於這問題，在德國工會內做了一點半鐘的報告（參看1867年12月17號的信）。

恩格斯在1868年11月20號的信內指出“在英國工人中有仇恨愛爾蘭人的心理”，差不多過了一年以後（1869年10月24號），他又談到這個問題，他寫道：

“從愛爾蘭到俄羅斯只差一步……看了愛爾蘭底歷史，就可以知道，要是一個民族奴役了別個民族，牠自己是何等的不幸。英國一切卑鄙現象都是因愛爾蘭問題而發生的。克倫威爾*時代我還應當去研究，可是無論如何，對於我無疑的是，如果沒有必要在愛爾蘭建立軍事統治和創造新的貴族，那末英國的情形就採取了另一種局面。”

我們順便又要指出馬克思在1869年8月18號給恩格斯的信：

“波蘭工人因為得到他們柏林同志底幫助，在波茲南舉行了勝利的罷工。這種反“資本老爺”的鬥爭（甚至於在他的較低的形式，即罷工形式中），其剷除民族的成見，比資本家老爺

* 克倫威爾 (1599至1658) 是英國十七世紀資產階級革命中著名的領袖。他曾領導革命的資產階級暴動起來反對英皇查理第一及封建貴族。——(校者)

們關於和平的宣言，要認真得多”。

馬克思在“國際”內對愛爾蘭問題所實行的政策，由以下的事實可以看得出來：

1869年11月18號，馬克思寫信給恩格斯說，關於英國內閣對愛爾蘭大赦的態度問題，他在（153）“國際總委員會”內講了一點一刻鐘的話，並提出以下的決議案：

“議決，

格拉斯敦先生在答覆愛爾蘭人要求釋放愛爾蘭愛國志士時，是故意侮辱愛爾蘭民族的；

他關於實行政治大赦所提出的條件，對於惡劣政府底犧牲者以及對於這些犧牲者所代表的人民，都是同樣卑屈的；

格拉斯敦教身處官廳地位，曾當衆地和得意洋洋地慶祝美國奴隸主底騷動，現在又向愛爾蘭民族宣傳消極服從的學說；

他對於愛爾蘭大赦的全部政策就是那種‘侵掠政策’底真正表現，格拉斯敦會因揭破這種政策而推倒敝黨（保守黨）底內閣；

國際工人聯合會底總委員會對於愛爾蘭人民之如此勇敢堅決而高尚地進行要求大赦的運動，表示欽佩；

本決議案應通知‘國際工人聯合會’各支部及與牠有聯繫的歐美各國一切工人團體”。

1879年12月10號，馬克思寫道，他在‘國際總委員會’內關於愛爾蘭問題所要作的報告，其結構將如下述：

“英國工人階級底直接的絕對的利益，要求牠與愛爾蘭斷絕現有的關係，這完全與‘替愛爾蘭主持公道’的各種‘國際主義的’及‘人道主義的’空話無關，因為這在‘國際總委員會’內都是

不言而喻的。這是我的極深刻的信念，這種信念所根據的理由，有一部份我是不能向英國工人宣佈的。我在許久時期內認為英國工人階級底高漲，可以推倒愛爾蘭所受的壓制；我在紐約論壇（‘New York Tribune’）（這是美國報紙，馬克思幫辦該報很久）上總是擁護這種觀點。但是更深刻地研究了這問題的時候，却使我相信相反的情形。英國工人階級在未擺脫愛爾蘭以前，他便一點沒有辦法……英國內部的英吉利反動勢力，其根源就在於對愛爾蘭的束縛。”（着重點是馬克思自己加的）馬克思在愛爾蘭問題上的政策，讀者現在應當完全明白了。

“空想家”的馬克思竟這樣的“不實際”，主張愛爾蘭分立，而這種分立過了50年還沒有實現。

馬克思爲什麼採取這個政策？這個政策是不是一個錯誤呢？

馬克思開始以爲解放愛爾蘭的不是被壓迫民族中的民族運動，而是壓迫民族中的工人運動。馬克思並不把民族運動看做什麼絕對物，明知只有工人階級底勝利才能使一切民族得到完全的解放。要預先估計到被壓迫民族中的資產階級解放運動與壓迫民族中的無產階級解放運動之間的各種可能的對比關係（這正是使現代俄國民族問題極感困難的地方），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情形弄成這樣：英國工人階級長久陷於自由派的影響之下，做他們的尾巴，因自由派的工人政策而喪失自己的頭腦。愛爾蘭資產階級的解放運動會加強起來而採取革命的形式。馬克思把自己的觀點重新審查而加以糾正。“一個民族要是束縛別個民族，這就是該民族自己的不幸”。愛爾蘭未從英國的壓迫之下解放出來以前，英國工人階級是不會得到解放的。英國的反動勢力，是由英國對愛爾蘭的束縛所鞏固和培養起來的（正如俄國之束縛許多民族也培養他的反

動勢力一樣！)。

馬克思在“國際”中提出同情於“愛爾蘭民族”“愛爾蘭人民”(聰明的И. Б.Т.大概要大罵可憐的馬克思忘記了階級鬥爭!)的決議時，宣傳愛爾蘭應當與英國分立，“那怕分立以後又會弄到聯邦制”。

馬克思底這種結論，有些甚麼理論上的前提呢？資產階級革命在英國一般地早已完成了。可是牠在愛爾蘭就還沒有完成，只是現在，經過50年以後，英國自由派的改良才來完成牠。如果英國資本主義之被顛覆，有如馬克思最初所預料的那樣快，那末，愛爾蘭就不會有資產階級民主的全民族的運動了，可是這種運動既然發生了，馬克思就勸英國工人去贊助牠，給以革命的推動，為本身自由着想而把牠進行到底。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中，愛爾蘭與英國的經濟聯繫，當然比俄國與波蘭及烏克蘭等等的聯繫更要密切些。愛爾蘭與英國的分立，其“不實際性”與“不可實現性”(就以地理上的條件與英國極大的殖民地勢力來說)會是顯而易見的。馬克思本是聯邦主義之原則上的敵人，他在這次却容許聯邦制*，為的只要使愛爾蘭之解放，不由改

* 從社會民主黨的觀點看來，既不能把民族“自決”權了解為聯邦制，也不能了解為自治(雖然抽象地說來，這兩者都包括於“自決”這個概念內)，這是顯而易見的。聯邦權一般地是沒有意思的，因為聯邦制乃是雙方的契約。馬克思主義者決不能在自己的政綱內一般地擁護聯邦主義，關於這一點講都不必講。至於自治呢，那末，馬克思主義者所擁護的不是自治“權”，而是自治本身，把他作為含有複雜的民族成份及各種極不相同的地理等等條件的民主國家之普通原則。因此，承認“民族自治權”也同承認“民族聯邦權”一樣沒有意思。

良的道路而由革命的道路，由英國工人階級所贊助的愛爾蘭民衆運動來完成。只有這樣來解決歷史的任務才能最有利於無產階級底利益及社會迅速的發展，這是毫無疑義的。

結果却不是這樣。原來愛爾蘭民衆與英國無產階級都很軟弱。只是現在，才由英國自由派與愛爾蘭資產階級實行可憐的妥協，用土地改良（實行贖買的）及自治（還沒有實行的）來解決（阿爾斯特（154）底例子指明，這是多麼困難）愛爾蘭問題。這是怎樣一回事呢？難道由此就可以說，馬克思與恩格斯是“空想家”，說他們提出“不可實現的”民族要求，說他們受了愛爾蘭民族主義者——小資產階級（芬尼亞底運動，無疑地是小資產階級性的）底影響嗎？

不。馬克思與恩格斯在愛爾蘭問題上，也實行了澈底的無產階級的政策，這個政策真正以民主主義及社會主義的精神教育了羣衆。只有這個政策會能使愛爾蘭及英國都不至於將必要的改革遲延五十年，不至於由自由派爲反動勢力着想而來損傷這改革。

馬克思與恩格斯在愛爾蘭問題上的政策，做了一個最偉大的、至今還有巨大的實際意義的榜樣，指示壓迫民族底無產階級應當怎樣對待民族運動；警戒他們不要沾染各個國家，各個種色以及各種語言的小資產者所持有的那種“奴隸式的急燥性”，這些小資產者手忙腳亂地認爲誰要是把由某一個民族中的地主和資產階級底暴力和特權所造成的國界加以改變，誰就是“空想家”。

愛爾蘭的及英國的無產階級，如果沒採納馬克思底政策，沒把愛爾蘭獨立作爲自己的口號，他們就犯了最惡劣的機會主義的錯誤，忘記了民主主義者及社會主義者底任務，向英國反動勢力及資產階級表示了讓步。

9、1903年的綱領及其取消者

1903年代表大會通過了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底綱領，大會底記錄已經非常少見*，而現時大多數的工人運動家，還不知道綱領個別條文底理由（尤其是因為關於這一類的書籍決不是都享受公開的可能）。因此，必需把1903年代表大會上關於本問題的實在情形，拿來分析分析。

首先要指出來的就是：無論俄國社會民主黨關於“民族自決權”問題的文籍是如何缺乏，可是從這些文籍中，還是可以完全明白看出，所謂自決權從來就是指民族分立權而言的。謝可夫斯基、李勃曼、尤爾克維赤這些先生們懷疑這一點，說第九條是“不清楚的”等等，他們只是因為極端愚昧或毫不關心的緣故，才會說什麼“不清楚”。還在1902年，普列漢諾夫就在曙光雜誌上擁護綱領草案中的“民族自決權”，他寫道，這個要求對於資產階級的民主派是不一定要有的，而“對於社會民主黨人是一定要有的”。普列漢諾夫寫道：

“如果我們把牠忘記了，或不敢把牠提出來，生怕觸犯與我們同代的大俄人底民族成見，那末，我們口裏所喊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呵’這一個口號，就成為可恥的虛言了。”

這幾句話，很精當地說明這條綱領底基本論據，牠如此精當，竟使那些“忘了親屬的”，批評我們綱領的人，總是畏首畏尾地避開牠。不承認這一條，無論藉口何種理由，這在事實上都是對大俄民族主義作“可恥的”讓步。為什麼在講到一切民族有自決權的時候而說是對

* 現在有單行本出版，並有列貝申斯基底序，註解及書後。——

大俄民族主義讓步呢？因為這裏所講的是與大俄民族分立。爲無產者聯合底利益計，爲他們的階級團結底利益計，須要承認民族分立權，——這就是 14 年前普列漢諾夫在上述這段話內所承認的；我們的機會主義者如果對於這一點稍加思索，他們關於自決問題大概就不會講出這麼多的無稽之談來。

1903 年代表大會上批准了這一個爲普列漢諾夫所擁護的綱領草案；大會主要的工作曾集中在綱領委員會上。可惜，綱領委員會底討論經過，沒有記錄起來。而正是在這一點上，這些記錄是特別有趣味的，因爲，波蘭社會民主黨人底代表，瓦薩夫斯基及甘業茨基只在委員會內才會企圖擁護自己的觀點，而反對“承認自決權”。讀者如果將他們的論據（瓦薩夫斯基底演說，他和加業茨基底申明（155）——見記錄 134 至 136 及 388 至 390 頁）* 與盧森堡在我們分析過的那篇用波蘭文寫的論文中的論據拿來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出，他們所持的論據，是完全相同的，

第二次代表大會底綱領委員會（在這裏，普列漢諾夫所發表的反對波蘭馬克思主義者的言論，比什麼都要多），曾經怎樣對付這些論據呢？委員會中的人把這些論據無情地嘲笑了一頓！波蘭馬克思主義者向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提議刪除承認民族自決權的話，其荒謬之處被指得非常明確，竟使得他們在全體大會上再也不敢重複自己的論據！他們深信，在大俄的、猶太的、格魯茲的與亞美尼亞的馬克思主義者底最高大會上，自己的主張一定會遭失敗，他們因此退出了大會。

* 參看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記錄，“黨史出版社”出版

本 124 至 126 及 357 至 306 頁。

這一段歷史事件，對於凡是認真注意自己的綱領的人，自然有極重要的意義。波蘭馬克思主義者底論據在綱領委員會上完全遭受失敗，他們在大會上放棄擁護自己觀點的企圖，——這件事實有非常顯著的意義。難怪盧森堡在她的1908年的那篇文章內，關於這一點過於“客氣地”默而不談，——這大概是因爲，只要回想到代表大會，就使她太難過意下去！瓦薩夫斯基及甘業茨基在1903年以全體波蘭馬克思主義者底名義提議要“修正”綱領第九條，這一個極不中肯的提議，後來盧森堡以及其他的波蘭社會民主黨人曾經不敢（而且現在也不敢）再行提出；關於這一點，她也默而不談。

盧森堡爲要隱瞞自己在1903年的失敗，所以不肯講出這些事實來，可是注意自己的黨史的人，是要關心來認識這些事實並考慮牠們的意義的。

盧森堡底朋友們在退出1903年的代表大會時向代表大會寫道：

“……我們提議把綱領草案第七條（現在的第九條）寫成以下的文句：第七條——設立保障國內各民族文化發展底完全自由的機關。”（記錄第390頁——編者）*

總之，波蘭馬克思主義者當時關於民族問題所發表的觀點是這樣的不明確，即他們不提議民族自決，他們所提議的，實質上就是著名的“文化民族自治”底別名（142）！

這說來令人不肯相信，但可惜這是一個事實。雖然在代表大會上，有五個猶太工人同盟派，共有五票，三個高加索人共有六票，而斯特洛夫底發言權還不算在內，可是，結果竟沒有一票贊成取消民族自決這一條。主張把“文化民族自治”添加到這一條上來的，共有七

* 見同上記錄360頁。——（編者）

票，其中三票是贊成哥爾德布拉特底公式：“設立保障各民族文化發展底完全自由的機關”，有四票是贊成李伯爾底公式：（‘各民族有自由發展文化之權’）。

現在，當俄國自由黨——“立憲民主黨”——出世了的時候，我們知道，在牠的綱領中，民族政治自決是由“文化自決”來代替。因此，盧森堡底波蘭朋友們，與“波蘭社會黨”內的民族主義作“鬥爭”，結果有了這樣的成績，就是要把馬克思主義的綱領改為自由派的綱領！而他們還責備我們的綱領是機會主義哩。難怪在第二次代表大會底綱領委員會內，這種責備只是受到了別人的譏笑！

我們已經看到，出席第二次代表大會的代表沒有一個反對“民族自決”，這些代表是怎樣來了解這個“自決”的呢？

記錄上的下列三段，即可證明這點：

“馬丁諾夫認為，不能給“自決”這字以廣義的解釋；牠的意思只是說，民族有權分立而成爲單獨的政治整體，而決不是地方的自治”（171頁）。*

馬丁諾夫曾是綱領委員會底委員，在這個委員會裏，駁斥了並嘲笑了盧森堡各朋友底論據。在當時，馬丁諾夫按其觀點是個經濟主義者，是火星報底勁敵，如果他發表的意見，是爲綱領委員會底大多數委員所不同意的，那一定是要被他們駁斥的。

在綱領委員會工作結束以後，猶太工人同盟派哥爾德布拉特在大會上討論政綱第八條（現在第九條）的時候，第一個起來發言。

哥爾德布拉特說：

“自決權”是完全不能加以反對的。如果有一個民族爭取獨立，那

*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記錄158頁。——（編者）

就不能反抗這一點。如果波蘭不願與俄羅斯正式成婚，就不能妨礙牠，——如普列漢諾夫同志所說過的一樣。在這些範圍內我同意這種意見。”（175至176頁）*

普列漢諾夫關於這一點並沒有在大會上發過言。哥爾德布拉特引用普列漢諾夫在綱領委員會上所說的話：在該委員會上，“自決權”已詳細而通俗地解釋為分立權底意思。哥爾德布拉特發言以後就是李伯爾講話，他說：

“當然，如果有那一個民族不能在俄國境內生存，黨是不會阻礙牠的。”（176頁）**

由此讀者可以看到，在通過黨綱的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大家都一致主張，認為自決“不過”是分立權底意思。那時候，連猶太工人同盟派都懂得這種真理，只是在目前綿延的反革命及一切“拋棄主義”的悲慘時期，才發見這樣因頭腦混沌而胆大妄為的人，說政綱“不清楚”。可是，在沒有抽出時間來講到這些可憐的“也是社會民主黨人”以前，首先就要把波蘭人對綱領的態度，敘述完結。

在第二次代表大會（1903年）時，他們拿着關於統一之必要與迫切的聲明參加這次大會。*可是，在綱領委員會上遭了“失敗”以後，他們就退出大會，他們的最後幾句話就是書面的聲明，聲明書載在大會記錄之內，**其內容就是以上所引過的提議，即把自決改為文化

* 同上第162頁——（編者）

** 看黨史局出版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記錄163頁——（編者）

* 同上，124至126頁。——（編者）

** 同上，357至360頁。——（編者）

民族自治。

1906年，波蘭馬克思主義者加入黨了，無論在加入黨的時候也好，無論在加入黨以後也好（無論在1907年代表大會上，無論在1907年及1908年代表會議上，無論在1910年全體會議上），連一次也沒有提過什麼議案要修改俄國黨綱第九條！！

這是事實。

這一個事實不管任何的空談與擔保，而很明白地證明：盧森堡底朋友們都認為第二次代表大會綱領委員會上的討論和第二次代表大會底決議，已經把問題完全解決了；他們已經不做聲地瞭解了自己吾錯誤而改正了牠，因為他們在1903年退出大會以後，1906年又加入了黨，而且，一次也未曾企圖經過黨的手續提出修改黨綱第九條的問題。

盧森堡底文章是她在1908年親自署名發表的（當然，無論何人，連想也沒有想到要否認黨的作家有批評黨綱之權），這文發表以後，同樣也沒有一個波蘭馬克思主義者的正式機關，曾提出修改第九條的問題。

因此，托洛茨基替盧森堡底三五個門徒拍馬屁，真是出力而不討好，他以鬥爭報*編輯部底名義在第二期（1914年3月）上寫道：

“……波蘭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民族自決權’是完全沒有政治內容而需要從黨綱上刪去的。”（25頁）

會獻殷勤的托洛茨基比敵人還危險些！要不是他作了“私談”（即是播弄是非，這是托洛茨基生平的慣技），他就不能夠得到證據，把一般“波蘭的馬克思主義者”都算作是盧森堡每篇文章底擁護者。托

* 這是當時托洛茨基底公開機關報。——（編者）

洛茨基把“波蘭的馬克思主義者”描寫為沒有節操，沒有廉恥，連自己的信念和自己的黨綱都不會尊重的人。好一個會獻殷勤的托洛茨基！

當1903年，波蘭馬克思主義者底代表為着民族自決權問題而退出第二次代表大會時，當時，托洛茨基還能夠說，他們認為這種權利是沒有內容而需要從黨綱上刪去的。

可是，自此以後，波蘭馬克思主義者又加入了擁有這樣一個綱領的黨，而且一次也沒有提議過要修改黨綱*。

托洛茨基何以在自己的雜誌底讀者面前把這些事實隱瞞了呢？只因為他樂得來投一投機，挑撥波蘭反對取消派的人與俄國反對取消派的人中間的分歧，在黨綱問題上欺騙俄國工人。

托洛茨基在馬克思主義底每個嚴重問題上，從來沒有堅定的意見，只要看見什麼分歧意見，便馬上“乘間而入”，反覆於兩方面之間。他現在是同猶太工人同盟派及取消派合在一夥。而這些先生們對黨是不客氣的。

你們聽猶太工人同盟派李勃曼的話吧：

“當俄國社會民主黨，十五年前在自己的黨綱內提出了每個民族都有‘自決’權的時候，每個人（！！）都曾經問過自己：這

* 有人說，波蘭馬克思主義者在俄國馬克思主義者1913年夏季會議上只有發言權，他們關於民族自決權（分立權）問題是完全沒有表決的，只是在發言中一般地反對這種權利。當然，他們有全權這樣運動並有全權照著在波蘭宣傳反對波蘭之分立。可是這不完全是托洛茨基所說的那一回事，因為波蘭馬克思主義者並沒有要求“從黨綱上刪去”第9條。

句時髦(11)話到底是甚麼意思？對於這問題從來是沒有過回答的(11)。這句話至今還是(11)爲雲霧所蒙蔽着。實際上，那時是難得撥開這團雲霧的。那時大家都說：現在還沒有到可把這一條具體化的時候，暫且讓牠還是爲雲霧所蒙蔽着罷(11)，實際生活本身會指明，這一條將包含怎樣的內容。”

這位“沒有穿褲子的小孩”。這樣侮辱黨綱，豈非有趣之至嗎？他爲什麼要侮辱呢？

只因爲他是一個十足的土包子，什麼都沒有學過，連黨史都沒有讀過，而只是落到取消派隊伍中去了，在取消派隊伍裏面，在黨及黨性的問題上是“容許”赤條子亂跑的。

波米洛夫斯基的小說中，有位教會學生，“在裝滿白菜的桶內吐入痰涎”，反而自鳴得意(156)。猶太工人同盟派先生們更進一步。他們推舉李勃曼這般先生們來當衆在自己的桶內吐入痰涎。什麼國際代表大會會有怎樣的決議，什麼在自己黨底代表大會上會有猶太工人同盟自己的兩個代表完全能够了解（雖然他們會是火星報底何等“嚴格的”批評者與堅決的敵人！）“自決”底意義，甚至贊成自決；試問這與李勃曼之流的先生們有什麼關係？要是“黨底政論家”（請不要開玩笑！）對待黨史黨綱像教會學生那樣，那不是比較容易取消黨嗎？

你們再看第二個“沒有穿褲子的小孩”，這就是鐘聲* 方面的尤爾克維赤。尤爾克維赤先生大概備有第二次代表大會底記錄，因爲他引了普列漢諾夫底話（即是哥爾德布拉特所引證過的話），並且

* 鐘聲是烏克蘭馬克思主義派的文藝科學及社會生活月刊。1913至1914年在基輔出版。——（編者）

還表示他懂得自決只能解釋爲分立權。然而這並不妨礙他在烏克蘭小資產階級內，造謠中傷俄國馬克思主義者，說他們主張俄國底“國家完整性”（1913年第7—8期，83頁及其他各頁）。當然，尤爾克維赤之流的先生們要離開烏克蘭的民主派與大俄的民主派，除了造謠誣蔑之外，再也找不出更好的方法來。鐘聲作家們底整個政策路線，就是實行這樣的離開，他們宣傳，說烏克蘭工人應分出而成為特別的民族團體。*

分裂無產階級隊伍的民族主義的小資產階級底集團，——鐘聲報客觀上的作用就正是如此，——在民族問題上散佈一些極端糊塗的思想，這當然是不言而喻的。尤爾克維赤及李勃曼之流的先生們（他們一聽見人家把他們叫作‘接近黨的’份子就氣得‘不得了’）自己到底打算怎樣在黨綱上解決分立權的問題？關於這一點，他們簡直是一字不提。

你們再看第三個而且最主要的一個“沒有穿褲子的小孩”——謝可夫斯基。他在取消派的報紙上**，當着大俄民衆面前“辱罵”黨綱第九條，同時他又申言，“有幾個理由使他不能贊成”關於取消這一條的提議！！

說來很奇怪，可是這是事實。

1912年8月，取消派底代表會議正式提起民族問題。一年半以來，關於第九條的問題，除了謝可夫斯基一篇文章外，再沒有看見一篇東西。而這篇文章中，作者又因爲“有幾個（怎麼，有秘密病嗎？）理

* 特別是尤爾克維赤給列溫斯基著加里西亞的烏克蘭工人運動發展簡史所作的序言。1914年在基輔出版。

** 即指我們的工人報。——（編者）

由使他不能贊成”修改政綱，但同時却駁斥牠！我敢担保：這樣脫離黨的，取消黨的機會主義和比機會主義更壞的例子，在全世界上都難得找到。

謝可夫斯基底論據怎樣呢，僅要拿一個例子來講罷了。他寫道：

“要是波蘭的無產階級想在一國範圍之內與俄國整個無產階級進行共同的鬥爭，而波蘭社會底反動階級則相反，想使波蘭脫離俄國以分立，而在全民公決的時候獲得大多數贊成分立的票數，那時怎麼辦呢：我們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在中央國會中是否與波蘭同志共同投票反對分立，還是爲着不要破壞“自決權”而贊成分立？”（新工人報71期）

由此可見，謝可夫斯基先生甚至於不知道在講什麼。他從不想一想，分立權的問題，恰恰就不需要由中央國會來解決，而只需要分立區域底議會（波蘭議會，全民公決等等）來解決。

當普力什克維赤與科可什金之流連分立的念頭都認爲罪惡的時候（157），謝可夫斯基先生却拋開實在的、真正的、活的政策問題不談，反而像小孩一樣發出這樣的問題：如果大多數在民主投票時都贊成反動派，那又“怎麼辦呢”。大概全俄無產階級今天不要與普力什克維赤及科可什金之流作鬥爭，反要饒過他們。而去和波蘭底反動階級鬥爭了！！

這類奇怪的胡說竟寫在取消派底機關報上，而該報底思想領導者之一，便是馬爾託夫。這位馬爾託夫會起草過綱領底草案並在1903年努力使牠通過，他後來又做了文章擁護分立底自由。馬爾託夫現在大概是按照以下的方式觀察問題了：

那裏用不着聰明人，

派黎亞德去就行，

我做旁觀人。

他把黎亞德、謝可夫斯基派去，讓他在日報上，當着新的而不知道我們的黨綱的讀者面前，曲解黨綱，弄出無窮的糊塗賬來！

對呀，對呀，取消派跑得很遠了，——連許多從前著名的社會民主黨人，現在都沒有保留一點黨性。

當然不能把盧森堡和李勃曼、尤爾克維赤及謝可夫斯基這班人看成一邱之貉，可是，利用她的錯誤的，恰巧就是這一輩人，這一個事實，便足以特別明顯地證明，她如何陷入了機會主義的深淵。

10、結 論

現在來作個總結。

從一般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上看來，自決權的問題並不困難，關於1896年倫敦大會決議的問題，關於自決只能了解為分立權的問題，關於形成獨立民族國家是一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趨勢的問題，這都沒有嚴重爭論的餘地。

在某種限度內造成困難的是下面這件事實：在俄國，被壓迫民族底無產階級與壓迫民族底無產階級正在共同奮鬥，而且應當奮鬥。堅持無產階級爭取社會主義的階級鬥爭底統一，回擊一切資產階級的及黑幫的民族主義的影響，——這就是我們的任務。在被壓迫民族中，無產階級之分立而成為獨立的政黨，有時竟引起向該民族底民族主義作這樣激烈的鬥爭，結果把前途弄模糊，把壓迫民族底民族主義忘記。

可是這樣的模糊前途，只有暫時的可能。各民族無產階級共同鬥爭底經驗，很明顯地指明，我們不應當從“克拉可夫的”^{*}的觀點而應

* 克拉可夫是波蘭底重要城市之一。——(譯者)

當從全俄的觀點來提出政治問題。而統治全俄底政治的却是普里什克維赤與科可什金這班人。他們的思想統治着，他們因外族人有“分立主義”與分離的念頭而加以攻擊；他們這種攻擊外族人的運動，在國會裏，在學校裏，在教會內，在營房內，在千百萬份的報紙上，宣傳着，進行着。這一個大俄民族主義的毒素染污着全俄的政治空氣。束縛其他人民而使反動勢力在全俄鞏固起來的人民，是不幸的。1849年及1863年的事變所留下的印象*構成活的政治傳統；如果沒有極大規模的風潮發生，這種傳統怕還要在幾十年之內阻礙一切民主運動，特別是社會民主運動。

毫無疑義的就是：被壓迫民族（牠們之不幸，有時就是民衆底耳目被‘自己的’民族解放底思想所掩蔽）底有些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底觀點有時看去無論是怎樣的自然，可是在事實上，根據俄國階級力量底客觀對比講來，不肯擁護民族自決權就等於最惡毒的機會主義，等於拿科可什金之流底思想來傳染無產階級。而這些思想，實質上也就是普里什克維赤之流底思想與政策。

因此，要是盧森堡底觀點在開始還可以當牠是波蘭的“克拉可夫的”特殊的狹隘觀點而加以饒恕**，那末，到了現在，當民族主義，

* 這些事變是指沙皇專制政府歷次施行的壓迫外族的戰爭。——

（譯者）

** 不難懂得，全俄馬克思主義者（首先是大俄人）之承認民族分立權，絕不妨害某個被壓迫民族底馬克思主義者去宣傳反對分立，也猶之乎承認離婚權並不妨害宣傳反對某個離婚事件一樣。所以我們以為在波蘭馬克思主義者當中，起來恥笑謝可夫斯基與託洛茨基現在所“燒熱的”不存在的“矛盾”的那些馬克思主義者，必將日益增加。

尤其是政府的大俄的民族主義到處加強了的時候，當牠在左右政治的時候，——這樣的狹隘觀點就已成爲不可饒恕的了，事實上各民族的機會主義者都擁護這個狹隘觀點，他們絲毫不願意有“風浪”與“突變”，他們認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終結，他們傾向於科可什金之流底自由主義。

大俄民族主義，同各種民族主義一樣，也經過幾個不同的階段，視資產階級國內那些階級是佔着首要地位爲轉移。1905年以前，我們差不多只曉得有民族反動派。革命以後，在俄國却產生了民族自由派。

事實上，10月黨人與立憲民主黨人（科可什金），即現代整個資產階級，都是站在這個立場上面的。

以後就必然會產生大俄的民族主義的民主派。“人民社會黨”底創始人之一——璧塞浩諾夫，當他（在1906年俄國富源8月號上）叫人家小心對待農夫底民族主義成見的時候，他就已表示了這種觀點。不管人家怎樣造謠中傷我們布爾塞維克，說我們把農夫“理想化”，可是我們總是嚴格地分清了、並且以後還要分清農夫底理智與農夫底成見，分清反對普力什克維赤的農夫民主主義與想同牧師及地主調和的農夫傾向。

無產階級的民主派現在已經應當顧到大俄農民底民族主義（不是要讓步而是要鬥爭），而且將來大概還要在很長的時期內顧到這一點*。1905年以後，被壓迫民族中的民族主義之激發表現得非常厲

* 考察波蘭民族主義（舉例來說）之變態，看牠怎樣由貴族的變爲資產階級的，再變爲農民的民族主義，這是很有興趣的。彼恩加德在他的普魯士以內的波蘭人一書中，本人站在德國的科可什金底觀點上，描

害（只要看第一次國會中的‘自治聯邦派’，烏克蘭運動，回教徒運動之增長等），這種激發，一定要引起城市和鄉村中大俄小資產階級底民族主義之加強。俄國民主的改造進行越慢，則民族的壓迫與各族資產階級的糾紛也將更強頑，更粗魯，更殘暴。同時俄國普力什克維赤之流底特別反動性將產生（並加強）某些被壓迫民族中的“分立主義的”要求，這些民族有時在鄰國裏面享有多得多的自由。

這種實際情況使俄國無產階級負有兩重的，或更正確些說，兩方面的任務：反對一切民族主義，首先是反對大俄民族主義；不但是一般地承認各民族都有完全的平等權利，而且還承認國家建設方面的平等權利，即民族自決權，民族分立權；——同時，正爲着與各民族底各種民族主義作順利的鬥爭起見，主張無產階級鬥爭及無產階級組織底統一，主張他們違反着資產階級趨於民族孤立的傾向而極密切地溶合爲國際的共同團體。

民族完全平權，民族有自決之權，各民族工人溶合起來，——馬克思主義，全世界底經驗和俄國底經驗，把這個民族問題綱領教給工人們。

1914年2月

寫一個非常特別的現象：在爲民族，宗教，“波人”土地而作的鬥爭中，在德國形成一個特殊的波人“農民共和國”，其具體表現就是波蘭農民各種合作社以及其他團體緊密團結。德國的壓迫使波蘭人團結起來，獨樹一幟，激起民族主義，起初是貴族的，後來是資產階級的，最後是農民的（特別是1873年德國人開始反對學校內用波蘭文以後）。在俄國也有這種趨向而且在俄國境內不僅限於一個波蘭。

第 五 篇

1908—1914年

時期內的國際革命運動問題

1 世界政治上的引火物 (158)

最近歐、亞各國革命運動非常洶湧，由此可以充分明顯地看出，無產階級底國際鬥爭已進到一個新的空前高的階段。

波斯發生了反革命；在俄國1905年暴動以後，俄國反革命解散了第一國會，在波斯，在特殊的情形之下，也發生了同樣的情形 (159)。被日本人打得落花流水的俄國沙皇的軍隊，現在拚命替反革命賣氣力，實行報復。哥薩克兵在俄國施行屠殺、討伐、毒打和搶掠之後，隨即去鎮壓波斯的革命。尼古拉、羅曼諾夫領導黑幫地主和領導被罷工及內戰所嚇怕的資本家來極力壓迫波斯革命家，這是顯而易見的；因為敬愛耶穌的俄國軍人之充當國際的劊子手，已經不是第一次了。至於英國假裝不管閒事，對波斯反動派和專制派顯然取友誼的中立態度，——這是稍微另樣的現象。已經被本國工人運動的發展和印度革命鬥爭的高漲所嚇怕的英國自由派資產者，日益經常地、日益公開地、日益明顯地指示出：從最高的立憲主義學校畢業的、歐洲最“文明的”政治“要人”，當羣衆激發起來反對資本，反對資本主義的殖民地制度，即反對奴役、搶掠及暴力制度的時候，便變成怎樣的野獸。波斯革命家在國內狀況，是困難的，因為印度底主人翁（這是一方面）和反革命的俄國政府（這是另一面）差不多已經準備好要彼此瓜分波斯了。可是，達夫里茲地方的堅決鬥爭，革命家（似乎被打得落花流水的

革命家)之屢次獲得軍事上的勝利,指明最兇惡的軍隊,即在俄國略霍夫軍*及英國外交家底援助之下,也遇到下層羣衆最有力的抵抗。革命運動善於給復辟企圖以軍事上的抵抗,牠迫着復辟企圖底健將去向外人求助,——這樣的革命運動是不能被消滅下去的,而在這樣的條件之下,波斯反動勢力底最完滿的勝利,也祇會成爲新的民衆憤激底開場。

在土耳其,少年土耳其黨人所領導的軍隊革命運動獲得了勝利。固然,這次勝利只是半勝利,或者甚至是一小部份的勝利,因爲土耳其的尼古拉第二**暫時是以答應恢復著名的土耳其憲法來敷衍了事(160)。可是革命底這種半勝利和舊政權底這種被迫的趕快讓步,就最足以保證國內戰爭將有新的更堅決的、更緊張的、吸收更廣大的民衆的急變。而國內戰爭底學校對於各國人民不是無所裨益的。這是一個功課繁重的學校,牠的全部課程必然要包括反革命底勝利,凶惡的反動派底猖獗,舊政權對騷動者之野蠻的摧殘等等。可是,只有顯然的學究與失去知覺的木偶才會因各國人民進入這個受苦的學校而痛哭流淚;這個學校教訓被壓迫階級去進行內戰,教訓作勝利的革命,把現代奴隸羣衆所有的怨恨集中起來,而這種怨恨是這些被壓迫的、蠢笨無知的奴隸所永遠懷着的;這種怨恨將引導那些已經明瞭自己奴隸地位底恥辱的奴隸去作最偉大的有歷史意義的事業。

在印度,“文明的”英國資本家底土著奴隸,最近以來正使他們底“老爺們”偏促不安(161)。英國管理印度的制度,是無限的暴力及

* 略霍夫是俄國哥薩克軍隊的旅長,他所指揮的一族兵鎮壓了波斯革命(參看本卷註釋(159))——(編者)。

** 即指土耳其王亞布都爾·哈米德。——(編者)

搶掠底制度。全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俄國當然是除外）如印度那樣的民衆窮困和連年饑饉的。自由不列顛底最自由急進的人物如約翰·莫里——俄國的和非俄國的立憲民主黨人所拜服的人，“進步的”（實際上是奉承資本的）政論明星，充任印度底元首，一變而為真正的成吉思汗，能夠批准一切“平服”庶民的方法，直到殺戮政治抗議者為止。英國社會民主黨人底每日小報正義報，在印度竟被這些自由派和“急進派”壞蛋如莫里之流所禁止。當英國國會議員，“獨立工黨”（Independent Labour Party）底領袖凱爾、卡第奮勇到印度，向土人講到最初步的民主要求的時候，全英國的資產階級的報紙都大事咆哮反對所謂“叛亂人”。現在英國幾種最有勢力的報紙總是切齒痛罵那些破壞印度治安的“鼓動家”，並歡迎純粹俄國式的普列維式的法庭判決和對印度民主派政論家的行政壓迫的手段。可是，在印度開始起來擁護自己的作家及政治領袖的有遊行示威的羣衆。英國強盜對印度民主派第拉克（Tilak）（161）下了卑鄙的判決（他被判決長期充軍），而且近日英國衆議院內的質問已經查明，印籍陪審員會替被告人辯護，而罪狀是由英籍陪審員表決宣佈的；——資本家走狗向民主派的這種復仇，引起了孟買的遊行與罷工。在印度無產階級也已發育到有覺悟的羣衆政治鬥爭了——既是這樣，在印度的英俄制度已經沒有長期存在底前途了。歐洲人在亞洲各國作殖民地的搶掠，結果，在其中鍛鍊出一個日本，使牠獲得偉大的軍事勝利，而這些軍事勝利却保障了日本有獨立的民族的發展。毫無疑義的，英人對印度百年來的劫掠，現時這些“先進”歐人反對印度波斯的民主運動的鬥爭，將鍛鍊亞洲數百萬和數千萬無產階級，將鍛鍊他們來作同樣勝利的（如日本人那樣的）鬥爭，反對壓迫者。歐洲有覺悟的工人已經有了亞洲的同志，而這些同志底人數將不是按日增加而是按時

增加。

在中國，近幾月來，反中世紀制度的革命運動也特別表現得厲害（162）。固然，關於這個運動（正是這個運動），還不能作什麼確定的結論來，——因為關於運動的消息很少，而關於中國各地變亂的消息倒很多；可是中國“新精神”及“歐洲潮”底厲害的發展，尤其是在日俄戰爭以後，這是毫無疑義的；因此中國舊式的暴亂也必然會進為有覺悟的民主運動。這一次，有些參加掠奪殖民地的人是很為着急的，這一點可從法人在安南的行為當中看得出來：他們曾幫助中國“歷史上的政權”來壓迫革命家！他們同樣會害怕喪失“自己的”那些與中國接界的亞洲屬地。

可是使法國資產階級着急的，還不單是亞洲的屬地。巴黎附近維尼上饒的街壘，槍殺建築這些街壘的罷工者（7月30號（17日）星期4），——這些事件再三指明歐洲階級鬭爭底緊張化（163）。代表資本家統治法國的急進派克勒蒙梭，把無產階級隊伍內所剩下的最後一點共和派的資產階級的幻想，拚命加以破壞。軍隊奉“急進派”政府底命令槍殺工人，這種槍殺事件在克勒蒙梭時代恐怕比從前還要多些。因此，法國社會主義者送他一個綽號叫做“紅人”；而在現在，當他的走狗、憲兵、將軍們又在屠殺工人的時候，社會主義者便回憶起這一位最進步的資產階級共和派過去有一次向工人代表團所說的話：“我們與你們各站在街壘底不同方面”。的確，法國工人階級為要奪得並擁護共和國曾流了許多血，而在現時，在這個已經鞏固的共和國制度基礎上，有產者與勞動者間堅決的鬥爭，日益迅速地迫近着。人道報* 關於7月30號的事件寫道：“這不是簡單的毆打，這是戰鬥之

* 人道報以前是法國統一社會黨底中央機關報，現在是法國共產黨底中央機關報。——（編者）

一片斷”。將軍與警察會總想向工人挑釁，總想把和平的徒手示威，變為殺打行動。可是，軍隊四面包圍罷工工人與遊行示威者以及攻打徒手民衆，遇到抵抗，迫得民衆立刻築起街壘，以至於造成震動整個法國的事變。該報又說，用木片築成的街壘是壞得可笑的。可是重要的並不在這裏。重要的是，第三共和國(164)會使街壘不再流行。現在“克勒蒙梭又使街壘流行起來”，——同時，他對於這點所發出的議論，正如“1848年6月的劊子手及1871年的哈里佛”關於國內戰爭所發出的議論一樣的直言不諱(163)。

因7月30號的事變而提起這些偉大的歷史年月的，不單是社會黨人的報紙。資產階級的報紙非常怨恨地攻擊工人，說他們的行動好像會打算開始社會主義的革命。同時，這些報紙中間有一個報紙載着一段小小的，但值得注意的瑣聞，描寫在當時事變發生地點作戰雙方底情緒。工人們將一個受傷同志抬着，經過指揮攻打罷工工人的維爾飛將軍面前，當時示威羣衆就喊道：“行政敬禮！”而資產階級共和國底將軍即向受傷的敵人行致敬禮。

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間的鬥爭在各資本主義先進國內都在緊張起來；而且，因為歷史條件之不同，政治制度及工人運動形式之不同，使得同一的趨勢有不同的表現。英美兩國，政治完全自由，無產階級沒有任何的，或至少是沒有多少活躍的革命傳統與社會主義的傳統；在那裏，這種緊張底表現就是反托拉斯運動加強，社會主義思想非常發展，有產階級對社會主義非常注意，工人組織——有時是純粹經濟的工人組織，過渡到有計劃的與獨立的無產階級的政治鬥爭。在德奧兩國，以及局部地在斯堪的納維亞各國，階級鬥爭底緊張表現於：選舉鬥爭緊張，黨派關係緊張，各派資產者彼此接近以對付共同敵人——無產階級，法庭及警察壓迫之加強。兩個敵對營壘都在慢慢地，

可是不斷地增加自己的力量，鞏固自己的組織，在全部社會生活上更加厲害地互相背道而馳，正好像靜靜地聚精會神地準備自己去作行將到來的革命戰鬥。拉丁族各國，——意大利，尤其是法蘭西，階級鬥爭底緊張，表現在特別洶湧的、激烈的有時簡直是革命的爆發上，此時無產階級蘊在心頭的對壓迫者的仇恨，驟然爆發出來，於是“和平的”國會鬥爭局面一變而為真正的國內戰爭局面。

無產階級底國際革命運動，在各國不是平衡地而且也不能平衡地進行，其形式也各不相同。只有在各國工人的階級鬥爭底總結中才能把各個活動場所的一切可能性，完全而周到地利用起來。每個國家都把自己有價值的，新奇的東西帶進總的潮流中來，可是，在每個國家內，革命運動因某種片面性，因各單個社會黨所有的某些理論上和實際的上缺點而受累。一般和整個說來，我們清楚地看到，國際社會主義正在長足的進展，數百萬的無產階級在與敵人的許多具體衝突中團結起來，他們和資產階級間的決鬥日益逼近了，——而在工人階級方面，對這次決鬥的準備程度，比“巴黎公社”（無產階級最近一次的偉大暴動）時期是高很多倍。

除了亞洲革命民主鬥爭之劇烈以外，整個國際社會主義底這一個進展，也使俄國革命處在特別的並特別困難的條件之下。俄國革命在歐亞兩洲都有偉大的國際友軍；可是同時而且正因為如此，牠不但有國內的敵人，不但有俄國的敵人，而且有國際的敵人。各資本主義國家中，對於日益加劇的無產階級鬥爭的反動是必不可免的；而這一個反動，使全世界的資產階級政府團結起來反對任何民衆的運動，反對亞洲的、尤其是歐洲的任何的革命。我們黨內的機會主義者，正如俄國大多數的自由派智識份子一樣，至今還在夢想俄國會有這樣一個資產階級的革命：這個革命“不致推開”資產階級，不致嚇

倒靶，不致產生“過份的”反動，不致弄到由革命的階級來奪取政權。好一個徒勞無益的希望！好一個庸俗的空想！在全世界各先進國內，引火物增長得如此之快，火燄如此光明地蔓延到亞洲大多數的昨天還沉眠不醒的國家，以至於國際資產階級反動之加強與各個民族革命之加緊是絕對不可免的。

俄國的反革命不執行而且也不能執行俄國革命底歷史任務。俄國資產階級必不可免地日益傾向於國際反無產階級的和反民主運動的潮流方面。俄國無產階級不應指望於自由派的同盟者。牠應當獨立地用自己的方法去達到革命底完全勝利，即主張必須由農民羣衆自己用暴力來解決土地問題，幫助農民羣衆推倒黑幫地主的及黑幫專制的統治，以建立俄國工農民主專政爲己任，同時要記得牠的鬥爭與牠的勝利同國際革命運動有不可分離的聯繫。請少去幻想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底（俄國的及全世界的）自由主義。請多去注意國際革命的無產階級底發展！

1908年8月（7日）

2 中國的民主主義與民粹主義 (165)

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逸仙底一篇論文，是我們從不律塞爾社會黨報紙國民報（Le Peuple）上轉載而來的，這篇論文對於我們俄國人有特別的興趣。

俗話說：旁觀者清。孫逸仙是一個極有趣味的“從旁”的證人，因為，他雖是受過歐洲教育的人，但他大概完全不懂俄國底情形。你看，這一位受過歐洲教育的、中國奮鬥的勝利的民主運動底代表（中國的民主運動已經爭得了共和政體），完全不以俄國，俄國的經驗及俄國的著作為轉移，在我們面前提出純粹俄國的問題。這位中國先進民主派的議論，完全像俄國先進民主派一樣。他與俄國民粹派這樣相似，以至於兩者底基本思想及許多個別言論完全相同。

旁觀者清。偉大的中國民主派底綱領——孫逸仙底論文，就正是這樣的綱領——迫使我們，並給我們以良好的機會，根據新的世界事變來再度考察現時亞洲各資產階級革命中民主主義與民粹主義的對比關係問題。這是俄國從1905年開始的革命時期中的最嚴重的問題之一。這個問題不僅擺在俄國前面，而且也擺在全亞洲前面，關於這點只要看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底綱領，特別是拿該綱領與俄國、土耳其、波斯、中國革命事變底發展* 比較一下，就可以知道。在許多關係上，並且在許多重要的關係上，俄國的確是亞洲國家之一，而且

是最野蠻的，最中世紀式的，落後得可恥的亞洲國家之一。

俄國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塗着民粹主義的色彩，——從牠那位貴族出身的孤身的遠祖格爾村起，到牠的大批代表們，1905年農民同盟會底會員以及1906至1912年前三屆國會底勞動派議員止。現在我們看到，中國資產階級民主派也塗着完全同種的民粹主義的色彩。我們現在且拿孫逸仙做例子來考察，現在完全被捲入全世界資本主義文明潮流中去的數萬萬人底深刻革命運動所產生的思想有甚麼“社會的意義”。

孫逸仙綱領底字裏行間，充滿着奮鬥的真正的民主主義。他完全懂得“種族”革命之不够。他絲毫沒有不問政治或者甚至於絲毫輕視政治自由的態度，甚至於完全沒有認為中國專制政體可以與中國“社會改良”及立憲改革等同時並存。這是帶有共和國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義。直接提出民衆生活狀況問題，羣衆鬥爭問題；對勞動者及被剝削者表示熱烈的同情；信賴他們的正確與他們的力量。

我們看到真正偉大民族底真正偉大思想；該民族不僅善於因自己長期的奴隸狀況而痛哭，不僅善於夢想自由平等，而且還善於去向長期壓迫中國的人作鬥爭。

試拿野蠻的，死氣沉沉的，亞洲的中國臨時總統與歐美各先進文明國底總統比較一下吧。那裏的共和國總統都是些資產階級底僕役、代辦或木偶，而這種資產階級又是完全腐化了的，從頭到腳遍身都是沾着污泥和鮮血的（不是皇帝們底鮮血而是因爭取進步與文明而被殺的罷工工人底鮮血）。那裏的總統是資產階級底代表，這個資產階級早已拋棄了一切青春理想，已經完全淫亂了，已經完全賣身給

* 參看世界政治上的引火物一文及其註釋。——（編者）

百萬富翁、兆萬富翁、資產階級化的封建地主等等了。

而這裏的亞洲的共和國臨時總統却是革命的民主派，却是充滿着下面這個階級所具有的高尚精神與英勇氣概的：這個階級不是向下而是向上的，是不怕將來而信仰將來並為將來而拚命奮鬥的；這個階級仇恨過去的東西，善於拋棄牠的臭爛和妨礙生活的廢物，而不打算去為維持自己的特權來圖謀保持和恢復過去的東西。

怎麼呢？這是否說，唯物主義的西方已經腐敗了，而光明只是從神祕主義的宗教的東方放出呢？不。恰恰相反，這是說，東方已完全跑上西方底道路；這是說，從今以後，幾萬萬新起的民衆將參加鬥爭，以期達到那些為西方所已達到的理想。西方的資產階級已經腐化了，站在牠面前的，已經是牠的掘墓人——無產階級了。但在亞洲，却還有能够代表真正的奮鬥的和徹底的民主派的資產階級，牠不愧為法蘭西十八世紀末葉的偉大思想家和偉大人物底同志。

這一個還能從事於歷史上進步事業的亞洲資產階級底主要代表或主要的社會支柱，就是農民。和農民並列着的就是自由派的資產階級，牠的要人，如袁世凱等一流人物，是最善於變節的。昨天，他們還害怕皇帝，向他卑躬屈膝；後來，看見了革命勢力，感覺到了革命的民主派底勝利，於是就背叛皇帝；明天呢，他們又會因為和什麼新的或舊的“立憲”皇帝實行勾結而出賣民主派。

沒有高度的真正的民主主義的高漲，中國人民就不能真正解脫千百年來的奴隸制，因為，這種高漲激動勞苦羣衆並使之能够完成奇特的事業，而孫逸仙底綱領，句句都是表現出這種高漲的。

可是，中國民粹派這種戰鬥的民主主義底思想系統，第一，是與社會主義的夢想相聯繫着的，這些夢想就是：希望中國避免資本主義的道路，希望預防資本主義；第二，是與急進的土地改革底計劃及宣

傳相聯繫着的。正是後面這兩個政治思潮使民粹主義這一個觀念具有特殊的意義，即是與民主主義不同，而又爲民主主義之補充。

這些思潮是怎樣發生的呢？其意義如何呢？

如果沒有民衆底偉大的精神的和革命的高漲，中國民主派就未能推翻中國的舊制度，就未能爭得共和國。這種高漲，就需要和產生一種對勞苦羣衆底狀況所表示的極懇切的同情與對他們的壓迫者及剝削者所表示的極熱烈的仇恨。先進的中國人以及全體經歷過這種高漲的中國人，其解放的思想是從歐美學來的，而在歐美，目前的問題，已經是從資產階級之下解放出來的問題，即社會主義了。因此，必然產生中國民主派對社會主義的同情，必然產生他們的主觀的社會主義。

他們在主觀上是社會主義者，因爲他們反對壓迫羣衆及反對剝削羣衆。可是中國這一個落後的農業的和半封建的國家所有的客觀的條件，提在四、五萬萬人民底生活日程上的，只是這種壓迫與剝削底一個一定的、歷史上特殊的形式——封建制度。封建制度曾建築在農業生活及自然經濟的統治上；中國農民所受的封建式的剝削底來源，就是他在這種或那種形式下被束縛於土地的這一個事實；這種剝削底政治代表就是以滿清皇帝爲制度元首的全體封建主和各個封建主。

所以從中國民主派底主觀社會主義的思想與綱領中，實際上所得出的綱領却是：只是改變“不動產”底“一切血腥基礎”，只是消滅封建式的剝削。

孫逸仙的民粹主義，他的進步的鬥爭的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土地改革綱領和他的似乎是社會主義的理論，其實質就在這裏。

這一個理論，如果我們從主義上來加以觀察，牠便是小資產階級

的反動派“社會主義者”底理論。因為，他夢想中國可以“預防”資本主義，夢想中國可以因落後的原故而比較易於進行“社會革命”等等，這完全是反動的。而孫逸仙可說是以無可仿效的幼女的稚氣，自己把自己的民粹派的反動理論打得粉碎，因為，他承認了實際生活所強迫他承認的東西：“中國正處在工業的”（即資本主義的）“巨大發展底前夜”，中國“貿易”（即資本主義）“將大規模地發展起來”，“50年後我們中國將有許多個上海”——即幾百萬人口的、有資本主義的財富與無產階級的貧困的中心。

可是要問一問，——這裏也就是問題底中心，這裏也就是最有趣味的地方，而刪去革命實質的、自由派的、似是而非的馬克思主義者往往是不肯提出這個問題的，——要問一問，孫逸仙是否根據自己的反動的經濟理論，而擁護真正反動的土地綱領呢？

不是的，——問題也就在這裏。中國社會關係底辯證律也就在於：中國民主派誠懇地同情於歐洲的社會主義，將牠改造成了反動的理論，並根據這種“預防”資本主義的反動理論，而實行純粹資本主義的、最大限度資本主義的土地綱領！

孫逸仙在文章底前段大談其“經濟革命”，談得如此漂亮而又如此模糊，試問這個“經濟革命”，在事實上要做到什麼呢？

要做到將地租轉交國家，即採用亨利喬治底那種什麼單一稅制來實行土地國有。在孫逸仙所提出和宣傳的“經濟革命”裏面，別的實在的東西是絕對沒有的了。

窮鄉僻壤的土地價值與上海的土地價值間的差別，就是地租大小上的差別。土地價值就是資本化了的的地租。要使土地底“增值”成爲“國民財產”，就等於把地租——土地所有權，交給國家，或者是使土地國有化。

這樣的改良，在資本主義範圍以內是否可能呢？不但可能，而且牠是最純粹的，最澈底的，完滿到合於理想的資本主義。這一點，馬克思在哲學底貧困中已經指出過，在資本論第三卷內也詳細證明過，尤其是在剩餘價值論內與羅伯圖斯爭論時清楚地加以發揮了。(166)

土地國有化，可以消滅絕對地租，只保留一種級差地租。照馬克思底學說，所謂土地國有，就是在農業上盡量剷除中世紀的壟斷與中世紀的關係，土地買賣有最大的自由，農業最容易適應市場。歷史底作弄就在於：民粹派為着與農業中的“資本主義作鬥爭”而主張這樣的土地綱領，這個綱領底完全實現，便是農業中的資本主義底最迅速的發展。

在亞洲一個落後的農民國家裏，流行着這種最先進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土地綱領，這是甚麼經濟上的必需性所引起的呢？這是毀壞各種各色的封建制度這種必需性所引起的。

中國越落在歐洲與日本之後，便越有四分五裂和民族解體的危險。祇有革命民衆底英勇精神，才能“維新”中國，在政治方面創造“中華民國”，在土地方面實行國有化以保證最快的資本主義的進步。

這是否會成功和成功到什麼程度，——這是另一個問題。各國在自己的資產階級革命中實現了程度不等的政治上及土地上的民主主義，而且在極複雜的錯綜之下實現的。這要由國際局面和中國各種社會力量底對比來解決。滿清皇帝大概要把封建主、官僚、僧侶統一起來，以謀復辟。好容易才由自由保皇派變為自由共和派的（能長久嗎？）資產階級底代表——袁世凱，將採用一種在帝制與革命之間隨風轉蓬的政策。孫逸仙所代表的革命的資產階級的民主派，認為在政治改良及土地改良事業上，盡量發展農民羣衆底自動性，堅決性及勇敢心乃是謀中國“維新”的道路，這是正確的。

最後，上海底數目既然將增加，中國無產階級也將增長起來。牠大概將組織某個中國社會民主工黨；這個政黨在批評孫逸仙底小資產階級空想及反動觀點的時候，大概將把孫逸仙底政治綱領和土地綱領中的革命民主主義的核心，關心地抽引出來，保護起來並發展起來。

1912年7月

3 維 新 的 中 國 (167)

先進的和文明的歐洲，對中國維新不發生興趣。四萬萬落後的亞洲人已經達到自由，已經覺醒起來參加政治生活了。環球四分之一的人口可說是已經由睡夢進到光明，進到運動，進到鬥爭了。

文明的歐洲置之不理。直到現在，連法蘭西共和國都還沒有正式承認中華民國！關於這一點，在法國議院內快要提出質問。

歐洲爲什麼這樣置若罔聞呢？因爲西歐到處都是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統治着，這種資產階級已腐敗了四分之三，牠爲着“嚴厲”對付工人或者爲着在一個盧布上多賺五分錢的額外利潤，不惜把自己的全部“文明”賣給任何一個冒險家。這種資產階級把中國只看作一塊肥肉，——現在俄國“親熱擁抱”蒙古以後（168），日英德等國人都要來分割這塊肥肉了。

可是中國底維新還是前進着。現時正在開始選舉國會——專政制度後的第一次國會。衆議院議員將有六百人，“參議院”274人。

選舉權不是普遍的也不是直接的。有選舉權的只是年滿21歲，在選區內居住兩年以上、繳納兩元直接稅或擁有500元財產的人。首先選出選舉人，再由選舉人選舉議員。

這樣的選舉法，即已經指明：富裕農民和資產階級是聯合在一起，而無產階級則完全沒有參加或完全沒有力量。

這種情況還有中國各政黨底性質可以證明。主要的黨有三個：

(一)“急進社會主義”黨，——實際上該黨之沒有絲毫社會主義也同我們的“人民社會黨人”(和十分之九的“社會革命黨人”)一樣。

這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底政黨。牠的主要要求：中國底政治統一，工商業“按着社會方面”發展(這種話頭，正和俄國民粹派及社會革命黨人底所謂“勞動原則”與“平均主義”，一樣模糊)，保持和平。

(二)第二個政黨是自由派。他們與“急進社會主義”黨聯合，共同組成“國民黨”。該黨在中國第一次國會內大概要佔大多數。該黨底首領就是著名的孫逸仙博士。他現在正在特別製定建築廣大鐵路的計劃(告訴俄國民粹派：孫逸仙之幹這種工作，是爲的要使中國“避免”資本主義底命運哩！)。

(三)第三個黨叫做“共和黨”——這是在政治上掛假招牌的榜樣之一！實際上，牠是一個保守黨，牠大半是依靠着中國北方(即最落後的地方)的官僚、地主、資產者。而“國民黨”則大半是比較更工業化的、更先進的、更發達的南方底政黨。

“國民黨”底主要支柱是廣大的農民羣衆。牠的各首領是外國留學的智識界。

- 中國的自由是因農民民主派與自由資產階級底聯合而爭取到了。農民沒有無產階級底政黨做領導，是否能夠用自己的民主主義的立場來抵擋住自由派(這派人只待良機到來，就要向右飛奔)，這在不遠的將來便可看得明白(169)。

1912年11月

4 國際社會黨人底斯都加爾大會 (170)

閉幕不久的斯都加爾代表大會是無產階級“國際”第12次大會。前五次大會是在“第一國際”時代(1866到1872年)開的。當時馬克思領導“第一國際”，企圖——培培爾說得確當——自土地創造鬥爭着的無產階級之國際的統一。在各國社會主義的政黨沒有團結和沒有鞏固以前，這種企圖是不能獲得成功的，可是“第一國際”底活動會給全世界工人運動以偉大的幫助，並留下堅固的痕跡。

“第二國際”由1889年巴黎國際社會主義代表大會所開創。以後各次大會是在不律塞爾(1891)、蘇黎支(1893)、倫敦(1896)、巴黎(1900)及亞姆斯坦(1904)舉行的；這個新“國際”在這些大會上，~~在~~各國堅固的黨，完全鞏固起來了。參加斯都加爾大會的代表共有884人，代表歐、亞(日本及印度之一部份)美、澳、非(南非州代表一人)等洲二十五個民族。

國際社會黨人底斯都加爾大會，其偉大的意義，正就在於牠已經把“第二國際”完全鞏固起來並把國際大會變為切實的會議，這些會議對於全世界社會黨人底工作方向及性質有極嚴重的影響。在形式上講來，國際代表大會底決議不是為各個國家所必需遵守的；可是，他們的精神上的意義却是這樣的大：不遵守決議的情形事實上只是稀有的例外，恐怕比各黨不遵守自己代表大會底決議還要稀有些。

亞姆斯坦代表大會已謀得法國社會主義者底統一，牠的反關員主義的決議會真正表現了全世界覺悟無產階級底意志，曾決定各國工人政黨底政策。

斯都加爾代表大會在這個方向中又作了一大進展，因為牠在許多重要問題上都成了確定社會主義底政治路線的最高機關。牠比亞姆斯坦大會更決斷地確定了這一條革命的社會民主黨反機會主義的路線。由蔡特金主編的德國社會民主派女工機關報平等，關於這點說得很公正：

“個別社會黨在一切問題上所犯的機會主義的傾向，已因全世界社會主義者底合作而改正到革命方面來了”。

同時，這裏有一個值得注意而令人痛心的現象，就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從來總是堅持馬克思主義上的革命觀點，這次却表現動搖，或者站在機會主義的立場上。斯都加爾代表大會把恩格斯關於德國工人運動的一段深刻的評論證實了。1886年4月29號，恩格斯寫給‘第一國際’底老戰士梭爾格道：

“德國人，尤其是當他們把大批庸人送到國會去（但這是不可免的）以後，領導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作用被人爭奪着，這一般說來是很好的。德國在平靜時期，什麼都變成庸俗的了；在這樣的時候，法國人露出鋒芒來同他們競爭是絕對必要的；而這種競爭是不會缺少的”。

在斯都加爾沒有缺少法國人競爭的鋒芒，而這種鋒芒的確會是必要的，因為德國人已經表現出不少的庸俗氣。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特別應當注意這點，因為我們的自由派（而且不僅是自由派）正是拚命把德國社會民主黨最不光榮的地方引為模範。德國社會民主黨底最有思慮的和最出色的領袖已經親自指出這種情形，並拋棄一切

虛偽的怕羞習氣，堅決地指出這點，作為警戒。

蔡特金底機關報寫道：

“在亞姆斯坦，全世界無產階級代表大會上的一切爭辯底革命基礎是德列斯敦的決議（171），而在斯都加爾大會，則福爾馬在軍國主義問題委員會上的演說，彼伯洛夫在僑居問題委員會上的演說，達微特（我們還要加上培恩斯坦）在殖民地問題委員會上的演說（172），都是一些不堪入耳的機會主義的論調。這一次，德國代表在大多數委員會內，在大多數問題上，都做了機會主義底首領”！

考茨基評論斯都加爾代表大會時寫道：

“德國社會民主黨向來在第二國際內所實際表演的領導作用，這次竟絲毫沒有表現過”

現在來分別考察大會上所討論過的問題。關於殖民地問題，在委員會內會未能消滅意見的分歧。機會主義派與革命派的爭論由大會自己解決了，贊成革命派的127票，反對的108票，懷疑的10票，結果革命派佔居多數。這裏還要附帶指出一個好的現象，就是俄國社會主義者，大家都本着革命的精神，一致地表決了一切問題（俄國共有20票，其中“俄國社會民主工黨”10票，波蘭人在外；社會革命黨人7票；工會代表3票。波蘭有10票：“波蘭社會民主黨”得4票，“波蘭社會黨”及非俄屬波蘭得6票。最後，芬蘭兩個代表共得8票）。

在討論殖民地問題的時候，委員會內形成了機會主義的大多數，而在決議草案內發現了這樣神奇古怪的句子：“大會並不在原則上和在任何時候都斥責一切的殖民政策；殖民政策在社會主義統治之下可以有發揚文化的作用”。這個論點，實際上是等於直接退到資產階級的政策及資產階級宇宙觀方面去，資產階級宇宙觀替爭奪殖民地

的戰爭及暴行作辯護。這是退到羅斯福方面去，——有一個美國代表這樣說。想拿“社會主義的殖民政策”和在殖民地進行切實的改良工作等任務來替這種退却作辯護，這些企圖會是非常不適當的。社會主義從來不拒絕而且現在也不拒絕在殖民地內也擁護改良，可是這並不是，而且不應當是減弱我們的原則上的立場：反對一切構成“殖民政策”的行為，即反對搶奪，反對征服異族，反對暴力和擄掠。一切社會黨底最低綱領，對宗主國及殖民地都是一樣有效的。“社會主義的殖民政策”這個觀念本身，就糊塗到了極點。大會把以上所引的這些話刪去，而對於殖民政策作比較過去各決議案中更嚴厲的斥責，這完全是正確的。

關於社會黨對職工會關係問題的決議案，對於我們俄國人有更重大的意義。該問題在俄國是一個迫切的問題。斯托阿爾姆大會之解決該問題是贊成無黨派的職工會，即是批准了俄國的以普列漢諾夫為首的主張工會中立的入底立場。倫敦大會則向贊成有黨派的職工會而反對工會中立的方面進了一步。大家知道，倫敦大會底決議案，在一部份職工會內，尤其是在資產階級民主報紙上引起了大的爭論與不滿意。

在斯都加爾大會上，實質上問題正是這樣：使職工會中立還是使牠們更加與黨接近？而國際社會黨人大會是贊成工會與黨更加接近的，讀者只要把大會決議閱讀一次就會相信這一點。決議內並沒有講到職工會底中立性，也沒有講到牠們的無黨派性。考茨基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內，曾經堅持工會與黨接近而反對培培爾底中立說，所以他向萊布齊工人做關於斯都加爾大會的報告時（1907年前進報 209期）有全權可以這樣聲言：

“斯都加爾代表大會底決議把我們所需要的一切，都講到

了。他把中立性永遠葬送了”。

蔡特金寫道：

“在原則上已沒有人反對(在斯都加爾)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底基本歷史趨勢——使政治鬥爭與經濟鬥爭聯繫起來，使各種組織盡量密切地團結為社會主義工人階級底統一力量。只有俄國社會民主黨人代表普列漢諾夫同志”(應當說是孟塞維克底代表，他們派普列漢諾夫到委員會去充當‘中立主義’底辯護者)“與法國代表團底大多數企圖用極不中肯的理由。用他們國家底特點為藉口，認為對於這個原則加以相當的限制是正確的……。大會底絕大多數都是贊成社會民主黨與職工會聯絡一致的堅決政策的……”

應當指出：普列漢諾夫底這一個不中肯的(蔡特金底公正的意見)論據，却以這種形式傳遍俄國的合法報紙了。他在斯都加爾大會底委員會上藉口說，“俄國有十一個革命的政黨”：“職工會到底應當同那一個聯絡一致呢？”(這是我們從前進報196期上引來的)。普列漢諾夫這種藉口，無論在事實上，或在原則上都是不對的。事實上，在俄國底每個民族內，爭取對於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影響的，不過只有兩個政黨：社會民主黨和社會革命黨，波蘭社會民主黨和波蘭社會黨，萊多維亞社會民主黨和萊多維亞社會革命黨(所謂“萊多維亞社會民主黨人聯合會”)，亞美尼亞社會民主黨及亞美尼亞社會革命黨等等。俄國出席斯都加爾大會的代表團，也馬上分為兩部分。說俄國有十一個政黨，這完全是任意捏造的，這只是把工人帶到迷路上去。普列漢諾夫在原則上之所以不對，是因為俄國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與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之間的鬥爭，在任何地方都必然地發生，在職工會內也是一樣。譬如英國人也有兩個鬥爭的社會黨：社會民主黨(SDF)(174)和獨立黨(ILP)(175)，可是他們沒有想過要

反對決議案。

在斯都加爾被否決的中立思想，已給了工人運動以不少的害處，這在德國特別顯著。中立思想在德國宣傳得最廣，運用得也最多。結果，職工會偏向機會主義如此顯著，連在本問題上如此小心謹慎的考茨基都已經公開承認這種偏向。他向萊布齊工人作報告時公開說：要明瞭德國代表團在斯都加爾所表現的“保守性”，“只要看看代表團底成分就是了。其中有一半的職工會底代表，因此，我們黨底“右翼”當時所表現的力量比在黨內所實有的更大些”。

毫無疑義的，斯都加爾大會底決議案應當加速俄國社會民主黨和俄國自由派所這樣鍾愛的中立思想堅決斷絕關係。我們採取必要的謹慎態度與漸進態度，不採取任何急躁的與不合節奏的步驟，同時我們應當在職工會裏面本着使工會和社會民主黨更加接近的精神來堅決進行工作。

其次，關於出國僑居和入國僑居問題，在斯都加爾大會委員會內也顯然暴露出機會主義派和革命派之間的意見紛歧。機會主義者打算限制落後的、不開通的工人（特別是日本人和中國人）底僑居權。這班人底狹隘的行會式的閉關自守的精神及工聯主義的特權思想，多過了他們對社會主義任務的意識；而這些任務應當是：教育和組織無產階級中間那些還沒有參加工人運動的階層。大會排斥了這一方面的一切偏向。甚至在僑居問題委員會內，主張限制僑居自由的份子是完全孤單的，而大會決議案就完全承認了全世界工人團結一致的階級鬥爭。

關於婦女選舉權問題，決議案也是一致通過的。只有從半資產階級的“費邊社”來的一個英國女子，主張可以不爭取完全的婦女選舉權而只爭取便利於有產者的有限制的選舉權。大會無條件地否決了

這種意見而主張：女工爭取選舉權時，不要同資產階級的男女平權派聯合一起而要與無產階級底政黨聯合在一起。大會認為，在從事婦女選舉權運動的時候，必需完全堅持社會主義底原則及男女平權制，絕不為圖什麼方便而損害這些原則。

在該委員會內，關於這一點發生了有趣的意見分歧。奧國人（阿德列爾、波普）曾替自己爭取男女普選權的策略作辯護：為着爭得這個權利起見，他們曾認為最好不要把婦女選舉權也提在前面。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特別是蔡特金，還在奧國人從事普選權運動時，就起來反對這種主張。蔡特金曾在報上申言說：抹煞婦女選舉權的要求是絕對不行的；奧國人為圖方便而機會主義式地犧牲原則；如果他們也這樣熱烈地擁護婦女選舉權，那末他們決不會減弱而會加強鼓動底規模和國民運動底力量。該委員會內還有一個出色的德國女社會黨員齊慈也完全贊成蔡特金。阿德列爾底修正案是間接辯護奧國人底策略的（在這修正案內只講到，真正為全體公民爭取選舉權時不要有間斷，而沒有講到，進行爭取選舉權的鬥爭時始終要提出男女平權的要求）；這個修正案以十二票對九票被否決了。該委員會與代表大會底觀點，齊慈在國際女社會黨人代表會議上（176）（這代表會議與代表大會同時同地舉行）的演說中的下面這一段話裏最確切地表明出來了，她說：“凡是我們所認為正確的，在原則上我們都應當要求……而只有缺少力量去作鬥爭時，我們才要求可以達到的東西。社會民主黨策略向來就是這樣的。我們的要求越微小，政府底讓步也越微小……”。在這次奧國女社會黨人與德國女社會黨人間的爭論中，讀者可以看出，優秀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多麼嚴厲地對付那些任何放棄堅定的原則的革命策略的企圖。

大會最後一天是討論最使大家感受興趣的軍國主義問題。鼎鼎

大名的愛爾維提⁽¹⁷⁷⁾一個極無根據的主張，他不會把戰爭同一般的資本主義的統治聯繫起來，不會把反軍國主義的鼓動和全部社會主義的工作聯繫起來。愛爾維底草案——用罷工和暴動去“回答”任何戰爭，表現他完全不懂得這種或那種鬥爭方法底運用，不是依賴於革命家底預先決定，而是依賴於戰爭所將引起的經濟的政治的危機底客觀條件。

可是，如果愛爾維的確是表現了輕率的浮泛的態度，爲動人的辭句所迷戀；那末，僅僅本着信條主義的精神敘述一些社會主義底普通真理來同他對立一下，那便是莫大的近視病了。福爾馬就特別陷於這種錯誤（培培爾與黑德當時沒有完全避免這個錯誤）。他以非常自滿的態度，本着酷愛矩守成規的議會主義的精神，痛罵了愛爾維；同時沒有看到，他自己的機會主義底狹隘性與呆板性却迫使人們承認愛爾維主義中有靈活的東西，雖然愛爾維自己對問題的提法，在理論上是荒謬的和無稽的。有時理論上的荒謬觀點在運動底新轉變時含有某些實際真理。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特別是盧森堡在演說中所着重指明的，也就是問題底這一方面，就是號召人們不要光是注重議會的鬥爭方法，號召根據將來戰爭和將來危機底新條件而從事活動。盧森堡與俄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列甫與馬爾托夫在這裏是一致的）共同提議修改培培爾底決議案，而在這些修正案內特別提出：必須在青年中作鼓動工作；必須利用戰爭所產生的危機，來加速資產階級底顛覆；必須注意到，鬥爭底方法與手段必然要隨着階級鬥爭底緊張及政治局面底改變而變更的。這麼一來，培培爾底決議案，本是教條式的片面的，死的，容許福爾馬式的論調的，結果却完全變成另外一個決議了。一切理論上的真理，都在這個決議案中反復說明，教訓愛爾維派——善於爲了反軍國主義而忘記社會主義的愛爾維派。可

是這些真理不是拿來袒護議會主義的癡病的，不是拿來單單推崇一種和平手段的，不是拿來崇拜已有的比較平靜的局面的，——而是要來承認一切鬥爭手段，來估計俄國革命底經驗，來發展運動底有作用的，創造的方面。

在我們已經多次提到的蔡特金底機關報上，正是十分正確地指出國際大會反軍國主義決議案中這一個最出色最重要的地方。蔡特金關於反軍國主義的決議案說道：

“這裏，結果取得勝利的，還是工人階級底革命熱忱與工人階級相信自己鬥爭能力的勇氣，——一方面戰勝了悲觀主義的軟弱無力的福音與保守的企圖：將鬥爭只限於舊有的國會鬥爭；另一方面戰勝了法國半無政府主義者如愛爾維等底簡單的反軍國主義的兒戲。結果為專門委員會及全世界將近九百代表所一致通過了的決議案用熱烈的辭句表明：自前屆國際大會以來，革命的工人運動有了巨大的高漲；決議案提出無產階級策略底靈活性，牠的發展能力，牠之隨條件底成熟而緊張化，作為這一策略底原則。”

愛爾維主義被駁倒了，可是牠之被駁倒不是有利於機會主義的，不是站在教條主義與消極性底觀點上來駁倒的。切實要求採取更堅決的新的鬥爭方法，這是國際無產階級所完全承認了的，而且是與經濟矛盾底全部緊張，與資本主義所產生的危機底一切條件相聯繫着的。

不是空洞的愛爾維式的感嘆；而是明確意識到社會革命之必不可免，具備鬥爭到底的決心，決計採用最革命的鬥爭手段——這就是斯都加爾國際社會黨人大會關於軍國主義問題決議底意義。

無產階級底軍隊，在世界各國正在鞏固起來。牠的覺悟性，團結

性及堅決性，不是按日增長，而是按時增長着。就是資本主義也是有成效地關心着要使危機多多發生，而無產階級就利用這些危機來破壞資本主義。

1907年末

5 好戰的軍國主義與社會民主黨

反軍國主義的策略 (178)

(1)

外交家手忙脚亂，“通牒”、“報告”、“聲明”如雪片飛來；各國戴着王冠的傀儡，高舉着香檳酒杯在那裏“鞏固和平”，而總長們則站在他們身旁低聲囑咐。可是，“小百姓”們則明明知道：烏鴉飛繞之下必有死屍之臭。保守派的元老克洛麥向英國議院發言，“在我們這個時代，無論治國者立意怎樣和平，而民族（？）利益已是千鈞一髮，各種慾望是在激發起來，衝突底危險和可能，是在呈現出來”。

最近以來，引火物積得夠了，而且還在增加。波斯革命威嚇着要把一切隔壁，——歐洲列強在那裏所建立的“勢力範圍”完全拌亂。土耳其底立憲運動，勢將把這塊肥肉從西歐資本主義的猛獸爪牙中奪取出來；此外又很緊張地擺着一些舊有的現在已形緊張的“問題”——馬其頓問題，中亞細亞問題，遠東問題（179）等等。

同時，現時或明或暗的談判，協商等等不知多少，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只要稍微對某個“強國”動彈一下，便是“火星燎原”。

各國政府彼此越是摩拳擦掌地準備戕殺，牠們就越將殘酷地摧殘本國反軍國主義的運動。對於反軍國主義者的壓迫日益深刻而廣泛。克勒蒙梭與白里安底“急進社會黨”內閣（180）之施行暴力，不

亞於畢尤洛夫貴族保守派內閣(1871)。關於集會結社的新法律，禁止20歲以下的青年參加政治會議，該法律頒布以後，德國底“青年團體”都遭解散；這麼一來，曾使德國反軍國主義的鼓動極感困難。

結果，關於社會黨人反軍國主義策略問題的爭論，從斯都加爾國際大會以後已經消沉下去的，現在又在黨的刊物上活躍起來了。

初看起來，這是奇怪的現象：雖然這問題底重要性如此顯著，雖然軍國主義底害處如此彰明昭著，而對於無產階級却難以找到另外一個問題，使西歐社會黨人在這個問題上，像在關於反軍國主義策略問題的爭論上有一樣的動搖與意見分歧。

對於正確解決這個問題的原則上的前提，早已完全確實地規定，並不引起意見分歧。現時的軍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底結果。牠的兩種形式，都是資本主義底“生活上的表現”，這兩種形式就是：資本主義國家在對外衝突時所使用的武力（如德國人所謂“對外的軍國主義”）以及統治階級用來鎮壓無產階級各種（經濟的和政治的）運動的武器（“對內的軍國主義”）。歷次國際大會（1889年巴黎大會，1891年不律塞爾大會，1893年蘇黎支大會及1907年斯都加爾大會）在自己的決議內曾完全說出了這種觀點(182)。把軍國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這種聯繫，規定得最周到的，莫過於斯都加爾大會底決議，雖然這次大會，根據議事日程（關於國際糾紛問題），對於德國人的所謂“對外的軍國主義”討論得比較多。關於這一點的決議是這樣：“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通常都是牠們在世界市場上競爭的結果，因為每個國家都不僅想替自己保證一塊銷售地，而且還想奪取一些新的領土，同時在這一方面起主要作用的就是奴役異族和他國。其次，這些戰爭是由軍國主義所引起的不斷武裝而產生的；而軍國主義是資產階級實行階級統治及政治上征服工人階級的主要工具。

民族主義的成見助長戰爭。在各文明國經常地培養這些成見以謀統治階級底利益，其目的是要使無產階級的羣衆離開他們本身的階級任務，使他們忘記國際階級團結底責任。

所以，戰爭底根源，是在資本主義實質的本身中；只有資本主義制度不再存在下去，或者是軍事技術發展所引起的人力和財力的巨大犧牲及武裝所引起的民衆之忿恨，結果消滅這種制度——只有這時候，戰爭才會停止。

兵士大半是由工人階級中徵募來的，遭受物質犧牲的大半是工人階級，因此，特別是工人階級是戰爭底天然的仇敵，因為戰爭違反他們的目的，這目的就是：創造一個基於社會主義原則的經濟制度，這個制度在事實上實現各民族底團結”。

(2)

總之，軍國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有原則上的聯繫，這在社會黨人中間，已經完全確定，在這一點上再沒有爭論的餘地了。可是承認這種聯繫，這還不是具體規定社會黨人反軍國主義的策略，這還不是解決一個實際的問題：怎樣反對軍國主義底重担和怎樣阻止戰爭。所以在回答這些問題的時候，社會黨人中間便發生了很大的意見分歧。在斯都加爾大會上就特別顯明地可以看出這些意見分歧。

在一個極端上站着禰爾馬式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他們說，軍國主義既是資本主義底產兒，戰爭既是資本主義發展底必然的伴侶，那末就不用不着從事什麼特別的反軍國主義的活動。禰爾馬在愛森大會上就正是這樣說的(183)。至於社會民主黨人在宣戰時應當怎麼辦的問題，那末以培培爾及禰爾馬爲首的大多數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擁護這樣的主張：社會民主黨人應當擁護自己的祖國，使之不受敵人所

襲擊。他們必須參加“防禦的”戰爭。這種基本觀點，使得福爾馬在斯都加爾大會上申明：“一切對於人類的博愛，都不能妨礙我們做個優秀的德國人”，使得社會民主黨議員諾斯克在國會內申明道：反德國的戰爭發生時，“社會民主黨人不會落後於資產階級的黨，而要把武器放在肩上”；諾斯克由此只要稍進一步，就可以申明：“我們希望德國盡量武裝起來”。

另一個極端上站着贊成愛爾維的這一個小小的集團。愛爾維派說，無產階級沒有祖國。所以一切的和各種的戰爭都是為資本家謀利益的，所以無產階級應當反對每次戰爭。凡遇宣戰，無產階級應當以軍事罷工及暴動來對付。反軍國主義的宣傳，主要的也就應當偏重這一點。因此，愛爾維在斯都加爾提出以下的決議草案：

“大會主張，凡遇宣戰，不管其出自何方，都應該以軍事罷工及暴動來對付”。

這就是西歐社會黨人在本問題上的兩個“極端的”主張。在這兩個主張中，正如“滴水照太陽”，反映出現在還妨礙着西歐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活動的兩個弊病：一方面是機會主義的趨向，另一方面是無政府主義的空談。

首先關於愛國主義作幾點申明。說“無產者沒有祖國”，共產黨宣言上的確是這樣說過。說福爾馬，諾斯克及其同伴們底立場侮辱了國際社會主義底基本主張，這也是對的。可是並不能因此而認為愛爾維及愛爾維派底下面這種斷語是正確的：無產階級生在那一個祖國，是生在帝制的德國，或是生在共和的法國，或是生在專制的土耳其，這對於無產階級都是痛癢不關的。祖國——已有的政治的文化的及社會的環境是無產階級階級鬥爭中之最強有力的因素。福爾馬給無產階級規定什麼“真正德國人的”對祖國的態度，這固然是不

對；可是愛爾維對於無產階級解放鬥爭底這樣重要的因素，無可原諒地不採取批評的態度，這同樣也是不對的。無產階級對於自己鬥爭底政治的文化的及社會的環境，不能痛癢不關，因而對於牠的國家底命運也不能痛癢不關。可是國家命運之所以使無產階級發生興趣，只是在這個命運涉及無產階級鬥爭的這個限度以內，而不是由於什麼資產階級的，社會民主黨人所完全不應講的“愛國主義”。

另外一個問題，——對軍國主義及戰爭的態度問題，就比較複雜了。只要初看一下，就知道愛爾維無可原諒地把這兩個問題混淆起來了，他忘記戰爭與資本主義之間的因果關係：無產階級採用愛爾維式的策略，牠便要耗費氣力：把自己的全部奮鬥決心（須知所說的是暴動）用來與結果（戰爭）鬥爭，而讓原因（資本主義）依然存在。

無政府主義的思想方法，在這裏表現得十足了。瞎信一切直接行動底神奇力量，把這一個“直接行動”從整個社會政治局面中抓出來而毫不分析這個局面，——總而言之，這顯然是“對於社會現象任意的機械的了解”（李卜克內西底話）。

愛爾維底計劃“很簡單”：在宣戰那一天，社會民主黨員兵士臨陣脫逃，而後備隊則宣佈罷戰，坐在家裏不出來。然而“後備隊之罷戰，並不是消極的反抗：工人階級會要馬上轉為公開的反抗，轉為暴動；作戰軍隊會在國家邊境上作戰，所以暴動更會有勝利的機會”（見愛爾維著的他們的祖國）。

這就是所謂“真正的直接而實際的計劃”，而愛爾維却深信牠會獲得成效，主張對於每次宣戰，都要用軍事罷工和暴動來對付。

從這樣可以明顯看到，這裏的問題並不在於無產階級是否可以（如果牠認為這是合宜的話）用罷工和暴動來對付宣戰。爭論在於，無產階級是否一定應該用暴動來對付每次戰爭。在後一個意義上來

解決問題，就是使無產階級不得選擇決戰底時機而交給敵人來選擇；不是無產階級，根據自己的利益來選擇時機，趁着一般社會主義意識發展很高，組織性很強，機會順利的時候，來發動鬥爭；不，資產階級政府竟可在暴動條件不利的時候挑撥無產階級去暴動，例如宣佈一種特別可以引起廣大羣衆底愛國主義及國家主義感情的戰爭，因而使暴動的無產階級孤立起來。還要注意一點，就是各國資產階級，從君主制的德國到共和制的法國及民主制的瑞士爲止，在和平時候就已經這樣殘酷地壓迫了反軍國主義的活動；那末，在戰爭時候，在軍法從事、軍事戒嚴及軍事裁判時期，其壓迫任何軍事罷工企圖所用的手段，將更是何等的兇暴。

考茨基講到愛爾維底思想時，說得很對：“軍事罷工思想，是由‘良好’動機而產生的，牠是高尙的，並且是充滿着勇敢精神，可是牠是勇敢的荒唐思想”。

無產階級，如果牠認爲妥當而適宜，牠可以用軍事罷工來對付宣戰；牠爲要達到社會革命起見，除用其他的手段之外，也可以採用軍事罷工。可是拿這種“策略藥方”來約束自己，這就不適合於無產階級底利益了。

斯都加爾國際大會就正是這樣回答這個爭論問題的。

(3)

可是，如果愛爾維底觀點是“勇敢的荒唐的思想”，那末，福爾馬、諾斯克及其“右派”同情者底主張，便是機會主義的懦怯思想。他們在斯都加爾大會上，特別是在愛森大會上說，軍國主義既是資本主義底產兒，而且將與牠同歸於盡，那末，也就用不着特別的反軍國主義的鼓動：不應當有這種鼓動。有人在斯都加爾大會上反駁了他們

道：可是，急進地解決工人問題與婦女問題，這一點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也是不可能的；然而我們還是爲工人立法而鬥爭；爲推廣婦女底公民權等等而鬥爭。軍隊干涉勞資鬥爭的事件日益加多，軍國主義底重要性不但在無產階級現時的鬥爭中，而且在將來——社會革命時候——也日益明顯，因此特別的反軍國主義的宣傳更應努力進行。

特別的反軍國主義的宣傳不但有原則上的證據，而且有重要的歷史經驗。比利時在這一方面勝過別國。比利時工黨（184）除了作反軍國主義思想底普通宣傳之外，還組織了許多社會主義青年小組，叫做“少年先鋒隊”（“Jeunes Gardes”）（185）。同府的各小組統一爲府聯合會；各府聯合會又統一爲全國聯合會，而以“總委員會”爲領導機關。“少年先鋒隊”底機關報（如“La jeunesse-c'est l'avenir”，“De Caserne”，“De Loteling”等）印發數萬份！這些聯合會，其中最強的是“瓦倫聯合會”，包括六十二個地方小組，一萬會員；“少年先鋒隊”現在總共包括一百二十一個地方小組。

除了文字鼓動之外，同時還加緊進行口頭鼓動：每逢1月和9月（募兵月），在比利時各主要城市舉行民衆會議及示威遊行。社會黨的演講者在衙門口，在廣場中，向新兵解釋軍國主義底意義。在“少年先鋒隊”底“總委員會”之下，設立“控訴委員會”，負責收集一切關於軍營中不公道事情的消息。黨底中央機關報民報上設有“軍中消息”一欄，每日公佈這些消息。反軍國主義的宣傳不僅在營房門口進行，社會黨員兵士們還組織小組，以便在軍隊中進行宣傳。現時這樣的小組（兵士協會）約有十五個。

現在法國、瑞士、奧國以及其他各國，都以比利時爲模範而進行着反軍國主義的宣傳，雖其強度及組織關係各不相同。

總之，特別的反軍國主義活動不但是特別需要的，而且在實際上

是妥當的，有效果的。因此，福爾馬藉口說德國底警察條件不允許這樣做，藉口說這樣幹會使黨部有破壞的危險，而反對特別的反軍國主義活動，——那末問題就歸結到對某國條件的具體分析上去了；這是關於事實的問題而不是關於原則的問題。雖然就在這裏，壽勒斯底話也是正確的，他說：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其幼年時代，在政府施行反社會黨人非常法的嚴重時期，經受住了俾斯麥底鐵血手腕，牠現在已經發展而強固得多了，可以不怕現時執政者方面的壓迫了。可是福爾馬拚命藉口說，特別的反軍國主義的宣傳在原則上不妥當，他這種話是非常不對的。

福爾馬及其同情者底主張：社會民主黨人必須應當參加防守的戰爭，這也是充滿着同樣的機會主義。考茨基出色的批評完全推翻了這些觀點。考茨基指出，要認清，尤其是在愛國主義風行一時的時期要認清某個戰爭是由防守的目的還是進攻的目的引起的，有時候是完全不可能的（考茨基引了這樣的例子：在日、俄戰爭開始時，日本是進攻還是防守？）。社會民主黨人如果想依靠這個標誌來決定自己對戰爭的態度，那他們就要迷亂於外交談判底羅網中了。社會民主黨人甚至可以遇着這樣的情況：他們應當要求進攻的戰爭。1848年（愛爾維派也不妨記着這一點），馬克思與恩格斯認為德國反俄國的戰爭是必要的（186）。他們後來又想影響英國底輿論，以便喚起牠去對俄宣戰（187）。同時考茨基也作了以下的假設的例子。他說：

* 法國人底有趣的特徵，就是他們組織的所謂“兵士小捐”底組織：工人每星期交一個銅元給工會書記，這樣收集弄來錢就拿去送給兵士，“以便提起”就在當兵的時候，他們也屬於被剝削階級，他們無論如何，不應忘記這一點”。

“假定革命的運動在俄國取得勝利，而這一勝利底影響使法國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另一方面，假定歐洲各君主組織聯盟來反對新俄國。那時如果法國共和國起來援助俄國，國際社會民主黨是否起來抗議呢？”（考茨基著：我們對於愛國主義及戰爭的觀點）。

很明顯的，在這個問題上（在對於“愛國主義”的觀點上也是一樣），唯一可能的觀點不是戰爭底防守性或進攻性，而是無產階級鬥爭底利益，或者最好是說，無產階級國際運動底利益；只有從這個觀點出發，才能考察和解決關於社會民主黨對國際方面各種現象的態度問題。

壽勒斯在不久以前所發表的言論，表示機會主義在這些問題上也能達到何等可恥的地步。他在德國一個自由資產階級的小報上發表自己關於國際狀況的觀點時，擁護英法與俄國聯盟，反對說該聯盟有反和平的企圖，認為該聯盟是“和平底保障”，他歡迎這件事實，即“英俄兩個世仇國家，現在竟聯起盟來了”（188）。

盧森堡在最近一期新時代*內，給壽勒斯寫了一封公開的信，對他的觀點作了很好的估計和熱烈的反駁。

盧森堡首先指出：說什麼“英”“俄”聯盟，這是“以資產階級政治家底口氣說話”，因為在對外政策上，資本主義國家底利益與無產階級底利益是相反的，在對外關係上不能講什麼利益底協調。如果軍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底產兒，則戰爭也不能因執政者及外交家底陰謀勾結而消滅；社會黨人底任務不是引起對於這一點的幻想，而是經常地揭破外交上“和平步驟”底虛偽及軟弱無力。

* 新時代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底理論雜誌。——（編者）

可是信底中心點是估計壽勒斯所如此贊揚的英、法與俄國的聯盟。歐洲資產階級給了沙皇制度以打退革命進攻的可能。信上寫道：

“現在專制政體企圖把對革命的暫時勝利變為最後勝利，所以首先就去採取一切已被搖動的專制政府所試驗過的方法，一一去獲得在對外政策上的勝利。”

現在俄國底一切聯盟都是：

“西歐資產階級與俄國反革命締結神聖聯盟，與摧殘俄國及波蘭爭自由的戰士的那些絞手及劊子手締結神聖聯盟；這些聯盟就是等於鞏固最殘忍的反動勢力、不但是俄國以內的而且是國際方面的反動勢力。因此，全世界社會主義者和無產者底最初步的任務，就是竭力阻礙與反革命的俄國締結聯盟”。

盧森堡向壽勒斯說道：

“你不是曾經在法國議會內大演其說，反對借款給俄國嗎(189)?你在數星期以前不是在你們的“Humanite”報上*熱烈地喚起輿論來反對俄屬波蘭軍事法庭底殘殺嗎(190)?你為什麼又用“極熱烈的辭句”想把摧殘俄國革命及波蘭暴動的劊子手政府變成歐洲政治上有勢力的因素，把俄國的絞架變為國際和平底棟梁呢?不久以前，法國社會黨底議會黨團及社會黨總委員會底管理委員會反對華利埃爾到俄國去(191)，在這個抗議書上還用熱烈的辭句擁護俄國革命底利益，而你又是署名發表這個抗議書的人；現在你却提出一種基於法俄聯盟及英俄聯盟的和平計劃，

* 即人道報，人道報過去是法國統一社會黨底中央機關報，現在是法國共產黨底中央機關報。——(編者)

試問這個計劃，與那個抗議書是否符合？如果法蘭西共和國大總統想援引你關於國際狀況的意見，那末，他對你的抗議可以這樣回答：誰要是贊成目的，他就應贊成手段；誰要是認為與沙俄聯盟是國際和平底協調，他就應採取一切可以鞏固這個聯盟及達到親善的辦法。

如果曾經有個時候，在德、俄、英各國，有過這樣的社會黨人或革命家，他們為“和平起見”而主張與復辟政府或華梯爾政府及華佛爾政府（192）聯盟，並用自己精神上的威權來掩飾這種聯盟：如果有過這樣的事實，你又將如何判斷呢？！……”

這封信已經說得淋漓盡致，而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只能歡迎盧森堡同志底這個抗議，歡迎她在國際無產階級面前擁護俄國革命。

6 德國工人運動中所不應

仿效的地方 (193)

不久以前，德國最著名最負責的一個工會代表李謹出版了一本很厚的關於遊歷美國的報告書，叫做美國工人運動見聞錄。

李謹不但是德國最出風頭的代表，而且是國際職工運動中的名人，他這次的遊歷，可以說負有所謂國家要人的使命。關於這次遊歷，他與美國各社會黨，與“美國勞動聯盟”(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194)——著名的(遺臭萬年的)韓伯斯所領導的工會聯合會，接洽了幾年。後來聽說卡爾·李卜克內西也正要到美國去，李謹便不願意與他同時出發，“免得在美國有兩個演說者同時說話，而這兩個演說者對於黨底策略及工人運動各部門底意義及價值，意見是不完全相符合的。”

李謹關於美國職工運動的材料收集得很多，可是他完全不會把牠們整理起來。他這本書大部份都是些遊記，按其內容是小品文字，而就其枯燥的敘述而論，還够不上小品文字。連李謹所特別注意的美國工會章程也沒有加以研究，沒有加以整理，而只是翻譯一下，散亂而不週全地翻譯一下。

在李謹遊歷中，有一段歷史非常值得注意，牠很明顯地揭露出全世界的、尤其是德國的工人運動中的兩種傾向。

李謹曾經參觀了美國議院，即所謂“代表大會”(195)。共和國

底民主制度使得在警察制的普魯士國家中教育出的人發生愉快的感覺；他很滿意地（這是不言而喻的）指出，美國政府不僅給每個議員以一間特別的具備一切新式陳設的辦公室，而且還給他一個領薪水的書記來執行議員的許多工作。議員和議長態度之簡單隨便和客氣，與李謹在其他歐洲各國議會中，特別是德國議會中所看到的大不相同。在歐洲，社會民主黨人簡直就不能想到在資產階級議會底正式會議上去致祝辭！可是在美國，這種事情却極其平常，而社會民主黨人底名稱，誰也不會聽了害怕……，除非是這個社會民主黨人自己！

這裏也就是表示出：美國資產階級慣於“軟化”不堅定的社會黨人，德國機會主義者慣於順從“軟和的”親愛的民主資產階級而拋棄社會主義。

李謹底祝辭譯成了英文（民主派在自己的議會內絕不害怕“外國”話）。兩百多個議員，依次同李謹握手為禮把他當作“國賓”；議長特別向他致謝。

李謹寫道：

“我的祝辭底形式與內容都在美國及德國社會黨刊物上得到同情。可是，德國有幾個編輯却不能不指出，說我的演說又重新證明：在資產階級會場上講社會民主黨的話，這對於社會民主黨人是何等不可實現的任務。這幾個編輯如果代替我去講話，大概會作反對資本主義和主張羣衆罷工的演說；而我當時所認為重要的却是要在這個國會面前特別申明，德國社會民主黨工人及加入工會的希望各國人民之間的和平，並希望經過這種和平而把文化繼續發展到最高度。”

可憐的“幾個編輯”呵，我們的李謹一篇“國家要人”底演說辭怎

樣把他們消滅了！在德國工人運動中，一般職工運動的首領，尤其是李謹，他們的機會主義，早已有目共見，許多有覺悟的工人也正確地估計着牠。可是在我們俄國，關於歐洲社會主義底“模範”談得太多，而所選擇的恰恰就是壞的、恰恰是“模範”底不好的方面，所以對於李謹底演說不妨稍微詳細地講一講。

兩百萬德國工會會員底首領，而且是社會民主黨工會底首領，社會民主黨國會黨團底團員，他在美國資產階級代表底最高會議上作了一次純粹自由資產階級的演說。當然，就是自由派，就是十月黨人也沒有一個不贊成“和平”和“文化”這些字眼的。

當德國社會主義者指出這不是社會民主黨人的演說時，我們這位資本僱傭奴隸底“首領”便把社會主義者大加藐視。“編輯們”，這與“求實的政治家”及向工人徵收小錢的人比較一下，真算得什麼！我們這位市僧式的納爾齊斯之瞧不起編輯們，也同某國警察貪官之輕視第三等人一樣。（196）

他們，這些“編輯們”，大概會作了“反對資本主義的”演說。

請想一想吧，這位也是社會主義者所恥笑的是什麼：他所恥笑的就是社會主義者竟能有必需作反對資本主義的演說的念頭。德國機會主義底“國家要人”是絕對沒有這種念頭的：他們說話的方式，是要不觸犯“資本主義”。他們這樣搖尾乞憐地放棄社會主義，已經是污辱了自己，同時又以受辱自誇。

李謹還不算第一個人。他是工會軍隊底代表，或更正確些說，是工會軍隊軍官團底代表。他的演說決不是偶然的，決不是失言，決不是單個的行動，決不是德國一個不開通的、終日坐在辦公室的、在美國和蘭的未染警察跋扈氣味的資本家面前發癡的人底錯誤。如果只是這樣，那末，李謹底演說也就不值得去講了。

可是這明明不是這樣。

在斯都加爾國際代表會議上，德國代表團有一半都是這樣的可憐的社會主義者，他們都舉手贊成關於殖民地問題的極端機會主義的決議案*。

試看德文雜誌社會主義（??）月刊，那裏就經常有像李謹這樣的人物底言論，關於工人運動底一切極重要問題的言論，這些言論都是十足的機會主義，沒有一點社會主義的氣味。

如果德國“正式”黨底“正式”解釋，說“誰也不讀”社會主義月刊，說牠沒有影響等等，那這是不對的。斯都加爾的“事件”證明了這是不正確的。最著名的、負責的人物，國會議員，工會領袖，他們在社會主義月刊上做文章經常不斷地將自己的觀點傳達於羣衆。

德國黨抱有“官場樂觀主義”這在牠自己的營壘內，就已經早被一部分人指出來了：這些人被李謹送上了一個鄙賤的（由資產者看來），光榮的（由社會主義者看來）頭銜：“這幾個編輯”。俄國自由派和取消派（託洛茨基當然也在內）越想企圖把這種可愛的東西搬到俄國來，我們便越要給他們以堅決的抵抗。

“德國社會民主黨”有很大的功勞。牠有由馬克思與一切賀伯、杜林等等（197）作鬥爭所造成的理論；我們的民粹派企圖避開這種理論或加以機會主義的修正，這是徒勞無功的。牠有羣衆的組織，報紙，工會，政治團體，——這樣的羣衆組織性。在我們俄國現時顯然也在形成着，如馬克思主義者真理報**在國會選舉上，在日報發行上，在保險局選舉上，在工會內，到處都獲得勝利。我們的這般被工人“撤職

* 請參看本卷國際社會黨人底斯都加爾大會這篇文章。——（編者）

**即是指布爾塞維克——（編者）

的”取消派，總想迴避這一個關於適應俄國環境的羣衆組織性的問題，這與民粹派底企圖，同樣是徒勞無功，同樣是智識份子之脫離工人運動。

可是德國工會民主黨底功勞，並不是由於李謹底演說以及社會主義月刊同事底“演說”（在刊物上）而來的，並不是由於這些丟臉的演說而來的，而是違反着他們的意志而來的。對於德國黨在這種現象上所表現的這種無可懷疑的病態，我們不應拿些“官場樂觀主義的”空話來含混，來抹煞，而要在俄國工人面前發露出來，使得我們能够根據發展較早的運動底經驗來學習，藉以知道那些東西不應仿倣。

1914年4月

註 釋

(1) 走上軌道——這篇文章登在1909年2月10號黨底中央機關報社會民主黨第二期上。這是列甯在1909年1月“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巴黎代表會議剛完以後寫成的。這次會議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底生活上有極大的意義，因為黨在這次會議上，對於反革命勝利以後的政治狀況，對於政府及各統治階級（與各政黨）底政策，對於黨工作底目前任務，局部地對於黨底國會工作之意義等問題，確定了自己的觀點。參加這次會議的代表成份如下：六個布爾塞維克（其中有兩個是召回派），四個孟塞維克，三個猶太工人同盟派和五個波蘭社會民主黨代表。布爾塞維克因為得到波蘭同志底援助，在一切極重要的問題上都佔了多數，而且在一切問題上，代表會議大體上都通過了布爾塞維克所提出的決議案（參看列甯全集第14卷第444至451頁）列甯在走上軌道這篇文章內說明這次會議底決議案並給這次決議案以一個理論的基礎。這次會議底基本決議案論目前時局與黨底任務是列甯擬定的；牠的草案（全文載在本卷內）完全由會議所通過了，只有一些局部的修改。該草案底基本意思是說，戰勝1905年至1907年革命的專制制度“正在發展而轉變為資產階級的君主政體”，向着這個轉變作新的步驟，可是這個步驟作得這樣：即替農奴地主“保留着他們的政權與收入”。這一個對於1905至1907年革命以

後專制制度底階級性的估計，列甯在當時，而且後來在1908到1914年整個時期內，都認為牠對於決定無產階級政黨底策略，有決斷的意義。列甯認為不接受這種估計，便是墮落到孟塞維克的取消主義，或是墮落到召回派底立場上。因此，列甯在反動時期進行這兩條戰線上的鬥爭時，正是經常從這種對專制制度階級性的估計出發，而打擊孟塞維克取消派及召回派對牠的估計。這一點讀者在以下的反對兩方面的文章內，可以看得出來：（1）論政權底社會構造、論前途和取消主義，（2）政論家底時評一文第一章：論召回主義底贊成者和擁護者之綱領。讀者把這兩篇文章，走上軌道這篇論文與論目前時局與黨底任務決議草案對照一下，就會知道，對專制制度階級性估計上的不同怎樣弄到布爾塞維克派底。孟塞維克取消派及召回派底政治路線上的差別。大會接受列甯對專制制度的估計，及由此所產生的一切政治結論，這樣也就是打擊了取消主義及召回主義。大會所通過的關於社會民主黨的國會黨團的決議及關於組織問題的決議，都是同樣給這兩派以打擊，關於這些決議也同論目前時局的決議一樣，列甯在這篇走上軌道的文章內正是根據這個觀點說明過了。

考察列甯與布爾塞維克在1908年12月代表會議上以及代表會議以後所作的“兩條戰線上”的鬥爭時，應該把這個鬥爭看作布爾塞維克與“工人運動內部的敵人”經常鬥爭底階段之一；正如列甯所說的一樣，“布爾塞維主義就是在這種鬥爭中長成、鞏固與鍛鍊出來了的”，這鬥爭一方面反對右邊的小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另一方面反對“左邊的”也是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孟塞維克的取消主義和牠之反對無產階級秘密的革命黨，主張自由主義的改良的公開“工”黨，這只是1905年至1907年革命中孟塞維主義的機會主義路線，在反動時期及新高潮時期底新條件下的直接繼續和發展。如果在1905至1907

年，孟塞維主義底一般政治路線是與自由資產階級合作並使革命的工人運動服從牠；那末，在取消主義中，這條路線所帶的性質是：使工人運動服從那個已經和沙皇政府勾結的自由資產階級底利益並用貪求小利的、自由主義的改良主義的方法來修補1905至1907年革命失敗以後所建立的統制。召回主義無非是“瘋狂的小資產者”底革命性，他們不能了解階級力量對比上和階級鬥爭條件上有了變化，不能隨着這種變化而改變策略。這種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不去估計鬥爭底條件而去作響亮的革命空談，這種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是召回主義最主要的特點。1905到1907年的革命遭了失敗，專制制度又向資產階級的君主制度方面走了幾步，國內發生階級變動（其表現，就是地主的專制制度與資產階級——自由資產階級也在內——的勾結、聯合及妥協）；這種情形，使戰敗的革命軍隊有退却之必要。布爾塞維克作這種退却，是要保存並準備新的革命進攻底可能性。孟塞維克的退却則不是這樣，而是退到自由派的改良主義底泥坑中去。召回派不作這樣的退却，可是他們也不作布爾塞維克的退却。他們不懂得已經改變了的鬥爭條件，也不懂得這些改變底意義，否認爲準備新的革命進攻起見有退却之必要，不肯爲這些目的而利用合法的機關與組織。這麼一來，他們實際上也同孟塞維克一樣，阻礙新的進攻底準備，他們實際上也是同樣的取消派，不過只是“從左來的”取消派，“換一個面的”取消派。這一個“左的”召回主義的危險，其所以需要與之鬥爭，更因為牠曾經隱藏在布爾塞維克本身的隊伍內；只有消滅了牠，布爾塞維克才能完全放開手足來和右的危險——孟塞維克的取消主義——作鬥爭。列甯在1920年，在共產主義中之左派幼稚病這本小冊子上（參看中文版列甯選集第16卷，該小冊子第三篇），曾用下面一段話來表明在反動時期和召回主義所作的鬥爭底全部重要性：“一

切戰敗的在野黨及革命黨中間，布爾塞維克黨退却得最有秩序，退却時牠的“軍隊”所受的損失最少，牠的核心保持得最多，分裂發生得最少（就其深刻性及不可醫治性而論），渙散現象發生得最少，最有恢復工作的能力，最能廣泛地、正確地、努力地恢復工作。布爾塞維克黨之所以能够做到這點，只是因為牠無情地揭破了並驅逐了空談的革命家，這些空談的革命家會不願了解：需要退却，需要善於退却，一定要學會在最反動的議會、最反動的工會、合作社、保險所以及諸如此類的組織裏面公開地進行工作。”

（2）列甯這裏指孟塞維克在大會上所提出來的修正案。在決議案內講到農奴制的專制制度向着轉變為資產階級的君主制度的道路又進了一步時，他們便提議把“資產階級”字樣改為“富豪統治”字樣。富豪統治這個名詞一般地就是富人統治；可是牠沒有確實指明，這些富人究竟是誰，是地主還是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大會當然否決了這個修正案，因為專制制度老早就是富豪統治（富人統治）的了，牠用不着走上這條道路，同時又因為須要對這個歷史時期內的專制制度作一明確的階級估計，而不用“富豪統治”這種不肯定的字眼來模糊牠。

（3）在德國施行非常法的時候，“德國社會民主黨”處於秘密狀況，極力想把黨底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聯繫起來。黨在國外（瑞士）組織了社會民主黨人報，秘密運入德國。為着這個目的，並為要散發其他的秘密刊物起見，該黨創辦了特別的秘密機關，名叫“赤色郵局”。黨經常在國外召集代表大會，並在國內召集個別區域的黨的秘密的代表會議。“德國社會民主黨”同時還盡力保持並鞏固黨的公開工作底支點。這些支點就是：議會，社會民主黨議員在議會壇上揭破政府，給工人羣衆指出了鬥爭底道路，工人團體（自修的、體育的

等等)，黨員在裏面進行了社會主義的工作；職工會，黨在那裏會有公開訓練羣衆與資產階級作鬥爭的機會；以及其他的組織。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底這種配合，會使黨能夠不顧政府底壓迫而加強自己在羣衆中的影響，結果還是迫着政府把非常法取消了。

(4) 爲什麼1905到1907年革命後沙皇專制制度底政策，可以估計爲“資產階級拿破崙主義的”政策，即是與1789到1793年革命後法國拿破崙第一底帝制政策及1849年革命後拿破崙第三底帝制政策同屬一類，——這個問題，列甯在對目前時局的估計（參看列甯全集第12卷第375到385頁）這篇文章內詳細加以解釋了；這篇文章是在1908年12月間黨的代表會議之前寫成的，正是要給論目前時局與黨底任務的決議草案以一個理論上的基礎。這兩個拿破崙帝制都已經沒有舊式封建的地主的支柱而不得不實行資產階級的政策，變成資產階級的君主制度。在沙皇專制制度之下，舊式半農奴制的地主的支柱也被動搖了。沙皇專制制度依舊還是地主的（這也就是牠與兩個拿破崙帝制所不同的地方），可是牠也不得不實行資產階級的政策和依靠資產階級，以使用這個支柱來拯救自己和自己的主人——地主。兩個拿破崙帝制都極力想依靠農民，各用自己的方式來向農村“吊膀子”。沙皇專制制度也會在農民中找支柱而向農村上層份子——富農——吊膀子。牠在農村中也用自己的方式，用地主的方式來實行資產階級的政策，其方法就是：用自己新的、斯託雷平的立法來破壞村社，排擠並鞏固鄉村富農階層（參看本卷內土地問題與俄國現狀一文及論現政府底（一般的）土地政策一文）。沙皇制度底這個土地政策，列甯稱之爲土地問題上的“拿破崙主義”。列甯在對目前時局的估計一文內（見列甯全集第12卷377頁）寫道：“如果俄國村社本身不是有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如果村社內部不是經常形成了一些

份子，使沙皇政府可以與他們吊膀子，向他們說：‘你們去發財’，‘你們去搶劫村社，可是要擁護我’，那末，爲黑幫派的地主與十月黨的資產階級所完全自覺和堅決地贊助的那種斯託雷平土地政策上的拿破崙主義，連產生都不可能，更莫說能支持了兩年之久。”這樣看來，1905至1907年革命後的沙皇專制制度底拿破崙式的土地政策，爲鞏固地主統治起見，利用了俄國資本主義發展影響農村的結果之一，即農村分化，即農村資產階級（富農）之出現。

（5）第三國會中的農民代表，“甚至於爲許多警察法律所限制的農民代表，非黨的和一部份是右派的農民代表，在國會內提出了土地法案草案（四十二人底草案），主張強迫讓渡土地，由全體人民選出地方土地機關。列甯說道：黑幫派的國會是根據貴族統一委員會所規定的那種有利於地主們的選舉法而選舉的，是在白色恐怖底反動勢力最猖獗的時候選舉的，——在這樣的國會中，四十二個農民正式提出這樣的草案，這比任何議論都更好地證明：在現代的俄國，農民羣衆是革命的（參看列甯全集第12卷409頁第三國會中關於土地問題的討論一文）。

（6）1906年8月25號頒佈法令，將一部份皇室土地轉交“農民銀行”，由銀行轉賣給農民；9月9號又有指令，將一部份官地轉交“農民銀行”，由銀行轉賣給農民所牽制。11月22號又頒佈法律，反對個別農民爲村社。牠准許農民自由退出村社，把份地定爲私產，有權自由支配自己的份地。11月28號頒佈指令，付託所謂“農民銀行”以轉變爲私產的份地作抵押而貸款給農民。所有這些法律和指令，其政治目的就是要在農村中造出一批強大的土地私有主，使這些人願意爲保護自己私產而反對革命，因而成爲地主專制制度底支柱。

（7）這裏所指的，是1906年的波斯革命，1908年的土耳其革命。

及中國、印度民族解放運動之興起（參看本卷註釋（158）、（162）、（165）及（167）。）

（8）這裏是指縮小下列的口號：建立民主共和國、實行八小時工作制、沒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布爾塞維克底主要鼓動工作都是圍繞着這三大口號而進行的。孟塞維克取消派，背叛革命，以純粹改良主義的口號來代替了這些革命口號。他們把不要推翻沙皇制度的那種結社自由、言論自由等等要求，代替了建立共和國及消滅帝制的口號，即是說，他們已經站在自由派的觀點上了。關於縮小革命口號的問題，列甯在幾個爭論問題這篇文章內講得更詳細（參看本卷126到149頁）。

（9）倫敦國際大會（1896年）在其關於工人階級經濟政策的決議案內指出，無產階級當以奪取政權，爭取社會底社會主義改造為自己的基本任務，同時應當爭取（在沒有奪到政權以前）自己地位之立法上的改善：爭取八小時工作制，勞動保護及集會結社自由。大會認為除了工人階級底政治組織之外，職工會組織也是非常需要的，工會底義務就是要把會員訓練成為深信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者。

大會指出，罷工與抵制是實現職工運動任務的必要手段。

斯都加爾國際大會（1907年）在其關於黨與工會相互關係問題的決議案內指出，工人階級底政治鬥爭與經濟鬥爭，對於無產階級底完全解放是同等需要的。大會在其決議案內指出：“因此，在無產階級解放鬥爭中黨與工會都實行着價值相同的革命任務。”“黨與工會必須在自己的活動中精神上彼此協助。……”“只有當工會底活動以社會主義前提作出發的時候，工會才能履行自己在無產階級解放鬥爭中的義務。”

（10）當俄國社會民主黨倫敦代表大會（1907年）舉行時，布

爾塞維克底政派會議曾經決定，布爾塞維克派底領導機關應當是布爾塞維克中央，牠由布爾塞維克的中央委員及候補委員與布爾塞維克報無產者底編輯部組織而成。1909年6月21號到30號召集了布爾塞維克中央底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有一些大的黨部（彼得格勒、莫斯科、烏拉爾）底代表和布爾塞維克派國會議員底代表以及其他的同志。這次會議即是有名的所謂“無產者擴大編輯部會議”，牠在反動時期爭取黨內列甯主義路線的鬥爭上，起了莫大的作用。在這次會議所通過的許多決議案中（這些決議案是由列甯校正的，而且一部份是由列甯起草的），這裏只選載了兩個。其中第一個決議，只看題目就知道是反對召回派及哀的美敦派的。

在1908年12月全黨代表會議時，黨就已經依列甯底提議而指出，利用國會講壇來作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宣傳與鼓動，這是重要的；這樣也就是指出了，會堅持要退出國會的召回派和哀的美敦派是犯了最大的政治錯誤。召回派在大會上並沒有堅持自己的錯誤，甚至舉手贊成列甯所提出的關於目前時局及黨底任務的決議案。雖然他們所提出的修正案是被否決了。然而在大會以後，他們不但沒有放棄自己的錯誤，反而繼續加深錯誤。召回派說社會民主黨的國會黨團底成份不能令人滿意，說牠犯了錯誤，說在黑幫的第三屆國會中工作困難，所以堅決地認為唯一的出路祇有把國會黨團召回來，他們竭力鼓動要召回黨團，企圖拉攏許多地方黨部。召回派雖然只是公開地反對參加國會，可是實際上却反對利用差不多一切的公開的可能性——職工會、合作社、文化教育團體等等。召回派既然不肯在公開的無產階級團體內進行工作，不肯利用牠們來作社會民主黨的宣傳與鼓動，因此也就是牠自己脫離了工人羣衆。

哀的美敦派與召回派不同的地方，就是前者提議不要立刻召回

國會黨團，而主張起初給牠一個哀的美教書，要求牠無條件地服從黨的紀律，參加國會以外的黨的工作，堅決澈底地執行黨的路線。在哀的美教派看來，提出這封哀的美教書無非祇是造成一種藉口來召回國會黨團。他們只是害羞地用哀的美教式的要求來掩飾自己的召回主義。因此列甯就把哀的美教派稱為“害羞的召回派”。

召回派與哀的美教派堅持自己的政治錯誤，他們的宣傳大有害處，因此無產者擴大編輯部會議不得不提出關於這個派別的問題，而給以嚴厲的斥責。可是召回派和哀的美教派還不光是堅持政治錯誤。到編輯部會議召集的時候，他們還留在布爾塞維克底隊伍內，可是他們却已開始形成特別的政派。這一點底表現局部地就在於，他們在卡普里島（意大利）組織自己政派的“黨校”。不僅如此，他們日益脫離布爾塞維主義底政治立場，同時也日益離開馬克思主義底理論基礎而走向唯心論——一直走到所謂“造神主義”，走到特殊的“社會主義的”宗教；他們的代表盧那查斯基同志及高爾基同志就曾經想把科學的社會主義變為這樣的宗教。在這種條件之下，堅決斥責召回主義哀的美教主義及其帶有無政府主義及“造神主義”觀點的首領，這個問題，便特別緊張起來了。因此，無產者擴大編輯部會議，首先是在與召回主義及哀的美教主義這種顯然反黨的思潮完全決裂的旗幟之下進行的。這次會議論召回主義和哀的美教主義的決議案（大體上是由列甯起草的）也就有這種特點。此外，會議通過了關於社會民主黨人中間造神主義傾向的特別決議案。“無產者擴大編輯部”在這決議案內聲明，牠“認為這一個在盧那查斯基同志底文章內宣傳得特別明顯的思潮，是脫離了馬克思主義底基礎，牠決不是光在名詞上，而且在其主張底實質上給革命社會民主黨教育工人羣衆的工作以一種害處，布爾塞維克與這種對於科學社會主義的曲解毫無相同之點。”會

議責成無產者編輯部與這種傾向作堅決的鬥爭，揭破牠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性質。召回派及哀的美教派思想上的主謀者波格唐諾夫（馬克西謨夫），企圖袒護盧那查斯基同志底“造神主義”；會議對於這種企圖也會加以斥責。會議結果，通過了一個決議，說波格唐諾夫（馬克西謨夫）脫離布爾塞維克，並指出無產者編輯部“對他的一切政治步驟不負任何責任。”

會議是在與召回主義及哀的美教主義完全決裂的旗幟之下進行的，同時却仍舊忠心於“兩條戰線上”的鬥爭；在決議案內，用反對召回主義的堅決態度來反對孟塞維克的取消主義，認為牠也是反黨的，也是脫離了馬克思主義底理論基礎及黨綱底基礎。會議上第二個決議案（布爾塞維克在黨內的任務），完全是反對這個當時已經完全形成的取消主義，認為牠不僅是反對秘密黨底存在，而且是反對整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

會議上除了論召回主義和哀的美教主義以及布爾塞維克在黨內的任務這兩個決議案之外，同時還通過了一個有重大歷史意義及普通原則意義的決議案：關於黨的其他各項工作與國會活動的關係。這個決議案指出，革命社會民主主義之利用代議制和機會主義之利用代議制比較，其差別應當在什麼地方。該決議案預告大家不要“把代議制看作什麼主要的、基本的、以本身為目的的一種東西”，該決議案“把無產階級政黨底國會黨團（這裏是指俄國國會黨團）看作社會主義工人運動中的一個附屬機關，看作實行全黨政策的黨的組織之一。”該決議案根據這一點而說道：“……必須把極有原則性的階級立場放在第一位……必須主張利用國會講壇來宣傳社會主義，必須堅持革命民主的目的利用革命方法來完成仍舊放在俄國面前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必須堅持擁護革命底各種傳統及口號，不要

加以任何的縮減，要反對反革命的、局部地是資產階級自由派的思潮……。必須反對（在孟塞維克中間、尤其在取消派中間）正在表現的改良主義，用革命社會民主黨對於改良的觀點來和資產階級的社會改良主義、和崇拜每次假“改良”（立憲民主黨人和十月黨人同盟在國會中所實行的改良）的奴隸行動相對立，革命社會民主黨底觀點就是：爭取改良的鼓動；應當利用來宣傳社會主義和革命，應當利用來團結和訓練無產階級，而專制政府實行改良的企圖，則應當利用來在工人運動中成立新的支柱和加強無產階級對資本及帝制的打擊。”

這裏不難看到，無產者擴大編輯部會議底這些指示，向全黨和工人們解釋，用革命方法利用國會是非常重要的；這樣一來，這些指示又是打擊了召回主義和哀的美教主義以及取消主義。

（11）這裏是指彼得堡所發生的事情：社會民主黨國會黨團向彼得堡各團體要求給牠一些材料，以便提出關於壓迫工會的質問，當時黨團底反對者（召回派）協同社會革命黨人通過決議，拒絕與黨團發生任何來往。

這不光是破壞黨內基本的紀律，而且對於黨底一項重要工作表示公開的怠工。無產者當時就斥責召回派底這種反黨的行為，認為牠是“新式的取消主義”。

（12）社會民主黨國會黨團會利用一些所謂“顧問”來幫助黨團審定各種材料、草案、質問等等。因為黨團內孟塞維克佔優勢，所以許多取消派（如波特列索夫等），甚至於顯然是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普洛科波維赤之類）都起來當顧問。這類“顧問”推動黨團來作極嚴重的機會主義的錯誤，而有時推動牠去公開破壞黨的訓令。

（13）從1908到1910年之間舉行過以下各種代表大會：

各人民大學工作人員代表大會（1908年1月16日到19日在彼得堡舉行的）；

第一次合作社代表大會（1908年4月29到5月5日在莫斯科舉行的，因警察干涉，未能結束其工作）；

第一次全國婦女代表大會（1908年12月23到29日在彼得堡舉行的）；

第一次全國工廠醫生及工廠工業代表大會（1909年4月14到19日在莫斯科舉行的，因警察干涉，未能結束工作）；

第一次全國禁酒運動代表大會（1910年1月10日到19日在彼得堡舉行的）。

在以上這些代表大會上也有工人代表參加，這些工人代表組織了工人團。關於參加這些大會的問題，社會民主黨內起了很劇烈的鬥爭：一方面是召回派，他們不懂得“合法可能性”底意義，認為社會民主黨不應參加這些大會，因為這些大會的目的是要“引誘工人”走上改良政策底道路。例如莫斯科的召回派與哀的美教派就認為參加工廠醫生代表大會是“叛變無產階級底事業”。另一方面，孟塞維克則極力想本着純粹機會主義的精神來利用這些代表大會，總想要工人說話時聲音軟和些，不要拿“過激的”口號去嚇倒這些大會，誘勸工人，說應當說服自由派，使之相信所提議的改良是妥當的，以及其他等等。布爾塞維克認為在當時的條件之下，利用這些代表大會，這不但正當的而且是必須的。“不過應當記着，社會民主黨人走到這些大會上去，是為的要利用這個可能性（縱使是很小的可能性）來在工人中間作社會民主黨的鼓動。”布爾塞維克認為社會民主黨人對於這些代表大會底材料，應當盡各種可能的方法來利用：“我們應當在報紙上，傳單上及工廠內的機器旁邊向工人敘述，工人怎樣在那裏揭開

了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底假面具，他們怎樣攻擊了現有制產。”布爾塞維克在黨底中央機關報社會民主黨人上就是這樣說的。布爾塞維克認為這些代表大會同時還有一種意義，就是牠們是一種不可多得的機會，“使俄國各地無產階級運動底工作人員，可互相傳達消息，彼此直接商確迫切問題，使俄國各工人團體實行事實上的接近並在思想上統一起來。”（無產者）

關於工廠醫生代表大會問題，中央曾指出，布爾塞維克之所以應當參加這些代表大會，還因為：“如果讓取消派在那裏得到自由的活動地盤，而布爾塞維克不在那裏當着工人面前和他們鬥爭，——那就是真正犯了大罪……。”

（14）這裏是指下面幾件事情：

一、中央關於職工會的決議，是由布爾塞維克向中央提出而一致通過的。該決議指出，社會民主黨人在職工運動中的工作，應當本着俄國社會民主黨倫敦代表大會及斯都加爾世界代表大會（參看本卷註釋（一））底精神而進行，應當根據職工會和社會主義黨日益接近的方向而進行。該決議首先提出了一個任務，要在工廠裏面成立團結一致的組織上的支部，這些支部將是最下級的工會組織。社會民主黨人應當在這些支部裏面，組織各種在地方黨部領導下工作的小組。在公開的工會組織已被警察摧殘的地方，該決議主張成立秘密工會。末了，中央還特別指出，工會公開的存在，不應當減低無產階級工會組織底戰鬥任務。

二、中央關於合作社的決議，也是由布爾塞維克提出而一致通過的。該決議指出，各級黨部必須特別注意合作社運動，並責成各黨員參加合作社並助長合作社之發展。該決議特別指出有吸收消費合作社和職工會及社會民主黨一致行動之必要，但同時却附帶地聲明，合

作社不能代替戰鬥的無產階級組織。該決議要求實行最堅決的鬥爭，來反對以合作社範圍限止無產階級組織上的活動的這一種企圖。該決議也向社會民主黨人提議，在合作社組織內部，也像在職工會內一樣，組織各種和地方黨部發生密切關係的小組。

三、關於國會黨團問題，中央通過了許多布爾塞維主義性質的決議案；在這些決議案中，特別指出國會工作底重要，指出全黨必須幫助黨團，加強和黨團的聯繫，其方法就是供給黨團以各種材料，動員工人羣衆在工人生活個別問題上環繞於國會黨團的周圍，以及其他等等。同時，中央在這些決議案中，還指出黨團所犯的許多具體的錯誤及離開黨底政治路線的情形。

四、1909年1月舉行的全俄代表會議，通過布爾塞維主義的決議，尤其是通過載於本卷的由列寧提出的那個論目前時局和黨底任務的決議草案，這是證明在這次代表會議上，絕大多數會擁護黨底路線。

五、所謂辦理黨中央機關報的經驗，是指辦理社會民主黨人報的經驗，社會民主黨人報雖然在那個時候還不是布爾塞維克派底機關報（當時布爾塞維克派底機關報是無產者），參加該報編輯部的，除布爾塞維克外，還有孟塞維克，但按其方向是布爾塞維克主義的。

六、該決議案中以及上一註釋（註釋（13））中所講到的工人團，大部份是在布爾塞維克領導之下參加大會的。

（15）從1908年底起，孟塞維克內部就已開始發現了取消派與未來的孟塞維克護黨派（普列漢諾夫派）即與贊成保其並鞏固秘密黨的人之間的意見分歧。在1909年，這些意見分歧已經正式形成而得到了組織上的鞏固：普列漢諾夫，前此曾是孟塞維克中央機關報社會民主黨人呼聲編輯部底編輯，在組織上脫離了取消主義，先申明

退出取消派刊物俄國社會運動底編輯部，然後又聲明退出社會民主黨人呼聲底編輯部，因為該報——如本決議案所指出的一樣——“完全”做了取消派底“俘虜”，而且事實上是取消主義底思想上的中心。從1909年8月起，普列漢諾夫恢復本人創辦的報紙社會民主黨人日記（他在1905—1906年出版過這個報紙）。普列漢諾夫在社會民主黨人日記上反對取消主義，主張保持、鞏固及擴充現有的秘密黨，擁護“不帶取消主義性質的孟塞維主義”，並着重指出，如果取消主義在孟塞維主義中得到勝利，則取消主義使孟塞維主義成爲“和社會民主黨敵對的東西”。

普列漢諾夫指出，布爾塞維克在和召回派及哀的美敦派決裂以後會加強了自己的力量，並根據這個例子號召孟塞維克也和取消派分清界線。

列甯說到社會民主黨人呼聲底編輯部內部發生破裂，就是指普列漢諾夫退出該編輯部而言。大概就在這個時候，有些地方組織的孟塞維克之間也發生了意見分歧：在彼得堡、維包格區的一部分孟塞維克，發表抗議書反對放棄一切革命工作的那些取消派底機會主義，主張統一在秘密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隊伍以內；在莫斯科，莫斯科河南岸區及立彌托夫區的孟塞維克，發表激烈的抗議書反對取消主義，結果，取消派就拒絕繼續和組織內工作的孟塞維克共同活動。“猶太工人同盟”內部也發生了分化：在1908年“12月”代表會議上，猶太工人同盟派自己就已經聲明在‘猶太工人同盟’內存在兩個派別——護黨派和取消派。在俄國日常共同進行實際工作的過程中，護黨派的孟塞維克日益接近布爾塞維主義。1912年，布爾塞維克在布拉加代表會議上（參看註釋（90））組織上正式和取消派完全破裂，當時在俄國自命爲孟塞維克護黨派的一大部分實際工作者，贊助布爾塞維

克，而不是贊助孟塞維克。

(16) 這個決議草案是1909年末列甯在黨底中央機關報（社會民主黨人）底編輯部會議上提出來的。這裏所謂“某些有力的和在實際工作運動中有影響的政派接近起來”，就是指布爾塞維克與護黨的孟塞維克接近起來（參看上一個註釋）。這個決議草案中的基本之點，就是列甯指出了：這種接近底目的正是要在兩條戰線上作“堅決鬥爭”，並在這個鬥爭中把主要打擊用來反對“右邊來的”取消主義，因為在1909年6月間無產者擴大編輯部會議堅決打擊了“左邊來的”取消主義以後，“左邊來的取消主義”已經可說是大體上“被擊破了”。這個決議草案沒有為編輯部底大多數所通過。

(17) 布爾塞維克在1909年6月無產者擴大編輯部會議上與召回派及哀的美敦派完全破裂。同年12月便形成“前進派”這一個新政派，或稱為“前進”社（他們就是這樣稱呼自己的）。他們當時就發表了自己的綱領（參看列甯全集第14卷第452至469頁）；列甯在這篇文章內就是分析這個綱領。在這綱領上署名的有高爾基，波克洛夫斯基，盧那查斯基，波格唐諾夫，瓦爾斯基，喀多夫，亞歷新斯基等等。該綱領底特點，就是他把一切被布爾塞維克所“得罪了”的機會主義份子也拉到自己的庇護之下來。前進派不公開站在召回主義及哀的美敦主義方面，可是實際上却袒護他，認為他是黨內“合乎情理的一種色彩”，而且實質上，如列甯所說的一樣，前進派自己就是站在召回主義底觀點上面。前進派雖不公開站在馬哈主義（唯心論的思潮，波格唐諾夫及盧那查斯基就是宣傳這種思潮的人，參看註釋(19)）方面，可是事實上也袒護他。該社關於造神主義一字不提，也沒有與他分清界線，同時在他的指導者和贊成者中間，又有宣傳造神主義的盧那查斯基及高爾基，這樣也就是庇護了這一個反馬克思

主義的思潮。

前進派把各派之間的劇烈的鬥爭，大部份都歸咎於個別人物（暗指列甯）底“傲慢”及“個人的野心”，扶掖各派鬥爭底原則上的意義，掩護孟塞維克取消派底機會主義（布爾塞維克會反對這種機會主義）。前進派在理論上和實際工作上對各種機會主義都採取這樣的調和態度，結果，使各種各色的份子（召回派，哀的美敦派，馬哈主義者，造神派等等）都因共同仇視布爾塞維主義而團結在這個政派中間，而布爾塞維主義則毫不動搖地與一切機會主義作鬥爭，不論牠是從那方面出發的。

列甯在論召回主義底贊成者和擁護者之綱領一文內，從各方面揭穿這一派及其綱領底實質，首先是揭露出，這一派底革命性以及他們的所謂布爾塞維主義，完全是“滑稽”的。該文載於1910年3月19日黨底中央出版的討論特刊第一期（參看本卷註釋(30)）。

(18)這裏列甯指出，法國資產階級共和國，只從1871年“巴黎公社”以後才穩固地建立起來，雖然1789到1793年第一次資產階級革命就已經產生了共和國。講到德國也是一樣，列甯認為，在德國，資產階級革命雖然發生於1848到1849年，然而資產階級的國家（以德意志皇帝及德意志國會為元首）只是在1871年德意志統一以後，由於1860年革命高漲（謀這統一的資產階級運動及爭普選權的第一次工人運動的高漲）底結果而建立的。

(19)1905年革命以後，許多社會民主黨的作家在刊物上擁護唯心論的馬哈主義哲學，企圖把牠與馬克思、恩格斯底學說聯絡起來。這派人中間有波格唐諾夫，巴沙羅夫及盧那查斯基等等。列甯專門著了唯物論與經驗批評論（載於本選集第18卷內）一書，來反對這些反動的理论，一方面批評馬哈主義，同時又敘述並發揮馬克思

主義底哲學。列甯擁護哲學上的黨性時解釋道，“社會的與政治的反動時期”，即“消化”豐富革命教訓的時期，必然就是這樣一個時期：當時一切有生氣的派別都把基本理論問題（哲學問題也在內）提在一個首要地位。他解釋道，“馬哈主義是唯心論之一種，牠在客觀上是反動勢力底工具，是反動勢力底傳達者。”反動派“只靠棍子和鞭子是不够的”，——牠還想在思想上惡化無產階級運動，用神道的馬哈主義的理論來麻醉牠的意識。列甯一步一步地揭穿，俄國馬哈主義者（前進派的以及孟塞維克的）完全脫離了馬克思主義，尤其是揭露出波格唐諾夫那種冒着“無產階級”招牌的馬哈主義哲學之反黨性；同時列甯還順便地指出，當時亦起而反對波格唐諾夫等人馬哈主義的那位普列漢諾夫，對於波格唐諾夫學說批評得不澈底，並犯了哲學上的錯誤。關於這一點的詳細情形，可參看本選集第18卷內所載的唯心論與經驗批評論底一章及其註釋。

（20）高爾基開始會加入前進社，是該社綱領署名者之一。按他的觀點是個造神主義者，在這問題上與盧那查斯基接近。高爾基不久就在列甯影響之下退出了前進社。

（21）黨內統一的危機——這篇文章登在6月7號討論特刊第一期上（參看本選集註釋（30）），是在1910年中央1月全體會議後幾個月做的。列甯在本文內詳細估計全體會議底決議及這次新的黨的統一企圖底結果。本文底基本內容，是在揭露布爾塞維克與機會主義派及調和派對於黨的統一所持態度間的深刻區別。牠的鋒芒是用以反對託洛茨基中派式的調和態度（託洛茨基以調和態度作掩飾，事實上投降了取消主義）以及反對取消派。列甯認為，統一底唯一可能的基礎，就是要從黨內堅決剷除一切取消派的及從左右兩方擁護取消主義的份子。他在這時候只承認布爾塞維克及護黨派的孟塞維克（當

時與取消主義作鬥爭的普列漢諾夫派)是黨的份子。

在中央全會上，除中派式的調和派(託洛茨基和猶太工人同盟派楊諾夫)外，還有孟塞維克呼聲派(馬爾託夫及其他贊成孟塞維克的社會民主黨人呼聲的人們)及前進派參加。後兩派人都感到自己沒有充分的力量來實行公開的分裂，所以會假仁假義地聲明，說他們服從全會底決定並同意和取消主義作鬥爭。列甯曾同意把呼聲派以及前進派都包括於黨的統一之內，希望實際生活不久就會在事實上表明，這兩派的行動是完全錯誤的，而列甯對於統一的觀點是完全正確的。

從列甯底文章中，讀者可以看到，調和派底壓制會影響到全會底決議。這一點底表現之一，就是全會上也有一些帶着調和主義情緒的布爾塞維克(加米業夫也在內)。

託洛茨基及其他調和派所提出的修正案大大地弄壞了全會底決定。然而這些決定，大體上仍舊還是布爾塞維主義的。全國着重指出必須採取爭取羣衆、準備羣衆作革命鬥爭的策略。全會指出，爲着這些目的，必須將公開的工作形式和秘密的工作形式配合起來，必須鞏固秘密黨(主要地是吸收社會民主黨的工人來鞏固秘密黨)，必須建立有工作能力的中央委員會。全會斥責了兩個基本的反黨思潮——召回主義及取消主義，並根據這種斥責而號召全黨實行統一並消滅政派。布爾塞維克在通過這個決議的時候曾聲明道，布爾塞維克將解散自己的政派和停止出版自己的機關報無產者。全會號召孟塞維克停止出版他們的政派主義的機關報社會民主黨人呼聲。然後，全會通過其他許多實際的決定：在最近期內召集全黨代表會議，選任中央委員來補缺，由兩個布爾塞維克、兩個孟塞維克及一個波蘭社會民主黨人參加中央機關報社會民主黨人編輯部，將託洛茨基在維也納出

版的真理報變成全黨底通俗報，並派加米業夫加入該報編輯部充當中央代表，使“前進社”只成爲一種出版社而存在，並希望其儘快地消滅而不成爲一種獨立的組織，以及其他等等。

全會剛一閉幕之後，布爾塞維克派的中央委員（特別是諾根同志），爲執行全會決定起見，曾向彼得堡的孟塞維克米哈爾、羅曼及玉里（這些人是由社會民主黨人呼聲編輯部提出來的）提議，叫他們中間選出兩人來填補中央委員的缺。米哈爾、羅曼及玉里答覆道，他們不僅認爲全會底決定是有害的，而且還認爲中央本身的存在是有害的，所以他們甚至於不肯出席實行選任手續的中央會議，這樣，孟塞維克底拒絕，就使全黨中央底恢復成爲不可能。同時，孟塞維克呼聲派沒有停止社會民主黨人呼聲底出版，並在中央全會閉幕以後所出版的第一期社會民主黨人呼聲上，就違背着自己的責任（關於和取消主義鬥爭的責任），仍舊擁護取消主義，在馬爾託夫的走上正路這篇文章中把取消派當作黨內享受平權的一部份。以後，社會民主黨人呼聲還是像從前一樣，仍舊是取消主義底思想上的中心。在這樣的條件之下，布爾塞維主義會應當加緊鬥爭來反對牠，這是不言而喻的。同時，布爾塞維主義也不能不加緊鬥爭來反對調和主義，尤其是反對當時的託洛茨基中派主義。斯大林同志在黨的第16次代表大會上對於託洛茨基主義所作的估計，即對於當時的託洛茨基中派主義，也再適當沒有了。斯大林同志說道：“託洛茨基主義底實質便是：事實上的投降行爲是牠的內容，‘左的’辭句及‘革命的’冒險的惡習，是掩蓋並裝飾投降內容的一種形式。”託洛茨基向反動勢力投降，實際上就是陷於取消主義。不過這種取消主義，託洛茨基是用他所慣用的革命辭句及關於黨底一致的呼聲來掩飾的。本想經過真理報編輯部內的中央代表加米業夫而影響託洛茨基派的真理報，但這個企圖

却沒有得到任何結果，所以到1910年夏天的時候，加米業夫就不得不退出了編輯部。託洛茨基和孟塞維克呼聲派一樣，不和取消主義作鬥爭，而和布爾塞維克作了劇烈的鬥爭。暗藏着的取消派——託洛茨基派，“社會民主黨人呼聲社”的取消派，“我們的曙光社”的取消派以及前進派，他們正是在共同反對布爾塞維克底列甯路線這個基礎上日益密切地接近起來，而到1912年，他們就（誠然，前進派不在其內）成立了一個反布爾塞維克的所謂八月同盟（參看本卷註釋（109））；這個同盟；同1926到1927年由託洛茨基領導的反黨的“反對派同盟”一樣地沒有原則。另一方面，在這個時期中，一切真正護黨的份子，也在中央全會底綱領上日益接近起來。普列漢諾夫在其社會民主黨人日記上以及中央機關報上，積極反對取消主義，不僅揭露彰明昭著的取消派，而且還揭露呼聲派及調和派。普列漢諾夫當時所採取的那種擁護秘密黨的堅決路線，其意義就在於：牠曾促進在俄國進行工作的孟塞維克護黨派中的優秀份子，和黨實行密切的接近。

（22）1863年拉沙爾在德國組織“全德工人聯合會”牠所根據的綱領，就是他所寫的一封公開的信。這個綱領底實質就在於：第一，要求普選權和以普選權為基礎的“自由國家”，實質上就是資產階級的民主的國家；第二，在這個國家底幫助之下，組織工人生產組合，這些組合還在資本主義時代，就漸漸地代替私人資本主義的企業，歸根到底走向社會主義。“全德工人聯合會”底會員後來就叫做拉沙爾派。

德國資產階級的“進步黨”（自由黨）組織了各種的工人文化團體來與拉沙爾的聯合會對抗。這些個別的文化團體又統一為“德國工人團體聯合會”。資產階級自由派在該聯合會內的影響漸漸衰落，而到1868年，在牛倫堡代表大會上，該聯合會就與自由派完全破裂。

1869年，“德國工人團體聯合會”與“全德工人聯合會”中一部份離開拉沙爾派的會員共同在愛森拿赫代表大會上組織“德國社會民主黨”。因為這次大會是在愛森拿赫舉行的，所以他們叫做“愛森拿赫派”（“愛森拿赫派”底領袖是威廉·李卜克內西及培培爾）。

拉沙爾派與愛森拿赫派有許多原則上及實際上的意見分歧。拉沙爾派輕視工會，愛森拿赫派則認為工會是工人階級必需的組織。拉沙爾派用不調和的態度仇視自由資產階級，可是墮落到了與保守派地主妥協並與俾斯麥底地主政府直接勾結的地步（“全德工人聯合會”底創始人拉沙爾就與俾斯麥底地主政府訂了密約）。愛森拿赫派用不調和的態度對待保守派地主們和俾斯麥政府，但對於自由資產階級却沒有充分明確的政治路線。使愛森拿赫派與拉沙爾派發生分歧而同時又使拉沙爾派與俾斯麥政府結合的一個基本政治問題，就是統一德國的問題。列甯寫道：“德國底統一，在當時各階級力量底對比關係中，可用兩種方法來實行：或者是由無產階級領導的並創立德國共和國的革命來實行；或者是用普魯士底鞏固普魯士地主們在統一德國中的領導權的那些皇朝戰爭來實行。拉沙爾及拉沙爾派，看到無產階級的和民主的道路有很少的可能，於是就實行了動搖的策略，即使自己去適應俾斯麥地主底領導權。他們的錯誤就是犯了使工人政黨走上拿破崙式國家社會主義道路的傾向。培培爾及威廉·李卜克內西則相反，他們自始至終堅持了民主的和無產階級的道路，即與那些對普魯士主義、對俾斯麥主義、對民族主義的任何讓步作鬥爭。”（見列甯全集第16卷第547頁論培培爾一文）在這個基本的政治的意見分歧中就已經表現出：雖然愛森拿赫派底領袖們（培培爾，威廉·李卜克內西等）的確有了一些錯誤和機會主義的動搖（他們會被馬克思及恩格斯所經常批評和糾正），但一般說來，

他們終究是“馬克思主義者底黨”（見列甯全集同卷同頁），而拉沙爾派，則無論在理論方面或在實際行動中都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內修正主義底始祖。

1891年德國底統一，是按着俾斯麥的道路，在普魯士地主君主制底領導之下進行了，在這次統一之後，拉沙爾派與愛森拿赫派間的基本的政治上的意見分歧就失去了實際意義，於是就發生了兩派統一的問題。1875年該兩黨在哥達開代表大會而實行統一。該統一黨就名為“德國社會民主黨”。牠通過了一個妥協的綱領，這個綱領顯然帶有拉沙爾主義底痕跡。馬克思還在哥達代表大會以前，在1875年5月5日的時候，就特別寫信給愛森拿赫派底各領導者（布拉凱，威廉，李卜克內西，培培爾，阿維魯，和海普），嚴厲批評這個綱領。該信曾被威廉、李卜克內西隱瞞起來不給愛森拿赫派知道，不僅不給參加代表大會的愛森拿赫派知道，而且還不給培培爾知道，祇過了16年之後，在1891年，才因恩格斯堅持要求而把該信發表出來，起初發表於該黨底機關報新時代上，後來有單行本出版，名為哥達綱領批評。關於拉沙爾派亦請參看本卷註釋（140）。

（23）前進派底傳單告布爾塞維克同志者是在1910年中央1月全體會議以後發表的。前進派在這傳單內拚命攻擊列甯派的布爾塞維克，責備他們拋棄了布爾塞維克的思想，說他們把政治地位讓給孟塞維克，實際上也變成了孟塞維克的小組。

（24）對於普列漢諾夫日記必要的補充——這是馬丁諾夫，馬爾託夫，阿雪洛德，波特列索夫等等底論文集，是1910年出版的。這個孟塞維克論文集內的一切文章都是反對普列漢諾夫的，普列漢諾夫這時已與取消主義斷絕了關係，而開始鬥爭要來保存和鞏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這本論文集拚命掩蔽和甚至否認取消主義底存在，

而在許多論文內公開發表取消派的思想。

(25) 這一個決議，是在社會民主黨人呼聲周圍的孟塞維克完全表現了取消主義立場以後通過的，可是牠還是這樣說：“吾黨內部狀況在中央全體會議以後，並沒有發生可以阻礙建設黨的工作的實際變化……牠還是與三個月以前全體會議時一樣，當時全體會議會一致通過關於吾黨工作基本問題的策略決議。”如此，託洛茨基派對於取消派之破壞全體會議底原則路線，略而不談，而同時堅持要履行各派所負擔的“道德政治義務”，並堅持要“與某些人、某些團體及機關合作”，即是與取消派呼聲派——馬爾託夫及唐恩等合作來實行已通過的決議，雖然他們對全體會議底決議表示公開的怠工。

(26) 1910年中央1月全體會議以後，被推舉加入中央機關報社會民主黨人編輯部的孟塞維克馬爾託夫及唐恩，馬上就破壞全會底決議：要求登載與全會路線相矛盾的文章，反對登載解釋這些決議的材料，反對在中央機關報上揭破取消派等等，認為黨底中央機關報不應執行黨底政治路線，而應讓那些為黨申斥的反黨份子也可以發表自己的文章。他們的行為顯然帶有陽奉陰違的性質：他們一方面坐在黨底中央機關報編輯部內同時又坐在擁護取消派的社會民主黨人呼聲編輯部內。1911年6月，他們申明退出中央機關報編輯部，“用自己的權柄宣佈中央機關報‘已不存在’，請各同志將材料和書信等不要寄給繼續出版的中央機關報編輯部內剩下的合法的大多數編輯而交給唐恩及馬爾託夫本人。”（列甯）

(27) 猶太工人同盟回聲——是“猶太工人同盟國外委員會”底機關報，1909到1911年出版於日內瓦（瑞士）。該報第4期上（1910年4月）登了楊諾夫底一篇文章政派反對黨，這篇文章是無原則的調和主義底模範。楊諾夫完全不講各派意見分歧底原則根源，而攻擊列

甯與普列漢諾夫，說他們進行‘兩條戰線上的鬥爭’。他關於取消派及擁護他們的社會民主黨呼聲派底機會主義一字不提，而勸各派“在解決實際問題時採取什麼中間的路線”。楊諾夫底文章之所以有意義，是因為他很明顯地揭露出調和主義底實質，完全表現出他的政治上的無原則性及軟弱無力。

(28) 中央全會關於黨內實況的決議第四條說道：

“在社會民主黨運動底各種思想政治任務方面，首先提出了這樣的任務，這些任務絕對要求黨的一致並經過各種困難而造成黨的一致：

一、 在資產階級反革命時代中社會民主黨運動底歷史環境，必然產生資產階級對於無產階級的影響之表現：一方面否認祕密的社會民主黨，降低他的作用及意義，企圖截滅革命社會民主黨綱領上及策略上的各種任務和口號，以及其他等等；另一方面，否認社會民主黨的國會工作及不肯利用合法的可能性，不懂得這兩件事情底重要性，不會使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策略適應目前特殊的歷史條件，以及其他等等；

二、 在這些條件之下，社會民主黨策略上一個不可缺少的因素，就是克服上面兩種傾向，其方法是：在無產階級各方面的階級鬥爭中擴大及加深社會民主黨的工作，解釋這些傾向底危險性；

三、 了解上述兩種傾向底危險性，和克服這些傾向的任務，使“俄國社會民主黨”組織上的統一之恢復，更為必要。這種情形，因為有上舉的各種客觀條件的關係，使政派行動之消滅，使一切比較有組織的政派之消滅，使各政派之變為不破壞黨的行動一致的思潮更為必要。”

列甯這裏所講的就是我們加上着重點的第二段話。託洛茨基的

修正案主張“用擴大及加深”的方法來克服傾向。這個修正案使該第二段話成了非常模糊的東西，甚至如猶太同盟派楊諾夫之流的調和派以及孟塞維克呼聲派，不管決議整個第四項內的總意思如何，也竟利用這一段話來反對“兩條戰線上”的鬥爭。例如社會民主黨人呼聲編輯部，在全會閉幕以後，就馬上發表了牠的告同志書，申明中央全會“故意不提出事先‘分開’及‘兩條戰線上’鬥爭的這個戰鬥口號，而提出相反的口號：在良好的工作基礎上把秘密組織和公開組織事先統一起來。”

(29) 全會關於黨內實況的決議第三條，隨着上條對於工人運動狀況的估計，說道：

“在這樣一種工人運動狀況底基礎上，覺悟的工人運動代表到處表現自己傾向於集中社會民主黨的力量，傾向於鞏固黨的統一。

自由派的及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人民階層間的廣大的反革命思潮，加強着覺悟無產階級底志願：堅持自己的階級的黨，堅持這黨的革命目的及行動方法，團結一切社會民主黨人來反對已經鞏固和在進攻的敵人。

無產階級在國會講台上（經過第三國會中的社會民主黨議員），在公開的代表大會上以及在各種公開的機關裏的公開活動，團結無產階級底力量，加強無產階級想和其餘各階級對立並在組織上影響社會生活的傾向，這樣來堅持革命社會民主黨的目的及革命社會民主黨的運動底階級性。

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日益感覺到必須要把公開的及半公開的機關中的秘密的社會民主黨人集團以及工人的黨支部統一起來，必須要利用一切公開的機關來復興羣衆運動，把這一切機關變成社會民主黨工作底支柱；他們日益想消滅手藝主義，幫助建立能幹事情的真

能領導地方工作的中央。

先進的工人們，除極力想加深自己的社會主義宇宙觀及加深自己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以外，還日益感覺到必須加強經濟鬥爭和職工運動的統一，以及在羣衆中發展政治鼓動。”

(30) 討論特刊，是根據1910年1月全會底決議而開始出版的，其目的是要使俄國社會民主黨內各派底代表，對於各種爭論問題能够發表意見。牠的編輯部，由全會推定黨內各派（布爾塞維克，孟塞維克，前進派）底代表（各一人）組織而成，而且猶太工人同盟和波蘭社會民主黨及萊多維亞社會民主黨也都有代表參加。一共出了三期（1910年和1911年）。在第一期上登載有楊諾夫底一篇文章：黨底統一是否可能？（還是在全會之前做的）。這篇文章是調和主義的，與其說牠要揭露布爾塞維主義與孟塞維主義之間的原則上的意見分歧，不如說牠要調和這些意見分歧。可是楊諾夫在這篇文章內講到召回主義及取消主義時，把牠們比作腫瘤，這個腫瘤把布爾塞維主義及孟塞維主義中一切有害的成份吸引出去了，這樣就促進了牠們的健康。楊諾夫說，召回主義及取消主義對黨有莫大的害處，必須和他們努力作思想上的鬥爭。

(31) 獨立合法派集團，這是一個取消派底團體，他們於1909到1910年在俄國出版公開的取消派的雜誌復興及我們的曙光，該團體底首領就是波特列索夫，切列凡甯，拉林等。該團體實際上是俄國取消派的中央，牠指揮各地取消派的行動。還在1909到1910年1月全會之前，他們中間就有人主張建立自己的“合法的（獨立的）工黨”，可是，他們還不會相信可以得到各地取消派底同情。全會以後，這種主張居然實現了：取消派米哈爾，尤里及羅曼不肯參加全黨中央底工作（參看本卷註釋(21)），同時又發表自己的綱領書（十六人底宣

言——看下一個註釋），這在事實上也就是建立離黨而獨立的特殊的取消派組織。

(32) 十六個孟塞維克底公開信登在社會民主黨人呼聲第19、20期上。這信公開宣傳取消派的觀點：信底作者主張建立“職業的，文化的以及其他的工人組織”來代替“自發解體的”舊有的黨支部。同時他們否認取消主義之存在，說那些“被人偽稱為‘取消派’的人，……並不是脫離工人運動而只是想去親近他。”這封由16位俄國著名的孟塞維克署名的信，曾博得社會民主黨人呼聲編輯部底同情。

(33) 這裏是指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孟塞維克伊哥爾，1908年他在莫斯科當着工人面前擁護取消派的觀點，主張“解散一切”，意思是要解散“俄國社會民主黨”各中心機關，後然就解散整個祕密“俄國社會民主黨”。

(34) 亞色夫是一個著名的奸細，他一方面在沙皇偵防局服務，同時又是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及其戰鬥團（恐怖團）底指導人：列甯說到取消派底政治上的亞色夫主義，就是說，把取消派底行為比作這位奸細底行為，因為取消派也幹了兩重把戲：一方面他們否認有保留舊有社會民主黨之必要，執行完全獨立的政策，把黨的決議及黨內機關置之不理，並與黨作直接的鬥爭；另一方面，他們在形式上還算是黨員，加入黨的機關，利用自己黨的地位來從內面破壞黨。

(35) 二十世紀初的俄國社會運動，這是一種彙刊，由馬爾托夫，馬斯洛夫及波特列索夫主編的（由1909年到1914年共出4卷）。該彙刊完全敘述了取消派對於1905年革命——革命底原因，動力及其失敗底原因等——的觀點。最初，普列漢諾夫也是編輯之一；起初他曾打算修改最帶有取消派觀點的、最反革命的文章，尤其是波特列索夫底革命前社會政治思想底進化一文（二十世紀初的俄國社會

運動彙刊第1卷)。然而，就是受了他的脅迫而修改過的文章也不能使他滿意。普列漢諾夫既深信他與取消派的編輯部不能“同道”，便申明不再參加牠的編輯工作。這一次（1909年）普列漢諾夫與社會運動編輯部（取消派波特列索夫及當時已經墮落到取消派的馬爾託夫都在內）的衝突，便是使普列漢諾夫和公開的及暗藏的孟塞維克取消派脫離關係的一個推動（參看本卷註釋（15））。

（36）克同志在社會民主黨人第13期上的一篇文章，描寫各黨部在反動年代遭受摧殘的慘狀，描寫一部份地方工作人員因這種情形而引起的驚惶失措的情緒；同時堅持必須鞏固舊有的社會民主黨，指出各黨部重新活躍底徵兆，並有精有彩地指出今後工作底任務。

（37）這裏是指“無產者擴大編輯部”底決議案：布爾塞維克黨內的任務。

（38）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底論目前黨的代表會議的信上（1910年2月發表的），曾講到準備全黨代表會議的問題。這封信是由季諾維夫，杜柏洛文斯基及馬爾託夫所組成的委員會草就的。牠堅決地和取消主義分清界線，但同時（也是在1910年2月間）馬爾託夫在這信上署名之後，又在社會民主黨人呼聲上發表一篇走上正路的文章，實質上是盡力粉飾取消主義，仔細掩飾牠的反黨的實質。列甯在自己的文章內就是指出馬爾託夫這種陽奉陰違的、虛偽的政策。

（39）1910年中央1月全會既斥責了取消主義，於是就指出了必須把公開團體內那些依然忠心於黨和服從於牠的領導的社會民主黨工作人員，儘量吸收來參加黨的工作。中央全會以後，孟塞維克馬上就這樣來曲解中央決議：說凡是在公開團體內的工作人員，中央都承認他們是享受平權的黨員，不問他們對取消主義所取的態度如何，不問他們是否服從黨的組織。馬爾託夫擁護這一個“公開人員享受

平權”的理論，以致於不但否認取消主義底存在，而且差不多把取消派看作最寶貴的一部份黨員。例如他寫道：“取消派底事業用最正確的方法培養了一些成份，來使社會民主黨的組織真正復活”，“在整個無產階級運動遭受破壞的黑暗時期，拯救了俄國社會民主黨底榮譽的人，就是那些被人加上‘取消派’頭銜的人。”

(40) 列甯這裏是指他的一篇文章黨的統一底障礙之一（社會民主黨人第13期），這篇文章是反對託洛茨基的（參看列甯全集14卷285到296頁）。列甯在這篇文章內說明：託洛茨基關於取消派反黨的行爲及分裂的策略默不作聲，關於這些問題連討論都不願意，託洛茨基這種行動是擁護取消派。同時，託洛茨基又完全抹煞一件事實，就是“孟塞維克中間發現了普列漢諾夫派及‘護黨的孟塞維克’派，這一派人還是忠實於‘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而與取消主義作鬥爭。”

(41) 列甯在這裏所引的語句，載在本卷內的這篇文章底第三、第四兩章。列甯在這兩章內，引託洛茨基、波蘭社會民主黨人、猶太工人同盟派以及萊多維亞社會民主黨人等等在全會上所作的申明：“我們認爲決議案內所指的這種思潮，最好是稱之爲‘取消主義’，而需要與之作鬥爭，可是孟塞維克的同志作了申明，說他們也認爲須要與這種思潮作鬥爭，不過在決議案內使用這種名詞，便是帶有攻擊他們（孟塞維克）的政派主義性質。因此，我們爲消滅一切無須的阻礙黨底統一的障礙物起見，提議把決議案內這個名詞刪掉。”

再則，在討論關於黨內實況的決議第一條時（孟塞維克對於這個決議作了幾個修正），馬爾托夫特別附帶地申明：決不可用取消派的觀點來解說這些修正案。列甯就根據這一切情形而斷定說協定底條件，會是呼聲派之轉到普列漢諾夫底立場上來，即是轉到黨性底立場上來。

(42) 這個口號，列甯起初是在1909年11月無產者編輯部會議上提出的（參看關於鞏固黨及其統一的決議草案，載在本卷41到43頁），後來又在1910年1月全會上再度提出。這口號是說布爾塞維克及護黨的孟塞維克（普列漢諾夫派）必需統一起來與取消主義及召回主義作鬥爭。孟塞維克在全會上以及全會以後都是拚命地反對這個口號，同時也反對在孟塞維主義中分出一個護黨派（普列漢諾夫）來。在社會民主黨呼聲第19—20期上，編輯部稱這個口號為“反動的”，說如果實現這個口號，那末合法工人運動中有生氣的社會民主黨的份子（就是說，恰恰是為這個口號當時所首先反對的那些取消派份子）就要脫離黨。

在同一期上，社會民主黨人呼聲還激烈攻擊普列漢諾夫。社會民主黨人呼聲認為，正是普列漢諾夫是一個取消派，因為普列漢諾夫和擁護普列漢諾夫的人，“拚命保持着已經陳舊的形式”（這就是說，拚命保持着祕密的俄國社會民主黨——編者），這樣也就是阻止着他的自由發展。

(43) 普列漢諾夫還在1908年8月間，就是說在他的社會民主黨人日記停辦三年以後又重新出版的時候，就已公開反對取消派及反對那幫助取消派的社會民主黨人呼聲。然而初起他還避免與自己不久以前的孟塞維克朋友作激烈的爭論。但在社會民主黨人第13期上（1910年5月9號“舊歷4月26”），他登了一篇文章，題為論無謂之事，尤其是論波特列索夫先生，在這篇文章中，他已十分激烈地反對取消主義尤其是反對他的老友波特列索夫，揭穿取消主義反黨底實質，他說取消主義是“資產階級對於無產階級的影響底表現”。

(44) 這裏顯然是指馬克西謨夫（波格唐諾夫）在無產者擴大編輯部底會議中的言論及會議後的無產者擴大編輯部中被撤職的編

輯員對布爾塞維克同志們的報告（1909年9月16號發出的）。馬克西謨夫因為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護黨派（普列漢諾夫派）接近而大不滿意，並責備列甯及其同志背叛布爾塞維主義，責備他們形成中派政團。”

（45）從1906年初起，普列漢諾夫起來反對抵制第一國會。事實上，當時普列漢諾夫底立場，就是號召人們在和自由派合作之下，“在國會中從事鎮靜的和實際的工作”。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底統一的代表大會上（1906年），普列漢諾夫擁護了一種意見，就是說，認為國會是“站在革命底康莊大道上”，認為國會和政府的衝突，將迫使國會去在廣大羣衆中尋找支柱，這樣就將把國會從反革命底工具變成革命底工具。在第二屆國會選舉的時候，他堅決主張在沒有希望選出社會民主黨候選人的地方，必需贊助立憲民主黨的候選名單。普列漢諾夫反對布爾塞維克所提出的各個革命口號，認為必需贊助立憲民主黨所提出的“責任內閣”這個口號（所謂“責任內閣”，就是向國會負責任的立憲民主黨內閣）。

然而，普列漢諾夫有一個時候會放棄“與立憲民主黨人周旋”的思想並接近了革命的策略：在1906年8月間第一屆國會被解散以後，普列漢諾夫出版了自己的第6期社會民主黨人日記，其中載有大家的悲痛一文，該文寫道：當前的口號只能是召集立憲會議的口號。這一次，普列漢諾夫不僅不會把社會民主黨的口號去適應立憲民主黨的口號，而且正是相反，他批評了立憲民主黨人底半途性，拿“勞動的”農民來和立憲民主黨人對立。然而，普列漢諾夫說到爭取立憲會議的口號時，却未能澈底地說出當時唯一能夠保證這口號勝利的那些鬥爭手段：無產階級底黨與革命民主份子底黨作戰鬥的協定，舉行全民暴動，建立臨時革命政府等等。

(46) 馬爾托夫在自己的文章內敘述，在1907年下半年，孟塞維克中間只有普列漢諾夫一人極力主張必需在國外創辦秘密的機關報（社會民主黨人呼聲），而馬爾托夫及阿雪洛德起初都是反對的。

(47) 當恩格斯寄居倫敦時，在英國成立了“社會民主聯盟”（SDF），他曾經仔細地考察牠的發展和活動。他指出了該聯盟在策略上所犯的錯誤。他曾不信任聯盟底首領之一——海特曼，稱他為陰謀家，並曾贊助聯盟裏面極力想剝奪海特曼在聯盟內的政治影響的那部份人。因此可以說，恩格斯是反對海特曼而不是反對聯盟。

(48) 此地所講的是加米業夫一篇文章：孟塞維克的俄國革命史上無產階級領導權之取消。

(49) 1910年中央正月全會通過了一個決議，要盡快地召集全黨代表會議，並替這次代表會議預先規定以下的議事日程：關於經濟鬥爭的問題與公開工會及秘密工會的問題；關於與國會工作有關的黨工作的問題；關於在各公開團體內工作的問題；關於宣傳與鼓動的問題；組織問題等等。因為在全會上，孟塞維克及前進派都一致通過了總的原則決議案，所以中央在代表會議議事日程上沒有單獨提出與取消派召回派底反黨思潮作鬥爭的問題。可是在中央全會以後，孟塞維克不但極力阻撓召集代表會議，而且使中央會議都不能召集起來。代表會議直到1912年1月才召集成功，那時已經沒有孟塞維克參加了（參看本卷註釋（90））。

(50) 列甯底論政權底社會結構，論前途和取消主義這篇文章，1911年3月登在布爾塞維克的公開雜誌思想上。牠的基本內容與本卷內所載的幾篇文章——走上軌道，論目前時局與黨底任務的決議草案，論召回主義底贊成者和擁護者之政綱，有最密切的聯繫。這幾篇文章，對於1905到1907年革命後專制制度底階級性（換句話說，就

是政權底社會結構)都有同樣的估計,這是在本卷註釋(1)上面已經指出了的。列甯在論召回主義贊成者和擁護者底政綱一文內,用這種估計去反對“左的”取消派,而在這篇文章內則是反對右的取消派。1908年底12月代表會議上討論並通過列甯的關於目前時局及黨底任務的法議草案時,孟塞維克沒有詳細發揮他們對於專制制度底性質的觀點。這一個問題,是決定黨底政治立場的基本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和他們作鬥爭,只是在代表會議以後才發展起來;當時馬爾託夫和拉林等關於這個問題在報上發表了許多文章,並做了相當的政治上及策略上的結論。拉林在那個時候已經是一個澈底的取消派,他斷定說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已經完結,說工商資產階級已取得政權,說繼續肅清現制度中農奴制殘餘的過程,將逐漸進行,經過日常的改良來進行。由此就必然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就是說,社會民主黨不應當再以革命為方針,而應當集中一切力量,取助於改良,來謀工人階級狀況底改善。要達到這些目的,當然用不着保存秘密的革命黨:公開的工黨也可以爭取改良。

馬爾託夫這位取消派却没有拉林那樣澈底,那樣公開,他所擁護的觀點有點不同。他在對於1905年到1907年革命後專制制度底階級性的估計上,與澈底的取消派意見不同。他不同意把六三制度當作資產階級政權的意見,恰恰相反,依他的意見,這是專制制度向着農奴主方面倒退一步。因此他否認自由資產階級已經轉到反革命方面去,否認資產階級贊助專制制度的事實。依他的意見,將來還有自由資產階級與地主專制制度之間的鬥爭。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應推動自由資產階級去作這種鬥爭,並關心在這個基礎上保持自己的權利與利益,但絕不可提出些過份的要求來恐嚇資產階級。這個理論也同拉林底理論一樣,結果會使馬爾託夫放棄民主革命,不去幹這種革命,而去在

那個顯然已經走上反革命道路的自由資產階級底政治領導之下爲自由派的改良而鬥爭。因此，馬爾托夫在其他的問題上（局部地是在關於保有秘密黨的問題上），轉到取消主義方面去。

（51）這幾句話是孟塞維克唐恩說的，他在1908年12月黨的代表會議上做了一個關於目前時局及黨底任務的副報告，反對列甯。他這樣說：“布爾塞維克主張再蹈覆轍”。唐恩這句話是反對武裝暴動及一般革命鬥爭的。在代表會議以後，孟塞維克的社會民主黨人呼聲申言，他“十分誠意地”同意唐恩底話。

（52）列維茨基在我們的曙光雜誌上發表了好幾篇文章，這些文章，都是澈底表現出取消主義。在這些文章內說，歷史已經把秘密組織這種基本的組織形式取消了，社會民主黨再不成其爲一個政黨了，社會民主黨已經不是一個嚴密的組織了。列維茨基爲保存工人運動底合法性起見，曾表示決意用斯托雷平制度那樣的界限，來限制社會民主黨的工作。

（53）所謂“第一等人”是指國家政權，政府，官僚。“第二等人”——這是地方自治派的地主們。“第三等人”——在地方自治機關服務的民主派的資產階級的智識界——醫生，農藝學家，教員等等。

（54）奧國專制政府於1848年3月19號被資產階級、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及無產階級底統一力量所推倒了。在革命向前的發展過程中，已被工農底革命熱忱所嚇倒的資產階級，就背叛了革命而去與舊政權妥協了。在小資產階級內部，厲害地表現出民族間的仇視（奧國境內有日耳曼人，捷克斯拉夫人，波蘭人，匈牙利人等），這種民族的仇視把各民族底小資產階級（和一部份無產階級）分成個別營壘。奧國專制政府就利用力量底這種分散，於1848年6月就已撲滅了捷克斯拉夫革命，1849年3月撲滅了奧地利革命，而於1849年9月

在俄國軍隊底幫助下也把匈牙利革命撲滅了。在此後十年當中，反動勢力橫行全國。

1859年奧國在奧法意戰爭中的失敗，引起了社會運動底新高漲，特別是在匈牙利。政府起初作了讓步，但後來看見反對牠的那班人中間又發生民族間的仇恨，於是又把讓步收回。這種退向反動方面的轉變，發生於1865年末。而在1866年春天，又發生了普、奧戰爭。在這次戰爭中大遭失敗的奧國政府當時已不能再抵抗社會勢力底重新加強的反抗了。1867年12月，奧地利終於得到了憲法；依照該憲法，奧國變成了兩國合併的奧、匈帝制，政府向議院負責，宣佈司法“獨立”不受政府控制，擴充資產階級對於地方行政人員底行動之監督。奧國資產階級終於得到了當權的可能。

(55) 列甯這裏是把馬爾托夫底論戰手段與布里甯及孟興科夫（他們是蘇瓦林在彼得堡出版的反動報紙新時代底兩個同事）底論戰手段比較。布里甯之所以聞名於世，是因為他在著作上抹煞天良，與入論戰時善於造謠中傷。孟興科夫與人爭論時，則沒有原則和亂用手段，因此得了“奸人”的綽號。

(56) 所謂“維特的改良”，即沙皇亞力山大第三及尼古拉第二時代總長維特底改良，是指他在財政方面所採取的一些辦法（施行金本位制和酒業專賣制，加強保護關稅制）及鐵路事業方面所採取的一些辦法（極力促進鐵路建築之發展）。

(57) 列甯是指在奧德沙警察廳長托爾馬却夫底行動。這位警察廳長在奧德沙橫行無忌，連斯扎雷平政府底命令都置之不顧，托爾馬却夫在反對“政治犯”的鬥爭中非常殘暴，並極端地侮罵少數民族、派別宗教及“異教徒”（非正教徒）。所謂“革新的托爾馬却夫制度”，意思是說，官僚專橫的制度（如奧德沙的托爾馬却夫制度那

樣)，只是以“革新的”形式保存着，用“國會”來掩飾，而這個“國會”則表示地主的專制制度與資產階級的聯合。

(58) 1848到1850年，維里赫加入了由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和領導的共產主義者同盟，該同盟底綱領就是他們兩人合著的共產黨宣言。但是，在他加入這個同盟的時候，甚至在他充當該同盟中央委員的時候，他實際上沒有贊成共產黨宣言底主張，因此就是說，也沒有贊成馬克思和恩格斯底觀點。他是共產主義裏面當時標本式的一種小資產階級“左派”、這樣一個小資產階級革命性底標本的（對於當時是標本的）代表，這種小資產階級“左派”，這種小資產階級“革命性”底標本特徵，向來就是而且現在還是這樣：沒有用唯物主義的觀點去了解實際，沒有估計革命與革命鬥爭底客觀條件，不認為“在實行一切革命行動以前對各種階級力量及其相互關係有作嚴格的客觀的估計之必要”，沒有能力“表示堅定性、組織性、紀律性、剛毅性。”（見列爾全集第25卷，第180和181頁）小資產階級革命性底這一切標本特點，在維里赫和贊助他的人方面，在1848到1849年德國革命失敗以後表現得十分明顯。當時，如恩格斯在其論共產主義者同盟底歷史一文中所說的那樣，“準備了1848年革命的那次工業危機，已經過去了；新的空前未有的工業興旺時期，已經開始了。”在這些新的條件之下，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共產主義者同盟的領導者底資格，站在唯一正確的觀點上，即認為“在普遍興旺中，資產階級社會底生產力發展得在資產階級關係範圍內一般地所能够有的那種普遍程度，在這種普遍的興旺中談不到什麼真正的革命，”（着重點是恩格斯加的）他們既站在這個觀點上，於是就進行了堅忍不拔的工作來準備無產階級在危機時期重新代替資本主義繁榮時期的時候去作新的、未來的階級戰鬥，而且其準備底方法就是創立、發展和鞏固無

產階級底獨立的階級的政黨，因為共產主義同盟當時只是這個政黨底第一個的和還軟弱的萌芽。維里赫正在這個問題上，把那些和他一樣不堅定的份子、和他一樣“左的”共產主義者（沙伯爾等人）吸收到了自己方面來，而組織反對派來反對由馬克思和恩格斯所領導的共產主義者同盟大多數及其中央。1850年9月15號，馬克思在該同盟中央會議上，對着這個反對派這樣說明了與這個反對派意見分歧底基礎：“少數派不持批評的觀點而持死守信條的觀點，不持唯物主義的觀點而持唯心主義的觀點。在牠看來，成為革命動力的，不是真實的關係，而僅是意志。我們向工人說：“你們應當經受15年、20年、50年的國內戰爭和國際戰爭，不僅為的要改變現有的關係，而且還為的要改變自己本身而成為能夠實行政治統治的人”。而你們所說的却相反：“我們應當立刻達到統治，不然我們就沒有什麼可幹的事了。”我們向德國工人特別指出德國無產階級底落後狀態，而你們却最粗魯地贊美牠的民族主義思想和德國手工業底等級成見，這對於德國無產階級和手工業者當然是容易懂得些。民主派把人民這兩個字眼變為什麼神聖的東西，你們像民主派那樣，把無產階級這四個字眼也變為什麼神聖的東西。你們像民主派那樣，用革命辭句來代替革命發展以及其他等等。”（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506至507頁，關於喬恩共產黨人案件的揭露一文，1931年馬克思、恩格斯、列甯學院出版）

維里赫、沙伯爾這一派人，曾認為“革命底動力”不是“真實的關係”，不是階級和階級鬥爭，而“僅是”寥寥無幾的革命家底“意志”，並“用革命辭句底發揮來代替了革命底發展”——這一派人曾是小資產階級的“造作革命的一派人”，他們不去估計革命產生和發展底實際條件，不去發展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不去估計這個發展底基本條

件——創立和鞏固無產階級底獨立的階級的政黨。這一派人，曾認為只要挑選出寥寥無幾的堅決勇敢的人，弄到武器和經費，就足以在何時機掀起暴動和實行革命。恩格斯在上引的論共產主義者同盟底歷史一文中寫道：“我們所主張的謹慎態度，是為這般人所不愜意的；他們會願意着手去造作革命；我們最堅決地拒絕了這點。”於是發生了分裂。被驅逐出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維里赫，沙伯爾這一派人，在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中間真正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這些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攻擊了馬克思及恩格斯為首的共產主義者同盟，並高喊革命的辭句而不幹真正革命的工作。

與維里赫、沙伯爾這一派人的鬥爭，按其實質講來，如列甯所特別指出的一樣，是為無產階級底獨立的、“依靠着工作運動的階級政黨”而作的鬥爭。馬克思、恩格斯與布朗基派的鬥爭，也是這樣一種的鬥爭。布朗基派，即法國革命家布朗基（生於1805年，死於1881年）底信徒們，和布朗基本人一樣，就他們所抱定的目的而論，曾是一些共產主義者，而且他們曾認為，建立革命專政是達到這些共產主義目的之條件。但是他們却沒有把這個專政當作無產階級底階級專政，而把牠當作寥寥無幾的共產主義革命家底專政，至於達到這種專政的革命底本身呢，那末在他們看來，這個革命不是由共產黨所領導的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及無產階級暴動底結果，而是一種仍舊還是由這些寥寥無幾的共產主義密謀者所實行的革命。最後，經過革命專政而到共產主義去的過渡，在布朗基派看來也不是整個過渡時期底結果，在這個過渡時期中，無產階級在共產黨領導之下，領導其餘的勞動羣衆，去從事社會主義建設和進行階級鬥爭來消滅階級和建立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在布朗基派看來，這個過渡是差不多在24小時以內自上地“施行共產主義”的結果，不需要什麼特別的過渡時期的。1873

年，“布朗基派共產主義者”脫離了第一國際和組織了自己的團體“革命公社”；恩格斯在分析布朗基派共產主義者底綱領時會寫道：“33個布朗基派之所以為共產主義者，是因為他們以為，他們既願意跳過中間的階段和妥協，那末事情就妥當了，並以為：如果在這幾天內“會發動起來”（而且他們深信會有此事）而政權將落在他們手裏，那末在後天，“共產主義便會施行”。所以，這點如果不能立刻就做到，那末他們也就不是共產主義者。”

(59) 1879年，德國社會民主黨黨員賀伯出版了一部論文集，標題為：社會科學和社會政治年刊。在這部論文集裏，登載了施拉姆、培恩斯坦和賀伯合著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底作者們曾責備了黨，說黨對於資產階級民主派持反對態度。他們會說道，黨開會亂叫而在理論方面則絲毫不加研究；黨員們開會亂叫不用溫和的口氣，慣用“激烈的字眼”。他們責備了黨，說黨沒有充份地適應德國的現有條件，說政府方面對黨的追究是黨自己的過咎，說黨用自己的行動來嚇退資產階級，而不是用鎮靜的、客觀的、認真的態度和“在所謂上流社會中從事積極宣傳”的方法，把這個資產階級以及凡願與無產階級實行合作的“一切忠實的人”吸收到自己這方面來。

與這篇文章底發表差不多同時發生的一回事就是：國會中的社會民主黨黨團，在國會討論關於確定關稅的問題時，做了資產階級底尾巴。一部份社會民主黨人與自由派一塊兒投票，另一部份與保守派一塊兒投票，而還有一部份人則不投票。

1879年末，德國社會民主黨開始出版社會民主黨人報，在這個報紙上發表了一些文章，斥責任何的戰爭（就是說，革命的戰爭也在內），宣佈黨底目的乃是“一切人們”之間的友愛以及其他等等。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給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們的許多信封裏面最激烈地和絕對地起來反對德國社會民主黨內部這樣的和諧如此類的機會主義表現。譬如在1879年9月間，他們寫了一封長信給培培爾、李卜克內西、布拉凱等人，論述施拉姆、培恩斯坦和賀伯底作品；在這封信上，他們寫道：“如果這些先生們組織小資產階級的社會民主黨，那他們完全有權利這樣幹。可是在工人政黨內，他們却是異己份子。如果有根據暫時要把他們容忍一下，那末我們僅僅應當容忍他們而不應當給他們影響黨底領導和應當明瞭這點：就是我們與他們的破裂只是時間問題。而且這個時間大概已經到臨了。黨怎麼能夠把這篇文章底作者們再容忍在自己的隊伍裏，這我們完全不懂得。如果黨的領導竟在某種程度內落到這班人手裏，那末這就是說，黨簡直被剝奪了元氣，黨內再沒有無產階級的精力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接着又指出：他們（即馬克思和恩格斯）“差不多在40年當中把階級鬥爭提在第一位，把牠當作歷史底直接動力，尤其是把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提在第一位，把牠當作現代社會革命底強有力的槓桿，”所以他們“無論如何不能與那些極力想從運動中排除這個階級鬥爭的人一塊兒走；”同時，馬克思和恩格斯，因為德國社會民主黨打算在瑞士出版自己的秘密報紙，於是聲明道：“如果新的黨的機關報將採取迎合這些先生們底觀點的那種方針，如果牠將是資產階級的、而不是無產階級的機關報，那末，我們可惜只能當衆起來反對這點和打消那種我們在國外代表德國黨時向來對你們所表示的同情心。但是我們希望不會弄到這個地步”。（見馬克思恩格斯文庫第1卷（第6卷）第154到155頁，1932年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學院出版）。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的時候，事情却沒有“弄到這個地步”，

可是在他們逝世以後就弄到了這個地步。後來也成了第二國際領袖們的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們，沒有採取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封信上所寫到的那種與機會主義實行“破裂”的方針。正是相反，他們自己從對於機會主義的讓步，一步一步地落到了機會主義的立場。德國的社會民主黨，而同牠一塊兒的還有第二國際各黨。結果變成了資產階級的、社會法西主義的黨。只有列甯和布爾塞維克黨，才繼續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兩條戰路上鬥爭的事業，曾能夠採取，而且從布爾塞維主義一產生時就採取了與機會主義實行破裂的方針並把這個方針實行到底，因為他建立了不能被戰勝的布爾塞維克黨——聯共（布）一及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

（60）列甯這裏是指言論報底社論（1911年2月3號）。立憲民主黨的機關報在這篇社論內證明：一切“反政府的”派別在共同的敵人（政府反動勢力）面前應統一成爲一個營壘，把各派綱領上的一切意見分歧放在次要地位。言論報寫道：“在現時的俄國，越下去，各政派便越要溶合爲兩大營壘，一個贊成立憲，一個反對立憲。”列甯提起言論報這篇文章，指明馬爾託夫底觀點，實質上與立憲民主黨報紙上的觀點相符合。

（61）著名的德國機會主義者培恩斯坦，在19世紀90年代末，公開用機會主義的觀點來曲解馬克思主義，發表和平生入社會主義的理論，主張不要革命，不要無產階級專政等等。培恩斯坦底觀點，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兩次代表大會上都受了斥責，——誠然，這種斥責是軟和的，是帶有中派主義的調和態度的。當時，另有一個機會主義的社會民主黨人亞威爾，關於這一點給培恩斯坦以這樣的規勸：你只要本機會主義的精神去幹，可是口裏不要說。列甯此地所引的，就是這幾句話。

(62) 列甯這裏是指取消派列維茨基底聲明，列維茨基說：無產階級的黨，應當“不是謀政治自由的全民族鬥爭中的領導者（好像從前那樣），而是階級的黨。”關於這一點列甯寫道：這“是最貫徹的改良主義底公式。不僅如此，——列甯又補充道，——這是十足的叛徒主義底公式……。”這樣說——“就是轉到資產階級方面去，轉到自由派方面去，自由派向我們這個時代底奴隸——僱傭工人，這樣說：你要謀自己這種奴隸生活底改善，可是要把推翻奴隸制的念頭算作有害的空想！”向工人這樣宣傳，“這就是宣傳用自由派的工人政策來代替社會民主黨的工人政策。”（見列甯全集第15卷第209到210頁，俄國社會民主黨內的改良主義一文）。

(63) 列甯這篇論調和派或好心人底新政派的文章，載在1911年10月31日社會民主黨人第24期上，是專講布爾塞維克內部的調和主義的。在布爾塞維主義內部發生分裂（前進派之分出）以後（這種分裂在中央正月全會以後更為緊張了，——參看本卷底註釋(21)），有些布爾塞維克不能了解布爾塞維主義與前進派鬥爭底原則上的實質，不能看出前進派底反黨的性質，把一切事情歸之於局部的組織上的意見分歧，並責備列甯和列甯派，說他們把意見分歧弄緊張和實行分裂。這一部分帶着機會主義情緒的布爾塞維克，在當時就形成了列甯在本文內所寫到的那個“調和派或好心人底新政派”，或者如他們自己所稱的，是“非政派主義的布爾塞維克”集團，“護黨的布爾塞維克”集團。當時最出名的調和派是馬爾克（留比莫夫）、羅索夫斯基、列華（胡拉奇木洛夫）、賴可夫、諾根、梅士可夫斯基（高登堡），英諾肯梯（杜伯洛文斯基）等人。附和他們的還有一些波蘭的社會民主黨人（瓦爾斯基、提什科等）。在俄國社會民主黨中央正月全會（1910年）上，除了杜伯洛文斯基、高登堡（梅士夫可

斯基)和諾根以外,加米業夫也實行了調和主義的路綫。調和派在自己的實際工作中,強硬地抵抗列甯的那種主張與右的及“左的”各派取消派完全破裂的路綫,而實行無原則的統一底路綫。至於列甯與調和派作了怎樣的鬥爭,這點還可從(除本文外)1911年23月間列甯與賴可夫的通信中看得出來,這些通信發表於列甯文存第18卷(1932年出版的)第12至35頁。

1911年夏開始準備全黨代表會議時,在國外成立的“技術委員會”(參看本卷註釋(64)內,大多數原來都是贊成調和派的。因此該委員會所出版的新聞紀要(共出版兩期),大部分正是反映這部分調和派底觀點。同時,在1911年8月,調和派特別發出一個傳單告俄國社會民主黨全體黨員書,署名的是“護黨的布爾塞維克同人”(參看列甯全集第15卷附錄,第598至602頁)。

在這些文件中所首先看到的,就是調和派完全不談起取消派及前進派底機會主義。而且,他們一肚皮的忿氣都不是反對機會主義者,而是反對列甯及其同道者,這本來也是俄國社會民主黨內其他一切無原則的調和派所具有的特點。他們寫道:“正式的布爾塞維克”(即列甯底同道者)底小組的政派主義超過其他各派,列甯及其同道者底政派主義的政策,袒護了其他各派底政派主義的分立。他們直接聲明:妨礙護黨的份子團結起來的主要原因之一,正是這樣一種政策。這種政策底實質似乎就是“排斥、開除、組織上的壓迫”。調和派這樣攻擊列甯及其同道者,同時還袒護了一切機會主義者。關於託洛茨基,他們寫道,“他與他的信徒在政治上對於護黨派要比他們對於取消派更接近些”。他們又補充道:“這句話應用於前進派更其適當。”

這時期調和派的布爾塞維克底觀點就是這樣。列甯稱他們為“不

澈底的託洛茨基主義者”。

因為列甯及黨與這個“調和派或好心人底政派”作了鬥爭，這個政派在黨內沒有得到什麼影響，牠以正式政派底資格而存在，為時不久。與這個政派鬥爭底教訓，和過去各時期內（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與第三次代表大會之間的時期以及第三次代表大會與第四次代表大會之間的時期）與調和主義鬥爭底教訓一樣，對於以後黨在兩條戰線上的一切鬥爭有了最大的意義，因為布爾塞維克黨內個別份子底調和主義，在歷史底以後各階段中，局部地在10月革命以後的時期中，也曾發生過（例如對託洛茨基主義、對右派機會主義、對託洛茨基主義被擊破以後的託洛茨基主義殘餘——“左傾”，持調和主義態度）。

（64）在1910年中央正月全會以後完全看出了，孟塞維克是竭力破壞下屆中央全會之召集的，所以在1911年6月，一部份中央委員（布爾塞維克、波蘭代表及萊多維亞代表）就在國外開會。這次“中央委員6月會議”通過了一些極重要的決議，其中最具有重大意義的，就是關於召集下屆黨的代表會議的決議。為籌備該會議起見，成立了“國外組織委員會”，並委託他在俄國成立“俄國組織委員會”。還成立了國外“技術委員會”，以便執行國外的技術工作（黨的出版工作、運輸工作等等）。

（65）列甯稱取消派為斯託雷平的工黨，是因為取消派提議要組織公開的工黨，這樣也就是把牠的活動限制在斯託雷平制度所許可的範圍以內。“拉林及其同伴們責備俄國工人，說他們會竭力想取得領導權（就是說 竭力想不顧自由派底意思而吸收羣衆去參加革命），並勸導他們組織起來，“不是為的來幹革命”，而是“為的在俄國行將到來的立憲維新中去擁護自己的利益”。德國腐敗的自由主義

底腐敗觀點，却被取消派冒充爲“社會民主黨的”觀點而供獻給俄國工人。你看，像這樣的社會民主黨人，怎樣不稱他們爲斯託雷平的社會民主黨人呢？”——列甯這樣寫着。（見列甯全集第15卷第213頁，俄國社會民主黨內的改良主義一文）

（66）中央國外局之成立是爲着保管黨在國外的財產，出版機關及技術機關，爲着統一國外各小組，爲着使這些小組與在俄國活動的中央發生關係，同時還爲着在國外代表黨。1910年中央1月全會以後，“中央國外局”內大多數都是孟塞維克及調和派。在孟塞維克呼聲派開始直接轉向取消主義的時候，“中央國外局”便變成了集合反黨力量的中心：“中央國外局”不肯和取消派作鬥爭，極力袒護和幫助取消派，結果他們這種黨內的顯然是政派主義的政策，不但引起布爾塞維克及波蘭同志起來反對牠，連護黨的孟塞維克也反對牠。“中央國外局”，因爲害怕呼聲派落於少數地位，所以不管有多次的要求，不願中央全會決議及黨章直接規定，竟不肯召集新的中央全會，而新的中央全會却是逃出黨的危機的唯一出路。1911年的中央委員6月會議，會不得不指出“中央國外局”“反黨的政派主義的政策”，這種政策是破壞中央底明確決議（1911年中央委員6月會議底通知和決議，載於列甯全集第15卷附錄內，第584至588頁）。

中央委員6月會議以後，“中央國外局”開始努力反對牠的決議，極力阻撓全黨代表會議底召集。結果，布爾塞維克底代表亞力山大洛夫（謝馬史科）退出“中央國外局”。於是布爾塞維克便與“中央國外局”完全破裂，‘中央國外局’便完全變成贊助和擁護取消派的份子底機關。

（67）這決議是由列甯起草的，全文載於列甯全集第15卷第197至203頁。“第二巴黎團”，這是巴黎布爾塞維克贊助“俄國社會民

主工黨”的團體。其中大多數都是列甯這一方面的人，少數是調和派。此外巴黎還有一個孟塞維克的團體，叫做“巴黎團”。

(68) 列甯這裏是指 1903 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所發生的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之間的分裂，以及此後一直到 1905 年為止的時期內這兩個政派之間的鬥爭；在 1905 年，布爾塞維克在倫敦開第三次代表大會，而孟塞維克則不肯出席這次代表大會而在日內瓦召集了自己特別的孟塞維克的代表會議。

(69) 關於米哈爾、玉里和羅曼這幾個人底叛黨行為，參看本卷內政論家底時評一文第 2 章：我們黨內統一的危機，第 6 節第 73 至 88 頁。

(70) 前進派提議要黨承認他們在加普利島（意大利）所辦的政派主義的學校為全黨的黨校，1910 年中央 1 月全體會議把這個提議否決了。於是他們便進行組織自己的第二個學校。1910 年 11 月，該校在波郎尼城（意大利）正式成立。連旁聽生一起共有 21 個學生。“波郎尼學校”，按其教員和指導員底成份來說，也同加普利的學校一樣，是前進派底政派中心。教授都是些最有名的前進派：波格唐諾夫、盧那查斯基、略多夫、亞力克新斯基、波克洛夫斯基、瓦克斯基、孟仁斯基等等。

可是“波郎尼學校”有一個特點，這就是：參加校務的，除了前進派之外還有一些孟塞維克取消派（巴夫諾維赤、郭倫泰、馬斯洛夫），並有託洛茨基。因此在實際上，“波郎尼學校”實現了前進派，取消派及“調和派”託洛茨基（他是暗藏的取消派，中派主義者）間的合作，這種合作在中央全會以後已經表現出來。“波郎尼學校”同“加普利學校”一樣，也是被前進派利用來造就他們的政派主義人材到俄國去工作。可是因為學生中間混進了奸細，所以許多學生一回國就

被暗探局逮捕了。

(71) 工人報從1910年11月開始出版，到1912年8月爲止，是由列甯、季諾維夫和加米業夫主編的。共出了9期。這一個純粹是布爾塞維主義的報紙，主要的是給“年輕的工人社會民主黨人”閱讀的，其目的是要“幫助他們分析現時複雜的政治問題及經濟問題。”(而社會民主黨人則是一個主要的是給黨內領導幹部閱讀的中央機關報)

(71) 列甯這裏是指加米業夫被託洛茨基逼迫而退出託洛茨基在維也納所辦的真理報編輯部。加米業夫是在1910年1月全會後以中央代表資格參加該編輯部的。(參看本卷註釋(21))

(73) 1910年中央1月全會以後，中央機關報社會民主黨人編輯底成份如下：布爾塞維克方面有列甯和季諾維夫，孟塞維克方面有馬爾託夫及唐恩，還有一個波蘭人——瓦爾斯基(後來由列德爾代替他)。

(74) 工人生活，這是社會民主黨的月刊，出版於巴黎，從1911年3月起至5月止(一共出了三期)；該報是由布爾塞維克調和派和取消派呼聲派合辦的。參加編輯部的是兩個布爾塞維克調和派(留比莫夫和胡拉奇米洛夫)及兩個呼聲派。該報是給俄國旅外工人讀的，主要的是注意法國工人運動而不談起黨內的鬥爭問題，對於俄國社會民主黨底生活差不多完全不談，以便這樣來表明自己的“非政派主義”。這種“非政派主義”，託洛茨基在自己辦的維也納真理報第21期上專論工人生活的文章中曾加以頌揚。

(75) 1911年4月29號，託洛茨基底真理報第20期上登有兩個調和派(黑爾曼及阿爾卡第)底一封信。這封信把黨內鬥爭看作一部份孟塞維克與國外布爾塞維克間的意氣鬥爭和國外上層機關互解底結果。這些調和派不願分析意見分歧的實質，完全無原則地聲明：“我

們沒有工夫來分析政派主義的派別”。他們以“團結”爲自己的基本任務，可是完全不談到：黨的團結，要同那種人和根據什麼原則上的主張才有可能和必要。

在該信底另一段話中也可以看出，他們對黨的生活中各基本的原則上的問題持藐視態度：黑爾曼及阿爾卡第認爲完全用不着討論擺在黨面前的各種任務，並以藐視的態度稱黨的政治路線之確定爲‘寫決議’。

(76) 列甯這裏是指國外技術委員會新聞紀要第2期(參看本卷註釋 63)。

(77) 1911年中央委員6月會議(見本卷註釋 64)所開始的那種重新建立黨和召集全黨代表會議的工作，進展得很快。由國外組織委員會派到俄國去的特派員(奧爾松尼基茲、石瓦爾切和布列斯拉夫三同志)，在巡訪了幾個最大的黨的組織以後，就在俄國建立了一個俄國組織委員會，該委員會便努力地着手籌備代表會議。雖然有非常困苦的政策壓迫的條件(石瓦爾切、布列斯拉夫、賴可夫等同志以及當地籌備召集代表會議的許多同志，很快就被捕了)，但“俄國組織委員會”到1911年年底的時候，終究能夠把二十個以上的黨的組織團結在自己的周圍，而且在1912年1月18日(舊曆初六)的時候，代表會議已經在布拉加舉行自己的會議了(見本卷註釋 90)。

當然，“俄國組織委員會”底工作引起了取消派、前進派和託洛茨基派方面拚命的攻擊。他們把布拉加代表會議底準備看作列甯底分裂陰謀，用無窮盡的謾罵來攻擊列甯及其同道者。爲對付布爾塞維克之召集代表會議起見，取消派和託洛茨基派便立刻籌備同時舉行的、反布爾塞維克的、取消派的代表會議，這次會議舉行於1912年8月(見本卷註釋 109)和(102)。

黨內危機告一段落，這篇文章是列甯於1911年12月在布拉加代表會議之前一月做的，登在1911年12月21號社會民主黨人第25期上。這篇文章對黨內生活上的這一切事件作一番估計，同時對整個反動時期及黨內紛亂時期作一總結。

(78) 布爾塞維克在中央1月全會上聲明，如果孟塞維克不再繼續作分裂，則布爾塞維克願將自己這個政派底經費拿出來供全黨之用。布爾塞維克暫時將經費交給了三個“保管人”(考茨基、梅林格、蔡特金)。1月全會以後，知道孟塞維克還繼續其政派主義的工作，於是布爾塞維克於1910年12月18號就向“保管人”申明，他們與孟塞維克的協定宣佈作廢，并要求歸還經費。“保管人”本應當無條件地和完全地履行這個要求，可是他們不這樣做，不肯最終決定把一切經費歸還布爾塞維克的問題，而先交一部份給“技術委員會”及“國外組織委員會”作為籌備大會之用，規定到1911年11月14號作最後的解決。可是“保管人”把這個問題推延到帝國主義大戰的時候，而到後來，在德國革命時，因馬克跌價，這筆款子也完全跌價了。

(79) 上面已經說過(參看本卷註釋(66))，“國外組織委員會”成立以後，取消派便開始籌備自己的代表會議。1911年8月，他們在伯恩城(瑞士浦本堡咖啡館內)召集會議，有託洛茨基參加，這次會議也就通過了決議召集單獨的代表會議。

為要增加這個決議底威信起見，猶太工人同盟派(李伯爾)協同取消主義的高加索區委代表，跑到不律塞爾(列甯為保守秘密起見，稱之為“Z”城)去找設在該地的萊多維亞社會民主黨中央，叫牠在這決議上簽個字(當時萊多維亞社會民主黨中央底大多數都是孟塞維克)。“中央國外局”中的取消派以為這麼一來，他們決議案就有“三個最強的組織”(猶太工人同盟，萊多維亞社會民主黨，高加索)

區黨部)簽字。然而從本文中可以看出，取消派畢竟沒有找到萊多維亞社會民主黨底中央。

(80) 1913年4月到6月間列甯在布爾塞維克的真理報上投了六篇文章，總題目為幾個爭論問題，都是反對取消主義的。當時已經是新的高漲時期了。取消主義當時做了新的蒸蒸日上的革命底阻遏者。因此和取消主義鬥爭，便成了為重新高漲着的革命而作的鬥爭。在公開報紙上，進行這個鬥爭的真理報，他所反對的則是孟塞維克取消主義的光線報。真理報從1912年開始出版，牠是打算給大批工人羣衆看的，這些工人沒有懂得以前在秘密條件下的黨內鬥爭；因此須要把以前反取消主義的鬥爭中的基本要點，用通俗簡單的形式敘述出來。列甯在幾個爭論問題這篇文章上就作了這樣的敘述。這六篇文章對於取消主義底實質及黨與牠鬥爭的歷史作了完滿的說明。同時要記得，這些文章是打算投在公開報紙上發表的，而公開報紙是受沙皇政府嚴格檢查的，所以文章語氣格外謹慎。

(81) 在1906年黨底託阿爾姆代表大會中，大多數都贊成孟塞維克，大會通過土地市有化作為黨底土地綱領上的要求。布爾塞維克以列甯為代表，在大會上極力反對土地市有化而主張一切土地國有化，還有一部份人以巴里索夫為代表，主張由農民分割地主和沙皇等等的土地。

(82) 列甯是指阿雪洛德底當前問題一文，全文登在取消派雜誌我們的光(1912年第6期)上，其節略登在取消派報紙尼瓦呼聲上。在這篇文章內，阿雪洛德在估計俄國社會民主黨黨內狀況的時候，堅決主張必需“根本改變俄國社會民主黨在革命以前形成和在革命時代繼續發展的那種性質”。他把舊有的、秘密的、革命的俄國社會民主黨，不稱為工人階級社會主義份子底組織，而是相反，稱為駕乎

他們之上、“忠於他們、保護他們”的一種力量，可是到底還是“外來的、不以他們為轉移的、多少把他們弄到附屬地位的一種力量，是一種智識份子的團體，依賴於無產階級底自發羣衆而約束牠的有社會主義意識的代表。”阿雪洛德既把社會民主黨說成爲駕乎無產階級之上的智識份子的組織，於是便號召一切“無產階級底先進份子及自覺贊成俄國工人運動西歐化的人們中的先進份子”起來創立“獨立的工人組織”。實質上，阿雪洛德在這篇文章中所發揮的機會主義的、取消俄國革命無產階級政黨的觀點，就是他和拉林以及其他孟塞維克還在1905到1906年他們鼓吹“工人大會”時所發揮的那種觀點。

(83) 解放報是在國外出版的，出版時期從1902年起到1905年止。該報也如革命黨底刊物一樣，是從國外秘密銷到俄國的。

(84) 道標是1909年由許多自由派作家出版的一種彙刊。其中有過去的合法馬克思主義者（司徒威、布加可夫等人）參加。在1905到1907年以後，這些作家不僅斷然離開革命（他們在過去就已離開革命），而且竟公開擁護並贊揚反動勢力。他們在道標上起來反對革命的黨和羣衆革命運動，贊揚警察式的國家，號召智識份子爲資產階級服務。

道標是證明俄國自由主義已最終地跑到斯託雷平的反動營壘中去。一切黑幫的及反動的報紙都極熱烈地慶祝道標出世。

(85) 列甯大概是指接近立憲民主黨人的進步派底代表會議，這次會議是在1912年11月24到26日舉行的。在這次會議上提出了把該派改組爲黨的問題。然而會議上有些人反對這點，他們認爲正是因爲沒有一定的政綱和沒有“不顧個性的紀律”，所以“使個別意見得以自由發表”，使得在各個問題上意見不同的許多份子都能統一在進步派的隊伍內，而保證進步派底勝利。

結果，這次會議決定，進步派以後還應該被稱爲一個派別，但在事實上，牠却改組爲以中央爲首的黨。同時亦決定要製定一個政綱。會議批准了該派底政治立場作爲以後的綱領基礎，這個政治立場是非常緩和的，是保皇派的，其中含有許多普通的自由主義的要求（改良選舉制，言論、出版、結社自由，廢除民族的和宗教的壓迫等等）。

（86）列甯稱第三國會內幾個牧師議員爲“沙布列爾神父”，這幾個人_在在國會內實行極端的黑幫的路線和反映出沙皇大臣——當時的正教總管理部總監沙布列爾底政策。列甯所謂齊莫石金之流（國會內有個右派議員叫做齊莫石金）也是指國會中的黑幫議員。

（87）列甯是指“人民社會黨人”派之脫離社會革命黨。1906年1月13號（舊歷1905年12月31日）在社會革命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俄國富源底一部份同事（壁塞浩諾夫、安甯斯基、亞苦波維赤、黃可廷）與大會底大多數破裂而退出了大會，到1906年秋天的時候，發表黨綱草案，創立“組織委員會”，正式成立了獨立的“人民社會黨”。壁塞浩諾夫及其派別堅決反對保留秘密黨，贊成公開黨，因爲依他說來，這可以把“不能吸收到秘密組織內”的人材吸收進來。壁塞浩諾夫完全明確地指出，他所謂人材主要的是指“智識人材”，這些人材，因社會革命黨保持牠的戰鬥的策略和牠的綱領，不僅是留在黨外，而且“更要壞些：他們開始很快地跑進立憲民主黨，而該黨則已不作秘密工作而走上了公開的舞台”。再則，人民社會黨人絕端反對“用奪取及游擊鬥爭方法”來實現土地綱領，主張由立憲會議來和平解決土地問題，無論牠的決議怎樣，都必須服從。人民社會黨人還反對革命專政這個思想，而社會革命黨當時還有這種思想。最後，社會革命黨政綱上有關於共和國的要求，而人民社會黨底政綱則完全把牠刪除了；這個事實，也可證明兩黨之間綱領上的分歧。

(88) 因為沙皇政府嚴格檢查社會民主黨的刊物，所以在公開雜誌上（布爾塞維克的及孟塞維克的）投稿的作者，不得不避用許多字眼和名辭而用一些暗示的話去代替。例如，不說“社會民主黨人”（這是沙皇政府出版檢查局所禁用的字眼）而說“有組織的馬克思主義者”；不說“民主共和國”而說“國家制度底完全民主化”；不說“沒收土地”而說“土地交給農民”；不說社會民主黨底基本革命口號（民主共和國、沒收土地、八小時工作制）而說“政治自由、民主制及立憲制底基本條件”等等。然而當時那些過慣沙皇政府檢查環境的讀者，很懂得這種“暗示語”，一讀到這些寓意的字樣，就知道作者的用意。

(89) 列甯這裏是指黨在1912到1913年所進行的所謂“保險運動”。當時因為工人選舉全權代表到疾病保險局，驗病委員會及總保險委員會，所以布爾塞維克就大事活動。在彼得堡及其他各城市中，保險運動完全是由布爾塞維克的秘密組織和積極參加工人公開組織的布爾塞維克領導的。在這次運動中，布爾塞維克的刊物作了最積極的參加。在布爾塞維克所起草的訓令中，除了其他各個要求之外，還提出了一個要求，要求承認由“有組織的馬克思主義者”，就是說由布爾塞維克的黨來領導保險運動。

取消派在保險運動中拚命反對布爾塞維克：否認關於必需由黨領導的要求，主張保險運動“中立”。

雖然有這樣的情形和困苦的警察壓迫的條件（在選舉前夜，彼得堡有二十個以上積極參加運動的人——多半是布爾塞維克——被捕），保險運動的進行對於布爾塞維克有了很大的成功。大多數選舉人通過了布爾塞維克的訓令，而當選為總保險委員會委員的大多數是布爾塞維克所提出的工人。在選舉彼得堡驗病委員會的時候，當選的也是布爾塞維克名單上的同志，而且還通過了布爾塞維克的訓

命。

保險運動一方面證明，工人羣衆大多數都贊成布爾塞維克而不贊成取消派；另一方面，牠做了一個榜樣，表明應當怎樣去爲局部要求（在這裏是保險事業）而鬥爭，而同時不降低革命的口號，並利用這些“局部要求”來鞏固自己對工人階級廣大羣衆的革命影響。

（90）“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全國代表會議是於1912年1月31號到2月12號在布拉加召集的。其最重要的決議案即登在這裏。在會議底召集以前，布爾塞維克曾經和自己的隊伍中的調和派，特別是和孟塞維克取消派作了長期的不屈不撓的鬥爭；這點可從本卷內列甯的黨的危機告一段落和調和派或好心人底新政派這兩篇文章以及這兩篇文章底註釋裏面看得出來。1910年中央1月全會曾特別通過一個決議，說必需召集全國黨的代表會議，但取消派則對中央決議怠工。他們極力破壞會議底一切籌備工作，故意阻撓下屆中央全會底恢復和召集。他們既在“中央國外局”內佔大多數，於是便儘量促進牠的消滅及其自行取消。

“中央國外局”內取消派的大多數底這種行爲，逼得布爾塞維克不得不與牠斷絕一切來往，而採取獨立的步驟去準備和召集全國黨代表會議。因此就成立國外組織委員會及俄國組織委員會（見本卷註釋（66及77））。雖然調和派佔多數的國外組織委員會，大大地阻礙了召集會議的工作，但是列甯派佔多數的俄國組織委員會，却在比較短促的時期內，把大多數秘密的黨的組織（孟塞維克派也在內）團結在自己周圍。而俄國組織委員會企圖把各民族社會民主黨組織（波蘭和立陶宛底社會民主黨，萊多維亞邊地底社會民主黨和猶太工人同盟）底中央機關吸收來參加自己的工作和參加牠所籌備的全國黨代表會議，這種企圖却没有成功，因爲波蘭和立陶宛底社會民主黨事

實上拒絕了這點，而且因為該黨和萊多維亞邊地底社會民主黨中央及猶太工人同盟中的取消派結了同盟。在終於因為俄國組織委員會多方努力而得以召集的布拉加代表會議上，派代表出席的有一切最重要的最老資格的黨的組織：彼得堡黨的組織、莫斯科黨的組織、中央工業區黨的組織、巴庫黨的組織、梯夫里斯黨的組織、加桑黨的組織、基輔黨的組織、沙拉託夫黨的組織以及其他許多黨的組織。此外，還有許多不能遣派代表的黨的組織，則通知這次會議，說牠們擁護這次會議。這次會議上出席的代表，布爾塞維克十八人，護黨的孟塞維克兩人，會議開了十二天，除了許多組織的問題（“俄國組織委員會”底報告，地方工作人員底報告，中央機關報編輯部底報告，建設黨的問題，黨底各中央機關底選舉等等）以外，還討論了黨內政治生活和俄國工人運動上許多最重要的問題；關於估計時局和黨底當前任務的問題，對取消派的態度問題，社會民主黨的國會工作問題，職工運動、罷工運動、保險運動問題以及其他問題。這次會議關於這一切問題所通過的決議，是由列甯校訂的，而一部份是由列甯起草的，會議底全部工作是在列甯直接領導之下進行的（會議上最重要的決議，載在本卷內，全部決議則載在列甯全集第15卷第374至395頁）。會議選出了中央，是由七個正式委員（列甯、奧爾松尼基茲及其他人）和四個候補委員組成的。會議過後不久，又選任斯大林同志及伯羅斯託茨基同志來填補中央底缺額。會議選舉列甯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駐“國際社會主義局”代表，而且會議決定亦請普列漢諾夫擔任“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駐“國際社會主義局”第二代表之職。布拉加代表會議在列甯主義底思想基礎上恢復黨和在組織上鞏固黨，布拉加代表會議底這個工作，是完成了1908到1912年中布爾塞維克與右的及左的取消主義、與托洛茨基的中派主義及與布爾塞維克個別份子底調

和主義所作的那種不屈不撓的鬥爭，這樣就消滅了1910到1911年的“黨內危機”。同時，這次代表會議，在組織上最終地與“俄國社會民主黨”內的機會主義者及調和派的中派主義者正式作了破裂，作了分裂如斯大林同志所說的那樣，布爾塞維克“在帝國主義大戰以前很久”（1903到1912年）就實行了這種破裂，這種分裂，同時就進行了“與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者及中派主義者實行破裂的路線，實行分裂的路線”（見列甯主義問題第606頁，1932年版）。布拉加代表會議在我黨歷史上的全部偉大的政治意義，首先就在這裏。我們的黨在列甯底領導之下，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一產生時就採取了這樣一條與機會主義作分裂的路線。布拉加代表會議對於布爾塞維主義之爭得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底領導作用，其偉大的政治意義也在這裏。

（91）1910年起，國內驟然表現出革命的活躍，工人運動顯然表現出起初是“慢得不堪設想的，後來在1912年列甯事件以後就快了一些的”高漲（列甯）。因為經濟危機、失業、生活昂貴、農民大批挨餓（這是由沙皇政府底土地政策所必然引起的），因為資產階級的地主的反動勢力向工人階級進攻，於是就發生1910到1911年的罷工，這些罷工後來在1912年，因為列拿事件而轉變為廣大的羣衆的罷工運動，同時在學生中間也表現出革命的活躍，海陸軍隊當中的革命風潮也恢復起來。

在這些條件之下，1912年全國代表會議除恢復和鞏固在反動年代已經削弱和破壞的黨的聯繫之外，還有一個基本任務，即確定明確的政治綱領，使得到代表會議開幕時已經表現出的那種工人運動新高漲帶有革命的性質。布拉加代表會議論目前時局與黨底任務的決議實質上也就是這樣一種綱領。

(92) 1912年布拉加代表會議關於取消主義與取消派的決議案，完成了與黨內取消派四年的鬥爭。列甯認為與取消派的意見分歧不是個別問題上的意見分歧，不只是組織問題（怎樣建設黨的問題）上的意見分歧，而是關於黨本身的生存問題的意見分歧。列甯寫道：“這裏根本談不到什麼調和，什麼妥協”。其所以能夠與各種取消派作徹底的組織上的破裂者，不僅是因為在黨內作了多年的鬥爭，在黨內克服了取消主義，而且還因為與取消派作過持久的鬥爭來爭取對工人非黨公開團體的領導。1912年的罷工運動和遊行示威，捐款資助工人報紙的運動，保險機關底選舉，工會底選舉等等，是一些好的證據，證明布拉加代表會議關於取消派的決議是正確的和及時的，因為牠們證明了俄國黨內和職工會內的工人們大多數是擁護布爾塞維克的。

(93) 列甯在其共產主義中的“左派”幼稚病這部著作裏面（1920年寫的）估計我們的黨所經過的各階段時，關於新高漲底年代這樣寫過：“布爾塞維克克服各種空前的困難而排擠了孟塞維克；孟塞維克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代辦，這一點在1905年以後，整個資產階級都很懂得，所以整個資產階級都千方百計地贊助孟塞維克去反對布爾塞維克。如果布爾塞維克沒有進行正確的政策，即沒有把公開工作和必須利用“公開可能”這一點配合起來，那他們就永遠不能達到這一點。”（見列甯全集第25卷第177頁）

秘密工作和公開工作底這一種配合，會須要這樣來建設下級黨部，務使這種建設同時能夠保障直接在企業工人羣衆中的影響和黨在各種公開及半公開的工人組織內的影響。1908年的12月代表會議，就已討論了這些問題並指出在各企業裏和各工會、各工人俱樂部、各工人文化團體等等裏，到處必須成立黨的秘密支部。1908到

1911年的經驗完全證明了1908年代表會議底這些指示是正確的，而且1912年的布拉加代表會議，在其論黨工作底性質和組織形式的決議案中，根據這個經驗而實行1908年代表會議所指出的那條組織路線。而且，1912年的布拉加代表會議，認為必須繼續發展企業、工會等等裏面黨的秘密支部，把這一點與黨應領導已經掀起的罷工運動的這個任務聯繫起來。

1912到1913年工人運動底新高漲迅速地和廣泛地增長起來，這會須要更確切的組織上的指示，以便保證黨的下級支部與黨底領導機關有穩固的聯繫並保證對這種新高漲的領導得能一致。因此在1912年的布拉加代表會議以後，中央連同黨的工作人員又開過兩次會議來討論組織問題：一次是在1912年12月間在克拉可夫（從前屬於奧地利）召集的，另一次是在1913年10月間，在波龍甯（克拉可夫附近）召集的（為保守秘密起見，第一次會議祇稱為“2月”會議，而第二次會議則被稱為“夏季”會議或“8月”會議）。這兩次會議底決議都是從1908年黨的代表會議和1912年黨的代表會議底指示出發的，而且第一次會議會規定這樣來建設黨：在工廠裏面成立純黨的工廠委員會作為下層組織。統一這些工廠委員會並領導牠們工作的是全市黨委員會，全市黨委員會又被在工人運動各主要區域成立起來的省黨部所統一起來並受省黨部底領導。省黨部使黨的地方組織與統一及領導全黨工作的中央聯繫起來。為着使中央更能與地方組織有密切的和靈活的聯繫起見，就成立“信託人底系統”。這些人是由地方上的社會民主黨人集團從領導地方工作的工人領導者當中提拔出來的。克拉可夫會議關於“秘密組織的建設”的決議案，對於這點說道：只有先進的工人們用自己本身的力量才能够鞏固黨在地方上以及全俄各地的中心機關。

1913年的波龍甯會議，再度地指出：第一，必須“不僅要鞏固各城市裏的領導黨部，而且要把各個別城市彼此統一起來，就是說，必須要成立省黨部；第二，必須擴充信託人底系統，這種系統，在那個時候“還剛開始應用於實際。”波龍甯會議底決議案說道：“各地先進的工人們到處應當關心到，至少要在工人運動底各大中心城市裏面提拔出儘多的信託人來。”

(94) 革命的高漲——這篇文章登在1912年6月17號社會民主黨人第27期上。1912年4月17號列拿慘案發生以後，就爆發了羣衆的革命工人運動：列甯這篇文章是第一次說明這次運動的意思和意義的。列拿是伊爾庫次克省北部的一個金礦區，是由金礦公司採辦的。工人在金礦內過着非常痛苦的牛馬生活，於是開始罷工，初起（還在3月初的時候）是在一個金礦內，後來蔓延到一切金礦內。罷工是由工人選出的罷工委員會領導的，是經濟的罷工，很有組織性，同時又很和平。列拿金礦公司向彼得堡中央政府請求拿出辦法來對付工人，於是政府便命令憲兵當局去消滅罷工。憲兵逮捕了罷工委員。工人決定到地方副檢察廳長那裏去請求釋放被捕的同志，於是大批出發。走到半路上，遇到了憲兵司令官特列斯科手下憲兵底連發掃射。手無寸鐵的工人，死者270人，傷者250人，槍殺後，還繼續捉拿“禍首”，後來又將工人逐出金礦。堅持甚久的罷工，就此被當局所撲滅了，公司方面獲得勝利。可是列拿慘案的消息，震動了全國的工人。在4月整整一個月內，各工業區繼續發生罷工，遊行示威，表示抗議，後來又與盛大的五一運動相匯合。1912年便變成罷工浪潮高漲的一年了。依工廠檢查處底記載，這年罷工共2032次，參加人數共725000人。運動最激烈的時期是在列拿慘案一發生以後（4、5月）。羣衆罷工，羣衆大會，示威遊行，都是在布爾塞維克澈底的革命口號之下進

行的。這次運動底規模既如此偉大，於是在1905年到1907年的革命以後，武裝暴動底準備又重新成爲迫切的任務。這實質上就是新革命底開始。這些事件底意思就在這裏。這個意思被取消派和託洛茨基所曲解：他們稱這次運動爲孤注一擲的罷工運動，他們所極力供獻給“工人們”的，不是革命的口號而是“結合自由”（即是在沙皇統治之下的結社罷工自由）的口號。列甯在這篇文章內以及以後寫的其他許多也是論述1912年春季運動的文章內（如取消派反對革命的羣衆罷工，1912年1月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全國代表會議底口號與五一運動——參看列甯全集第15卷第539至543頁），一方面估計運動，同時還打擊取消派及託洛茨基，認爲他們是熄滅又在開始的革命火焰的人。他們根據這些事件，便斷定布爾塞維克黨在這次運動中顯然有了影響和起了組織者底作用，並認爲正在增長的工人運動是證實布拉加代表會議決議之正確。列甯在1913年寫的革命的罷工和遊行示威底發展這篇文章，給1912年的運動作了這樣一個總結：“1912年俄國工人底革命罷工簡直是帶有全民的性質。因爲，所謂全民運動，並不就是整個資產階級或至少是自由派資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條件之下）所贊成的那種運動。只有機會主義者才這樣觀察問題。不。所謂全民運動，就是這樣一種運動，這種運動表現全國客觀的需要，用自己的主力去打擊妨礙國家發展的那種敵人底主力。所謂全民運動，就是絕大多數人民的同情心所贊成的運動。這一年所發生的爲全體勞動者及被剝削者、全體民主份子（不管他們是怎樣的軟弱、愚昧、被蹂躪、無辦法）底同情心所贊助的工人政治運動，正就是如此。”（見列甯全集第16卷第241頁）

（95）1905到1907年革命被摧殘以後，在1910年下半年，在已經開始的工人運動和罷工鬥爭底高漲基礎上，學生及一般小資產階級

民主派底革命情緒及革命活動，也第一次活躍起來了。這種革命高漲底顯明標誌之一，就是在1910年，除了夏季罷工以外，還因第一國會議長謨郎切夫及託爾斯泰之死而有11月之遊行示威。同時在各個有大學的城市內，到處有學生集會，反政府的示威及抗議，反對專制政府對高級學校的反動政策，反對窩洛達格、西連圖等地牢獄內的殘暴及對革命家的虐待。

列甯在示威運動底開端一文中估計這遊行示威底意義時寫道：

“無產階級開了端。其他的、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的階級和階層，繼續幹下去。反對民主主義的溫和自由派，第一國會議長謨郎切夫之死，使遊行有了第一次的畏縮的開端。托爾斯泰之死，引起了——這是經過長期停頓之後的第一次——遊行示威，參加者主要的是學生界，但局部地也有工人。許多工廠在埋葬托爾斯泰那一天停止了工作，這表明示威式的罷工有了開端，雖然是渺小的開端。

沙皇管監者在窩洛達格、西連圖等地虐待我們受徒刑的同志（因為他們在革命中作了英勇專業），沙皇管監者這種暴行，最近更使學生大抱不平。俄國各處舉行羣衆大會，警察闖入大學校舍，拷打學生、拘捕他們，凡關於風潮稍講一點真話的報紙都被取締，這一切情形只是使風潮加厲。

無產階級開了端，民主派的青年繼續幹下去。俄國人民正在覺醒過來去作新的鬥爭，去迎接新的革命。”（參看列甯全集第14卷第392至393頁）

（96）列甯這裏所指的是加米業夫底列拿慘案及六三帝制這篇文章。

（97）列甯所說的這篇宣言，是在1912年五一節之前夜，在

彼得堡刊印的。署名的是彼得堡全體有組織的工人們代表，統一社會民主黨人小組，中央城區社會民主黨人小組，社會革命黨的工人小組，彼得堡社會民主黨的工人小組及各五一委員會代表。宣言開始指出，“最近一年來，罷工運動大大高漲”，“列拿慘案之消息一傳出後，正當的義憤就自發地爆發出來”，結尾的口號就是不久以前（1912年1月）俄國社會民主黨布拉加全國代表會議所提出來的，——推翻沙皇專制制度，沒收地主土地，八小時工作制和民主共和國。列甯在1912年1月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全國代表會議底口號與五一運動這篇文章中寫道：“對於這篇宣言極其值得研究一下，因為牠是俄國工人運動史上和我們黨史上的一個極重要的文件……。這篇宣言上署名的各小組、各代表等等，——這正是自由派及取消派所仇恨的秘密工作者……。我們從這個可以作為教訓的文件中看到：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代表會議所提出的一切口號，已經被彼得堡無產階級所採納了，而且成了新的俄國革命底第一步。百般誹謗和攻擊1月代表會議的人們，可以隨便同誰去繼續自己的醜惡事情。彼得堡無產階級已經給了他們一個回答。號召無產階級去做人民革命底領袖的革命社會民主黨，在布拉加代表會議很久以前所曾進行的那種工作，不管警察如何壓迫，不管五一節前夜如何拘捕及摧殘革命者，不管自由派及取消派的報紙如何造謠謾罵，可是終究獲得了成績”（參看列甯全集第15卷第539至541頁）。

（98）列拿慘案以後，全國各處大起抗議，革命情緒高漲，沙皇政府為平定人心和制止風潮起見，特派參議員馬奴興（前任司法總長）調查列拿事件。政府在其授予馬奴興的訓令中，給馬奴興定出下列的任務：

“責令國務會議委員、參議員、秘密顧問馬奴興調查列拿金

鐵罷工底一切詳情以及罷工發生的原因”。

這樣看來，這個訓令實際上是抹煞了槍殺問題，而專注意到罷工問題。馬奴興完全依照這個訓令而行事，他一到列拿，就向工人提議停止罷工和開始工作，企圖充當罷工者與列拿金鐵公司間的調解人，可是馬奴興底這個企圖卻沒有什麼結果。暫行停止的罷工，因為列拿金鐵公司不肯提高工資和不肯減少工作時間而又很快地重新恢復了，罷工幾星期，結果五千工人離去了鐵山。

(99) 沙皇政府內務總長馬卡洛夫，在1912年4月24號國會中講到列拿事件的時候說道：“失去理智的羣衆，受了惡意的煽動家底影響，而向軍隊撲去，那時軍隊只有開槍對付。過去這樣，以後也要這樣”。

(100) 因第四國會選舉之逼近，又因萊多維亞社會民主黨中央請求“德國社會民主黨管理委員會”在當前選舉運動中給牠以物質上的幫助，“德國社會民主黨管理委員會”答應津貼“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八萬馬克的選舉費；同時，又提出一定的條件：(1) 這筆款子只能供選舉運動底需要，(2) 這筆款子只能用在不致於提出“雙重選舉名單”的地方，即是不至於提出黨內各派底候選人的地方，(3)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各組織底代表事先商定款子底分配手續，(4) 非選信託的人，向“德國社會民主黨管理委員會”負款項用途之責。

“萊多維亞社會民主黨國外委員會”把這個消息通知布爾塞維克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通知波蘭、立陶宛社會民主黨總管理委員會及社會民主黨人呼聲報編輯部，請牠們派代表到不律塞爾去參加1912年5月31號分配款子的會議。於是取消派與託洛茨基就極力運動，使取消派的“組織委員會”取得與“德國社會民主黨管理委員會”的談判權，使“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不得參加款子的分配。耳

消派的組織委員會便委派託洛茨基和“德國社會民主黨管理委員會”談判。5月31號不律塞爾會議沒有開成，於是“萊多維亞社會民主黨國外委員會”直接向“德國社會民主黨管理委員會”提議由管理委員會自己來召集11個“中心”：取消派的組織委員會，也是取消派的高加索區委員會，取消派的社會民主黨人呼聲報編輯部，“前進社”，託洛茨基底維也納真理報，普列漢諾夫底社會民主黨人日記，“布爾塞維克護黨派”（調和派），“猶太工人同盟”，“萊多維亞社會民主黨中央”，“波蘭、立陶宛社會民主黨總管理委員會”和“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德國社會民主黨管理委員會”便把這個提議分發給以上各機關，並邀請他們（如果他們同意）在1912年9月18號以前派代表到柏林去。這封信便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對“德國社會民主黨管理委員會”底提議及“萊多維亞社會民主黨國外委員會”底計劃所給的回答。這信是1912年8月11號到12號由列甯寫就的。當時出版的時候附有一篇短的序言和結論（用單行本出版的，標題為論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現狀），信中說明布爾塞維克中央為何拒絕參加會議，並敘述“俄國社...主黨”底實際狀況。

除“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底布爾塞維克中央之外，波蘭、立陶宛社會民主黨總管理委員會及普列漢諾夫也都拒絕參加會議。因此，德國社會民主黨管理委員會將預定召集的會議取消，同時通知各被邀請的“中心”說，牠還是保留自己的決定，不將款子交給單個的集團，而同意將款子交給大家所信仰的人去領取和分配。列甯所寫的並由“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機關報社會民主黨人編輯部署名發表的補充書，就是要揭破“管理委員會”底這種似是而非的中立態度，“管理委員會”因為同情於取消派之造謠誣蔑，而不肯幫助“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及其中央。

(101) “Vorwärts” 中的匿名者和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底實況，這篇文章是列甯作的。當時德國社會民主黨機關報前進報上登有託洛茨基關於1912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拉加代表會議”的文章，所以黨底中央機關報社會民主黨人便作了這個回答。託洛茨基這篇文章鄒度布爾塞維克，並斷定，這次會議不能算作全黨的，因為他只是代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一派（即列甯派）底主張。託洛茨基這篇文章標題為俄國黨內生活一瞥，登在前進報關於布拉加代表會議的正式消息的後面，作為這個消息底評註，但沒有註明作者底姓名。列甯為使德國社會民主黨人能正確了解俄國事件起見，便作了這一個回答，把會議以前黨內鬥爭底基本要點及階段，作了一番詳細的估計，並說明會議以後的狀況。

這個回答雖然帶有正式的性質（有黨底中央機關報編輯部署名），可是前進報編輯部竟拒絕登載。因此社會民主黨人編輯部便把牠印成了德文，用單行本出版，分發給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各級黨部。

“Vorwärts”中的匿名者和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實況這本小冊子載在列甯全集第15卷第419到431頁。

(102) 列甯這裏所指的一次會議是1912年1月在俄國一個城市內召集的，是由“猶太工人同盟”及萊多維亞社會民主黨中央發起的。除了這些組織底代表們以外，取消派的高加索區黨部底代表及波蘭、立陶宛社會民主黨底代表也參加了這次會議。該會議反對布爾塞維克的“俄國組織委員會”及牠所召集的布拉加代表會議。牠另外組織自己的“組織委員會”（參看本卷註釋(77)）來擔任召集“全黨的”代表會議（因在這個“組織委員會”成份問題上發生爭執，波蘭、立陶宛社會民主黨底代表便退出了會議）。該會議所通過的決議，委託“組

織委員會”向“俄國組織委員會”提議，開始談判共同召集“全黨”代表會議的問題，而在“俄國組織委員會”拒絕這點的時候便“直接向組成‘俄國組織委員會’的各集團提議”。同時該會議在關於會議工作的正式紀錄中，責備“俄國組織委員會”自尊自大，造成黨內的分裂，對黨起“腐化影響”，並深信該會議所建立的“組織委員會”，“將從凡是主張保持吾黨一致和再不能容忍政派主義傾軋環境”的人們方面得到堅決的贊助”。

同意“組織委員會”底信及其關於派遣代表參加籌備“全黨”代表會議的提議，只有顯然是機會主義的反黨的、事實上站在黨外的集團：託洛茨基派（託洛茨基在維也納辦的真理報編輯部），“前進社”，社會民主黨人呼聲等等。想吸收孟塞維克護黨派去參加的企圖，結果沒有成功。“組織委員會”曾兩次請求其參加的普列漢諾夫，把所召集的會議視為取消主義的會議，又把選出“組織委員會”的這次會議底參加人稱為取消派。在“組織委員會”頭幾次會議中的一次會議上，關於當時在布拉加召集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代表會議通過了一個決議。這個決議斥責布爾塞維克，說他們實行“政變”，把持“黨的旗幟”，故意使黨分裂，同時該決議號召“各級黨部”堅決抗議，反對這次已經實行的變革，不承認在布拉加代表會議上選出的各中心機關並用參加“組織委員會”所召集的全黨代表會議這個辦法來竭力“幫助恢復黨的統一”。1912年8月“組織委員會”所召集的這次“全黨”代表會議實際上就是取消派的反黨的各個大小集團底代表會議，這些集團在這次會議上組織了所謂布爾塞維克“8月”同盟（參看本卷註釋（109））。

（103）在關於託洛茨基底維也納真理報行將出版的廣告中以及在1908年末出版的兩期真理報上，載有一個消息，說該報是烏克蘭

社會民主黨“司比爾克”底機關報。這個消息底根據就是：“司比爾克”底國外委員會以及“司比爾克”底幾個地方組織，向託洛茨基表示同意把維也納的真理報稱為“司比爾克”底機關報。然而，該報編輯部却沒有得到“司比爾克總委員會”底正式的委任狀，同時“司比爾克”底幾個地方組織又提出抗議，於是託洛茨基便不能不從真理報第三期起就不稱該報為“司比爾克”底機關報。結果，維也納的真理報就成了以託洛茨基為首的一部份接近黨的著作家底私人機關報，這班人與“俄國社會民主黨”底任何黨的組織都沒有穩固的聯繫。

(104) 調和派的布爾塞維克會稱自己為“護黨的布爾塞維克”。關於“護黨的布爾塞維克”參看本卷內論調和派或好心人底新政派一文（參看本卷第92到113頁及註釋(63)）。

(105) 第三國會內的社會民主黨黨團中，有兩個人經常在取消派底活事報上投稿，這就是阿斯特拉漢切夫和古士業超夫。伯洛烏索夫在其未退出社會民主黨黨團以前，也參加了這個取消派機關報底工作。所謂社會民主黨黨團裏面參加布爾塞維克的反取消派的明星報工作的八人團，是由瓦依洛士尼可夫、葉哥洛夫、波克洛夫斯基、普列德卡林、列達也夫、查哈洛夫、伏龍甯及蘇爾可夫組成的。社會民主黨黨團中的兩個議員——齊夷芝和格吉却可里——在第三國會時期中沒有參加取消派刊物底工作，也沒有參加反取消派的刊物底工作，而有一個議員——蘇爾加諾夫——則既參加取消派刊物底工作，又參加反取消派的刊物底工作。在第三國會裏的社會民主黨黨團中，參加布爾塞維克明星報工作的人顯然是佔多數，這是因為黨團底大多數，如列甯所指出的一樣，是由“護黨的孟塞維克”，就是說是由贊助普列漢諾夫去反對取消主義的人組成的。

(106) 1913年秋，打算在維也納召集國際社會黨大會。“俄國

社會民主工黨”中央打算在國際大會上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的情況和“德國社會民主黨管理委員會”及其中央機關報前進報之幫助取消派，因為該報贊助對德國社會民主黨散佈關於俄國問題的不正確的消息。還打算在國際大會以前召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代表大會或代表會議來事先討論這些問題。黨底中央曾擬定了籌備代表大會的計劃並規定了大會底議事日程。黨的代表大會或代表會議以及維也納國際大會，當時都沒有召集成功。

(107) 改良派底綱領和革命社會民主黨人底綱領一文，是在第四國會選舉時寫的，1912年11月18號登在社會民主黨人 28、29合期上。列甯在這篇文章內把選舉前布爾塞維克中央所發出的宣言與孟塞維克取消派的“組織委員會”(參看本卷註釋(109))所發出的宣言拿來對照。他根據這個對照而指出：取消派在自己的政策中做自由派底尾巴，他們不提出革命的綱領(雖然革命已在高漲)而提出在沙皇政體下作立憲改良的綱領。而託洛茨基則做取消派底尾巴，用許多“革命的辭句”來掩飾這個自由派的綱領。

取消派底選舉綱領及策略是以所謂“兩個營壘的理論”為基礎的。這個理論底實質是在：在他們看來，在那時期，俄國只有兩個營壘互相鬥爭：一個是農奴主、地主的營壘，另一個是自由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及農民底統一營壘。第二個營壘主張保留並改良憲法，而第一個營壘則反對。取消派既是這樣估計政治鬥爭底性質和內容，於是就做出結論，說必需與立憲民主黨(即自由資產階級)訂立聯盟，來爭取憲法，反對黑幫的危險，並反對布爾塞維克之“仇恨立憲民主黨的態度”——就是說，反對布爾塞維克之批評立憲民主黨人底反革命性。

布爾塞維克則與取消派底這個策略和取消派關於兩個營壘的理論相反，他們對於為什麼而進行鬥爭的問題這樣回答：鬥爭之進行並

不是爲着立憲的問題，而是爲要用革命道路而不是用改良道路來改造俄國。布爾塞維克說：參加選擇某條道路的鬥爭的，不是兩個而是三個營壘：（1）農奴主、地主底營壘，（2）自由主義君主派的資產階級底營壘及（3）無產階級與農民底營壘。而且，前兩個營壘已經彼此聯合起來反對第三個營壘，因爲這第三個營壘極力要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幹到底，要以革命手段來打破貴族地主的制度。布爾塞維克由此便定出自己的“左派聯盟”的策略，即是無產階級與農民主派，社會民主黨與勞動派，在選舉第四國會時訂立聯盟的策略。這樣看來，布爾塞維克的國會策略，就是列甯關於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奪取領導權及其與農民聯合的舊思想在新環境中之澈底發展和運用，而取消派在選舉國會時的立場，却是孟塞維克關於自由資產階級在解放運動中應得領導權的思想之完成。

（108）在土耳其斯坦、波羅的海艦隊及黑海艦隊中海陸兵士底暴動和暴動企圖，曾發生於1912年春夏兩季。1912年7月14號，在駐紮於塔什干附近託洛伊茨克村的軍營內，發生工兵暴動。暴動是由兩營工兵幹起來的，其原因就是不滿意於軍紀之嚴格，軍官之虐待，飲食之惡劣，野營生活之異常痛苦，軍役之苦楚及軍役期限之長久等等。至於暴動底目的，則照暴動參加人所說的有如下幾點：“應當幹暴動來縮短服役期限，來改良飲食及改變長官對士兵的待遇”。在暴動前底幾個月內，軍營內就開始了熱烈的革命的鼓動及對暴動的準備，集衆開秘密大會，散發傳單反對向官長行禮致敬，會議參加人議論紛紛，說俄國“要像中國那樣幹”，就是說要像中國辛亥革命那樣推翻專制和建立民國。暴動底發起人當中，有些人在過去也參加過革命運動，這班發起人與塔什干的革命的軍事組織有聯繫。但是這種聯繫是薄弱的和偶然的。暴動者沒有明白確定的計劃。結果，暴動帶着極

其無組織的性質，弄成自發的騷擾和騷動，沒有必要的領導。暴動者把士兵們所最痛恨的幾個軍官殺了以後，就沒有採取進一步的有組織的行動，只是向那些還忠實於野營長官的部隊亂開了幾槍。雙方開了幾槍以後，暴動就被壓服下去了，而參加暴動的人也被捕了 223 人，根據“軍事時期底法律和期限”而提交法庭懲辦。府立軍事法庭底判決如下：14 人受無期徒刑，94 人受有期徒刑，期限不等，81 人坐看守所，15 人編入悔過營，7 人被宣佈無罪。

波羅的海艦隊（‘流里克’巡洋艦，‘車沙列維赤’無畏艦以及其他各艦）和黑海艦隊（‘堯安司拉道斯特’鐵甲艦及其他各艦）的暴動企圖，和土耳其斯坦工兵底暴動比較，其組織性要强得多。在準備暴動的海員中間，曾有戰鬥的革命的組織，其中並有一些布爾塞維克參加。暴動底組織者製定了一定的在政治方面、軍事組織方面都考慮過的發動計劃，這個計劃指望於和陸軍兵士及工人發生聯繫並得到他們的幫助。可是，暗探局和軍事當局底干涉，搜查與逮捕，阻礙了計劃底實現。7 月初開審的海軍法庭，其判決如下：波羅的海暴動準備案犯共 52 人，大部份被判決徒刑，黑海艦隊暴動案犯 15 人，3 人被殺，其餘被判決徒刑。

土耳其斯坦、克龍什塔及塞瓦斯託堡底各種事變，引起了無產階級革命份子大大的同情，他們舉行許多罷工和遊行示威來對付摧殘暴動者的行動；這些事變引起了社會民主黨報紙底注意。布爾塞維克的報紙，把這些事變估計為海陸軍隊中與工人運動新高漲有關的那種革命情緒增長底表現，並指出：對暴動必需作更其周到的準備。反之，孟塞維克取消派及託洛茨基派却把這些暴動企圖看作明知會失敗的一種絕望的表現，而且甚至公開斥責了牠們。

例如，1912 年 8 月在維也納舉行的取消派代表會議（參看本卷註

釋(109) 在特別關於最近海陸軍隊中的事變的決議中，認為“必需使同志們注意到：凡是與民衆運動隔離的海陸軍隊中的一切爆發和軍事暴動企圖，都是不希望有的而且是極其危險的。”

(109) 列甯這裏是指“取消派代表會議”，這次會議是爲對抗布爾塞維克底布拉加代表會議而召集的。這是由於註釋(102)內所說的那次會議底結果，並由這次會議上所選出的“組織委員會”所召集的。這次會議底主要組織者和領導者，就是託洛茨基。託洛茨基站了中派主義的、就是說用革命辭句來掩飾的機會主義的——對於當時是取消主義的——立場，其目的就是：召集這次代表會議，以便在自己的中派主義的領導之下建立一切反布爾塞維主義的各個大小集團底聯盟，這樣去和布爾塞維克黨對立並和牠鬥爭。會議舉行於維也納，是在1912年8月舉行的。除召集了這次會議的各組織：“組織委員會”、孟塞維克的社會民主黨人呼聲、維也納的真理報（託洛茨基本人）、猶太工人同盟、萊多維亞社會民主黨人、“司比爾克”國外委員會和彼得堡取消派的報紙尼瓦呼聲以外，出席這次會議的祇有俄國的八個取消派的集團，而且這些地方上的、一部份簡直是虛空的組織底代表，手段玩的太笨了，連資格審查委員會底主席也不得不在會議上聲明，“他們的委任狀一張也不可信的”。前進派也被請去參加代表會議，可是他們的代表亞力克新斯基在開會的第一天就退出了會議，後來還在報上揭露，這次會議底“成份是虛假的”。孟塞維克護黨派（普列漢諾夫派），也被邀請參加會議，可是作了拒絕。這麼一來，參加會議的祇有各式各樣的由於共同仇恨布爾塞維主義而聯合起來的取消派及其擁護者：

取消派底代表會議，用自己的取消派的政治綱領來和布爾塞維克在布拉加代表會議上所通過的政治綱領對立，在取消派的政治綱

領中，像在‘組織委員會’底選舉綱領中一樣，“取消派的實質”會“爲託洛茨基底革命辭句精巧地掩飾着”。

取消派代表會議，在自己的決議案中完全放棄了民主共和國的口號，不把牠當作當前的口號，而代以國會全權及實行普選這個自由派的口號。牠也用‘重新審查第三國會土地法案’這個自由派的要求來代替沒收土地這個革命的口號。再則，牠完全拒絕了用全民武裝代替常備軍的這個綱領式的要求。在關於選舉第四國會的問題上，牠贊助了自由派的候選人（和立憲民主黨人結同盟）。在組織問題上，取消派代表會議，也走上了取消派的道路，因爲牠主張必需‘改革社會民主黨’和必需使黨的組織“適應”於公開的工人運動底新形式及新方法。

在這次代表會議上所形成的反布爾塞維克聯盟，是由這次代表會議新選出的“組織委員會”領導的。然而這個聯盟很快便開始瓦解了。必然引起這種瓦解的原因，就是該同盟底“臭爛的無原則性”（斯大林），牠的取消主義實質及和取消主義實質相適當的那種取消主義的政治立場，這種“臭爛的無原則性”，取消主義的實質及取消主義的政治綱領，會由列甯及布爾塞維克黨所揭穿，而且和新的革命高漲底性質及任務是全不相容的。引起這種瓦解的第二個原因，就是整個聯盟及加入該聯盟的各個派別，與工人羣衆完全隔離，並爲這些完全擁護布拉加代表會議所提出的布爾塞維主義革命口號的工人羣衆所藐視。關於這個聯盟如何瓦解了的過程，讀者可參看本卷內論高城統一而實則破壞統一的行爲一文（第三章：論8月聯盟底瓦解，第201到204頁）。

（110）參議院——這是沙皇時代最高的政府機關之一。牠的職務之一就是在解釋和說明法律（尤其是在以終審資格審察案件的

時候)。參議院解釋法律是隨心所欲的。在政府須要這樣做的時候，參議院就把那些已於沙皇統治不利的法律解釋得全無效力。

(111) 託洛茨基在取消派代表會議上用“外交手段”把取消派觀點與黨的觀點調和起來的這種把戲，是從當時託洛茨基所站的中派主義的立場中產生的，在這個立場中，當時就已表現出了託洛茨基主義底那種已經完全確定的實質。斯大林同志在黨底第16次代表大會上說明了託洛茨基主義底實質（本卷註釋（21）內引了斯大林同志底話）。用“左的”革命辭句來掩飾投降主義，高談“左的辭句”，實行右的事情，即擁護取消主義的事情，並以爭取黨底統一和工人運動底統一為名義來擁護取消主義反對布爾塞維主義，——託洛茨基在反動時期和新高漲時期中，尤其是在1912年取消派8月會議上，其中派主義的“外交式的”調和主義之實質，就是如此。託洛茨基底這個中派主義，就在那個時候就隱藏了取消主義所含有的反革命成份——這個中派主義，如那時候的考茨基中派主義一樣，和他們兩人在帝國主義大戰年代的中派主義（暗藏的社會國家主義）一樣，就在那個時候就是託洛茨基到1927至1928年走盡了頭的那條從革命營壘走到現代資產階級反革命營壘底道路中的一個階段。大家知道，“左得不合邏輯的”——列甯的說法（見本卷第213頁）——託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在當時是一個重要的“左的”屏障，用以掩飾託洛茨基主義走入資產階級革命營壘的這條道路，掩飾託洛茨基主義之變為資產階級反革命底先進隊伍。應當指出一點，就是託洛茨基在其擁護中派的取消主義的年代（反動時期及新高漲時期），也仍舊用這個理論作掩飾。

(112) 列甯底論高喊統一而實則破壞統一的行為這篇文章，寫於1914年5月，就是說，在1912年布拉加代表會議以後經過兩年多

的時候。各種取消派底及中派底反黨的大小集團，當時既被真正統一的而且是布爾塞維主義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所拋棄，既與工人運動相隔離，既在“8月聯盟”瓦解以後（就是說，在託洛茨基及其同伴想用這個聯盟來建立反布爾塞維克的取消派的有其中派主義領導的黨的這個企圖破產以後）重新四分五裂，於是就有延殘喘，往往祇有虛名，或者只是託洛茨基底一個中派主義集團，一部份黨外的著作家底集團。列甯在本卷第1章裏指出，在這樣的條件之下，說什麼“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裏有“政派主義”和“政派主義”鬥爭，這就是“違背”真情。當時的鬥爭，是統一的布爾塞維主義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反對黨外機會主義者及中派主義者派別的鬥爭，是這些派別反對統一的布爾塞維主義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鬥爭。然而，這並沒有妨礙暗藏的中派主義取消派託洛茨基仍舊在自己的雜誌上（他在“8月聯盟”瓦解以後就創辦了“非政派主義的工人雜誌”鬥爭）呼喊什麼布爾塞維克有“政派主義”和“分裂主義”。託洛茨基以自己假的“非政派主義”自傲，假仁假義地用黨內統一的口號來掩飾自己，豈知這個口號事實上已由布爾塞維克用那種無產階級革命黨所唯一可取的形式來實行了，這種形式就是：不要取消派和不要中派主義者而實現統一；託洛茨基利用這個口號去謀取消派的方便，這樣一來，他就仍舊站在自己中派主義的立場上，即以“左的辭句”為掩飾而擁護取消主義，反對布爾塞維主義，宣佈取消主義的觀點。

列甯底這篇文章，也就是揭穿託洛茨基在新環境中的這個舊有的反黨立場底實質，這種新環境是由兩年以前的布拉加代表會議所造成的，並由這次會議以後的“8月聯盟”底形成及破產所造成的。這篇文章，同時對於託洛茨基底政治面目及其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過去所起的作用，也做了一個總的估計。

(113) 列甯這裏是指1913年末及1914年初。布爾塞維克的公開雜誌教育編輯部在該雜誌讀者中間舉行填寫調查表，其目的是要查明：讀者所最感受興趣的是那些問題和他們對雜誌及其各欄的態度如何。共收到四十五封回信，參加的共143人。對這些調查表詳細分析（1914年3月的第3期教育雜誌上，特載有我們的調查表一文，作了這種分析）指出來，雜誌讀者最感受興趣的問題是關於布爾塞維克和取消派、護黨的孟塞維克及其他各派意見分歧底實際問題。同時在許多調查表中，讀者希望教育雜誌編輯部做些文章來解釋這些分歧底歷史根源，說明“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過去的鬥爭，機會主義在俄國工人運動中的發展等等。

(114) 關於這裏所例舉的那願意把自己列入同一個社會民主黨的“五個俄國政派”或集團，讀者可從本卷下列各文中知其底細：

(1) 關於“前進派”——參看列甯底政論家底時評一文第一章論召回主義底贊助者和擁護者之綱領（見本卷第24到34頁）及本卷註釋21。前進派有兩批人，一批在日內瓦，另一批則在巴黎，其實他們彼此的意見是一致的，不過彼此之間的聯繫很少。(2) 關於託洛茨基派，——除列甯底這篇文章以外還請參看政論家底時評一文第二章我們黨內“統一的危機”（見本卷第34到36頁）及本卷註釋21，並請參看論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的現狀一文及改良派底綱領和革命社會民主黨人底綱領一文（見本卷第181到190頁）。託洛茨基派起初組織在維也納的真理報周圍，而後來在“8月聯盟”（參看本卷註釋109）瓦解以後就組織在鬥爭雜誌周圍。(3) 關於“布爾塞維克護黨派”（即調和派），——參看列甯底論調和派或好心人底新政派一文（見本卷第92到113頁）及本卷註釋63。(4) 關於“孟塞維克護黨派”，請參看我們黨內統一的危機一文（第七章論護黨的

孟塞維主義和對牠的估計——見本卷第 19 至 6 頁)及本卷註釋 (15)。以普列漢諾夫爲首的“孟塞維克護黨派”，和布爾塞維克一塊兒作過鬥爭來反對取消主義並在布爾塞維克的報上投過稿，但同時他們却站了獨樹一幟的“非政派主義的”(他們自己這樣說)立場，責備列甯和布爾塞維克黨爲分裂主義者，尤其是在組織布拉加代表會議(參看本卷註釋 90)的時候和這次會議之後。不錯，與地方上的黨的實際工作有聯繫的那部份“孟塞維克護黨派，參加了布拉加代表會議，可是普列漢諾夫及其最親近的同道者，却拒絕參加這次會議，同時亦拒絕參加取消派的代表會議(參看本卷註釋 109)，他們會認爲布拉加代表會議是有害的“分裂的事情”。1912年普列漢諾夫關於布拉加代表會議及取消派召集的代表會議寫道：“雙方都這樣區氣地組織分裂，以至要用什麼方法來防止這種分裂的可能日益減少了。很快——嗚呼！——我們就會看到兩個完全獨立存在的黨。列甯底口號將成實事。那時候，我們護黨派將跟誰或同誰一塊兒走呢？回答是很明顯的。我們不同這些人去，也不同那些人走。”(見普列漢諾夫全集第19卷第414頁)一部份“孟塞維克護黨派”會溶化於布爾塞維克黨內，而普列漢諾夫及其最親近的同道者，則保持其獨樹一幟的狀況而日益仇視布爾塞維克。1913年，普列漢諾夫在短時期內還向布爾塞維克的報紙投稿。從1914年5月起，他便開始出版自己的統一報。戰爭一開始，他便同團結在統一報周圍的一個小小的集團投入了最極端的社會國家主義者底營壘。

〔115〕諾士特萊夫，這是果戈爾著名小說死靈中的一個地主，他是一個無恥之徒，吹牛客，小的騙子。奸人果洛孚列夫，也是沙德可夫、謝德林著名小說果洛孚列夫老爺門中的一個地主，他是個最令人厭惡的農奴主地主，而同時又帶有宗教的假面具。

(116) 在1913年中央與黨工作人員的“夏季”會議（關於這次會議，在本卷註釋(93)上已提到過）上，出席的有22人，其中也有國會中的社會民主黨黨團底團員——布爾塞維克，以及各個最大的黨的組織底代表。這次會議討論下列的問題：中央底報告和地方工作人員底報告。關於罷工運動及目前鼓動任務的問題，關於社會民主黨人國會工作的問題，民族問題和組織問題等等。關於國會中的社會民主黨黨團的問題是這次會議上最重要的問題之一，這一方面是因為在國會中的社會民主黨黨團內部，布爾塞維克“6人團”與孟塞維克“7人團”發生了意見分歧，另一方面是因為在這個時期中，黨底國會工作有了很大的意義和作用。“7人團”當中，只有三個人是由工界選入國會的，這“7人團”利用其多數地位（牠比社會民主黨的區會黨團中的布爾塞維克——“6人團”多一票），曾使布爾塞維克議員們沒有可能在國會中發言，沒有可能參加國會中的各種專門委員會等。“6人團”企圖與“7人團”合作，但這種企圖始終為“7人團”所破壞。在1913年（在波羅甯城舉行的）夏季會議（參看本卷註釋(93)）關於該問題的決議中說道：

“本會議最堅決地抗議七個議員底這種行為。

六個議員是代表俄國大多數工人的，他們的行動是與絕大多數工人的有組織先鋒隊底政治路線完全符合的。

因此本會議認為，只有在黨團內的兩派完全享受平等權利的條件之下，只有在七個議員放棄壓制政策的條件之下，才能保持社會民主黨黨團在國會工作方面的一致。

雖然在工作方面（不僅是國會工作）有不可調和的意見分歧，可是本會議還是要求黨團在其兩派享受平等權利的基礎上實行統一。

本會議請覺悟的工人們對這個重要問題發表自己的意見，並請

用全力來協助在六個工人代表享受平等權利的這個唯一可能的基礎上去實行黨團底統一。”

列甯認為中央夏季會議底這個決議，有重大的政治意義，把牠當作一種文件，證明布爾塞維克決意在真正黨的基礎上、在“7人團”執行黨的決議的條件下保持並鞏固社會民主黨的國會黨團底一致。因為“7人團”不願採納和拒絕採納1913年“夏季”會議所作的提議，又因為他們繼續採取分裂政策，所以國會中的社會民主黨黨團便發生了分裂（1913年10月），“6人團”組織了獨立的“俄國社會民主黨工人黨團。”

（117）“波蘭社會黨左派”，是波蘭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黨（P. P. S.）底一個政派。該黨在1905年革命之後，因受1905年革命底影響，分裂為“弗拉克派”（所謂“革命的政派”，即右派，現時社會法西主義的波蘭社會黨底基本核心就是由牠構成的）及“左派”，“左派”極力想與舊的波蘭社會黨底社會民族主義破裂而與社會民主黨接近。“左派”曾和波蘭社會民主黨作過長期的激烈的政治鬥爭，因為波蘭社會民主黨在有些問題上擁護了布爾塞維克的觀點，而“左派”在反動時期及高漲時期則與孟塞維克接近，總是得到他們的幫助與同情。在1908年12月全國代表會議上，孟塞維克甚至於提議要把“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與“波蘭社會黨左派”合併，但是這個提議，沒有經過討論就被否決了。除這次12月代表會議底決議之外，“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斯託呵爾姆聯合代表大會與波蘭社會民主黨訂有條約，說波蘭的一切團體，只有先加入波蘭社會民主黨然後才能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可是孟塞維克取消派却破壞這些決議，屢次企圖與波蘭“左派”合併。1912年取消派的8月會議（8月聯盟）及取消派的組織委員會，在政治上和組織上，與“左派”正式結了同盟，而

這個同盟完全是用來反對黨與波蘭社會民主黨的。在第四國會內，孟塞維克黨團，比布爾塞維克多一票，於是他就利用自己的多數，不顧布爾塞維克議員們底抗議而通過波蘭“左派”代表亞格洛（他之當選為國會議員，是由於猶太民族主義團體底贊助，而且是違反波蘭社會黨組織底意志的）加入國會黨團，並有表決權。布爾塞維克及波蘭社會民主黨却與孟塞維克取消派不同，他們對“左派”的態度底出發點，是認為必需要與“左派”底半途性及其社會民族主義的殘餘進行原則上的鬥爭，認為這種鬥爭是“左派”和社會民主黨接近的必要條件和唯一道路。布爾塞維克對“左派”所採取的這種策略上的路線是正確的，很好的證據就是：後來，一部分“左派”因布爾塞維克和波蘭社會民主黨對他們的政治觀點和思想作澈底的批評，而逐漸剷除了舊波蘭社會黨底遺毒及社會民族主義底思想，因此而日益接近社會民主主義。帝國主義大戰時期，“左派”曾參加齊美瓦德的聯合，而後來就加入波蘭共產黨。

（118）“列甯的棍棒”這個綽號，託洛茨基是從他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的發言中得來的，在他所講到的各個問題上，全體火星派還一致起來反對工人事務派和猶太工人同盟派（關於猶太工人同盟的問題，關於黨綱的問題，關於土地綱領的問題）。而在凡使火星派和整個第二次代表大會分為革命“多數派”（列甯方面的人）和機會主義“少數派”（馬爾託夫及阿雪洛滋方面的人）的一切問題上，託洛茨基則起來擁護“少數派”反對列甯（關於第二次代表大會及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鬥爭，參看中文版列甯選集第4卷內列甯底關於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敘述一文，參看他在这次代表大會上的各篇演說辭及其註釋）。他贊成馬爾託夫所提出的關於黨章第一條的措辭而反對列甯底措辭；他贊成“少數派”之

主張批准中央機關報（火星）編輯部底舊有人員，而反對列甯之提議選舉三人為編輯。他與“少數派”共同拒絕參加選舉中央委員及黨的最高委員會底委員。因此，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託洛茨基就已從“列甯的棒”變成了機會主義者，擁護少數派而反對已經產生的那個布爾塞維克黨底組織原則。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以後，他是——如列甯以後所說的——一個“激烈的孟塞維克”，是孟塞維克破壞組織的政派主義的“工作”——他們反黨工作底最積極的參加人及領導者之一。在這個時期中，在1904年，他在列甯著的進一步退兩步（參看中文版列甯選集第4卷）一書出版以後，便寫了我們的政治任務一小冊子來誹謗列甯及布爾塞維克黨，在這本小冊子中，他發揮了當時孟塞維克底機會主義綱領。從他所“敬愛的先生”阿雪洛德底文章中抄襲這個綱領。在該小冊子中所發揮的反布爾塞維主義的組織問題上的觀點，後來與“不斷革命論”一同成了託洛茨基及託洛茨基派於1923至1927年在黨時所進行的反列甯黨的鬥爭底基礎，這個鬥爭，結果使託洛茨基及託洛茨基派轉入了反革命營壘和被開除出聯共（布）及共產國際。

（119）託洛茨基曾聲明：他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五次代表大會上（舉行於倫敦）所作的關於對資產階級政黨態度問題的演說中，“是與盧森堡一致的”。當時他在代表大會上發揮了自己的那個基本上正是從盧森堡及巴烏斯那裏抄襲來的“不斷革命論”。因為正是這個由巴烏斯及盧森堡所想出的“烏託邦的和半孟塞維主義的不斷革命方案”（斯大林），曾反映在盧森堡關於對資產階級政黨態度問題的副報告中（做正報告的是列甯），所以託洛茨基在自己的演說中“高興地指出，盧森堡同志代表波蘭代表團而發揮的那種觀點，與他（託洛茨基）在過去和現在所堅持的那種觀點極其相近”。這一個“烏

託邦的和半孟塞維主義的不斷革命方案”，也反映在波蘭代表團所提出的關於對資產階級態度問題的決議草案中，這個決議底毛病，就是輕視無產階級與農民在反沙皇制度鬥爭中有聯合底必要，輕視無產階級底黨與農民底黨（社會革命黨及勞動黨）有締結“左派同盟”的必要。只有在大會選出的決議起草委員會裏面作了積極的鬥爭以後，列甯才與波蘭代表團達到了妥協，使波蘭代表團收回了自己的決議草條和贊成了布爾塞維克底決議。

至於列甯說在1906到1907年託洛茨基“接近布爾塞維克”，這句話也是指關於對資產階級政黨的態度問題而言。在倫敦大會上，列甯在關於這個問題的結論中這樣說到託洛茨基之這樣接近布爾塞維克：“關於託洛茨基要說幾句話。我在這裏沒有工夫來分析我們與他的意見分歧。我只想指出一點，就是託洛茨基在擁護黨這本小冊子中，表示自己是與考茨基一致的，而考茨基則寫過，在俄國現時的革命中，無產階級底利益與農民底利益在經濟上是相同的。託洛茨基曾承認，締結左派同盟（即與社會革命黨人及勞動黨人的妥協——編者）來反對自由派資產階級，是允許的而且是妥當的。這些事實就足以使我承認託洛茨基與我們觀點之接近。無論“不斷革命”（即託洛茨基底“不斷革命論”——編者）怎樣，可是在對於資產階級政黨的態度問題上，這裏基本上是一致的”（見列甯全集第11卷第256頁，着重點是我們加的——編者），我們在列甯底結論中所加上着重點的一句話，表明託洛茨基在1906到1907年接近布爾塞維克，並沒有消滅布爾塞維克與他的分歧，而且是在一個基本問題上——在不斷革命問題上，就是說在關於這個“反覆將軍”底“左得不合邏輯的”而同時又是“半孟塞維主義的”不斷革命論的問題上所發生的意見分歧。這還不够，正是在1906年，託洛茨基在總結與前途這篇大文

章裏最詳細地發揮了自己的理論，而託洛茨基就在現在，當他處在反革命資產階級營壘裏的時候，也還是認為這篇文章是他關於不斷革命的一篇基本的論文。1906到1907年他在對資產階級政黨的態度上接近布爾塞維克，這無非是當時的中派主義（俄國的託洛茨基，德國的考茨基）底一個特徵；中派主義在保持一般的中派主義的適應機會主義路線的情形之下表示動搖。

（120）好決議和壞演說以及本卷內的再論國際社會主義局和取消派。這兩篇文章於1913年12月2號及1914年1月1號登在無產階級真理第6期和11期上。列甯因為“國際社會主義局”在1913年12月常會上有關於“俄國問題”的決議而做這篇文章。取消派的各派（託洛茨基派也在內），以及當時贊助牠們的盧森堡及提什科派都向“國際社會主義局”請求，要牠干涉“俄國事件”，促進俄國工人運動中各思潮及各政派底統一。這種請求之發生，是因為八月聯盟一倒台，取消派和調和派不能在自己本身的隊伍內及黨內找得足够的力量，來與布爾塞維克鬥爭，又因為取消派和調和派在俄國工人運動中和在擁護布爾塞維克的各公開工人團體中找不到這種力量。因此，取消派及託洛茨基派在與布爾塞維克作鬥爭時，不得不求助於“第二國際”底中派首領，而極力要“國際社會主義局”出來干涉“俄國事件”。取消派與託洛茨基派堅決控告“分裂者”及“政派主義者布爾塞維克”，同時“國際社會主義局”自己又站在機會主義的立場上，這種情形，就使“國際社會主義局”在1913年倫敦12月常會議事日程上，提出“俄國人底統一問題。”（這是國際社會主義局謀統一的第二次企圖。第一次企圖是在1905年，關於這一點，請參看中文版列甯選集第6卷列甯給不律塞爾‘國際社會主義局秘書處’的信）

在“國際社會主義局”內，關於這問題的報告人就是當時已經適

應機會主義的中派考茨基。出席“國際社會主義局”的布爾塞維克代表李特維諾夫同志將黨的正式文件分發給“國際社會主義局”各委員，這些文件證明在俄國運動中，事實上只有一個布爾塞維克黨，牠與在工人羣衆中毫無影響的某些智識份子集團相對立，工人羣衆是跟着布爾塞維克跑。考茨基做報告時關於這個材料，一字不提。他的報告只是把取消派控訴布爾塞維克的話背誦一遍。他此外還聲明道：“俄國黨底分裂，至今已有了 10 年了。全世界工人運動底各黨各派互相鬥爭，從來沒有像在俄國那樣厲害，雖然俄國黨內的意見分歧，並沒有像德、法黨內那樣大。在這種鬥爭中，各單個人物，能起很大的作用，無產階級之痛斥他們的行爲，這也許是對的。黨內許多有聲望的老工作人員都開除了。“列甯派”否認所謂“取消派”底社會民主主義，波蘭有幾個集團不把“波蘭社會黨”左派當作社會民主黨人底一部份。這一點我們當然是不能承認的。我們現在的出發點，是認爲他們都是社會民主黨人，俄國舊社會民主黨既已死了，那就既往不咎，何必去再翻陳案，應當找條最好的出路去逃出目前的情況”。考茨基在他這篇“壞演說”（與他的在 1905 年論“俄國”事件及意見分歧的那些文章一樣，參看本選集第 6 卷底的註釋）底結論中却提出一個“好決議”，列甯在本文開頭時所講的，就是這個決議。

盧森堡起來反駁考茨基，對於考茨基所謂“俄國舊社會民主黨已經死了”的話提出抗議；她說，考茨基底話可以有各種解說。她說，必需用比較嚴格的條件來限制參加代表會議之權。必需要不但“承認”黨綱而且“承認”黨章和事實上却是黨員的份子，才允許參加代表會議。她把自己的提議擬成以下的決議：“國際社會主義局委託自己的執行委員會與俄國及波蘭社會民主黨駐國際代表，商確召集共同的代表會議的問題，這次會議底目的應當是弄清那些恢復統一的俄

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必要條件。”

布爾塞維克代表李特維諾夫同志在自己的演說中反對盧森堡底提議，而贊成考茨基底決議，其理由正如列甯所說的一樣，即認為這個決議是一個“由預先交換意見而進於統一的計劃，是一個比較慎重而較有系統的計劃。”

李特維諾夫演說之後，就有齊美芝起來講話，他照例是本着取消派的精神攻擊布爾塞維克。李特維諾夫因此提議，不要給在1912年取消派8月會議上成立的“組織委員會”以駐國際社會主義局代表資格，牠不但不是代表任何政黨，而且還不是代表產生牠的託洛茨基派取消派的“8月聯盟”，因為現在“8月聯盟”已經瓦解了。國際社會主義局不同意李特維諾夫，而引進“組織委員會”底代表到社會主義局內來。同時牠還通過考茨基所提出的論俄國問題的決議案。決議案開始引證“第二國際”阿姆斯特丹大會關於黨底統一的決議，再則指出俄國黨務底“有害的和傷心的情況”，末尾主張由“國際社會主義局”出來考察俄國黨內鬥爭和消滅分裂現象。爲了這些目的，“國際社會主義局”決議委託執行委員會與承認“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黨綱的“俄國工人運動中各政派”發生聯繫，而且還與那些在政綱上和社會民主黨相符合的各派發生聯繫。同時，“國際社會主義局”又申明，牠不願討論個別思潮底過去的錯誤，而只是關心於“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底現在和將來。

1914年7月，“國際社會主義局”根據這個決議，在不律塞爾召集俄國各社會主義思潮及各民族社會民主黨組織底“統一的”會議。布爾塞維克黨中央底代表也參加了該會議。該會議不肯批評各派底“既往”，認為這是“有害無益的”，牠的決議還否認有這樣一些意見分歧，這些意見分歧足以爲“繼續的分裂”作辯護，而且很含糊地說有實行

統一和舉行“共同代表大會來解決綱領上爭執問題”之必要。決議案又是考茨基提出來的。布爾塞維克中央代表及萊多維亞社會民主黨代表沒有參加表決。這個決議案，一點實際意義都沒有；他們會多方企圖與布爾塞維主義鬥爭，其方法就是：像德國社會民主黨那樣，和機會主義者“聯合”起來並使無產階級革命黨溶化在由中派領導的小資產階級改良黨內，這一切企圖都被戰爭所打消了。至於盧森堡在這種企圖中的作用，那末，這種作用指明：第二國際中的左派，在戰爭前夜和第二國際破產前夜的時候，就已怎樣染有與機會主義者實行“統一”的“可惡傳統”，怎樣不能用真正革命的觀點去了解，無產階級黨的統一乃是在反機會主義的這種不可調和的鬥爭基礎上來實現的一種統一。

(121) “提什科組”或“提什科派”，這是波、立社會民主黨總管理委員會底領導派別（提什科，盧森堡，瓦爾斯基等等），牠在反動及高漲時期，反對布爾塞維克列甯派底“分裂主義”政策，贊成俄國社會民主運動中一切思潮與政派之妥協與統一。“提什科組”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鬥爭底各問題上，沒有什麼獨立的原則政策，牠在整個反動及新高漲時期內，總是動搖於取消派和布爾塞維克派之間，並經常反對派別鬥爭底“混亂現象”，反對所謂“列甯派”（提什科派就是這樣稱呼布爾塞維克的）之“故意煽起”這種鬥爭。1911年提什科起初與布爾塞維克調和派共同參加布爾塞維克所組織的召集黨的代表會議的運動，而後來就離開這種運動，不參加布爾塞維克所召集的布拉加代表會議而參加1912年取消派因討論召集反黨的取消派代表會議問題而召集的1月會議（參看本卷註釋 102），可是牠又退出這次會議，聲明因為會議上取消派佔多數，牠不能參加。1912年8月，波、立社會民主黨總管理委員會（由提什科派所操縱的）召集

波蘭社會民主黨邊疆代表大會，並在這次大會上通過決議，斥責布爾塞維克底“分裂主義政策”，而沒有提到一個問題：牠對於被1912年布拉加代表會議所開除了的各取消派持何種態度。最後，在1913年，提什科組經過盧森堡而向“國際社會主義局”提議，請牠弄清恢復俄國黨底統一的問題及“列甯派”底“分裂主義”政策的問題（參看本卷註釋（120））。

波、立社會民主黨總管理委員會在俄國社會民主運動各問題上所採取的那種提什科的機會主義的政策，結果弄到牠脫離“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可是因為牠在波蘭社會民主運動底許多重要問題（職工會問題，對“波蘭社會黨”的態度問題，黨內政策問題等等）上，總是動搖不定，所以，波蘭社會民主黨內許多最老和最大的黨部（瓦薩黨部，洛茲黨部等）提出嚴重抗議與採取反對態度。反對派和提什科派的總管理委員會間的鬥爭（總管理委員會罵整個瓦薩黨部播弄是非，並宣佈將其解散），結果弄到分裂和反對派組織上的獨立；反對派成立了自己的邊疆的中心並實行了一些步驟來與布爾塞維克接近。這種分裂，使提什科派的總管理委員會失去了瓦薩黨部這樣的支柱而大大地破壞了牠的影響，並在很大的程度內消滅了牠在俄國社會民主運動各問題上繼續其原有政策的可能。直到1916年末，因帝國主義大戰引起波蘭的和國際的工人運動中一切真正國際主義份子接近起來的必要，於是這種分裂才被消滅。

（122）列甯這裏所提到的決議案，登在真理報上，署名為“有組織的馬克思主義者同人”，是布爾塞維克黨對“國際社會主義局”底決定（本文及上文內所說到的那個決定）所作的回答。這個決議案規定與取消派“恢復統一”的必需條件。牠說，取消派須要無條件地承認“地下黨”（即秘密黨）及服從牠的決議，同時要無條件地承認“俄

國工人階級所提出的三個基本要求”——民主共和國、沒收土地及八小時工作制，要不再為聯合立憲民主黨而“降低工人階級底任務”，要國會黨團無條件地服從“馬克思主義整體底有組織的意志”，即是秘密黨底訓令等等，——只有在這些條件之下，統一才有可能。所有這些條件底意思，簡言之就是：只有在取消派不再做取消派的時候，統一才有可能。

(123) 列甯給斯切津諾夫的這封信是在1910年末寫的，1924年初次登在無產階級革命雜誌上，所講的問題就是俄國農村經濟發展底兩條道路問題，這問題就是他在社會民主黨在1905至1907年第一次俄國革命中的土地綱領（請參看列甯選集中文版第5卷第149至186頁及其註釋）這部著作上所提出來的。可是在1910年，這問題已經處在新的環境中了。專制制度更加走向資產階級的君主制度（請參看本卷所載的論目前時局和黨底任務的決議草案，這個草案曾由1908年12月代表會議通過）。這一點在斯託雷平的土地法案上表現得特別明顯，該法案打算消滅村社，鞏固農村資產階級——鄉下的富農。斯託雷平的土地改良顯然促進了鄉村資本主義的發展。這種發展，的確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要快些。這一點底局部的表現，就是地主經濟中僱傭勞動之增加，即是半農奴制的地主經濟之日益變為資本主義的經濟。這就是地主的專制制度與資產階級聯合，自己施行改良，藉此在農村內慢慢推行資本主義，由此而慢慢消滅農奴制殘餘，這一條農業中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就是列甯所謂“普國式的”道路。因此當時就發生這樣的問題：俄國是否已經完全走上了這條道路，再沒有別的——“美國式的”道路之可能；而這條美國式的道路，是要事先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堅決勝利，本着革命精神來解決土地農民問題，使一切土地國有化。依列甯的信看來，斯切津諾夫在這

個問題上有了動搖，而且恰恰是這樣的動搖，即認為俄國已經完全走上‘普國式的道路’，認為村社破壞了，富農鞏固了，農民的階級分化增長了，於是農村中農奴制度底最後一些殘餘也破壞了，地主半農奴主也消滅了，以前全體農民階級與地主間的矛盾也消失了。由此就得出結論說，“基本理論問題底標本提法”也失去意義了，即是說無產階級在反地主及反沙皇制度的鬥爭中與全體農民的聯合問題及工農革命民主專政的問題也失去意義了。而且依列甯給高爾基的一封信看來，斯切泮諾夫會根據他關於農業資本主義發展實況的理論而寫道：“應當把民主革命一筆鈎銷，俄國將不經過革命而走英國的道路’。

列甯在回答斯切泮諾夫的信內，像他在反動及新高漲時期所作的一切文章一樣，都是站在相反的觀點上。列甯認為專制制度之更加走向資產階級的君主制度，這並沒有打消關於推翻沙皇專制制度的問題，因為牠到底還是地主的專制制度。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中心問題（土地農民問題）上，也是一樣；專制制度之更加走向“普國式的道路”，這並沒有打消反地主的土地農民革命——直到根本剷除農奴制度殘餘時為止。這樣也就沒有打消關於聯合全體農民及關於工農革命民主專政的口號。

關於解決土地農民問題的兩條道路的問題，在反動時期和在1905年到1907年一樣帶有重大的意義，因為這是關於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以後命運的問題。局部地在有些布爾塞維克中間，關於這個問題的動搖，曾是一種嚴重的危險。斯切泮諾夫底動搖沒有引起什麼結果，就是說沒有弄到脫離布爾塞維主義的地步，可是其他有些同志底這種動搖，就引起了兩個結果中的一個：或者是過早地取消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口號而過早地提出直接轉向無產階級革命的問

題；這就是左的過火行動。或者同樣是取消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口號，可是不向“左”偏而跑到取消派的營壘中去。著名歷史家洛什可夫就是這樣。洛什可夫直到1907年為止還在布爾塞維克隊伍內工作，而後來就跑到了取消主義方面去（參看本卷內土地問題與俄國現狀一文第246到250頁），他在取消派刊物上做的那種文章，真是如列甯所說的，可以稱為“自由派工人政黨底宣言”（參看列甯全集第15卷第272至280頁自由派工人政黨底宣言一文）。正是各種各樣的孟塞維克取消派（託洛茨基派也在其內）這樣觀察事情，認為農村中的農奴制殘餘已經斷然轉向消滅的方向，地主經濟在基本上已經變成資本主義的經濟。他們認為，這樣一種對於農業實況的估計，就是證明應當取消革命口號，因此也就是說，應當取消無產階級革命的祕密黨，而代以（如列甯所說的）“斯托雷平”的“自由派的工人政黨”。

（124）依里英——這是列甯底假名，他在沙皇時代常用這個假名發表公開的著作。他的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一書，也是用這個假名在1899年發表的。他在這部著作中，引用許多數字的材料證明了：俄國的農村已被捲入商品經濟底漩渦，農村經濟——無論是地主的或是農民的——往直前地接着商品經濟的資本主義的道路前進着。列甯也在這本書內指明了：在俄國，農村底階級分化，農村中兩個對立階級——農村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增長，這個過程是怎樣發生的。該書底某幾部份編入於列甯選集第1卷內。全書就編成列甯全集第3卷。列甯在1907年7月間寫的，就是說根據1905年到1907年革命經驗而寫的俄國資本主義發展一書第二版序言中，激烈地提出俄國資本主義發展有兩條可能的道路的問題。在該書所描寫的經濟基礎上，客觀上能有兩條基本的發展道路：

“或者是舊有的，與農奴制千條萬索地聯繫着的地主經濟，慢慢

地變爲純粹資本主義的、“翁克式的”經濟，而保持下去……，或者是革命破壞一切農奴制殘餘，首先是破壞大規模的土地佔有制，而毀壞舊有的地主經濟”（見列甯全集第3卷第12頁）。

（125）是指馬丁諾夫在其俄國革命底動力一文內攻擊布爾塞維克的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口號而言。馬丁諾夫這篇文章於1909年3月登在孟塞維克的雜誌社會民主黨人呼聲上。

（126）列甯這裏是指普列漢諾夫用來反對民粹主義的著作，例如我們的意見分歧，民粹主義在伏龍超夫著作上的理論根據及其他的著作（參看普列漢諾夫全集第二、三、九各卷），同時又是指列甯自己的著作：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參看列甯選集第1卷）及其他的著作，也是反對民粹主義的。

（127）列甯這裏引證孟塞維克馬斯洛夫底一篇文章國民經濟之發展及其對於十九世紀階級鬥爭的影響，該文載在孟塞維克底論1905至1907年革命的彙刊二十世紀初的俄國社會運動內（參看本卷註釋（35））。

（128）根據1907年6月16號的法律而選出的第三國會，牠的反革命性，在1909年11月30號到12月3號國會會議上討論個人不可侵犯的法案時表現得特別明顯。列甯就是講到這一點。這個法案，實際上是給當局以支配公民生命的全權，只要當局認爲這是需要時，甚至於可以不經過裝樣的沙皇法庭。例如，該法案底報告人黑幫派查梅斯洛夫司基也就是這樣說的：“凡國內安靜的地方，個人不得侵犯的法案就應發生效力；反之，如果國內有些地方，局面不安，那末就有根據，在這些地方應用個人不可侵犯的法案時作這樣一些例外，這些例外在別的法令：軍事法令和非常法令中已有規定。”接着查梅斯洛夫司基又作了解釋，什麼叫做“局面不安”：這就是軍事行動和對軍事行動

的準備，變亂和“準備騷擾的行動——造叛和騷動”。

(129) 這裏是指列甯底社會民主黨在俄國革命中的土地綱領這篇文章（參看列甯全集第12卷第276到295頁），這篇文章是列甯依波蘭社會民主黨人（盧森堡等）底請求而給波蘭社會民主黨的報紙寫的。這篇文章是把列甯的社會民主黨在1905到1907年第一次俄國革命中的土地綱領一書（該書底某幾章編入於中文版列甯選集第5卷第148至277頁）極簡略地敘述一遍。關於從馬克思底剩餘價值一書中引來的引證，看同卷第205至208頁。

(130) 這裏大概是指德國社會民主黨內關於土地問題的討論，這個討論是在90年代由那些以達微特為首的修正派開始的。爭論的中心問題就是關於農業發展有兩條可能道路的問題。在1895年德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大會上，修正派提出一個土地綱領草案，其中包含着許多辦法，都是用來贊助和鞏固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小農私有制的。這一個草案被大會上大多數否決了。在德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普國式的道路已經戰勝了，那裏地主的經濟已經變成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的營業性的經濟；整個農業制度已經成了資本主義的制度；在這種條件之下去贊助小農私有制，那一定會使農民去夢想資本主義制度之下有改善本身地位之可能，一定會促進他們的小私有主義傾向底鞏固。在農業資本主義已經發展的條件之下，要解決土地農民問題，只有在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和無產階級專政建立的條件之下才有可能。

(131) 列甯這裏是指孟塞維克切爾凡甯所著的時局狀況及可能的將來（1908年在莫斯科出版的）一書中的下面一段話：“顯然的，無產階級只有得到農民底幫助，才能在革命中得到某種嚴重的勝利。這一點，社會民主黨深切地感覺到了，——深切到這個地步，就是

黨內一部份人所表現的機會主義比培恩斯坦派及德國南部社會民主黨人還更多些。可是這些機會主義者，並不是那些被布爾塞維克底叫喊所欺哄了的培恩斯坦派及立憲民主黨人所決意列入自己營壘的孟塞維克，而是‘不調和的’布爾塞維克，他們曾以阿爾洛夫為代表而贊成平分土地的這種完全反動的綱領。”

關於列甯及布爾塞維克黨對於平分土地的態度，參看列甯選集第5卷內俄國社會民主黨在1905到1907年第一次俄國革命中的土地綱領一文第二章第八節（第220至226頁及其註釋??）。

（132）論現政府底（一般的）土地政策問題，這是一篇演說稿子，是給第四國會布爾塞維克黨團員沙哥夫寫的。沙哥夫在1913年6月22號國會會議上，討論國有田產部底預算問題時，就是依這篇草稿說話的。

沙哥夫差不多完全根據列甯所起草的演說稿子說話，僅僅有了一些小小的改變和遺漏。

這篇演說，對沙皇制度在1905年革命以後的土地政策作了透切的說明。列甯用事實與數目字來指明：斯託雷平的政策，在其7年的存在中，不但沒有解決土地問題，而且使牠更加緊張。雖然鄉村中資產階級式的發展由於這個政策而得到了很大的向前的推動，可是這個政策不會能夠消滅農奴制及農奴制的束縛。依舊還需要用革命手段來消滅牠們。

另一方面，這篇作品底價值，還在於牠是證明列甯怎樣領導國會裏面布爾塞維克黨團的一個文件。

列甯在這篇演說稿子中用非常明白的和易解的字句來敘述意思，這指明這篇演說，不是講給國會內的議員聽的，而是給國會以外的廣大工農羣衆聽的。這篇演說是一種模範，表明如何可以利用和應

牠利用最反革命的機關——當時的國會——底講壇。

(133) 沙皇制度在1905年以前會擁護村社和農民份地之不能讓渡，當然，這不是爲着農民底利益着想，而是爲要把農民束縛於土地和爲要保證地主得能不僅剝削農民的僱傭勞動，而且還能用工役制、平分制以及其他束縛的農奴制的剝削方法去剝削農民的勞動。把農民束縛於村社和不許份地讓渡，這在當時是地主奴役農民的一種方法。1893年12月27號（舊曆14日）所頒佈的法律，指出這種把農民束縛於土地的情形，達到了如何的程度，如果不得該村社內三分之二的有表決權的農民底特別決定，農民便無權出賣份地，如果出賣的份地價值超過五百盧布，那末除了村社底特別決定以外，還得內務總長底准許。

差不多就在1905年底前夜，在1903年3月11號（2月26日）的宣言中又重新指出，政府主張村社制度不可侵犯，而最後，在1904年，就是說正是在1905年底前夜，1月21號（舊曆8日）的沙皇詔令中又承認“替農民保存等級制度和保存農民份地不得讓渡的制度”是必需的。

(134) 貴族聯合委員會，是在1906年貴族代表大會上成立的。這是農奴主地主們用來反對革命的一個組織。還在1905年2月的時候，沙拉託夫城的貴族們中間就有建立這個組織的念頭，而在1905年9月的時候，在沙拉託夫城就舉行了“全俄各等級地東聯合會”創立人底籌備會議。地主們曾企圖用這個名稱來隱瞞自己的真面目，可是，他們所通過的綱領却馬上暴露出這個“各等級聯合會”底階級性。如關於土地的問題，“創立人會議”很明確地聲明了，“地主的私產應當是不可侵犯的”，農民缺乏土地的現象，祇是由農民用自願購買土地的辦法才能消滅，根本談不到用什麼強迫手段去割讓土地。

在1905年12月，召集了地東聯合會底成立大會，在這次大會上，地主貴族們對政府底行動發表了很堅決的不滿論調。他們責備政府，說牠對於地主財產底不可侵犯權保護得不够，說牠袒護自由（地主們甚至把當時專制政府所實行的殘酷鎮壓革命的行動也稱為“袒護自由”的行動）。大會指示政府，叫牠更堅決地反對革命。而在地東聯合會底下一次代表大會上（1906年），地主貴族的反革命勢力，對政府努力鎮壓革命的行動已經較為滿意。大會向鎮壓了莫斯科武裝暴動的杜巴索夫將軍以及其他有名的摧殘革命的份子致書申謝。關於土地問題，大會提出要求，請政府補償地主們因農民革命運動而遭受的一切損失。1906年5月5號（4月22日），舉行了由最高等的貴族代表組成的“貴族團”大會，這個“貴族團”也就是全俄貴族代表大會底組織者。全俄貴族代表大會，是在1906年5月舉行的，大會選出了常務機關——貴族聯合委員會。地主貴族反革命勢力以後的活動，就是在這個組織領導之下進行的。

貴族聯合委員會底綱領和政策，決定了政府底政策。例如在1906年11月第二次貴族代表大會上，貴族們向政府指出，說第二國會底選舉手續不能使他們滿意，說在這樣的選舉手續之下，“在選舉中有產份子被無產份子壓倒”，說這樣一來地主貴族們就不能發生他們所想發生的那種作用。因此向政府提議，要牠“堅決聲明，俄國是私有制的國家，”無產者的方針在這個俄國是“不容有的”。關於國會選舉的新法律（第三國會就是根據這個法律選出的），會適合於貴族們上述的要求。在土地政策方面，沙皇制度也完全是以貴族聯合委員會所代表的地主階級利益為出發的。

（135）據內務部底計算，20省內地主們因農民革命運動而遭受的損失，達三千一百萬盧布以上。農民在其反地主的鬥爭中，應用了

各種各樣的形式和方法：搗毀田產，放火，斬伐林木，踐踏田禾等等。正是在1905到1906年第一次革命時期內，火燒和澈底搗毀地主的田產，這種鬥爭形式最爲流行。例如在沙拉託夫省，被搗毀的田產，有272座，唐波夫省——130座，阿爾洛夫省——84座，平什省——30座，庫爾斯克省——127座，烏克蘭各省——200座以上，波羅的海沿海各省——260座。

(136) 列甯是指1910年6月27號(14日)的法令，該法令再度批准了1906年11月22號(9日)所頒佈的關於有權退出村社及變村社土地爲私有財產的法令，並用比較激烈的措辭發揮了1906年11月22號(9日)的法令中底各要點。例如關於變村社土地爲私有財產的問題，在1906年11月22號(9日)的法令中這樣寫着：“凡在個別戶主寫聲明書願意變村社土地爲私產以前24年內土地未曾實行過總的重新分配的那些村社內，除宅基以外，凡村社內由他經常使用的(不是租來的)一切土地也都歸該戶主所有。”而在1910年6月23號(10日)的法律中，這一點是這樣說的：“自從分得份地以來土地未曾實行過總的重新分配的村社及擁有個別領土的村莊，從今以後算作已經過渡到了遺傳的(按地基的或是按戶的)土地佔有制。”接着又說，農民對這些土地有私有之權。在這裏，在第二個法令中規定，如果該村社內未曾實行過總的重新分配，那末連個別的人物也用不着寫什麼聲明書，不管你願不願，村社土地便依法不再成爲村社所有。依照這個法律，在已經實行過總的重新分配的情形之下，退出村社的手續也弄得簡單便當了。每個戶主有權在任何時候寫聲明書，要求退出村社，如果在三十天以內村社並不按實審查這個聲明書，那末問題就提交農事官辦理，後者就隨着自己的意志解決問題。此外，在1910年6月27號(14日)的法令中還有這樣一條(列甯說到這條法令)，就是

說，在法令未重新審查以前，暫時禁止用購買或受禮的方法，在一縣之內把六塊以上的份地集中在一戶手裏，而在比沙拉比省，則禁止將一縣之內兩塊以上的份地集中在一戶手裏，在西南各省，禁止將一縣之內三塊以上的份地集中在一戶手裏。

(137) 雖然農民運動在革命以後，從1907年起大大地低落，但是農村中的階級鬥爭，不僅沒有削弱，而且如列甯所說的，還採取激烈的“非常憤激”的形式。斯託雷平的土地政策，沒有消滅階級矛盾，而是加強了階級矛盾。除了全體農民與地主間的矛盾以外，農民本身內部的矛盾：貧農與受賜於斯託雷平政策的富農之間的矛盾，也採取了日益激烈的形式。

(138) 土地問題與俄國現狀，這篇文章登在1913年11月28號真理報36期上，牠的基本內容，也就是以上兩篇文章（給斯切特諾夫的信及論現政府底（一般的）土地政策）上關於斯託雷平底土地政策及革命底前途的意見。他發揮這些意見，批評立憲民主黨人的（波爾菲洛夫）及取消派的（洛什可夫）觀點，並用這種批評來證明：取消派如何與完全變成了反革命者的立憲民主黨人同走一條路。立憲民主黨人與取消派都是一樣地認為：關於革命的一切念頭都應拋棄，理由正是因為革命所應反對的那種勢力已經沒有了，農奴地主階級已經沒有了，牠已變成極少數的幾個人了（普力什克維赤之流，馬爾可夫之流及其同伴）。關於這個問題，列甯在另一篇也是專論洛什可夫取消主義立場的文章：從斯託雷平“工人”政黨營壘中來的這篇文章內，寫道：‘關於地主階級底作用問題，洛什可夫無掛無念地馬上就說出了荒謬的東西來。依他說來，好像還在不久以前，這個階級底代表‘曾是’真正的農奴主，現在‘他們變成極少數的幾個人，還團結在普力什克維赤和馬爾可夫第二底周圍，軟弱無能地(!!)掙扎。’

大多數的地主貴族們逐漸地和不斷地蛻化爲農業資產階級¹。大家都知道，馬爾可夫第二之流及普力什克維赤之流，在國會裏，尤其是在國務會議裏，尤其是在黑幫的沙皇黨羽內，尤其是在治理俄國的事業中，事實上都有至高權力。”（參看列寧全集第15卷第297至298頁）

（139）秩序黨——這是法國1848年革命時保皇派資產階級底反革命大聯合。秩序黨底口號是“保護財產，家庭及宗教”。該黨恰恰在法國的這樣一部份農民中間得到很大的同情，這部份農民曾經擁護拿破崙第三，起初選舉他爲法蘭西共和國大總統，後來又擁護他做皇帝，馬克思關於這一部份農民（當時是農民底大多數）這樣說：“拿破崙皇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農民而是守舊的農民，不是極力想衝破自己的社會環境、衝破小塊土地之界限的農民，而是想鞏固小塊土地的農民，——不是極力要用自己的力量與城市共同推翻舊制度的農民，而是死守在舊制度之內和等待皇帝來拯救和優待他及其小塊土地的農民。拿破崙皇朝所代表的不是農民底開明而是他的迷信，不是他的理智而是他的成見，不是他的未來而是他的過去。”（馬克思著：拿破崙第三政變記）

（140）列寧這裏是指馬克思與恩格斯反對德國社會黨人施維澤的鬥爭。施維澤是拉沙爾的信徒，他與拉沙爾一樣，對普魯士專制制度及其元首俾斯麥所實行的政策，都站在機會主義的立場上。在當時（1860到1870年）的德國，基本問題就是民族統一問題。那時候，德國還不是一個統一集中的國家，而是許多各別的政治上聯繫薄弱的國家，封地等等組成的。這樣的政治上的分散，妨害了德國資本主義底發展。民族統一問題在當時的德國成爲首要問題，也猶之乎土地問題在革命以前的俄國成爲首要問題一樣。在俄國，當時的

問題就是關於解決土地問題的道路、方式與力量的問題；在德國也是擺着關於解決民族統一問題的道路與方法的問題，當時的問題是這樣：或是以國家制度之完全民主化為基礎而建立統一集中的德意志民主國，經由這條革命道路來達到民族統一，或者是由當時德意志境內武力最強的普魯士的地主君主國來實現這種統一。在第二種情形之下，普魯士帝制就會加強自己的地位。拉沙爾以及後來的施維澤認為，德資產階級無力解決民族統一問題，因此認為求實現統一，只有兩條路；或者是“自下的革命”——藉無產階級的拳頭來謀統一的德意志共和國或者是“自上的革命”——由俾斯麥底君主政府藉普魯士的槍頭來實現這點。拉沙爾看不見“自下的革命”底可能，於是得出結論說，必須贊助俾斯麥政策：藉槍頭之助並在普魯士君主國指揮之下來統一德意志。他不僅在統一德意志的問題上以及擁護地主利益反對自由派資產階級的鬥爭中，從旁贊助了俾斯麥，而且還和俾斯麥訂了密約（這點到後來才知道）。繼承他領導全德工人（拉沙爾派）的施維澤，也繼續了拉沙爾底這條路線，而施維澤已經公開在報上頌揚俾斯麥和他的政策了。施維澤也和拉沙爾一樣，以為他一贊助普魯士政府，俾斯麥便會施行普選制，國家便會擁護工人的生產組合，而這種生產組合，依拉沙爾底機會主義學說講來，一定會弄到社會主義。

當時德國社會黨內其他一派（是培培爾和威廉、李卜克內西及其他人（“愛森納派”）所領導）則堅決反對施維澤底這種普魯士社會主義。他們揭破普魯士專制制度底政策，他們認為，應當實行“自下的革命”，根據完全的平等權利，召集德意志各國代表開立憲會議，同時要使政治制度完全民主化，這樣來實現民族統一。威廉、李卜克內西及培培爾等反對德意志底分散狀況而贊成他的統一，可是

戶時又反對君主制度及俾斯麥而主張共和制度。

馬克思與恩格斯堅決反對拉沙爾及施維澤底政策。他們指出，拉沙爾及施維澤與俾斯麥暗中勾結，抹煞政府政策底階級實質，而這個政策是擁護大地主階級底利益的。他們指出，地主的政府與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矛盾是不可調和的。馬克思說，拉沙爾與施維澤所會希望的普魯士王朝對無產階級的任何幫助是有害無益的。1865年他寫信給施維澤說：“普魯士資產階級的政黨，因為認真相信“新時代”一到，治國權便因皇恩浩蕩會落到牠手裏，所以污辱了自己，和弄到了現在這種可憐的地步；工人政黨如果認為俾斯麥時代或其他什麼普魯士的朝代一到，就會因皇恩浩蕩而有黃金蘋果落到牠口裏來，那就更污辱自己了。無疑義的，關於普魯士政府能實行社會主義設施的這種不幸迷夢，總會甦醒過來的。事情一定是會這樣的。可是工人政黨底榮譽，却要求牠不等經驗來破壞這些幻想而先放棄牠們。工人階級是革命的，否則就一錢不值了。”（參看由阿多拉茨基編譯的馬克思恩格斯信札集第142頁，1928年由“莫斯科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列甯對於沙拉爾派與愛森納派底立場的估計，參看本卷註釋（22））。

拉沙爾及施維澤與俄國取消派的主張完全相同。孟塞維克與拉沙爾及施維澤一樣，抹煞沙皇制度及其政策底階級實質。他們抹煞了一個問題：黑幫普力什克維赤及馬爾可夫是代表鄉村中還遠沒有消滅的農奴制的，這個農奴制還要用革命來消滅。

（141）1913年11月5號（舊歷10月23日）孟塞維克社會民主黨人杜列可夫在國會中演說，列舉警察取締工人組織、解散會議、禁止在工人中講演等等的事實。杜列可夫用純粹是立憲民主黨的口號來結束自己的演說，這個口號就是：要求結社自由而不要推翻沙皇制度。這位孟塞維克說道：“我們的口號是結社自由，這是我們的戰鬥口

號，爭取集會自由是這個口號底一部份。”（第四國會，速記本，第225頁）

布爾塞維克代表巴達也夫也在這次國會會議上起來講話，他指出工人們在政治上全無權利的情形之後，就聲明道：“工人們是不怕鬥爭的。禁止他們的會議，破壞他們的公開組織，把戰書拋給他們，可是他們將接受這封戰書，再把一個1905年給你們看。我們相信這個運動，相信這個運動是增大着和擴大着，而工人階級是會爭得自己的一切權利的。我們相信這個未來，而且勇敢地望着牠，知道歸根結底，在我們的街上將有點燈綵彩的景象。在俄國，這個已經腐敗的制度，不久也將與這個反動的地主的國會同歸於盡……”（左排座位中的喊聲：對呀！）

孟塞維克杜列可夫口口聲聲說，他們孟塞維克底戰鬥口號是結社自由。而布爾塞維克巴達也夫則代表工人階級聲明道，他們的口號是為推翻整個“已經腐敗的制度”而鬥爭。布爾塞維克巴達也夫會勇敢地向地主的和資產階級的國會公開聲明道：工人們還“會把新的1905年給你們看”。

（142）論民族自決權這篇文章，登在1914年教育雜誌第4到第6期上，是由列甯在1912到1914年爭論民族問題時所作的。

這次爭論之開始，是因為1912年，孟塞維克的高加索區代表大會，提出“文化民族自治”底要求。後來，同年舉行的取消派的8月代表會議（是由託洛茨基領導的，——參看本卷註釋（109）；又通過決議，證實高加索孟塞維克關於“黨綱上承認各民族都有自決權的這一條解說，與黨綱上的確切意思不相衝突。”

以後，孟塞維克的及猶太工人同盟的刊物上就開始發表了一些文章，擁護“文化民族自治”而批評黨底主張民族自決的民族問題綱

領。

列甯對機會主義者這種攻擊黨底民族問題綱領的第一個回答，就是他的民族問題評論了，此文初次登載於1913年10月到12月的布爾塞維克的公開雜誌教育上（參看列甯全集第17卷129到159頁）。列甯這篇文章是反對“文化民族自治”要求的，他當時就把這篇長文章底基本內容，作成一篇論文化民族自治的通俗的短文，轉載在真理報上（參看列甯全集第17卷第92到95頁）。他在這篇文章內明確規定“民族文化”自主底“計劃或綱領”底實質，他說，“猶太人底一切資產階級政黨，各民族小資產階級政黨及左的民粹主義政黨底代表會議（1907年），以及接近馬克思派的團體底小資產階級機會主義份子，即猶太工人同盟及取消派，都採納了這個綱領。”這個“計劃或綱領”底實質，就是使學校事業按民族不同而分別辦理。列甯說：“一切公開的及暗蔽的民族主義者（猶太工人同盟派也在內）越是企圖把這種實質弄得曖昧，我們便越應堅決指出牠。每個民族，不管屬於這族底人住在何地（不以地域為轉移：因此叫做“超地域的”自治），都構成爲統一的，承認其爲一個國家的聯盟，去辦理民族文化事業。這些事業中主要的是學校事業。由每個人自願簽名來決定其民族籍貫，不問其住址何在而聽其自願加入任何一個民族聯盟；這樣一來，學校事業就能絕對確實地和徹底地按照民族性來分別辦理了。”文化民族自治的要求就是這樣；列甯認爲，這種要求，無論是由澈底的民主派看來，無論是（尤其是）從“無產階級鬥爭底利益”上看來，都是“絕對不能容許的”。“如果經濟是把住居在一國之內的各民族結合起來，那末想在‘文化’方面，尤其是在學校問題方面把他們永遠分開，這種企圖是荒謬的和反動的。”文化民族自治，與無產階級實行國際統一來反對資產階級的這種利益更相抵觸，因為牠不是爲的要使

工人互相統一。而是使他們彼此分開而與自己的民族資產階級統一，服從這資產階級底利益，服從牠的“民族的”，就是說資產階級的文化。列甯說，“宣傳這種思想，可以分散、分開和削弱工人”，“理解和重視自己的國際主義的無產階級，永遠不會受這種精巧的民族主義所欺騙。”

可是在這時期中，列甯為黨底民族綱領而鬥爭，也與他為其餘綱領問題及策略問題而鬥爭一樣，不但是反對從右邊來的孟塞維克的取消主義。民族自決權這個口號，同時也受到以盧森堡為首的波蘭與德國左派社會民主黨人方面的攻擊，這些左派“發揮了——斯大林同志說道——半孟塞維克的關於帝國主義的理論，否認了馬克思主義者所主張的那種民族自決（直到分立和獨立國家之創立）底原則，否認了關於殖民地及被壓迫國家解放運動具有嚴重革命意義的原則，否認了關於無產階級革命與民族解放運動之間能夠建立統一戰線的原則，並拿了這一切半孟塞維克主義的、完全輕視民族殖民地問題的糊塗觀點來和布爾塞維克底馬克思主義的方案對立。”（見1932年出版的列甯主義問題第608頁）“無論在帝國主義大戰前夜，或在大戰時候，都是如此，而且在大戰時期，這種半孟塞維克主義的糊塗觀點，就為託洛茨基利用來當作反列甯主義底鬥爭工具，”（斯大林，參看同書同頁），而在另一方面，“極左的”布爾塞維克——布哈林、皮達可夫這一派人，當時也利用了這種半孟塞維克主義的糊塗觀點，他們也作了鬥爭來反對民族問題上的列甯主義路線。無論在戰前或戰後各時期，列甯在自己的言論中，對於這一切“左的”向民族問題上（而以後就在民族殖民地問題上）布爾塞維克主義立場的攻擊，像對於右派機會主義者向這立場的攻擊一樣，作了同樣堅決的反抗。列甯在這篇戰前作的文章，像在帝國主義大戰時期發表的許多言論一樣，主要的正是

打擊盧森堡及其同道者，同時順便地又批評到“文化民族自治”。

除列甯在戰前的黨報上發表言論之外，同時布爾塞維克黨還正式通過黨的決議來發表自己對民族問題的主張。這次決議是1913年中央與黨的工作人員共開的“夏季”會議（實際上是在10月間開的）通過的。這次會議底民族問題決議案講到，無產階級的政黨絕對應當保持一種主張，即被壓迫民族有自決一直到分立和成立獨立國家之權，決議案駁斥“文化民族自治”這個要求，認為這是“絕對有害的”要求。會議把這個決議案通過了，同時又駁斥“左的”擁護盧森堡觀點的人所提出的決議草案。

這樣一來，布爾塞維克曾經堅決地與“文化民族自治”底擁護者分清界線，同時又與“無綱領派”底立場分清界線。

這次會議底民族問題決議案是由列甯起草的，他在會議後所作的關於這問題的各篇文章就是擁護這次決議案的。

列甯在1913年的爭論中所發揮的思想，就是他在第二次代表大會時代關於民族問題的立場之必然的發展。無論在第二次代表大會時代，無論在1913年，爭取黨底民族綱領，就是爭取無產階級綱領上基本的民主要求之一。

同時，在這時期列甯所作的文章中，還有些為1902至1903年所沒有過的東西。這些新的東西就是：列甯指出，在俄國自由資產階級中間，已經發生反動的帝國主義的野心，這種野心是反對俄國境內各被壓迫民族底民族解放的。列甯說：“1905年以前，我們差不多只知道有民族主義反動派。而在革命以後，俄國已經產生民族主義自由派了。”列甯在上述的民族問題評論一文上開始就指出，1913年，民族問題之所以推上第一位，除其他原因之外，還因為“反革命的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之轉變為民族主義。”（參看列甯全集第17卷第133頁）當

然，顧到這種情形，這並沒有取消民族自決權的口號。反之，俄國資產階級在民族問題上表現帝國主義的野心，這只是更加强了民族問題底意義。這個要求，現在已經不僅變成了反對專制制度的要求而且已變成了反對自由資產階級之帝國主義野心的要求。

列甯在 1913 至 1914 年的主張是他在 1902 至 1903 年的主張之發展，同樣，他的對手底主張也是第二次代表大會時“猶太工人同盟派”和波蘭社會民主黨所犯的那些錯誤之發展（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在第二次代表大會時代，曾與這些錯誤作過鬥爭）。列甯在 1913 年 12 月寫道：“忘記這種鬥爭，這就等於又變成健忘的伊凡使自己離開俄國整個社會民主主義的工人運動底歷史基礎及思想基礎。”（參看列甯全集，第 17 卷，論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底民族綱領）。

列甯說：“從那時到現在已經有十年了，而現在鬥爭還是按着同樣的兩條基本路線進行着。這一點同時也就是證明，這一個鬥爭與俄國民族問題底一切客觀條件有深刻的聯繫。”（參看列甯全集第 17 卷第 117 頁）

反對孟塞維克底公開的機會主義和反對用革命辭句來掩飾着的“左派”機會主義，這個“向右”“向左”的全部鬥爭，只是布爾塞維克在當時為黨底革命綱領及策略的總鬥爭之一部份。民族問題上各種機會主義的立場，曾經是與取消派及“左派”底整個機會主義觀點系統密切聯繫着的。

（143）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所通過的俄國馬克思主義綱領（即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綱領）第九條，包含“國內一切民族皆有自決權”的要求。

（144）1907 到 1908 年，考茨基寫了列甯這裏所引證的一篇文章民族性與國際性，不管他有了各種的“遁辭”和向機會主義作了一

些最重要的讓步，可是在當時，他畢竟還沒有弄到完全放棄馬克思主義的地步。當時，考茨基曾用——如列甯所說的——歷史的經濟的觀點來解釋一民族的國家之產生。因此在當時，考茨基曾承認了民族自決權，但在帝國主義大戰時期，在考茨基根本叛背了馬克思主義的時候，也就否認了民族自決權。至於奧地利的社會民主黨人鮑威爾以及和他一塊的斯賓格爾（他們兩人現在是奧地利社會法西主義底領袖），則是機會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的“文化民族自治”綱領底起草人，而這個綱領，也就是為猶太工人同盟一開始就從奧地利社會民主黨人那裏所抄襲去，而後來也是為孟塞維克取消派所抄襲去的。鮑威爾曾認為應當這樣解決民族問題，就是說，給民族以最大的自由去發展“民族文化和民族性”及民族語言。為着這個目的，必需“把每個民族在一縣、一府、一州、一國之內，統一成為公法團體，這個團體的任務，就是關心到怎樣去滿足民族底文化需要，替民族創辦學校、圖書館、戲院、博物館、人民大學，遇必要時就給同族者以法律上的援助。”（鮑威爾著的民族自主，見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第33頁，着重點是我們加上的——編者）

鮑威爾反斯賓格爾就是拿列甯這裏所講到的那種“心理的”關於民族的理論來作這個民族文化自治的綱領底根據的，列甯把這種“心理的”理論來和考茨基在1908到1909年的“歷史的經濟的理論”對照。

馬克思主義者對於什麼叫做民族的問題答覆如下：“民族——這就是語言、地域、經濟生活、心理結構這些東西在歷史上形成了的穩固的共同性，這種共同性表現在文化底共同性上。”而且，“這些標誌中，沒有一個足以單獨拿來作為民族底定義的。不僅如此，這些標誌中只要缺少一個，民族就不成其為民族了。”（斯大林）

這個定義底基礎是物質條件——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經濟生活。共同的語言是在共同的經濟生活基礎上生長起來的，而沒有共同的語言，共同的經濟生活也是不可能。最後，從這一切東西就產生出特殊的心理結構及共同的文化。

鮑威爾和斯賓格爾以唯心論的觀點作出民族底定義。依鮑威爾底意見，民族就是“因命運相同而性格相同的那些人們底一切總和”。這裏沒有指出最主要的最基本的東西——共同的經濟生活與地域。鮑威爾認為人們之結合為一個民族，不是由於他們生存底物質條件而是由於“心理”，由於“性格”。斯賓格爾在這方面則甚至更進一步。他的民族定義是這樣的：民族就是“與土地無關的現代一部份人底文化的共同性”，他在一個地方簡直說：“民族就是思想與感覺底總和，因而就是純粹的內部生活……。”

文化民族自治的綱領，是從鮑威爾和斯賓格爾底“心理的”理論中產生的，該綱領底實質就是主張：許多民族國家內的學校工作及其他一切文化工作按各民族而分開。

這個綱領帶有深刻的機會主義性。牠首先是要用暴力把各民族束縛在一國之內，因為（舉例來說），某個民族與奧國分立而建立獨立國家，這就是“使奧國瓦解”，而依文化民族自治論底創造者看來，這是絕對不能容許的。

第二，這個綱領是民族主義性的。當文化民族自治綱領底起草人企圖回答為什麼要依他們的綱領來解決民族問題的時候，他們就這樣說道：這是為的要消滅民族間的糾紛，展開階級鬥爭。又問文化民族自主對於工人有什麼好處，我們就回答道：使工人同化於本民族底“共同的民族文化”。這在資產階級社會內，無非是同化於“自己的”民族資產階級，脫離國際無產階級。

(145) 列甯這裏大概是指特魯伯茨基（按其觀點是個立憲民主派）底文章，其標題為新的地方自治制的俄羅斯，登載在1913年俄國思想第12期上。他在這篇文章內講到社會民主黨人底土地綱領，他說：

“1905年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因策略上的關係’不得不採取蠱惑式的根本就違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的土地綱領，因為當時市場上需要這種商品，如果沒這種‘誘人的’綱領，就不能在農民中間得到勝利。”（1913年俄國思想第12期第10頁，着重點是我們加上的）

說社會民主黨底土地綱領違反“馬克思主義底基本原則”，這暗中就是說，俄國社會民主黨底綱領與西歐社會民主黨底綱領不同。

(146) 列甯這裏所說的巴爾幹戰爭是發生於1912年到1913年。共有三次。第一次從1912年10月9號（舊歷9月26日）開始，因1912年12月3號（舊歷11月20日）的休戰條約而停止。第二次開始於1913年1月30號（舊歷17日）因休戰條約破壞而繼續開戰，到1913年5月14號（舊歷1日）才結束。第三次從1913年6月30號（舊歷17日）開始，1913年8月10號（舊歷7月28日）告終。

前兩次戰爭是巴爾幹各小國（保加利亞、塞爾維亞、希臘、黑山）與土耳其的戰爭。最後一次是保加利亞與羅馬尼亞、希臘、塞爾維亞之間的戰爭。前兩次戰爭是為爭馬其頓而起，巴爾幹各國想從土耳其手裏奪取馬其頓，彼此瓜分。後一戰爭是因為打敗土耳其以後，因分贓而起。

這些戰爭中當然帶有民族解放戰爭底因素。十九世紀下半期歐洲“頭等”強國在巴爾幹所施行的政策，把那裏的民族關係弄得極其混亂，以至要引起“修正邊界”的鬥爭，不知有多少藉口，然而列甯在

自己的一篇文章內，預告大家不要過於估計這種因素。他說：“資產階級的報紙，從新時代起到言論止，都講到巴爾幹的民族解放，而把經濟解放忽略過去。但實際上主要的正是經濟解放。”（參看列甯全集第16卷第186頁）。

當時在巴爾幹各國，客觀上放着一個任務，就是要使各民族底農民擺脫地主底統治而得到經濟解放。這個任務，尤其在馬其頓特別緊張，因為那裏地主是土耳其人，而農民則是斯拉夫人。因此將土耳其人逐出馬其頓，這是革命的任務：“塞爾維亞人及保加利亞人底勝利，就是破壞馬其頓封建制度統治基礎，就是造成多少自由的擁有土地的農民階級，就是保證巴爾幹各國全部的社會發展，這種發展是曾經被專制制度及農奴制度所阻礙的。”（參看列甯全集第16卷第186頁）

除巴爾幹戰爭之外，列甯同時又提到波斯、土耳其及中國的革命。這些革命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首先是反對這些國家內專制政體的。可是因為這些國家內的反動勢力都有俄國及西歐各帝國主義國家做後台老板，所以這些國家內的革命鬥爭客觀上是民族解放鬥爭。關於這幾次革命的詳細情形，可參看本卷內世界政治上的引火物，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族主義，維新的中國底各文（第407至431頁）和註釋（158）及（168）。

（147）德國60年代，恰恰是由各國分散的德意志小國組成統一的大國的時候。本來歷史上情形是這樣，就是這個任務底解決，有三條可能的道路：民族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道路，在奧地利領導之下實行統一的道路，在普魯士領導之下實行統一的道路。可是60年代，對於民族革命沒有順利的環境。所以統一德意志的任務就不得不由後兩條道路中的某一條來解決。列甯這裏所說到的1866年戰

爭，就是普、奧爭取這種統一底領導權而起的戰爭。力量比較薄弱的奧國很快就被打敗了。結果，奧國退出德意志聯盟。德意志統一在普魯士領導之下進行了。（參看本卷註釋(22)及(140)）

(148) 奧國社會民主黨在布恩納的代表大會是在1899年9月24到29號舉行的。民族問題在大會上佔了中心地位。當時有兩個決議：一個是由黨底聯合執行委員會（中央委員會）所提出的，一個是由南斯拉夫社會民主黨委員會所提出的。第一個決議，是主張所謂地域自治，即是要求奧國底各民族區一律自治。第二個決議則主張鮑威爾的所謂“文化民族自治”。結果通過這樣一個決議，這個決議說道：奧國應當變成“各民族聯合國”，而且——（1）每個民族區域應有自己的民主自治權，而每個民族在本區內應統一為民族聯合會，牠有權完全獨立地辦理其一切民族事務；（2）應由“帝國議會”規定特別法律，來保護少數民族的權利。

如此，在布留恩大會上“文化民族自治”的要求並沒有通過。可是大會所通過的綱領也沒有要求各民族有自決、直到分立和建立獨立國家之權。

(149) 列甯這裏是指護黨報（布爾塞維克調和派及普列漢諾夫派底機關報）第5期上胡拉奇米洛夫底一篇文章，標題為中央與黨工作人員的夏季會議。在這篇文章裏，作者也批評到“夏季會議”關於民族問題的決議案。（參看本卷註釋(142)及(151)）

(150) 專論這些問題的第五、第六兩章，沒有載入於本卷（參看列甯全集第17卷第442到455頁）。現在將這兩章底內容略述如下：

第五章底標題是民族問題上的自由資產階級與社會黨人機會主義者。列甯在這章內詳細分析俄國自由資產階級在民族問題上的立

場。他指明：這種立場完全是國家主義的；俄國資產階級擁護自己的階級利益，而不承認民族自決權，並在這問題上，牠不但反對社會民主黨，而且反對被壓迫民族底民族資產階級，在這鬥爭中，牠與農奴主地主及地主的專制制度聯合起來。在這種情況之下，社會民主黨如果否認民族自決權這一個要求，這事實上替大俄的資產階級效勞，而歸根結底，也就是替黑幫的地主及沙皇制度效勞。

第6章底標題是挪威與瑞典的分立。盧森堡認為1905年挪威與瑞典的分立，這並不能成爲證明“民族自決權”口號之正確的一個例子，這“只是表現農民與小資產階級底分立主義，表現他們希望自己出錢來買得‘自己本身的’國王，而不要瑞典貴族所強給他們的國王，因此，這回運動沒有絲毫革命氣味。”（參看列甯全集第17卷，第451頁）列甯則與這個觀點相反，他指出，這次分立是民主主義的事情，因為牠在挪威消滅了“瑞典貴族底束縛”。

依列甯底意見，挪威的例子，“事實上證明，覺悟的工人一定要系統地宣傳並準備：務使爲民族分立而起的各種可能的衝突，只有像1905年挪威與瑞典的衝突那樣去解決，而不要‘依俄國式’來解決。”（參看列甯全集第17卷第452頁）

至於挪威在分立之後建立了君主制度。這當然不利於無產階級，無產階級應當起來反對這點，提出民主共和制度的要求，可是這並不是說，無產階級因此就應當反對分立。瑞典工人會主張分立，而且這只是鞏固了他們與挪威工人之間的聯合。

（151）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與工作人員合開的（1913年）夏季會議底民族問題決議第四第五兩條上（參看註釋（116）及（142））這樣說着：

“第四，至於沙皇君主制度壓迫下的各民族有民族自決權，

即是有分立與建立獨立國家之權，那末，社會民主黨無條件地應當堅持這種權利。一般的國際民主運動底基本原則，尤其是俄國大多數人民從沙皇君主制度方面所受到的那種空前的民族壓迫，都要求這樣做；沙皇君主制度與歐亞各鄰邦比較起來，是一個最反動的最野蠻的國家制度。

再則，大俄人民本身的解放事業也要求這樣做，因為如果不剷除黑幫的大俄民族主義，大俄人民就不能創立民主的國家，這種民族主義是由屢次向民族運動施行的流血罪殘的傳統所維持着，牠不僅被沙皇君主制度和一切反動政黨加以有系統的培養，而且被那個向君主制度效犬馬之勞的大俄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尤其是在反革命時期）加以有系統的扶植。”（參看列甯全集第17卷第12頁）

“第五，民族有自決權（即是由國家憲法來保證以完全自由的及民主的方法解決分立問題）的問題絕對不應與某個民族分立是否妥當的問題混為一談。對於後面一個問題，社會民主黨每次都應完全獨立地站在整個社會發展底利益上，站在無產階級為社會主義的階級鬥爭底利益上去解決。

社會民主黨在這裏應當注意到，被壓迫民族底地主牧師及資產階級，常常用民族主義的口號來掩飾他們那種分散工人和愚弄工人的企圖，暗中與統治民族中的地主及資產階級互相勾結以犧牲各民族中的勞動羣衆底利益。”（參看列甯全集第17卷第12至13頁）。

（152）列甯往後所引證的馬克思及恩格斯的各段話，是由他從馬克思與恩格斯底下列各信中引來的（信的順序是依列甯原文中所排列的順序排列的）。

一、1907年7月5號（列甫誤寫為7月15號）的信，該信論到羅巴庭及他對於波蘭的態度，——“Der Briefwechsel zwischen Friedrich Engels und Karl Marx”，Bd. 4. S. 29?（恩格斯馬克思通信集第四卷第292頁），並未譯成俄文。

二、1851年5月23號的信，該信論波蘭及俄國（見俄文的馬克思恩格斯信札集，由阿多拉茨基編輯的，1928年版第47到48頁；見馬克思恩格斯學院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1928年版第209到210頁）。

三、1862年10月4號的信，該信說到反對馬駿尼底民族主義的鬥爭（見俄文的馬克思恩格斯信札集，由阿多拉茨基編輯的，1928年版第230頁）。

四、1866年6月20號的信（見同書第233頁）。

五、1867年11月2號的信（見同書第218頁）。

六、1867年11月30號的信（見同書第219到220頁）。

七、1869年8月18號的信（見同書第250頁）。

八、1869年11月18號的信（見同書第221頁）。

九、1869年12月10號的信（見同書第225頁）。

（153）60年代末葉，是愛爾蘭反英吉利的民族解放鬥爭空前緊張的一個時期。這個鬥爭是由所謂“芬尼黨”領導的，該黨還在60年代初期就已成立，是愛爾蘭小資產階級智識界底一個半恐怖主義的組織。英政府曾用高壓手段來對付這個運動。1865年起，芬尼黨人運動底著名領袖們就開始被捕。芬尼黨人於是就組織了鬥爭以謀自己領袖們底解放。事情弄到了公開的騷動。1867年9月18號，芬尼黨公開襲擊囚禁被捕的芬尼黨人的一輛囚車。當政府鎗決了這次襲擊底幾個參加人的時候，芬尼黨人就轟炸了克利格維爾監獄底城牆，因為

有很多被捕的芬尼黨黨員坐在這個監獄裏。

結果，這個運動還是被殘酷的壓迫手段所鎮壓下去了。到1869年的時候，運動底一切首領，不是坐在監獄裏，便是逃至國外。此後幾年當中，各社會階層都注意到一個問題，即進行鬥爭以謀赦免被捕的芬尼黨人。

在愛爾蘭和倫敦，曾舉行了許多示威主張大赦。英國國會中幾次提出了這個問題。馬克思也作了積極鬥爭主張大赦。列甯所引證的第一國際總委員會決議案，反映出馬克思對這個問題的態度。

這個決議案所痛斥的格拉斯登，是當時英國自由派底領袖。在進行鬥爭主張大赦的時候，格拉斯敦是政府底首腦。該政府是在1867年成立的，當時在選舉的時候，由格拉斯敦所領導的自由黨人戰勝了保守黨人。

馬克思說格拉斯敦起來擁護美國的奴隸主，是指以下的事實。1862到1863年，在美國發生了奴隸制的南方與工業的北方之間的內戰。在那個時候，格拉斯敦以英國財政總長資格遊訪美國。北方的人，把他當作自由黨人看待而興高彩烈地招待他。然而在紐約司特爾的宴席上，他却作了演說，希望奴隸制的南方得到勝利。

關於大赦愛爾蘭暴動首領的問題，格拉斯敦在1867年的國會選舉時曾允諾實行大赦，這一種允諾是格拉斯敦的競選運動綱領底條文之一，而這些條文就保證了他在選舉中能够戰勝保守黨人和上台執政。雖然如此，但他在長久的時間內，不是拒絕實行大赦，便是向芬尼黨人提出絕對服從英國及停止任何鬥爭的條件。結果，大赦祇在社會輿論和英國及國外所進行的那種主張大赦的鼓動壓迫之下才被實行。在這種鼓動中，馬克思底長女燕尼起了很大的作用，她在法國報上投了許多文章來揭破對於被捕的芬尼黨人所施的各種殘酷的待

遇。

(154) 阿爾斯特，這是愛爾蘭極北的一部份。該省底特點就是，他自從克倫威爾時代（十七世紀）第二次佔領愛爾蘭以後，英國侵略者就以該地為巢穴。這班人多半也就是阿爾斯特底統治階級（地主，資產階級），他們老早就儘量反抗愛爾蘭脫離英國的運動。

十九世紀之末和二十世紀之初，英國政府受愛爾蘭日益增長的民族解放運動所迫，不得不作讓步，於是開始了所謂愛爾蘭的改良時期。改良是從兩方面進行的：第一，促進農村經濟中資本主義底發展（使豐裕的農民容易購買地主土地，以及其他種種辦法），第二，減輕行政方面的壓制（在大戰前夜允許施行自治制，可是大戰一起，便延期施行）。阿爾斯特的地主及資產階級努力進行鬥爭來反對這些辦法。

列甯講到阿爾斯特底例子，也就是指這種鬥爭。

(155) 波蘭代表瓦薩斯基和甘業茨基在退出第二次代表大會時，有聲明書送給大會，把他們關於民族問題的主張敘述如下：“民族問題底唯一可能的和社會民主黨在一切條件之下所必須採行的解決法，依我們的意見，就是擁護每個民族文化發展之自由，其方法是使這一些歷史上形成的國家機關民主化。”他們就根據這一點而在民族問題綱領上提出了列甯以後所引證的那個措辭。

瓦薩斯基在第二次代表大會第十七次會議上的演說中，其擁護本人主張的理由，與90年代末盧森堡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底新時代雜誌上所說的理由差不多。他的出發點，也和盧森堡一樣，認為：現時（第二次代表大會時）經濟發展底過程“日益使資本主義的波蘭與資本主義的俄國結合起來”，因此提出民族自決的問題是沒有意思的。他說提出這個問題。這便是與波蘭的民族主義取一致態度，這種

民族主義“極力想使波蘭無產階級與俄國無產階級分開，並極力想在空想的民族志願底基礎上來組織波蘭無產階級。”（見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大會記錄第124到126頁及357到360頁，1924年黨史出版社出版）

（156）波米洛夫斯基，這是十九世紀60年代俄國一位有名的小說家。這裏所講的是他的一本教會學校概論，描寫舊時教會學校內的生活。

拷打的教育方法把教會學生訓練成爲以盡力作惡爲能事的壞蛋列甯所講的就是其中一個壞蛋所作的一樁惡事。

（157）這裏是指代表自由資產階級的立憲民主黨人（科可什金之流）與黑幫地主（普力什克維赤之流）之完全一致，共同反對被壓迫民族底自決權（請參看本卷註釋（501））。

（158）本編開頭三篇文章（世界政治上的引火物——於1908年8月18號登在無產者第33期上，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於1912年7月28號登在尼瓦明星第17期上，維新的中國——於1912年11月21號登在真理第163號上）都是專論1908至1912年這一時期中的殖民地民族解放鬥爭的，這時期完全是屬於“帝國主義，帝國主義的震動以及由帝國主義所產生的震動”底一個時期。這時期，是“資產階級由上升的先進的階級成了下降的、衰落的、內部死亡的、反動的階級”的時期。（參看列甯全集第18卷在他人的旗幟之下一文第110頁）

各資本主義國家裏面反對封建制度的資產階級革命時代，曾是資產階級進行民族戰爭和創立民族國家的一個時代。現在的情形已經改變了。現在各帝國主義國家反動的資產階級已經不進行反對封建制度的戰爭，也不作民族戰爭了。反之，現在“到了這樣一個歷史時

期，即統治的資產階級因為害怕正在發展而強固的無產階級，所以維持一切落後的、正在衰亡的、中世紀的東西。正在衰亡的資產階級與一切已經衰亡的及正在衰亡的勢力聯絡，以便保持動搖着的僱傭奴隸制。”（參看列甯全集第16卷落後的歐洲與先進的亞洲一文第395頁）

可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已經變成無可救藥的反動的正在下台的階級，這還不是說，資產階級的民主運動及民族運動一般地已經終止了。正是相反，帝國主義一增長，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在牠所奴役的各附屬國及殖民地中的壓迫也隨之而加強，而且這些運動是增長着，不過牠們主要的舞台已從帝國主義的歐洲移到東方被壓迫的國家去了。“強大的民主運動在亞洲到處發展着，擴大着，日益強固起來。那裏，資產階級還與民衆共同反對反動勢力。數萬萬人民正在覺醒起來，求生活，求光明，求自由。”（同上）

歐洲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因擁護自己的強盜的利益而“幫助民主運動底敵人”。殖民地國家中的這一切民主運動，不但是反對本國封建的反動勢力，而且還反對帝國主義。在帝國主義面前，兩個敵人底力量正增長着，這兩個敵人就是：帝國主義國家底無產階級與東方被壓迫國家底民主力量。俄國將來的革命有兩支同盟軍：一支來自東方，一支來自西方。

列甯之擁護“民族自決權”的要求，也就是擁護西方無產階級與東方民主運動之聯合。列甯爭取對於這些運動底作用的正確了解，這就是在歐洲準備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環節，這一個社會主義革命也“不能不說是一切和各種被壓迫者與不滿意者底羣衆鬥爭之爆發。”（參看列甯全集第19卷關於民族自決問題的辯論底總結一文第269頁）

(159) 列甯這裏所講的反革命政變是1908年6月末由波斯王麥梅德、阿里在特黑蘭所舉行的。這次政變是反對1906年革命結果所產生的波斯國會。這次政變底階層內容，就是地主與官僚戰勝人民中間的革命階層（商業資產階級，手工業者，智識份子）。政變是藉俄國一旅哥薩克兵底武力來完成的，該旅由略霍夫大佐指揮，駐在特黑蘭。波斯王還在春季被人謀刺不成以後，就在特黑蘭宣佈戒嚴，並給與略霍夫以獨裁的全權。6月間，略霍夫炮擊國會，驅逐議員，而把幾個最積極的議員絞死。此後，波斯王就任命他為特黑蘭的督軍。英國似乎站在一旁，沒有參與這些事變，甯肯借俄國的反動勢力去消滅革命，然後則坐收“勝利”之果。然而，牠對反動派所採取的“友誼的中立態度”，十分明白地表明牠是站在那一方面的。

國會解散以後，波斯革命並沒有終止。各省爭取資產階級憲法的鬥爭還繼續到1911年。列甯往後所說到的達夫里斯，就是這鬥爭底主要中心（直到1910年春為止）。特黑蘭六月政變以後，達夫里斯的“恩周門”（即選出來的委員會，1906年起，這種委員會曾握有各省政權）馬上就宣佈麥梅德、阿里為廢王，並組織城市底防守。此種防守繼續到1910年4月：後來，只有俄國軍隊才得消滅牠。1910年4月間，俄軍藉口“保護俄國國民”而佔領了革命的達夫里斯城。

列甯把特黑蘭政變比作第一次國會之解散，而把達夫里斯防守則比作1905年12月的莫斯科暴動。



(160) 列甯所說的少年土耳其黨人之勝利，這是1908年土耳其革命之開始。領導這次革命並在革命勝利後取得政權的“少年土耳其黨”，還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就成立了。該黨主要的是從土耳其的智識份子和軍官中間徵收其黨員的，牠的政綱與行動都是反映出已在發展的土耳其資本主義底利益。

由該黨領導舉行的這次革命開始於1908年7月，起始於一小羣兵士底暴動，暴動指揮人是下級軍官尼西伯及恩維伯。當馬其頓人民贊助暴動者而政府底一切討伐企圖遭受失敗的時候，土耳其王阿伯都、哈米德即實行讓步，而宣佈施行他自己在1878年所取消的那個所謂1877年憲法。這就保持了他的王位，而這樣一來，就使他能夠準備並實行反革命的政變（1909年3月31號）。然而少年土耳其黨又能很快地戰勝他，自己取得政權，將他推翻而宣佈新王。

（161）從1905年起，印度的民族運動便活躍起來了。在所謂“國民大會”（這是印度進步的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底民族組織，成立於1885年）底1905年第21次常會上曾通過一個“排貨”綱領（專用國貨，抵制外貨）。印度資產階級用這種綱領來對付英國阻礙印度工業發展的政策。這綱領通過以後，全國到處都宣傳抵制外貨，主張開辦本國工廠及本國銀行。這種宣傳在孟加拉（印度最富的省份之一）進行得特別厲害。英國政府因此頒佈法律，把孟加拉分成兩省，故意使一省人口以印度人佔多數，另一省人口以回教人佔多數，這樣一來，這兩省人民的相互關係就極端惡化起來了。於是印度“國民大會”就在1907年的常會中宣佈：在英國政府沒有取消這種法律以前，實行抵制一切英貨。同時，工人運動底萌芽也出現了：1906年有鐵路工人及煤礦工人罷工，1907年加爾各答（印度的京都）麻廠工人罷工。

當時英國內閣內主持印度事務的總長（從1906到1910年）是自由黨人約翰·莫萊。他採用種種的壓迫手段去對付解放運動之興起。他趕快從文庫內翻出1818年的老法律來，根據這條法律，凡政治上“形跡可疑”的人，可由總督不經法庭而直接驅逐出境。1908年又特別頒佈了兩條法律，禁止土人製造及保藏任何的炸藥和武器，違者

須受極嚴格的處分。印度許多革命家都被驅逐出境。民族運動左派（所謂“極端派”）底領袖泰拉克，因為做了幾篇談印度恐怖統治的文章，於1908年被判決監禁6年。對於出版物也採用種種壓制手段。報紙或者被封，或者受各種壓制。列甯所提到的正義報也在被封之列。到1909年3月的時候，印度記者被捕下獄及被放逐的有130人。然而所有這些辦法，連在最短期內都不能阻止印度的運動。恰恰在1908年末和1909年當中，屢次有謀刺英國官吏之事。而謀刺又重新引起新的壓迫。

（162）1907年，萍醴發生暴動，是由孫逸仙底“同盟會”所組織的（參看本卷註釋167）。這次暴動以後，1907年及1908年間，中國南方各省屢次發生暴動，誠然，這些暴動都沒有成功。這是辛亥革命（參看本卷註釋167）底預兆。列甯所講的大概也就是指這些暴動。列甯下面所說的法國幫助中國的“世襲政權”去壓迫革命，其事實是這樣：有600革命者初起把河口佔領了整整一個月，後來被官軍奪去，即退到安南，當時法國政府依北京政府底要求，將他們逐出境外，趕到新加坡。

（163）1908年7月，法國發生了幾次警察與工人之間的流血衝突。7月2號，威尼約城罷工的土工與憲兵衝突，工人死者1人，傷者10人，憲兵受傷者4人；7月6號，聖普利城工人與警察衝突，工人受傷者13人。7月30號，又在威尼約，工人與警察互相射擊，工人死者3人，傷者20人。同日，巴黎近郊，維爾尼聖朝什地方，遊行的罷工工人與警察衝突，弄到建築街壘的地步。列甯這裏所提到的就是後面這一次衝突。

如果工人之起事，與警察之衝突，街壘之建築等等都是明顯地指明階級矛盾底緊張化，那末，政府元首急進派克勒蒙梭之行動也同樣

明顯地指明這種緊張化。還在1906年，當法國北部罷工的煤礦工人代表團去見克勒蒙梭的時候，他向代表團說了下面這句列甯所引證的話：“我們與你們已經各站在街壘底兩方面了”，旋即派兵去鎮壓罷工者。當時，他身為政府底元首，本負鎗殺工人之責，但他在議院內演說，却將罪過一手推在社會黨人身上，責備他們，似乎只有他們是鎗殺案之罪魁，因為，煽動工人起事的，就是他們。

克勒蒙梭從這時候起，即開始仿效1848年6月在巴黎槍殺暴動工人的將軍們及1871年指揮鎮壓“巴黎公社”的哈里佛將軍。“巴黎公社”被鎮壓以後，法國工人進行街壘式的戰鬥是從克勒蒙梭政府時代開始。

(164) 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就是從“巴黎公社”（1871年）失敗起一直存在到現在的共和國。第一共和國是從1789年法國革命以後存在到拿破崙第一稱帝（1804年）止；第二共和國是從1848年革命時起存在到1851年恢復帝制時代止。

(165) 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一文，登在1912年尼瓦明星第17期上，與孫逸仙底中國革命底社會意義一文底譯稿同時發表，作為這篇文章底評註。孫逸仙文章底內容如下：

該文起初標明孫文主義底“三大主義——（1）民族主義，（2）民權主義，（3）民生主義”——並指出前兩個主義已因辛亥革命而實現了，現在要謀實現第三個主義，即“經濟革命”。孫逸仙說，如果認為中國維新底目的是要造成如英美法等國那樣的力量國家，那就錯了。他說，在這些國家裏面，“貧富懸隔太遠，人民染着革命思想。如果不發生社會革命，則大多數人還是得不到快樂與幸福。現在這種幸福只是歸幾個資本家獨享。大批勞工還是窮得要命。”孫逸仙又說：“民族革命與政治革命是容易的，可是社會革命則比較困難了”；要是在工業

發達的文明國內，實行社會革命是很困難，那末在中國，“這個革命則比較容易”，“我們有可能防止資本主義統治之到來”。他又說：“如果我們從中華民國成立起就不想到防止在最近期內會建立的資本主義，那末比清朝專制還要可怕百倍的新專制就要到來，且須要一次大流血才能擺脫牠”。孫逸仙認為行將到來的中國經濟革命底基本任務，就是“改變不動產底全部法權基礎”，使得土地稅與地價相稱——一塊的土地少納稅，高價土地多納稅——使得“不動產價值底增殖為創造這種價值的國民所有，而不為偶然成為土地私有者的私人資本家所有。”

孫逸仙底文章是由尼瓦明星編輯部從1912年7月11號不律塞爾國民報（“Le Peuple”）上轉載過來的。

（166）是指哲學底貧困，第二章第四節私產或地租；資本論第三卷，第二部，第四章第五節；剩餘價值論第二卷，第一部，第一章，第四節羅伯圖斯論李嘉圖。

（167）1911年中國發生革命。起來反對代表封建主官僚的中國專制政府的，有城市資產階級，農民與無產階級，固然，無產階級在當時還沒有自己的政黨，因此也沒有起獨立的作用。地主官僚不但最兇暴地剝削國家，而且為自身利益起見，極力使國家受帝國主義者的束縛。因此，中國反封建的鬥爭，在1911到1912年，實際上就已經是反對束縛中國的帝國主義的鬥爭。因此，“民主的”歐洲不但不“承認”革命，而且用金錢幫助反革命。革命底支柱是工業先進的南方，反革命底支柱是經濟落後的北方。革命首領就是著名的孫逸仙。列甯在上面一篇文章內，認為孫逸仙是接近於俄國民粹派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他從1901年起組織“同盟會”，後又與自由派合成一個“國民黨”。反革命底首領是袁世凱。1912年初，袁世凱與南方作了長期談判後，

承認了民國，可是達到了把一部份革命軍隊解散的目的。這就使他的地位大行加強，而使革命的勢力大行減弱了。袁世凱既把舊的官僚機關保留不動，於是從那個時候起就很快地努力取得全中國的獨裁政權。國會選舉時（列甯在文章內提到這次選舉），袁世凱派獲得多數。前任臨時大總統孫逸仙把總統位讓給袁世凱。於是袁世凱就做了大總統。1912年初向袁世凱讓步，這是南方第二次大失敗，這是孫逸仙及其政黨底機會主義策略之結果。同是在1912年（7、8月），孫逸仙及其信徒受“國民黨”內部右派份子底脅迫，又作了第三次大投降的行爲：使“國民黨”與右的（就其思想與政治主張而言）“共和”派合併。成立了一個把大資產階級、中等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鄉村資產階級底各個集團統一起來的政黨，叫做“中國國民黨”。

（168）蒙古當時受着中國統治。中國商業資本用高利貸手段及兇暴的經商方法，極兇暴地剝削蒙古人民。此外，北京政府爲鞏固自己的統治起見，恰在辛亥革命前夜，製定了一個由中國人開拓蒙古的大計劃，且開始來實行牠。

這一切情形就引起蒙古反中國的民族運動。俄國沙皇政府就決計利用這種運動，以便使蒙古脫離中國而歸併俄國。1910年秋，蒙古有巴衣爾、託克託蒙底遊擊隊，起來反抗中國，於是沙皇政府就幫助牠，給牠以逃身之地，給牠以各種可能去攻打蒙古境內的中國人，去宣傳蒙古應脫離中國。這一宣傳底結果就是，1911年夏，蒙古王公及喇嘛就在庫倫開代表大會，並以大會名義派代表到彼得堡，請求俄國干涉蒙古事情，俄政府答應贊助。

同年秋，蒙古王公及喇嘛乘着中國革命使中國政府無暇顧及蒙事的時候，即宣佈外蒙古獨立。此後俄政府就趕快在蒙古鞏固自己的地位。1912年11月3號（舊歷10月21日），俄國與蒙古新政府訂結

條約，俄國答應幫助反對中國人，而取得許多權利與優待條件（通商不納稅，自由購買和租借土地，牲畜經過蒙古境時沿途畜牧不要錢，自由割草，捕魚，打獵等等）。

這一切為俄國統治階級利益而對民族運動的幫助，列甯就稱之為蒙古受俄國“親密擁抱”。

（169）由註釋 167）上已可以看到，“不遠的將來”已證明農民未能把自己民主的立場保持下去。1925到1927年的中國革命更明顯地說明了列甯底這個思想。在這次革命中，孫逸仙底“國民黨”在相當時期內會領導過反帝國主義運動。然而工農運動底發展迫着牠倒戈來反對革命，並與帝國主義者妥協。現時“國民黨”起反革命的作用，而中國農民則在城市無產階級及其共產黨底領導之下進行革命鬥爭反對地主及資產階級，而且中國工農革命已經在八千萬人口的廣大領土內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在這些領土內實現着工農革命民主專政。

（170）在斯都加爾大會上（1907年），因為大會上以列甯為首的左派份子（盧森堡等人）提出對軍國主義問題決議的修正案，曾經明確規定了一個基本的戰略任務，而各國社會黨人都應集中無產階級底力量去解決這個任務，這個任務就是：加速資本主義統治底顛覆，其方法就是準備羣衆去作社會主義革命來對付資本家之準備世界大戰。

這個口號雖然遇到第二國際底領導黨——德國社會民主黨方面的反對，可是終於被大會通過了。德國代表團共有300人，他們在大會上擁護機會主義的政策和策略。在大會選出的各委員會（軍國主義問題委員會，僑民問題委員會，殖民政策問題委員會）中，有老機會主義者達微特、培恩斯坦、彼伯洛夫等人充當德國的代表，列甯把

這班人認作絲毫沒有社會主義氣味的人。

列甯底國際社會黨人底斯都加爾大會一文登在布爾塞維克出版的1908年年鑑上。該文估計這次大會底工作，明顯地標明列甯如何與戰前第二國際中的右派機會主義，中派主義及無政府主義的左傾（愛爾維）作了鬥爭，並一般地說明在斯都加爾大會以後會放在革命社會民主黨人面前的任務。

（171）德國社會民主黨底德列斯敦大會是在1903年舉行的。大會上討論底中心問題是關於修正主義的問題，因為在大會不久以前（1899年），培恩斯坦出版了一部名著：社會主義底前提與社會民主黨底任務。德列斯敦大會斥責了培恩斯坦對於馬克思理論的修正，認為這是企圖“把站在階級鬥爭及奪取政權這個觀點上的致勝政策，暗中代以親善地迎合現制度的政策。”大會又預告黨，叫他以後也要反對這樣的企圖：把革命的黨變為“以資產階級制度之改良為滿足”的黨。

1904年舉行的“第二國際”亞姆斯坦大會審查了修正主義問題，並通過了一個關於社會黨策略底國際規例的決議，該決議重覆德列斯敦大會決議底一切基本原則。然而這兩次大會之斥責機會主義，帶有中派調和主義的性質，而德國社會民主黨底中派領導份子，不僅把培恩斯坦及其同伴這些公開的資產階級代辦容留在自己隊伍裏，並且還給他們參加黨的領導，中派份子既迎合這班資產階級的代辦，於是就領導黨走上機會主義的道路。

（172）福爾馬在斯都加爾大會軍國主義問題委員會內的演說中，離開革命的無產階級的原則和宣傳資產階級的愛國主義。他說：“說我們沒有祖國，這是不對的。我們是有祖國的。對人類的任何博愛都不能妨礙我們做個良好的德國人……。我們認為反軍國主義的宣

傳，不但在策略上是不正當的，而且在原則上也是有害的。”

在工人僑居問題委員會上，德國代表彼伯洛夫關於亞洲工人僑居問題，擁護民族國家主義的主張。他證明，“國際”應當贊成用立法限制“黃種”工人（中國人、日本人及馬來人）移居於“文明”國（德、英、美等）。他證明，這些工人既同意得較低工資而做工，實際上就是工賊。因此，對待他們也應當同對待工賊一樣，不許他們移居到“文明”國去。這樣看來，彼伯洛夫主張用資產階級的立法，禁止亞洲工人到歐洲各國來做工。

同時，達微特（也是德國代表）在殖民地問題委員會內又說：因為殖民政策是資本主義底必不可免的伴侶，所以社會民主黨並不是應當反對殖民政策，而是應當主張改善殖民地人民底勞動條件，主張由資產階級正當地開發殖民地的富源。他說：“我們應當創造自己的殖民政策”。社會民主黨應當在殖民地爭取特殊的勞動保護制，而不要站在否認殖民政策的這個無所裨益的立場上。

達維特這樣豈有此理地擁護對殖民地的剝削，而培恩斯坦則企圖給他以“理論上”的根據。他說，世界上有兩種民族，一種是統治的，一種是被統治的。他說，有些民族還是小孩子，他們自己不能發育。培恩斯坦從這個“理論”中作出結論，說殖民政策甚至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也是必不可免的。

（172）關於職工運動“中立”的機會主義理論，是在德國創立的。這個理論是代替另外一個同樣錯誤的理論，即所謂“利用”工會的理論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其發展底初期，或者是完全否認（一部份人）工會之任何意義，或者是認為（另一部份人）只有把工會當作黨的鼓動場所而“利用”他，工會才有用處。工會一天一天地發展起來，加入工會的工人一天一天地增多起來，於是黨內懂得職工運動重

要性的人也一天一天地多起來了。但是整個兒講來，黨承認職工運動是有重大的意義。然而德國社會民主黨却認為，職工會底任務，只在於進行鬥爭以謀改良資本主義社會內的勞動條件。這個鬥爭，最好是由職工會不受黨的領導而來進行。至於願為社會主義而鬥爭的工人，則他們就應當加入黨。這樣一來，職工運動“獨立”或“中立”的理論就代替了關於“利用”職工運動的理論。這個理論底害處，就在於牠使職工會脫離黨和黨的領導，並督促職工會專做經濟的改良主義的工作。

“俄國社會民主黨”第四次統一的（司託阿爾姆的）代表大會底決議案，如列甯所說的，批准了“擁護中立論的人們底主張”，該決議案是一個孟塞維主義的決議案。牠的結尾說道：

“大會認為

（1） 黨應當贊助工人組織工會的這種願望並用各種辦法來協助無黨派的職工會之成立；

（2） 因此，在利用一切公開可能、局部地是利用工會法的時候，應該不斷地擴大公開範圍，其方法就是不斷地爭取工會底全部自由；

（3） 全體黨員都應加入工會，積極參加工會一切工作和在工會會員中間不斷鞏固他們的階級團結精神和階級意識，以便在鬥爭中及鼓動中，與黨發生密切聯繫。

這個孟塞維主義的決議案，模糊地說什麼“鞏固階級團結精神和階級意識”，什麼“與黨發生密切聯繫”，其實是實行工會中立的機會主義主張，否認黨對工會有領導之必要，反對工會參加政治鬥爭去實現無產階級底社會主義任務。布爾塞維克提出了自己的決議草案來和孟塞維主義的決議對立。布爾塞維克的決議要大會承認：“黨應當

竭盡其力，以便教育工會中的工人們去廣泛地了解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及其社會主義任務，以便在這些工會裏用自己的活動來爭取真正的領導作用。以便使這些工會在相當的條件之下，能够直接歸附黨，然而並不是把非黨的會員排斥出去。”布爾塞維克的這個對於工會與黨相互關係的觀點，曾為第四次代表大會所否決，但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五次倫敦代表大會上，布爾塞維克却用更加明顯的形式實現了自己的這個觀點。第五次代表大會關於工會的決議案說道：“大會再度批准統一大會關於工會工作的決議，同時向職工會內工作的一切黨組織及全體社會民主黨人，提出社會民主黨的工會工作中的基本任務之一：促進工會承認社會民主黨思想上的領導，以及與黨建立組織上的聯繫，凡地方條件允許的地方必需實行這個任務。”

（174）“英國社會民主聯盟”產生於1884年，是帶有急進情緒的社會主義的智識份子底一個小團體。牠主要的是在不熟練的工人中及失業工人中進行工作。聯盟舉行了羣衆大會，遊行示威，從事鼓動，主張無產階級成立自己獨立的階級政黨。

社會民主聯盟，經過多次分裂之後，於1912年改名為“不列顛社會黨”。牠自始至終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小組。聯盟之所以帶有這種小組的性質，是由於牠的不正確的策略以及英國工人運動底發展條件所致。牠的不正確的策略，就在於牠極其忽視為工人日常需要的鬥爭。聯盟認為減少工作時間，實行國家保險等等要求都是有害的要求，足以使工人階級去和資產階級調和，足以使他們離開革命鬥爭。聯盟在自己的選舉策略上（國會選舉時），有時採用不可容許的手段。牠與自由派鬥爭時，向保守派去領經費來組織這個鬥爭。牠對工會（工聯）也採取了不正確的態度，因為牠要求工會完全採納聯盟

底綱領。所有這些錯誤，在英國工人運動條件之下，便使社會民主聯盟不能不成爲一個小組。

(175) ‘獨立工黨’是1893年成立的。該黨是從工人貴族及工會官僚中產生出來的。列甯很中肯地估計該黨爲“離開社會主義而獨立的”黨。該黨就其性質與行動而論，完全與“社會民主聯盟”相反。“獨立工黨”活動底中心就是稍稍改善工人階級的狀況，而把社會主義拋在一邊。在資產階級的社會範圍內實行改良，這就是該黨底主要目的。該黨認爲實行改良的手段是國會活動，在市政廳內及資產階級公法團體內進行工作。該黨從未宣傳過和進行過革命的階級鬥爭。現在該黨是真正出賣工人階級利益的一個黨。

(176) 第一次國際社會主義婦女代表會議是1907年9月1號在斯都加爾舉行的。大會討論了兩個基本問題：(1)關於爭取婦女選舉權的問題；(2)關於組織國際婦女社會主義秘書處的問題。大會上討論婦女選舉權的時候，發現了很有力的機會主義思潮，這思潮爲奧國女代表團及英國一部份女代表所代表。

(177) 愛爾維（開始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後來是法國社會黨黨員）在1906年出版一種報紙，名爲社會戰爭，他在該報上作反軍國主義的宣傳，並發揮一種主張，說無產階級應當用罷工和暴動來對付任何的戰爭。他在斯都加爾大會上也發表了這種主張。列甯在他這篇文章內以及下面好戰的軍國主義與社會民主黨反軍國主義的策略一文上就是解釋這種“革命”詞句底錯處。

(178) 好戰的軍國主義與社會民主黨反軍國主義的策略一文，寫於1908年，登在同年8月5號無產者第33期上。這篇文章，按其內容是與論斯都加爾大會的文章相聯貫的，並且好像是論斯都加爾大會的文章底繼續。

寫這篇文章的原因，是因為1908年中，國際狀況異常緊張，世界大戰底威脅這樣厲害，連資產階級的政治家在當時也公開說到這點。

可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大戰危險緊張時期的那種行爲，實在令人寒心。斯都加爾大會以後，德國右派機會主義者既在黨內沒有遇到應有的抵抗，於是更堅決地活動了。另一方面，愛爾維及其同道者在法國不斷地宣傳其“英勇的荒唐思想”，如列甯在本文內所詳細說到的一樣。列甯這篇文章與上一篇文章同樣是一個顯明的例子，表明列甯如何在關於戰爭的問題上進行兩條戰線上的鬥爭——反對右的機會主義與左的“荒唐思想”。

(179) 所謂“馬其頓問題”底緊張是這樣：馬其頓農民幫助土耳其的軍隊所進行的反對土王阿伯都、哈米德（參看本卷註釋(160)）的暴動，希望在這個鬥爭中得到獨立。另一方面，巴爾幹的三個國家（保加利亞、塞爾維亞、希臘）都想把馬其頓吞併爲自己的領土。歐洲的大強盜（奧、英、俄等等）認爲巴爾幹上任何一個國家底加強，都對於自己不利，因此他們要求土耳其政府在馬其頓實行一些改良辦法，來改善馬其頓人民底經濟地位及法權地位而保持馬其頓仍歸己有。當土耳其反土王運動開始時，保加利亞決意乘着土耳其的內亂，要他立刻在馬其頓實行改良，否則就宣佈戰爭。這種哀的美敦書式的要求就引起歐洲各大帝國主義強國都來注意馬其頓問題。背地裏的勾結和談判開始了，俄奧關係與土保關係等等，都緊張起來了。

這裏所謂中亞細亞“問題”底緊張，是指1908年春季開始的波斯事變。1908年6月，波王得駐波的俄國哥薩克兵（由路霍夫指揮的）幫助而實行反革命的政變（參看本卷註釋(159)）。這次政變在波斯

引起了國內戰爭，使英俄在波斯的統治地位發生危險。這種情形也使得英帝國主義與俄帝國主義之間互相猜疑。彼此都生怕對方能够利用事變來加強自己在亞洲的勢力。

所謂遠東問題底緊張是指中國內戰。1907年春，南方六省發生大暴動。組織了暴動軍六萬人，反對滿清的軍隊。暴動一起，官廳大加恐慌，將中國分成“勢力範圍”的帝國主義列強也弄得提心吊胆。暴動被平服了，可是暴動者却能把武器保存下來。1907年11月19號，警官學校校長殺死一位督軍，說自己是一個革命黨員。1908年春天起，孫逸仙及其黨徒在南方各處大事鼓動。鼓勵底中心口號是：（1）推倒滿清，（2）建立民國，（3）謀中國之獨立自由。所有這些事變就使遠東問題緊張起來。（關於中國的運動及關於孫逸仙參看本卷所載維新的中國及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兩文）。

（180）克勒蒙梭與白里安底內閣是在1906年成立的，是兩黨（急進黨與急進社會黨——都是資產階級政黨）妥協底結果。這個內閣曾經派過二萬五千軍隊去鎮壓鑛工底罷工，罷工原因是由於鑛主不肯採用保險方法以致鑛下壓死幾千工人。該內閣也藉軍警的力量鎮壓巴黎五一示威。1907年，牠調動整批軍隊去鎮壓南方釀酒農民的風潮。1908年，牠調遣憲兵到巴黎附近去對付罷工的鑛工，打死大批工人。該內閣嚴厲取締國家機關職員參加工會。牠壓制反軍國主義的宣傳更屬野蠻。

（181）這裏是指1907年德國國會選舉以後成立的德國內閣（內閣總理是畢尤洛夫）。該內閣當政兩月。牠之所以聞名，是因為拚命建築德國的軍艦，鎮壓德國境內的波蘭人民，在1908年4月4號頒佈結社法。這個結社法禁止20歲以下的人參加政治會議和政治會社。牠使得在未到入伍期者中間進行的反軍國主義工作大感困難。列

甯往後所說的解散一切青年組織(社會民主黨的青年組織也在內)，也就是根據這個法律實行的。該法律只在1918年德國革命以後才被取消。

(182) 第二國際巴黎大會 (1889年)關於軍國主義的決議案，包含有以全民武裝去代替常備軍的要求。

在不律塞爾大會 (1891年)決議案中說道，“只有創立這種消滅人對人的剝削的社會主義社會制度，才能剷除軍國主義，才能使各國人民相安無事。”

1894年巴黎大會底決議案，指出“社會民主黨應當不斷工作，使資本主義趨於崩潰”，指出“資本主義底崩潰就是世界和平”，而責成國會裏的工黨代表們“否決軍事預算案”和“始終抗議反對供養常備軍並要求解除武裝”。

最後，斯都加爾大會在其所通過的由列甯等提出的關於軍國主義問題決議的修正案中，在列甯這裏所引的一段話之後這樣說道：“如果戰爭有爆發的危險，那末一切關係國中工人階級底義務及其國會代表底責任，就是用一切可能的力量，以使用他們所認為最適當的一切方法來阻止戰爭……。如果不管有這一切辦法，而戰爭終於爆發了，那末他們務須竭盡其力來儘快地停止戰爭和用一切力量利用那戰爭所引起的經濟危機及政治危機，以便激醒最下層的各社會階級和加速資本主義統治底傾覆。”

(183) 德國社會民主黨底愛森大會是在1894年第二國際斯都加爾大會以後立刻舉行的。這次大會討論社會民主黨國會黨團底報告時，福爾馬發言攻擊主張必需進行反軍國主義宣傳的李卜克內西。福爾馬在這次發言當中發揮了列甯所說的那種社會國家主義的觀點。

(184) “比利時社會黨”是在1877年成立的。但因為黨不會與工人羣衆發生聯繫，所以牠就毫無生氣。1885年，牠併入新成立的“比利時工黨”，該黨包含有職工會，工人文化團體，合作社等等。

黨的工作在第一個時期（1885到1902年）中，令人抱有一種希望，以為牠過些時候會變成真正的社會主義的黨。黨在這個時期中作了很大的政治工作，組織大批工會來作政治宣傳，而且真正領導了罷工，1883年在比利時組織了一次總同盟罷工和爭得了普選權，組織了普遍的反軍國主義的宣傳，創立了無產階級青年聯合會以及其他等等。

1902年起，第二次總同盟罷工失敗以後，黨便走上機會主義底軌道。黨內開始藐視理論，把改良主義的實際工作提在首位。黨底領導者自己也承認，在比利時黨內，讀過馬克思恩格斯主要著作的人差不多是沒有，狹隘的實際主義和機會主義底精神漸漸消磨了黨。

1905年俄國革命，使“比利時工黨”稍微驚醒了一點。黨內開始發出一種論調，說黨所走的路是不應走的路。1909年，組織了左派反對派底一個小集團，開始與黨的大多數鬥爭。1911年，德國社會民主黨底理論機關報新時代副刊上載有兩篇文章，關於比利時黨內的機會主義作了明確的說明。一篇是由亨利克德曼寫的，名為比利時工人運動底性質，而另一篇是由魯易德不魯克爾寫的，名為比利時底政治危機（這兩篇文章，在1922年已譯成俄文，是由國家出版社出版的，書名為亨利克德曼和魯易德不魯克爾合著：比利時的工人運動）。這些論文底作者，在戰爭的時候自己也跑到了社會國家主義方面去。

(185) 比利時工黨代表大會是1880年在魯文納舉行的。大會通過決議，主張必須成立特別的青年組織，其最主要的任務之一就是進行反軍國主義的宣傳。黨之所以有這個決議，是因為比政府總是調

遣軍隊去彈壓工人底一切大罷工。比利時“少年先鋒隊”之成立，是在1886年政府用屠殺手段平服瓦龍工人暴動之後。“少年先鋒隊”各組織作了廣大的反軍國主義的工作；出版一些專門的報紙、小冊子、標語等等，組織大會，示威遊行等等。政府究辦青年底各組織，企圖消滅牠們。牠在1895, 1896, 1901, 1902, 1903, 1904等年舉行了幾次大規模的審案，結果，各組織底許多積極份子照例被判決監禁三年到六年不等。政府雖然如此究辦，可是“少年先鋒隊”底組織還是發展，還是擴大自己的活動，這一點可從列寧所引舉的數字中看出。

(186) 馬克思在1848年德國革命時，主張德國必須對俄宣戰。俄國在當時是歐洲一切反動勢力底柱石。德奧反動勢力在國內與革命勢力鬥爭時，曾靠望於俄國底幫助（俄國也的確幫助了奧國專制政府去摧殘匈牙利革命）。因此，馬克思（在1848年）關於德國對俄國進行革命戰爭的問題寫道：“只有對俄國的戰爭才是革命德國底戰爭，——在這個戰爭中牠就可以洗清過去的罪惡，鞏固自己和戰勝本國的專制皇帝；在這個戰爭中，牠就可以丟棄長期的可恥的奴隸制度之鎖鍊，用自己子弟底鮮血，去買得宣傳文化的權利，在國內解放自己，同時解放國外民族。”

(187) 馬克思與恩格斯在1853年及1877年曾喚起英國的社會輿論，以便激起英國對俄作戰。

1853年，俄國向土耳其開戰，目的是要奪取君士坦丁堡及海峽。這時馬克思與恩格斯做文章寫道：“要是俄國佔有土耳其，則牠的勢力將加倍增長，牠將比歐洲其他一切國家底總勢力還要強些。這樣的情形，對於革命事業是極大的不幸。在這問題上，革命民主派底利益與英國底利益是相符合的。他們彼此都不能容許沙皇把君士坦丁堡作為自己的都城之一；如果事情弄到極端，則這兩種勢力會給沙皇

以同樣努力的反抗。”經過幾星期之後，馬克思又寫道：“英國永遠不能同意俄國佔領君士坦丁堡。牠應當與沙皇底敵人共同出馬……。”

1877年俄土戰爭的時候，英國自由派首領格拉斯敦擁護俄國，他證明俄國是為正義而戰。反對格拉斯敦的人說，在這次戰爭中，俄國想侵略土耳其和奪取君士坦丁堡，因此英國應當起來反對俄國。馬克思則以為沙皇政體戰勝土耳其，這會加強歐洲的反動勢力，因此主張英國參加反俄戰爭。他當時寫給一個朋友趙爾格的信內說：“我……曾贊助倫敦時髦報紙之攻擊親俄派格拉斯敦……曾影響英國上議院及下議院中的議員們等等。”

(188) 英法俄底聯合或“三角協約”，是帝國主義列強間矛盾底產物。在三角協約以前，有過俄法聯盟，該聯盟是在1893年，因法國與德國有仇，俄國與奧國（奧國是德國底同盟者）為敵而產生的。1904年，法國與英國訂結“懇切的協約”，根據這個協約，法國奪取摩洛哥，英國則佔領埃及。1907年英國與俄國訂結關於瓜分波斯和關於阿富汗及西藏的協約。英國既與法國及俄國結了單獨的協約，於是便加入俄法聯盟。“三角協約”就成立了，其目的是反對德奧兩國的。壽勒斯贊揚帝國主義者這種聯盟，這樣也就是贊成“三角協約”準備反德戰爭。

(189) 沙皇政府因與日本作戰及因鎮壓1905年革命而財政空虛，於是在1906年便向法國政府及銀行家請求給牠25萬萬佛郎（約10萬萬盧布）的大借款。法國社會黨領袖之一壽勒斯，在1906年春季黨中大事活動反對借債給沙皇政府。在這個時候，壽勒斯在法國國會中演講反對借款。壽勒斯證明，“減輕沙皇政府財政上的困難——這就是使他能够贏得時間，再去愚弄人民……。這就是由法國去分担沙皇政府屠殺和欺騙的責任……。誰借款給沙皇政府，誰就是幫助屠

殺人民的兇手。血漬會漬到助手底臉上來。”

壽勒斯反對借款的運動沒有成功。法國資產階級當時甘願鎮壓俄國革命和鞏固沙皇制度。因此，牠就借債給沙皇。

(190) 俄國1905年革命，曾在當時的俄屬波蘭地方引起了革命高漲。俄國革命一失敗，沙皇政府就開始野蠻地摧殘波蘭人。在波蘭境內成立軍事法庭，將波蘭人成千成百地判決死刑；調遣大批軍隊到波蘭境內，這些軍隊奸淫擄掠，欺侮平民。沙皇的將軍及軍官在波蘭的這種行爲，連俄國資產階級都抱不平。資產階級的報紙俄國導報當時寫道：“每天都從瓦薩傳出判決死刑的消息；這種判決多得這樣，連邊疆總監也認爲必需用比較省錢的殺人方法來代替每次須費75盧布的絞死方法，以節省官費。邊疆及這裏的居民，處在丘八們鐵蹄之下，這些丘八們逍遙法外，作惡不怕受處分。”沙皇政府在波蘭的這種可恥行爲，就引起了法國無產階級熱烈的抗議。壽勒斯在法國社會黨黨報人道報上發表了一篇熱烈的抗議書，反對沙皇“公正法庭”在波蘭的殺人行爲。

(191) 法蘭西共和國大總統（1906到1913年）華利埃爾於1906年8月9號至14號（舊曆7月27日至8月1日）到俄國，拜訪尼古拉第二。到1908年，“協約國”（英法俄三國反德奧的聯合）已經成立。法總統之拜訪俄皇和同年英王愛德華第七之拜訪俄皇是表示帝國主義列強勢力有了新的對比。這是歐洲大戰將到的證明。壽勒斯反對法總統遊俄，其理由與反對借款一樣。

(192) 所謂復辟政府是指1814年法蘭西在拿破崙第一被歐洲各國（英俄普等國）聯盟所推倒以後建立的政府。這是反動的政府，牠依靠於地主並企圖在法國恢復法國大革命以前的制度。

梯也爾與法佛爾政府則因他們殘酷鎮壓巴黎公社和殘酷壓迫工

人而著名。

(193) 考茨基曾解釋德國代表在斯都加爾大會上何以有機會主義的行爲，列甯在其論斯都加爾大會的文章內，就是引考茨基這些解釋的話。考茨基認爲，該代表團之所以有機會主義，是因為在代表團內，有一半人是工會工作人員，而在德國工會中工作的黨員則是黨底右派。

在考茨基底這個解釋中，有一點是對的。整個第二國際都知道，德國工會官僚專注意瑣屑的、日常的、渺小的、改良主義的工作，喪失了革命的前途，走上了狹隘的實際主義和妥協主義底道路。這是他們脫離黨的必然結果。黨本身內流行一時的關於工會“中立”的理論（參看本卷註釋（173））促使他們脫離了黨。於是就造成了一種情形，在這種情形之下，黨就沒有領導工會的工作，而這些工會本身底機會主義領導却不容許本着社會主義及階級鬥爭底精神以教育羣衆。

考茨基說職工會內的工作人員是黨底右派，這是對的。可是他說德國代表團底機會主義只是因為其中一半是工會的工作人員，這樣他就沒有說出全部真情；考茨基把下列的事實抹煞了：德國社會民主黨內產生出了機會主義，這不是以工會工作人員爲轉移的；羅爾馬，達微特，培恩斯坦等等都是代表團底領導者，他們從來沒有在工會內做過工作，而是社會民主黨內有名的工作人員；代表團內有許多是團結在機會主義雜誌社會主義月刊周圍的社會民主黨人，這班人實際上“沒有一點社會主義氣味”，但是却掛名爲黨員。德國黨內上層份子這種抹煞黨內正在增長的機會主義的態度，越是下去，便越足以表明德國社會民主黨底面目。這證明機會主義在黨內已經得到很大的勢力，已經征服領導的人物。德國工人運動中所不應做傲的地方，這篇文章發表在1914年4月教育雜誌第四期上，即在1914到1918年大

戰之前數月發表的。在這篇文章中，列甫激烈地反對抹煞德國黨內及工人運動上的病態。他揭破德國黨上層份子中的機會主義，要求黨終於起來與黨內腐敗份子作堅決鬥爭，因為這些份子使黨不能進行快要到來的戰鬥。

(194) “美國工人階級聯盟”，或“美國勞動聯盟”是在1887年成立的。牠把熟練工人（工人貴族）底工會統一在自己隊伍內。牠從來就極其仇視階級鬥爭，並在綱領上說道，牠將從事於純粹經濟的鬥爭，謀會員生活狀況之改良。牠極力阻止不熟練工人加入聯盟。牠堅決反對在工會會員隊伍中宣傳社會主義及政治鬥爭。牠與資產階級政黨有密切的關係，在國會選舉時，只要那一個黨答應給工人以某些改良，牠就幫牠的忙。牠的世襲總理韓伯斯（1924年死的）是我們無產階級革命底最兇惡的敵人。

(195) 這就是北美合衆國底議院。牠是兩院制。上議院或參議院是由每個聯邦選出（由各聯邦底議會選出）兩人組成的，任期6年；下議院或稱衆議院，其議員共391人，是由各區選出的（以居民之多少爲比例），任期2年。美國立法權屬於國會。

(196) 列甫所謂“如某國警察貪官之輕視第三等人一樣”，這句話是指俄國說的。所謂“第三等人”是指小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沙皇警察對他們非常賤視。

(197) 關於賀伯本人和馬克思恩格斯兩人對他們的態度可參看本卷註釋（57）。

杜林是一位大學教授。他出版了幾本書來攻擊科學社會主義，並拿出自己非常糊塗的，似乎是社會主義的理論來與牠對立。杜林底理論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內得到許多擁護者。因此恩格斯曾做過許多文章去駁他，這些文章後來印成了一本專書，這就是著名的杜林先生。

所作的科學革命（簡稱駁杜林）。恩格斯這本書在發揮和宣傳馬克思主義方面起了極大的作用，而且至今還算是說明馬克思主義基礎的一部好著作（俄文譯文已於1929年由馬克思恩格斯學院出版了）。



